



ISSN 3080-3039
eISSN 3080-3047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Modern Education



WISVORA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2026

第2卷第2期

2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主辦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Wisvora Publishing

編輯出版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編輯部

編輯部郵箱 jyxb@wisvora.com

投稿地址 www.wisvora.com



HONG KO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THINK TANK LIMITED
香港社會科學學術智庫有限公司

总编辑 梅见华

编辑委员会

陳科存	孫文傑	蘇天	穆艾偉	熊森浩
劉偉偉	呂憬巖	黃少安	劉宇	葉明裕
陳曦	景瑞賓	崔健	王正威	李澤宇
姚金芳	李明蔚	吳鈺雙	穆尚海	曹一君
陳立立	舒波	袁臣輝	郝澳茹	

版权声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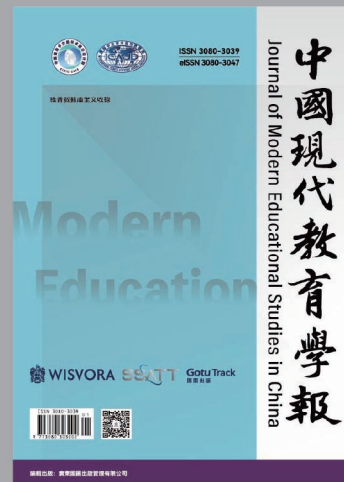
文章版權由文章作者所有，單篇文章由 Wisvora Publishing 正式出版，所刊載文章均依照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進行許可。根據該許可協議，任何第三方在明確署名原作者與出處的前提下，均可對本刊內容進行複製、傳播、演繹使用，無需作者及出版社另行個別授權。



Gotu Track
国图出版

廣東國圖專注於數位學術出版基礎建設與學術服務創新，致力為全球科研工作者提供專業、規範、高效的出版支援。公司透過建置數子期刊平台、孵化高水準學術期刊、提供國際出版服務，通過出版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推動學術界與社會各界的對話與合作。

www.wisvora.com gotu-track@wisvora.com



國際標準連續出版物號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網上出版 ISSN 3080-3047

維普數據庫全文收錄

出版社: Wisvora Publishing
維思沃爾出版社

地址: 香港新界將軍澳景嶺街 99 號啟德
工業大廈 8 樓 D07
publisher@wisvora.com
www.wisvora.com

中國大陸編輯出版
廣東國圖出版管理有限公司

本刊依投稿原稿字體發行
不作繁簡互轉調整



WISVORA
Publishing



微信扫一扫

Q 维思沃尔出版

目 錄 TABLE OF CONTENTS

核心素養視域下高中英語單元“教-學-評一體化”設計研究——以外研版必修三 Unit2 “Making a Difference”為例-段如夢、李曼曼	1-6
高校思政課“講好中國故事”的實踐路徑-梁楚晨	7-11
開放性主題活動的實踐探索與價值重構——以大班“春日遊‘計’”為例-李雙雙	12-16
AIGC 賦能下廣州紅色文化品牌青年傳播策略體系構建與教學啟示研究-祁俊	17-25
“雙減”背景下小學語文單元整體教學與作業設計一體化研究-南風臣	26-31
基於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學英語四、六級聽力測試開發及資源庫建設研究-過君琰	32-40
數字技術賦能下 UI 設計智慧課堂的“三維融合”改革實踐——基於《交互設計工作坊》課程-曹楚怡、龍海鳴	41-45
苗族泥哨 IP 形象設計研究——以“苗疆印象”為例-謝明陽、顏麗燕、文秀、黃珊	46-50
“祈靈”節慶系列海報設計解析-文秀、呂苑、黃珊	51-55
“賽教融合+項目驅動”的實踐教學創新模式研究——以《新媒體產品設計與項目管理》課程為例-李文琦	56-59
生成式人工智能賦能高中英語寫作教學：價值、沖擊及優化路徑研究-金嵐、徐婧英	60-66
立德樹人視域下高中英語閱讀教學中課程思政的路徑構建-徐婧英、金嵐	67-72
高等職業院校大學生職業勝任力評價體系建設研究-張一平、王凡、宋林、周軍、郭曉琳	73-79
從靜態遺存到動態再生：文物數字傳播中的符號激活與公共連接-徐沁怡、王奕然	80-83

核心素養導向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中英語閱讀教學中的應用現狀與優化對策-杜 俊、劉峻利	84-89
退課監測視角的在線課程個性學習與信息繭房推薦困境-習佳寧、施雯	90-97
學歷貶值現象的網絡輿情分析-劉心怡	98-104
人教版小學數學教材插圖的變化研究-陳丹	105-111
我國雙減政策工具選擇與組合邏輯研究——基於 2018-2025 年政策的文本分析-董寧寧	112-119
AI 賦能的雙師英語課堂模式構建與實踐研究-高淑婷、崔穎坤	120-126
英語教材中“講好中國故事”內容的教學實施路徑-崔穎坤、高淑婷	127-131
論新時代“教育家精神”的政治意蘊、理論表征與實踐路徑——基於馬克思主義教育觀的視域-張明、艾珂欣、應一卓	132-138
基於“金課”理念的地理學一流課程建設路徑研究-江進德、李子楊、羅雲娟、邢文旋	139-144
OBE 理念下高校籃球“學練賽評”一體化教學設計研究-楊帆、吳秋燕	145-150
高校在少數民族武術傳承中的多維功能與實踐路徑研究——基於各民族區域的實證研究- 丁惠炯	151-157
性別比例失衡對學科英語專碩男生學習影響與對策思考-楊旭光	158-161
原型理論視域下小學語文神話教學的文化認同培育-陳文俊、孔豔洪	162-166
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社會市場邏輯與治理變革-劉心怡	167-172
中國社會與酒文化變遷-王路寧	173-178
立德樹人視域下高校輔導員“五育並舉”育人實踐研究-榮曉雯	179-184
職本建築設計專業畢業生就業困境及專業技能提升策略研究-周澧驪	185-191
鯨的認知與語境——中國古代鯨豚類的社會史深描-劉金歲月	192-198
AI 賦能下的母語者書法教學創新研究——以漢語言文學專業零基礎本科生為對象-池程遠	199-204

試論唇齟裂兒童生存系統重建的社會工作介入-秦嘉琪、陳涵涵、黃鈺玲、宋方港、倪宸好、 袁伊爾.....	205-209
應用型涉外法律人才需求分析與教育改革路徑-黃斌斌.....	210-214
教育鏡像與成長突圍：電影《我，許可》中青少年自我認同的教育敘事建構與價值闡釋- 王晨璐.....	215-219
精神內核、專業本體與行為表征：書法教師教學形象的系統塑造邏輯-秦祥、馬宇.....	220-224
高職院校微創業教育生態構建研究-王麗華、蘇媛媛.....	225-228
小學中高年級學生小團體現象的調查與引導策略研究-林婉君.....	229-236
科研反哺教學：將幹細胞與再生醫學最新科研成果轉化為教學內容的實踐-關曉穎、郭偉聖.....	237-241
人工智能賦能的高校數學課程混合式教學探究—以《複變函數與積分變換》課程為例-王立雄、 馬迪.....	242-245
數智時代廣播電視編導專業“真題真做”跨界融合路徑研究-戴露.....	246-251
芬蘭托育服務保教結合的制度邏輯及其教育啟示-董柯筠.....	252-258
面向新質勞動者的高職財稅專業課程體系創新研究-劉玉葉.....	259-263
地方高校現代產業學院建設與實踐-以山東理工大學“空間信息+”專精特新產業學院為例-王春光、蘇 天、劉建平.....	264-267
從資源轉化到信仰生成：地方紅色文化賦能大中小學思政課一體化的機制研究-張曉琳、梁昭.....	268-274
玩中傳承：民族節慶體育遊戲的幼兒教育轉化路徑研究-韓明慧、代如意.....	275-279
產出導向法指導下的高中英語讀寫教學實踐-曹改娟.....	280-284

核心素养视域下高中英语单元“教-学-评一体化”设计研究 ——以外研版必修三 Unit2 “Making a Difference” 为例

段如梦¹ 李曼曼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

摘要: 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改革背景下,“教-学-评一体化”被视为推动课堂转型、落实育人目标的关键路径。然而,实践中长期存在目标模糊、活动低阶等脱节问题,本研究采用案例研究法,基于逆向设计理论与形成性评价理论,构建了以“素养为本、评价先行、活动为桥”为核心的单元设计框架,包含“明确预期素养结果—设计评估证据体系—规划序列化学习活动”三阶段,以外研版必修三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为例,通过解构教材内容并开展系统性重构,设计了以“微公益项目”为驱动任务的“教-学-评一体化”单元方案。研究发现,该框架能够通过评价量规与序列化活动将抽象素养目标转化为可操作、可评估的语言实践任务,实现语言学习与意义探究的深度融合,对推动核心素养在课堂中真实落地具有实践参考价值。

关键词: 教学评一体化; 核心素养; 单元整体教学; 逆向设计; 高中英语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46

A Study on the Design of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Integr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Uni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re Competencies: A Case Analysis of FLTRP Book 3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Duan Rumeng¹, Li Manman¹

¹ Tai 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 zhong, Shanxi 03061,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core competency-oriented curriculum reform,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integration” is pivotal for classroom transformation, yet practical disconnects persist, including ambiguous objectives and low-order activities. Grounded in backward design and formative assessment theories, this study proposes a “competency-based, assessment-first, activity-mediated” unit framework with three phases: defining expected outcomes, designing assessment evidence, and sequencing learning activities. Us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Book 3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as a case, the study develops an integrated unit scheme driven by a “micro-philanthropy project.” Findings demonstrate that this framework operationalizes abstract competencies into assessable language tasks through rubrics and sequenced activities, integrating language learning with meaning exploration. This offers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authentic core competency implementation in classrooms.

Keywords: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Integration; core competencies; holistic unit teaching; backward desig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作者简介: 段如梦(2002—),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英语);

李曼曼(1998—), 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英语);

通讯作者: 段如梦

一、引言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2025年修订）》明确指出，英语课程旨在发展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使其成为具有中国情怀、国际视野和跨文化沟通能力的时代新人（教育部，2025）。这一目标导向要求英语教学实现根本性转型，即从过去以语言知识传授为核心，转向以主题意义探究为引领、整合发展的学科育人。在此背景下，“教-学-评一体化”被视为推动课堂转型、保障核心素养落地的关键路径与核心环节（王蔷、李亮，2019；程晓堂、谢诗语，2023）。它强调教学目标、学生学习活动与课堂评价的一致性，主张将评价深度嵌入教学过程，形成一个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有机整体（崔允漷、雷浩，2015；Black & Wiliam, 1998）。然而，许多课堂中的教学、学习与评价相互脱节，评价往往游离于教学过程之外，沦为孤立的、终结性的知识检测，未能有效服务于素养目标的达成（吴晗清、高香迪，2022；Lysaght et al., 2019）。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是一个承载着丰富育人价值的典型单元，其主题聚焦于“凡人善举与社会贡献”，旨在激发学生的同理心、社会责任感和行动意愿，这一主题是在英语课堂中实现“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者的统一的绝佳载体。

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构建“教-学-评一体化”单元设计框架，并以“Making a Difference”为例展开案例研究，试图为高中英语单元教学提供系统化、可操作的设计范例。下文将依次展开文献综述、理论框架、案例设计与讨论。

二、文献综述

本章旨在梳理与界定本研究的核心概念，对“教-学-评一体化”与“核心素养”的内涵及其关系进行深入探讨，结合“Making a Difference”单元主题进行具体阐释。

（一）教-学-评一体化

“教-学-评一体化”是当前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核心概念之一，它超越了将教学、学习和评价视为线性或孤立环节的传统观念，强调三者应围绕共同的育人目标，构成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王蔷、李亮，2019）。崔允漷与雷浩（2015）提出的“教-学-评一致性”三因素理论模型为其提供了重要基础，强调目标、教学与评价的一致性。在本研究中，“一体化”具体指在单元教学中，以

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发展为统领，将评价（特别是形成性评价）深度嵌入并贯穿于教学与学习全过程，使评价任务成为驱动学习、检验目标达成度的关键证据，教学活动成为支持学生完成评价任务、发展素养的阶梯，最终实现“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良性循环（程晓堂、谢诗语，2023；Cheng & Fox, 2017）。由此可见，国内研究已为‘教-学-评一体化’奠定了坚实的学理基础，但其论述多集中于宏观理念与原则层面，对如何在中观单元层面进行系统化、可操作的设计，尚未形成清晰的技术路径。

（二）核心素养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包括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和学习能力（教育部，2025）。对于本研究聚焦的“Making a Difference”单元，核心素养目标需与“社会贡献”主题深度融合，具体表现为在文化意识上超越对中外奉献事迹的一般性了解，重点在于引导学生理解与认同“家国情怀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思维品质上要求学生运用批判性思维与创新性思维来审视“贡献”这一概念；语言能力上具体体现在围绕该主题进行有效理解、阐释、讨论、规划与展示的综合性语言运用上；学习能力则体现在学生为完成基于主题的探究性任务（如项目式学习）而进行的自主规划、资源整合、合作学习与持续反思中。现有对核心素养的解读多关注其静态维度划分，然而在真实的教学单元中，这些素养如何在学生完成复杂任务的过程中实现动态融合与协同发展，仍是待深入探索的实践命题。

（三）研究现状及不足

国内外关于“教-学-评一体化”及其在英语教学中应用的研究日益丰富。国际研究方面，早期关于形成性评价的经典论述（Black & Wiliam, 1998）为本研究提供了评价促进学习的基本原理。课程改革背景下对“评价、教学与学习一致性”的强调（Lysaght et al., 2019），以及“逆向设计”这一系统化课程设计模式（Wiggins & McTighe, 2011），为“一体化”的实践提供了成熟的方法论指导。国内研究则在引进吸收的基础上，紧密结合本土课改实践进行了深化，王蔷与李亮（2019）系统阐述了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课堂“教—学—评”一体化的意义与路径，具有纲领性指导作用，崔允漷团队（2015）的理论模型为一致性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后续研究从不同角度进行拓展，如探讨其在写作教学（肖丹、原卓珺，2022）、阅读教

学(徐伟贻, 2025)中的具体应用, 或反思其实践困境(吴晗清、高香迪, 2022)。近年来, 研究更趋向于与“大概念”(李海青等, 2025)、“逆向教学设计”(古敏, 2024)等结合, 寻求更落地的操作方案。

然而,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理论阐释或单一课型, 缺乏对完整高中英语单元的系统化、全流程设计研究, 尤其在“素养导向”与“评价先行”的结合上, 尚未形成可广泛迁移的操作模式。因此, 本研究尝试以逆向设计为路径, 结合形成性评价工具, 构建一个适用于高中英语单元的“教-学-评一体化”设计框架, 并通过外研版必修三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这一具体单元为例进行验证。

三、理论基础

本章旨在梳理本研究的理论基础, 以“逆向设计”与“形成性评价”理论为支撑, 进行探讨研究。

(一) 逆向设计理论

本研究主要采用 Wiggins 和 McTighe (2011) 提出的“逆向设计”理论作为核心设计框架。该理论主张教学设计应遵循“确定预期结果—确定合适的评估证据—设计学习体验”三个阶段。这一“以终为始”的理念与“教学评一体化”的要求高度契合, 应用该理论于本单元, 意味着首先要凝练单元“大观念”与核心素养目标, 然后设计一个综合性的表现性评价任务(如“制定并推介一项社区微公益计划”)及相应的评价量规, 最后再逆向规划出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学习活动, 确保教学直接指向评价任务所要求的能力和素养。

(二) 形成性评价理论

Black 和 Wiliam (1998) 关于形成性评价的研究指出, 嵌入教学过程旨在获取并利用反馈以调整教学与改进学习的评价, 对提升学习成效具有显著作用。在本单元语境下, 由于学习目标涉及价值观内化与行动规划, 强调“自我反思”与“同伴互评”的评价方式尤为关键。学生通过“反思日志”回顾自己对“贡献”认识的演变, 通过“同伴互评表”评估同伴方案的可行性与创新性, 这些不仅是收集学习证据的过程, 其本身更是深度学习和社交性互动的过程(Cheng & Fox, 2017)。

综上, 本研究将以逆向设计理论为宏观设计蓝图, 确保教学、学习与评价在单元层面的结构性一体化; 同时以形成性评价理论为微观实施指南, 特别注重设计反思性与合作性评价工具, 使

评价在课堂动态过程中持续发挥促进学习与素养发展的功能, 二者共同构成支撑本案例设计的坚实理论基础。

四、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评一体化”单元设计

框架构建

基于上述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本章旨在建构一个以发展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为宗旨、以逆向设计为路径、以形成性评价为驱动的单元“教-学-评一体化”设计框架。

(一) 设计理念与原则

本框架的构建遵循“素养为本、评价先行、活动为桥”的核心设计理念。素养为本是指单元设计的起点与归宿是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融合发展。评价先行是指借鉴逆向设计理论, 将评价置于教学活动规划之前进行思考(Wiggins & McTighe, 2011)。活动为桥是指学习活动是连接“预期素养结果”与“评估证据”的桥梁。活动的设计是为了使学生能够成功地产出评估证据、逐步建构对“大概念”的理解而精心规划的序列化经验(古敏, 2024)。活动应提供必要的思维与语言支架, 引导学生从已知走向新知, 从理解走向应用与创造。

(二) 三阶段设计模型

基于 Wiggins 和 McTighe (2011) 的逆向设计理论, 结合英语学科教学特点, 本研究构建了核心素养导向的单元“教-学-评一体化”三阶段设计模型。

1. 明确预期素养结果

本阶段的核心是将课程标准的要求、教材单元的主题内容与学生的实际学情相结合, 凝练出单元的“大概念”和具体的、可观测的核心素养学习目标。

(1) 要深入分析单元主题(如“Making a Difference”), 追问其超越事实性知识的深层含义与可迁移价值, 可提炼为“个体的积极行动, 无论大小, 都能基于同理心与责任感推动社会向善发展。”大概念为整个单元的学习提供了意义锚点(李海青等, 2025)。

(2) 制定可观测的素养目标, 基于大概念, 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四个维度出发, 叙写具体的学习目标。目标应使用可观察、可测量的行为动词(如“分析”、“比较”、“设计”、“阐释”), 明确学生在学习结束后能做什么以及能理解什么(Wiggins & McTighe, 2011)。

2. 设计评估证据体系

在明确目标后,需优先设计能够证明目标达成的评估证据,包括终结性表现性任务与贯穿过程的形成性评价。

(1) 设计终结性表现性任务与量规,设计一个真实的、复杂的、需要综合运用所学知识 with 技能的任务,直接对应单元大概念和核心素养目标。同时,开发与任务配套的评价量规,量规应清晰描述从“优秀”到“待改进”各个等级在相关素养维度(如:内容深度、思维逻辑、语言运用、合作效果)上的表现标准。

(2) 设计形成性评价工具,为学习过程中的关键节点设计多样化的形成性评价工具,这些工具旨在收集学生理解与发展的过程性证据,并提供即时反馈(Black & Wiliam, 1998)。例如:观察清单用于记录学生在小组讨论中表现出的思维层次与合作行为;同伴互评表用于在项目草案阶段提供建设性反馈,这些工具共同构成一个促进学习的“反馈循环系统”(Cheng & Fox, 2017)。

3. 规划序列化学习活动

依据前两个阶段的输出,规划能够引导学生成功完成评估任务、达成学习目标的一系列学习体验。

(1) 从终结性表现任务的要求出发,逆向分析学生需要掌握的关键知识、技能与理解,并将其分解为一系列循序渐进的子任务或学习环节(古敏, 2024)。

(2) 围绕子任务,设计具体的、吸引人的学习活动,这些活动应遵循 WHERE TO 原则,确保学生明确目标(W)、被主题吸引(H)、有机会探索与体验新内容(E)、能反思与调整学习(R)、能初步练习与展示(E),并获得差异化支持(T),整个教学过程组织有序(O)。活动设计应确保每一项主要活动都与阶段二的某种评估证据收集相关联,或直接为完成终结性任务服务,从而在课堂层面实现“教”、“学”、“评”的即时性统一(程晓堂、谢诗语, 2023)。

通过以上三阶段的系统化设计,单元教学得以成为一个目标清晰、证据确凿、活动支持有力的有机整体,为核心素养的落地提供了可操作的实践路径。

五、案例研究与设计

本章为设计型案例研究,旨在展示“教-学-评一体化”框架在具体单元中的应用过程,本研究暂

未涉及实际教学实施与学生数据收集,重点在于提供一种可操作的设计范例。下文将依据上文所构建的“核心素养导向的教-学-评一体化单元设计框架”,以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为例,具体展示该框架的应用过程,回答如何在一个以育人价值为核心的单元中实现“教、学、评”的深度整合。

(一) 案例单元内容解析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围绕“社会贡献”这一核心主题展开,其核心阅读课文(Understanding ideas)通常以一至两位中外杰出人物(如特蕾莎修女、袁隆平等)的事迹为主线,阐述他们如何以其非凡奉献改变了世界。Developing ideas 部分往往拓展视野,引入社区志愿者、环保行动者等“平凡英雄”的故事,展现“贡献”的多元性与可及性。Using language 板块聚焦于与主题相关的词汇、语法及功能语言训练。Presenting ideas 和 Project 部分则通常要求学生围绕“如何帮助他人”或“介绍一位榜样”进行口头或书面输出。整套教材内容从“典范引领”到“身边故事”,再到“语言应用”与“自我表达”,结构清晰,旨在层层递进地引导学生理解主题。

(二) 基于“教-学-评一体化”框架的批判性分析

尽管教材编排体现了主题的渐进性,但若以第三章构建的“素养为本、评价先行、活动为桥”的框架进行审视,其原生设计在“一体化”方面存在显著脱节,具体表现为目标模糊、活动低阶、评价滞后。

第一,目标上停留于理解与记忆,缺乏可迁移的素养表现预设。教材的教师用书或单元导引中预设的目标多表述为“理解课文主要内容”、“学习并掌握相关词汇和表达”等,这类目标主要指向对特定文本信息的理解和对既定语言知识的掌握,属于相对低阶的认知活动(吴晗清、高香迪, 2022),它们未能明确提出如“能批判性评估不同贡献方式的价值与局限”等可迁移的、整合性的核心素养表现。第二,活动上以输入与操练为主,缺乏驱动性的高阶输出任务,单元内的学习活动以阅读理解题、词汇填空、句型转换、基于模板的对话或写作为主。这些活动本质上是对输入信息的提取、复现和有限应用,属于“教材内容驱动”而非“素养表现驱动”(程晓堂、谢诗语, 2023)。第三,评价上侧重知识检测,缺失对价值观与思维过程的评估设计。教材配套的评价(如课后练习、单元检测)绝大多数是封闭式的、有唯一正确答案

的题目,主要评价对课文事实的记忆和对语言形式的掌握(Lysaght et al., 2019)。评价与高阶的素养目标严重脱节,无法为教学提供促进学习的反馈(Black & Wiliam, 1998),加剧了“教、学、评”的分离。

综上,原生教材设计在目标、活动与评价三者之间未能形成以素养发展为导向的一致性闭环,为落实核心素养,必须对单元进行以终为始的重构设计。

(三) “教学评一体化”单元重构设计实践

遵循逆向设计三阶段模型,我们对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进行重构。

1. 明确预期素养结果

此单元大观念是指个体的积极行动,无论大小,皆源于内在的责任感与同理心,并能汇聚成推动社会向善发展的力量。四维核心素养目标分别为语言能力上能准确运用描述贡献、阐释动机、论证价值及规划行动的相关语言,完成从理解到创造的多模态表达。文化意识上能理解并阐释中外杰出人物及普通志愿者行动背后的价值取向(如仁爱、奉献、科学精神、公民责任),增强社会参与意识。思维品质上能对比分析不同时代、领域、规模的“贡献”之异同、价值与实现条件。学习能力上能通过小组协作,制定计划、分工收集信息、整合资源,并运用反思与互评策略,持续优化项目成果。

2. 设计评估证据体系

进行形成性评价设计,在学习课文时,使用“人物贡献动机-方式-影响”对比图,评价学生信息整合与比较分析的能力(思维品质);要求学生在单元学习的不同节点,用英文记录自己对“何为真正的 difference”、“谁可以 make a difference”等问题的思考变化,评估其价值观的内化过程(文化意识、元认知能力);在项目计划书撰写中期,小组间依据简化版的评价量规进行互评,提供关于“创意”、“可行性”等方面的具体反馈,促进学生作为“学习资源的彼此提供者”(Cheng & Fox, 2017)。

3. 规划序列化学习活动

所有活动均以支持学生最终完成“微公益项目”为核心目标进行逆向规划。活动不止于理解课文事实,而是引导学生使用图形组织器,深度分析课文中人物做出贡献的内在驱动(如信念、情感)、外在条件与行动策略。同时,学习并归纳

描述贡献、阐述原因的相关语言表达。比如组织研讨会,探讨“在当代社会,青年学生可以通过哪些形式创造价值?”联系社会热点案例(如环保倡议、数字支教、社区敬老),拓宽对“贡献”形式的认知。之后引导学生初步审视校园或社区中可被改善的问题,并开始进行小组议题的头脑风暴。此阶段嵌入“反思日志”第一次记录。最终,举办“Youth in Action”公益项目提案会,各小组进行最终展示与答辩,师生共同依据评价量规进行评分。最后,引导学生通过最终一篇“反思日志”,回顾整个单元的学习历程与项目体验,实现从知识学习到实践体悟的升华。

通过以上三步重构,本单元的教学被转化为一个目标清晰(素养导向)、证据明确(多元评价)、活动支持有力(支架式学习)的有机整体,真正实现了“教学评一体化”,为核心素养在英语课堂中的落地提供了一个具体、生动的范本。

六、讨论与启示

本研究通过逆向设计构建“微公益项目”表现性任务,将宏大主题转化为学生可参与的英语实践——定义问题、设计方案、说服他人、评估效果(Wiggins & McTighe, 2011)。贯穿始终的形成性工具与多维量规使核心素养发展清晰可见(Cheng & Fox, 2017),有效回应了语言形式学习与主题意义探究割裂的困境:语言作为服务意义探究的工具,其工具性与人文性在完成公益项目的驱动下动态融合(王蔷、李亮, 2019)。评价量规更超越传统评分功能,成为“以评促学”的形成性工具(古敏, 2024)。

对一线教师的启示在于角色需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设计师”与“意义建构引导者”(李海青等, 2025),优先思考单元大概念与素养目标,提升评价素养,为学生提供思维工具、语言支持与过程反馈等学习支架(Cheng & Fox, 2017)。本研究局限在于缺乏课堂实证数据,且设计普适性有待检验。未来可开展行动研究,收集学生作品、反思日志等质性与量化数据验证效果,并探索支持教师系统性设计的校本专业发展机制(Lysaght et al., 2019)。

七、结论

本研究以核心素养为导向,以逆向设计理论和形成性评价理论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包含“明确预期素养结果—设计评估证据体系—规划序列化学习活动”三阶段的“教学评一体化”单元设计框架,并以外研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2 Making a

Difference 为典型案例,完整展示了该框架从原生教材分析到系统性重构设计的应用过程。通过案例研究,本文揭示了“教-学-评一体化”是破解核心素养在学科课堂问题的关键操作机制,以终为始的“教-学-评一体化”设计,不仅为教师提供了一套可操作的行动路线图,更深刻地指向了英语教育本质的回归,尽管本研究存在局限,但它为在高中英语课堂中深度落实课程改革理念提供了一个经过严密论证的设计范例与一个富有潜力的实践方向。

参考文献:

- [1] Black, P. & Wiliam, D. Assessment and classroom learning [J]. Assessment in Education,1998,5(1): 7-74.
- [2] Cheng, L. & Fox, J. Assessment in the Language Classroom: Teachers Supporting Student Learning [M]. London: Palgrave.2017.
- [3] Lysaght, Z., Scully, D., Murchan, D., O'Leary, M. & Shiel, G. Aligning assessment,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curricular reform and implementation[R]. National Council for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2019.
- [4] Wiggins, G. & McTighe, J. The Understanding by Design: Guide to Creating High-quality Units [M]. Alexandria, VA: Association for Supervision and Curriculum Development.2011.
- [5] 崔允漦,雷浩.教-学-评一致性三因素理论模型的建构[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5, 33(04):15-22.
- [6] 褚艳秋.优化关键环节:让“教学评一体化”真实落地[J].中小学管理,2023,(11):53-55.
- [7] 程晓堂,谢诗语.英语“教—学—评”一体化的理念与实践[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3,46(01):1-8.
- [8] 古敏.基于逆向教学设计的高中英语“教—学—评”一体化教学设计[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2024.7(10):20-24.
- [9] 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日常修订版(2017年版2025年修订)[S].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5.
- [10] 李海青,刘徽,邱爽.大概念视角下的“教学评一体化”[J].上海教育科研,2025,(01):8-13.
- [11] 林茜.在中学英语课堂教学中落实教学评一体化理念的策略[J].中国教育旬刊,2025,(S1):109-112.
- [12] 徐伟贻.“教学评一体化”视野下高中英语阅读课堂教学模式的构建与运用[J].现代基础教育研究,2025,57(01):183-187.
- [13] 肖丹,原卓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教-学-评一体化”构建与实践[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22,(03):64-67.
- [14] 王蔷,李亮.推动核心素养背景下英语课堂教—学—评一体化:意义、理论与方法[J].课程.教材.教法,2019, 39(05):114-120.
- [15] 吴晗清,高香迪.“教·学·评”一体化理念偏差与实践困境及其超越[J].教育科学研究,2022,(02):54-58+66.

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

梁楚晨

(海南大学, 海南 海口 570100)

摘要: 中国故事是中国人民对本民族历史传统与优秀文化的回顾、整理、加工并能体现出中华民族精神追求的精神文化成果,是植根于中国大地的宝贵精神财富。高校思政课肩负着立德树人的使命,也必须完成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精神。本文从“讲好中国故事”与高校思政课的关系以及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意义切入,分析当前“讲好中国故事”的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了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 高校思政课; 中国故事; 实践; 教学创新

基金项目: 2024 年度海南省研究生创新科研课题(Qhys2024-324)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47

The practical path of "telling the Chinese story wel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universities

Liang Chuchen

School of Marxism, Hainan University, Haikou, China

Abstract: Chinese stories are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s of the Chinese people in reviewing, organizing and processing the historical traditions and excellent culture of their own nation, and they can reflect the spiritual pursuit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y are precious spiritual wealth rooted in the Chinese land. This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a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well as the significance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nalyzes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ocess of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and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s for "telling China's story well"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words: Course of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universities; Chinese stories; Practice; Teaching innovation

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实现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是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门基础课程。随着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内容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新时代要求高校思政课要紧跟时代、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创新思政课教学方式、强化思想引领功能。而讲好中国故事就是新时代思政课教学改革、提升思想性、理论性和亲和力、针对性的内在要求。中国故事是植根于中华大地、由中国人创造出的具有积极意

义的事件。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可以提升高校思政课的人文性、艺术性、增强教学效果,还可以带动学生对高校思政课内容学习的兴趣和积极性。因此,探讨和完善“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路径,对于提升高校思政课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一、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性

“中国故事”是高校思政课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思政课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渠道,“讲好中国故事”的效用与完成高校思政课任务相辅

相成。当前,高校思政课程内容中不乏中国本土的案例与中国精神,这些案例与精神实际上就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通过学习和理解中国故事,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高尚情操,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和综合素质。中国故事讲述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的发展与变革,能够引发学生的爱国情感和归属感,促进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了解,从而带动学生对道德、法律、马克思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等高校思政课程内容的理解。并且,中国故事中的许多经典案例和人物的思想与行为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例如勇敢、忠诚、勤劳、诚实、宽容等等,这些价值观念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对中国故事的讲解有助于学生理解、接受、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 提升高校思政课的亲和力、说服力、实效性

新时代大学生思维活跃但尚未完全成熟、创新欲望强烈但缺乏规范意识,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列但分辨能力有待加强。传统保守的高校思政教师严谨规范的理论话语表达与新时代大学生的认知接受水平和喜好不相符合,难以激发其学习热情,容易导致学生“口服心不服”、课堂走神、课堂气氛低迷等情况。中国故事作为对中华民族历史与文化的回顾,兼具真实感与人文性、艺术性,是一种通俗易懂的内容表达形式。思政教师如果能在讲授理论知识的同时穿插富有感染力的中国故事的讲述,就让思政课变得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生活温度,就能提高思政课的亲和力。同时,中国故事包含着真实事迹,其中不乏普通人做出的英雄壮举,因此更加具体、具有可学性、更具说服力。在亲和力与说服力的双重作用下,学生会由衷地产生对兼具真、善、美的中国故事中的人物及其精神的佩服、崇拜与向往,从而提升了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

(二) 推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如何循循善诱、深入浅出、直击内心,关系到思政课能否达到沟通心灵、启智润心、激扬斗志的作用。在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能够在纵向与横向上拓展传统思政课的格局,横纵古今、汲取精华,使中国故事与马克思主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果碰撞、共鸣、发出

强音,从而更好地铸魂育人。

(三) 迎接当今时代与世界格局对大学生思想带来的挑战与冲击

当今,人类步入了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多姿多彩的纪元,多元文化碰撞的成果借助先进的科技手段在全世界广泛传播。然而,某些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在经济、科技与文化领域的影响力,刻意迎合年轻人的喜好,以电影、书籍、杂志、动漫等为年轻人所喜爱的形式进行意识形态的软性输出,企图在潜移默化中输出本国的主流价值观,以占领国外的文化、舆论、思想高地。在提倡面向世界、博采众长的同时,中国的大学生作为中国的未来、民族的脊梁,要担当起民族复兴的大任,就必须增强对腐朽文化的辨别力,时刻警惕西方不良价值观念的入侵,坚定理想信念。高校思政课作为覆盖全体大学生的关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阵地,在坚决抵抗外来不良倾向入侵、保证方向绝对正确的同时,应该积极运用科学的方法、先进的手段、有趣且动人的讲述方式加工中国故事,使教学内容摆脱生硬死板、使课堂摆脱照本宣科,调动大学生学习思政知识的积极性,增强大学生的民族自豪感与自信心,强化大学生理想信念与家国情怀,能够始终坚定中国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立场。

二、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存问题

(一) 内容的选取缺乏针对性

当前,高校思政课课堂内容对于中国故事的选取尚未设计出一套科学的标准体系,课堂上所采用的中国故事案例重复概率高且有时在与理论和课堂主题结合时略显笼统、牵强。思政课所讲的中国故事必须为思政课教学服务,能证明教师所讲的理论观点。如果思政课中的中国故事素材与课程教学契合度不够,缺乏针对性、指向模糊,就难以使学生认同故事本身和相关理论,课堂讲授也无法深入人心、鞭辟入里,实效性有所欠缺。

(二) 教师的讲述缺乏感染力

作为思政课教学活动的直接实施者,思政课教师的能力直接关系到中国故事是否能够被讲好。在教育实践中,部分思政课教师的能力在一些方面还有所欠缺,例如:一是遴选故事的能力不足,比如选取的故事与课堂主题不够契合,导致“顾左右而言他”,中国故事的插入反而使课堂出现“跑题”,必然难以达到感染学生、使学生印象深刻从而愿意更进一步了解相关理论的效果;二是讲解

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还有所欠缺,教师自身对“中国故事”的理解不够深刻、讲课功底不够扎实,难以承担起向学生传达中国故事、使学生被中国故事打动的任务。

(三) 课堂弱化学生的主体性

传统的思政课教学以教师为主体,课堂形式以教师讲授为主导,课堂内容立足于课本,本质上是教师对学生的单向输出课本内容。从课本观点出发,教师讲,学生听,学生观点的发表主要依靠课上的短时间的发言和交流,发挥空间有限,同时也因为班级人数众多而导致教师难以顾及到每个学生真正的想法和观点。这种教学方式使得学生的声音容易被忽视,即使学生的认识有错误和偏差也难以得到矫正,每个学生仅通过阅读课本、教师输出或者短时间的个人展示与教师点拨难以充分理解、认同故事及其相关理论内容,以至于在思政课中虽然讲了中国故事,但由于缺乏与学生的互动和共鸣而未能达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四) 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巩固成效

当前,高校的思政课往往形式拘泥于传统课堂的“上课、作业、考试”模式,重视理论、轻视实践,课内课外都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作为理论知识教授的补充。思政课作为大学公共必修课程,包含多门具体课程,覆盖全校各年级各专业学生,目前常见的实践活动有学校统一组织观看、参加的线上或线下的宣讲或演讲活动,通常由学院或年级组织的参观革命圣地、展览馆或进行实地走访调研活动。但统一组织的活动通常因为人数过于巨大、硬件有待提升或重要人员难以到位而导致开办难度大且效果不佳,学生普遍感到参与感底下、内容缺乏实感或者枯燥无聊、难以投入。总体来说,相当数量的高校针对于思政课且涉及到讲好中国故事的实践活动无论是形式还是数量,都不够丰富,实效性也有待提升。

三、新时代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路径

(一) 筛选、优化作为教学内容的“中国故事”

“中国故事”是中华民族千年来奋斗历程、优秀品质与美好向往的结晶,是高校思政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宝库。海量的内容为思政课的选材提供了广阔范围,但为了保证授课的实效性,故事的选用应该仔细斟酌。

第一,思政课讲授的中国故事,要有正确的立场和价值导向,同时贴近当代大学生的生活实

际和思想实际。大学生正处于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需要有针对性地加强对他们的正面宣传教育和引导。为了让中国故事发挥正面激励作用,应着重选取道德模范人物故事、法治故事、奋斗故事、民族英雄故事、红色革命故事等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公不应该仅限于大人物、大英雄,情节也不一定要波澜壮阔、跌宕起伏,那些平凡但又在勤劳、善良等美德中孕育出伟大的中国人的故事同样可以成为生动的教材,这些故事更加贴近日常生活,可学性、可借鉴性强,同样可以对大学生起到激励、示范作用。

第二,在选取中国故事作为课堂素材时,可以对较为小众的故事多加考虑,这样更能引起学生的新鲜感,让学生对故事情节好奇从而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有些过于广为人知的故事,学生已经对其有了完整的了解,如果不进一步深入挖掘故事的内涵和细节,也不进行设计和加工,那么这些故事就很难吸引学生的兴趣。因此,我们应该结合实际的课程内容,精心选择中国故事,设计故事情节,深挖故事内涵和细节,同时运用图画、视频、音乐等形式,为学生打开中国故事的宝库,引导学生在中国故事的体验中感悟中国精神,逐步坚定理想信念,促进学生更好地成长成才。

第三,组织编写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中国故事”专门教材。当前,市面上并没有出版可以用于大学思政课讲授中国故事的配套教材。有关部门要注重大学思政课的中国故事教材设计,打造符合时代要求、具有针对性的教材资源,为教师讲好中国故事提供有力保障。可以从在整合旧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新教材内容的创新,尽可能发挥中国故事资源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优势。教材内容要贴近时代,注重与大学生日常学习与生活的关联性,选取的案例应具有真实性、可模仿性,融入当前的热点、焦点话题和问题,增强教材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同时,强化教材的知识性和思想性,让学生学习必要的理论知识的同时获得思想启迪。单纯的知识性内容难免枯燥乏味,因此思政课教材可以借助中国故事的人文性、艺术性优点,在对大学生进行思想理论引导之际用大学生更容易接受的故事形式强化教学中的价值观教育和人文性感化。

(二) 丰富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可运用的载体和媒介

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各种功能强大的应用软

件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大学生群体的娱乐活动与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一新形势下,高校思政教育需要应对新的挑战:传统的思政教学方式通常围绕着教师、课本和教室展开,教师讲授,学生听取,容易造成单向输出和照本宣科的现象,因而吸引力低下。但传统教学模式的优点也不可忽视,如教学过程更加具有针对性,课堂管理便利且直接有效等。因此,高校思政课的教学形式应利用各类网络平台的高人气、高热度、高流量的优势进行改革,以“讲好中国故事”,使教学效果最优化。一方面,高校思政课需要继续发挥传统课堂教学的优势,坚守阵地,保证对学生的影响力和立场、方向的正确性;另一方面,思政教师需要利用新媒体讲好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在学生日常活动以喜闻乐见的方式穿插思想政治教育,提高课程的亲和力和受欢迎程度,避免学生对思政课产生抵触心理。高校思政需要主动适应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把握机遇、顺势而变、迎难而上,充分发掘、发挥各类软件的思想教育功能,将传统教学形式与网络平台相融合,拓展新时代的思政课与中国故事的传播路径。

(三) 提升高校思政课教师的教学素养

具有高水平学科素养的高校思政教师队伍是“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保障,

必须积极推动高校思政教师队伍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高校思政课教师若要成为一名合格乃至优秀的“中国故事”讲授人,就必须加强对中国故事的研究和学习,增进自身的理解和把握。思政教师还需要不断提高讲解水平,运用思想政治教育的方法和艺术,通过语音语调、肢体动作的转换与教学工具的配合,抓住教育的时机,精准把握学生情感与思想上的共鸣点、聚焦点和共同的疑惑作为课堂的切入点,使“中国故事”入脑入心。高校思政教师还应当提升自身的修养和人格魅力,积极主动带头践行自己所提倡的理念、精神,成为学生心中的榜样和模范,书写当代的、身边的“中国故事”。同时,相关部门和学校应组织教师参加相关培训和交流活动,促进师资队伍的实现专业化、学术化和国际化。

(四) 高校思政课采用更加凸出学生的主体性的教学模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政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要做到“以人为本”,实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相结合。高校思政课既要重视理论知识的传

授,又要重视情怀情操的培养。高校思政课针对的对象以青年为主,思想趋于独立但尚未成熟,并非处于“人云亦云,亦步亦趋”的状态,因此不能只在单方面强调教师是否讲好中国故事,只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这样只会适得其反、事倍功半甚至引起学生的逆反心理。在思政课上,应当更加注重学生对中国故事的思考、理解与感悟,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教师的主导性与学生的主体性应该做到相互补充、相辅相成,使单向的理论灌输变成双向的知、情、意、信、行的互动,使教师的知识、教材传递的精神和学生的思想融为一体。因此,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必须以学生为中心,坚持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喜好,利用科学的方法、得当的技艺使中国故事深入人心。“翻转课堂”对于高校思政课是值得利用的教学模式。教师要求学生在课前查阅、收集资料,挖掘出好的中国故事,可以将其转化为幻灯片、短视频等形式,辅以自己的理解、创意在课堂上进行阐述或展示。在这一环节中,应强调发挥学生的思想性。同时,教师应参考学生的讲述,剖析学生的思路 and 心路历程,从而分析出大学生真正需要的、欠缺的、希望的是什么,以此来改进教学,以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

(五) 组织以“中国故事”为主题的实践活动以强化课堂教学效果

是否“讲好中国故事”,其衡量的标准不能局限于课堂当堂的氛围与效果,还要考察学生是否做到知行合一。一切的思想、理论,只有在投入实践后,才能不断巩固、走向成熟、转化为客观的行动从而改造现实世界。因此,各高校应该因地制宜,立足于本地、本地的资源、特色和条件,组织配套的“讲好中国故事”主题实践活动。以校内活动为例,每学期可以抽出一至两个课时,用于开展较为轻松活泼的活动,例如“中国故事”角色扮演活动,可以将学生划分为小组,以感兴趣的中国故事为原型设计剧本,各人扮演故事中的人物,模拟故事情境并在班级上进行演出,从而使学生在体会到乐趣的同时,通过亲身参与加深对中国故事中价值观念的领悟。再如,每学年可以组织一次参观校史馆的活动,通过讲解本校的杰出校友的生平与事迹,鼓舞学生的精神和斗志,拉近学生与中国故事中优秀人物的距离,激励学生向优秀前辈学习、书写以自己为主人公的中国故事。以校外活动为例,高校可以与博物馆、纪念馆、展览馆等单位进行沟通,定期选拔、输送

优秀学生担任“中国故事”的校外讲解员并给予一定奖励。再如,要求学生利用寒假、暑假返乡时间,挖掘自己家乡的“中国故事”,以幻灯片、动画、视频等形式为成果并于返校后进行展示。此类任务能够锻炼学生发掘、加工、宣传中国故事的能力,使学生在把握理论知识、亲身参与实践的基础上成为合格的“中国故事”的宣讲人。

参考文献:

[1] 孙楚航,许克松.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贯通人才培养体系的逻辑理路与实践创新[J].思想理论教育,2023(02):99-105.

[2] 蔡笑.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的路径研究[J].文教资料,2022(17):56-59.

[3] 徐刚,邹泽沛.新时代网络短视频育人的现实问题及其应对策略[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12):142-147.

[4] 宋珊.高校思政课讲好中国故事三维审视[J].中学政治教学参考,2022(31):80-82.

[5] 代玉启,朱惠羽.讲故事: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呈现方式[J].思想理论教育研究,2021(08):122-126.

[6] 汪亭友,李艳艳.上好思政课要打好“组合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3·18”讲话[J].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2021(01):89-94.

开放性主题活动的实践探索与价值重构

——以大班“春日游‘计’”为例

李双双

(常州市红溪实验幼儿园, 江苏 常州 213000)

摘要: 开放性主题活动是践行《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理念的重要载体^[1], 其核心在于回归幼儿生活经验、激发主动探究意识。本文以大班“春日游‘计’”主题活动为研究对象, 从活动设计、实施过程、多元评价三个维度, 探讨开放性主题活动如何融合自然教育、项目式学习与生活化教育理念, 实现幼儿核心素养的全面发展。研究表明, 以幼儿兴趣为起点、以真实问题为驱动、以多元体验为路径的开放性主题活动, 能有效培养幼儿的探究能力、合作意识与创新思维, 为幼儿园主题活动的深入开展提供实践参考。本文通过详细记录活动过程、分析教育行为与幼儿表现, 提炼出“计划—实施—反思”三阶支持策略, 并进一步从教师角色转型、课程生成机制、家园社协同等角度, 系统阐述开放性主题活动的实施路径与教育价值, 以期为一线教师开展类似活动提供可操作的框架与反思视角。

关键词: 大班幼儿; 开放性主题活动; 春日游计; 核心素养; 自然教育; 项目式学习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43

Practical Exploration and Value Reconstruction of Open-Themed Activities

—A Case Study of “Spring Outing Plan” for Senior Class

Shuangshuang Li

Hongxi Experimental Kindergarten of Changzhou, Changzhou, Jiangsu, China

Abstract: Open-themed activities are important carriers for implementing the concept of Guidelines for the Learning a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Aged 3 – 6. Their core lies in returning to children’s life experience and stimulating their awareness of active exploration. Taking the senior class theme activity “Spring Outing Pla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discusses how open-themed activities integrate the concepts of nature educ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and life-oriented education to realiz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core literacy from three dimensions: activity design,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Research shows that open-themed activities, which start from children’s interests, driven by real problems and take multiple experiences as the path, can effectively cultivate children’s inquiry ability, cooperation awareness and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provid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kindergarten theme activities. By recording the activity process in detail and analyzing educational behaviors and children’s performance, this paper extracts the three-stage support strategy of “Plan – Implement – Reflect”. Furthermore,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achers’ role transformation, curriculum generation mechanism and home-kindergarten-community collaboration, it systematically expound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open-themed activities, so as to provide an operable framework and reflective perspective for front-line teachers to carry out similar activities.

Keywords: Senior Class Children; Open-themed Activities; Spring Outing Plan; Core Literacy; Nature Education; Project-based Learning

¹² 作者简介: 李双双(1992—), 女, 幼儿园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学前教育。

一、引言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以下简称《指南》)明确指出,幼儿的学习是以直接经验为基础,在游戏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的。教师应“最大限度地支持和满足幼儿通过直接感知、实际操作和亲身体验获取经验的需要”^[1]。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学前教育正从“教师主导”向“幼儿主体”逐步转型^[2]。近年来,“儿童立场”“生活课程”“生成式学习”“项目活动”等教育理念不断融入幼儿园课程实践,倡导教育应根植于幼儿的真实生活,支持幼儿在主动探究中建构属于自己的经验^[3]。

然而,在实践层面,许多教师仍面临“如何放手”“如何支持”“如何评价”等具体问题。主题活动往往停留在教师预设的框架内,幼儿的“主体性”多体现为参与而非决策,活动过程缺乏真正的开放性与生成性。基于此,本研究以笔者所在班级开展的“春日游‘计’”主题活动为案例,尝试探索一种真正以幼儿兴趣为起点、以真实问题为线索、以幼儿自主计划与实施为主线的开放性主题活动模式。本研究不仅关注活动的外在形式,更着重分析教师在其中角色行为的转变、幼儿学习方式的转型以及课程价值的重构,以期为幼儿园开展开放性主题活动提供具有一定理论深度与实践参照价值的研究文本。

二、活动背景与主题缘起:捕捉生活中的教育契机

(一) 源自幼儿对话的课程萌芽

2024年3月中旬,常州地区气温明显回升,园内花草萌发。在一次户外活动时,多名幼儿在奔跑玩耍后提到“好热啊”,并由此引发了关于季节的讨论:“现在是春天了!”“我看到迎春花开了!”“红梅公园的梅花特别好看!”孩子们七嘴八舌的议论,展现出他们对周围环境变化的敏锐感知和自表达的欲望。在随后的点名环节,当教师提问“春天你们最喜欢做什么”时,“春游”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幼儿的兴趣点高度集中,且与季节、生活经验紧密相连,这构成了课程生成的最佳起点^[3]。

(二) 基于年龄特点的教育考量

本班幼儿处于大班下学期,即将步入小学。根据《指南》及相关儿童发展理论,此阶段幼儿的自主意识、表达能力、合作意愿和任务意识均显著增强^{[1][2]}。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跟随,而是渴望参与决策、承担责任。将“春游”这一深受喜爱

的活动交由幼儿自己策划,正是对其成长需求的积极回应,也是对其即将面对的小学生活中“计划与执行”能力的一次前置性锻炼。

(三) 教师角色的初步定位:从“提议者”到“支持者”

在捕捉到幼儿的普遍兴趣后,教师并未直接宣布春游计划或设定方案,而是以平等协商的口吻提出:“你们已经长大了,这次的春游,我们可以试着自己来准备吗?”这一开放式的提议,将决策的主动权交给了幼儿。教师在此刻的角色,并非传统的组织者,而是兴趣的识别者、机会的提供者和后续学习的潜在支持者^[4]。幼儿热烈的响应,标志着本次活动从开端便确立了“幼儿在前,教师在后”的基本关系格局。

三、活动实施过程:幼儿作为课程共建者的“计划-行动-表达”三阶推进

整个“春日游‘计’”活动历时近一个月,自然形成了以幼儿自主计划为核心、以解决问题为驱动、以多元表达为延伸的三个阶段。每个阶段中,教师根据幼儿的需求提供差异化支持^[5]。

(一) 第一阶段:民主协商与集体决策——“我们要去哪里?怎么去?”

本阶段的核心目标是引导幼儿学习如何表达个人观点、倾听他人意见,并通过集体协商达成共识,初步体验社会生活的决策规则^[2]。

1. 个人意愿的表达与分类

教师鼓励幼儿用绘画的方式描绘自己最想去春游地点,并陈述理由。这一环节尊重了幼儿多元的表征方式^[6]。从作品和陈述中,目的地主要集中在三类:以自然赏花为主的“红梅公园”、以主题娱乐为主的“中华恐龙园”,以及其他零星建议(如小区花园、附近山坡)。教师将幼儿的图示进行分类展示,使抽象的意见变得可视化,为后续的深入讨论奠定了基础。

2. “春游去哪儿”辩论会的组织与实施

面对不同选择,如何决定?教师引入了“辩论会”这一形式。将支持不同目的地的幼儿分为三组,给予他们一定的准备时间,思考自己选择的目的地优势。辩论会上,教师担任主持人,明确“发言规则”(如举手发言、认真倾听、反驳要有理由),但不干预观点内容。

幼儿的辩论远超预期。支持红梅公园的幼儿从“距离近、可以走路去”“有很多花,很漂亮”“不

要门票（公园免费）”等实用和审美角度阐述；支持恐龙园的幼儿则强调“有很多好玩的游乐设施”“可以学到恐龙知识”。在自由辩论环节，“我反驳……”成为高频语句。例如，当一方说“恐龙园太远了，要坐车”，另一方则回应“我们可以一起坐大巴车，也很好玩”。这个过程，不仅是语言组织与表达能力的锻炼，更是逻辑思维、快速反应和基于事实说服他人的综合实践。最终，通过举手投票，“红梅公园”以绝对优势胜出。这一结果并非教师引导，而是幼儿在信息碰撞后做出的集体权衡，体现了初步的民主决策能力^[2]。

3. 出行方式与时间的共同规划

目的地确定后，新的实际问题产生：怎么去？何时去？教师提供了地图软件，与幼儿一起测量从幼儿园到红梅公园大门的距离，约为2.1公里。结合《指南》中“大班幼儿能连续行走1.5公里以上（途中可适当停歇）”的目标^[1]，幼儿一致认为“我们可以走过去”，这既是对自身体能的自信，也符合绿色出行的理念。关于时间，幼儿在日历上共同查看，考虑到需要时间准备物品、制作计划、邀请家长等，共同商定将春游日期定在两周后的周四。这些具体决策，让“计划”从抽象概念变得具体可感。

（二）第二阶段：合作规划与问题解决——“我们需要准备什么？”

本阶段聚焦于将宏观计划分解为可执行的具体任务，幼儿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学习分工、协作、计算与资源统筹^[4]。

1. 物品清单的梳理与“必需品”辨析

幼儿首先列出自己想带的物品，清单五花八门：水、零食、水果、垃圾袋、纸巾、垫子、玩具、水枪、相机、电话手表，甚至有人提出带充电宝。面对长长的清单，教师抛出问题：“我们的书包空间和体力有限，所有东西都必须带吗？哪些是必须的？”通过小组讨论，幼儿自发形成了分类标准：“喝的”“吃的”“装垃圾的”被公认为“必需品”；而玩具、水枪等属于“可以玩但不一定非要带”的物品。进一步，有幼儿提出“我们可以小组一起带”，比如一个小组带一大包零食分享，一个小组负责带垃圾袋和纸巾。这标志着幼儿思维从“个人清单”向“小组协作与资源共享”的跃升^[2]。

2. 超市采购：数学与财商的真实情境学习

为增强活动的真实感和幼儿的自主权，教师提议部分零食由幼儿用自备的10元经费采购。活动前，幼儿在家与家长初步制定购物计划，预估

价格。在超市中，他们需要寻找商品、核对价格、计算总价是否超过10元，并做出取舍（“薯片太贵了，我可以换一包饼干”）。有的幼儿发现“买两样就超过10块了”，于是主动寻找更便宜的商品或与同伴协商合买。这个过程，是10以内加减运算最生动、最迫切的运用场景，也让幼儿初次体验到“预算”“价格比较”“理性消费”等财商概念^[1]。

3. 人力资源的动员：制作邀请函，招募家长志愿者

当幼儿意识到仅有三位保教人员难以照顾近40名儿童外出时，人力资源问题自然浮现。有幼儿提出：“可以请我妈妈来！”如何正式地邀请？孩子们想到了“做一张邀请函”。他们用图画和简单的文字，制作了给家长的春游志愿者邀请函，写明了时间、地点和需要帮忙的内容。这一行为，将家园共育从教师的单向通知，转变为幼儿主动的沟通与动员^[3]。最终，除两名幼儿家长因工作实在无法调整外，其余家长全部踊跃报名。幼儿在解决安全问题的同时，也实践了社会交往与动员能力。

（三）第三阶段：体验回顾与创意表达——“如何留住春天？”

春游活动的圆满结束并非课程的终点。如何引导幼儿将愉悦的体验升华为更深度的学习与表达，是开放性主题活动的关键一环^[6]。

1. 春游过程的自主管理与沉浸体验

春游当日，幼儿自己背负装有物品的小书包，与同伴、家长志愿者结对，历时约30分钟步行至公园。整个过程中，他们遵守交通规则，相互鼓励，没有出现哭闹或掉队现象。在公园内，他们按事先分组分享食物、游戏（如事先商定的“两人三足”），并自由观察花草、树木。这种完全由自己参与策划并成功实现的体验，赋予了幼儿极强的成就感和自主管理意识^[4]。

2. “留住春天”的创意项目小组

返校后的分享中，孩子们纷纷感叹“春天太美了，好想一直看到”。教师顺势引导：“我们可以用什么方法把春天‘留住’呢？”幼儿的想法充满童趣与创意：拍照、画画、做干花、捡落叶贴画……基于共同的兴趣，幼儿自由组合成了三个项目小组^[6]：

“咔嚓娃”摄影组：借用幼儿园的旧相机或儿童相机，在园内寻找春天的痕迹进行拍摄，学习简单的取景构图。

“写生”绘画组：带上画板、画笔，在户外写生，将眼中的春色转化为纸上的图像。

“花花世界”手工组：希望制作干花标本。在得知不能随意采摘公共区域花朵后，他们尝试到各班自然角“协商求助”，成功获得一些掉落的花朵和叶片进行创作。

这三个小组的活动完全由幼儿主导，教师仅提供材料和安全支持^[4]。幼儿在项目中持续探究、调整方法（如发现花朵直接压会变色、尝试不同干燥方式），最终通过摄影展、画展和手工作品展，向全园师生分享了他们的“春天收藏”。这个过程，完成了从感知体验到艺术表达、从个人情感到集体分享的完整学习闭环^[6]。

四、教育价值的多维透视：开放性主题活动的理念彰显

“春日游计”活动看似是一次普通的春游，但其背后蕴含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却值得深度剖析^[3]。

（一）儿童主体性的真实落地与深度实现

本次活动彻底打破了“教师设计、幼儿参与”的传统模式。从目的地选择、出行规划、物品准备到后期表达，每一个关键决策点都来自于幼儿的讨论与投票。教师的角色贯穿始终为：兴趣的捕捉者、过程的推动者、资源的提供者、安全的守护者和深度的提问者。当幼儿争论时，教师不评判对错，而是维护辩论规则；当幼儿遇到困难（如东西太多），教师不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抛出问题引导思考。这种“幼儿在前，教师在后”的互动模式，使得儿童的主体性不是一句口号，而是贯穿课程始终的行动逻辑^{[2][7]}。

（二）生活化与整体性学习的自然融合

活动根植于“春游”这一真实生活事件，所有学习内容都围绕解决真实问题展开。在这个过程中，五大领域的知识被有机整合^[3]：

科学与健康：感知季节变化，规划徒步行程，锻炼体能^[1]。

语言与社会：辩论、邀请、小组讨论，发展表达能力与社会性规则^[2]。

艺术：通过绘画、摄影、手工多形式表现春天之美^[6]。

数学：在超市采购中进行价格计算与预算管理^[1]。

这种学习是浸润式的、整体性的，幼儿为了“做好春游这件事”而自然而然地调用和习得各种知识技能，知识的内在关联性和实用性得到充分

体现^[8]。

（三）高阶思维与核心素养的协同发展

活动全程充满了问题解决的契机。面对“意见不统一”“资源有限”“人力不足”“如何表达美”等层层递进的问题，幼儿经历了分析情境、提出方案、评估选择、合作执行、反思调整的完整思维过程^[2]。这极大地促进了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沟通能力和合作能力——这些正是 21 世纪核心素养的关键组成部分。辩论中的据理力争、采购中的精打细算、邀请中的有效沟通，都是高阶思维在真实情境中的生动演练^[1]。

（四）家园社协同共育生态的构建

本次活动成功地将家长从“旁观者”或“配合者”转变为课程的“共建者”与“参与者”^[3]。幼儿自制邀请函的举动，赋予了家长一份被尊重、被需要的价值感。家长的积极参与，不仅解决了安全管理问题，更让他们亲眼目睹了孩子在计划、协商、执行中的成长，从而更理解并支持幼儿园“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理念^[4]。社区资源（超市、公园）也被自然地纳入课程体系。一个以幼儿活动为纽带，连接家庭、幼儿园与社区的微型共育生态得以形成^[5]。

五、教师的反思与专业成长：在支持儿童中重新定义教育

作为活动的设计者与亲历者，笔者的教育观念与实践能力也在过程中经历了深刻的洗礼与重构^[4]。

（一）信任与放手：迈向专业自信的关键一步

活动初期，最大的心理挑战来自于“不放心”。能否真的让幼儿决定？步行安全吗？辩论会变成争吵怎么办？实践表明，当教师给予幼儿清晰的规则框架和充分的信任时，幼儿往往能表现出超乎预期的责任感和能力^[2]。这份信任，源于对幼儿年龄特点和发展规律的尊重，是教师专业自信的体现^[6]。

（二）支持性策略的运用：从“教”到“促”的转变

教师的支持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更加精准和隐性。主要体现在：

1. 框架性支持：设立辩论规则、提供地图和日历工具、设定 10 元预算框架等，为幼儿的自主探究划定安全的边界和可操作的路径。

2. 提问性支持：通过开放式提问（“怎么办？”“为什么？”“还有别的办法吗？”）推动幼儿思考走

向深入^[2]。

3. 资源性支持：提供绘画材料、联系超市、协调家长时间、准备相机等，为幼儿的想法落地扫清障碍。

4. 情感性支持：在整个过程中鼓励尝试、接纳不同意见、庆祝每一次小的成功，营造安全、积极的心理氛围^[8]。

（三）课程生成能力的提升：与幼儿共同成长

本次活动不是按教案执行的，而是与幼儿共同书写的“活剧本”。教师需要时刻保持敏锐的观察力，捕捉幼儿话语中的兴趣点（如“留住春天”），并快速思考其可能蕴含的教育价值，灵活调整后继续活动方向。这种“计划—观察—回应—调整”的生成课程能力，是开放性主题活动对教师专业素养提出的核心要求，也是教师获得职业成就感和创造力的源泉^[4]。

六、启示与展望：让开放性主题活动成为常态

“春日游‘计’”是一次成功的尝试，其经验具有可迁移性和推广价值。

（一）开放性主题活动实施的关键原则

1. 始于真兴趣：课程起点必须是幼儿生活中真实、普遍关心的问题或现象^[3]。

2. 贯穿真问题：让幼儿在解决一连串真实的、有挑战的问题中学习，避免虚假情境^[1]。

3. 赋予真权利：将选择权、决策权、尝试权和犯错误的权利真正还给幼儿^[2]。

4. 鼓励真表达：支持幼儿用一百种语言（绘画、讲述、建造、表演等）来计划和表达他们的经验^[6]。

5. 建立真联结：将活动与家庭、社区资源自然连接，构建学习共同体^[5]。

（二）对幼儿园课程建设的建议

1. 管理层面：应为教师开展生成性、开放性活动提供弹性的时间安排和资源支持，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尝试的评价机制^[5]。

2. 教研层面：应组织教师围绕“如何观察幼儿”“如何有效提问”“如何平衡预设与生成”等主题进行深度教研，积累典型案例，形成实践智慧共同体^[4]。

3. 教师层面：需不断学习儿童发展理论，提升观察、解读和支持儿童的能力，勇于从舒适区

走向与幼儿共同探究的未知区。

七、结语

“春日游‘计’”活动已然落幕，但由它引发的关于儿童、关于课程、关于教育的思考却远未停止。在这个由幼儿亲手策划的春天之旅中，我们看到了当儿童被信任、被赋能时所迸发出的惊人力量：他们是有能力的思想者、有热情的行动者、有美感的表达者。开放性主题活动的价值，不仅在于让幼儿获得了知识与技能，更在于让他们体验了作为学习与生活主体的尊严、乐趣与力量。

教育的真谛，或许就蕴藏在这“鲜活的当下”之中——教师放下完美的预设，与幼儿一同投入真实的生活，在共同的计划、行动与反思中，彼此滋养，共同成长。这趟“春日游‘计’”，既是一次走向自然的远足，更是一次走向儿童心灵深处的教育探索。它启示我们，最美的课程，永远生长在儿童生活的土壤里，绽放在教师与儿童共构的旅程中。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M].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 [2] 李季湄，冯晓霞. 《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解读[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 [3] 虞永平. 生活与幼儿教育[M]. 合肥：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2011.
- [4] 刘占兰. 促进幼儿教师专业成长的理论与实践策略[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6.
- [5] 朱家雄. 幼儿园课程的理论与实践[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 [6] Edwards, C., Gandini, L., & Forman, G. (Eds.). The hundred languages of children: The Reggio Emilia experience in transformation (3rd ed.)[M]. Santa Barbara, CA: Praeger, 2012.
- [7] 屠美如. 向瑞吉欧学什么——《儿童的一百种语言》解读[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
- [8] 华爱华. 幼儿游戏理论[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

AIGC 赋能下广州红色文化品牌青年传播策略体系构建与教学 启示研究

祁俊

(广州工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800)

摘要: 围绕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在青年群体中视觉呈现与价值认同之间存在的落差, 本文以 AIGC 介入视觉传达课程教学为切入点, 探讨其在提升青年参与度与表达丰富性方面的实践路径。研究以《标志设计》《书籍设计》《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三门课程为行动研究场域, 围绕品牌视觉系统构建、主题叙事设计与跨平台内容原型展开教学实践, 并结合教学过程记录与学生作业材料进行分析。研究形成面向青年媒介语境的课程实施框架: 提出微叙事与在地符号结合的视觉表达方式, 构建可追溯的 AIGC 内容生成与真实性控制流程, 完善“学生共创—线上展示—反馈改进”的课堂组织结构, 并总结质量与伦理评价要点。研究为 AIGC 赋能红色文化品牌相关课程建设提供实践经验与路径参考。

关键词: 广州红色文化; 青年传播; 视觉传达设计; 生成式人工智能

基金项目: 2025 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常规课题 (共建) 项目《AIGC 赋能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形象视觉创新与青年群体传播策略研究》, 项目编号: 2025GZGJ23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49

Constructing a Youth-Oriented Communication Strategy System for Guangzhou

Red Culture Brands under AIGC: Implications for Teaching

Qi Jun¹

¹ Guangzhou College of Technology and Busines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800,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gap between visual presentation and value recognition of Guangzhou red culture brands among young audience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integration of AIGC into visual communication courses to enhance student participation and expressive diversity. Using three courses—*Logo Design*, *Book Design*, and *Traditional Art and Modern Design*—as action research contexts, the study explores curriculum practices related to brand visual system construction, thematic narrative design, and cross-platform content prototyping. Teaching process records and student work were analyzed to inform the development of a curriculum framework tailored to youth media contexts. The framework proposes a visual expression approach combining micro-narratives with local cultural symbols, establishes traceable AIGC content generation and authenticity control processes, implements a “student co-creation—online presentation—feedback revision” classroom organization structure, and summarizes quality and ethical evaluation criteria. The findings provide practical experience and guidance for integrating AIGC into red culture brand-related courses.

Keywords: Guangzhou red culture; youth communication;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作者简介: 祁俊(1997—), 男, 硕士, 助教, 研究方向文创设计;

通讯作者: 祁俊

一、绪论

近年来,广州持续推进红色文化资源开发与城市文化品牌建设,但在青年群体中的传播仍存在“可见但不入心”的问题:视觉表达偏纪念化、宣讲化,导致日常媒介语境中的距离感;同时,符号与叙事同质化易引发审美疲劳,难以在短视频与社交平台的注意力竞争中形成有效触达。与之相对,青年视觉接受方式正转向图像化、平台化与参与化——图像不仅承载信息,也承载情绪与身份认同;平台算法重塑观看路径;青年更倾向通过二创、拼贴、模因化与视觉再叙事参与意义生产。由此,红色文化品牌若仍停留在单向传播与固定语态,往往难以进入青年的日常传播链。

AIGC 作为新型内容生产工具,具备快速生成、多方案迭代和风格具备快速迁移等优势,在红色文化视觉传播中提,它使设计过程从单一的结果导向逐渐转向探索式过程,为青年从被观看者转向参与共创者、策展者与再阐释者创造了技术条件。但与此同时,AIGC 介入红色文化内容生产也带来历史真实性、文化准确性、风格趋同与伦理治理等风险,亟需一套可执行的质量控制与传播策略体系。

现有研究空白主要体现在三点:(1)关于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讨论多停留在宏观叙事与媒介渠道层面,缺少从“视觉语态—平台机制—青年参与”联动结构出发的策略框架;(2)AIGC 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研究多强调效率与技术展示,对“真实性/准确性可控”的评价指标、流程规范与伦理边界讨论不足;(3)以高校视觉传达设计教学为场域的证据较少,尚缺乏将课堂共创实践转化为可复制的品牌传播策略体系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AIGC 赋能下广州红色文化品牌的青年传播策略体系构建”为目标,选取笔者所任教课程班级(主要为专升本第三学期学生),关注其红色文化认知与意义建构、媒介使用行为、AIGC 工具接受度与内容共创意愿,并将思政教育、广州红色文化品牌建设、红色文化设计与 AIGC 教育应用开发者等协同主体纳入分析,呈现多主体共创机制。

本文聚焦三个研究问题:

RQ1: AIGC 介入红色文化学习与传播后,青年学生的意义建构与认知机制呈现何种特征?

RQ2: 如何在提升传播效果的同时,实现历史真实性、文化准确性与内容质量的可控,并形

成适配广州在地红色资源与岭南文化特征的伦理与质量评估框架?

RQ3: 如何引导青年从接受者转化为共创者、品牌设计者与再阐释者,其参与路径与实现机制为何?

研究方法采用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1],以“课堂问题—方案设计—实施—反馈—迭代”为基本循环。研究场域覆盖《标志设计》、《书籍设计》、《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三门课程(会计学中与周次以课程进度表为准),组织学生在 AIGC 辅助下完成品牌视觉系统、主题视觉叙事与跨平台内容原型^[2]。并通过课堂与课程任务获取青年认知与使用数据,结合生成内容的质量评估与传播表现(如叙事一致性、在地符号适配度、真实性风险点、平台传播语态匹配度等)进行分析迭代,最终沉淀“策略体系”。以课程教学实践为场域,揭示 AIGC 介入后青年在红色文化视觉学习与传播中的意义建构机制^[3];并将“课堂共创—生成控制—再设计—传播适配”的流程提炼为可复制的教学与传播策略模型;同时提出面向广州红色文化品牌视觉传播的 AIGC 内容生产规范与评估框架。

二、AIGC 介入视觉传达课堂的实践路径

在教学实践中,考虑到学生终端设备性能差异、软件采购与维护预算有限,以及“课堂集中教学+课后分布式创作”的混合场景需求,本研究对多款主流 AIGC 工具进行比选。评价维度涵盖可用性、易用性、跨平台兼容性与综合成本,并综合考虑青年群体的工具偏好与使用习惯。综合比较后,豆包 AI 与即梦 AI 在普惠可达性、轻量化接入与课堂任务适配度方面表现较好,因而被确立为核心辅助工具。该组合不是被动的资源妥协,而是一项面向“普惠覆盖+稳定协作”的教学设计决策,旨在以低门槛保障更广参与、以高适配支持更稳定的创作迭代。

工具选型的关键依据在于其对复杂教学情境的包容性与可扩展性:两者均可覆盖 Windows、macOS 及主流移动端,降低硬件门槛,使学生可基于电脑、平板或手机完成基础生成、迭代与优化;其图形化界面与提示词交互降低学习曲线,促使学生将更多认知资源投入创意构思、视觉叙事与文化要素转译,而非软件排障。为避免“只生成不设计”,课程将 AIGC 定位为“概念探索与原型生成”的工具,并通过过程性证据与再设计要求,

将生成输出纳入可训练、可评价、可追溯的设计闭环。

(一) 标志设计课程中的 AIGC 辅助实践

从行业需求看,标志设计岗位正向“视觉能力+技术协作^[4]+策略理解”的复合能力结构迁移。除形式控制与审美表达外,用人方更关注设计师对 AIGC 工具的协作能力,以及对 AI 产出的筛选、诊断与再设计判断力。AIGC 能够提升概念探索效率并支持多方向迭代,但其输出仍需要人工完成语义校准、品牌一致性控制与差异化加工。因此,课程培养应以 AIGC 为效率工具、以品牌逻辑为约束框架,重点训练“需求理解—概念生成—方案评估—再设计优化—交付呈现”的闭环能力,避免学生停留在生成与拼接层面。

标志设计课程处于从“以传统工具与形式训练为中心”向“以 AIGC 支持的概念生成与迭代优化”转型阶段。AIGC 虽能在短时间输出多方案草图并支持快速迭代,但也带来两类教学风险:其一,学生将生成结果等同于设计能力,弱化需求分析、语义校准与方案论证;其二,训练停留在“生成—筛选”的浅层操作,难以支撑真实项目所要求的系统化设计思维与可交付能力。面向专升本学生群体(基础差异较大),在 48 学时且任务密度较高的情境下,如何将 AIGC 纳入可训练、可评价的流程,并实现从概念到落地的能力闭环,是课程改革的关键。

课程采用“课堂讲述+单个辅导+项目实践”的混合教学组织,以真实市场项目为主线构建人机协作流程,将 AIGC 定位为“概念探索与原型生成”的工具,而非替代性创作主体。能力目标分为三层:①形式控制(构成、比例、可读性、识别度);②策略与逻辑(需求转译、品牌一致性、差异化论证);③AIGC 素养(提示词构建、生成结果评估、再设计优化与规范使用)。评价方式以过程性证据为主,强调设计简报、方向推导、迭代记录与最终交付物一致性,避免仅以最终视觉效果衡量学习结果。

课程共 48 学时(45 分钟/学时),班级规模 32—35 人,按“概念—策略—技法—落地”四阶段连续推进,形成可复制的训练路径第一阶段(概念建构):以命题短练完成“概念—形式”快速映射,AIGC 用于关键词驱动草图生成与风格对比,学生需完成形式归类、构成拆解与再设计改写,产出命题草图集与设计说明;第二阶段(策略建立):以真实项目推进资料梳理、受众与场景界

定、核心价值提炼与关键词体系构建,形成设计简报。AIGC 用于概念扩展与多方向草案生成,但以“三维筛选”约束:语义一致性、品牌适配性、差异化;第三阶段(技法巩固):围绕图形标/字标/组合标与平台适配训练比例、留白、可读性与识别度,AIGC 用于变体生成与风格测试,但必须以网格修正、结构精炼与应用检验完成人工再设计;第四阶段(交付落地):按“定稿—规范—应用—呈现”完成闭环,包括标准制图、色彩/字体规范、最小尺寸与禁用规则、社媒与物料触点适配,以及提案文档与路演表达。AIGC 主要用于应用场景快速模拟与多版本对照,但交付以人工控制的一致性与可执行性为准。

在 AIGC 介入后,学生对广州红色文化符号的理解呈现“加速—偏差”并存,其根源在于模型的模式生成机制与红色符号的历史语境、价值指向之间存在张力^[5]。一方面,“加速”主要体现在标志设计学习链路被显著压缩:在课程的中文标志、英文标志与以周年庆典为主的数字标志设计训练中,AIGC 能够依据你设定的命题(如“学校 60 周年庆典数字标志”,并延展到“未来学校升级为一本院校的情境设想”)快速生成多组构图方案、字体结构、数字“60”的组合逻辑与风格变体,帮助学生在短时间内完成从命题理解到形式原型的迭代;低门槛操作降低初学者进入成本,提升早期参与度;多风格样例也扩展了学生对“数字标志”可行表现路径的认识,提高试错效率,使课堂讨论更容易从“做不出来”转向“为什么这样做更恰当”。另一方面,“偏差”则更易在“红色符号的意义层”发生:由于生成依赖统计相关而非史实与在地经验理解,学生容易把“红色”简化为一种视觉情绪或通用庆典语汇,把广州在地的红色文化符号、学校自身的历史叙事与群体记忆,降格为可拼贴的装饰性素材;在你观察到的现象中,恰逢学校 30 周年时,学生方案大量集中于“红色帆船/轮船”以及若干广东地域元素——这类表达一方面说明纪念语境会自然推高“红色”与“航行/奋进”隐喻的使用频率,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当符号缺少史料支撑与语境论证时,容易滑向套模板式的象征(把“红色+船+地域元素”当作万能解),从而造成叙事被泛化^[6]、情感认同被同质化;同时,训练数据中的主流庆典视觉范式还可能进一步强化这种刻板路径,导致作品风格趋同、地方性与学校独特性被稀释。因此,教学上需要将 AIGC 严格定位为“概念探索与原型生成”的工具,而不是意义生产的替代者:在数字标志命题(学校 60 周年

庆典+未来升格情境)进入生成阶段之前,先以史料/校史研读与在地观察建立“叙事底座”,明确学校与广州语境下可被调用的红色文化资源及其价值指向;生成之后,以符号学核验与语境对照作为硬性约束,要求学生对AI草案逐项完成“语境核验—价值论证—再设计”:说明为何选用红色及其对应的历史与情感依据、为何使用帆船/轮船隐喻及其与学校发展愿景(尤其是“一本院校”设想)的关联、广东元素如何从“装饰”转为“叙事证据”,并通过字体系统、构图逻辑与周年数字语法的再组织,形成具有差异化识别度与意义准确性的最终方案。以此形成可操作的人机协作路径:用AIGC提升效率,用研究与论证守住语境与价值的准确性。

(二)书籍设计课程中的AIGC叙事与形式探索

书籍设计涵盖开本、纸张、字体与版式、装订工艺与印刷流程等整体设计工作。AIGC的加入改变了传统以设计师经验与直觉为中心的工作方式,使封面、版式与图像生成进入“多方案快速迭代”的算法驱动模式。其积极意义在于:缩短概念探索周期、提升系列化资产生成效率;潜在风险在于:算法偏好导致的美学趋同^[7]、叙事模板化与文化语境稀释^[8]。因而,课程的关键不在于“更快生成”,而在于通过叙事结构与形式控制,把AIGC纳入“内容理解—叙事建模—形式推演—校准修订—跨媒介延展”的学习闭环,从而平衡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

课程以“红色基因传承”与“设计美学演进”为主线,构建“价值引领—能力培养—素养提升”的三维目标。教学将红色叙事分解为可操作的三类任务:①史料与语境理解(阶段精神与视觉母题);②叙事结构搭建(时间线/空间线/人物线);③形式策略落地(字体、网格、色彩与图像处理)。AIGC被定位为“概念辅助与方案分叉”工具:在每一历史阶段先由教师给出史料边界与禁忌清单,再由学生通过提示词约束生成多个方向,最后以人工再设计完成风格校准与版式控制,确保输出可读、可证、可交付。为保证学生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语境理解—形式转译”的闭环,课堂以“命题卡+必选元素清单”的方式提供结构化输入,并配套典型图形参考与字体示例素材包;同时限定练习节奏(60—90分钟完成草图/线稿),强调对“时代风格—设计语言”转化能力的考察,而非精细制作本身。

在1949—2000年书籍设计风格教学中,课程

以“阶段特征—视觉语法—当代表达”组织内容,并通过三个具体命题将抽象的历史分期落实为可执行的设计任务:其一,“火红的篇章——建国初期的理想主义叙事”(1949—1978),围绕革命美学与政治宣传语境,要求学生在封面中调用红/金主色、典型政治符号(如红旗、齿轮麦穗等)与对称式构图,并在虚构书目(如农业合作化纪实、雷锋日记选读、工业英雄谱)中任选其一完成主题化叙事;其二,“春潮与沉淀——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与多元”(1979—1992),强调从单一政治叙事转向信息载体与生活化表达,要求使用低饱和对比色、生活符号或抽象线条,并通过图文错位与网格意识呈现“松动感”;其三,“新潮与秩序——市场经济浪潮下的商业觉醒”(1993—2000),要求以撞色/渐变、摄影/具象符号与更具冲击力的版式组织体现消费文化与商业传播逻辑。在工具路径上,学生需结合AIGC与图像参考平台(如花瓣、站酷)完成概念生成、风格对照与元素搜集,并按统一交付规范完成“封面—书脊—封底”三联设计,控制在一张横板A3范围内导出JPG提交,以便形成可比对、可归档的过程与成果证据链。

课堂观察显示,AIGC显著提高了迭代速度,但也带来风格趋同与符号表层化问题:学生更容易依赖“主流推荐风格”完成时代感模拟,而忽视对叙事对象与符号语境的证据化论证,因而出现“形式合理但语义失配”的情况。针对这一风险,课程将评估标准从“好看”转向“可证据化叙事”,并将其具体落实到作业提交要求之中:学生除提交最终A3横板成品外,还需同步提交(或在设计说明中呈现)提示词结构、生成版本迭代、人工再设计修改点与依据,形成可审计的学习证据链;评价维度则以史实一致性(时代语境与符号母题是否匹配)、叙事清晰度(主题对象与阅读路径是否明确)、符号适切性(符号所指是否准确且不过度泛化)、跨媒介延展性(封面视觉是否具备后续数字传播与品牌化延展潜力)为关键指标,从而把AIGC“生成—筛选—再设计—交付”的流程转化为可复用的内容生产规范与评估框架。

广州红色文化在中国革命史与当代城市文化构建中具有重要地位,其视觉传播需要完成从“政治记忆再现”到“当代文化识别与情感认同”的转换。书籍作为兼具信息与意识形态传播功能的媒介,其叙事结构与视觉表达承担着“组织历史材料—构建阅读路径—激发情感共鸣”的双重任务。面向青年受众,书籍化传播应强调“可读的微叙事”与“可

参与的延展机制”，使读者不仅理解历史，也能在互动中完成再阐释。

书籍叙事建模可从时间、空间与人物三个维度展开：时间维度以章节节奏与视觉层级组织“阶段—事件—精神”的递进关系，通过标题系统、信息密度与图文比例控制阅读推进；空间维度以广州红色地标、场馆街区与交通节点构成叙事载体，借助地图化构图与路径化阅读强化地域识别，并为线下到访、打卡传播与城市记忆再生产预留接口；人物维度以文献影像、家书与口述材料建立情感支点，以“可读的微叙事”将宏大叙事转化为个体经验，增强共情与价值认同。面向青年受众，可参与的延展机制可将阅读转化为“认知—情感—行动”的连续体验^[9]。建立“革命红×岭南在地色”的双层色彩体系，兼顾庄重性与城市气质；字体在榜书、报刊字与现代字体之间进行结构化重组，以形成可识别的标题语气与信息层级；版式以网格控制节奏与密度，为年表、地图、图注与史料标注提供稳定位置；图像采用“纪实+拼贴+插画化”的多层表达，并明确标注史料来源与再创边界，平衡历史可证性与当代审美接受度。虽然 AIGC 可嵌入概念生成、叙事组合与风格对齐等环节以提升效率，但仍需以人工把关叙事主线与价值表达，并通过提示词、版本迭代与再设计说明等可审计记录纳入质量控制，避免模板化叙事，确保规范可复用、效果可评估。AIGC 在书籍传播中的作用可被纳入三个环节：概念生成（关键词与方向分叉）、叙事建模（场景/符号/人物的可视化组合）、风格优化（参数化对齐色彩、构图与层级）。

（三）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课程中的文化再编码

《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课程以“传统元素提取—调研分析—形式转译—综合应用”为学习路径，强调学生在真实设计任务中建立“从文化到视觉”的转换能力。课程前段以岭南传统文化为核心案例，引导学生识别并拆解地域符号的视觉构成与文化寓意：例如石湾陶艺、醒狮、广绣、岭南建筑花窗等，将其转化为可用于品牌视觉系统的纹样与符号单元，并要求在简化过程中兼顾“文化内涵保留”与“现代审美适配”。这一阶段的训练目标并非单次成品交付，而是形成可复用的符号提取方法与“视觉元素库^[10]”的雏形，为后续主题化传播提供基础素材支撑。课程通过品牌调研任务把“文化元素的存在”转化为“文化元素为何被使用、如何被使用、是否被有效感知”的问题意识：学生

需从品牌基础、文化关联、用户偏好与竞品对照等维度筛选信息，并把零散材料转译为可视化结论与设计策略，从而避免传统元素停留在表层堆砌。种“调研—筛选—结论输出”的训练，使文化再编码不再是“看见符号就用”，而是以受众理解与传播场景为导向的策略化转译。课程后段进一步将符号库投入综合项目，要求学生以岭南非遗与城市文化符号为切入点完成资料分析、符号意义对照、草图推演与视觉系统化呈现；并明确强调从“是什么”转向“为什么”，即从外观特征走向文化根源与情感指向。该训练为红色文化的在地化表达提供一种“将红色叙事中抽象的精神价值，转译为可被识别与愿意分享的视觉语言”框架。

AIGC 的介入以新的方式理解并重组红色文化符号。AIGC 并未被定位为单一的图像生成工具，而是被纳入一套系统化的“文化再编码”实践流程，用以支持参与广州红色文化的在地化再创作。课程构建出“文化拆解—生成控制—语义校准—传播转化”的实践路径，使技术嵌入文化理解与设计判断的全过程之中，实现从抽象精神价值到可传播视觉语言的结构化转译。围绕广州红色文化资源展开文献与案例调研，对红色文化相关象征物进行梳理，并同步提取岭南地域视觉元素，如建筑花窗结构、醒狮纹样、木棉意象等。通过归类与结构分析，将相关元素划分为“空间—形态—情感”等层级，进一步建立“精神价值—视觉母题”的对应关系。例如，将“信念”转译为纵向挺拔结构，将“牺牲”对应为张力构图，将“希望”转化为上升趋势或光源意象。通过构建包含“对象—事件—时间—地点—风格—禁忌”等要素的提示词模型，引导学生在输入端明确历史语境与在地视觉语法，避免生成内容脱离广州地域文化特征。多轮对比实验中，学生对不同语义权重、风格设定与构图指令进行调整，并记录生成结果与问题修正路径，使 AIGC 从不可解释的“黑箱”转化为可分析、可优化的设计实验平台^[11]。生成不再追求数量扩张，而强调控制能力与语义精准度的提升，AIGC 被界定为辅助性方法工具，而文化解释权与价值判断权始终掌握在人类创作者手中。因此，借助 AIGC 参与广州红色文化在地化再创作的路径模型为：文化拆解、提示词结构化、多轮生成实验、人工语义校准与跨媒介传播转化的递进式整合。该模型的价值不在于技术替代，而在于通过技术强化青年对文化符号的再理解与再组织能力，使叙事中的精神价值在广州在地视觉语法中获得当代表达，从而实现历史语境与数字媒介环

境之间的有效衔接。

三、课堂实践中的问题生成与机制线索

AIGC 技术进入高校视觉传达与文化设计课堂, 重构图像生产流程, 在实践层面显现出红色文化青年传播中的结构性问题。相较于将课堂经验视为教学方法的改进案例, 本文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技术逻辑、文化表达与青年媒介行为相互作用的前端观察场域。通过对课堂作业生成过程、版本演化路径及讨论反馈的系统梳理, 可以提炼出若干具有机制指向的问题线索, 为后续模型建构奠定经验基础。

以提示词驱动和多版本输出为特征的 AIGC 显著降低了视觉生产的技术门槛, 使学生在有限的绘图能力条件下即可迅速形成视觉方案, 从而扩大参与规模并提升创作效率。但课堂观察显示, 生产效率的提升并未同步转化为意义理解的深化, 部分作品停留于形式生成层面, 对红色文化所依托的历史语境与精神内涵缺乏系统校准。

该现象表明, 在生成效率加速的条件下, 若缺乏明确的知识结构与语义核验机制, 视觉表达容易趋于表层化。红色文化青年传播因此呈现出“生成能力”与“意义建构能力”之间的不平衡状态, 显示其问题属性并非技术层面, 而是涉及认知机制与表达机制的协同关系。在相似提示语条件下, 不同小组生成结果在构图方式、色彩倾向与符号使用上呈现出高度相似性, 反映出生成模型在视觉风格上的算法偏好。这种趋同倾向易导致红色文化表达的模板化, 使作品在形式上具备吸引力, 却在语义层面削弱历史复杂性 with 价值指向。

对于具有明确政治象征与历史合法性要求的红色文化而言, 视觉创新必须以文化准确性为前提。课堂实践表明, 若缺乏在地符号约束与史实边界控制, 生成机制将放大泛化风险。因此, 有必要在生产机制之外引入规范维度与知识结构, 以维持文化表达的稳定性与区分度。

在社交媒体环境中, 青年媒介行为呈现出明显的参与化与互动化特征。课堂中围绕红色主题展开的共创实践显示, 学生更倾向于通过再叙事、系列化表达与互动设计完成意义理解, 而非通过单幅作品或线性图文进行接受。这一变化意味着, 传统以单向输出为主的传播模式难以适配青年媒介语法。视觉内容不仅承担信息传递功能, 同时也是身份表达与情感互动的媒介节点。由此, 红色文化青年传播亟需回应“参与—互动—再传播”的链式结构, 构建支持持续参与的表达机制。

四、课堂样本分析与结构变量提取

为避免模型建构停留在经验描述层面, 本研究在行动研究循环过程中, 对三门课程的生成过程、作业成果与课堂讨论记录进行了结构化梳理。样本涵盖《标志设计》《书籍设计》《传统艺术与现代设计》三个课程班级, 共计约 90 余名学生, 形成阶段性视觉方案草图与定稿作品共计 260 余份。围绕 AIGC 参与路径, 对提示词构建次数、生成版本迭代数量、语义修订记录与人工再设计比例进行课堂记录与对比分析, 以此提炼影响红色文化青年传播质量的关键变量。

从生成行为特征看, AIGC 显著压缩了概念形成时间。在标志设计与书籍封面阶段练习中, 单个命题平均可生成 5—8 个方向性方案, 提示词平均修改次数约为 3—5 次。生成数量的增加扩大了学生对形式可能性的感知范围, 提高了参与积极性与讨论密度。然而, 对作品语义校准情况进行二次审阅时发现, 约 60% 左右的初次生成结果存在不同程度的符号泛化现象, 例如将“红色精神”直接等同为高饱和红色背景、抽象光芒或通用庆典构图, 而缺少广州在地红色资源的具体指向; 约 40% 左右的作品在历史语境匹配度上存在偏移, 如时间线混用或人物母题泛化。

进一步对修订后作品进行对比, 可以观察到当教师在中期评图环节嵌入“史料核验清单”与“语义对照表”后, 超过 70% 的小组能够完成明显的语义修正与结构优化。生成机制本身并未自动提升历史准确性, 而是在结构化知识嵌入后才显现出协同增效特征。该现象表明, AIGC 在红色文化视觉传播中的作用呈现出“效率强化—语义波动”的双重属性。

基于样本分析, 本研究将课堂实践中反复出现的影响因素归纳为三个结构变量。

第一, 生成效率变量。其表现为单位时间内可输出的方案数量与风格分叉能力。生成效率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参与门槛, 增强青年对表达过程的控制感, 但若缺乏语义约束, 效率提升可能放大符号套用与风格趋同风险。

第二, 语义校准变量。其核心在于历史语境、精神价值与在地符号之间的匹配度。语义校准通过史料阅读、对象限定与提示词结构化建模实现。当该变量被显性嵌入教学流程时, 生成结果的准确度与叙事完整性显著提升; 反之, 则易出现“形式正确但意义空泛”的表达偏差。

第三,参与强度变量。其体现为学生在生成—讨论—再设计循环中的主动投入程度,包括提示词优化次数、版本对比深度与再设计幅度。课堂观察显示,参与强度越高,小组作品的文化辨识度与传播延展性越强。青年并非单纯接受算法输出,而是在反复比对与协作讨论中完成意义建构。

三个变量之间呈现出互动关系:生成效率扩大表达空间,参与强度决定空间利用程度,语义校准维持价值稳定性。当生成效率提升而语义校准缺位时,表达数量增加但文化深度下降;当语义校准嵌入但参与强度不足时,表达趋于保守,创新活力受限;唯有三者协同运行,方可实现“效率—深度—活力”的动态平衡。

由此可见,课堂实践并非简单展示AIGC应用效果,而是揭示出红色文化青年传播中“技术加速”与“意义建构”之间的结构张力。模型的提出并非抽象理论推演,而是基于上述变量互动关系的归纳结果。在此基础上,下一章节将对“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的三维协同结构进行系统阐释,以回应课堂样本所呈现的机制逻辑。

五、AIGC 赋能广州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三维协同结构模型

第三章所呈现的课堂实践表明,AIGC 介入红色文化视觉传播并非简单的工具替换,而是在生产效率、文化表达与青年参与之间引入新的结

构张力。一方面,生成式人工智能显著扩展了视觉探索路径,使青年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多方向方案生成;另一方面,算法生成依赖统计分布与模式复现,其结果易出现语义漂移、风格趋同与符号泛化,进而影响红色文化表达的历史深度与在地识别度。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技术是否介入,而在于如何在技术效率、文化合法性与传播有效性之间建立稳定结构。缺乏系统框架的技术应用,可能放大表达偏差;而过度强调规范约束,则可能抑制青年参与活力。因此,有必要在价值基础、生成机制与制度规范之间构建协同关系。

在理论层面,红色文化具有明确的历史真实性与价值导向,其视觉表达承担着意义建构与身份认同功能。生成式人工智能则体现为概率模型驱动的技术逻辑,擅长多方案扩散与跨媒介迁移,但本身不具备历史判断与伦理自觉。青年媒介行为的参与化、互动化特征进一步放大了上述张力^[12]。三种力量的交汇,构成AIGC 赋能红色文化青年传播的结构场域。

三本研究提出的三维协同结构模型并不是一个线性操作流程,而是一种由多个功能维度共同构成的协同结构。三者分别承担意义基础、效率动力与规范调节功能,并在互动中维持系统运行的平衡。红色文化视觉传播必须建立在真实史料、历史语境与精神价值之上。视觉表达不仅需要呈现革命记忆,也应体现地域文化的在地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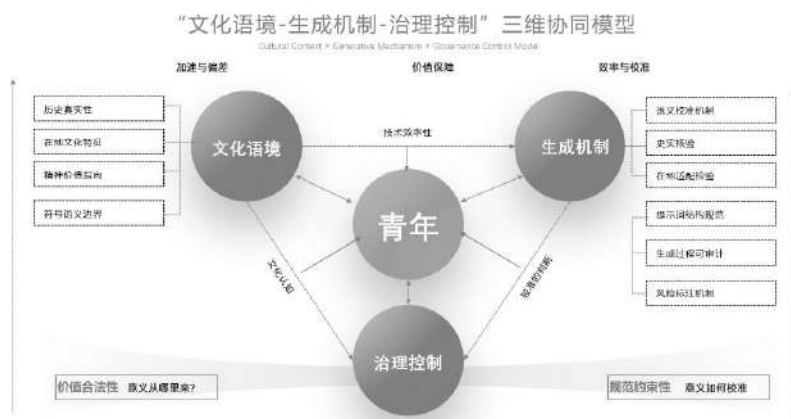


图1 “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三维协同模型

该维度通过确立史实边界、构建“历史对象—精神内涵—视觉母题”的对应关系,并强化在地符号识别度,为生成活动提供意义框架。在三维结构中,文化语境决定传播内容的方向与深度,是生成机制运行的前提条件。

提示词驱动、多版本生成与跨模态迁移显著提升了视觉探索效率,并拓展了表达的可能性空间。该机制降低了创作门槛,同时增强了青年参与的广度。由于生成过程依赖统计分布,输出结果易强化主流审美与既有模式。在红色文化语境

中,若缺乏结构化引导,生成机制可能削弱历史复杂性。因此,其运行必须嵌入文化语境约束与治理控制之中,形成受限扩展的表达结构。治理控制并非事后审查,而是与生成机制同步运行的动态调节结构,其作用在于维持技术效率与文化合法性之间的平衡^[13]。文化语境为生成机制提供语义输入与价值边界,生成机制为文化表达提供形式扩展与参与空间,治理控制对全过程进行调节,防止表达偏离历史真实性与伦理底线。三者共同形成“价值—效率—规范”的动态平衡结构。当任一维度弱化时,系统运行将出现失衡,进而影响传播效果与文化表达的稳定性^[14]。

该模型在三个层面拓展了相关研究(图1“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三维协同模型):其一,在红色文化传播研究中引入生成式人工智能变量,将技术逻辑纳入价值表达分析;其二,在AIGC应用研究中强调文化合法性与制度规范,避免技术决定论;其三,在青年传播研究中,将参与式媒介行为嵌入生产—表达—治理的协同结构之中。“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的三维协同结构,既是对课堂实践经验的理论升格,也是对AIGC赋能广州红色文化青年传播路径的系统回应。

六、模型的实践转化路径与规范边界

视在第三章所揭示的“参与门槛下降与理解深度不足”的结构张力,实质上反映出红色文化视觉传播仍停留在经验化生产层面。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条件下,视觉内容若仅被理解为单次图像输出,则难以支撑稳定的意义建构。三维协同模型的实践转化,首先体现为生产逻辑的范式转型,即由“个体经验驱动”转向“结构化知识嵌入驱动”的生成系统^[15]。

在此框架下,广州红色文化资源不再作为零散素材进入设计流程,而需被编码为具有层级关系与语义关联的视觉知识结构。具体而言,可构建包含四个维度的结构体系:其一为对象维度,涵盖革命遗址、历史人物与重要事件;其二为语义维度,明确精神内涵与价值指向;其三为风格维度,整合岭南视觉传统与历史图像资源;其四为场景维度,匹配展陈、导视系统与社交媒体传播等应用情境。

当视觉资产完成结构化编码后,AIGC生成机制方能在明确语义边界内展开多版本扩散,实现“限定条件下的表达创新”。由此,生成活动由偶发性的创意产出,转化为“生成—测试—校准—

再生成”的循环系统。这一转型不仅提升了生产效率,更在制度层面嵌入知识约束,使技术效率与文化深度之间形成可持续平衡。从单次作品到生成系统的转变,实质上是红色文化视觉生产逻辑的结构重组,是对算法趋同与语义漂移风险的制度化回应。

模型的“传播维度”强调青年在传播链条中的角色转化^[16]。课堂观察显示,青年更倾向于通过再创作与互动参与完成对红色文化的理解,而非停留于被动接收。AIGC支持多版本输出与跨媒介适配,使宏大叙事能够拆解为微叙单元,从而匹配社交平台的传播语法。广州地域文化符号(街景、方言字体、工运图像)与红色主题形成“熟悉感—历史感”的双重锚定,有助于降低理解门槛并强化情感连接。这种双锚定机制,使价值表达不再依赖宏大阐释,而通过在地化语境完成意义内化。由此,模型在传播维度上实现了“青年参与—情境认同—再传播扩散”的结构闭环。

课堂实践中所显现的史实偏差、语境错配与风格挪用问题,表明若缺乏制度嵌入,技术效率可能侵蚀文化表达的严肃性。因此,三维协同模型的稳定运行,有赖于规范维度的结构化建构。确立“人机协同”的责任结构,生成式人工智能仅承担形式生成与路径扩展功能,历史阐释与价值判断必须由具备专业知识的设计者或研究者完成。技术并不替代主体判断,而是在主体控制下提供方案空间。提示词结构、版本迭代路径与图像来源记录应纳入生成档案,以增强表达过程的透明度与审计性。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责任划分,也为后续效果评估与模型优化提供数据基础。在评价体系嵌入史实一致性、语义适切性与版权合规性指标,使创新行为始终处于制度边界之内。

通过制度嵌入,三维协同模型形成“文化语境—生成机制—治理控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使红色文化视觉传播在技术加速环境中保持价值稳定性与表达活力。

七、反思与展望

本研究以课堂实践为观察场域,通过过程记录、文本分析与生成路径梳理提炼模型结构。然而,其样本来源具有情境属性,尚未充分纳入真实传播环境中的组织协同、平台算法与量化反馈机制,传播效果验证仍以过程性证据为主,不同模型输出差异亦未形成系统比较。

未来研究可从机制层面深化:其一,构建红色文化视知识图谱并嵌入生成流程,强化历史—

致性与语义精度；其二，建立面向生成链条的审计框架，比较不同提示策略与模型结构对价值表达稳定性的影响；其三，探讨地域视觉知识与青年媒介语法的耦合机制，提升在地表达的差异化能力。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不断更新模型与加速内容生产的背景下，红色文化传播的关键已经不再只是媒介更新，而更多体现在传播结构与表达机制的重构。唯有在文化语境、生成机制与制度规范之间形成稳定协同，方能实现持续的意义生产与认同建构。

参考文献：

- [1] 杨春梅.高校翻转课堂的有效翻转[M].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04:231.
- [2] 刘晶鑫. AIGC 赋能视觉传达设计数字化教学改革实践研究[J]. 艺术与设计(理论),2024,2(08):143-145.
- [3] 吕星月,何琳,童雅熙.叙事结构理论视角下红色文献数字叙事特征及其传播效果[J].图书情报工作,2026,70(02):41-53.
- [4] 龚昕悦,白丹.AIGC 时代下数字绘画基础课程的内容重构、方法创新及教改策略[J].美术教育研究,2025,(21):128-130.
- [5] 严璐璐,程聪,郭长伟.生成式人工智能主体性的矛盾张力与治理研究[J].科学学研究,2026,44(02):315-324.
- [6] 金二威.思想政治教育空间的数字化构建及优化[J].教育理论与实践,2026,46(03):40-46.
- [7] 覃晴,罗梦舟.人工智能时代电影美学的嬗变[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25,(12):21-29.
- [8] 王斌,董筱.数字技术赋能下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觉符号的活化传承：从静态保护到创新转化的路径研究[J].民族艺林,2025,(06):103-112.
- [9] 刘东.红色家书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微叙事”逻辑探析[J].中共合肥市委党校学报,2025,24(06):25-33.
- [10] 杨艺贞.厦门花砖视觉元素提取与设计应用研究[J].闽南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34(01):119-126.
- [11] 孙波.可解释的人工智能：打开未来智能教育“黑箱”的钥匙[J].中国教育信息化,2022,28(04):3-4.
- [12] 程瀚.从技术赋能到制度重构：AIGC 赋能红色资源融入思政教育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5, 13(3): 82-90
- [13] 黄子扬, 傅玄, 赵佳佳. Research on AIGC-Integrated Design Education for Sustainable Teaching: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TAM and TPACK Models[J]. Sustainability, 2025.
- [14] 王伟文. Analysis of AIGC and Visual Communication Design Fusion Strategies[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5, 9(2):264-268.
- [15] 刘佳宁. AIGC 赋能四川高校红色文化教育：问题研究与路径探索[J]. 发展教育学, 2025, 6(9).
- [16] 王群壹. 新媒体融合与 AIGC 赋能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模式创新研究[J]. 2025,6(11).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设计一体化研究

南风臣¹

(1.马周明德小学, 山东 德州 253700)

摘要: 聚焦“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教学改革, 针对传统课时切割模式导致的教—学—评割裂、作业与目标脱节等问题, 构建以“单元—任务—作业”为核心的一体化设计框架。通过整合课程理论与作业设计方法论, 揭示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设计的内在逻辑, 旨在实现减负与增效的辩证统一, 为一线教师提供兼具理论指导与实践操作价值的创新路径。

关键词: 双减; 小学语文; 单元整体教学; 作业设计; 一体化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68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ion of Unit Teaching and Homework Desig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Fengchen Nan¹

¹ Mazhoumingde Primary School, Dezhou, China

Abstract: Focusing on the reform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Reduction", this paper addresses problems such as the separation of teaching-learning-assessment and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homework and objectives caused by the traditional class-hour segmentation model. It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design framework centered on "unit-task-homework". By integrating curriculum theory and homework design methodology, the paper reveals the internal logic of unit-integrated teaching and homework design, aiming to achieve the dialectical unity of burden reduction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provide innovative paths with both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value for front-line teachers.

Keywords: Double Reduction; Primary Chinese; Unit Teaching; Homework Design; Integration

“双减”背景下, 小学语文作为母语教育的核心学科, 亟需突破传统以知识点切割为特征的教学模式, 探索更具系统性与整合性的教学策略。现有研究表明, 语文教学长期存在教—学—评割裂现象, 不仅导致学生语文核心素养培养的碎片化, 也进一步导致作业设计与教学目标之间的脱节。通过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设计的一体化创新, 实现减负与增效的辩证统一, 是“双减”政策下语文教学改革的关键命题。

1 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一体化的理论意蕴

1.1 从“课时—作业”到“单元—任务”的结构性质转换

在长期的课堂实践中, 小学语文教学普遍以单课时作为组织与推进的基本单元, 作业则紧随课时之后安排, 形成以“课时—作业”为主导的运行结构。教学目标往往被分解为若干相对独立

的知识点,每一课时围绕若干重点、难点展开讲授,课后作业主要承担巩固操练的功能,以重复性练习和再现性题目为主。这易导致学习内容被过度切割,学生的语文经验呈现碎片化状态,作业数量偏多而结构松散,造成负担重而增值不足的状况。

“双减”政策的实施,使作业管理从单纯控制课时末尾的作业量,转向对整体学习结构的系统调节。与这一政策取向相呼应,2022年版语文课程标准强调以单元为重要课程形态,倡导大单元教学,通过主题统领、语文要素整合和学习任务群的设计,引导学生在较长时间跨度内形成连贯的语文实践经验。由此,以单元为整体框架、以任务为推进方式的“单元—任务”结构逐渐成为课程实施和作业设计的价值指向,传统以课时为轴心的作业附属模式受到冲击。作业被置于单元整体学习进程之中,服务于单元目标的达成^[1]。

“课时—作业”向“单元—任务”的转换,首先体现为教学时间与学习内容组织逻辑的调整。以课时为中心的设计,强调当节课的完成度和即时反馈,作业围绕当堂知识点展开,强调短期记忆和技能操练。以单元为中心的设计,则要求教师在单元起始阶段就统筹规划学习目标、活动序列以及课内外学习安排,使作业同课堂活动一同嵌入单元的整体结构之中,形成由连续链条。

这一转换也改变了作业内在功能的侧重。在“课时—作业”模式下,作业更多围绕知识点的复现,评价标准相对单一;在“单元—任务”结构中,作业被纳入学习任务群,其形态转变为围绕单元主题和语文要素组织的“作业群”或项目化作业,促进经验整合与意义建构。这种功能转换,使作业与课堂学习、单元评价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有利于形成教、学、评协同的格局^[2]。

“单元—任务”的结构性转换还指向教师备课与专业判断方式的调整。以课时为中心时,教师往往从教材单篇课文出发安排教学与作业,容易出现每课各上一遍课程、每课各留一套作业的叠加式设计;以单元为中心时,教师需要基于单元整体目标和学生学习进阶,对各课时功能进行统筹分工,将作业量和作业难度进行单元视野下的整体平衡,避免简单叠加各课时作业。

1.2 政策逻辑与学科逻辑交织中的教—学—作业

失衡问题

“双减”政策以减轻过重课业负担和规范校外培训为主要目标,突出的是可度量、可监督的管

理逻辑,强调控制作业总量和完成时长,要求学校切实承担教育主责。其落地过程不可避免地与人文学科自身的知识结构、能力生成路径和教学传统发生交叉与牵扯。在学科逻辑层面,小学语文依托大量阅读、持续写作和反复语言实践来形成积累,强调在较长时段中通过多文本、多情境的综合运用,促进学生语言能力、思维能力与审美体验的同步发展,新课标提出的大单元教学和学习任务群理念正体现了这一特征。当政策逻辑以严格的时间和数量指标进入学校运作时,如果缺乏与学科逻辑的深入对接,教、学、作业三者之间就容易出现失衡^[3]。

这种失衡首先体现在目标指向上的不一致。学校在政策压力之下,优先回应的是可被检查的事项,例如作业布置时间是否达标、书面作业是否减量、是否存在家长代劳式作业等,作业管理被行政化、表格化,成为接受督导和问责的重要对象。其次,语文学科的真实追求在于提升学生的读写能力和综合语文素养,需要通过连续的学习活动和结构合理的作业系统予以支持。现实中,一些学校和教师把“双减”简化处理为“少留作业”或“缩短时间”,在教与学的整体设计并未根本调整的情况下,单纯压缩作业环节,导致作业与课堂之间的功能联系被削弱,作业难以发挥诊断学习、深化理解的作用。在教学过程的具体运行层面,教、学、作业之间的时间与任务分配也出现了结构性错位。减量压力之下,一部分教师将原本通过课后练习完成的巩固性和拓展性要求前移到课堂,通过加快讲授节奏来维持既有教学进度,课堂学习负荷被无形加大,而课后作业则呈现形式上的轻简化^[4]。

评价体系与责任机制的惯性也加剧了这种失衡。当前学校层面仍普遍以考试成绩作为重要绩效指标,而“双减”对作业的规范主要集中在数量和形式上,二者之间存在明显错位。教师一方面要接受作业总量和时长的严格监管,另一方面又须承担升学压力和质量考核,这种双重压力容易使教与学的真实负担从可见的书面作业转向不易被统计的练习、资料和校外补偿性学习,引发新的不平衡。在语文教学中,这种状况尤为突出,一部分教师出于成绩考虑,仍然倾向于以应试题型为蓝本组织课堂讲练,而将富有开放性和实践性的语文作业压缩到最低限度,从而削弱了语文学科应有的人文涵养和实践育人功能。

1.3 “减负”与“增质”张力下语文学习经验的

再审视

在“双减”政策中，减轻作业负担与提高教育质量被视为一个内在统一的目标组合，但在实践层面，两者往往呈现出彼此拉扯的状态。政策层面强调严控书面作业总量和完成时长，反对机械重复和惩罚性作业，同时突出作业的育人功能和质量要求，提出“减负提质”的基本指向。然而，对一线学校和教师而言，削减可以被量化的“负担”往往比提升较难界定的“质量”来得直接，语文学习经验便在少做一些题与学得更好一些之间陷入摇摆。

从语文学科本身看，语言能力与语文素养的形成依赖长期、持续的阅读和写作实践，需要在多次接触文本、多次表达与反思中逐步积累和生长。新课标在语文课程性质和核心素养中，强调在真实的语言情境中整合听说读写活动，倡导通过大单元教学和学习任务群，引导学生经历完整的语文实践过程。

如果简单将作业时间、阅读篇目、写作次数一并压缩，固然可以在形式上减轻学生的学习时长，却极有可能造成阅读量不足、写作经验贫乏，削弱语文学习的广度和厚度，使减负转化为实质上的减质。另一方面，减负并不等于否定一切学习活动，关键在于区分有效学习负担与无效或异化的负担。

在语文学习经验中，其则表现为学生在重复抄写、生硬背诵和高频刷题中消耗精力，却缺少与文本的真实对话、与生活的经验联结以及自我内心的表达与整理。这部分负担理应被清理或重构，为高质量的语文实践腾挪时间和空间。在新课标和“双减”的双重背景下，语文学习经验的质量更多体现在学习活动的结构和内涵之中，而不仅是数量多少。与零散的题目操练相比，这类学习经验虽然同样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却在意义建构、情感体验和思维发展上具有更高的教育价值，可以视为必要的学业负担或有益的学习投入。减负的关键不在于避免学生付出努力，而在于引导努力指向更具价值的学习经验。

“双减”通过增加在校学习和服务时间、减少家庭书面作业，引导学校将更多高质量的语文学习经验安置在校内，由教师专业设计和引导，从而减少家庭教育资源差异对学习结果的影响。这对语文学习经验提出了新的结构要求：课堂教学、课后作业与在校延时服务活动需要在单元层面形成连续、互补的实践链条，既避免时间上的堆积，

又提升体验上的丰富度和整体性。由此，“减负”不再只是压缩作业数量，而是通过重组语文学习经验的内容和结构，淡化低效、重复、孤立的练习，增加整合性、生成性、体验性的语言实践。

2 小学语文单元教—学—作业一体化的内在逻辑与运作机制

2.1 单元整体视角下“目标—内容—任务—作业”链式生成逻辑

单元整体观下，小学语文教学设计需突破一课一练的局部视角，将单元视为完整学习进程。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核心素养为统领，提出以学习主题引领、学习任务为载体整合内容与情境，预设“目标—内容—任务—作业”的链式生成取向。

教与学组织需以单元整体目标为起点，落实内容统整、任务安排与作业设计，确保各环节逻辑一致而非分离拼接。目标是链式生成的源头，需回应课标核心素养的阶段性与整体性要求，落实单元语文要素、文本类型及学习方式，形成涵盖语言、思维、审美、文化维度的可见学习进阶。整体目标确立决定内容组织与任务设计的结构边界，使单元成为以意义方向和能力要求为纽带的整合体而非课文简单相加。

内容组织是第二关键环节。教师需围绕单元主题与语文要素统整文本、练习及课程资源，按学习进程与能力梯度安排内容序列；研究表明，文本群编排应服务大概念与关键要素，通过多元材料生成内在关联的内容场。其中，单篇文本价值通过关联放大，学生学习转向单元主题的意义建构而非零散篇章印象。内容统整是任务生成的基础，课标“语文学习任务群”强调以任务驱动连贯实践活动，促进学生综合运用语言知识与策略。单元任务是目标引导下内容意义的实践转化，需基于目标与内容序列设计递进式任务链（如阅读→分析→表达），实现从懂文本到用语言的过渡。

任务是连接目标、内容、学生与文本的中介枢纽。作业是任务链的课外延伸，需衍生自单元任务链，承担课堂任务的延伸、深化功能；研究显示，基于任务群的作业应形成与主题、要素对应的“作业群”，分布于单元各阶段并兼具多重功能。“双减”背景下，链式生成可避免作业机械叠加，通过调控任务强度与作业结构，实现总量可控与质量可感的统一，让学生在有限时间内获得完整且有层次的语文实践经验。

2.2 深度学习取向的作业功能再定位与价值重申

在“双减”政策落地前，语文作业长期处于偏工具化框架中，被视为巩固知识、训练技能与反馈教学效果的核心手段，教师与家长对作业价值的判断多集中在巩固效果、考试帮助等维度。“双减”政策一方面限制作业总量与时长以回应负担关切，另一方面强调作业的诊断、巩固与学情分析功能，鼓励分层、弹性与个性化设计，整治机械无效作业，为作业功能从单一巩固工具转向综合育人支点提供制度契机。

从当前课堂改革取向看，深度学习被学界普遍界定为以高阶思维、深度加工与主动建构为特征的质性学习状态，强调学生围绕挑战性任务投入持续主动认知活动，追求理解本质、整合知识与迁移运用的统一。在此视角下，作业已非课后重复练习，而是深度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学生形成知识结构、发展思维品质与提升自我调控能力的关键环节。新课标背景下，作业需与任务群整体安排衔接，不再是课堂教学的简单“翻版”，而是在课内外时空延展中支撑学生完成从初步接触、深入理解到综合运用与反思提升的系列学习活动。

基于深度学习取向，作业功能再定位首先体现为学习支持功能的整体扩展。国内作业设计研究逐步从关注难与易、多与少转向诊断性、形成性与发展性，强调借助作业发现学生理解偏差以调整教学，通过连续性活动引导学生反思学习策略与思维过程，提升元认知水平。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单元作业设计实践表明，当作业围绕单元大概念与语文要素，以进阶式任务序列组织时，学生完成作业在比较、概括、解释与创造等高阶认知活动中重组经验，作业成为推动学生从表层记忆走向深度理解与迁移运用的支架^[5]。

2.3 教师行动、学生经验与学习情境的互动机理

在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一体化的视域中，教师行动、学生经验与学习情境并非彼此独立的要素，而是相互牵动的活动系统。学生的高水平心理机能常先以人际间形式出现于社会互动与具体活动，再转化为个体内部心理过程；教师通过创设教育情境、提供支架、组织交往活动，对学生的学习方式和思维发展具有决定性中介作用。在小学语文单元教学中，这种中介作用具体体现为教师在单元目标统领下对文本资源、任务情境和作业结构的系统安排，塑造具有特定话语规则、交往方式与评价取向的学习环境，学生的语文学

习经验在此环境中不断发生、积累与改造。

从教师行动的角度看，单元整体观要求教师不再仅围绕单篇课文讲解，而是围绕单元主题开发大情境，并在课时与作业中创设呼应的小情境，形成由目标、内容、任务和作业共同构成的情境链条。课程与教学研究和一线实践均指出，大单元教学中，教师需依托课程标准与教材单元主题，将相关知识点和语文要素整合于同一情境主题下，通过项目化或结构化学习任务与作业重构单元学习环境。此过程中，教师的预设不仅决定学生接触的文本与任务，更通过任务难度、合作形式、评价方式等安排，规定学生的参与与思维，为后续学习经验提供可能边界。

学生经验并非被动回应，而是对教师行动与学习情境的选择性吸收与再组织。学生在真实且富有挑战性的任务情境中，通过身体与环境互动，将新知识纳入既有经验结构，多次加工生成新理解与能力。语文课堂中的对话互动、合作探究、展示反馈等活动，使学生在与教师和同伴的交往中调整理解框架，而情感体验、安全感与信任感又影响学习投入的深度与持续性。当教师在单元教学中营造开放平等的对话氛围，运用对话式反馈引导学生表达、质疑和反思时，学生的学习经验会由简单接受转向主动建构。

学习情境既是教师行动的产物，又在学生参与中不断被改写。在大单元视野下，情境不限于单节课情景，而是扩展为覆盖单元全程的整组情境，包括课堂语言活动、课外阅读与写作、家庭和社区语文实践等层面。作业是连接这些层面的关键机制之一。基于大单元理念的项目化或结构化作业设计，通过主题一致、层级分明的任务框架，延伸课堂学习至课外生活，引导学生在家庭、社区等场域开展观察、访谈、阅读和写作，使学习情境从学校扩展至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同时，学生完成作业时暴露的短板，通过作业批改、讲评和调整反馈到教师后续教学设计，促使教师重新配置情境资源与交往方式，形成教—学—作业的循环互动^[6]。

3 “双减”取向小学语文单元教—学—作业一体化的类型建构与路径演绎

3.1 以“学习进阶—任务链—作业群”为核心的 一体化设计结构

在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一体化视野中，学习进阶—任务链—作业群是前后相扣的设计结构。

教学设计需从单元整体出发,勾勒学习进程,建构任务链与作业群,使教与学围绕进阶路径展开。学习进阶是结构起点,非简单目标罗列,而是学生语言能力、思维品质与语文实践经验的预期发展轨迹,体现感知-理解-运用-反思的层级递进。新课标按学段提出表现性要求,为梳理进阶提供依据;大单元教学研究指出需进阶任务链支撑高阶思维,形成逻辑阶梯。教师需把握课标与教材,明确单元增量并转化为可操作进阶路径^[7]。

任务链是进阶统摄下转化单元目标与内容的中介形态,强调任务间关联与递进,涵盖课前预备、课堂核心、课后延展任务。新课标下大单元教学研究强调整合性任务与进阶链,引导学生发展系统、逻辑、批判性思维,任务主题与方法连贯,每项任务指向当前进阶并铺垫后续,形成层层展开的学习过程。

作业群是任务链的课外延伸,为“双减”作业提质关键载体。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研究指出,单元作业需整体规划,构成有机“作业集合”而非课时叠加;应与任务链对应,覆盖单元各阶段,兼具多元功能与难度梯度。深度学习研究强调作业嵌入大单元框架,围绕主题构建进阶任务,承接课堂并推动课外高阶语言实践与意义建构。

学习进阶—任务链—作业群构成自上而下且可回流修正的一体化机制:教师依课标与学情勾勒进阶,统筹任务链,延展为作业群,实现目标-过程-延伸一致;学生作业表现反馈修正设计。该结构回应新课标与“双减”要求,为小学语文单元教、学、评一体化提供逻辑抓手。

3.2 “少而精”作业系统的类型化建构:基础巩固型、探究拓展型与语用迁移型

基础巩固型

基础巩固型作业承担单元核心知识与技能的精要巩固功能,面向全体学生基本学习需求。研究与政策文件强调,双减下基础性作业仍不可或缺,但需突出关键性与必要性,以精选内容替代叠加、适度梯度替代重复。在小学语文单元中,这类作业重点指向识字写字、常用字词运用、基础性阅读理解和规范化表达,围绕课内文本与单元语文要素开展代表性练习。与传统抄写刷题不同,基础巩固型作业在“少”的前提下追求“精”选与“准”对应,通过控制题量、压缩重复度、强化典型性,使学生在合理时间内完成高效基础训练,为后续探究拓展与语用迁移提供稳定底座。

探究拓展型作业在基础巩固之上,面向学生高水平认知需求与兴趣,强调在开放任务情境中

深化理解、拓展视野。新课标提出以学习任务群整合语文实践活动,鼓励真实或类真实情境中的探究性学习,多项研究将项目化学习、探究性作业引入单元设计,围绕单元主题设置跨文本探究任务,促进学生在信息搜集、观点比较、合作讨论与成果表达中形成高阶理解。这类作业通常在单元中后段集中安排,允许分步完成,形式包括阅读延伸、资料整理、访谈观察、小型项目等。其比重不必过大,但在支撑深度学习与思维品质发展方面价值独特,是“少而精”导向下保留与优化的重点。

语用迁移型作业强调将单元所学知识与能力投向真实语文生活,在多样情境中实现应用与创造。课标与多地实践表明,将作业组织为“积累与梳理、阅读与表达、跨学科综合”板块,或通过跨情境、跨学科综合性作业,引导学生在家庭、校园、社区开展观察、交流与写作,利于提升语言综合运用能力与语文实践意识。这类作业可表现为面向真实读者的书信、倡议、短评,基于单元主题的生活记录、口语交际与微型演讲,或其他学科关联的资料整理展示。相较于前两类,它更强调情境真实性与任务完整性,使学生在解决具体交际需求中,将单元所学转化为可感知的语言能力经验。

3.3 以主题阅读单元为例的一体化设计理路演绎与作业类型分析

以主题阅读单元为例,可清晰呈现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一体化生成逻辑。主题阅读围绕人文主题整合多文本,引导学生形成主题多侧面理解,是统编小学语文教材代表性单元形态。新课标下,其被纳入“文学阅读与创意表达”等任务群,需通过一体化设计统摄单元目标、课堂任务与课后作业于同一进阶结构。

整体设计需基于课标与学段要求勾勒学习进阶。针对不同主题单元,可划分为三阶段:起始感知情境与主题大意,中段多文本比较把握形象、情节或景物异同,后段综合信息形成价值判断与审美体验并尝试表达。此进阶为任务链和作业群提供结构约束,明确后续任务与作业方向。围绕进阶设想,单元内构建关键任务链:前期导入阅读与经验唤起,中期单篇精读、群文比较与合作讨论,后期综合阅读与创意表达。任务链覆盖课内外,含教师主导与学生自主活动。作业作为任务链延展,被规划为结构分明的作业群,通过类型搭配支持进阶关键台阶。

主题单元中,基础巩固型作业围绕核心语文要素与基本阅读技能展开。如自然主题单元,精选代表性词句引导学生抄写、朗读、仿写体会语言节奏与意象;人物主题单元,以针对性题目梳理行为线索与情节,以少量高质量练习取代重复题目。这类作业面向全体,强调命题典型性与精准性,“双减”下压缩数量、提升效度,保障学生完成必要基础训练^[8]。

探究拓展型作业紧扣群文特征,在多文本比较联系中深化理解。如引导学生阅读单元内外文本后,围绕主题呈现方式、人物情境选择等议题开展资料整理、讨论与表达;或鼓励查找补充读物,完成阅读卡片、书单或调查报告。这类作业以阶段性任务安排,单元中后段集中,通过开放任务与合作成果,承接基础能力,推动学生形成更高水平理解。

4 结论

“双减”背景下,小学语文作业改革核心非数量压缩,而是减负约束下的语文学习结构重构。本文从单元整体视角,围绕教—学—作业一体化,呈现课时到单元的结构转换逻辑,分析政策与学科逻辑下的失衡点,以语文学习经验为中介重审作业功能。单元整体教学与作业一体化非技术叠加,而是课程结构与学习方式转型框架下的考察。理论层面,单元整体观下提出“目标—内容—任务—作业”链式生成逻辑,强调单元目标统摄作用;文本统整与任务安排是作业从课时附属到单元内在环节的关键中介。引入深度学习重定位作业功能,突出高阶理解、元认知与语文实践经验的综合价值。分析师生经验与情境互动,一体化设计

非线性,通过教学—作业循环的预设生成双向优化单元结构。实践上以“学习进阶—任务链—作业群”为核心,构建基础巩固、探究拓展、语用迁移三类作业的功能互补“少而精”系统。主题阅读案例显示,清晰进阶与任务链下,三类作业嵌入单元各阶段:基础巩固支撑理解比较,探究拓展承载多文本对话与高阶思维,语用迁移在真实情境整合检验成果。作业总量受控,学生语文经验在结构优化中提升密度与质量。

参考文献:

- [1]俞明敏.突破成规积极转化——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的转化策略例谈[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5,(10):61-63.
- [2]许英霞.“教—学—评”一体化下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策略[J].西藏教育,2025,(09):33-36.
- [3]张晓琳.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大单元整体教学研究[J].名师在线(中英文),2025,11(29):19-21.
- [4]顾宇星.“备—教—学—评”一致——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方法探析[J].语文教学通讯·D刊(学术刊),2025,(10):40-42.
- [5]钟林怡.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策略[J].亚太教育,2025,(17):125-128.
- [6]朱龙江.基于新课标标准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优化策略[J].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25,41(05):63-67.
- [7]李胜男.基于学习任务群的小学语文单元整体教学[J].安徽教育科研,2025,(14):51-53.
- [8]魏彩琴.主题式单元整体教学在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应用[J].亚太教育,2025,(07):126-128.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开发及资源库建设研究

过君琰

(无锡学院, 江苏 无锡 214105)

摘要: 生成式人工智能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重塑外语教育的生态, 为外语教学注入全新的活力与可能性。然而在外语测试领域, 其应用与实践尚处于探索阶段。本研究探讨了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 (ChatGPT、DeepSeek 和 Murf AI) 开发符合内容效度要求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的可行性。结果表明, ChatGPT 和 DeepSeek 能够生成符合四、六级听力任务特征的文本与试题, Murf AI 合成的音频在口音、语速和清晰度方面基本满足测试需求。基于研究结果, 可构建听力测试资源库, 为听力测试开发提供可持续更新的资源支持。

关键词: 生成式人工智能; 大学英语考试; 听力测试; 资源库

基金项目: 2024 基于人工智能的大学外语数字化创新教学专项课题(2024RGWY045)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69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CET-4/6 Listening Test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source Banks Based 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Junyan Guo

Department of General Education, Wuxi University, Wuxi, China

Abstrac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is reshaping the ecology of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with unprecedented width and depth, injecting new vitality and possibility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However, in the field of foreign language testing, its application remains in the exploratory stage.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GenAI (ChatGPT, DeepSeek and Murf AI) to develop content-valid listening tests of the College English Test (CE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ChatGPT and DeepSeek can generate scripts and test items aligned with the task characteristics of CET-4 and CET-6 listening assessments. The audio files synthesized by Murf AI met the testing requirements in terms of accent, speech rate and clarity. Based on the research findings, a listening test resource bank can be established to provide sustainably updated resources for listening test development.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College English Test (CET); Listening test; Resource bank

作者简介: 过君琰(1984—), 女, 博士, 研究方向外语教学、外语测试。

通讯作者: 过君琰

一、引言

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发展给外语教育带来了全面、深刻和系统的变化与契机。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指一组人工智能算法和模型,它们具备类似人类的创造力与适应性,能够生成新内容,包括文本、图、视频以及问题解决策略等^[1]。从理论到实践层面,外语界掀起了一股关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应用的探讨热潮。在理论层面,学者们从语言本体特征^[2]、二语习得机制^[3]、外语教学实践^{[4][5][6]}、理论框架构建^{[7][8]}以及对人与科技关系的反思^[9]等不同方面切入,深入剖析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外语教育融合的内在机理,挖掘其深度价值。在实践领域,学者们探索了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认知与态度^{[10][11]}、语言技能培养^[12]、教学资源开发^{[13][14]}、教学实施与融合^[15]、教师发展^[16]等方面,为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外语教育的创新发展提供了新思路^[17]。然而,与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学领域的快速发展相比,其在外语测试领域的系统应用相对滞后,虽然关于各项技能的研究已渐次展开,例如翻译^[18]、阅读^[19]和口语^[20]等,但主要集中于写作,例如协助写作过程^[21]、实施自动评分^[22]、提供写作反馈^[23]等,听力测试领域相关研究相对较为匮乏^[24],尚未形成系统成果。鉴于此,本研究探讨如何基于大学英语四、六级真题语料库特征分析,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符合测评内容效度要求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可扩展的测试资源库,以期提升测试命题效率,为听力试题开发提供建议和参考。

二、文献综述

对真题语料库的任务特征分析能够让我们理解语言测试的命题规律和语言特征,确保测试的内容效度,而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其在自然语言理解、分析、模拟和生成的强大能力,为听力测试的材料生成和题目设计提供了新的思路,推动听力测试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一) 听力真题语料库的特征分析

听力测试语料库是指系统编制的口语语料电子数据库。基于真实考试材料的语料库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测试所取样的语言能力范围,为检验测试效度、信度与测试目标的一致性提供实证依据。通过对真题语料的系统标注与统计分析,研究者可以了解试题在话题、语篇及交际功能等方面的任务特征,为后续测试的开发提供理论支撑

与实证依据。关于听力真题语料库特征分析的既有研究大体可以归纳为两个研究方向。

首先是研究者们构建由高风险测试多年真题组成的语料库,这些测试包括高考、大学英语四、六级和雅思考试等,然后分析其中的语言模式和文本特征为语言测试与评估提供依据。辜向东、李亚果的两项研究围绕2005年的大学英语四、六级改革,分析了1996年至2008年四、六级听力真题的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两方面的任务特征^{[25][26]}。过君琰对2016年至2024年的四、六级听力真题进行上述两方面的分析,其中语篇输入包括体裁、主题、词汇、难度、话轮数和语速,预期回答包括考查技能^[27]。Tao和Aryadoust分析了从2000年至2022年31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70套高考听力材料的语言特征及其对应的功能维度^[28]。Aryadoust通过分析1996至2021年256份雅思听力考试的主题和口音,为提高测试的公平性和公正性提出建议^[29]。

另外一个研究方向是测试开发者和研究者运用具有代表性的语料库作为高风险听力测试的参照,以衡量这些测试的内容效度。内容效度是指考试内容是否涵盖了课程教学要求或考试大纲所规定的语言技能、语言结构等内容^[30]。这些语料库包括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 BNC)、当代美国英语语料库(Corpus of Contemporary American English, COCA)、国际学习者英语语料库(International Corpus of Learner English, ICLE)和密歇根大学学术口语语料库(Michigan Corpus of Academic Spoken English, MICASE)。例如Nguyen的研究比较了密歇根大学学术口语语料库和雅思考试听力第三、第四部分的词块^[31],而Zhao和Aryadoust的研究则基于自动化语义分析,考察该语料库和雅思以及托福听力部分微型讲座的语义特征^[32]。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听力测试

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听力测试领域的应用尚处于起步阶段。已有的少数研究表明,其在自动生成多样化听力测试文本、题目以及选项方面展现出一定的潜力。许家金等总结了大语言模型在听力教学中的应用,并以ChatGPT 4为例探讨如何改编材料、设计习题、制作音频和词表^[33]。Aryadoust等讨论了ChatGPT 4在为不同水平的受试者(学术型、低水平、中等水平和高水平)生成听力文本和测试试题方面的能力^[34]。同时研究

者们对 ChatGPT 4 产生的文本就语言学特征、主题变异性 and 选项重叠程度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ChatGPT 4 能够较为稳定地生成针对不同水平的具有显著语言差异的文本,但在不同选项之间存在语义重叠的现象,因此四个难度水平在题项层面和文本层面均未呈现显著差异。Runge 等运用 ChatGPT 3 生成多邻国英语测试 (Duolingo English Test, DET) 中交互式听力测试内容^[35]。这种基于情景的对话任务包含不同的对话者 (学生对学生、学生对教授)。在每一轮的对话中,受试者需要从一些选项中选择合适的使对话继续。在任务的最后,受试者对对话进行总结。这项大规模的试点研究包含 713 个测试任务,每个任务收集了 464 份作答。研究结果表明采用人机协同的方法,能够在大规模条件下自动化生成测试内容,从而为大语言模型自动化生成题项的可行性提供了实证依据。Wang 和 Meng 的研究则探讨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 (Kimi) 和人工专家相结合是否能够提高听力选择题干扰项质量^[36]。研究结果表明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充分捕捉听力误解模式以及情境化语言使用方面存在不足,但它能够保持内容与结构的一致性并确保语义上的相对独立性。因此在基于原则的提示语和人类监督相结合的前提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提升干扰项的质量。

基于前述研究综述,本研究以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真题为研究对象,在笔者前期系统分析其任务特征成果的基础上^[27],探讨如何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开发听力测试,以期听力测评的设计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四、六级听力测试开发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 (2016 年修订版)》(以下简称《考纲》)规定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考试各包含三个部分,四级为短篇新闻、长对话和听力篇章,六级为长对话、听力篇章和讲话/报道/讲座^[37]。测试题型均为选择题 (单选题)。本节以两个级别考试中共有的题型——长对话和听力篇章为例,探讨如何运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进行听力文本生成和题目设计以及运用 Murf AI 进行音频录制。

(一) 文本生成

1. 长对话

《考纲》规定长对话每篇的词数分别为四级 240 至 280 词和六级 280 至 320 词。大学英语四、

六级对标欧洲语言共同参考框架 (The Common European Framework of Reference for Languages, CEFR) 分别为 B1 和 B2 水平^[38]。四级长对话的听力真题参考文本为 2024 年 6 月第 2 套第 1 个对话,该对话的主题为教导孩子如何存钱和花钱。提示语设置为 Please generate a listening 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on the topic of “teach children...” with a length of 240-280 words, designed for learners at the CEFR B1 level. A sample script is provided below as a reference. 六级长对话听力真题参考文本为 2023 年 6 月第 2 套第 1 个对话,该对话的主题为教授与学生之间的谈话:选择建筑学专业及其准备工作。提示语为 Please generate a listening script of a conversation between a professor and a student with a length of 280-320 words, designed for learners at the CEFR B2 level. A sample script is provided below as a reference.

根据过君琰的分析框架^[27],笔者从主题、词汇、难度和话轮数四个维度对比分析真题长对话和 ChatGPT、DeepSeek 各自生成对话的内容效度,从主题、词汇和难度三个维度分析真题听力篇章和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篇章。其中词汇的形符数、类符数和词频覆盖率通过 Vocabprofilers (<https://www.lexutor.ca/vp/comp/>) 的 BNC-COCA (1-25k) 语料库进行统计, Nation 认为 98% 以上的词汇覆盖率是理想的^[39]。文本难度使用英文分级指难针统计^[40]。指难针运用阅读真题文本进行词汇、句法和篇章的核心特征进行难度计算,确定难度级别范围,并将其与《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的三至七级衔接^[41]。数值 3.00-3.99 之间表示三级 (中考) 难度, 4.00-4.99 是四级 (高考), 5.00-5.99 是五级 (CET-4), 6.00-6.99 是六级 (CET-6), 7.00-7.99 是七级 (考研)。需要注意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文本偶尔会不在提示语所规定的词数范围内,因此笔者会再一次给出词数范围的指令,要求重新生成。文本难度如果过高则可以根据英文分级指难针给出的难词和难句简化建议进行调整。如果难度过低则可以再给提示语,让其调整各自生成文本的难度。表 1 和表 2 的结果显示,经过调整,ChatGPT 和 DeepSeek 能够生成和真题长对话的任务特征基本一致的文本。

表 1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四级长对话任务特征对比

任务特征	真题	ChatGPT	DeepSeek
主题	教导孩子	教导孩子养	教导孩子

		如何存钱 和花钱	成健康的饮 食习惯	注意安全
词	形符数	283	278	276
汇	类符数	165	163	162
	词频覆 盖率	最高频 3,000 词覆 盖 98.2%	最高频 3,000 词覆 盖 98.6%	最高频 3,000 词 覆盖 98.2%
难度		4.94	4.74	4.96
话轮数		5.5	5.5	5.5

表 2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六级长对话任务特征对比

任务特征		真题	ChatGPT	DeepSeek
主题		教授与学 生对话: 选 择建筑学 专业及其 准备工作	教授与学生 对话: 学术 研究选题与 研究方案设 计	教授给学 生提供论 文反馈
词	形符数	312	304	316
汇	类符数	172	196	180
	词频覆 盖率	最高频 3,000 词覆 盖 98.1%	最高频 3,000 词覆 盖 99%	最高频 3,000 词 覆盖 99.4%
难度		4.79	4.96	4.84
话轮数		5.5	5.5	5.5

2. 听力篇章

根据《考纲》听力篇章每篇的词数分别为四级 220 至 240 词和六级 240 至 260 词。按照长对话的模式, 笔者选取四、六级真题听力篇章各 1 篇作为参考文本, 分别运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相应的听力篇章。四级的参考文本为 2023 年 12 月第 2 套第 3 篇, 该篇章的主题为个人空间。提示语设置为 Please generate a listening script of a passage with a length of 220-240 words, designed for learners at the CEFR B1 level. A sample script is provided below as a reference。六级为 2023 年 12 月第 1 套第 1 篇, 该对话的主题为作家凯特·阿特金森(Kate Atkinson)。提示语为 Please generate a listening script of a passage with a length of 240-260 words, designed for learners at the CEFR B2 level. A sample script is provided below as a reference。表 3 和表 4 的结果显示, ChatGPT 和 DeepSeek 能够生成和真题听力篇章的任务特征基本一致的文本。

表 3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四级听力篇章任务特征对比				
任务特征		真题	ChatGPT	DeepSeek
主题		个人空间	身势语	睡眠现象— 说梦话
词	形符数	240	228	231
汇	类符数	134	145	158
	词频覆 盖率	最高频 4,000 词覆 盖 98.8%	最高频 4,000 词覆 盖 98.7%	最高频 4,000 词覆 盖 99.6%
难度		5.09	5	5.01

表 4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六级听力篇章任务特征对比

任务特征		真题	ChatGPT	DeepSeek
主题		作家凯特· 阿特金森	作家奇玛曼 达·恩戈齐· 阿迪奇埃	作家石黑 一雄
词	形符数	257	254	260
汇	类符数	159	180	179
	词频覆 盖率	最高频 5,000 词覆 盖 98.1%	最高频 5,000 词覆 盖 98%	最高频 5,000 词 覆盖 98.1%
难度		6.7	6.71	6.85

(二) 题目设计

1. 理解明示的信息

《考纲》中提到听力考核技能包括理解明示的信息、理解隐含的信息、运用语言特征理解听力材料和运用听力策略。根据过君琰的研究结果^[27], 四、六级真题题目的考核技能主要集中在理解明示的信息(超过 97%)和理解隐含的信息(2%左右), 而理解明示的信息中又以听懂重要信息或特定细节为主。本节主要以听力篇章展示运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题目, 考核理解明示的信息(听懂重要信息或特定细节)以及理解隐含的信息两种技能。如例 1 所示, 表 3 中四级真题听力篇章的第 2 个问题是关于一个只是泛泛之交的人进入我们的亲密空间的细节, 答案是 A. It makes us feel uncomfortable, 与听力文本中的信息一致(A mere acquaintance entering our intimate space makes us uncomfortable)。

例 1: What happens if a mere acquaintance enters our intimate space?

- A. It makes us feel uncomfortable.
- B. It renders the acquaintance a stranger.
- C. It brings the acquaintance closer to us.

D. It causes the bubble around us to vanish.

笔者运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分别对表 3 中其各自生成的四级听力文本提出一个关于重要信息或特定细节的问题。提示语是: Please create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focusing on a specific detail from the following passage, with four options. 例 2 是 ChatGPT 给出的问题以及选项, 答案是 C. Defensiveness or discomfort, 与听力文本中的细节 while crossed arms may signal defensiveness or discomfort 一致。例 3 是 DeepSeek 给出的问题以及选项, 答案是 B. During periods of stress, illness, or significant lack of sleep, 与听力文本中给出的信息一致 (They may become more frequent during periods of stress, illness, or significant lack of sleep)。

例 2: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at might crossed arms suggest?

- A. Confidence and self-assurance.
- B. Agreement and support.
- C. Defensiveness or discomfort.
- D. Happiness and excitement.

例 3: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en do episodes of sleep talking tend to become more frequent?

- A. During periods of dreaming.
- B. During periods of stress, illness, or significant lack of sleep.
- C. After intense physical exercise.
- D. When trying to remember dreams.

2. 理解隐含的信息

笔者运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分别对表 4 中其各自生成的六级听力文本提出一个关于推论隐含意义的问题, 提示语是 Please create a multiple-choice question about an implied meaning or inference from the following passage, with four options. 例 4 是 ChatGPT 给出的问题及选项。正确答案是 B。文本中的信息 (As a teenager, she read extensively, particularly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before gradually discovering African writers whose works connected more closely with her own cultural experience.) 并没有直接说明发现非洲作家产生重大影响, 听者根据上述信息需要推断出与文中作者此前阅读的英美小说相比, 非洲作家的作品对她来说更具个人意义。

例 4: Based on the passage, why did

discovering African write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Adichie as a teenager?

- A. Their works were easier to understand than British and American novels.
- B. Their stories reflected experiences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closer to her own.
- C. They focused mainly on political science, which she later studied.
- D. They encouraged her to move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further education.

例 5 是 DeepSeek 给出的问题及选项, 正确答案是 B。根据文本中的信息 (contemplation of morality, profound inquiries into the nature of forgetting, his novels share a fundamental emotional depth) 可以推断无论作家石黑一雄用什么题材 (科幻、奇幻、历史), 他最终关注的始终是人类共同的情感深度和人生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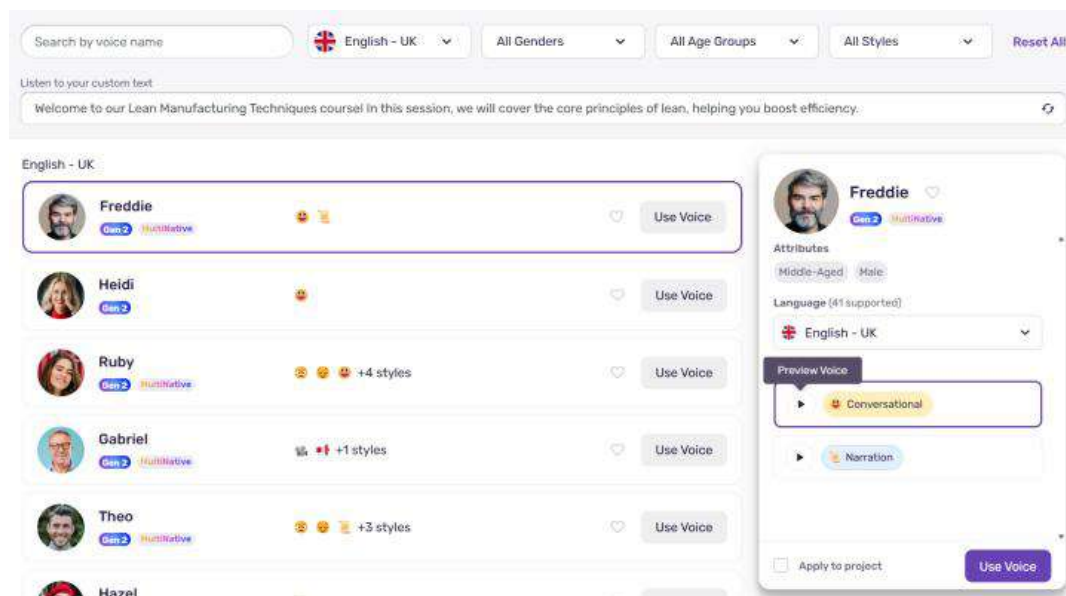
例 5: According to the passage, why does the author suggest Kazuo Ishiguro uses fantasy or science fiction settings in his later novels?

- A. To reach a wider international audience.
- B. To explore deep and universal human themes.
- C. To move away from his Japanese background.
- D. To make his stories more entertaining.

(三) 音频录制

本节展示如何运用 Murf AI 将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的文字材料转换为音频格式。Murf AI 是一个基于云的平台, 提供先进的文本转语音技术, 利用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生成逼真自然的 AI 配音。它提供超过 300 种 AI 语音, 涵盖超过 33 种语言, 声音比较清晰自然。在 Murf AI 中需要先创建项目, 然后选择朗读声音。由于《考纲》规定四、六级录音材料使用标准的英式或美式英语朗读, 因此我们在标签栏选择 English - US & Canada 或者 English - UK。在标签栏我们还可以选择朗读者的性别 (如: 男、女)、年龄 (如: 年轻、中年) 以及声音风格 (对话式等 17 种)。如图 1 所示, Freddie 是一位中年男性, 我们可以在右下角的风格选项中预听他不同风格的声音 (Preview Voice)。对于新闻听力建议选择 Newscast 风格, 长对话更适合 Conversational, 听力篇章则可以选择 Narration。

图 1 Murf AI 声音选择界面



确定使用该声音之后就可以把生成的文本复制到文本框里，点击右侧的小三角就可以制作音频了。根据《考纲》规定，四级听力语速约为每分钟 120-140 词，每个问题后留有 15 秒答题时间。六级语速为每分钟 140-160 词，每个问题后留有 13 秒答题时间。如图 2 所示，所选声音旁边的标

签栏可以调整音高(Pitch)、语速(Speed)和增加停顿时间(Add Pause)。新闻和听力篇章文本可以一句、一段或整篇录制。长对话需要根据两位对话者的内容分层交替将文本粘贴在一个个方框(Block)里面(图 3)。录音完成之后就可以下载导出了。

图 2 Murf AI 音频录制界面(新闻、听力篇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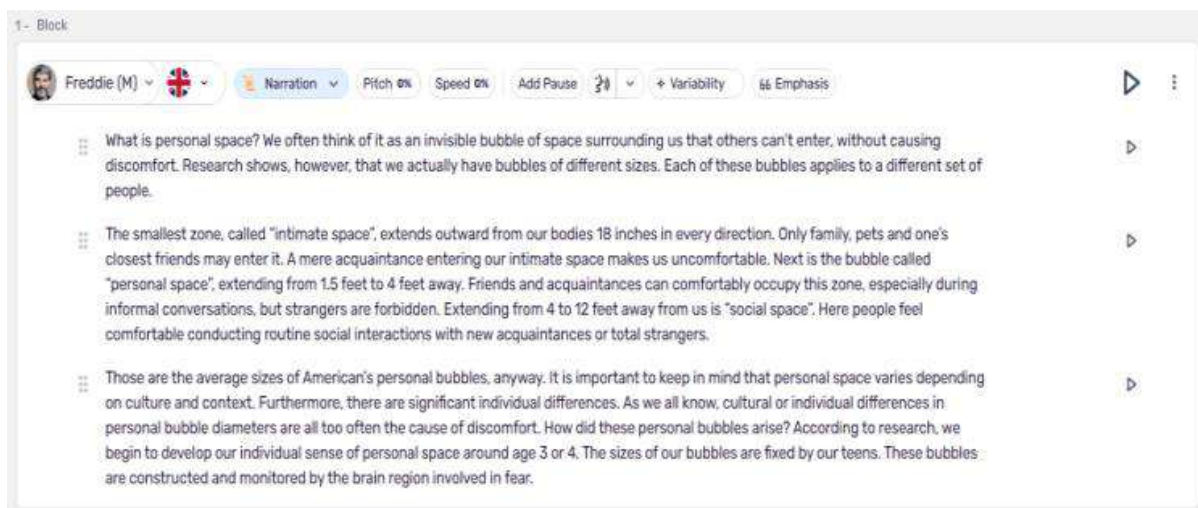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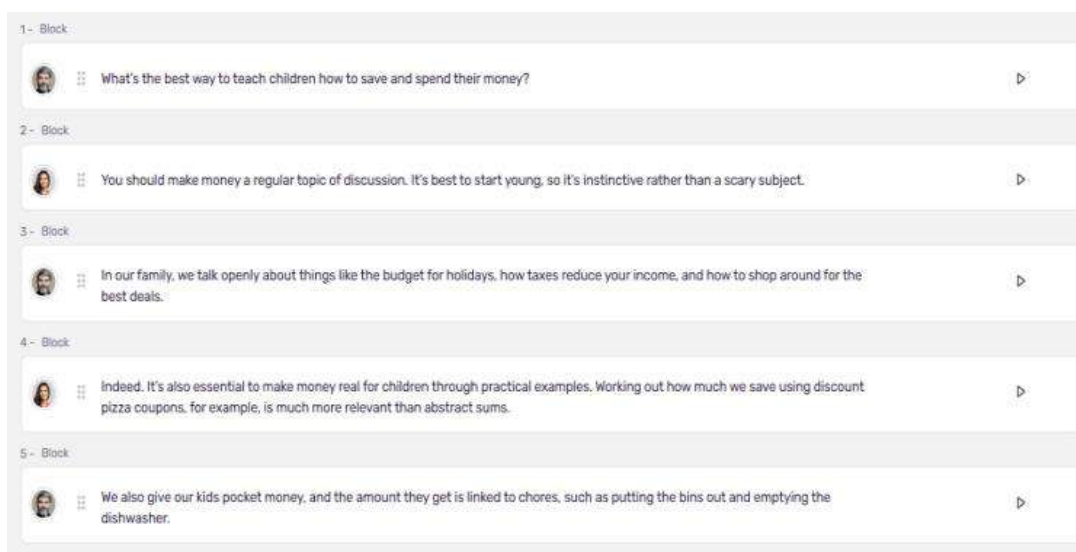


图3 Murf AI 音频录制界面（长对话）



四、结论

本文探讨了如何运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符合测评内容效度要求的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具体而言,本研究运用 ChatGPT 和 DeepSeek 生成听力文本并设计相关试题,同时利用 Murf AI 将文本转为语音,实现听力材料的音频化制作。研究结果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听力文本生成与试题设计方面具有较高的效率和灵活性,经过调试能够产出符合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任务特征的文本和考核技能的题目。同时,使用 Murf AI 进行语音合成能够有效提高音频制作效率,其口音、语速和语音清晰度方面基本满足测试需求。

尽管本研究显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开发中展现了一定的应用潜力,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生成式人工智能输出内容对提示语高度敏感,不同指令设定可能导致文本难度、语篇结构及题目质量产生差异,因此在不同内容主题与任务情境下生成结果的稳定性与可重复性仍有待进一步检验。尽管 ChatGPT 和 DeepSeek 能够较好地模拟听力语篇特征,但它们能否把握任务的语用特征、真实性和文化语境等层面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其次,本研究尚未开展大规模考生数据收集与统计分析,因此缺乏基于统计数据的量化证据支撑,难以评估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开发的听力测试在预测或区分考生真实语言能力方面的效力。

针对上述局限,未来研究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拓展。首先,进一步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提

示语设计和生成流程,提高输出文本在语篇结构和题目设计方面的一致性和可控性。同时可以进一步比较不同模型在生成文本和题目方面的差异。其次,应该在不同语言水平的考生群体中开展实证研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听力材料进行项目分析与信度检验。同时对比 AI 录音与真实录音在语调、连贯性以及自然度上的差异,评估其对听力理解和考生表现的影响。再次,可以通过问卷和访谈研究受试者和测试专家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试题和录音在真实性和可信度方面的感知。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根据不同主题生成与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考试匹配的文本、试题和音频材料经过系统化质量评估与试测,可进一步进行整理、分类和整合入库,逐步构建一个主题多样、难度分级、结构规范的听力测试资源库,为后续听力测试开发提供标准化、可持续的素材支持。

参考文献:

- [1] HE R, CAO J, TAN T.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 National Science Review, 2025, 12(5), nwaf050. <https://doi.org/10.1093/nsr/nwaf050>
- [2] 冯志伟, 张灯柯. GPT 与语言研究[J]. 外语电化教学, 2023, (2): 3-11+105. <https://doi.org/10.20139/j.issn.1001-5795.2023.02.001>
- [3] 杨连瑞. ChatGPT 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的二语习得[J]. 现代外语, 2024, 47(4): 578-585. <https://doi.org/10.20071/j.cnki.xdwj.20240523.003>

- [4] 张震宇, 洪化清. ChatGPT 支持的外语教学: 赋能、问题与策略[J]. 外语界, 2023, (2): 38-44. <https://doi.org/10.26971/j.cnki.flw.1004-5112.2023.02.006>
- [5] 文秋芳. 人工智能时代的英语教育: 四要素新课程模式解析[J]. 中国外语, 2024, 21(3): 1, 11-18.
- [6] 胡壮麟. ChatGPT 谈外语教学[J]. 中国外语, 2023, (3): 1+12-15.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3.03.003>
- [7] 李炜炜. 人工智能赋能外语教育改革: 理念创新与行动逻辑[J]. 中国高等教育, 2023, (9): 49-52.
- [8] 郑咏滢.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争议与理论构建[J]. 外语教学, 2024, 45(6): 48-53.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023/h.2024.06.012>
- [9] THORNE S L.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co-evolution, and language education[J].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2024, 108(2): 567-572. <https://doi.org/10.1111/modl.12932>
- [10] PRILOP C N, MAH D-K, JACOBSEN L J, et al. Generative AI in teacher education: Educators' perceptions of transformative potentials and the triadic nature of AI literacy explored through AI-enhanced methods[J].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5, 9, 100471.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5.100471>
- [11] 张蕊, 刘雅楠. ChatGPT 辅助大学生英语写作中心流体验、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浮力的作用机制研究[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5, 33(3): 61-67.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457/h.2025.03.005>
- [12] LI S. Generative AI and second language writing[J]. *Digital Studies in Language Literature*, 2025, 2(1): 122-152. <https://doi.org/10.1515/dsll-2025-0007>
- [13] LO A W T. The educational affordances and challenges of generative AI in Englishes-oriented materials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ation: A critical ecological perspective[J]. *System*, 2025, 130, 103610.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5.103610>
- [14] 贾蕃, 马颖. 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外语教材编写中的应用[J]. 外语研究, 2025, 42(2): 55-61+113. <https://doi.org/10.13978/j.cnki.wyyj.2025.02.008>
- [15] 于晖, 宋金戈. 知识共建视域下生成式人工智能辅助的外语教学一定位、应用与发展[J]. 中国外语, 2025, 22(3): 4-14. <https://doi.org/10.13564/j.cnki.issn.1672-9382.2025.03.004>
- [16] MOORHOUSE B L, WAN Y, WU C, et al. Developing language teachers' professional generative AI competence: An intervention study in an initial language teacher education course[J]. *System*, 2024, 125, 103399.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4.103399>
- [17] LI B, TAN Y L, WANG C, et al. Two years of innov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of empirical generative AI research in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J].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5, 9, 100445.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5.100445>
- [18] 王勇, 王雨晨. 生成式 AI 在大学英语翻译教学中的应用研究[J]. 长春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6(2), 122-128.
- [19] LIN Z, CHEN H. Investigating the capability of ChatGPT for generating multiple-choice reading comprehension items[J]. *System*, 2024, 123, 103344. <https://doi.org/10.1016/j.system.2024.103344>
- [20] ARYADOUST V, ZAKARIA A. Chat GPT in the assessment of speaking[C]. MCCALLUM L, TAFAZOLI D. (Eds.), *The Palgrave Encyclopedia of computer-assisted language learning*, 2025: 1-8.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51447-0_200-1
- [21] CONNELL PENSKEY A E, USDAN J H, CHANG H. Generative AI's impact on graduate student professional writing productivity and qualit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ducation*, 2025, 35(6): 4057-4082. <https://doi.org/10.1007/s40593-025-00528-z>
- [22] BARROT J 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automated essay scoring: Exploring teacher agency through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J]. *Assessing Writing*, 2026, 67, 100990. <https://doi.org/10.1016/j.asw.2025.100990>
- [23] CROSTHWAITE P, SUN S. Generative AI and L2 written feedback studies: A scoping review[J]. *RELC Journal*, 2025, 00336882251386530. <https://doi.org/10.1177/0033688225138653>

- [24] GOH C C M, ARYADOUST V. Developing and assessing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and speaking: Does AI make it better?[J] *Annual Review of Applied Linguistics*, 2025, 45: 179-199. <https://doi.org/10.1017/S0267190525100111>
- [25] 辜向东, 李亚果. 改革后 CET 听力测试语篇输入与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分析[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0, 18(4): 71-74+79. <https://doi.org/10.16362/j.cnki.cn61-1457/h.2010.04.024>
- [26] 辜向东, 李亚果. CET 听力测试语篇输入和预期回答任务特征历时分析(1996-2007)[J]. *外语测试与教学*, 2012, (3): 17-26. <https://doi.org/10.26970/j.cnki.fltt.1004-5112.2012.03.004>
- [27] 过君琰. 大学英语四、六级听力测试命题质量历时研究[J].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2026, 2(2): 32-38. <http://doi.org/10.70693/rwsk.v2i2.202>
- [28] TAO X, ARYADOUST V. A multidimensional analysis of a high-stakes English listening test: A corpus-based approach. *Education Sciences*[J], 2024, 14(2): 137. <https://doi.org/10.3390/educsci14020137>
- [29] ARYADOUST V. Topic and accent coverage in a commercialized L2 listening test: Implications for test-takers' identity[J]. *Applied Linguistics*, 2024, 45(5): 765-785. <https://doi.org/10.1093/applin/amad062>
- [30] HUGHES A, HUGHES J. Testing for language teachers (3rd ed.)[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29-30. <https://doi.org/10.1017/9781009024723>
- [31] NGUYEN P H T. Investigating the content validity of the IELTS listening test through the use of lexical bundles[D]. Nottingham: 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 2022.
- [32] ZHAO Y, ARYADOUST V. An automated semantic analysis of two large-scale listening tests: A corpus-based study[J]. *Language Testing*, 2024, 42(3): 312-343. <https://doi.org/10.1177/02655322241288598>
- [33] 许家金, 赵冲, 孙铭辰. 大语言模型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应用[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4: 40-50.
- [34] ARYADOUST V, ZAKARIA A, JIA Y. Investigating the affordances of OpenAI's large language model in developing listening assessments[J]. *Computers and Educati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4, 6, 100204. <https://doi.org/10.1016/j.caeai.2024.100204>
- [35] RUNGE A, ATTALI Y, LAFLAIR G T, et al. A generative AI-driven interactive listening assessment task[J]. *Frontier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4, 7. <https://doi.org/10.3389/frai.2024.1474019>
- [36] WANG Y, MENG, Y. Optimizing distractor quality in a locally developed second language listening test: Integrating generative AI and psychometric methods[J]. *Language Testing*, 2025, 02655322251400375. <https://doi.org/10.1177/02655322251400375>
- [37]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委员会. 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大纲(2016 年修订版) [EB/OL]. (2016)[2025-10-12]. <https://cet.neea.edu.cn/html1/folder/16113/1588-1.htm>
- [38] FAN J, FROST K, JIN Y. Local English testing in China's tertiary education: Contexts, policies, and practices[J]. *Language Testing*, 2022, 39(3): 453-473. <https://doi.org/10.1177/0265322211070839>
- [39] NATION, I. How large a vocabulary is needed for reading and listening?[J]. *The 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2006, 63(1): 59-82. <https://doi.org/10.3138/cmlr.63.1.59>
- [40] 金檀, 陆小飞等. 阅读分级指难针[EB/OL]. (2025)[2025-12-28]. language-data.net/tester
- [4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中国英语能力等级量表[S].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24: 8

数字技术赋能下 UI 设计智慧课堂的“三维融合”改革实践 ——基于《交互设计工作坊》课程

曹楚怡¹ 龙海鸣¹

(1.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419)

摘要: 面对 UI 设计教育与产业、技术脱节及创新培养不足的困境, 本文提出融合目标、流程与评价的“三维融合”改革框架, 依托《交互设计工作坊》课程构建回应数字变革、对接行业需求的智慧课堂。改革引入 AIGC 与低代码平台, 重构“构思-设计-实现-测试” workflow, 推动教学从“如何画”转向“如何想”与“如何建”; 并以“非遗数字体验”项目贯穿教学, 通过“解构-认知-建模-实践-融合-创新”三阶段驱动学生实现从知识、能力到素养的阶梯式成长。实践证明, 该路径有效衔接了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 为设计课程创新与跨学科融合提供了参照, 同时强调“设计思维”与“审美判断”的核心地位, 指向培养兼具数字技能、设计理论与文化意识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关键词: 三维融合; 智慧课堂; 交互设计工作坊; 数字技术赋能; UI 设计

基金项目: 东莞城市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项目 (2025yig056)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70

Digital Technology-Empowered Reform and Practice of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in UI Design Smart Classroom: Based on the Interactive Design Workshop Course

Chuyi-Cao¹, Haiming-Long¹

¹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Guangdong Province Dongguan,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gaps in UI design education by proposing a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framework that merges objectives, processes, and evaluation. Implemented via an Interactive Design Workshop, the reform integrates AIGC and low-code tools, shifting focus from "how to draw" to "how to think/build." A project-driven, three-stage approach fosters knowledge-to-innovation growth. Results show it bridges the talent-industry gap, offering a model for curricular innovation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while reaffirming the centrality of design thinking and aesthetic judgment.

Keywords: Three-Dimensional Integration; Smart Classroom; Interactive Design Workshop; Digital Technology Empowerment; UI Design

作者简介: 曹楚怡 (1994—), 女, 硕士, 研究方向 UI 色彩心理研究;

龙海鸣 (1994—), 男, 博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新闻传播学;

通讯作者: 曹楚怡

一、UI 设计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

当前, UI 设计教育正面临与产业实践深度脱节的严峻挑战。尽管业界对 UI 设计的认知已从早期的“界面美工”层面, 演进为以用户体验为核心、涵盖交互逻辑与产品战略的系统性工程(刘再行, 2015), 但许多高校的培养体系仍滞后于此^[1]。东瑞(2014)曾尖锐指出, 国内部分企业对 UI 的理解仍停留在“描描画画”的视觉表现阶段, 缺乏对用户交互重要性的深刻认知^[2]。这种认知偏差直接映射到人才需求上, 导致教育输出与产业期望之间存在显著鸿沟。教学过程中, 往往侧重于软件操作与界面美化, 而对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原则、完整的用户研究流程以及产品可用性测试等核心实践环节训练不足(刘再行, 2015), 使得毕业生难以迅速融入强调数据驱动与体验闭环的现代产品开发流程^[1]。

教育内容与日新月异的数字技术发展之间存在明显断层。随着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低代码平台、虚拟现实(VR)等技术的普及, UI 设计的边界与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 设计对象从静态界面扩展至包含语音、手势等多模态交互的动态体验系统。然而, 传统课程体系在工具链与知识结构上更新缓慢, 未能及时将“光电构成的意象世界”所代表的虚拟性、非经验性审美以及智能交互的前沿理念纳入教学核心。学生接触的往往是相对成熟甚至过时的工具与技术, 对于如何利用 AIGC 辅助创意发散, 或运用低代码平台快速验证交互逻辑缺乏系统训练, 这导致其技术能力与行业前沿需求产生代际差距^[2]。

更深层次的困境在于, 现有教学模式在培养学生创新素养与文化自觉方面存在不足。设计教育的本质在于激发批判性思维与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能力, 但当前教学容易陷入“重技术模仿、轻思维训练”与“重形式表现、轻文化内核”的窠臼。一方面, 课程作业往往强调对流行视觉样式的复现, 而忽视了从“用户研究”到“原型测试”的完整设计思维闭环, 学生独立发现、定义并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未能得到充分锤炼。另一方面, 在全球化语境下, 如何将深厚的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当代设计语言, 塑造具有本土文化特色的数字体验, 是 UI 设计教育亟待回应的重要命题。若仅追随国际流行风格而缺乏文化主体性的思考, 将难以培养出能向世界传播中国主流文化价值观、具备深层创新动力的设计人才。

二、“三维融合”理论框架与内涵解构

为系统性地应对上述教育困境, 本研究构建了“目标融合、流程融合、评价融合”的“三维融合”改革理论框架。该框架以系统思维重构教学体系, 旨在突破传统 UI 设计教学中知识、技能与素养培养相互孤立、衔接不畅的固有模式。目标融合强调从单一技能训练转向知识、能力与素养的立体化整合, 将认知心理学、交互原则等理论认知, 与工具运用、原型实现等程序性技能, 以及设计思维、审美判断与文化理解等价值性素养, 统一于连贯的教学目标体系中。流程融合聚焦于教学过程的重组, 依托真实项目驱动, 构建“理论解构-技术实践-综合创新”的螺旋式进阶路径, 使学生在“学-做-创”一体化的完整情境中深化学习。评价融合则致力于建立过程性与终结性、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多维评估机制, 不仅关注最终成果的专业完成度, 更重视学生在项目推进中体现的协作、迭代与反思能力。通过对目标、过程与评价三大核心要素的一体化设计与有机联动, 该框架力图打造一个既能敏捷响应数字技术革新、精准对接产业动态需求, 又能有效激发学生内在创新潜能的新型智慧课堂生态。其根本要义在于, 将原先离散、静态的教学元素, 转化为一个相互支撑、动态调适的有机整体, 从而为《交互设计工作坊》等高阶实践课程提供兼具理论高度与实操价值的系统性改革方案与实践指引。

“目标融合”旨在实现知识、能力与素养的三维统整。具体而言, 它要求教学目标不再局限于软件操作的陈述性知识, 而是深度融合程序性知识(如基于用户研究的信息架构方法与交互原型迭代流程)与价值性素养(如设计伦理、审美判断与文化自觉)。这一融合的理论基础在于, 现代交互设计本质上是处理复杂情境中“人-机-环境”关系的系统性活动, 需调动设计者的多维认知资源。借鉴多模态交互设计中对视觉、听觉、认知及动作(VACP)资源进行整合分析的思路^[3], 教学目标必须同步关照用户的认知规律、行为逻辑与情感体验。同时, 它直接回应了产业界对设计师“创新能力本位”的核心诉求(东瑞, 2014), 强调在解决真实设计问题的过程中, 内化理论原则并形成稳定的专业判断力。

“流程融合”则聚焦于教学实施过程的系统性重构, 其核心是构建一个以真实、复杂的设计项目为主轴的“学-做-创”一体化螺旋式进阶流程。该流程突破了传统教学中理论讲授、技能训练与项目实践机械拼接的线性模式, 转而引导学生沉浸于一个从认知建构、能力应用到创新生成的迭代

循环中。具体而言,学生首先进入“理论认知与案例解构”阶段,在此环节,他们并非被动接受知识,而是主动运用认知心理学、用户体验原则等理论工具,对经典或前沿设计案例进行批判性剖析,旨在建立扎实的、可迁移的设计认知图谱。随后,进入“技术工具与流程模拟”阶段,学生在明确的设计目标驱动下,学习并应用包括 AIGC 辅助创意生成、低代码/无代码平台快速原型搭建在内的现代工具链,在模拟的、但高度结构化的任务中,实践从用户调研、信息架构到交互原型制作的专业流程,将抽象理论与设计原则转化为具体的、可操作的解决方案。最终,在“综合创新与项目实施”阶段,学生需整合前两个阶段的所学所练,完成一个从 0 到 1 的完整创新项目,在真实约束条件下进行设计决策、美学表达与技术实现,并接受用户测试与迭代的考验。这一流程的深层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对 UI 设计标准专业工序的教学化复现,更是将 AIGC、低代码等前沿技术作为“认知伙伴”与“效率引擎”,深度嵌入每一个环节。学生借此亲身体验到,技术如何赋能“交互设计的高效率、合目的性、对话性及选择性”,理解工具本身亦是设计思维与问题解决逻辑的延伸。通过这种“在设计中学习设计、在创新中理解创新”的浸润式旅程,学生得以超越对软件功能或设计样式的表层掌握,深刻领悟设计作为一个动态的、系统的、以人为中心的问题求解活动的本质,从而构建起面向未来挑战的、可持续的复合型专业能力。

“评价融合”构成了保障改革成效、驱动教学持续优化的关键闭环,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贯穿全程、多维互证、促进发展的立体化评价体系。该体系彻底扬弃了以最终视觉产出为主要甚至唯一标准的传统评价模式,转向对学生在“学习过程-项目表现-能力发展”三个维度的综合、动态评估。在过程性评价层面,体系关注学生在真实项目周期中的思维轨迹与行为投入。这包括对调研日志、需求分析报告、头脑风暴草图、多轮原型迭代记录等过程性文档的系统审阅。其重点不在于文档的形式完美,而在于评估学生如何发现问题、定义问题,如何基于用户反馈与测试数据进行设计决策与方案优化,从而衡量其设计思维与系统性解决问题能力的形成过程。在表现性评价层面,体系聚焦于学生在完成综合性项目任务中展现出的专业成果品质。评价标准依据课程所对标的专业实践要求,具体考察设计方案的逻辑严密性、用户中心理念的贯彻度、技术实现的合理性与完

成度,以及在解决设计问题中体现出的创意新颖性与文化敏感性。这超越了单纯的“画面效果”,转而评价方案作为“解决问题的系统”的整体效能。在发展性评价层面,体系着重考察学生在非技术性核心能力与素养上的成长。这包括在团队协作中沟通、协调与领导力的表现,在项目答辩与设计评审中展现的批判性思维、表达与抗压能力,以及在整个学习过程中表现出的自主学习意愿、伦理意识与可持续发展观念。此类评价往往通过同伴互评、自我反思报告、教师观察记录等质性方式进行。这一“三维一体”的评价融合体系,其本质是将评价从课程终点的“裁判”,转变为嵌入教学全过程的“导航仪”与“催化剂”。它通过多元、透明的评价标准引导学生明确努力方向,通过持续、及时的评价反馈支持学生的个性化成长路径,最终确保“目标融合”所设定的知识、能力与素养目标,能够通过“流程融合”的教学实践,在学生身上得以真实、稳固地达成,从而形成一个以评促学、以评促教的良性教学闭环。

评价标准需紧密对标塑造产品竞争力的核心维度,即可用性、易用性、吸引力与文化认同^[4],并具体化“一致性、反馈、简化”等交互设计基本原则^[5]。通过这种融合性评价,不仅能更准确衡量“三维融合”目标的达成度,更能引导学生关注设计的完整价值,鼓励他们在技术与文化的交界处进行有意义的探索(魏力敏,2017)。

三、《交互设计工作坊》课程改革实践

基于上述“三维融合”的理论框架,本研究对《交互设计工作坊》课程实施了系统性重塑,核心在于将前沿数字技术深度融入教学全流程,并以一个完整的项目驱动学生能力实现阶梯式跃升。改革首先聚焦于教学工具与范式的重构。课程果断引入 AIGC 工具(如即梦 AI、Stable Diffusion)与主流低代码/无代码平台(如即时设计),此举并非简单的工具叠加,而是旨在引发教学重心的根本性转移——从过去强调“如何画”的技艺训练,转向注重“如何想”的概念发散与“如何建”的逻辑实现。教师利用 AIGC 快速生成海量风格方案与用户界面文案,甚至创造典型用户画像与使用场景,极大丰富了案例教学的维度与效率;同时,低代码平台使得复杂交互逻辑与高保真原型的搭建变得直观高效,教师能够动态演示信息架构与操作流程,使抽象设计原则“可视化、可互动”。由此,学生被训练掌握“AI 辅助创意构思-专业软件深化设计-低代码平台交互实现-用户测试迭代”的现代

workflow,例如,他们可运用 AIGC 探索多种符合“邻近性”、“相似性”格式塔原理 (Johnson, 2010) 的页面布局,并迅速在低代码平台上构建可点击原型,以验证“反馈”机制的有效性或实施“模态代偿”策略 (程时伟 & 石浩, 2019),从而在快速原型迭代中深化对交互本质的理解。

为实现能力的结构化进阶,课程精心设计并贯穿了一个名为“非遗文化数字体验”的综合性项目,并分解为“解构与认知”、“建模与实践”、“融合与创新”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解构与认知),学生需对“匠木”、“云游敦煌”等优秀文化类应用进行深度剖析,运用 VACP 框架系统评估其如何整合视觉、听觉、认知与动作资源来传达文化内涵与提升体验 (赖世文, 2025),并结合认知心理学原则 (Johnson, 2010) 撰写竞品分析与设计策略报告,此阶段旨在夯实“目标融合”中的理论知识根基。进入第二阶段(建模与实践),学生则投身于“流程融合”的真实操练,开展用户访谈、构建人物角色、绘制信息架构图与用户旅程图,

本次课程改革实践在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亦引发了对若干关键挑战的深度教学反思。改革所依赖的 AIGC 与低代码平台等技术工具本身处于高速迭代周期,这对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与教学资源的前瞻性提出了持续更新的要求。同时,学生数字化基础与接受能力的差异,也对差异化教学设计与过程性支持构成了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建立由校内教师、行业导师与技术提供商共同构成的“协同教研机制”至关重要,三方可共同开发与维护动态更新的案例库、工具教程与项目资源包,确保教学内容的行业前沿性。此外,必须警惕在教学中对技术工具产生过度依赖的风险,应始终强调“设计思维”作为问题解决核心方法论的地位,以及“审美判断”在塑造产品情感价值与差异化竞争力中的不可替代性 (魏力敏, 2017)。技术的赋能唯有服务于人的创造性思考与深层次的文化表达,方能真正实现其教育价值。

“三维融合”改革模式在实践中展现出多维度的推广价值。首先,其理论框架与实施路径具有较高的普适性,可被适配并应用于《交互设计工作坊》、《UI 设计》等相关课程中,其项目驱动的“三阶能力进阶”模型尤其适用于强调实践与创新的设计类课程教学重构。其次,该模式为在专业层面构建“紧密对接产业链的专业体系” (东瑞,

并运用前期掌握的工具链,将“简洁性”、“容错性”等设计原则转化为可交互的低代码原型,专注于核心功能流程的实现,从而将知识转化为解决具体问题的程序性能力。

最终,在第三阶段(融合与创新),课程引导学生迈向“素养”层面的升华与创造性输出。学生需在功能性原型基础上,进行设计的文化赋能与体验升华,尝试将传统文化意象与现代交互语言相融合,或探索融入 AR、语音等多模态交互的可能性。他们需要完成从高保真视觉界面、交互原型到完整设计说明的全套方案,并参与最终的小组答辩与用户测试。这一阶段不仅考核其综合项目输出能力,更激励其进行有文化深度的设计思考,回应 Frow (1995) 所提出的产品应具备“文化价值”的竞争力维度^[6],并探索在“光电意象世界”中塑造新审美形式的可能 (魏力敏, 2017),最终达成创新素养与专业判断力的培养目标。

四、可持续发展路径探索

2014) 提供了具体的课程级落地方案,通过引入行业真实项目流程与主流生产工具,有效弥合了学术培养与职业需求之间的“最后一公里”差距。最后,该课程模式天然地促进了跨学科的知识融合,UI 设计本身即需综合运用认知心理学 (Johnson, 2010) 以理解用户,借助计算机科学实现交互逻辑,并汲取文化研究养分进行内涵塑造 (魏力敏, 2017)。因此,本实践为设计学与其他学科开展深度融合教学,培养复合型人才,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试点经验。

面向未来,UI 设计教育必须保持对行业前沿趋势的敏锐洞察与动态融入。教育者应持续关注“情感化设计”、“无界面交互”、“可持续设计”等新兴理念^{[7][8][9]},并将“可访问性与包容性”设计作为重要的设计伦理纳入核心教学内容,培养学生为社会不同群体创造公平数字体验的责任感。教育的终极目标,是超越对工具与技能的传授,培养出既精通先进数字技术、能驾驭快速演变的设计范式,又深谙人本设计原理与文化传承脉络,最终具备可持续创新能力与战略视野的复合型设计人才。唯有如此,我们所培养的设计师才能在未来的技术与文化变革中,不仅成为被动的适应者,更能成为积极的定义者与引领者。

参考文献:

- [1] 刘再行.UI 交互设计流程的探索与教学实践[J].装饰,2015,(01):136-137.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5.01.041.
- [2] 东瑞.浅谈高校 UI 交互设计人才的培养[J].宁夏社会科学,2014,(03):161-163.
- [3] 赖世文,况宇翔,程祖玲,等.基于 VACP 模型的非遗 APP 多模态交互设计策略研究[J].包装工程,2025,46(20):225-236.DOI:10.19554/j.cnki.1001-3563.2025.20.021.
- [4] 张鑫宇.神话重构与文化觉醒: 哪吒 IP 的传播机制及文化认同探析[J].传媒论坛,2026,(04):67-69.
- [5] Johnson R B, McGowan M W, Turner L A. Grounded theory in practice: Is it inherently a mixed method?[J].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2010, 17(2).
- [6] Frow J. 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value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
- [7] 刘逸,杨勇.数字技术赋能下湖南博物院数字文创产品情感化设计研究[J].鞋类工艺与设计,2026,6(04):94-96.
- [8] 李宇辰,郑婷婷,初玥君.无界面交互游戏的设计策略[J].明日风尚,2024,(10):101-103.
- [9] 刘世豪,刘乙臻.可持续设计理念下宣纸文创的视觉表达与材料循环策略[J].造纸科学与技术,2026,45(01):110-114.DOI:10.19696/j.issn1671-4571.2026.01.023.

苗族泥哨 IP 形象设计研究——以“苗疆印象”为例

谢明阳¹ 颜丽燕¹ 文秀¹ 黄珊^{1*}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苗族泥哨作为苗族传统文化的瑰宝, 承载着族群的历史记忆与审美智慧。本文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黄平苗族泥哨为造型基底, 以苗族服饰纹样为文化符号内核, 结合苗族泥哨生肖文化, 旨在探索非遗元素融合的 IP 形象设计, 推动苗族文化活态传承。通过元素提取跟色彩策略, 打造6个核心 IP 角色, 既保留泥哨工艺质感与服饰纹样民俗寓意, 又契合现代审美偏好。该设计有效破解传统泥哨传播与市场适配的难题, 实现苗族非遗元素的创造性转化, 构建以文化为核心根基, 传播为扩散路径, 商业为可持续动力的价值闭环, 为民族文化 IP 形象设计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兼具理论支撑与实践可行性的范例, 对非遗传承与文化传播具有双重价值。

关键词: 苗族泥哨; 服饰纹样; IP 形象设计

基金项目: 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霞客桂韵——徐霞客广西游记文创设计”(课题编号 S202510603284);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南宁师范大学 2025 年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课题(课题编号 2025SCKT1)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77

Research on the IP Image Design of Miao Clay Whistles: A Case Study of "Miaojiang Impression"

Mingyang Xie¹, Yanli Yan¹, Xiu Wen¹

¹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0, Guangxi

Abstract: As a treasure of the Miao ethnic group's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iao clay whistle carries the historical memory and aesthetic wisdom of the ethnic group. This paper takes the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the Miao clay whistle of Huangping, Guizhou as the base of the shape, and the Miao ethnic group's clothing patterns as the core of cultural symbols, combined with the Miao clay whistle zodiac culture, aiming to explore the IP image design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and promote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Miao culture. Through the extraction of elements and color strategies, six core IP characters are created, which not only retain the texture of the clay whistle craftsmanship and the folkloric implications of the clothing patterns, but also conform to modern aesthetic preferences. This design effectively solves the problems of the dissemination and market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clay whistles, realizes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Miao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and builds a value loop with culture as the core foundation, dissemination as the diffusion path, and business as the sustainable driving force. It

作者简介: 谢明阳(2004), 女, 汉族, 广西省桂林市, 本科, 学生,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

颜丽燕(2005), 女, 汉族, 广西省北海市, 本科, 学生,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

文秀(2005), 女, 汉族, 广西省桂林市, 本科, 学生,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

黄珊(1978), 女, 汉族, 广西南宁市, 硕士研究生, 老师,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

通讯作者: 黄珊

provides a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feasibility example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thnic cultural IP image design, and has dual value for the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d cultural dissemination.

Keywords: Miao Clay Whistle; Clothing Patterns; IP Image Design

一、研究背景

在文化强国战略引领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发展成为时代命题。苗族作为我国多元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其传统工艺与视觉符号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基因。苗族泥哨于 2008 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以其夸张传神的造型与鲜明的色彩风格成为苗族民间美术的代表；而苗族服饰纹样则被称为“穿在身上的史诗”，通过动植物、几何等符号记录着族群的神话传说与生活愿景。当前，苗族泥哨这一非遗元素的 IP 开发虽已初见成效，但多元素融合的深度创作仍显不足，其传承也面临着巨大的困难。

（一）认知与传播不足

经调研显示，大众对苗族泥哨的认知多呈现浅层化、碎片化的状态，多数人仅停留在听说过，对其作为非遗的文化内涵与独特艺术价值缺乏深入了解，部分年轻群体甚至完全未曾接触过。传播层面短板显著，一方面，缺乏现代化的营销推广思维，依赖传统线下售卖的单一渠道，未充分利用数字媒体和跨界合作等传播载体，无法有效吸引年轻消费群体；另一方面，品牌建设严重滞后，没有形成统一的文化 IP、视觉标识与传播口号，产品辨识度低，在同类非遗手工艺品中难以形成记忆点，导致传播缺乏持续性与穿透力。

（二）市场需求少

市场需求不足是制约苗族泥哨产业发展的核心瓶颈。泥哨制作依赖纯手工制作，工序繁琐且无法量产，导致制作成本高，最终导致售价缺乏市场竞争力。同时，大众对其文化价值认知不足，消费意愿低，加之使用场景单一，难以满足现代审美与日常需求，进一步压缩了市场空间。传承人收入与投入的不匹配，不仅挫伤创作与传承积极性，更削弱了技艺传承的核心动力，形成需求少、收益低、传承难的恶性循环，严重阻碍产业规模化与可持续发展。

（三）传承断层和缺乏创新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年轻一代对于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减弱，他们更倾向于追求时尚和潮流。导致苗族泥哨等传统手工艺品的传承面临着后继无人的风险。即便有一些年轻人愿

意学习和传承这门技艺，但因其制作难度大、周期长、收益低等原因，很难长期坚持。此外，苗族泥哨还面临着产品创新不足的困境，当前苗族泥哨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新形式的设计和对新材料、新工艺的探索和应用，这种单一性限制了苗族泥哨的创新发展，难以满足现代消费者的需求，逐渐远离现代生活。（如图 1、2 所示）



图 1、2 黔东南州民族博物馆的苗族泥哨（图片来源网络）

二、研究意义

（一）文化价值苗族泥哨 IP 形象设计研究——以“苗疆印象”为例

苗族泥哨，在历史漫长的发展中沉淀下来许多文化精髓，汇聚各时代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向往。苗族泥哨要有效地传播，就必须坚持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在保留独特文化价值的同时，打破传

统的设计理念，对其进行二次创新设计，为苗族泥哨 IP 形象设计注入新的活力。IP 形象不仅仅是商品，更是文化内涵的载体，其艺术价值与文化底蕴紧密相连。因此，在设计 IP 形象时，应深入挖掘苗族泥哨的文化内涵，通过创新设计，让更多人领略到苗族泥哨艺术的独特魅力，从而实现有效地传承与发展。

(二) 实践价值

苗族泥哨的实践价值多元且突出，是赋能产业与文化发展的重要载体。产业层面，其可通过文创转化开发饰品、摆件等衍生产品，降低传统工艺门槛，带动手艺人增收；文化传播层面，小体量、强符号性的优势让它成为非遗传播载体，适配短视频、文创展会等现代场景，助力民族文化破圈。教育领域层面，其简易制作流程可作为非遗教具，培养青少年文化认同；乡村振兴层面，依托地域特色形成产业 IP，吸引文旅消费，为乡村发展注入内生动力。

三、苗族泥哨 IP 形象设计的框架

苗族泥哨作为承载苗族民俗文化与手工技艺的非遗载体，其 IP 形象设计以活化非遗、传递苗韵、连接大众为核心，立足文化辨识度、民俗关联性、场景延展性三大维度。设计既留存泥哨工艺灵魂与苗族文化基因，又适配现代传播与消费场景，让 IP 成为非遗与大众沟通的可视化桥梁，助力非遗的活态传承。

(一) 元素提取

1. 造型元素提取

调研显示，苗族泥哨多以生活中的动物为原型，因此本次 IP 形象设计以泥哨的十二生肖原型为基底，精选龙、虎、牛、鸡、猪、兔这六种具有代表性的形象。保留泥哨动物的核心特征，如“泥小龙”保留龙的犄角形态，延续泥哨龙的民俗威严寓意；“泥小虎”保留虎面的对称纹路与耳朵的形态，呼应泥哨虎的驱邪祈福象征。同时，结合苗族传统头饰的包裹式结构，将动物造型转化为贴合 Q 版角色头部的装饰载体，简化传统泥哨的复杂肌理，既延续生肖承载的纳福、护佑等民俗内涵，又以鲜明动物标识构建 IP 核心视觉记忆点，实现传统符号与现代造型的有机融合。（如表 1 所示）

表 1 苗族泥哨造型元素提取

动物	泥哨	提取	苗族泥哨形象设计线稿	动物	泥哨	提取	苗族泥哨形象设计线稿
龙		龙角		鸡		羽冠	
虎		耳朵、胡须、斑纹		猪		耳朵、憨态鼻	
牛		犄角、牛脸		兔		耳朵	

图片来源：作者整理

2. 纹样符号提取

苗族泥哨的彩绘纹样与苗族服饰纹样同源，均承载祈福、叙事等民俗表意功能。本次 IP 设计筛选服饰纹样核心纹样进行转化，动物类提取

龙、蛙、蝴蝶等纹样，简化传统纹样线条为圆润流畅的轮廓，保留纹样的文化内涵，避免繁复纹样造成的视觉压迫。几何类提取菱形纹、回纹、云纹，将传统的细密排列改为色块拼接，适配服

饰的简约布局。植物类提取缠枝、花草等纹样,提取纹样的曲线形态,简化纹样的细节肌理,以色彩点缀于黑色基底,呼应苗族泥哨的传统视觉,让纹样成为区分角色的标识之一,实现文化符号与现代造型的融合,形成适配泥哨造型的装饰单元。

3. 色彩元素提取

苗族泥哨 IP 形象的色彩元素,提取自苗族泥哨黑底彩纹的传统视觉特质,装饰色则选取自苗族服饰中的玫粉、明黄、宝蓝等高饱和色调。提取保留传统色彩的对比张力,同时调整色彩明度与纯度,让高饱和色更适配现代萌系形象的明快氛围。提取既锚定了苗族泥哨的视觉基因,又以协调的色彩搭配强化 IP 辨识度,契合当代文创产品的审美偏好。同时,色彩提取紧扣生肖角色性格,如“泥小龙”搭配黑金色彰显神圣尊贵;“泥小牛”则用黑蓝组合凸显稳重内敛,让色彩既承载苗族文化寓意,又成为区分角色、强化记忆点的视觉符号,实现传统色彩与现代设计的有机融合。

(二) 苗族泥哨 IP 形象设定

1. 基础形象设定

该 IP 形象以苗族泥哨为载体,融合苗族服饰纹样与生肖文化,设计出六个核心 IP 角色,

分别将其为“泥小龙”“泥小虎”“泥小牛”“泥小鸡”“泥小猪”“泥小兔”。赋予其对应文化性格,“泥小龙”聪明机智,“泥小虎”坚韧果敢,“泥小牛”坚毅稳重,“泥小鸡”自信昂扬,“泥小猪”天真烂漫,“泥小兔”活泼聪慧。角色造型以泥哨拟人化为主体,在头饰上、衣服嵌入适配的服饰纹样。既保留苗族泥哨的民俗工艺质感,又通过 Q 版造型契合现代潮玩审美,实现苗族非遗符号与生肖文化、服饰文化的视觉融合。

2. 形象动态设计

借鉴苗族泥哨的造型动态,为每个角色设计站立、叉腰等 5 种核心动态。“泥小龙”姿态舒展温和,呼应苗族接龙节的祈福内涵;“泥小虎”动作飒爽果敢,契合苗族赶秋节的勇猛精神;“泥小牛”动作坚毅稳重,彰显苗族农耕文化特质;“泥小鸡”动作挺拔昂扬,呼应苗族鸡图腾崇拜的活力特质;“泥小猪”的憨态坐姿尽显苗族文化的质朴;“泥小兔”可爱坐姿灵动俏皮,传递苗族玉兔送丝传说的灵动意象。动态设计强化生肖动作特征,融入苗族民俗精神,让形象兼具性格辨识度与文化感染力,赋予静态 IP 动态叙事的生命力。(如图 3 所示)



图 3 六个苗族泥哨 IP 形象 (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四、设计的创新点

(一) 文化符号的融合创新

该 IP 形象设计创新性地地将苗族泥哨与生肖文化、服饰纹样进行融合。传统苗族泥哨多以动物造型呈现,具有驱邪纳福的寓意,此 IP 选取龙、虎、牛、鸡、猪、兔这六个生肖形象为载体,同时将苗族服饰纹样提炼后融入泥哨头饰的设计,既保留了泥哨的民俗工艺特征,又赋予其生肖文化的新寓意,实现了传统非遗符号与生肖文化、

服饰纹样的有机结合,为非遗文化的现代传播提供了全新的叙事载体,提升了文化符号的辨识度与趣味性。

(二) 形象设计的表达创新

在形象塑造上,该 IP 采用 Q 版卡通的现代设计语言,对苗族传统形象进行了适应性转化。设计中简化了苗族服饰的复杂结构,提炼出黑色主调、彩色纹样等标志性视觉元素,同时以萌态化的五官、1:1 的头身比例构建卡通形象,契合了现代受众尤其是年轻群体对潮玩 IP 的审美偏好。既保留了苗族服饰的视觉识别性,又通过扁

平化色彩和卡通化处理,降低了大众对苗族文化的理解门槛,使传统形象具备了更强的亲和力与传播力,为传统民族形象的现代化表达提供了可借鉴的路径。

五、结论

苗族泥哨是我国民间手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泥哨手艺人基于乡土情感、融入文化认同及参考时代需求进行泥塑技艺实践产生的艺术成果。苗族泥哨 IP 形象设计通过对非遗符号的系统性提取与现代转译,为苗族泥哨的当代传承提供了创新路径。非遗 IP 化设计需在文化坚守与现代创新之间找到平衡,既要深度挖掘非遗的文化内核,又要以符合当代审美的形式实现传播破圈,助力非遗文化在当代社会实现更广泛的传播与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 [1] 宋文静. 黄平泥哨的视觉化创新设计转译探究[J]. 天工, 2025, (12): 45-47.
- [2] 李旭润. 贵州苗族泥哨品牌形象设计与推广研究[D]. 重庆工商大学, 2025.
- [3] 王秀伟, 李晓军. 大运河文化带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空分异与传承保护[J]. 民族艺术研究, 2023.
- [4] 龙晴. 贵州黄平泥哨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应用研究[J]. 中国包装, 2025, 45(02): 89-91.
- [5] 龚卿民, 谭晓霜. 传统手工技艺的内涵与角色解读——以黄平苗族泥哨为例[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 2024.
- [6] 李佩穗. 贵州黄平泥哨造型色彩及纹样元素在文创设计中的应用研究[D]. 贵州大学, 2024.
- [7] 韩若男, 蔡克中. 苗族泥哨元素在文化创意产品设计中的应用[J]. 设计, 2024, 37(01): 64-67.
- [8] 吴一巧. 基于 AR 技术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及设计应用——以黄平泥哨为例[J]. 中国包装, 2022.
- [9] 赵威, 张超, 朱晓君. 黄平苗族传统手工艺设计中的色彩语义研究[J]. 丝网印刷, 2022, (01): 9-13.
- [10] 刘凯. 苗族装饰元素在包装设计中的研究与应用[D]. 北京印刷学院, 2022.
- [11] 袁意斯扬, 杨薪玉, 张海林, 等. 基于苗族泥哨的黄平城市形象视觉识别系统设计研究[J]. 艺术科技, 2016, 29(05).
- [12] 王莹莹, 李正安. 贵州黄平苗族泥哨的艺术特色及制作工艺[J]. 装饰, 2016, (03): 106-108.
- [13] 杨德. 试论黄平苗族泥哨的艺术特色及价值[C]//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建设与发展初探. 贵州省黄平县文物局, 2010: 156-157.

“祈灵”节庆系列海报设计解析

文秀¹ 吕苑¹ 农文君^{1*}

(1. 南宁师范大学,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祈灵”节庆系列海报, 是一项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麒麟舞为创作原型的文化 IP 创新设计项目。该系列通过构建“祈灵”虚拟形象为核心, 将壮族服饰纹样、地域建筑符号、植物意象与传统节日融合, 构建兼具文化识别性与现代传播力的视觉系统。设计在统一的视觉系统下, 对应春节、元宵、端午、中秋四大节日, 采用差异化的文字意象与视觉节奏, 传达各传统节日的独特文化底蕴, 探索民俗文化在当代设计语境下的焕新路径。

关键词: 麒麟舞; 文化 IP; 视觉转译; 节庆设计; 非遗创新; 地域符号

基金项目: 南宁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资助项目“霞客桂韵——徐霞客广西游记文创设计”(课题编号 S202510603284); 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南宁师范大学 2025 年创新创业教育专项课题(课题编号 2025SCKT1)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78

An Analysis of the "Qiling (Spirit Invocation)" Festival Series Poster Design

Xiu Wen¹, Yuan Lü¹

¹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0, Guangxi

Abstract: The "Qiling (Spirit Invocation)" Festival Series Poster Design is an innovative cultural IP design project that takes th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Qilin Dance as its creative prototype. Center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virtual "Qiling" character as the core, this series integrates Zhuang ethnic costume patterns, regional architectural symbols, plant imagery and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thus constructing a visual system with both cultural recognizability and modern communication effectiveness. Under this unified visual system, the design adopts differentiated textual imagery and visual rhythms corresponding to four major traditional Chinese festivals: the Spring Festival, Lantern Festival, Dragon Boat Festival and Mid-Autumn Festival, to convey the unique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each festival and explore the path for the revitalization of folk culture in the context of contemporary design.

Keywords: Qilin Dance; Cultural IP; Visual Translation; Festival Desig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novation; Regional Symbols

一、传统语境下麒麟舞的文化意蕴

麒麟舞广泛流传于中国南方广东、广西、福建、湖南、江西等省份, 以及客家、瑶族、壮族等民族聚居地, 是一种融合舞蹈、音乐、服饰与信仰的民间表演艺术。其视觉系统以麒麟造型为核心, 头部饰有彩绘、刺绣与金属饰片, 身躯覆有鳞甲纹样, 整体形态威武而灵动, 象征吉祥如

意、风调雨顺。在壮族地区, 麒麟舞更常与绣球、铜鼓等民族文化符号共同出现, 形成一套完整的仪式视觉语言。

传统的麒麟舞表演形态高度依赖特定场域与时节, 其传播范围与受众群体有限。在当代设计中, 若仅对其进行简单的场景复刻或纹样搬运, 容易陷入标本化展示, 难以与现代受众建立深层情感共鸣。本研究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麒麟舞的当

作者简介: 文秀(2005), 女, 汉族, 广西省桂林市, 本科, 学生,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

吕苑(2004), 女, 汉族, 广西省玉林市, 本科, 学生, 主要从事视觉传达设计。

农文君(1992), 女, 壮族, 广西百色市, 硕士研究生, 老师, 主要从事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研究。

通讯作者: 农文君

代设计转译为核心,提取其文化内核与形式美感,进行符合现代审美与传播逻辑的再创造,为麒麟舞文化注入适配当代传播场景的创新活力。

二、文化 IP 的构建与民族基因的植入

(一) 语义转换与 IP 定位

“祈灵”以谐音巧妙关联传统祥瑞神兽麒麟的文化内核,延续其仁兽喻德、送子祈嗣和祥瑞兆运的三大核心文化意蕴。这一关联让 IP 在大众认知中天然自带祈福纳祥的属性根基,既维系了非遗麒麟舞的文化脉络,又为当代受众在事业发展、家庭圆满、个人成长等场景的祈愿需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溯源支撑。

赋予“祈灵”即时祈愿的情感寄托与灵验成真的心理共鸣双重现代价值,将传统瑞兽的神性符号转化为可感知的人文伙伴。面向青年群体,使其成为社交祈愿的互动符号;面向家庭客群,则强化其作为圆满祈愿的情感载体属性。承接当代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多元祈愿诉求,形成强烈的情感共鸣点。

突破传统麒麟威严瑞兽的固化形态,创新打造头戴非遗麒麟舞头套的萌态孩童形象。头套设计先提取麒麟舞的核心视觉元素,再以几何化手法进行提炼与整合手法重构形态。通过灵动神态、夸张眼部设计、童趣化肢体语言,打造强互动性视觉符号,完成从神话瑞兽到可情感互动的人文祈愿 IP 的形象转型,让 IP 具备一眼识别的视觉冲击力和一触共情的传播力。

(二) 民族基因的植入

IP 形象采用壮族服饰中的视觉基因,从而强化祈灵 IP 的民族属性。将壮族特色菱形纹、云雷纹抽象重构,转化为麒麟头套的鳞片装饰与边缘饰带,壮锦的经纬编织逻辑则融入 IP 服饰的色彩分层与肌理细节。同时,把壮族仪式核心物件绣球、铜鼓做符号化处理。绣球的几何拼接元素化作头套点缀纹样,铜鼓同心圆纹以精致边框形式嵌入背景,让民族元素不堆砌,自然成为 IP 的文化标识,强化受众的民族归属感。

设计创新性融入南宁地域地标,为 IP 注入鲜明地域印记与时代气息。南宁的青秀山大门与日月双塔等建筑,经过扁平化提炼与卡通化艺术处理后,以背景视觉锚点的形式与 IP 场景融合。这些建筑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成为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成果的象征,让祈灵 IP 跳出传统祥瑞符

号固有框架的局限,在保留文化底蕴的同时,与当代地域发展建立情感关联,兼具文化性与时代特征。

海报选取南宁本土植物构建 IP 的地域生态符号,实现文化与自然的融合。以市花朱槿花为创作原型,采用写实与卡通结合的手法,打造春节、元宵海报的花卉背景;三角梅的色彩层次被提炼融入 IP 服饰的渐变设计中。花卉的柔美形态与麒麟头套的刚毅线条形成强烈视觉对比,既丰富了画面的层次与韵律,又以自然元素直观传递地域属性,让 IP 的地域文化表达更鲜活、更具亲和力。

(三) 传统麒麟舞现代设计转译

聚焦非遗麒麟舞核心视觉符号体系,鬃毛部分还原再现其灵动层次感,借顺滑曲线搭配渐变色彩,传递出麒麟舞表演时的韵律感;角型部分严格遵循传统样式的基础框架,结合几何化提炼处理与非遗纹饰元素,保留瑞兽通天的符号属性。同时结合各节日场景开展创新呈现设计,助力受众直观辨识其麒麟文化内核,实现非遗视觉基因的有效传承。

对传统造型实施“减法设计”,以简练线条重构形态。肢体处理上,以流畅的弧度勾勒肢体轮廓;服饰设计层面,将传统繁杂的纹饰元素,通过符号化提炼转化为几何线条与块面的组合形式,简化不必要的冗余装饰细节。在形态简化过程中,保留麒麟舞本身特有的灵动气韵,贴合当代简约审美取向,实现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语言的深度衔接,显著提升非遗造型的时尚化传播效能。

三、“祈灵”节庆海报视觉系统设计实践

(一) 图案与纹样融合

围绕麒麟舞的标志性符号做抽象提炼和功能化适配,拒绝具象复刻。将麒麟舞头的脸部左右周围装饰,简化为几何圆形装饰点,精准点缀在边框、文字背景等关键位置,既保留其吉祥寓意与听觉联想,又契合现代设计的简约感;面部彩绘则提炼为流畅曲线,或作为 IP 饰带延伸,或作为版面分割线,还原舞蹈灵动韵律的同时增强画面动感。所有元素均紧扣非遗,以功能化设计融入整体框架,让非遗基因成为海报的隐性核心脉络。

遵循按节日特性适配和不扰乱整体秩序的原

则,以轻量化点景形式嵌入图案与纹样。春节用烟花星点底纹呼应节日热闹氛围,端午用简化龙舟桨纹暗合竞渡动态,中秋用散点桂花强化诗意,元宵用角落灯笼呼应团圆;所有符号均低饱和度呈现,不抢夺IP视觉焦点,却能快速唤醒受众节日记忆,实现小符号激活强氛围的核心效果,让节日属性直观传递。

核心是将壮族标志性纹样转化为视觉肌理,强化地域文化归属。把铜鼓纹样处理为低透明度底纹或边框,其同心圆结构呼应画面圆形元素,注入古朴气质;将绣球纹样拆解为核心几何单元,转化为文字区域的细腻底纹,既以重复韵律提升文字区精致度,又隐性传递绣球团圆吉祥的文化寓意。纹样不做显性堆砌,而是与其他元素有机融合,让地域文化成为IP的文化底色,强化独特归属感。

(二) 文字设计与应用

汉字具有信息传递功能与视觉符号属性,是衔接非遗文化与节日情感的核心媒介。本设计以“形、义、情”深度契合为核心逻辑,中文统一选用方正大标宋简体,通过排版规划、色彩匹配及细节打磨,使文字与麒麟舞IP形成精准视觉协同。春节文字呼应该童抱心姿态,端午文字贴合持灯手臂走向,中秋文字落于孩童与玉兔中线,元宵文字被汤圆环绕,成为串联画面叙事的核心纽带。

不同节日场景的文字设计实现文化适配性表达,春节“国泰平安”采用篆刻形制与朱红金描配色,借字体厚重感传递家国安宁祈愿;端午“吉祥如意”以斜向错动排版与青绿色调,暗合驱邪纳吉的刚健气质与龙舟竞渡动感;中秋“花好月圆”以圆润字体、暖橙渐变呼应圆月光晕;元宵“圆”字白描边贴合汤圆形态,通过文字与画面元素的融合,完成团圆主题的视觉化转译。

(三) 色彩策略

以红、金为核心色彩符号,呼应中国传统文化吉祥庆典内涵。红色象征非遗活力与节庆氛围,

是瑞兽驱邪纳福的文化符号,具象于春节灯笼、端午香囊等元素强化仪式感;金色隐喻尊贵繁荣,以渐变或线条形式呼应麒麟祥瑞属性,传递福瑞祈愿。各节日辅以暖橙(春节)、青蓝(端午)等专属辅助色,实现核心色统一、节日色差异化的象征表达。

红色高饱和属性带来强视觉冲击,传递春节团圆热烈氛围、端午竞渡活力气息等节日情感,引发大众的文化共鸣;金色渐变光泽营造华贵亲切的视觉氛围,为画面注入丰富的层次变化与空间纵深感,拉近非遗与现代受众距离。不同节日的色彩搭配进一步强化情感表达的独特性,春节暖橙红显烟火气、端午青蓝红具清新感、元宵粉紫红含甜蜜感、中秋暖黄红藏团圆感,让色彩成为非遗与节日相结合的情感可视化载体,实现文化内涵与视觉体验的双重传递。

(四) 海报构图

四张海报均将麒麟舞IP置于画面几何中心区域,聚焦视觉锚点。IP造型的视觉细节,涵盖麒麟头套的色彩配比、面部神态、服饰风格等维度,在整套海报中保持高度统一,仅通过姿态的精细化调整适配多元节日场景,具体呈现为春节抱心、端午持灯、元宵端坐、中秋站立的差异化表达。这种设计处理既强化了IP的符号性,又为画面注入了动态差异。核心IP形象与中英文节日名称均设定固定陈列方位,形成稳定的视觉骨骼体系,强化整套作品的系列感。

海报信息层级采用标准化布局,构建清晰有序的视觉逻辑。顶部信息层以复古风格字体呈现英文节日名称与QILIN WU专属标识,搭配对称星形装饰元素,兼顾国际传播与画面精致感;右侧文化层的书法体中文节日名称,与左侧红色圆形背景承载的主题汉字形成节日属性与文化祈愿的对称表达;底部字样选择与顶部字体风格一致,采用暖红色系完成视觉维度的统一,形成画面的稳定收尾效果。整体构图保证系列作品连贯性,从视觉层面深化IP的品牌化识别维度。



图 1 非遗麒麟舞
海报设计-春节



图 2 非遗麒麟舞
海报设计-端午节



图 3 非遗麒麟舞
海报设计-元宵节



图 4 非遗麒麟舞
海报设计-中秋节

四、设计创新点

（一）用创新转译替代简单复刻

设计并未直接照搬麒麟舞的传统形态或节日符号的原始样貌，而是进行了适配现代审美的创新转译。将传统麒麟舞的表演者转化为萌趣卡通孩童 IP，既保留了麒麟头套的核心识别特征，又通过圆润线条、灵动神态贴近当代受众的审美偏好；汉字并非直接沿用古体字形，而是结合节日内涵重构。春节篆刻字融入现代描边与云纹装饰，端午文字以斜向排版赋予动态，让传统文字在传递语义的同时，成为符合当下视觉习惯的设计元素。

（二）给传统符号注入现代表达

各节日场景均放弃写实化场景呈现模式，选择使用高度提炼的视觉符号体系，激发受众文化记忆共鸣与情感联想联动，完成从单向信息告知到双向情感共鸣的传播维度升级。融入多元现代设计语言，色彩渐变的层次应用、图形圆角的柔和处理、对称排布与错位构图的创意相融合的创作体系。搭配英文标识强化跨文化传播适配性，让非遗符号突破地域与文化边界，获得更广泛的传播空间，使传统符号承载文化记忆积淀，具备当代设计特有的时尚质感与高效传播效能。

（三）以系统化思路打造品牌体系

整个系列海报以非遗麒麟舞与传统节日联系为核心主题，构建了完整的品牌化视觉体系。从核心 IP 的统一造型、信息层级的标准化布局，到色彩系统的情感适配、符号元素的联动呼应，

形成了换场景不换骨架的设计逻辑。每张海报既通过专属节日符号、色彩传递个性，又通过统一的 IP 形象、排版框架、底部标识强化系列感，让四张作品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既方便受众识别记忆，也为非遗麒麟舞的长期品牌化传播奠定了视觉基础。

五、结论

“祈灵”节庆系列海报突破传统节日海报仅传递节庆氛围的浅层功能，构建出兼具文化深度与传播效能的非遗活化范例。作品以麒麟舞文化内核为根基，精准提取其核心视觉符号并完成现代化转译，有机融入壮族纹样与南宁地域元素，成功打破传统麒麟舞的传播局限，转化为高识别度、强共鸣的文化 IP。美学上借“减法设计”规避传统符号堆砌，实现非遗元素与现代审美的契合；功能上靠系统化品牌构建适配多元需求，跨文化策略拓展了非遗传播边界。

该节庆系列海报的设计实践，有力佐证优秀设计的核心价值，并不是单纯停留在表层的视觉形式雕琢与美学修饰，而是承载着文化转译、传播赋能的核心使命与时代责任。“祈灵”系列为麒麟舞的当代活化传播提供了可实施路径，并为其其他地域非遗的现代化转化提供了宝贵实践经验。这一实践成果为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构筑起坚实的设计层面支撑与指引，切实推动传统文脉在当代社会语境中持续焕发蓬勃的鲜活生机。

参考文献

- [1] 邢金善. 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下麒麟舞的传承与发展 [J]. 山东体育学院学报, 2011, 27 (03): 44-47.
- [2] 邱桐, 朱颖琳, 陈华丽. 三方传承下深圳麒麟舞的价值认同与中华民族精神凝聚 [J]. 明日风尚, 2025, (10): 35-38.
- [3] 刘晨曦, 王文青, 蒋慧. 视觉文化视域下俄罗斯族巴斯克节 IP 形象设计与传播思考 [J]. 设计, 2024, 37 (19): 29-31.
- [4] 柴嘉瑶. 非遗文化 IP 在文创产品系列化开发中的品牌构建策略 [J]. 绿色包装, 2025, (10): 169-172.
- [5] 周天一. 寓意的视觉载体——谈广西少数民族服饰图案的寓意与图案形态要素之间的关系 [J]. 艺术与设计(理论), 2008, (08): 209-211.
- [6] 戴雅琳. 从符号学视域看非遗文创品牌包装的色彩研究 [J]. 湖南包装, 2021, 36 (03): 123-125.
- [7] 张良宇. 基于视觉传达设计的非遗数字化传播路径研究 [J]. 大观, 2025, (10): 18-20.
- [8] 臧晓蕾. 汉字在海报设计中的情感表现研究 [D]. 安徽大学, 2021.
- [9] 江淑容. “读图时代”背景下文字图形化设计研究 [D]. 苏州大学, 2019.
- [10] 曲比阿果, 王智薇. 艺术节庆符号的视觉呈现与民族文化传播——以大凉山国际戏剧节为例 [J]. 民族学刊, 2023, 14 (10): 103-111+158.
- [11] 赵妍, 魏志成. 谐音祈愿吉祥图案在现代设计中的变化与应用研究 [J]. 设计, 2024, 37 (05): 32-36.
- [12] 陈虹均. 四时节俗中祈福文化的当代视觉转译设计研究 [D]. 中国美术学院, 2023.

“赛教融合+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创新模式研究——以《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为例

李文琦

(东莞城市学院, 广东 东莞 523000)

摘要:针对《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目标偏差、内容滞后、方法单一、实践不足与评价僵化等问题,本文提出“赛教融合+项目驱动”的实践教学创新模式。该模式以学科竞赛标准与真实项目需求为核心导向,通过课程内容模块化重组、教学方法多元化创新、价值引领分层融入及评价体系优化四大实践路径,构建“以学生为中心、以项目为载体、以竞赛为情境”的教学新生态。实践表明,该模式能有效打破知识碎片化困境,激发学生学习主动性,提升其创意设计、项目管理、团队协作等综合能力,同时强化职业素养与社会责任感,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素养塑造的协同统一,为新媒体行业复合型人才提供可行路径。

关键词:赛教融合;项目驱动;实践教学

基金项目:东莞城市学院教改课题(2025yjg05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79

Research on the Practical Teaching Innovation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 Project-Driven" — Taking the Course New Media Product Desig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as an Example

Li Wenqi

Dongguan City University, Dongguan, China

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eaching of the course New Media Product Design and Project Management, such as deviated teaching objectives, outdated course content,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insufficient practical training, and rigid evaluation system, this paper proposes an innovative practical teaching model of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 Project-Driven". Centered on the standards of discipline competitions and the demands of real-world projects, this model constructs a new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ecology with projects as the carrier and competitions as the scenario through four practical approaches: modular restructuring of course content, diversified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ethods, layered integration of value guidance, and optimization of the evaluation system. Practice has proved that this model can effectively break the dilemma of knowledge fragmentation,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itiative,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ies in creative design, project management and teamwork, strengthen their professional literacy and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ed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imparting, ability cultivation and quality shaping. It provides a feasible approach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for the new media industry.

Keywords: Integration of Competition and Education; Project-Driven; Practical Teaching

作者简介:李文琦(1997—),女,硕士,研究方向新媒体传播。

一、引言

随着数字技术的飞速迭代与新媒体行业的蓬勃发展,市场对兼具创新思维、实践能力与项目管理素养的复合型新媒体人才需求日益迫切。《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作为衔接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实际需求的核心交叉课程,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潜力。然而当前该课程普遍存在教学目标与行业需求脱节、教学内容滞后于前沿动态、教学方法缺乏互动性与实践性、评价体系难以全面衡量学生综合能力等突出问题,导致学生虽掌握基础技能,却难以应对真实工作场景的复杂挑战。在此背景下,传统“理论+软件操作”的教学模式已无法满足人才培养要求,亟须探索适配行业发展的教学创新路径。学科竞赛作为连接教育与行业的重要桥梁,其命题导向、评审标准与实践流程高度契合行业真实需求;项目驱动教学则能有效激发学生主动学习意识,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基于此,本文以“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为依托,构建“赛教融合+项目驱动”的教学新模式,将竞赛要求与项目流程深度融入课程教学全流程,旨在破解课程教学痛点,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一体”的教学效果,为高校同类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与内涵

赛教融合指将学科竞赛的命题要求、评审标准、实践流程与课程教学的目标设定、内容设计、教学实施、考核评价进行深度融合,并非将竞赛作为课程之外的附加活动,而是将其内化为课程核心教学环节,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赛教一体”的教学效果。项目驱动教学则是以真实项目为核心载体,将教学内容分解为项目的不同环节,学生以团队形式经历项目立项、策划、实施、成果展示的完整流程,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主动建构知识、提升能力的教学方法。“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教学模式更加强调学生主动参与学习而非被动接受知识的过程,让学生在跨学科的合作环境中完成系统性任务,既加深了对知识的迁移和理解,也培养了在真实情境中调动资源、协调关系和持续创新的能力。^[1]在此模式下,学生能够围绕真实的竞赛项目,看到行业真实的需求,通过团队协作的方式开展实践活动,加深知识的理解与实践技能的提升,帮助学生更好地与社会接轨。

三、《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教学现

状与挑战

《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是一门融合新媒体技术、产品思维与项目管理方法论的交叉性课程,主要面向高等院校新闻传播、数字媒体技术、电子商务、广告学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随着新媒体行业的快速发展,该课程在国内高校的开设比例逐年上升,但不同院校的课程质量差异较大。审视当前该课程的实际教学状况,不难发现其面临着一些挑战,这些挑战深刻影响着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思维的培养效果。

以往《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多定位为“理论+软件操作”的技能型课程,教学目标侧重知识点的掌握与工具的使用,忽视了对学生创新思维、项目管理能力、行业适配能力的培养,与新媒体行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存在偏差,导致学生虽掌握基础技能,但难以应对真实工作场景的复杂需求。在具体教学实施过程中还容易出现以下问题:第一,课程内容滞后,教学内容多依据教材章节编排,涵盖市场分析、用户研究、项目管理等分散知识点,缺乏与行业前沿动态、真实项目流程的对接,未融入竞赛评审标准与企业岗位要求,导致知识体系碎片化,实用性不强;第二,教学方法单一,以“教师讲授+案例演示”为主,缺乏互动性与实践性,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状态,难以激发学习主动性与创新潜能,团队协作、沟通表达等综合能力得不到有效锻炼;第三,实践环节不足,实践任务多为虚拟模拟项目,缺乏真实的命题背景、资源支持与评价标准,学生难以体会真实项目的流程管控、需求对接与问题解决,实践能力培养流于形式;第四,评价体系僵化,采用“理论考试+期末作品”的终结性评价方式,这种单一化的考评模式对学生的整体发展起不到促进作用,而且由于其具有滞后性(只重视结果而轻视过程),使得学生平时不注重基本技能与素质的提高,只是到了学期末才临时抱佛脚,这样就难以保证教学质量。^[2]

四、“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教学模式在课程中的实践路径

(一) 课程内容模块化重组

有效实施“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模式的关键起点在于对课程内容体系进行根本性的整合与重构,其核心策略是将高水平竞赛所设定的能力目标、技术规范以及真实业务挑战作为课程内容设计与更新的直接导向和核心参照。以“大学生广告艺术大赛”(简称“大广赛”)为例,每年“大广赛”的命题最早从3月份开始在网上分批发放,作品提交时间大致在5月中旬至6月中旬,

这个时间恰好与第二学期时间一致,因此教师可以将课程与竞赛更好地结合起来,在课程内容安排上可以打破教材章节的界限,对接大广赛项目流程。将课程内容重组为四大模块单元,第一,基础与洞察模块可以对应1-4周,前4周的时间正好结合陆续发布的命题策略单来讲授市场分析、用户研究、竞品分析等方法,引导学生如何找到适合自己的选题与赛道,并根据所授知识完成市场调研报告;第二,策略与创意模块可以对应5-8周,在市场分析基础上,教师引导学生聚焦品牌产品,深入了解产品定位,根据品牌调性和产品特征来挖掘核心创意与内容策略,通过头脑风暴与小组探究形成创意方案,搭建作品的逻辑框架;第三,设计与实现模块对应9-12周,“大广赛”有众多赛道,此时应当按参赛赛道(如策划案、互动类、UI类)开展专项教学,嵌入项目管理知识,如任务分解、协作工具使用等,让学生合理分工,都能在项目中发挥所长;第四,整合与呈现模块对应13-16周,教师组织学生模拟竞赛评审流程进行预答辩,进行作品展示与汇报,训练演讲表达与作品优化能力,纳入项目复盘环节。同时课程要融入AI前沿内容,为使课程内容跟上新媒体行业的最新发展步伐,教师应将AI前沿知识与产品设计方法、项目管理等内容深度结合。

[3]

(二) 教学方法多元化创新

理论讲授与软件实操的方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对新媒体人才培养的需求,在教学方法层面进行深层次的创新设计与系统化实施,彻底转变传统以教师单向讲授为主的教学形态,代之以学生为中心、项目为载体、任务为驱动、竞赛为情境的多元化互动教学模式。开展工作坊式教学,比如在创意阶段组织“头脑风暴工作坊”,设计阶段开展“原型设计诊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增强课堂趣味性与互动性,让学生充分发挥主导地位,教师进行引导和辅助。工作坊教学中,教师仅作为引导者与资源提供者,充分给予学生自主思考、协作探究的空间。在课堂上还可以邀请嘉宾分享,比如邀请往届获奖学生或者企业专家分享实战经验与行业视角,往届获奖学生可以分享“参赛避坑指南”“团队协作经验”等实操性内容;高校需主动对接主流媒体、互联网平台及传媒公司,搭建集实习实训、项目合作、人才输送于一体的产教融合平台,将企业真实项目、行业前沿案例引入课堂。通过与企业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开发课程,邀请行业导师开展专题讲座与实操指导,实现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的同频共振。^[4]企业专家聚焦行业真实需求,可以分享“品牌命题背后的商业逻辑”“职场核心能力

要求”等内容;分享后设置互动问答环节,让学生直接对接行业资源,解决实际困惑,都能给学生提供很多实质性的帮助。教师还应当提供过程性指导,一方面,根据学生专业背景、能力水平将团队分为基础型、提升型、拔尖型三类,基础型团队侧重基础知识与基础技能的指导,提升型团队侧重创意优化与实践能力提升,拔尖型团队侧重创新突破与竞赛冲刺指导;另一方面,通过“固定指导+弹性指导”结合的方式,固定每周开展一次团队进度会议,教师针对各团队的项目进展、存在问题进行集中点评与指导;同时开通线上指导通道,为学生提供实时答疑服务。

(三) 价值引领分层融入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要坚持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该课程蕴含着道德伦理、美学艺术、人生价值、家国情怀等丰富的育人资源。结合比赛,课程可设计多样化的项目主题,深入挖掘相关知识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这不仅能够丰富课程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还能借助思政元素的融入,让学生对思政教育形成更具体、形象且生动的认知。^[5]遵循“润物细无声”的原则,构建“职业素养-行业伦理-社会价值”三层渗透的课程思政体系,将价值引领有机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知识传授、能力培养与素养塑造的协同统一。

首先,在职业素养层方面,以项目实践与竞赛压力为载体,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责任意识、抗压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严格要求团队遵守时间节点,对拖延进度、敷衍了事的团队进行针对性引导,强调“Deadline意识”在职业工作中的重要性;在团队协作中,设置“团队冲突解决”专题讨论,引导学生学会沟通包容、换位思考,提升团队协作效率。其次,在行业伦理方面,结合新媒体行业特点,强化“真实、诚信、责任”的行业伦理教育。在市场调研与创意策划环节,强调数据真实、宣传诚信,杜绝虚假调研数据、夸大产品功效等行为,引导学生认识虚假宣传的法律风险与行业危害;在产品环节,聚焦用户隐私保护,讲授个人信息保护法相关知识,要求H5、APP等产品设计中设置隐私权限说明,避免过度收集用户信息;在传播策略制定中,引导学生关注内容合规性,杜绝低俗、暴力、违背公序良俗的传播内容,强调新媒体产品的正向引导作用。最后,在社会价值方面,依托竞赛中的多元命题,引导学生关注社会议题、传承优秀文化、践行社会责任。在公益类命题或商业命题的公益元素融入中,鼓励学生将

社会价值与商业价值相结合,鼓励学生参与公益设计实践活动(如为公益组织设计新媒体宣传物料),将课程学习与社会服务相结合,强化社会责任感。

(四) 评价体系优化

科学有效的评价体系是保障“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模式成功实施并准确衡量教学改革成效的核心环节,必须彻底改变传统课程评价中过度依赖单一期末考核的弊端,构建一个与竞赛实践深度融合、能够全面真实反映学生能力发展与综合素质提升的多元化、过程性、发展性评价新体系。打破传统“重结果、轻过程”“重理论、轻实践”的评价模式,构建“过程+结果”“个人+团队”“赛事+行业”三位一体的多元化评价体系,既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效,又精准对接竞赛标准与行业需求。

首先,评价维度应当多元化,设置四大评价维度,全面覆盖知识、能力、素养与成果。一是知识掌握维度,通过课堂提问、阶段测验、调研报告等方式,考核学生对市场分析、创意策划、项目管理等核心知识的掌握程度;二是实践能力维度,重点考核学生的创意设计能力、技术实现能力、项目执行能力、沟通表达能力,通过项目进度报告、设计原型、模拟答辩等成果进行评价;三是团队协作维度,采用“团队互评+个人自评+教师评价”的方式,从分工合理性、协作积极性、沟通有效性、贡献度等方面进行评分,避免“搭便车”现象;四是素养与合规维度,考核学生的职业素养、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感,通过项目复盘报告、日常表现、作品合规性审查进行评价。其次,评价方式应当过程化,过程性考核要贯穿课程四大模块,实现“学习全过程有记录、有评价、有反馈”。基础与洞察模块重点评价市场调研报告与命题解读答辩表现;策略与创意模块评价创意方案的创新性与可行性;设计与实现模块评价项目执行计划完成情况、设计原型质量与技术实现效果;整合与呈现模块评价作品打磨效果、模拟答辩表现与项目复盘报告质量。过程性评价采用“周评价+阶段评价”相结合的方式,每周通过进度报告进行简短评价,每个模块结束后进行综合评价并反馈整改意见,引导学生及时调整优化。再者,终结性评价对标化,终结性考核以“大广赛”参赛作品及最终答辩表现为核心,评价标准直接对标大广赛评审规则与企业产品验收标准。最后,评价主体尽量多元化,可以构建“教师+企业导师+学生+行业专家”的多元评价主体,确保评价的客观性与专业性。教师侧重知识掌握、教学目标达成情况评价;企业导师聚焦作品的商业落地性、行业适配性评价;学生通过自评与互

评,强化自我认知与团队协作意识;行业专家从行业前沿视角对作品的创新性与竞争力进行评价。多元评价主体的意见综合形成最终成绩,避免单一评价主体的片面性。

结语

本文以《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为研究对象,系统探索了“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教学模式的理论内涵与实践路径。通过课程内容模块化重组对接竞赛流程与行业需求,教学方法多元化创新凸显学生主体地位,价值引领分层融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及“过程+结果”“个人+团队”“赛事+行业”三位一体评价体系的构建,有效破解了传统课程教学中存在的诸多难题。该模式不仅让学生在真实项目实践与竞赛情境中深化了对核心知识的理解,提升了创意设计、项目执行、团队协作等关键能力,更塑造了良好的职业素养、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感,实现了从“知识传授”向“能力培养”“素养塑造”的转型。

当然,教学改革是一项持续深化的系统工程,本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仍需不断完善。未来可进一步拓展合作竞赛类型与企业资源,丰富项目来源的多元化与真实性;针对不同专业背景学生的认知差异,细化分层教学策略;借助数字化教学平台优化过程性评价的效率与精准度。期待通过持续的教学探索与迭代,让“赛教融合+项目驱动”模式发挥更大育人价值,为新媒体行业及相关领域培养更多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人才,助力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需求的深度契合。

参考文献:

- [1]张秀丽.“赛教融合”视角下的创新思维训练课程建设与教学模式探索[J].科教文汇,2026,(05):81-84.DOI:10.16871/j.cnki.kjwh.2026.05.018.
- [2]孟杨.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教学改革实践[N].山西科技报,2025-09-29(A07).DOI:10.28712/n.cnki.nshxk.2025.001022.
- [3]王昭,张明川,曾文琪.基于人工智能的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以新媒体产品设计与项目管理课程为例[J].传播与版权,2025,(21):105-107.DOI:10.16852/j.cnki.45-1390/g2.2025.21.024.
- [4]刘美.数字时代下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实践教学模式改革研究[N].山西科技报,2026-01-26(B05).
- [5]傅鸿洲.项目学习在高校专业课实践教学课程思政建设中的实践——以影视产品制作课程为例[J].河南教育(高教),2026,(02):87-89.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价值、冲击及优化路径研究

金岚¹ 徐婧英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在《中小生成式人工智能使用指南（2025年版）》“育人本位、技术赋能”原则与2025年修订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数字化核心素养要求背景下，传统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在反馈滞后、素材不足和差异化支持方面的问题日益突出。本文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二语习得理论，采用文献研究法，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价值与挑战。研究发现，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通过提供个性化反馈与多模态素材支持，缓解传统教学困境，但同时也可能引发思维固化、学术诚信风险及评价失真等问题。为此，本文提出“主体性坚守—过程性评价—人机协同”的优化框架，以促进技术应用与教学目标的有效协同。

关键词：生成式人工智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数字化核心素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85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Assisted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A Study on Its Values, Impact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JinLan, XuJingy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Taiyu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policy backdrop of the principle of “student-oriented education and technology empowerment” stipulated in the Guidelines for the Use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y Junior School Students (2025 Edition) and the requirement of cultivating digital core competencies set forth in the revised *National English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General Senior High School* (2025 Edition), the traditional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is increasingly confronted with such drawbacks as delayed feedback, insufficient teaching resources, and inadequate differentiated instruction. These drawbacks make it difficult to meet the demands of scenario-based writing practic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abilities. Current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g., ChatGPT) into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have verified its effectiveness in providing instant feedback and abundant teaching resources. However, discussions on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such as the rigidification of students’ thinking patterns, academic integrity risks, as well as the systematic optimization approaches remain insufficient, which serves as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is research. Based on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theory, this study adopts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review to sort out relevant research achievements. It aims to analyze the core values and prominent challenge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owering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and construct a targeted optimization framework. The research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is technology can address the key pain points of traditional teaching through personalized feedback, resource supply, and lowering the threshold of language expression, which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digital literacy cultivation. Nevertheless, it also brings about several problems, including the rigidification of writing thinking, the weakening of students’ subject

作者简介：金 岚（2001-），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徐婧英（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通讯作者：金 岚

status, the triggering of academic integrity crises, and the distortion of teaching evaluation. These issues are in contradiction with the policy principle of “teacher-led and technology-assisted” teaching. Therefore,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optimization framework featuring “subjectivity adherence, process-oriented assessment,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By enhancing students’ subjective awareness, constructing a diversified process-oriented evaluation system, and defining the boundaries of AI-assisted teaching, this framework is designed to realize the synergy betwee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Theoretically, this research will expand the digital application dimension of relevant theories and constructs an analytical paradigm of “value-impact-optimization”. Practically, it will provide operable strategies for frontline teachers and references for educational administrators to formulate relevant norms. It is expected to facilit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toward precision, personalization, and in-depth instruction, thus conform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ore competency cultivation.

Keywords: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Writing Teaching; Digital Core Competencies

1 引言

梁文花等 (2020) 指出写作一直是我国英语教学中的薄弱环节。在教育数字化转型与人工智能深度渗透教育场景的背景下, 高中英语写作作为语言输出与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载体, 其教学质量直接影响学生综合语言运用能力发展。传统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长期面临反馈滞后、素材单一、差异化指导不足等难题,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既为破解困境提供了技术可能, 也引发了思维固化、主体性消解等新挑战, 这一技术赋能与教学本质的适配矛盾是本研究核心议题。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提出推动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深度融合, 2025 年修订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强调利用数字化工具优化写作教学, 培育思维品质与文化意识。学界现有研究虽涉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在英语写作教学的反馈供给、素材支撑等维度, 但多侧重正向价值论证。部分研究提及技术风险, 却未构建系统优化框架, 且结合建构主义与二语习得理论的融合性分析较为匮乏。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空白, 一是价值与风险的辩证关系剖析不足、二是缺乏适配高中英语写作场景的优化路径、三是未结合核心素养明确技术与教学本质的协同逻辑。为填补空白, 本研究以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和二语习得理论为框架, 采用文献研究法与逻辑分析法, 系统探讨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核心价值、现实冲击及优化路径。研究范围限定于高中英语写作教学, 聚焦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学辅助应用场景, 不涉及技术开发与算法优化。本研究可拓展相关理论的数字化应用维度, 完善技术与外语教学融合的理论体系, 实践层面可为一线教师提供实操策略, 为教育管理者制定规范

提供参考, 助力写作教学向精准化、个性化转型, 契合核心素养培育要求。

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周玲等 (2023) 指出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是一种特定类型的人工智能, 其能够借助人工智能的相关技术, 理解人类的输入信息, 并自动化生成文本、视频、音频等的多模态数据。简单来说, 就是能够生成全新内容的人工智能, 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分支, 标志着人工智能领域的一次飞跃。徐晓艺等 (2024) 指出它运用先进的机器学习模型自主创造内容, 如文本、图像、音乐等, 突破了传统内容创作的边界。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 其核心功能包括文本生成、语言纠错、素材推荐、结构优化、个性化反馈等, 典型代表有 ChatGPT、Kimi、Grammarly 等。与传统人工智能相比, 生成式人工智能具有更强的交互性、适应性与生成能力, 能够更好地满足个性化教学需求。

2.2 国内外研究现状

《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 年)》等政策文本明确了技术赋能教育质量提升的核心导向, 为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学科教学的融合提供了政策背景支撑。2025 年修订版《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则强调以核心素养为统领, 利用数字化工具优化写作教学, 界定了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目标与场景。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聚焦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二语习得理论, 其中 Hein (1991) 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学习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 核心在于学生主体地位与情境化互动, 为分析生成

式人工智能对学生写作主体性的影响提供了逻辑依据；二语习得理论中，Krashen (1992) 的输入假说与 Swain (2005) 的输出假说指出语言输出需依托充足的输入资源与有效的反馈互动，这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写作素材供给、反馈优化方面的价值分析提供了理论支撑，二者共同搭建了本研究的理论框架

国内外学界对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写作教学的相关研究已形成一定积累，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领域，研究证实 ChatGPT、Kimi 等工具具备文本生成、个性化反馈、素材供给等核心能力，其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可提升教学效率、丰富学习资源，部分实证研究还发现其能帮助学生拓宽表达思路，助力语言成绩提升（如托福写作分数提高案例），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领域，传统研究多聚焦反馈策略优化、素材资源开发等方向，普遍指出反馈滞后、素材单一，差异化不足是核心痛点，而数字化背景下的研究虽关注到在线平台、智能批改工具的应用，但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探讨相对有限，且现有实证研究多围绕 ESL 学习者展开，聚焦高中阶段特定写作场景的系统分析较为匮乏。现有研究存在明显的争议与局限，在价值判断上，支持方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可高效破解传统教学痛点，为写作教学提供自适应反馈与个性化支持。高意博等 (2025) 指出若应用得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是“阿拉丁神灯”，成为一种强大的教育工具，从而赋能新质人才的培养。反对方则担忧过度依赖会导致学生写作思维模板化、真实情感表达缺失，甚至引发学术诚信问题，国外已有学者开始关注人工智能写作的学术不端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引发的学术不端问题已经影响到期刊、编辑、审稿人和读者，Hosseini 等 (2025) 为期刊使用人工智能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制定指南，Chan (2023) 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调查他们对人工智能抄袭 (AI-giarism) 的看法。

现有研究未系统辩证二者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多数研究为单一案例或定性分析，偏好混合研究法与质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不足，且部分结论仅聚焦技术功能，未结合学科核心素养要求，对技术应用边界，教学本质适配性的深入探讨欠缺，同时对技术引发的教育资源鸿沟等衍生问题关注不足。由此可见，当前研究存在三方面关键空白，一是未构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系统分析框架，对技术的正向赋能与潜在冲击缺乏整体性研判，二是缺乏

适配高中英语作文的技术应用优化路径，现有策略多停留在泛化层，三是未充分结合建构主义与二语习得理论，明确技术与写作教学本质的协同逻辑，对如何平衡技术辅助与学生主体性缺乏深入思考。本研究理论上可回应教育数字化转型对技术合理应用的政策诉求，完善生成式人工智能与外语教学融合的理论体系，实践上能破解传统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痛点，为一线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指导策略，同时规避技术滥用风险，助力核心素养培育目标落地，推动英语写作教学向精准化、个性化转型

本研究正是基于现有文献的空白，通过逻辑分析与理论推演，构建优化框架，旨在实现技术赋能与教学本质的有机统一，这也与当前学界呼吁加强 GenAI 教学适配性研究。

3 理论基础与方法

本研究的理论基础涵盖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二语习得理论与核心素养理论。

Hein (1991) 的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知识的过程，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反馈、素材推荐与互动交流功能，能为学生的自主思考与意义建构提供支撑。

二语习得理论中 Swain (2005) 的“输出假设”与 Ellis (1991) 的“互动假设”指出，语言输出与互动能促进二语习得，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提供输出机会、即时反馈与模拟互动场景，助力学生优化语言表达。

核心素养理论以《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提出的语言能力、思维品质、文化意识与学习能力为核心，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语言纠错、思路启发、跨文化素材推荐及自主学习支持功能，与四大核心素养的培育要求高度契合。

3.1 研究方法

通过文献研究法梳理生成式人工智能教育应用、英语写作教学等相关成果，奠定理论基础，运用逻辑分析法厘清技术与教学的内在关联，分析价值、冲击并构建优化路径。结合高中英语写作典型场景设计应用案例，验证优化路径的可行性与实践指导性。

4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核心价值

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自然语言处理与文本生成的核心技术优势，从教学痛点破解与学生需求

满足出发,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提供了多维度的赋能支持。

4.1 精准化个性化反馈,提升教学针对性

传统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教师受时间精力限制,难以提供及时精准的个性化反馈,多关注语法错误等表面问题,缺乏对思维逻辑、素材选择等深层问题的针对性指导。生成式人工智能依托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可快速识别语法、拼写、用词等错误并提供修改建议与范例。同时能根据学生水平、风格与需求提供差异化反馈——为基础薄弱学生侧重语言基础巩固与句式参考,为优秀学生侧重思维拓展与表达创新引导。其即时反馈特性可帮助学生及时调整思路,避免错误固化,提升学习效率。

4.2 富化素材供给,拓宽写作视野

“缺乏素材”是高中生英语写作的主要困境,多数学生并非无生活体验,而是缺乏素材转化加工能力,且因知识面、跨文化储备不足,面对环保、文化交流等话题时思路狭隘、素材匮乏,作文内容空洞。徐晓艺等(2024)强调了高中生面临写作话题有限、素材缺乏创新及个性化反馈缺失等问题。生成式人工智能可解决这一问题,学生输入话题或关键词即可获取观点、案例、数据等素材参考,还能结合上下文,将贫瘠生硬的表达转化为地道生动的英语表达。

4.3 降低写作门槛,强化过程性支持

高中英语写作对语言基础、思维与表达能力要求较高,部分基础薄弱学生因词汇有限、语法不扎实,对写作产生畏惧心理,且难获充分个性化指导,陷入“畏惧写作-乏练习-能力薄弱”的恶性循环。生成式人工智能提供低门槛支持降低写作难度,Richard E.Mayer(2016)认为即时反馈原则是有效开展练习的实证原则之一。学生在存有疑惑或遭遇困境之时,生成式人工智能能够提供即时性、人性化的反馈与建议,并通过易于让学生接受的亲和性的方式呈现。一方面提供写作框架与提纲,助力理清思路,另一方面推荐词汇与句式,帮助突破语言障碍。此外,其反馈以鼓励为主,肯定进步并指明改进方向,可帮助学生树立信心、激发兴趣,逐步实现从不敢写、不会写向“愿意写,能写好转变”。

5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现实冲击

尽管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带

来了显著的正向价值,有效破解了传统教学的诸多痛点,但技术的过度使用或不当应用,引发了一系列与教学本质、学生发展相悖的潜在冲击。

5.1 固化写作模式,禁锢思维发展

写作是创造性思维活动,英语写作既要求学生掌握语言知识与技能,更强调思维的敏捷性、灵活性、深刻性与独创性。韦斯特(1984)指出写作过程意味着意义表达和思考的过程,它能帮助学生把凌乱的思想条理化,使学生的想法经过提炼而清晰起来,并且进一步发展学生的思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算法具有机械化、程序化特征,其生成的文章本质上是对现有语料的模仿、重组与变形,缺乏真实情感体验与创造性思维。学生过度依赖该技术,可能直接输入题目或关键词获取文章,跳过审题立意、思路构思等关键环节,或照搬技术提供的观点、表达与结构,忽视自身真实感受与独立思考,导致作文千篇一律、缺乏个性,长期来看会导致学生的思维能力退化,难以适应核心素养培育对思维品质的要求。

5.2 消解主体地位,引发主体移位

在传统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生是写作的主体,教师是引导者与促进者,写作过程是学生主动建构知识、表达思想、发展能力的过程。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出现打破了这一传统主客体关系,学生过度依赖技术时,易消解自身的主体地位。义务教育阶段与高中阶段的学生自控力相对较弱,当写作遇到瓶颈时,倾向于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完成写作,而非主动思考、自主探究。生成式人工智能通过机械化的算法和程序,直接将符合要求的语言和内容呈现在学生面前,在一定程度上代替了学生的写作思路与想法,略去了学生作为写作主体本应经历的审题、构思、表达、修改等过程,导致学生写作主体性的降低。

5.3 挑战学术诚信,引发诚信危机

英语写作讲求真实表达,需展现学生对自然、社会、人生的感受与思考,真实写作是呈现学生真实语言水平、思维能力及教学评价的重要依据。但生成式人工智能可快速生成高质量英语作文,为学生作弊提供便利,严重挑战学术诚信。ESMAEIL(2023)面向学生进行调查,发现学生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学术不端等行为的担忧主要包括内容的可信度和真实性、削弱人类自身批判性思维能力以及加剧剽窃和作弊等问题。部分学生可能直接使用AI生成完整作文冒充原创提交,

本质属抄袭剽窃。即便对 AI 生成内容修改,也可能因过度依赖丧失真实思考与表达,导致作文缺乏真情实感。此外, AI 生成作文文通字顺、逻辑清晰,传统人工评阅难以辨别真实性,既造成学生间不公平竞争,扭曲写作教学目标,长期还会弱化学生诚信意识,影响品德发展,引发教学诚信危机。

5.4 导致评价失真,增加教学负担

教学评价旨在全面了解学生写作水平与能力发展,为教学改进和学生发展提供依据。传统英语写作评价虽效率不高,但能一定程度反映学生真实水平。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应用使作文真实性难以辨别,导致评价失真,教师无法准确判断学生独立思考与表达的内容,难以评估其真实语言知识、思维及表达能力, Liu 等 (2024) 指出这不仅增加了教育评价的难度,不利于学生诚信意识的发展,而且会造成学术剽窃,背离学术规范和学术伦理,给教育领域和学术领域带来深重的灾难。同时,为辨别作文真实性,教师需耗费更多时间精力,甚至通过额外测试、口头表达等方式验证,进一步加重教学负担。

6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优化路径

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带来的价值与冲击,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不应简单地拥抱或禁止技术,而应坚持“以人为本、技术为辅”的原则,构建“主体性坚守-过程性评价-人机协同”三位一体的优化框架,实现技术赋能与教学本质的有机统一。

6.1 坚守学生主体地位,促进思维与能力发展

王道俊等 (1990) 指出主体教育论强调学生在教育过程中的主体性和主体地位,倡导学生应是学习的主体,而教师的作用主要是为激发学生主体性而服务。学生是写作的核心参与者,也是核心素养培育的关键对象,应对思维固化与主体消解冲击,首要任务是坚守学生主体地位,通过正确引导与科学训练,实现学生思维能力与自主写作能力的提升。

(1) 引导正确使用技术,明确技术辅助定位

教师应引导学生正确认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价值与局限,明确其辅助工具的定位。通过专题讲座、课堂讨论等方式,让学生了解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工作原理,认识到技术只能提供思路启发、素材参考、语言支持等辅助功能,不能替代独立思考与创造性表达。同时制定明确的技术使用规

范,如禁止直接使用技术生成完整作文、使用时需注明素材来源与修改过程、鼓励独立构思与初稿完成后再借助技术修改优化等,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技术使用观,避免过度依赖。

(2) 强化思维训练,培育创造性思维

写作能力的核心是思维能力,写作思维体现出一种更高层次的思维。马正平 (2003) 指出与阅读相比,写作水平较高的人的思维能力也较强,其阅读理解的能力也会比较强。由此可知,写作教学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技能,也有利于促进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教师应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辅助功能,强化学生思维训练。审题立意环节,引导学生先独立分析题目要求、确定主题与观点,再利用技术获取思路参考,对比分析不同观点优劣,培养批判性思维。素材选择环节,鼓励学生先挖掘自身生活体验与知识储备,再借助技术补充素材,学会筛选、整合与加工素材,培养逻辑思维。表达创新环节,引导学生模仿技术提供的地道表达,结合自身风格进行创新,培养创造性思维。例如,在议论文写作中,教师可让学生先独立列出论点与论据,再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获取更多论点与论据参考,然后让学生对不同论点进行论证与比较,深化思维深度。

(3) 鼓励个性化表达,呵护写作个性

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的作文往往真情实感,教师应引导学生在写作中坚持个性化表达,鼓励学生融入自身真实感受、独特经历与见解,避免照搬技术提供的表达。引导学生探索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鼓励尝试不同写作手法与表达技巧。评阅作文时,重点关注学生的个性化表达与创意,对具有独特见解、新颖表达的作文给予充分肯定与鼓励,激发学生写作热情。

6.2 构建过程性评价体系,防范学术诚信危机

学术诚信危机与评价失真的核心症结在于评价重结果轻过程,传统终结性评价难以适配生成式人工智能时代的写作教学需求。因此需重构以过程性评价为核心的体系,通过多元参与、方式创新保障评价的真实性与有效性。

借助数字化教学平台记录学生完整写作轨迹,包括提纲、初稿、修改稿及技术使用记录,全面反映其写作过程与努力程度。要求学生提交作文时同步提交提纲、初稿,并注明 AI 使用环节与修改说明。利用平台版本控制功能追踪修改过程,分析自主修改能力与技术辅助效果。通过过程性记录,教师可精准评估学生真实水平,辨别作文

真实性。构建多元评价主体,形成评价共同体构建“教师-学生-人工智能”三位一体的多元评价主体,提升评价科学性与全面性。教师负责综合评价写作过程、思维深度与个性化表达。学生通过自评与互评反思优劣,提升自主学习与反思能力。AI负责客观评价语言准确性、表达地道性与逻辑连贯性,并提供具体修改建议。

6.3 坚持人机协同并进,推动教学模式变革

生成式人工智能是教学辅助工具而非替代者,需秉持人机协同理念,融合技术与传统教学优势,推动英语写作教学模式革新。

(1) 明确教师主导作用,强化教学引导

人机协同模式中教师主导作用不可或缺。教师需结合教学目标与学情,设计合理写作教学活动,明确AI应用场景与边界。写作过程中密切关注学生技术使用与写作进展,及时提供针对性指导。评价反馈环节结合AI评价结果开展综合分析总结,引导学生明确改进方向。

(2) 优化教学流程,构建人机协同教学模式

依托AI技术优势优化教学流程。课前,教师利用AI设计个性化预习任务。课中,教师引导学生独立审题构思,再利用AI获取思路启发与素材补充,独立完成初稿,教师巡视指导。课后,学生通过AI优化语言,开展自主修改与同伴互评,教师借助技术批量批改,聚焦思维逻辑与个性化表达。评价反馈阶段,教师结合AI结果提供个性化建议。

(3) 开发优质教学资源,提升教学质量

借助AI开发优质写作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搭建不同话题、文体的素材库、范文库、句式库,提供多样化学习支持。结合学生学习数据与反馈,生成个性化资源包(如语法薄弱学生的纠错练习、思维僵化学生的思路启发任务)。

7 结语

本研究基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二语习得理论,系统探讨了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核心价值、现实冲击及优化路径。生成式人工智能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带来了显著价值。其通过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写作反馈,丰富多元的写作素材供给以及低门槛的写作支持,有效解决了传统写作教学中反馈滞后、素材匮乏与差异化指导不足的问题,为高中英语写作教学的精准化和个性化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亦带来一定的冲击。过度依赖技术可能导致写作模式固化、思维发展受

限,削弱学生的创造性表达。同时,技术介入可能消解学生主体性,引发学习主体移位,并对学术诚信提出挑战,还可能导致评价失真与教师教学负担加重。这些问题对写作教学的本质属性和学生发展提出了新的考验。

针对上述问题,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需要构建以“主体性坚守-过程性评价-人机协同”为核心的优化框架。通过引导学生科学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强化写作思维训练和个性表达,可以维护学生主体地位。通过聚焦写作过程、引入多元评价主体并创新评价方式,可构建科学合理的过程性评价体系。通过明确教师主导作用、优化教学流程和开发优质教学资源,推动人机协同共进,实现技术赋能与教学本质的有机统一。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局限。一是缺乏大规模实证研究验证优化路径的有效性,未来可通过准实验研究对比传统写作教学模式与人机协同模式的教学效果。二是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细节及其与写作教学深度融合机制的探讨不够充分,后续研究可加强与技术开发者的协同,开发更契合高中英语写作教学需求的智能工具与资源。三是未充分考虑不同地区、不同层次学校的差异,未来可提出更具针对性的应用策略。

展望未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其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应用将更加广泛和深入。教育工作者应以学生核心素养培育为目标,秉持理性、开放的态度,科学把握技术应用边界,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规避潜在风险,推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向更高质量、更具个性化和创新性的方向发展,为教育数字化转型提供有益实践与理论支持。

参考文献

- [1] 梁文花,康淑敏.“体裁教学法”在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实践研究[J].课程·教材·教法,2010,30(09):74-79.
- [2] 周玲,王烽.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教育启示:让每个人成为他自己[J].中国电化教育,2023,(5):9-14.
- [3] 徐晓艺,陆祎.生成式人工智能助力初中英语写作教学的实践探究[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24(4):49-53.
- [4] Hein G E. Constructivist learning theory[J]. Institute for Inquiry, 1991, 14.
- [5] Krashen S. The input hypothesis: An update[J].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pedagogy: Th

e state of the art, 1992, 12(3): 409-431.

[6] Swain M. The output hypothesis: Theory and research[M]//Handbook of research in second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Routledge, 2005: 471-483.

[7] 高意博, 王苗等. 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新质人才培养[J]. 中国电化教育, 2025, (7): 78-85.

[8] Hosseini M, Resnik D B. Guidance needed for us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screen journal submissions for misconduct[J]. Research ethics, 2025, 21(1): 1-8.

[9] Chan C K Y. Is AI changing the rules of academic misconduct? An in-depth look at students' perceptions of 'AI-giarism'[J]. arXiv preprint arXiv:2306.03358, 2023.

[10] Ellis R. The Interaction Hypothesis: A Critical Evaluation[J]. 1991.

[11][美]理查德 E.梅耶.盛群力等译. 应用学习科学——心理学大师给教师的建议[M]. 北

[17]

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6: 72.

[12] 韦斯特. 提高写作技能[M]. 章熊, 章学淳译.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1984: 2.

[13] Esmaeil A A A, Dzulkifli D, Maakip I, et al. Understanding student perception regarding the use of ChatGPT in their argumentative writing: A qualitative inquiry[J]. Jurnal Komunikasi: Malays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3, 39(4): 150-165.

[14] Liu M, Zhang L J, Biebricher C. Investigating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es in generative AI-assisted digital multimodal composing and traditional writing[J]. Computers & Education, 2024, 211: 104977.

[15] 王道俊, 郭文安. 试论教育的主体性——兼谈教育、社会与人[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1990, (04): 33-40.

[16] 马正平. 中学写作教学新思维[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3: 20.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课程思政的路径构建

徐婧英¹ 金岚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 在"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指引下, 将课程思政融入高中英语教学已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的必然要求。本文通过系统分析高中英语课程思政的内涵特征, 从价值引领、文化传承、素养培育三个维度探讨其重要意义。研究发现, 当前教学中存在教师认识不足、教学方法单一、内容融合生硬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 本文提出从教师素养提升、教材深度解读、教学活动创新、评价体系完善、教学资源拓展五个方面构建完整的课程思政实施路径。研究表明, 通过构建全方位的课程思政实施体系, 能够有效促进英语教学与思政教育的有机融合。

关键词: 课程思政; 高中英语; 阅读教学; 教学策略; 立德树人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86

Path Construction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Instruc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Xu Jingying, Jin La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integrating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to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educational reform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ith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exploring its significant importance from three dimensions: value guidance,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literacy cultivation.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current teaching practices suffer from issues, such as insufficient teacher understanding, monotonous teaching methods and forced integration of content. To address these problems, this paper proposes constructing a comprehensive implementation pathway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from five aspects: enhancing teachers' professionalism, conducting in-depth interpretation of teaching materials, innovating teaching activities, improving the evaluation system and expanding teaching resource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by building an all-encompassing implementation system for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English teaching and ideological-political education can be effectively promoted.

Keywords: Curriculum-bas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Instruction; Instructional Strategies; Fostering Virtue and Cultivating Talents

作者简介: 徐婧英(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金 岚(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通讯作者: 徐婧英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教育事业进入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2016)与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2019)上多次强调,要坚持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统一,挖掘其他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这标志着“课程思政”从高等教育的先行探索,正式成为涵盖大中小学全学段的教育改革核心议题。

作为一门语言类学科,英语课程标准(2020)提出英语课程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与文化特质,肩负着知识传递、能力培养与价值塑造的重要使命。语篇承载着高中英语课程的核心内容,阅读教学则是开展课程思政、落实立德树人目标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当前英语阅读教学过分注重语言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致使学科育人功能弱化。高中生正处于思想发展的黄金期,教师应在阅读教学中实现语言知识传递和价值观引领的有机结合,促进学生学科核心素养发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实现全面发展。因此,本文尝试探索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开展课程思政的内涵、意义及实施路径,提升英语课堂的思政育人实效。

一、高中英语课程思政的内涵与定位

(一)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巩茹敏,林铁松(2019)认为课程思政主要指深挖思政课程之外的各级各类课程和教学活动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通过课程承载思政、思政寓于课程的知识传授与价值引领的良性互动,发挥课堂主渠道承载的立德树人的功能与职责,促使学生在教学过程与活动中潜移默化地接受思想政治教育,达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说,课程思政是一种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有机融入各类课程教学的新型教育理念。这一理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教育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全面育人的深刻转变。要深入理解课程思政,需要把握其三个理论基础:

首先,隐性教育理论强调通过间接、内隐的方式实现教育目标。在英语教学中,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进行政治说教,而是将价值观教育融入语言学习的各个环节。比如在讲解课文时,通过分析人物的行为动机、故事的发展脉络,让学生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其中蕴含的价值取向。

其次,全课程育人理念认为所有课程都承载着立德树人的功能。具体到英语学科,就是要充分发挥其人文性特点,在培养学生语言能力的同

时,注重思想品德的塑造。这就要求英语教师转变观念,从单纯的语言教师转变为学生成长的引路人。

最后,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指出学习是学习者主动建构意义的过程。在课程思政实施中,教师需要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引导学生在语言学习过程中自主建构正确的价值观念。例如,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和感悟。

(二) 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辩证关系

正确把握课程思政与思政课程的关系,是有效实施课程思政的前提。二者既有本质区别,又存在内在联系。

从本质上看,思政课程具有明确的思想政治教育属性,汪瑞林(2020)提到思政课程主要指学校课程体系中专门设立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总称,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思想道德修养及形势与政策等课程。而课程思政则是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专业教育的隐性教育方式。以高中英语为例,思政课程会直接讲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而英语课程思政则可能通过一篇描写志愿者服务的课文,让学生在理解内容的同时,潜移默化地感受到奉献精神的价值。

从内在联系看,二者在育人目标上具有一致性,都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功能上又具有互补性:思政课程为学生提供系统的理论指导,课程思政则在专业学习过程中强化价值引领。这种显隐结合、相互促进的关系,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

(三) 高中英语学科实施课程思政的独特优势

岳美娟(2025)认为高中英语课程思政应以《新课标》为依据,以学科核心素养为导向,立足高中生认知发展特点,将课程中蕴含的理想信念、家国情怀、文化自信等思政育人资源,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融入英语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在传授专业知识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对学生进行价值引导、道德浸润和思想启迪,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

高中英语学科在实施课程思政方面具有天然优势。其语言载体特性使其成为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培养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良好平台。例如,在学习全球化主题时,可以引导学生思考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角色与担当。

英语教材内容的多元文化特性为开展文化比较提供了丰富素材。通过对比中西方价值观差异,帮助学生建立文化自觉与自信。比如在学习西方

节日文化时,可以同步介绍中国传统节日的内涵,在比较中增强文化认同感。

此外,英语课文题材广泛,涉及人生哲理、社会问题等多个层面,易于引发学生的情感共鸣和价值思考。一篇描写科学家奋斗历程的文章,既可以训练阅读技能,又能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和创新意识。

二、课程思政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重要意义

(一)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

将课程思政融入英语阅读教学,首先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选择。高中英语教学不仅要传授语言知识技能,还要注重学生的品德培养。田安年(2025)认为英语阅读文本多取材于世界名著或英语国家的报刊,涉及个人修养、人际关系、社会热点、全球议题等多个领域,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是开展思政教育的有效素材。阅读教学作为英语教学的重要环节,其丰富的文本材料为价值引导提供了天然载体。

通过精选的阅读材料,教师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的价值判断能力。例如,在学习人物传记类课文时,可以引导学生讨论主人公的成功因素,从中感悟坚持不懈、勇于创新等可贵品质。这类课文往往蕴含着深刻的人生哲理,是进行价值观教育的优质素材。

社会热点类阅读材料则能帮助学生建立社会责任感。如环境类文章可以引发学生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思考,科技类文章可以探讨创新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通过这些真实情境的讨论,学生不仅能提高语言能力,还能增强社会参与意识。

更重要的是,文学作品的赏析过程本身就是一种价值引领。学生在品味语言之美、感受情节之妙的同时,其审美情趣和人文素养也在悄然提升。

(二) 增强文化自信与民族认同的重要途径

在全球化背景下,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比较具有特殊价值。通过中外文化对比,可以帮助学生理解文化差异,在比较中认识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

具体而言,教师可以引导学生对比中西方在家庭观念、社会交往、价值取向等方面的差异。例如,在学习西方个人主义文化时,可以同步探讨中国集体主义价值观的优越性。这种对比不是简单地评判优劣,而是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产生的背景和适用的情境。

在展示中华文化方面,教材中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是重要资源。教师不仅要讲解语言点,更要深入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例如,在学习中国传统节日主题时,可以拓展讲解节日背后的文化意义和精神价值。

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也是重要目标。教师引导学生在保持文化自信的同时,也要引导学生尊重文化多样性。这需要教师在教学中有意识地设计跨文化交际情境,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得体的交际策略。

(三) 促进学生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全面发展

课程思政与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具有内在一致性。将二者有机结合,能有效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在语言能力方面,真实的价值观讨论为语言运用提供了有意义的语境。例如,在讨论环保话题时,学生需要运用相关词汇表达观点,这个过程既能提升语言能力,又能强化环保意识。这种基于真实情境的语言训练,往往比机械的句型操练更有效果。

在文化意识方面,课程思政的融入为其注入了灵魂与深度,使得跨文化理解超越了浅层认知,升华为文化认同与自觉。价值引领为文化比较提供了明确的坐标,引导学生在理解差异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性反思与身份建构。例如,在对比中西节日文化时,教师不仅引导学生了解节日习俗,更可深入探讨节日背后的精神内涵,并联系当代中国家庭与社会的价值观,从而在比较中深化对中华文化独特价值与当代意义的理解,坚定文化自信。

思维品质的培养同样受益于课程思政的融入。价值判断的过程本身就是批判性思维的训练。教师可以设计开放性问题的,引导学生多角度思考。比如在讨论科技发展话题时,可以让学生分析科技进步的双重影响,培养辩证思维能力。

学习能力的提升则需要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来实现。项目式学习、合作探究等活动形式,既能锻炼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又能培养团队协作精神。例如,组织学生开展“用英语讲中国故事”项目,在整个过程中,学生的信息搜集、整理、表达等综合能力都能得到提升。

三、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融入课程思政的现状分析

(一) 教师层面的挑战

教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但目前教师队

伍在认识和能力方面都存在明显不足。部分教师将思政教育简单等同于政治说教,认为与英语教学关系不大。这种认识导致他们在教学中刻意回避价值观引导,错失了育人契机。

更深层次的问题在于教师专业能力的欠缺。许多教师缺乏从语篇中挖掘思政元素的敏感性,也欠缺将思政元素自然融入教学活动的设计能力。比如在处理一篇包含多元文化内容的课文时,教师可能只注重语言点的讲解,而忽视了其中的文化比较价值。张俏(2024)提出,尽管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广泛应用,但一些高中英语课堂对数字资源、智能平台等的使用仍停留在辅助层面,未能有效构建融合多模态阅读、项目化探究与任务驱动的综合性阅读教学体系。这不仅削弱了英语教学的育人功能,也无法满足学生在新时代背景下对语言能力、文化素养与价值判断的多重成长需求。

教师培训体系的不完善也加剧了这些问题。现有的培训往往偏重理论传授,缺乏实操性指导。教师即使有意识实施课程思政,也常感无从下手。这种情况在基层学校尤为明显,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师资水平差距较大。

(二) 教学实践中的问题

在教学实施层面,问题同样突出。教学方法的单一化是普遍现象。许多课堂仍以教师讲授为主,缺乏师生互动和学生探究。这种“满堂灌”的教学方式难以引发学生的深度思考,使得课程思政的效果大打折扣。

内容融合不自然更是常见问题。一些教师为了体现思政,生硬地在课文讲解后附加道德说教,造成思政内容与语言学习内容融合不自然。比如在讲解完科技类课文后,简单加上“我们要热爱科学”的结论,缺乏深入的引导和讨论。

更值得关注的是,部分教师对文本的复杂性处理不当。有的教师回避课文中存在的价值冲突,有的教师则进行简单化的价值判断。这种处理方式不仅达不到育人效果,还可能抑制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发展。

(三) 支持体系不完善

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需要系统的支持体系,但目前这方面的建设明显滞后。教学资源匮乏是首要难题。教师缺乏可参考的典型案例和实用的教学资源库,往往需要自己从头开发,增加了工作负担。

评价机制的不健全也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

现行的评价体系仍偏重语言知识的考查,对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缺乏有效的评估标准。这导致教师在实践中缺乏明确的方向感和成就感。

学校层面的支持力度也参差不齐。一些学校对课程思政重视不够,缺乏系统的规划和组织。教研活动的开展流于形式,难以形成持续改进的机制。这种状况使得课程思政的实施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教师的个人自觉。

四、课程思政视角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优化策略

(一) 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教师是课程思政实施的关键力量,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是首要任务。要构建系统化的培训体系,针对不同发展阶段教师的需求开展差异化培训。

对于新入职教师,培训重点应放在理念认同和基本操作上。通过案例分析、示范课观摩等方式,帮助他们理解课程思政的内涵,掌握基础的实施方法。可以组织他们观摩优秀教师的课堂,重点学习如何自然地将价值引导融入语言教学。

骨干教师的培训则应侧重课程开发和教学设计能力的提升。通过工作坊、课题研究等形式,培养他们深度挖掘教材、创新教学活动的的能力。例如,可以组织跨学科教研活动,让英语教师与思政教师共同备课,相互启发。

培训方式的创新同样重要。除了传统的讲座式培训,更应推广参与式、体验式的培训形式。微格教学、案例研讨等方式能让教师在实践中提升能力。可以建立区域性的教师学习共同体,促进经验分享和协同发展。

(二) 深化教材解读与资源建设

教材是课程思政实施的主要载体,深化教材解读是重要基础。卢霞(2024)提到英语教材中的阅读语篇往往涵盖丰富的文化、社会与情感内容,教师应具备敏锐的教育洞察力,将这些“潜在”的思政资源转化为“显性”的育人内容,使学生在语言学习的过程中构建正确的价值判断与道德认同。教师需要具备批判性解读教材的能力,从不同维度挖掘思政元素。

从主题内容维度,可以系统分析教材中各单元蕴含的思政教育点。以人与自然主题为例,不仅要讲解环保知识,更要引导学生思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可以设计层次化的问题链,从认知到认同逐步深入。在文化比较方面,要避免简单的二元对立。教师应引导学生理解不同文化的

内在逻辑,在比较中建立文化自信。例如,在学习西方现代文明的同时,也要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资源建设是教材解读的延伸。要建立系统的思政素材库,收集与教材内容相匹配的教学资源。这些资源应该具有时代性和针对性,能够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价值观念。比如在讲授创新主题时,可以补充中国科技创新的最新案例。

(三) 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的创新是课程思政有效落地的关键。黄薇(2025)认为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和思政元素,灵活选择教学方法。

问题导向式教学能够引发学生深度思考。以“科技发展”主题为例,可以设计层层递进的问题链:基础层面关注科技发展的表现和影响,引导学生搜集资料、分析数据。深入层面探讨科技伦理问题,如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道德困境。价值层面则引导学生思考如何在科技发展中保持人文关怀。

项目式学习是另一个有效途径。以“传统文化传承”为主题的项目可以这样设计:准备阶段指导学生选择具体的研究方向,如传统节日的现代意义。实施阶段组织学生开展调查研究,用英语整理成果。展示阶段则鼓励学生创新表现形式,如制作双语宣传片。

情境化教学能增强学生的情感体验。通过角色扮演、情景模拟等方式,创设真实的教学情境。比如模拟国际会议讨论环境问题,让学生在扮演不同国家代表的过程中,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重要性。

(四) 完善教学评价体系

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是课程思政持续改进的保障。评价内容应该多元化,涵盖知识掌握、能力发展和价值认同等多个维度。除了传统的纸笔测试,更要注重过程性评价。

在评价方式上,要突破单一的考试模式。学习档案袋可以记录学生的成长轨迹,表现性评价能够考察学生的实际能力。例如,通过小组项目展示,既可以评估学生的语言运用能力,也能观察其合作精神和创新意识。

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也很重要。除了教师评价,还要引入学生自评和同伴互评。这不仅能全面反映学习效果,还能培养学生的元认知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要建立具体的评价标准,使评价更加客观、公正。

(五) 拓展课外实践空间

课外实践是课堂教学的重要补充。校园文化建设要突出英语学科特色,可以定期举办英语文化节、主题演讲比赛等活动。这些活动要注重内涵建设,避免流于形式。比如英语戏剧表演可以选取具有教育意义的题材,在提升语言能力的同时实现价值引导。

社会实践要注重与课程内容的结合。组织学生参与社区英语志愿服务,在国际交往中展示中国文化。这类活动要提前规划、精心组织,确保教育效果。可以建立稳定的实践基地,形成长效机制。

数字资源平台建设是新时代的重要课题。要开发集资源库、交流平台、评价系统于一体的在线支持系统。这个平台应该便于师生使用,能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支持。同时要加强内容审核,确保资源的正确导向。

五、总结与展望

(一) 研究总结

本研究系统探讨了课程思政视角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优化路径。主要结论包括,课程思政的有效实施需要建立在正确的理念认识和扎实的实践基础上;教师专业发展是推动课程思政的关键因素;教学模式的创新是课程思政落地的重要保障。研究还发现,课程思政的实施必须遵循教育规律,要注重显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的结合,知识传授与价值引导的统一。特别是在英语学科中,要充分发挥其人文性特点,在语言学习中实现育人目标。

(二) 未来展望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高中英语课程思政将呈现新的发展趋势。在实施方式上,将更加注重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创设更真实的教学情境,通过大数据分析实现个性化教学。在内容建设方面,将更强调中国特色,在教材编写和资源开发中更多融入中国元素,用英语讲述中国故事。同时,评价体系也将更加完善,形成可操作、可评估的质量标准。

最重要的是,课程思政将更加注重实效性。未来的研究应该更多关注课程思政对学生发展的实际影响,通过科学的评估方法检验实施效果。这需要教师、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等多方共同努力,持续推动课程思政的创新发展。

总之,将课程思政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长期坚持和不断探索。只有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的良性互动中,才能不断

提升育人水平,为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作出应有贡献。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J].青海教育,2025,(06):13-14.

[2] 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9-03-19(01).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0.

[4] 田安年.课程思政视角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探微[J].成才之路,2025,(32):133-136.

[5] 巩茹敏,林铁松.课程思政:隐性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形态[J].教学与研究,2019(6):45-51.

[6] 汪瑞林.中小学“课程思政”的功能及其实现方式[J].课程·教材·教法,2020(11):77-83.

[7] 岳美娟.课程思政视域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施路径探究[J].品位·经典,2025,(19):160-163.

[8] 张俏.课程思政与高中英语教学的融合状况探析[J].牡丹江教育学院学报,2024(07):110-112+125.

[9] 卢霞.逆向设计:课程思政融入 Extended reading 板块教学的实践路径[J].江苏教育,2024(47):18-21.

[10] 黄薇.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课程思政融入现状的研究——以南宁市Y中学为例[D].广西民族大学,2025.

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建设研究

张一平¹ 王凡^{2*} 宋林¹ 周军¹ 郭晓琳¹

(1.昆明科技职业大学, 云南 昆明 651701; 2.滇池学院, 云南 昆明 651701)

摘要: 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与职业教育提质培优的双重背景下, 高等职业院校作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载体, 其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直接关系到产业升级、校企协同育人成效及学生个人职业发展。当前, 我国高职院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存在主体单一、标准脱节、方法固化、功能弱化等突出问题, 难以适配企业岗位需求与高职教育类型定位。本文基于 OBE 教育理念、冰山模型等理论, 结合文献研究、专家访谈等方法, 明确高职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核心维度与评价指标, 构建科学、可操作、重实践的職業胜任力评价体系, 并提出针对性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 为高职院校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助力实现“入学即入职、培养即就业”的育人目标。

关键词: 高等职业院校; 职业胜任力; 评价体系

基金项目: 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创新课题(CSDP25LF8B417)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87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a Competency Assessment Framework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Zhang Yiping¹, Wang Fan², Song Lin¹, Zhou Jun¹, Guo Xiaolin¹

¹ AI school, Kunming Vocational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unming, Yunnan, China

² Affiliation, Dianchi College, Kunming, Yunnan, China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core carriers for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have their students' vocational competency directly related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students' personal career development. Currently, there are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vocational competency assess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in China, including unitary assessment subjects, disconnected standards, rigid methods, and weakened functions, making it difficult to adapt to enterprise job requirements and the type orienta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Outcome-Based Education (OBE) concept, the Iceberg Model, and other theories, combined with literature research, expert interviews, and other methods, this study clarifies the core dimensions and evaluation indicators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 students' vocational competency, constructs a scientific, operable, and practice-oriented vocational competency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proposes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paths and safeguard measures. This research aims to

作者简介: 张一平(1984—), 女, 硕士, 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职业教育、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创新创业;

王 凡(1988—), 女, 硕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就业指导、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

宋 林(1986—), 男, 博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创新创业教育、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周 军(1980—), 男, 硕士, 高级工程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郭晓琳(1978—), 女, 硕士, 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工智能、软件工程、职业教育。

通讯作者: 王凡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optimize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deepe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ereby helping to achieve the educational goal of "enrollment equals employment, cultivation equals employability."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Vocational Competency" Evaluation System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

1. 政策背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深化，《职业教育法》修订、《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 - 2035 年）》等政策明确要求强化职业教育质量评价，建立以学习者职业伦理和技术技能为核心的评价体系，推动高职教育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

2. 产业背景：新质生产力培育推动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从“技能型”向“综合胜任型”转变，对高职学生的数字素养、创新能力、职业素养等提出更高要求。

3. 教育背景：当前高职院校人才评价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的倾向，校企协同评价机制不健全，评价体系与企业岗位需求脱节，导致育人与用人存在差距，亟需构建适配产业需求与高职特色的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

(二)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丰富高职教育人才评价理论，完善职业胜任力评价的研究维度，探索 OBE 理念、冰山模型与高职教育的深度融合路径，填补当前高职学生职业胜任力动态评价、校企协同评价的研究空白，为同类研究提供理论框架。

2. 实践意义：为高职院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调整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模式提供实践指引；帮助企业精准选拔适配岗位的人才，降低培训成本；引导高职学生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有针对性地提升自身职业胜任力，实现人职精准匹配。

(三) 国内外研究现状

1. 国外研究现状：梳理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的研究成果，重点分析德国二元制教育中的岗位胜任力评价模式、美国 OBE 理念下的能力评价体系、澳大利亚 TAFE 体系的职业能力标准，总结其“校企协同、标准导向、过程导向”的核心经验及对我国的借鉴价值。

2. 国内研究现状：基于国内相关文献，从职业胜任力维度划分、评价指标设计、评价方法应用三个方面梳理研究成果，分析当前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如评价指标同质化严重、缺乏行业针对性、校企协同评价机制不完善、忽视增值性评价与数字化评价工具应用等。

(四) 研究内容与方法

1. 研究内容：明确高职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核心内涵与构成维度；剖析当前高职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的现状与存在问题；构建科学合理的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含指标、权重、标准）；提出评价体系的实施路径与保障措施。

2. 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系统梳理职业胜任力、高职教育评价相关理论与文献；采用专家访谈法，邀请高职教育专家、企业管理专家、行业技术专家，确定评价指标与权重，梳理当前评价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及优化方向。

(五) 研究创新点与不足

1. 创新点：构建“知识-技能-素养”三维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突出高职“实践导向”特色；引入数字化评价工具与增值性评价理念，实现评价过程动态化、智能化；建立“校-企-生-行”四方协同评价机制，破解校企评价脱节难题；结合不同专业岗位特点，设计差异化评价标准，提升体系的针对性与可操作性。

2. 研究不足：未开展大规模调研与实证测试，评价体系的普适性仍需进一步验证；数字化评价平台的搭建与应用需长期实践完善；评价体系的动态调整机制仍需结合产业发展持续优化。

二、相关概念与理论基础

(一) 核心概念界定

1. 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明确本文研究对象为全日制高职专科院校在读学生，聚焦其面向一线岗位的技术技能与职业素养培养，区别于普通本科院校学生的培养定位。

2. 职业胜任力：结合高职教育特色与企业岗

位需求,定义为高职学生在职业活动中,能够顺利完成岗位任务、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所具备的知识、技能、素养的综合能力,涵盖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三个核心层面,突出实践性、综合性与发展性。

3. 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指为全面、客观、科学地评价高职大学生职业胜任力水平,所构建的包含评价主体、评价指标、评价权重、评价标准、评价方法、评价流程及结果应用的有机整体,核心是实现“评价导向育人、评价衔接岗位”。

(二) 理论基础

1. 冰山模型:以冰山模型为核心理论支撑,将职业胜任力划分为“显性胜任力”(知识、技能)与“隐性胜任力”(职业素养、个人特质、职业价值观),明确隐性胜任力在岗位适配与长期职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为评价指标的构建提供维度支撑。

2. OBE 教育理念:以“成果导向”为核心,强调评价体系应围绕学生的学习成果(职业胜任力)构建,反向推动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优化,确保评价与育人目标、岗位需求精准对接。

3. 协同治理理论:为校企协同评价机制的构建提供理论支撑,强调政府、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学生等多方主体协同参与评价过程,明确各方权责,形成育人合力。

4. 增值性评价理论:借鉴增值性评价思路,关注高职学生在入学至毕业期间职业胜任力的提升幅度,而非仅评价最终结果,更全面、客观地体现高职院校的育人效能。

三、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 评价体系建设现状

当前我国高职院校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建设已初步起步,部分院校结合自身专业特色,尝试引入企业评价参与,优化评价指标与方法,但整体仍处于不完善阶段。从评价实践来看,多数院校仍沿用传统人才评价模式,呈现出“单一化、固化化、脱节化”的特点:评价主体以院校为主,企业、行业协会参与度较低;评价内容侧重理论知识与基础技能,忽视职业素养等隐性能力;评价方法以终结性评价为主,过程性评价缺失;评价结果应用局限于学生毕业与评优,未能充分发挥导向与改进作用。

(二) 评价体系存在的核心问题

1. 评价导向偏差:重理论、轻实践,重结果、轻过程,与高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定位不符,难以引导学生注重实践能力与职业素养的提升,导致培养出的学生难以快速适配企业岗位需求。

2. 评价指标不合理:指标设计同质化严重,缺乏行业与专业针对性,未能结合不同专业岗位特点设计差异化指标;隐性胜任力指标难以量化,评价标准模糊,导致评价过程主观性较强;未充分融入数字素养、创新思维等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岗位需求,评价指标的时代性不足。

3. 评价主体协同不足:校企协同评价机制不健全,企业在评价指标制定、评价流程执行、结果运用中的话语权不足,参与评价多流于形式;行业协会、学生的评价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未形成“校-企-生-行”协同育人的评价格局,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全面性难以保障。

4. 评价方法固化滞后:传统评价方法以考试、考核为主,难以适应职业胜任力的综合性、动态性特点,无法全面反映学生职业胜任力的动态提升过程;数字化评价工具应用较少,评价效率与精准度不高,难以满足大规模、常态化评价需求。

5. 结果应用机制不完善:评价结果与人才培养、教学改革、学生发展脱节,未能将评价结果有效应用于人才培养方案优化、教学内容调整、学生个性化培养等方面,评价的反馈、激励与改进功能弱化,难以实现“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改”的核心目标。

(三) 问题产生的原因分析

1. 理念层面:部分高职院校仍沿用传统教育评价理念,对职业胜任力评价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树立“岗位导向、协同评价、动态评价”的理念,将评价等同于“考核”,忽视了评价的育人功能与导向作用。

2. 机制层面:校企合作深度不足,缺乏有效的利益联结机制,企业参与评价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常态化协同评价机制;院校内部评价机制僵化,缺乏动态调整与优化机制,难以适应产业升级与岗位需求的变化。

3. 实践层面: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滞后,部分教师缺乏企业一线岗位经验,难以设计贴合岗位需求的评价指标与标准;评价资源投入不足,数字化评价工具与平台建设不完善,制约了评价方法的创新与优化。

4. 政策层面：缺乏明确的政策引导与保障，对校企协同评价的激励机制、评价标准规范等支持不足，导致评价体系建设缺乏系统性与持续性，不同院校的评价实践呈现碎片化特点。

四、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

（一）构建原则

1. 岗位导向原则：紧密结合企业一线岗位需求，以岗位胜任标准为核心设计评价指标与标准，确保评价体系与岗位需求精准对接，实现“评价即岗位适配检验”。

2. 全面系统原则：涵盖职业胜任力的显性与隐性维度，兼顾知识、技能、素养的综合评价，既关注专业能力的提升，也重视方法能力与社会能力的培养，实现评价内容的全面性与系统性。

3. 科学可操作原则：评价指标清晰明确、可量化，评价方法科学合理、简便易行，兼顾评价的科学性与实践可操作性，适合高职院校大规模应用，避免过于复杂的评价流程增加实施成本。

4. 协同参与原则：明确院校、企业、行业协会、学生等多方主体的权责，构建协同评价机制，充分发挥各方优势，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全面性。

5. 动态发展原则：结合产业升级与岗位需求变化，建立评价体系动态调整机制，及时更新评价指标与标准，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6. 增值导向原则：关注学生职业胜任力的提升幅度，将增值性评价融入评价过程，全面反映高职院校的育人效能，避免仅以最终结果评判学生与院校的培养质量。

（二）评价主体构建

构建“校-企-生-行”四方协同评价主体体系，明确各方权责，形成协同育人与评价的合力，破解单一主体评价的局限性：

1. 院校主体：由高职院校的教师、教学管理者组成，负责评价体系的搭建、过程性评价的实施、学生理论知识与校内实践能力的评价，以及评价结果的分析与应用，是评价体系实施的核心主体。

2. 企业主体：由企业 HR、一线岗位负责人、企业导师组成，负责学生岗位实习表现、实践技能、职业素养的评价，参与评价指标与标准的制定，提供岗位需求信息，确保评价内容贴合企业

实际。

3. 行业主体：由行业协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组成，负责制定行业通用的职业胜任力评价标准，参与评价过程的监督与指导，确保评价体系的行业适配性与规范性。

4. 学生主体：学生作为评价对象，同时参与自评与互评，反思自身职业胜任力的优势与不足，明确提升方向，增强自我发展的主动性，实现“评价促提升”的目标。

（三）评价指标体系设计

基于冰山模型与 OBE 理念，结合专家访谈意见与高职教育特色，构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三级指标”的三级评价指标体系，涵盖 3 个一级指标、9 个二级指标、30 个三级指标，兼顾显性与隐性胜任力，突出高职实践特色，具体如下：

1. 一级指标 1：专业能力（权重 40%）——显性胜任力核心，反映学生完成岗位任务所需的专业知识与技能，对应冰山模型的“水面以上部分”，是学生立足岗位的基础。

（1）二级指标 1.1：专业知识，三级指标包括：核心课程掌握程度、岗位相关理论知识储备、数字知识（大数据、人工智能等）、行业标准与规范掌握程度。

（2）二级指标 1.2：专业技能，三级指标包括：岗位核心技能操作熟练度、实践项目完成质量、职业技能证书获取情况、故障排查与解决能力。

（3）二级指标 1.3：实践应用能力，三级指标包括：工学交替表现、顶岗实习业绩、实践成果转化能力、岗位适配度。

2. 一级指标 2：方法能力（权重 25%）——连接显性与隐性胜任力的桥梁，反映学生适应职业发展的学习与创新能力，是学生终身发展的关键。

（1）二级指标 2.1：学习能力，三级指标包括：自主学习能力、新知识与新技术学习速度、问题分析与总结能力、终身学习意识。

（2）二级指标 2.2：创新能力，三级指标包括：创新思维、技术改良与优化能力、创新创业实践成果、问题解决的创新性。

（3）二级指标 2.3：数字化应用能力，三级指标包括：数字化工具操作能力、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数字化岗位适应能力。

3. 一级指标 3：社会能力（权重 35%）——隐性胜任力核心，反映学生适应职场环境、实现

职业发展的综合素养,对应冰山模型的“水面以下部分”,是学生长期职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

(1) 二级指标 3.1: 职业素养,三级指标包括:职业道德、工匠精神、责任意识、敬业精神、企业文化认同度。

(2) 二级指标 3.2: 沟通协作能力,三级指标包括: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协作能力、客户服务意识、跨岗位协作能力。

(3) 二级指标 3.3: 职业发展能力,三级指标包括:职业规划能力、岗位适应与调整能力、市场眼光、绿色意识、国际视野。

(四) 评价权重确定

采用德尔菲法,邀请 20 位高职教育专家、企业管理专家、行业技术专家,对各指标的重要性进行打分,经过多轮反馈与修正,形成指标重要性共识,最终确定各层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其中,专业能力权重 40%,重点突出高职“实践导向”的培养定位;社会能力权重 35%,强调隐性素养对学生职业发展的核心作用;方法能力权重 25%,兼顾学生的学习与创新能力培养。同时,结合不同专业岗位特点,对权重进行差异化调整,如电子信息类专业可适当提高专业技能权重,旅游管理类专业可适当提高沟通协作能力权重,提升体系的针对性。

(五) 评价标准制定

针对每个三级指标,制定明确、可量化、可操作的评价标准,采用“优秀、良好、合格、不合格”四级评价等级,明确各等级的具体要求,避免评价的主观性,确保评价过程规范、结果客观:

1. 量化指标:对于可直接量化的指标(如核心课程成绩、技能证书数量、实习业绩等),明确具体的量化标准(如核心课程平均分 ≥ 85 分为优秀,获取 1 项以上高级职业技能证书为优秀)。

2. 质性指标:对于难以量化的隐性指标(如职业道德、团队协作、创新思维等),采用“行为描述法”制定评价标准,结合学生的日常表现、企业评价、师生评价等进行综合判断(如“严格遵守职业道德,无违规违纪行为,得到企业导师高度认可”为优秀)。

3. 行业差异化标准:联合行业协会与企业,针对不同专业的岗位特点,制定差异化的评价标准,确保评价体系与行业需求精准对接,避免“一刀切”的评价模式。

(六) 评价方法选择

构建“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数字化评价与传统评价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方法体系,打破传统评价方法的局限性,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职业胜任力:

1. 过程性评价:贯穿学生整个学习过程,包括课堂表现、实践项目、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环节的评价,采用课堂观察、实践记录、企业反馈等方式,实时追踪学生职业胜任力的提升过程,避免“一考定终身”。

2. 终结性评价:在学期末、毕业前进行,采用考试、技能考核、综合答辩、实习鉴定等方式,对学生职业胜任力的最终水平进行评价,全面检验学生的学习成果。

3. 定量评价:采用数据统计、技能测试等方式,对可量化指标进行评价,确保评价结果的客观性与准确性。

4. 定性评价:采用专家评审、企业评价、师生互评、学生自评等方式,对质性指标进行评价,通过访谈、案例分析等方式,全面反映学生的职业素养与综合能力。

5. 数字化评价:搭建校企协同数字化评价平台,整合相关技术,实时采集学生课堂表现、实践数据、企业评价等信息,自动生成学生“岗位胜任力画像”,提升评价效率与精准度,实现评价过程的智能化、便捷化。

(七) 评价流程设计

设计“前期准备-过程实施-结果分析-反馈应用”的闭环评价流程,确保评价体系的有序运行,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与改进作用:

1. 前期准备:明确评价目标与范围,组建四方协同评价小组,制定评价实施方案,开展评价人员培训,确保评价过程的规范性与一致性。

2. 过程实施:各评价主体按照评价标准与方法,开展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采集评价数据,记录评价结果,确保评价数据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3. 结果分析:对评价数据进行综合分析,计算学生职业胜任力综合得分,划分评价等级,分析学生胜任力的优势与不足,形成评价报告。

4. 反馈应用:将评价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教师与企业,引导学生制定个性化提升计划,指导教师优化教学内容与方法,帮助企业调整人才选拔标准,形成“评价-反馈-改进-提升”的闭环机制。

五、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实

施路径与保障措施

(一) 实施路径

1. 理念先行：强化高职院校师生与企业的评价理念，树立“岗位导向、协同评价、动态评价、增值导向”的理念，明确职业胜任力评价在人才培养中的核心作用，转变“重考核、轻评价”的传统认知。

2. 分步推进：采用“试点先行、逐步推广”的方式，先在部分特色专业开展评价体系试点，总结实践经验，优化完善后，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应用；结合不同专业特点，制定差异化的实施细则，确保评价体系的适配性。

3. 校企协同：深化校企合作，建立校企协同评价长效机制，明确企业在评价中的权责，鼓励企业深度参与评价指标制定、评价过程实施与结果应用，共建评价标准、共享评价资源，实现“育人与用人”同频共振。

4. 数字化赋能：加快数字化评价平台建设，整合相关技术，实现评价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与共享，生成学生“岗位胜任力画像”，提升评价的智能化水平；推动评价数据与院校教务系统、企业管理系统的对接，打破“数据孤岛”，提升评价效率。

5. 反馈优化：建立评价结果反馈与应用机制，将评价结果与学生毕业、评优评先、职业规划相结合，与教师绩效考核、教学改革相结合，与企业人才选拔、员工培训相结合，充分发挥“以评促教、以评促学、以评促改”的核心作用。

6. 队伍建设：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与评价能力；开展评价人员培训，提升院校教师、企业导师、行业专家的评价专业水平，确保评价过程的规范性与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二) 保障措施

1. 政策保障：对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政策，争取政府部门的政策支持与资金扶持；高职院校内部制定相关管理制度，明确评价体系的实施要求、各方权责，确保评价工作有序开展，形成制度化、规范化的评价机制。

2. 资金保障：加大评价体系建设的资金投入，用于数字化评价平台建设、评价人员培训、实践基地建设等，为评价体系的实施提供充足的物质支撑，保障评价工作的顺利推进。

3. 组织保障：成立评价体系建设领导小组，

由院校领导、企业负责人、行业协会代表组成，统筹推进评价体系的建设和实施；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分工，加强部门协同，形成工作合力，确保评价体系落地见效。

4. 机制保障：建立评价体系动态调整机制，定期调研产业发展与岗位需求，更新评价指标与标准，确保评价体系的时代性与针对性；建立校企协同评价激励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评价工作；建立评价质量监督机制，加强对评价过程的监督与管理，确保评价结果的真实性与客观性。

5. 文化保障：营造“重视职业胜任力、崇尚工匠精神”的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价值观，主动提升自身职业胜任力；加强校企文化融合，推动评价体系与文化建设深度结合，形成“评价促发展、发展强素养”的良好氛围。

六、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高等职业院校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的系统研究，明确了高职大学生职业胜任力的核心内涵与“专业能力-方法能力-社会能力”三维构成维度，剖析了当前评价体系存在的导向偏差、指标不合理、主体协同不足、方法固化、结果应用不完善等问题及产生原因；基于冰山模型、OBE理念等理论，构建了“校-企-生-行”四方协同、“知识-技能-素养”三维融合的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明确了评价主体、指标、权重、标准、方法与流程；提出了“理念先行、分步推进、校企协同、数字化赋能、反馈优化、队伍建设”的实施路径与“政策、资金、组织、机制、文化”五位一体的保障措施，为高职院校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建设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能够有效推动高职教育提质培优，助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二) 研究展望

1. 后续可扩大调研范围，覆盖更多地域、更多类型的高职院校与行业企业，进一步优化评价指标与标准，提升评价体系的普适性与针对性。

2. 深化数字化评价工具的应用，探索相关技术在评价体系中的深度融合，搭建更加智能化、一体化的评价平台，提升评价效率与精准度，推动评价模式的创新。

3. 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与产业升级趋势，持续优化评价体系，重点强化数字素养、创新能力、

绿色意识等指标的评价,确保评价体系与时代发展同频共振。

4. 加强评价体系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深度融合,探索“教学评一体化”的育人模式,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适配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5. 开展跨区域、跨院校的对比研究,借鉴不同地区、不同院校的评价改革经验,推动高职大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的标准化、规范化建设,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参考文献

[1] 牛杰。高职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指标体系

构建研究 —— 以电子信息类专业为例 [J].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23 (02):71-74.

[2] 郝福锦。科教兴国战略下职业院校技能型人才胜任力评价体系构建 [J]. 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 2025,36 (01):1-6.

[3] 洪小萍。数智时代财会类学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研究 [J]. 梧州学院学报, 2024,34 (04):77-84.

[4] 程涛,王正青。“中文 + 职业技能”人才跨文化职业胜任力模型构建研究 [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 2024 (01):59-70.

[5] 王雷。高校毕业生职业胜任力评价体系研究 [J]. 浙江社会科学, 2011 (11):91-97+122.

从静态遗存到动态再生：文物数字传播中的符号激活 与公共连接

徐沁怡¹ 王奕然²

(1.华中师范大学 新闻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2.华中师范大学 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 基于“符号激活—公共连接—价值衍生”分析框架, 文物数字传播的现实要义在于实现意义转译、情感凝聚与价值转化。受制于技术中心、传者中心与流量中心逻辑, 当前实践深陷技术悬浮的呈现困境、单向灌输的互动困境与碎片消费的认知困境。为破解上述症候, 亟须推进语境重构、社群共创、意义链接的实践性转向, 构建开放的意义协商网络, 使文化遗产真正融入时代公共生活。

关键词: 文化遗产; 数字传播; 符号; 连接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388

From static relics to dynamic regeneration: symbol activation and public connection in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Xu Qinyi¹, Wang Yiran²

¹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hina

² Schoo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symbol activation - public connection - value derivation", th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of digital dissemination of cultural relics lies in achieving meaning translation, emotional cohesion, and value transformation. Constrained by the logic of technology-centeredness, communicator-centeredness, and traffic-centeredness, current practices are deeply trapped in the dilemma of technology-suspended presentation, one-way indoctrination interaction, and fragmented consumption cognition. To address these symptoms, it is urgent to promote practical shifts towards contextual reconstruction, community co-creation, and meaning connection, and to build an open network for meaning negotiation, so as to truly integrat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he public life of the times.

Keywords: cultural heritage; digital communication; symbol; connect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让文物说话, 让历史说话, 让文化说话^[1]。随着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纵深推进与“深度媒介化”时代的全面到来, 文化“活化”传播已由物质层面扩展至行为、精神层面^[2]。数字媒介的引入, 一方面拓展了文化遗产

的物理边界, 一方面开辟了活化历史记忆、沉淀集体感情、坚定文化自信的精神阵地。然而, 数字技术的广泛赋能不能自发促成文化机制的有效传递。文物数字传播亟须实现从静态遗存向动态再生的范式跨越, 将简单的物理呈现修正为激活

作者简介: 徐沁怡(2005—), 女, 本科, 新闻学;

王奕然(2002—), 男,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80 **通讯作者:** 徐沁怡

符号意义、建立公共连接、衍生文化价值的社会建构过程。

1 文物数字传播的内在逻辑与应然向度

在数字传播可塑性、流变性、无界性、共享性、交互性传播趋势^[3]下,文物数字传播正成为连接历史记忆与现实社会的重要场域。首先,应聚焦符号激活,推动文物从单一的物理形态再现向契合时代语境的现代意义生成跃升;然后,应深化公共连接,构建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双向演绎网络;最后,应指向价值衍生,将沉淀的历史群体记忆升华为鲜活的当代文化认同。

1.1 符号激活:从物理再现向意义生成

人利用符号交流意义、分享意义、建立意义共同体^[4]。在媒介融合变革、数字产业转型和文化消费升级的时代语境下,文物数字传播亟须打破物质载体的静止状态,实现文化符号的动态激活。即通过促使文物由静态物证转化为可感知、可解释、可连接的文化符号,实现文物内涵的意义转译、语境重构与当代阐释。一是实现历史信息的降维转码,将晦涩、深奥、冷僻的专业叙事转化为具象、直观、生动的视听语言。二是丰富文化内涵的表达张力。深化文物的历史信息、社会关系和时代链接,赋予静态器物以叙事性、故事性与生命力。三是拓展器物原型的表意空间。突破材质、形制和年代的物理限制,使得文物在数字场域中获得多维、立体、全息语义延展。若缺失符号激活,文物数字传播便易沦为外观复制、形式展示与浅层浏览,难以真正生成文化意义。

当前,文物的符号激活正面临多维度的赋能机制。一是数字技术的底层支撑。三维扫描、全息投影与知识图谱为符号的精准采集、深度解析与结构化存储提供了技术工具。二是数据资源的开放融通。数据库建设、素材开源与云端共享为符号的跨界整合、重混生产与创新应用创造了资料基础。三是表意形式的持续拓宽。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混合现实为符号的全景展示、动态模拟与沉浸体验构建了媒介场域。

1.2 公共连接:从单向接受向双向演绎

在平台社会持续扩展、媒介使用深度日常化、文化参与方式不断互动化的现实背景下,文物传播只有建立稳定的公共连接,才能回应当代受众对表达、参与与协商的传播需求。其公共连接应以传播关系的重组为核心指向,致力于使文物在

数字传播中突破单向告知和被动接受,形成机构与公众之间可进入、可回应、可协商的交流关系。一是改变传播结构,将单向输出转化为双向沟通,提升文物传播的回应度、到达度与持续度;二是扩展阐释空间,使馆方、研究者、媒体与用户都能进入解读过程,增强内容表达的丰富性、多样性与延展性;三是提升公共讨论能力,使文物从被观看、被接受、被陈列的对象,转化为可讨论、可分享、可再阐释的公共文化议题。若缺失公共连接,文物数字传播便易沦为自说自话、信息孤岛与单向输出,难以真正融入时代公共生活。

当前,文物的公共连接已具备较为明显的现实条件。一是社交媒介的平台支撑。社交矩阵、短视频流与网络社区为受众的圈层聚集、话题讨论与情感交流提供了互动场域。二是共创机制的规则赋能。开放授权、众包生产与互动反馈为连接的协同编纂、二次创作与集体发声创造了实践路径。三是算法推荐的精准分发。用户画像、兴趣标签与协同过滤为连接的垂直触达、个性匹配与关系链拓展构建了网络基底。

1.3 价值衍生:从群体记忆向文化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5]。在文化自信重塑、民族复兴叙事和全球价值交汇的实践维度下,文物数字传播应区别于历史常识的简单普及,使文物突破固有的收藏、陈列、说明功能,转化为能够承载公共价值、文化意识与身份感知的传播资源。一是激活群体记忆,将分散的历史片段、文化意象与文明经验重新组织起来,增强文物传播的历史连续性、情境完整性与记忆可感性;二是沉淀公共价值,使文物所承载的精神观念、伦理传统与审美经验在数字场域中获得再表达、再确认与再传播;三是推动文化认同,使个体在接触、理解与体认文物的过程中形成更稳定的文化归属、价值认可以及身份自觉。

当前,文物的价值衍生可依托于多维度的支撑体系。一是宏观政策的战略引领。国家战略、政策扶持与制度供给为价值的时代定位、方向指引与精神引领提供了政策保障。二是社会心理的认同觉醒。国潮兴起、寻根热潮与文化寻思为价值的情感共振、心理投射与精神契合创造了受众基础。三是数字产业的跨界融合。文旅融合、IP开发与场景消费为价值的生活融入、产业转化与持久传承构建了实践载体。

2 文物数字传播的现实困境与失衡症候

物理形态的“在线”不等于文化意义的“在场”。数字技术虽能有效地推动传播过程的感官化、交互化和大众化,但无法自为地激发文物符号的生命力、共情力和感染力。在技术理性僭越、传者本位固化、流量逻辑裹挟的现实影响下,符号激活和公共连接的缺失,导致了文化数字传播的呈现、互动与认知困境。

2.1 技术悬浮与意义隐匿的呈现困境

在项目立项、资源配置和评价指标中,文物数字实践的参数化、计量化、流程化,易导致文物的历史语境、社会记忆、价值内涵在扫描、建模、渲染、装置的技术流程中隐没,引发技术悬浮和意义隐匿的呈现困境。一是视觉奇观化遮蔽器物魅力,即追求声、光、场的震撼感、沉浸感和逼真度,将观众视觉中心迁移到陈展空间、交互界面和操作人员,而非文物的工艺、材质、形制。二是语境剥离化消解价值深度。即追求复用效率和通用审美,将文物从原有人文空间、历史制度、社会关系中抽离,置入泛化的“古风”“氛围”“高级”等场景。三是形式同质化抹杀质态个性。即追求技术标准的绝对统一,将不同时期、不同质地、不同功能的文物用同一套陈展、交互、叙事处理。总结而言,技术悬浮与意义隐匿的叠加,影响了文物的器物魅力、历史厚度和文化个性的表达,使得文物向单纯的视觉消费品滑落,导致文物内在的文化符号陷入持续休眠状态。

2.2 单向灌输与双向缺失的互动困境

在交互设计、内容制作和活动策划中,数字媒介的交互属性常常被传统的“传者中心”范式所规训,易导致公众的参与诉求、表达意愿、情感反馈在单向链条中被边缘化,引发单向灌输与双向缺失的互动困境。一是交互浅层化。即数字交互设计仅满足基础的点击、拖拽、缩放等机械操作,缺乏能够引发深度认知与情感投入的挑战、探索与创造环节。二是环节封闭化。即数字叙事编排仅由文化机构主导并封闭设定,用户个人化的解读路径、情感体验与知识关联无法融入或改变既定的叙事框架。三是个体孤立化,即数字节点搭建仅基于单客流量、停留时长、终端特性,缺乏引导公众围绕文物话题展开横向交流、意义协商与社群构建的机制设计。总结而言,单向灌输与双向缺失的叠加,使得围绕文物数字传播形成的讨论场、协作链与认同纽带难以为继,使得公众向被动的文化消费者滑落,导致文物价值难以在持续对话中转化为可共享、可延展的公共意

义。

2.3 碎片消费与语境坍塌的认知困境

在算法分发、平台运营和话题营销中,为适应数字传播环境高频更新、即时反馈和流量竞争逻辑,文物数字传播被不断压缩为时长更短、节奏更快、情绪更强的碎片单元,推动碎片消费与语境坍塌的认知困境持续积累。一是叙事碎片化。即追求传播的高效性和阅读的低门槛,将完整的文物故事、工艺流变、历史背景,切割为零散记忆、孤立事实和片面认知。二是意义娱乐化。即追求受众的猎奇心理和平台的流量变现,使用网络热梗、搞笑表情、戏谑段子,将文物由历史见证变为趣味素材。三是语境扁平化。即追求跨圈层的快速扩散和标签化的流行表达,把跨时代、跨制度、跨地域的文物经验压缩到生活语境,将语义空间压缩为单层的“好看”“好玩”“好用”。总结而言,碎片消费与语境坍塌的叠加,瓦解了知识体系、严肃内涵和历史语境的完整表达,使得数字文物的价值传播向娱乐消遣滑落,难以将其沉淀为稳定、交互、发展的公共认知结构。

3 文物数字传播的实践转向与优化路径

数字技术传播是自我传播、人际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和大众传播的全面融合^[6]。文物数字传播需要构建一套超越单一技术创新的系统性机制,以实现由“静态遗存”到“动态再生”的跨越。遵循“符号激活—公共连接—价值衍生”的递进逻辑,涵盖叙事呈现、关系互动、价值认知三个圈层的实践框架,可以为文物数字传播的公共化进程提供可操作的路径指南。

3.1 内圈层:数字转译与语境重构的呈现路径

破解“技术悬浮”导致的符号休眠,让文物从“可感”走向“可知”,核心在于挖掘文物背后的历史文化,做到见物、见人、见精神^[7],将文物从静态的视觉对象转化为可被深度理解的文化基因。一是历时叙事还原生命轨迹。运用微纪录片、互动游戏、舞台剧等多模态媒介,呈现文物从原料到成品、从使用到埋藏、从发现到修复的全生命周期历程,将器物还原为承载历史演进的动态节点,使公众在流动的叙事中感知文物的历史厚度与生命张力。二是具身情境缝合历史语境。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把文物本体的孤立展示转为社会场景的具身体验,将孤立悬浮的文物重新锚定于原生的历史与社会关系网络中。促使受众在沉浸式的在场体验中,完成对文物功能属性

与深层文化语境的还原与体认。三是探索机制驱动认知内化。引入任务驱动、即时反馈、渐进挑战机制,将复杂的符号意义转化为可操作的探索路径。引导公众在主动的交互解谜中,完成对文物内涵的自主拆解与意义建构,实现从“被动观看”到“主动解码”的跃升。

3.2 中圈层:社群共创与情感共鸣的互动路径

破解“双向缺失”的互动困境,让文物从“可议”走向“可创”,核心在于打破“传者中心”范式,构建开放的参与式网络,引导公众从文化消费者向意义协作者转型。一是搭建UGC激励生态,实现从“单向传播”到“双向共创”。通过建立规范的文物数字资源授权机制、多元的数字文物传播平台矩阵、动态的二次创作激励机制,赋予受众共创身份,实现传播权力的下放与意义生产的多元化,从根本上激发其持续参与的意愿。二是培育趣缘社交圈层,实现从“散点受众”到“情感公众”。通过培育以策展人、领域学者、资深爱好者为代表的意见领袖、利用超话社区、兴趣小组、知识播客等形式的趣缘媒介,扩展受众社群空间,促成基于共同兴趣的意义协商与多维对话,将原子化的数字受众转化为具备认同感的情感共同体。三是设计协作式公共项目,实现从“个体表达”到“集体成就”。通过策划如数字文物档案、数字文物地图、数字文物设计等公共参与项目,创造受众创造机会,赋予受众将个体的碎片化智慧汇聚为数字文化景观的宏大叙事,在协同生产中强化公众的社会联结与归属感。

3.3 外圈层:意义链接与价值衍生的认知路径

破解“碎片消费”的认知困境,让文物从“可沉淀”走向“可升华”,核心在于推动文物符号突破圈

层壁垒,深度嵌入当代社会的意义网络,实现从文化消遣到价值认同的升华。一是构建跨媒介叙事系统,实现从“碎片消费”到“意义整合”。围绕核心文物IP在文字、影像、展览、戏剧、游戏等多种媒介之间形成互为补充的内容网络,将碎片化的信息切片重新编织为严密的意义图景,为受众提供组织化、系统化、多维度的认知通道。二是贯通线上线下价值循环,实现从“虚拟共鸣”到“实践确认”。通过专题展览、工作坊、研学等形式,将线上聚集的情感能量导向线下的实体实践,从而将虚拟连结沉淀为可触及、可持续、可规范的社会交往。三是锚定公共议题与社会认同,实现从“文化话题”到“公众共识”。主动将文物与当代社会议题、群体记忆和身份认同关联起来,使文物成为讨论历史经验、价值选择与社会责任的媒介,引导数字传播跳出单一的审美范畴,成为激发公共讨论、培育文化自信、凝聚共同价值的一个渠道。

4 结论

文物的“动态再生”可视为激活符号意义、建立公共连接、衍生文化价值的社会过程。当前,文物数字传播的结构性证候可表现为呈现层面的技术悬浮、互动层面的单向灌输及认知层面的碎片消费。基于此,应进行叙事重构、社群共创、意义链接的实践性转向。数字化传播并非一种单纯的技术手段,而是一种关系性、过程性与生态性的新范式,未来,文物数字传播应在技术更新的基础上,建立开放、包容、创新的意义协商网络和文化生态,使文化遗产真正融入民族的文化血脉与时代的公共生活,成为滋养民族精神、凝聚文化认同的活水之源。

参考文献:

- [1]习近平.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J].求是,2024,(8):4-13.
- [2]王竹,邓倩.新媒体时代主流媒体文物“活化”传播策略研究——以央视新闻新媒体为例[J].传媒,2023,(14):44-46.
- [3]薛可,龙靖宜.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传播的新挑战和新对策[J].文化遗产,2020,(1):140-126.
- [4]赵星植.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传播学思想[J].国际新闻界,2017,39(6):87-104.
- [5]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J].求是,2022,(14):4-8.
- [6]方兴东,严峰,钟祥铭.大众传播的终结与数字传播的崛起——从大教堂到大集市的传播范式转变历程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0,42(7):132-146.
- [7]陆建松.如何讲好中国文物的故事——论中国文物故事传播体系建设[J].东南文化,2018,(6):117-122.

核心素养导向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现状与优化路径

杜俊¹ 刘峻利²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19)

摘要: 在信息技术与教育深度融合、高中英语阅读教学转向核心素养导向的双重背景下, 生成式人工智能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凭借个性化生成、实时交互等技术优势, 为破解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核心素养培养的难点提供了新路径。本文结合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特征, 系统分析生成式 AI 在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突出问题及优化路径。研究发现: 生成式 AI 已初步覆盖“读前—读中—读后”全教学流程, 对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的培养具有潜在赋能价值, 但在实践中仍存在技术依赖加剧、师生情感互动弱化、创造性思维受抑、评价体系失序等现实困境。据此, 本文提出构建“人机协同”教学范式、融入人文性教学设计、实施“AI+批判性思维”训练模式、建立“过程溯源+分层验证”评价机制等优化路径, 推动 AI 从“辅助工具”向“育人载体”的角色跃迁, 以期为核心素养导向下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智能化改革提供理论框架与实践策略。

关键词: 核心素养; 生成式人工智能;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 应用现状与优化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24

Application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Literacy

Jun Du¹, Junli Liu²

¹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Shanxi 030619,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ducation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to core literacy orientation,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GenAI) provides a new way to solve the difficulties of cultivating the core literacy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by virtue of its technical advantages such as personalized generation and real-time interaction.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to systematically analyze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utstanding problem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of generative AI in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literacy.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GenAI has initially covered the entire teaching process of “pre-reading, while-reading, and post-reading”, and possesses potential enabling value for the

作者简介: 杜俊 (出生年份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学英语学科教学;
刘峻利 (出生年份 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中学英语学科教学。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language ability, cultural awareness, thinking quality, and learning ability.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practical dilemmas including excessive technological dependence, weakened emotional interaction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suppression of creative thinking, and disorder of evaluation system. Based on these findings, this study proposes several optimization paths: constructing the teaching paradigm of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integrating humanistic teaching design, implementing the integrated training model of AI and critical thinking, and establish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rocess tracing and hierarchical verification. It aims to promote the role transition of AI from "auxiliary tool" to "educational carrier" and provide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strategies for the intelligent reform of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in senior high school under the guidance of core literacy.

Keywords: Core literacy;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enior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teaching; Application status and optimization paths

一、引言

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时代必然,《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5年修订)》指出:普通高中英语课程应充分发挥现代教育技术对教与学的支持与服务功能,确保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应用有助于学生的有效学习和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教育部,2025)。

目前,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教学目标与核心素养脱节,“一刀切”设计忽视学生差异;部分教师缺乏从语篇视角解读文本的意识,语篇研读意识及能力薄弱;教师往往因精力所限,未能及时反馈作业或反馈浅层化;课堂教学过程模式化,教学活动缺乏特色与活力,难以满足核心素养培育需求(古海波、乔若雪,2024)。近两年,生成式人工智能凭借个性化生成、实时交互等优势,为破解英语阅读教学中核心素养培养难题提供了新路径。GenAI已渗透高中英语阅读“读前-读中-读后”全流程,在提升学生语言能力、培育文化意识等方面具潜在价值。但实践中其与核心素养培养目标适配不足,凸显多重困境:教师过度依赖AI弱化教学主导性;AI场景挤压师生情感交流,削弱课堂人文性;标准化输出抑制学生创造性思维;评价体系缺失导致效果难衡量、反馈失准。这些问题既制约GenAI育人价值释放,也阻碍阅读教学改革深化。现有研究多聚焦GenAI单一应用场景或泛化价值探讨,虽认可其潜在赋能作用,但缺乏对应用矛盾的系统剖析,对技术依赖等问题归因不足,更缺少适配困境的系统性优化路径,难以满足实践需求。

本研究立足教学实践与素养目标,梳理GenAI应用现状,剖析困境根源,提出构建“人机

协同”范式、融入人文设计、实施“AI+批判性思维”训练及建立“过程溯源+分层验证”评价机制等对策,为高中英语阅读教学智能化改革提供理论与实践支撑,实现“人工智能技术与外语教学融合”的新外语建设路径,推动智能化时代下英语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二、文献综述

(一)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内涵演进

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并非静态概念,而是我国外语教育目标在时代变迁中不断演进与本土化建构的产物。郝成森(2023)基于1949年以来13版高中英语课程标准指出:1949至1990年代初以“双基”为主导,聚焦语言能力与基础学习能力;1993至2013年进入“三维目标”过渡期,逐步纳入文化意识与思维品质,强调综合语言运用;2014年后正式确立“核心素养”框架,2017年及2020年课标明确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与学习能力四维结构;2021年至今则进入深化落实阶段,强调素养内涵的边界性与育人本质,推动学生从语言学习者向跨文化沟通者和终身学习者转型。这一演进始终回应时代对人才关键能力的需求,也为智能时代借助生成式人工智能创新素养培育路径提供了历史依据与现实指向。

(二) AI与英语教学的结合探索

如何使用AI赋能英语教学已成为许多教师关心的问题,但目前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层面,少量研究侧重实践层面。王鹏等(2022)则从课程资源开发角度出发,论证了利用AI技术可高效构建动态更新、学情适配的高中英语阅读资源库,以解决传统资源开发中素材精选难、改编处理难和便捷使用难的问题。付永庆(2024)聚焦于对话式AI在高中口语教学中的实践,提出其

可通过缓解学生焦虑、提供实时互动和即时反馈,有效提升学生的口语流利性与准确性。武和平与武银强(2024)则关注教师的能动性,通过案例分析探讨了教师如何通过有效的提问策略,引导AI深入挖掘单元主题意义,从而将AI转化为支持教学设计与意义探究的智能伙伴。何宁与王守仁(2025)站在更高维度,倡导建设人工智能时代的“新外语”,强调外语教育应培养学生包括外语运用能力、AI交互能力、跨文化能力和研究能力在内的关键素养,并推动AI与教学的深度融合。

三、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现状

基于对当前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实践特征的梳理,结合生成式AI的技术特性,从应用场景、主体特征以及应用价值与局限三维度系统分析其应用现状。

(一) 应用场景: 覆盖“读前-读中-读后”全流程

生成式AI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全过程中均得到有效应用,并在阅读教学的课前、课中、课后扮演不同的角色。读前可担任语言顾问(Language advisor)角色,辅助学生自主解决基础语言问题,同时帮助教师精准定位重难点,提升预习针对性(陈路遥、陆佳,2025);读中可担任语言伙伴(Language partner)角色,创设互动情境,聚焦真实交际与高阶能力培养;读后,AI可担任语言评测专家(Language assessment specialist)角色,根据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兴趣爱好生成有创意且符合教学目标的个性化作业并实施多维度评价,实现对已学知识的意义再建构。

(二) 应用主体: 师生认知与需求存在差异,影响应用深度

生成式AI的应用效果不仅取决于技术本身,更与其应用主体教师与学生的认知态度、需求偏好密切相关。教师层面,接纳度高但存在“工具化”倾向,核心诉求为减轻备课负担、提升效率,忽视AI对核心素养培养的价值,且对AI生成内容的二次加工缺位,导致技术与教学目标适配度低;学生层面,需求聚焦实用性,如即时答疑、答案核对等,但缺乏主动借助AI进行深度思考、能力提升的意识。在师生认知与需求错位这种状态下导致AI应用局限于知识传递,无法实现“赋能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

(三) 应用效果: 对核心素养的赋能潜力

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简单的“技术工具”,而是能够深度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全流程,辅助教师精准落地四大核心素养的协同伙伴,其赋能价值如下:

1. 助力语言能力培养: 从“知识灌输”到“能力迁移”

语言能力是英语核心素养的基础,针对不同水平学生,GenAI提供差异化阅读内容与支持,适配分层需求,解决传统教学统一文本的弊端。同时,语篇研读是确定教学目标、选择教学方法、组织教学活动的前提与关键(古海波、乔若雪,2024)。GenAI能生成语篇结构图、拆解长难句并提供同义替换,辅助教师深化语篇解析,推动学生从“懂”语言到“用”语言转变,实现语言能力动态培养。

2. 助力文化意识培育: 从“文化认知”到“文化共情”

文化意识要求学生理解中外文化内涵、尊重差异,GenAI可破解传统教学文化介绍碎片化难题。它能针对文本中的西方节日等文化元素生成文化背景卡片,补充语境以激活文本内涵;还可围绕主题生成多元文化文本,帮助学生拓宽文化视野,实现从“文化认知”到“文化共情”的提升,构建立体文化认知场景。

3. 助力思维品质提升: 从“被动接受”到“主动思辨”

思维品质的核心是批判性与创新性思维,能独立思考与理性判断。GenAI可通过创设思辨情境与引导深度思考,推动学生从被动接收信息转向主动分析判断。利用AI生成争议性文本,引导学生对比分析并表达自身观点,训练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还可以设计阶梯式开放性问题链,激活学生联想与创新表达,避免思维的随意性。

4. 助力学习能力养成: 从“教师驱动”到“自主调控”

学习能力的核心是具备自主规划、自我监控、自我反思的能力,能主动管理学习过程(张静,2025)。生成式AI可通过引导自主规划与辅助自我反思,帮助学生从依赖教师安排转向自主管理学习。一方面来说,AI可以依据学习表现生成个性化诊断报告,教师可根据报告与学生共同制定“每周阅读目标”,让学生从被动完成作业转变为主

动规划学习。另一方面来说, AI 可以生成反思表格, 在读后环节可引导学生进行自我反思, 从而推动学生的学习能力从“无意识”走向“有意识”。

四、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应用的突出问题

尽管生成式 AI 对核心素养培养具有潜在赋能价值, 但在当前教学实践中, 受技术依赖、思维情感、教学评价等因素影响, 仍存在四大突出局限, 制约其赋能效果的发挥。

(一) 技术过度依赖, 削弱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部分学生将生成式 AI 视为“万能工具”, 在阅读中遇到任何问题包括简单生词、基础句意理解均直接依赖 AI 解答, 缺乏先自主思考、再借助工具的意识。例如, 阅读中遇到“delicious”这类基础词汇仍习惯性查询 AI, 或面对文本推理题直接索要 AI 生成的标准答案, 导致自主查阅词典、分析文本逻辑的能力逐渐弱化, 反而与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核心目标相悖。

(二) 情感互动匮乏, 背离核心素养的人文性

核心素养的培养不仅需要认知层面的理解, 更需要情感层面的共情。目前教学中教师的情感支持、激励作用以及师生之间的心智沟通、精神关照等也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可比拟, 原有的耳濡目染、以身示范等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被人工智能的工具性、技能化特征取代, 教学中人的完整存在意义降低则意味着课堂里的“温度”逐渐缺失(杨港、顾世民, 2023), 难以激发学生的情感共鸣与学习热情。

(三) 创造思维抑制, 弱化思维品质的高阶发展

深度学习之所以“深”, 关键在于迁移、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 由此构建的指向深度学习的教学模式就必须着重处理好知识结构与知识运用一体化的关系(张良, 2019)。AI 生成的阅读材料、问题答案、反思模板等内容多基于现有数据与算法逻辑, 具有一定的标准化与趋同性。若师生过度依赖 AI 生成的内容, 易导致学生的思维被算法框定, 缺乏独立探索与创新表达的空间。在读后拓展环节, 有些学生直接使用 AI 生成的阅读总结作为自己的作业, 未进行个性化思考, 也没有结合自身生活体验提出独特见解。这种被动接收 AI 结论的模式, 会抑制学生的创新思维与独立认知能力, 与提升思维品质的素养目标背道而驰。

(四) 评价体系失序, 难以精准衡量素养发展

核心素养导向的教育评价强调“教—学—评”一体化, 需精准衡量学生语言能力、文化意识、思维品质及学习能力的真实发展水平。生成式人工智能融入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后, 学生借助 AI 生成标准化作业答案成为常态, 其输出的词句翻译、主题解读等结果逻辑严谨, 直接导致传统以作业正确率、完整性为核心的评价指标失效, 使教师难以通过作业判断学生知识掌握、思维发展及核心素养提升的真实状况。评价体系与教学实践失配, 导致教师无法及时调整策略, “核心素养导向”教学目标缺乏有效评价支撑, 最终陷入“教—学—评”脱节的恶性循环。

五、核心素养导向下生成式人工智能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当前生成式 AI 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应用中的突出问题, 结合核心素养培养目标与教学实践需求, 本文从教学范式、教学设计、思维训练、评价机制四个维度, 构建系统性优化对策, 实现“技术赋能”与“素养培养”的深度融合。

(一) 构建“人机协同”教学范式, 规避技术过度依赖风险

智能时代的教师, 是“人师-机师”构成的“双师并存”的时代(李政涛, 2021)。针对技术过度依赖削弱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问題, 需以核心素养培养为锚点, 构建“教师主导—AI 辅助—学生主体”的人机协同教学范式, 明确人机角色边界与协同逻辑。教师应首先建立“先自主后协同”的教学原则, 通过教学设计引导学生合理划分 AI 使用场景。

在具体的阅读教学实践中, 可设计分层任务链: 首先, 基础认知层面例如生词查询、语法解析等要求学生优先运用词典、语法书等传统工具自主完成, 教师通过课堂随机抽查、小组互检等方式强化自主学习习惯; 其次, 深层理解层例如阅读文本逻辑分析、主题意义探究等活动则允许学生借助 AI 生成多角度解读框架, 但需在课堂研讨中阐述 AI 结论与自身思考的差异, 教师针对性点评学生的批判整合能力。与此同时, 强化教师在人机协同中的引导作用, 教师可结合具体阅读文本设计自主思考任务单, 明确标注哪些环节需独立完成、哪些环节可借助 AI 辅助, 并用课堂展示、成果分享等形式检验学生自主学习成效, 引导学生在实践中形成“自主优先、AI 赋能”的学习模式, 这一过程既能切实规避技术过度依赖风险,

更能真正实现以机赋能而非以机代劳，保障核心素养导向下学生英语阅读自主学习能力的持续扎实发展。

（二）融入“人文性”教学设计，弥补情感互动与文化共情短板

立足英语核心素养的人文性要求，将生成式AI的工具性与师生互动的人文性有机结合，重构有“温度”的课堂。一方面，优化AI应用场景，将其聚焦于机械性、重复性教学任务，如词汇听写、语法纠错，为教师释放更多时间用于情感互动与价值引导。教师可借助AI生成多元文化背景素材，在此基础上组织课堂讨论、角色扮演等活动，引导学生深入解读文本中的情感内涵与文化差异，同时及时给予学生情感反馈与激励，强化师生间的心智沟通。另一方面，挖掘传统教学模式的优势，实现AI与传统教学的互补。例如，在文本解环节，先由教师进行示范性分析，传递自身对文本的情感体悟与解读思路；再利用AI拓展文本相关的多元视角，引导学生结合自身体验发表见解，通过师生、生生间的思维碰撞，激发情感共鸣，凸显教学的人文价值。

（三）设计“AI+批判性思维”训练模式，破解创造思维抑制难题

深度学习的实质是结构性与非结构性知识意义的建构过程，也是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须对已激活的先前知识和所获得的新知识进行有效和精细的深度加工。在核心素养导向下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中，针对AI生成内容“标准化”“趋同性”抑制学生创造思维的问题，需构建“AI辅助—批判探究—创新生成”的三阶训练模式，将批判性思维培养有机融入阅读教学全过程，助力学生思维品质高阶发展这一核心素养目标落地。

在实践过程中要立足高中英语阅读文本特点，如议论文的逻辑结构、跨文化语篇的价值观隐含等，设计具有思辨张力的任务链——例如比较不同文化视角下的主题阐释、辨析作者立场与AI生成观点的异同、重构文本结局并论证合理性等。在阅读中，让学生先基于文本证据进行自主分析，再借助AI拓展理解维度，最后通过小组辩论、书面评述等形式对AI输出进行验证、质疑与修正。如此，不仅契合新课标对思维品质培养的要求，更在真实语言实践中破解AI使用带来的创造思维抑制难题，实现技术工具性与育人价值性的深度协同。

（四）创新“过程溯源+分层验证”评价机制，破解AI生成内容的评价困境

针对AI生成内容模糊英语阅读素养评价边界的问题，本研究构建“过程溯源+多元验证”融合机制。一方面，依托智能平台全程追踪学生阅读行为数据，记录学生调用AI工具的频次、检索关键词及文本调整轨迹，结合同步眼动数据捕捉阅读专注度，还原“人机协同”下的真实思考过程，剥离“完美答案”的表象干扰。另一方面，设计覆盖语言、思维、文化多维度的验证体系：通过AI自动分析文本词汇语法准确性及结构逻辑性，筛除疑似机器生成内容；同步设置“限时文本重构”任务，观察学生对信息的提取整合能力；增设“观点辩论”“文化对比阐释”等开放性任务，结合教师人工评阅与同伴互评，重点评估批判性思维与跨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该机制将评价重心从结果正确性转向素养生成过程，既借助技术识别AI依赖行为，又通过多元任务穿透算法输出的外壳，精准定位学生阅读素养发展的优势与短板，为动态调整教学策略提供实证依据，推动“教-学-评”在智能环境下的有机协同。

六、结语

核心素养导向下，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与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的深度融合，是教育数字化转型背景下外语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亦是破解素养培育痛点的关键路径。本文基于教学实践梳理发现，GenAI已覆盖“读前-读中-读后”全流程，在语言能力培养、文化意识培育、思维品质提升及学习能力养成等方面展现出显著赋能潜力，但同时暴露出技术依赖加剧、情感互动弱化、创造性思维抑制及评价体系失序等核心困境。

为实现技术赋能与素养培育的精准对接，本文构建“教学范式-教学设计-思维训练-评价机制”四维优化体系：以“教师主导—AI辅助—学生主体”的人机协同范式规避技术依赖；融入人文性设计弥补情感与文化共情短板；通过“AI+批判性思维”三阶训练破解思维抑制难题；依托“过程溯源+分层验证”机制摆脱评价困境。其核心逻辑在于厘清人机边界，使GenAI从“工具载体”升级为“素养培育赋能者”，同时强化教师的育人主导地位，确保技术服务于核心素养培育本质。

未来研究需双向发力，技术层面应推动GenAI与英语阅读教学需求的深度适配，开发素养导向的专属功能模块；实践层面需强化教师数

字素养与智能教学能力培育,构建“技术-教学-素养”三位一体的融合路径。同时,需要关注技术应用的伦理风险,建立动态监管机制,确保智能化改革的良性发展。核心素养培育是新时代高中英语教育的根本使命,GenAI为该使命的落地提供了创新性支撑。唯有坚守“素养为先、技术赋能、人机协同”原则,才能摆脱当前教学困境,推动高中英语阅读教学向智能化、个性化、素养化转型,最终培育出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与终身学习能力的复合型人才,为新时代外语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核心动力。

参考文献:

- [1]陈路遥,陆佳.生成式人工智能作为语言顾问、语言伙伴、语言评测专家赋能初中英语阅读教学的路径[J].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2025(Z1): 77-82.
- [2]程晓堂,赵思奇.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实质内涵[J].课程·教材·教法,2016,36(05): 79-86.
- [3]付永庆.以对话式人工智能促进高中生口语表达能力的实践策略[J].英语学习,2024,(01): 19-23.
- [4]古海波,乔若雪.人工智能辅助英语阅读教学的实践探究[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24,(11): 58-62.
- [5]郝成森.英语学科核心素养的嬗变及思考[J].教育观察,2022,11(08): 85-87+124.
- [6]何宁,王守仁.人工智能时代“新外语”建设的目标与路径[J].外语界,2025,(02): 11-15.
- [7]李政涛.智能时代是“双师”协同育人的新时代[J].当代教师教育,2021,14(01): 1-4+29.
- [8]王鹏,赵杰,张静.2022.基于AI技术的高中英语阅读课程资源开发实践[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2022,(09): 70-74+77.
- [9]武和平,武银强.与AI“聊”单元主题意义:教师如何向AI“提问”?[J].2024,英语学习(01): 4-11.
- [10]杨港,顾世民.人工智能时代外语教学模式变革的风险及其规避[J].语言教育,2023,11(03): 20-29.
- [11]袁汉邦,唐邦顺.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高中英语阅读教学例谈[J].中小学数字化教学,2024,(09): 15-19.
- [12]张静.AI智能体辅助混合式外语自主学习模式:设计、实施与优化[J].外语界,2025,(03): 29-37.
- [13]张良.核心素养的生成:以知识观重建为路径[J].教育研究,2019,40(09): 65-70.
-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5年修订)[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25.

退课监测视角的在线课程个性学习与信息茧房推荐困境

习佳宁¹ 施雯¹

(1. 广州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36)

摘要:教育数字化转型推动在线课程个性学习由理念走向平台化实践,但个性推荐在提升资源匹配与支持精准性的同时,也可能因依赖既有偏好、历史行为与静态标签而诱发信息茧房。本文基于退课监测视角,分析目标失衡、标签固化、内容收缩、协同不畅与治理滞后等问题及其成因,提出育人导向重构、课程图谱优化、探索推荐引入、协同干预强化与制度规范完善等路径,以促进精准支持与认知开放的动态平衡。

关键词:退课监测; 在线课程; 个性学习; 信息茧房; 推荐算法

基金项目:广州市教育科学规划 2024 年度课题课程图谱大数据分析的退课监测精准教学实施研究(202316719)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39

The Dilemma of Personalized Learning and Information Cocoon

Recommendation in Online Cour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ropout Monitoring

Jianing Xi¹, Wen Shi¹

¹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China

Abstract: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ducation has advanced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 online courses from concept to platform-based practice. While personalized recommendation improves resource matching and targeted support, its reliance on prior preferences, historical behaviors, and static labels may lead to information coco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urse withdrawal monitoring, this study analyzes issues such as goal misalignment, label rigidity, content narrowing, weak coordination, and lagging governance, along with their underlying causes. It further proposes pathways including reconstructing a learner-centered orientation, optimizing course knowledge graphs, introducing exploratory recommendation, strengthening coordinated interventions, and improving institutional regulations, aiming to achieve a dynamic balance between precise support and cognitive openness.

Keywords: course withdrawal monitoring; online courses; personalized learning; information cocoons;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作者简介: 习佳宁(1990—),男,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知识图谱,人工智能;

施雯(1993—),女,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学,优化算法;

通讯作者: 施雯

一、引言

随着高等教育数字化建设的深化,在线课程已由辅助资源转变为集课程实施、学习支持、过程评价与教学反馈于一体的重要平台(黄昌勤等, 2021)。在提升课程可及性与学习便利性的同时,平台积累了大量关于观看轨迹、停留时长、退出节点与互动反馈的过程数据。基于这些数据开展学习分析、风险预警与资源推荐,逐渐成为精准教学的重要实践方向。这一转变不仅重构了课程资源的组织方式,也使学习过程由隐性走向可观测与可干预(韩锡斌等, 2022)。

从教学理念看,个性学习强调基于学生差异提供适配性支持,关注发展性与开放性;而推荐机制依托画像建模与行为预测优化资源分发,更强调效率与即时响应。二者虽在实践中紧密耦合,但价值导向并不完全一致:前者重在促进多元发展,后者易受短期指标驱动而趋向熟悉化与低阻力路径(班启敏等, 2022)。现有研究多集中于行为分析、风险识别与精准教学实现,为过程监测与差异化支持提供了方法基础,但对个性推荐可能引发的认知窄化与路径固化关注不足(吴娟等, 2023)。

在退课监测情境下,推荐机制常与降低退出率和提升留存直接关联,平台若以“减少退出”为优化目标,推荐逻辑可能持续向既有偏好收敛,优先推送易接受、低门槛内容,虽可缓解学习中断,却压缩了接触异质与高阶知识的空间,使个性学习滑向偏好迎合(黄昌勤等, 2021)。基于此,本文以退课监测为切口,围绕视频退出断点采集、双边知识图谱构建与退课概率预测,探讨内容反向修正与预警干预机制,并从问题与成因出发提出优化路径,以实现精准支持与认知开放的动态平衡(高雪与蒋晓, 2022)。

二、现实背景与研究问题提出

在高校课程建设由规模扩张逐步转向质量提升的背景下,在线课程承担的任务已明显超出单纯的资源供给与结果评价(朱永海等, 2025)。课程平台不仅支持知识传递,还承载学习过程识别、学习状态反馈、差异化资源分发和课程质量诊断等复合功能。随着学生学习基础、认知节奏、课程兴趣和任务承受能力差异持续显化,传统统一供给模式已难以充分满足高质量人才培养要求。个性学习因而成为在线课程改革中的重要方向,其核心诉求在于提升支持的适配性而非简单增加推送频率(刘玉萍与徐学福, 2022)。

在此过程中,退课监测逐渐成为连接个性学习、课程修正与精准教学的重要接口。退课行为并非单一的结果事件,而是可能通过观看中断、停留下降、反复退出、互动减弱和关键节点流失等过程性迹象提前显现(刘桐与顾小清, 2022)。对退出断点进行识别,不仅能够提示学生在何处中断学习,也有助于揭示课程在哪些内容位置、任务环节或表达方式上存在结构性障碍。由此,退课监测不应被理解为单纯的风险筛查工具,而应被纳入课程诊断的整体框架(叶俊民等, 2025)。

相关研究实践已将退课监测与个性学习联动作为重要推进方向。其基本思路在于通过采集学生视频退出断点、构建学生实体与课程视频节点双边知识图谱、预测个体退课概率,并依据高频退课时点对课程内容进行反向修正和预警干预(刘桐与顾小清, 2022)。此种设计表明,在线课程中的个性学习不再只是根据偏好推荐内容,而是试图通过过程数据识别学习阻滞点,再以推荐、支持与课程调整相结合的方式实现更精细的教学改进(陈芮等, 2023)。

然而,从现实运行看,个性学习与推荐机制之间并非天然一致。个性学习强调面向差异促进发展,其本质在于通过适当支持帮助学生跨越障碍、拓展认知和实现进阶(匡容等, 2020)。推荐机制则更容易依赖既有兴趣、历史行为与画像标签来进行匹配。当推荐系统长期围绕学生已表现出来的偏好进行资源分发时,学生虽然可能获得更高的短期舒适度和更低的退出率,但也可能逐渐被限定在熟悉内容、低挑战任务和单一路径之中,形成教育场景的信息茧房(朱红涛与李姝熹, 2021)。

因此,当前最值得关注的,不是在线课程是否应推进个性学习与推荐支持,而是推进过程中究竟面临哪些关键困境,以及如何在退课监测视角下构建兼顾精准支持与认知开放的优化路径(刘桐与顾小清, 2022)。换言之,问题的核心不在于技术能否识别学生退出风险,而在于识别之后所形成的推荐逻辑究竟是促进发展,还是在无形中加固偏好闭环。此种问题意识,正是本文进一步展开困境分析与路径建构的逻辑起点。

三、当前存在的主要困境

(一) 目标定位失衡

当前在线课程中的推荐机制,多围绕提高匹配度、降低退课率和增强停留时长等目标展开。此类目标具有现实合理性,因为平台运行确实需要关注学习中断与资源到达效率。然若缺少明确

的育人目标统摄,推荐机制便容易将学生当前更愿意接受的内容等同于学生更需要学习的内容。结果是,个性学习所强调的发展性、开放性与进阶性,可能被即时性、舒适性与留存性所替代。

在实践中,此类失衡常表现为平台倾向于依据历史观看偏好与退出风险推送更熟悉、更低门槛和更少挑战的内容。短期看,此类策略有助于平缓学习波动,减少中途流失,提升课程运行表面的稳定度。然从长周期看,学生接触异质知识、高阶概念和复杂问题的机会却可能不断减少。推荐由此不再主要承担引导学习前进的功能,而逐步转化为迎合既有兴趣的分发工具。

更为重要的是,目标定位失衡还会反过来影响教师和课程团队对课程质量的理解。当推荐机制持续以降低退课为中心时,课程优化也容易围绕“怎样更少退出”而非“怎样更好发展”来展开。此种倾向表明,表层困境并不止于推荐目标单一,更深层的问题在于课程育人目标尚未真正进入推荐逻辑的核心位置。

(二) 标签建构固化

学生画像和标签建构是在线课程推荐的重要基础。通过观看时长、停留节点、互动频率、反馈内容和退出轨迹,平台能够形成较为精细的行为表征,并据此识别学习兴趣、参与程度和退课风险。此种建模为差异化支持提供了数据前提,也使推荐机制具备更强的针对性。然从现实层面看,画像越精细并不必然意味着支持越合理,标签一旦缺乏动态修正机制,便可能逐渐转化为固化学生学习机会的隐性边界。

当平台长期依据既有行为记录进行判断时,学生很容易被框定为某种稳定类型,如高退课风险者、低持续参与者或偏好低难度内容者。此类标签若持续影响后续推荐,平台便可能减少对其推送更具挑战性、拓展性和跨主题的内容,以求在短期内降低退出概率。久而久之,过去的行为就会持续塑造未来的供给,学习者被固定在相对封闭的内容空间之中。

标签固化的直接后果在于,推荐系统更擅长重复确认既有偏好,而不擅长识别学习者可能发生的发展变化。学生实际具有成长性、波动性和可塑性,但静态标签却容易把此种变化压缩为稳定分类。由此产生的困境,表面上是画像过度依赖历史记录,实质上则反映出技术表征能力增强与教育开放性要求之间的明显错位。

(三) 课程供给收缩

退课监测本应服务于课程诊断与内容改进,但若对退出行为的理解过于单一,便可能把“学生在某处退出”简单等同于“该内容过难”或“该任务不受欢迎”。在此逻辑影响下,课程团队容易优先选择降低表达门槛、简化知识深度和压缩高阶任务等方式来减少学习中断。此种调整在局部层面确有助于改善完课率和即时反馈,但也可能使课程逐步偏离原有的知识结构、能力梯度和育人深度。

从现实运行看,一些在线课程面对高频退出点时,更倾向于通过缩短视频长度、减少理论环节、弱化复杂案例和拆分关键任务来平缓学习曲线。此类优化方式虽然具有一定合理性,但若长期围绕“更容易被接受”而非“更有助于成长”展开,课程便可能出现结构性收缩。学生在平台中获得的是更加顺滑的内容流,却未必是更加完整和更具发展性的课程体系。

课程供给收缩所导致的问题,不只是知识内容减少,更在于课程整体逻辑可能因此被割裂。高阶内容被弱化,跨层次任务被压缩,复杂问题被简单化,最终可能形成“留住更多人却发展更有限”的结果。此种困境说明,退课率控制若缺少教育性价值约束,会推动课程供给朝向茧房化方向收缩,使推荐机制在无形中强化内容边界。

(四) 协同反馈不畅

在线课程中的个性学习与推荐,并非单一平台功能,而是涉及平台、教师、管理者与学生多方参与的教学运行机制。平台负责采集与分析数据,教师负责课程组织和教学调整,学生则直接承受推荐结果并形成真实体验。若多主体之间缺少有效衔接,推荐输出就难以转化为有针对性的教学行动,平台分析也难以从教育专业判断和学习主体反馈中获得持续修正。

现实中常见的状况是,平台能够输出预警、标签和推荐结果,但教师未必能据此准确判断学生退出的教育原因。教师虽然了解课程目标与内容难点,却往往缺少将自身判断及时反哺系统的便捷路径。学生则主要作为被推荐对象存在,对推荐为何出现、推荐是否合适以及是否希望调整推荐方向,通常缺少充分表达和调节空间。如此一来,技术逻辑、教学逻辑与学习体验逻辑之间便形成断裂。

协同反馈不畅带来的问题,不仅是推荐结果利用不足,更在于系统更容易沿着既有行为惯性进行自我强化。缺少教师校正时,平台会更倚重

历史数据。缺少学生反馈时,推荐偏差不易被及时发现。缺少管理统筹时,平台分析也难以上升为课程治理机制。此类表层困境表明,在线课程中的信息茧房风险,既来自推荐机制本身,也来自多主体协同与反馈链条建设不足。

(五) 治理规范滞后

随着在线课程平台不断引入学习画像、标签分类、风险预警与资源推送,推荐机制已不再只是技术模块,而逐渐涉及知情权、选择权、公平性、数据边界和责任分配等治理问题。学生在平台中的行为被持续采集、分类和分析,推荐结果也会实质影响其接触内容、学习路径与任务难度。若缺乏必要的透明机制和制度约束,推荐支持虽以促进学习为名,却可能在无形中弱化学习者主体性,甚至加剧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在现实实践中,不少平台功能强调“更精准地推送”,却较少向学生清晰说明推荐为何出现、标签如何生成以及数据如何影响内容分发。与此同时,教师对平台推荐逻辑也未必具有足够的知情基础和参与权限。学生往往只能接受推荐结果,而难以对推荐倾向进行有效调整。此种状况会使推荐机制以黑箱方式运行,既增加了信息茧房风险,也削弱了平台与课程之间的信任基础。

治理规范滞后的更深层影响在于,平台和课程团队缺少明确边界来判断何种推荐属于合理支持,何种推荐可能构成过度收缩。若没有透明规则、动态审查和责任界定,推荐机制便更可能围绕短期指标持续优化,而较少接受来自教育公平、认知开放和学生权利等方面的约束。此种困境说明,在线课程个性学习的推进,已进入必须同步加强制度供给与治理规范的阶段。

四、问题形成的深层原因分析

(一) 效率逻辑偏强

究其原因,在线课程推荐之所以容易滑向信息茧房,首先在于平台运行更容易被可量化的效率指标牵引。停留时长、点击率、完课率和退出概率具有可见性强、反馈迅速和计算便利等特点,因此往往成为推荐系统最直接的优化依据。相比之下,认知拓展、思维进阶、知识迁移和长期发展等育人目标更难以在短时间内被准确量化,也更难被直接嵌入算法调整过程。

当效率指标持续居于主导位置时,推荐机制自然会优先围绕“怎样让学生不退出”“怎样提高短期匹配度”来运转,而不是围绕“怎样帮助

学生实现更充分的发展”来建构。此种逻辑使平台更倾向于向学生提供熟悉内容、低阻力路径和高即时反馈资源,进而形成偏好强化与内容收缩。前文所述目标定位失衡和课程供给收缩,正是效率逻辑偏强在教学场景中的集中表现。

从本质上讲,问题并不在于效率指标本身毫无价值,而在于此类指标尚未被课程目标、能力培养目标和认知发展目标所统摄。当推荐逻辑先行而教育逻辑滞后时,平台虽能提高局部运行效率,却难以保证个性学习真正服务于学生成长。由此可见,破解推荐困境,首先需要在目标层面完成从效率优先到发展统摄的逻辑重整。

(二) 教育解释不足

从深层次看,技术表征的快速发展明显快于教育解释框架和教学转化机制的建设。相关实践已围绕学生退出断点采集、双边知识图谱建构和个体退课概率预测展开系统设计。此类工作为精准识别学习中断提供了坚实基础,但技术擅长识别相关性,并不等于已经完成教育性解释。退出行为背后可能同时涉及课程难度、任务节奏、表达方式、支持不足、兴趣偏差和行程安排等多重因素,若缺少深入解释,数据结果就容易被简单化地转译为推荐规则。

事实上,相关研究方案已提出通过调查问卷和原因分析了解退课意愿,并结合在线答疑与分层课程支持等方式实施干预。这表明,平台输出只是教学诊断的起点,而非终点。问题在于,现实运行中常常是技术先给出标签与推荐结果,教师再被动理解其含义,学生则直接接受其后果。此种顺序会使推荐更容易围绕历史行为持续强化,而难以围绕真实教育原因实施修正。

教育解释不足带来的直接后果,是退课监测更像行为识别系统,而较少成为课程诊断系统。标签固化、供给收缩和协同不畅等问题,均与此种断层密切相关。由此可见,在线课程中并不缺少数据,而是缺少把数据真正转化为课程理解和教学行动的解释机制。

(三) 协同机制薄弱

从实践运行机制看,个性学习与退课监测天然具有跨主体特征。平台掌握数据和技术,教师掌握课程与教学判断,学生掌握最真实的学习体验,管理者则承担统筹与制度推进职责。若上述主体之间缺少明确责任划分、沟通接口和反馈程序,推荐机制便难以形成有效治理闭环。平台可以识别学生可能在哪里退出,但不一定理解其教

育含义。教师能够判断课程难点，却不一定及时接入平台结果。学生感知推荐是否合适，却缺少充分表达路径。

现实中的协同不足，常常表现为平台分析停留在数据面，教师调整停留在经验面，学生反馈停留在零散面，三方之间缺乏稳定联动。结果是，平台更依赖可计算的历史行为，教师更依赖局部观察，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位置。此种状态会使推荐偏差难以及时发现，也使课程修正缺少持续证据支持，最终加剧信息茧房风险。

因此，协同机制薄弱并非简单的沟通问题，而是教学治理结构尚未与技术系统形成深度耦合。当前在线课程平台建设速度较快，但围绕推荐机制的组织协同、责任闭环与持续反馈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此种深层原因表明，优化推荐机制不能只从技术层面入手，更要从教学治理机制层面重构多主体协作关系。

（四）制度供给滞后

从制度层面看，教育场景中的推荐机制已经进入课程实施与学习支持的核心环节，但与之相匹配的透明规范、标签治理、评价标准和责任边

界建设仍相对不足。平台采集学生行为、分析退出风险并推送差异化内容，实质上已经影响学习机会分配和课程体验结构。若缺少明确制度约束，就容易使推荐逻辑长期围绕效率指标自我优化，而较少接受来自公平性、开放性和主体权利等方面的审视。

与此同时，当前课程评价仍较多聚焦完课率、满意度和阶段成绩等显性结果，对推荐多样性、认知拓展度、课程修正响应度和干预有效性等过程指标关注不足。评价导向的单一化，使平台和课程团队更容易围绕“减少退出”“提升留存”进行局部优化，而缺乏主动纳入认知开放和学习发展维度的内在动力。前文所述治理规范滞后，正是制度供给未能及时覆盖新型教学场景的具体体现。

从本质上讲，在线课程个性学习已不再只是平台功能升级问题，而是教育数字化治理问题。若制度供给跟不上技术应用节奏，推荐机制便可能长期处于“能用但未必规范”“有效但未必合理”的状态。由此可见，破解信息茧房推荐困境，必须同步推进制度更新、评价改革与责任机制完善（表1）。

表1 在线课程推荐困境与治理路径模型

主要困境	表征现象	演化后果	作用机制	调控路径
目标定位	推荐偏向	学习目标	指标过度依	重构发展导向的
失衡	熟悉内容	逐渐被弱化	赖留存与点击	推荐目标
标签建构	行为标签	学习空间	静态画像压制	构建可演化的
固化	持续强化	被路径锁定	学习动态变化	课程图谱
课程供给	内容趋向	高阶知识	以退出风险反向	保持梯度与拓展
收缩	低难与碎片化	逐步被边缘化	压缩课程结构	并存供给
协同反馈	数据难以	干预行为	平台与教师之间	建立数据-教学
不畅	转化为教学	缺乏针对性	断层明显	联动闭环

五、优化路径对策体系构建

（一）明晰育人导向，夯实个性学习的发展基础

优化在线课程中的推荐机制，首先需要在目标层面完成根本校准，即将个性学习由偏好迎合式分发转向服务学生发展的教学支持机制。此一路径主要回应目标定位失衡和效率逻辑偏强的问题。课程平台在设计推荐规则时，不应只围绕点击、停留和退出概率进行优化，而应把课程知识结构、能力培养要求和学习进阶目标纳入推荐逻辑之中，使推荐成为促进发展而非固化偏好的工具。

在具体实施上，应建立课程目标与推荐目标之间的映射关系。对于基础薄弱或退出风险较高的学生，平台可以推送更具支持性的内容，但此类内容仍应与课程主线、关键知识点和能力目标保持连续性，不能因为追求短期留存而长期停留在低层次供给。对于学习状态较稳定的学生，则应适度增加高阶任务、延展资源和跨主题内容，使推荐机制始终保留向更高层次引导的功能。

同时，课程团队应在推荐系统中嵌入发展性约束，明确区分“当前适配”和“长远发展”两个维度。推荐既要回应学生眼前的学习障碍，也要承担引导其逐步突破舒适区的职责。通过在目

标体系中重构育人导向, 个性学习才能摆脱单纯围绕留存率运转的局限, 在精准支持与认知拓展之间形成更有教育意义的平衡。

（二）优化课程图谱，增强退课监测的教育解释力

面对标签固化与教育解释不足的问题, 应以课程图谱优化为抓手, 提升退课监测与推荐机制的教育解释能力。现有研究已围绕学生实体、退课行为与课程视频节点之间的双边知识图谱展开实践, 为识别退出断点与预测退课概率提供了有力支撑。后续优化的重点, 应从“是否能够建模”转向“如何更好解释行为与课程之间的关系”。

具体而言, 应将课程图谱从单纯的行为连接图谱拓展为兼具知识结构、任务类型、难点分布、表达方式、互动支持和反馈机制的综合图谱。退出断点不应只被理解为某个时间位置的异常, 而应与具体知识点、认知负荷、任务安排和支持节点形成语义关联。如此, 平台才能更准确地区分学生退出究竟源于理解障碍、节奏失衡、兴趣偏差还是支持不足, 从而为后续推荐和课程修正提供更可靠依据。

此外, 图谱优化还应坚持动态画像原则, 避免静态标签长期固化学习机会。学生的兴趣、能力和投入状态始终处于变化之中, 平台应根据持续更新的学习数据和反馈对画像进行修正。通过将行为数据、课程语义与教学判断更深度地联通, 课程图谱才能真正承担起教育诊断功能, 使退课监测从简单识别走向可解释、可转化的精准支持。

（三）引入探索性推荐，缓解熟悉化推送导致的认知收缩

要真正打破信息茧房, 仅靠优化既有匹配机制并不足够, 还必须在推荐系统中主动引入探索性推荐逻辑。此一路径主要回应课程供给收缩和标签建构固化等问题。若平台始终只围绕既有偏好推送内容, 学生获得的支持虽然更加熟悉, 却未必更加有利于成长。探索性推荐的意义, 就在于在保障基本适配的同时, 有意识地为学生保留接触新知识、新观点和新任务的机会。

在实施上, 可采用“适配性推荐与拓展性推荐并行”的组合框架。平台在推送与当前学习状态高度相关资源的同时, 应同步提供一定比例的延展性材料、跨主题内容和更具思考深度的问题任务。此类内容不宜过量, 以免增加不必要负担, 但也不宜缺失, 否则推荐系统将长期封闭在既有

偏好循环中。对于退课风险较高的学生, 探索性推荐可采取小步推进、弱负荷渗透和分层呈现的方式, 使拓展与支持同步发生。

更为重要的是, 探索性推荐不应完全由系统自动决定, 而应与教师专业判断相结合。教师最了解课程主线、核心目标和学生可能需要突破的关键环节, 因此平台应赋予教师适度配置推荐类别、调整推送时机和设置难度梯度的权限。通过制度化引入探索性机制, 个性学习才能在降低退出风险的同时避免认知空间过度收缩。

（四）强化协同闭环，推动平台分析与教学干预深度联动

面对协同反馈不畅与机制薄弱的问题, 必须从教学治理角度重构平台、教师、学生与管理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此一路径的核心, 不在于增加行政性环节, 而在于形成明确分工、顺畅衔接和持续反馈的协同闭环。平台应负责数据采集、图谱更新、风险识别和结果可视化, 教师应负责课程诊断、教学调整和个体支持, 学生则通过反馈与选择参与推荐修正, 管理者则承担制度统筹与资源协调职责。

在具体推进中, 平台输出不应停留于抽象标签和复杂指标, 而应尽量转化为教师可理解、可操作的课程诊断信息。例如, 可提示某一章节在哪些时段退出集中、可能与哪些知识点或任务节点相关, 以及适合优先调整的教学环节。此种输出越贴近教学决策, 教师介入的有效性就越高, 推荐偏差也越容易被及时校正。教师则应将课程观察、学生表现和教学判断及时反馈给平台, 使系统不至于长期只依赖历史行为数据运行。

与此同时, 应建立学生参与的反馈机制, 使学生能够表达对推荐内容、学习负荷和支持方式的真实感受, 并在必要时对推荐倾向进行适度调节。通过平台、教师、学生和管理者多方联动, 退课监测、推荐支持和课程修正才能形成往复反馈, 逐步实现从行为识别到教学干预再到系统优化的完整闭环。

（五）健全多元评价，促进推荐机制与课程改进协同迭代

若要防止推荐机制长期被完课率、点击率和退出率等单一指标牵引, 还需在评价体系层面引入更加多元的考量维度。此一路径主要回应制度供给滞后和效率导向偏强等问题。评价导向决定改革方向, 若评价始终围绕短期留存展开, 平台

和教师便难以主动兼顾认知拓展、课程完整性和学习发展深度。

因此,在线课程评价应在传统结果指标基础上,增加对推荐多样性、课程修正响应度、干预有效性、认知拓展度、学生体验改善度和教师使用成效等过程性指标的考察。平台不应只被要求提高匹配率和降低退出率,还应被要求说明推荐是否过度集中于同类内容,是否压缩了学生的知识接触面。课程团队也不应只围绕完课率变化开展总结,而应分析高频退出点修正后是否真正改善了理解难点、任务节奏和学习支持质量。

此外,评价机制还应强化阶段性复盘和持续追踪。围绕退出断点、推荐效果和教师干预措施,可以建立学期中的多轮评估,对不同阶段的课程运行状况进行比较分析。如此既可避免一次性结果替代整体判断,也能为平台模型、课程内容和支持方式的持续优化提供依据。多元评价体系的建立,有助于推动个性学习从单一留存导向走向发展导向和质量导向。

(六) 完善制度规范,构建透明可调的推荐治理生态

在目标、图谱、协同和评价逐步完善的基础上,还需通过制度建设为推荐机制提供长期稳定的治理边界。在线课程中的个性学习与推荐支持,已经实质影响学生所接触的内容范围、学习路径和认知机会,因此必须建立与教育场景相适配的透明规范、标签治理、数据边界和责任机制。只有明确运行规则,推荐机制才能在促进学习的同时避免演化为新的不透明控制方式。

具体而言,平台应向学生和教师清晰说明推荐服务的存在、基本依据和作用方式,使推荐不再完全处于黑箱状态。与此同时,应提供适度的非个性化选项或推荐偏好调节功能,使学生在必要时能够扩大内容接触范围,防止长期被动接受单一路径推送。对于画像标签的生成与使用,也应建立动态修正、内部审查和边界约束机制,避免标签长期固化并对学习机会造成不合理限制。

从长远看,推荐治理生态还应将数据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教师使用规范、平台责任追溯和课程团队参与机制统一纳入制度框架。此种制度建设不仅有助于增强学生对平台的信任,也能为教师实施精准教学提供更稳定、更规范的支撑条件。通过制度规范的持续完善,个性学习才能真正建立在透明、可调和可改进的治理基础之上。

六、实施保障或实践推进建议

前述路径能否真正落地,关键在于是否形成与之配套的实施保障体系。首先,应在学校层面建立统筹推进机制,将退课监测、课程图谱建设、推荐支持和精准教学改革纳入统一规划。相关研究方案已设置较为明确的阶段安排,包括系统设计、试点部署、反馈收集和持续优化等内容。此种安排说明,个性学习与推荐优化不能依靠零散尝试,而需在时间进度、任务分工和资源配置上形成连续性设计。

其次,应完善资源供给与队伍支撑。相关研究经费安排已涉及设备购置、调研交流、专家咨询和成果形成等项目,表明此类改革需要技术条件、专业支持与持续投入。因此,在推进退课监测视角下的个性学习时,学校既要重视平台能力建设,也要加强教师培训、课程诊断指导和数据解读支持,帮助教师逐步形成将行为数据转化为教学改进依据的能力结构。

再次,应重视试点验证与动态修正。平台上线并不等于改革完成,推荐机制必须在真实课程运行中接受检验。学校可选择具有代表性的课程开展阶段性试点,通过对退出断点、推荐效果、学生反馈和教师调整情况的连续追踪,不断修正画像偏差、优化课程图谱和完善干预机制。通过建立试点、复盘、迭代和推广相衔接的推进模式,前述路径方可由研究设想逐步转化为具有持续效能的实践体系。

七、结论

本文以退课监测为视角,系统分析在线课程个性学习中的信息茧房推荐困境,指出当前存在目标失衡、标签固化、供给收缩、协同不畅与治理滞后等问题,其根源在于效率导向偏强、教育解释不足与制度机制不完善。为避免个性学习滑向偏好闭环与认知收缩,文章提出明晰育人导向、优化课程图谱、引入探索性推荐、强化协同闭环与完善制度规范等路径,推动退课监测、推荐支持与课程修正形成联动,在降低退出风险的同时保留认知拓展空间,并将推荐问题由技术议题转化为教学治理议题,为在线课程高质量发展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班启敏,吴雯,胡文心等.2022.基于学习者知识和性格的个性化课程推荐.华东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J]:87-101.

- [2]陈芮, 李飞, 王占全. 2023. Prefix-LSDPM: 面向小样本的在线学习会话退出预测模型.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J], 49: 754-763.
- [3]高雪, 蒋晓. 2022. 分布式认知视角下在线教育平台设计策略. 包装工程 [J], 43: 365-371.
- [4]韩锡斌, 陈香妤, 刁均峰等. 2022. 高等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核心要素分析——基于学生和教师的视角. 中国电化教育 [J]: 37-42.
- [5]黄昌勤, 涂雅欣, 俞建慧等. 2021. 数据驱动的在线学习倦怠预警模型研究与实现. 电化教育研究 [J], 42: 47-54.
- [6]匡容, 杨振国, 刘文印. 2020. 基于多重因素的个性化学习推荐系统. 计算机应用研究 [J], 37: 183-187.
- [7]刘桐, 顾小清. 2022. 以学习分析技术理解学习失败——基于在线课程退课行为的视角. 开放教育研究 [J], 28: 93-101.
- [8]刘玉萍, 徐学福. 2022. 服务大规模个性化教学的制度建构逻辑. 电化教育研究 [J], 43: 40-46+69.
- [9]吴娟, 陈蕊, 吴磊等. 2023. 混合场景下阅读投入的多模态表征与预警研究. 电化教育研究 [J], 44: 90-98.
- [10]叶俊民, 尹兴翰, 于爽等. 2025. 生成式人工智能赋能学习分析: 价值内涵、实践框架及发展路向. 电化教育研究 [J], 46: 86-92.
- [11]朱红涛, 李姝熹. 2021. 信息茧房研究综述. 图书情报工作 [J], 65: 141-149.
- [12]朱永海, 张佳鑫, 韩锡斌. 2025. 基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个性化学习新形态. 电化教育研究 [J], 46: 58-64.

学历贬值现象的网络舆情分析

刘心怡¹

(1.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与互联网传播的迅速发展, 学历贬值现象成为社会舆论场中备受关注的话题之一。公众普遍感受到高学历群体在就业市场中的竞争优势下降, 从而引发了广泛的焦虑与讨论。本研究基于微博与抖音平台的相关评论数据, 探讨了“学历贬值”话题下公众舆情的核心焦点与社会心理。研究发现, 公众对学历贬值的讨论集中于“原因—影响”两大主线, 原因维度包含就业压力、高校扩招、供需失衡三类要素, 影响维度涵盖个人焦虑、教育投入、经济负担、学历倒挂四项表现。公众普遍认为, 学历贬值是高等教育结构性膨胀与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结果, 体现了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脱节。为应对公众担忧与教育困境, 本研究提出应从教育质量保障、产教融合、就业指导、经济负担缓解及公众认知引导五个方面入手, 以期实现学历价值与社会发展的再平衡。

关键词: 学历贬值; 网络舆情; 教育改革; 就业压力; 社会心理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41

Analysis of online public opinion on the phenomenon of academic devaluation phenomenon

Liu xinyi¹

¹ Affiliation,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communication, the phenomenon of academic deprecia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topics of great concern in the public opinion field. The public generally feels that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highly educated groups in the job market has declined, which has triggered widespread anxiety and discussion. Based on the relevant comment data of Weibo and Douyin platforms,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core focus and social psychology of public opinion under the topic of "depreci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The study finds that the public discussion on the depreci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focuses on the two main lines of "cause-impact", the cause dimension includes employment pressure, college enrollment expansion, and supply and demand imbalance, and the impact dimension covers four manifestations: personal anxiety, education investment, economic burden, and academic degree inversion. The public generally believes that the depreci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is the result of the structural expansion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social resources, reflecting the disconnect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labor market. In order to cope with public concerns and educational dilemmas, this study proposes to start from five aspects: education quality assuranc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mployment guidance, economic burden alleviation and public perception guidance, in order to achieve a rebalance between academic valu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Keywords: depreciation of academic qualifications; online public opinion; education reform; employment pressure; Social psychology

作者简介: 刘心怡(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通讯作者: 刘心怡

维度	核心要素
原因	就业压力、高校扩招、供需失衡
影响	个人焦虑、教育投入、学历倒挂、经济负担

(表 1: 学历贬值舆情分析框架)

公众对学历贬值的舆情表达,正是在“原因—影响”的双重逻辑中展开:既探讨“为什么会学历贬值”,也担忧“学历贬值会带来什么后果”,这种讨论逻辑既反映了学历贬值作为社会结构性现象的本质,也凸显了其作为心理与文化感知产物的特征。

三、统计分析

利用 NVivo 12 软件对有效评论进行自动化主题编码与手工精细编码后,清晰呈现了公众对学历贬值原因与影响的讨论分布。以下将结合编码数据、典型评论案例,对两大维度展开详细分析。

(一) 关于原因的讨论

公众普遍认为,学历贬值的形成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就业压力、高校扩招与供需失衡三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见表 2)。其中,就业压力以 31.3% 的占比成为最受关注的成因,其次是高校扩招(26.2%)与供需失衡(17.7%),三类因素的编码点合计占比达 75.2%,构成了公众认知中学历贬值的核心成因体系。

维度	要素	编码点	论据举例
原因	就业压力	189	1.“麦当劳面试前面一堆硕士 研究生到底想咋地” 2.“现在送水都要大专学历还要有驾照” 3.“今年硕士毕业,去高校应聘辅导员,一栋楼考场有 600 多个研究生党员”
	高校扩招	158	1.“现在大学生门槛太低了,分低,人多,志愿能填比以前翻几倍的学校和专业……上不上大学都没什么区分了” 2.“20 年前,本科生都已经很多了,我就是 2004 年高考的,全校 90% 以上的本科率” 3.“我现在是大学生但我知道放在二十年前我可能连中专都考不上,所以不是我能力变强了,是他的选拔标准变低了”

维度	要素	编码点	论据举例
	供需失衡	107	1.“时代的趋势了 大学生越来越多 工作岗位越来越少 好的工作和岗位 也都被内部消化了” 2.“2025 年了,中国的资源分配早就已经分配好了,后来人真的难了,除非你比这个人更有能力来接收或者抢夺它的资源,没有这个能力只能是这个人的下级,或者你自己创业,但创业也得要资源所以越到后面人只会越难,现在钱难挣,屎难吃,饱的饱死,饿的饿死,哎 太现实了” 3.“人才饱和,技术岗有限,你以为你技术很好但是比你好的年年都在毕业大哥哪怕你是顶尖的只要你不是唯一,年年都有和你一样的毕业!应届生有补贴你有啥?你只有多要工资少加班,应届生要的少国家还给补贴不仅加班还想把你赶走”

(表 2: 关于学历贬值原因的讨论)

从编码结果与典型评论可以看出,公众对学历贬值原因的认知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向性。在就业压力层面,公众直观感受到用人单位的学历门槛持续抬高,“研究生优先”“硕士及以上”成为许多岗位的基本要求,甚至基础服务类岗位也开始对学历提出要求,倒逼本科生为就业而考研、研究生为竞争而“内卷”,形成“为了就业而深造,深造后就业竞争更激烈”的循环。在高校扩招层面,公众普遍认为高等教育规模的快速扩张是学历贬值的直接推手,扩招降低了入学门槛,使得“大学生”不再稀缺,学历的信号价值被稀释,正如评论所指出的“上不上大学都没什么区分了”。在供需失衡层面,公众清晰感知到毕业生供给与岗位需求的严重不匹配,一方面是每年数百万高校毕业生涌入市场,另一方面是优质岗位数量有限,甚至部分岗位存在“人才过剩”现象,这种供需矛盾直接导致学历作为就业筛选标准的“通货膨胀”。

(二) 关于影响的讨论

相较于对原因的探讨,公众更聚焦于学历贬值带来的各类负面影响,相关评论编码点合计占比更高,其中个人焦虑以 44.0% 的占比成为最核心的影响维度,充分凸显了舆情的情感内核(见表 3)。

维度	要素	编码点	论据举例
影响	个人焦虑	265	1.“我们真的是脱不掉孔乙己的长衫吗？我们真的好难” 2.“刚刚毕业大学生，感觉被监视了，投了 400 份简历已读不回，去摇了奶茶，冲了咖啡，真的没有一份工作能够给我们了，我不会骑电动车不然现在应该在送外卖但不过现在又失业了” 3.“真的看哭了 毕业到现在半个月了 投了不知道多少简历 太难太难了 快结束时候幻想着租房养只小猫 后面发现想要找个工资付得起房租 养的起自己都难”
		164	1.“花了爹妈百来万读了几十年然后在几万人中脱颖而出获得一份月薪 3000 的工作” 2.“贬不贬值不值得？主要的是上不起呀。学费太贵了。而且又有几个能考得上清华和北大？上个好大学。如果能花费这些钱也值。最主要平常的孩子就是 500 分以下的。还要花几十万来培养。到头终究是一场空。父母一辈子的钱。都回馈了学校。孩子下学以后，几千块钱的工作都找不到。就算找到几千块钱的工作，一个月能攒几千呢？这几十万够他攒多少年呢？如果 500 分以下的孩子这些钱够你挣多少年？” 3.“为了让孩子上重点班，200 块 1 节课的补课费，我们夫妻加起来工资都不够付”
	学历倒挂	98	1.“我女儿是金融博士，现在在超市收银。” 2.“视觉传达设计本科毕业，现在在炸薯条” 3.“我一个哥们正儿八经研究生，现在在酒店上班一个月 3500”
	经济负担	142	1.“25 届毕业生，土木工程，在深圳找个收银的工作，挂着店长的职称，在学校收银，暑假还要找暑假工，怕丢人，不敢和家里人说，我大二就不敢找家里要钱了，家里还借了一个，我干兼职帮忙还了” 2.“大家都只看到大学生没工作，昨天和朋友姐姐去找学校为小孩读书，我看到的却是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一个大学读下来基本不下于 10W，大学生多久才能转回来” 3.“父母一辈子的钱都花在我读书上，现在我找不到好工作，连他们养老钱都没法补”

表 3 关于学历贬值影响的讨论

从编码数据与典型评论来看，学历贬值的影响已渗透到个人生活、家庭经济等多个层面。在个人焦虑层面，公众的情绪集中表现为求职受挫后的迷茫、自我价值否定与社交羞耻感，“简历石沉大海”“工资低”“不敢告诉家人”成为高频表述，反映出高学历群体对自身职业预期与现实回报之间巨大落差的难以接受。在教育投入层面，公众普遍对“教育投资回报率”表示不满，认为多年的时间、精力与金钱投入未能获得相应回报，这种“投入—回报”的失衡感进一步加剧了负面情绪。在经济负担层面，教育支出成为许多家庭的沉重负担，尤其是普通家庭，为子女读书耗尽积蓄甚至负债，而子女毕业后的就业状况却未能改善家庭经济，形成“投入高、回报低”的经济困境。在学历倒挂层面，高学历与低技能、低薪酬工作的强烈反差，不仅让个人产生“学历无用”的认知，也动摇了公众对教育价值的信任，进一步放大了学历贬值的负面社会影响。

四、讨论与建议

（一）保障教育质量

公众对学历贬值的普遍焦虑，实质上深层次反映了对教育质量的信任危机。在高等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学历的稀缺性下降是必然趋势，但教育质量的下滑则进一步加剧了学历贬值的负面感知。因此，保障并提升教育质量，是缓解学历贬值舆情、重塑学历价值的核心路径。

强化高校质量监管与分类发展是首要举措。当前我国高校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竞争”问题，部分高校盲目追求规模扩张与学科齐全，忽视了自身定位与特色发展，导致人才培养质量参差不齐。对此，国家应推进“双一流”建设差异化布局，引导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校找准自身定位，避免千校一面。同时，应引入第三方质量评估机构，建立科学、客观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对高校的教学质量、科研绩效、学生就业质量等进行持续跟踪与公开公示，将质量评估结果与资源配置、招生规模等挂钩，形成“以质量为导向”的发展机制。李立国在《研究生教育质量治理现代化路径探析》中指出，第三方评估能够

有效弥补政府监管的不足,提升教育质量评估的专业性与公信力,这一观点为高校质量监管改革提供了重要参考。

完善导师责任制与课程体系改革是提升教育质量的关键环节。教师是人才培养的核心力量,其教学能力与责任心直接影响教育质量。研究表明,教育质量下滑与教师激励机制不健全、教学投入不足密切相关,部分高校教师重科研、轻教学,对学生的指导流于形式。因此,高校应强化教师职业伦理,将师德师风作为导师选聘、考核及激励的首要考量,同时优化教师考核指标体系,适当提高教学业绩在考核中的权重,鼓励教师将更多精力投入到教学与人才培养中。在课程体系方面,应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根据市场需求与行业发展动态调整课程内容,减少理论脱离实际的课程,增加实践性、应用性强的课程模块,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与岗位适配能力。周光礼在《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研究》中强调,课程体系的动态调整是连接教育与市场的重要纽带,能够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解决培养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是提升教育质量的重要支撑。当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存在三大突出问题:一是培养目标同质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不同层次高校的培养方案缺乏针对性,未能根据社会需求精准定位;二是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失衡,过度重视理论知识传授,忽视实践能力培养,导致学生“纸上谈兵”,难以适应岗位要求;三是专业知识与综合素质培养脱节,过于强调专业能力,忽视了学生的沟通能力、创新能力、心理素质等综合素质的提升。针对这些问题,高校应明确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才的培养目标,制定差异化的培养方案;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建立稳定的实习实训基地,推行“理论+实践”的双导师制;同时将综合素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开设心理健康、沟通技巧、创新创业等相关课程,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二) 推进产教融合

学历贬值的核心矛盾之一是教育与产业的脱节,即高校培养的人才与市场需求不匹配,导致高学历人才难以找到合适的岗位,而企业又难以招到符合要求的人才。因此,推进产教深度融合,打通“学业—就业”的通道,是化解学历贬值困境的关键举措。

构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是产教融合的核心内

容。高校应主动加强与行业龙头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的合作,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形成“校企联合、双向共赢”的育人模式。一方面,校企共建实践平台,依托企业的生产基地、研发中心建立高质量的研究生工作站、创新实验室及实训基地,让学生在真实的工作场景中提升实践能力,熟悉行业规范与市场需求;另一方面,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课程设计与教学过程,引入企业导师与行业专家参与课堂教学、课程研发与毕业设计指导,将企业的实际项目、技术需求融入课程内容,使教学更贴近市场实际。陈霜叶在《产教融合与就业质量提升的实证研究》中通过数据分析证明,深度参与产教融合项目的学生,其就业竞争力与岗位适配度显著高于未参与的学生,这为校企协同育人机制的有效性提供了实证支持。

推进科研与产业需求对接是产教融合的重要方向。高校应改变科研与产业“两张皮”的现状,引导教师围绕产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开展科研工作,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与实践项目。同时,鼓励企业参与高校的科研项目,通过共建研发中心、联合申报科研课题等方式,实现科研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促进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这种“科研—产业—教学”的良性循环,既能提升高校的科研水平与人才培养质量,又能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与人才储备,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

完善创新创业支持政策是产教融合的延伸与补充。面对就业市场的激烈竞争,鼓励高校毕业生创新创业,不仅能够缓解就业压力,还能创造新的就业岗位,是应对学历贬值的重要途径。政府应设立专项创新创业基金,为高校毕业生提供创业启动资金、场地支持、税收减免等政策优惠;高校应开设创新创业课程,建立创新创业孵化基地,邀请企业家、投资人担任创业导师,为学生提供项目指导、融资对接等服务。同时,校企联合开展创新创业大赛、创业实训等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业热情,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让更多毕业生从“求职者”转变为“创业者”,拓宽就业与发展渠道。

(三) 加强就业指导

就业指导是连接教育与就业的桥梁,优质的就业指导能够帮助学生正确认识就业市场、明确职业定位、提升就业竞争力,有效缓解因求职受挫引发的学历焦虑。当前我国高校的就业指导工作仍存在针对性不足、全程性不够、实效性不强

等问题,难以满足学生的实际需求,亟需进一步加强与完善。

构建全程化、个性化的就业指导体系是关键。就业指导不应局限于毕业季的短期培训,而应贯穿于整个大学阶段,形成“全程化”的指导模式。从新生入学开始,高校就应开展职业认知教育,帮助学生了解自身专业的就业前景、行业发展趋势,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在大学中期,根据学生的兴趣、特长与职业规划,开展职业测评、职业技能培训等个性化指导,帮助学生明确职业定位,提升专业技能与通用能力;在毕业季,聚焦求职技巧培训、简历制作、面试指导、就业信息推送等核心需求,为学生提供精准化服务。同时,建立“就业导师制”,为每位学生配备专属就业导师,由导师、校友与企业专家共同为学生提供一对一的职业规划指导与就业帮扶,提升就业指导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提升就业指导的专业化水平是重要保障。高校应加强就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选拔具备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专业背景,且具有企业工作经验或就业指导实践经验的教师组成专业就业指导团队。同时,建立就业指导教师培训机制,定期组织教师参加行业研讨会、企业调研、职业技能培训等活动,更新就业指导理念与知识,提升指导能力。此外,高校应整合校内外资源,邀请企业HR、行业专家、优秀校友等开展就业讲座、经验分享会、模拟招聘等活动,让学生直接接触就业市场一线信息,提升求职实战能力。

优化就业服务与信息对接机制是重要支撑。高校应建立专业化的就业服务中心,整合职业测评、就业培训、实习推荐、就业信息发布等多项服务功能,为学生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同时,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建立稳定的就业信息渠道,及时收集并发布优质就业岗位信息,搭建校企招聘对接平台,举办校园招聘会、行业专场招聘会等活动,为学生与企业提供面对面的交流机会。此外,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分析就业市场趋势与学生就业需求,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就业信息推送、职业发展预测等服务,帮助学生精准匹配岗位,提高求职成功率。

(四) 减轻经济负担

家庭教育支出过高是学历贬值舆情中的重要焦点,过高的教育成本加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也提高了公众对教育回报的预期,一旦预期无法实现,就会进一步放大对学历贬值的不满情绪。

因此,减轻家庭教育负担,降低教育投入的“沉没成本”,是缓解学历焦虑的重要途径。

扩大教育资助覆盖面、提高资助力度是核心举措。国家应持续优化高校学生资助政策,进一步扩大国家奖助学金、励志奖学金的覆盖范围与奖励额度,让更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能够获得资助,减轻学费与生活费压力。2024年教育部、财政部已宣布提高国家奖学金与助学金标准,本科生奖学金从8000元提高到10000元,研究生贷款额度提升至2.5万元,此类政策应进一步落实并深化。高校应统筹各类资助资金,整合学校学费提取、社会捐赠等资源,设立专项资助金,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供学费减免、生活补贴、科研补贴等多元化资助。同时,充分发挥研究生“三助”(助教、助研、助管)岗位的作用,适当提高“三助”薪酬额度,让学生在提升能力的同时获得合理报酬,缓解经济压力。

规范教育收费行为、降低非必要教育支出是重要补充。政府应加强对高校收费的监管,规范学费、住宿费等收费标准,严禁乱收费、高收费现象。同时,整治校外培训市场乱象,遏制学科类培训的过度资本化、高收费化趋势,减轻家庭的课外补课负担。高校应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减少不必要的教材费、资料费等支出,通过共享数字资源、开源教材等方式降低学生的学习成本。此外,鼓励高校与企业、社会机构合作,为学生提供免费的技能培训、考证补贴等,降低学生的职业发展成本。

提升教育投入的性价比是根本方向。除了直接降低教育支出,更重要的是提升教育质量与就业回报,让公众觉得“教育投入物有所值”。通过前面提到的保障教育质量、推进产教融合、加强就业指导等举措,提升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与职业发展潜力,提高教育投资回报率。同时,引导公众树立理性的教育消费观,避免盲目追求名校、高价培训等非理性教育投入,根据家庭经济状况与学生实际情况选择合适的教育路径,减少不必要的教育支出。

(五) 引导公众认知

“学历贬值”舆情中负面情绪占主导,部分公众存在“学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等极端认知,这种认知不仅会影响个体的教育选择与职业发展,还可能对社会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政府、高校、媒体等多方主体应协同发力,加强舆论引导,帮助公众树立理性的学历观与职业观。

发布权威解读,澄清认知误区是首要任务。政府与高校应通过官方网站、社交媒体、新闻发布会等多种渠道,发布权威数据与政策解读,向公众客观阐述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必然趋势与学历价值的本质内涵。明确学历的核心价值不在于“稀缺性”,而在于知识积累、能力提升与思维训练,高学历带来的是长期发展潜力而非即时经济回报。同时,通过典型案例宣传,展示高学历人才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实例,以及技能型人才、蓝领工人的成功案例,打破“唯学历论”的认知误区,让公众认识到职业无高低贵贱,成功的路径不止一条。

构建多元评价体系,重塑社会价值观念是核心内容。学历贬值舆情的背后,是“唯学历论”的社会评价体系与单一的成功标准。因此,需要推动社会评价体系从“唯学历”向“唯能力”“唯贡献”转变,提升技能型人才、蓝领岗位的社会尊重度与经济待遇。政府应完善技能人才评价制度与激励机制,加大对技术能手、大国工匠的表彰与奖励力度,让技能型人才有尊严、有前途、有回报;企业应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与薪酬体系,不唯学历论英雄,注重员工的实际能力与工作业绩;媒体应加强对技能型人才、基层劳动者的正面宣传,营造“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社会氛围,引导公众树立多元化的成功观。

加强沟通互动,倾听公众诉求是重要保障。舆论引导不是单向的“说教”,而是双向的“沟通”。政府、高校应建立常态化的舆情回应机制,及时关注公众对学历贬值、教育改革、就业政策等话题的意见与诉求,主动回应公众关切。通过召开座谈会、开展问卷调查、开通留言渠道等方式,倾听公众的声音,将合理的意见与建议纳入政策制定与调整过程中,让公众感受到被尊重、被重视。这种良性互动能够有效缓解公众的负面情绪,增强公众对政策的理解与支持,形成有利于教育发展与社会稳定的良好舆论环境。吴晓波在《学历焦虑的社会成因与疏导机制》中指出,有效的沟通互动是疏导学历焦虑的重要手段,能够促进公众情绪的理性释放,避免负面情绪的累积与扩散。

五、结语

“学历贬值”网络舆情深刻折射出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普及化转型过程中,教育体系、就业市场与社会心理之间的深层矛盾,也反映出公众对教育公平、就业机会、阶层流动的多重期待。舆情中包含的焦虑、不满与批评,既是社会问题的客观镜像,也是一种建设性的民意反馈,为教育改革与社会治理提供了重要的方向指引。

学历贬值的本质不是学历的“无用”,而是学历价值实现机制的失衡,是教育质量、市场需求与社会评价体系之间的不协调。面对这一现象,我们既不能简单否定高等教育的价值,陷入“读书无用论”的误区,也不能忽视舆情背后的真实问题,采取回避态度。解决学历贬值引发的一系列问题,需要多方面协同发力:在制度层面,通过保障教育质量、推进产教融合、加强就业指导、减轻经济负担等举措,优化教育生态与就业环境,实现学历价值与社会发展的再平衡;在文化层面,通过引导公众认知、构建多元评价体系,重塑社会价值观念,缓解“唯学历论”带来的焦虑。

教育的根本使命不在于制造文凭,而在于培养可持续成长的社会人才;学历的核心价值不在于作为就业的“敲门砖”,而在于成为个人发展的“垫脚石”。相信通过制度改革与文化重塑的双重努力,能够有效缓解学历贬值引发的社会焦虑,让学历重新成为知识、能力与社会信任的象征,让高等教育真正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的进步。

参考文献:

- [1] 张帆.智媒时代下网络舆情的特征、困境与治理策略[J].新闻前哨,2023(9):31-33.
-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5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https://www.cnnic.net.cn/n4/2024/0829/c88-11065.html>.
- [3] 研究生扩招会导致学历贬值吗[N].北京日报,2020-12-23(020).
- [4] 李娇艳.大学生就业焦虑现象的质性研究[D].导师:张俊宗.西北师范大学,2025:11-12.
- [5] 杨洋.社交媒体中小镇青年社会焦虑的媒介话语研究[D].导师:蔡卫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2025:17-20.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变化研究

陈丹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 湖北 430000)

摘要: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与内容分析的方法, 系统梳理了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功能演变、研究现状及研究存在问题。研究发现, 教材插图的功能经历了从“双基”时期的知识图解工具, 到“新课改”时期的生活化学习情境创设者, 再到“核心素养”时期作为立德树人综合育人载体的深刻转变。当前研究多集中于插图的功能分类、教学应用与风格审美, 且主要从教材编写与教师教学视角出发, 缺乏对学生认知过程与使用效果的实证考察, 研究方法的理论深度与实证基础亦有不足。未来应加强学生主体视角的研究, 结合认知理论深化插图与学习机制的融合, 推动跨版本、跨文化比较及数字化插图形态的探索, 以推进数学教材插图前进, 更好地服务于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培育。

关键词: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 插图; “双基”; “新课改”; “核心素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43

A Study on the Changes in Illustrations of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ChenDa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Hub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functional evolution, research status,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illustrations in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s published by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function of textbook illustrations has undergone a profound transformation from being a knowledge illustration tool during the "dual foundation" period, to being a creator of life oriented learning situations during the "new curriculum reform" period, and then to being a comprehensive carrier of moral education and nurturing during the "core literacy" period. Current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the 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teaching application, and aesthetic style of illustrations, and mainly start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extbook writing and teacher teaching, lacking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es and usage effects. The theoretical depth and empirical basis of research methods are also insufficient. In the future, we should strengthen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tudent subjectivity,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llustration and learning mechanisms based on cognitive theory, promote cross version and cross-cultural comparisons, and explore digital illustration forms to advance the development of illustrations in mathematics textbooks and better serve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mathematical core literacy.

Keywords: People's Education Press Primary School Mathematics Textbook; Illustration; Basic Knowledge and Basic Skills; New curriculum reform; Core competencies

作者简介: 陈丹 (2001—), 女, 研究生, 专业领域: 教育学;

一、引言

1、研究背景

2016年,习近平主席在全国高等院校思政教育大会中强调:“教材的构建对于培养人才至关重要。我们需要建立一套怎样的教材系统?关键在于哪些教材应该被使用并传达何种价值观,这直接反映了国家的立场和权力[1]。”2017年9月,我国中小学校正式全面启用三科统编教材。意识形态属性强是统编教材最大的特点,正是其特点确保了基础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给基础教育的发展指引了正确的方向,具有极其重要而特殊的育人功能。2020年初《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以下简称《规划》)对我国各学段各学科教材建设做出了系统设计,强调教材质量[2]。教材建设处于国家战略地位,深刻理解教材建设属于国家事权。然而前几年,网络上对第十一版小学数学教科书的封面和插图提出了质疑,这引发了社会各方对教科书品质的忧虑。为此,2022年5月下旬,教育部着手了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重新绘制工作,历经反复审核校对,最终经国家教材委员会审核通过,确保学生在新学期到来时及时拿到新教材。由此可见,教材中的插图不仅仅起艺术装饰作用,而是作为教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小学数学新知识的载体,肩负着传递数学知识和思想的重任。2022年,教育部发布《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2022年版)》(以下简称“新课标”)明确指出插图素材应尽可能地选择接近学生现实生活,选用与现实生活有关的图片和图形,利于学生在熟悉的生活中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教材所选择的素材应尽量,直观形象,图文并茂,以使学生感受到数学的价值和趣味,教材插图依旧备受重视[3]。此外,新课标首次指明了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由三方面构成:一是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

二是用数学的思维观察现实世界;三是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以下简称“三会”),高度重视数学学科与实际生活的联系[3]。因此,数学教材插图接近现实生活能够将数学教学与学生的实际生活联系起来,成了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的重要资源。

本研究通过对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的插图时间维度的变化进行分析回答三个问题:一是插图在数学教材中发挥的功能;二是不同时期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变化;三是数学教材插图未来应如何改进。

2、概念界定:数学教材中的插图

“插图”的拉丁文“illustratio”意为给予色彩使之被看见,其英文“illustration”意为说明、解释,指文章中的插图、图解、说明和例证[4]。弗朗瓦梭认为插图就是图示、图画、资料、照片、历史符号标识等。除了插图说明,所有不属于文本的东西都是插图的一部分[5]。《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插图的解释是插在文字中间帮助说明内容的图画,包括科学性的插图和艺术性的[6]。《辞海》(第七版·彩图本)对插图的解释为附在书刊中的图片,有科学插图和艺术插图两种类型,对正文作补充说明或仅供艺术欣赏,所在位置为正文中间或插页[7]。

本研究数学教材插图均取自人教版小学数学课本,指的是小学数学教材中蕴含数学知识、培养能力学生的图。

二、我国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功能演变与研究现状

1、阶段划分

结合课程改革历程,将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功能演变划分为三个时间阶段:“双基”、“新课改”、“核心素养”时期。具体内容见表1。

表1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演变

阶段维度	“双基”时期(约 1950s 至 21 世纪初)	“新课改”时期(约 2000s-2010s)	“核心素养”时期(约 2020s 起,尤以 2022 年重绘版为标志)
核心理念	强调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	注重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倡导生活化与探究性学习。	聚焦数学核心素养,强调文化自信、立德树人;“三会”
核心功能	知识图解工具:辅助说明数学概念、演示运算过程,功能直接单一。	教材“第二语言”,设计生活情境、激发学生兴趣、引导探究。	综合育人载体:承载知识传递、文化浸润、价值引领、审美培养等多重使命。

内容与情境特征	内容紧密围绕数学知识本身, 情境简单, 与实际生活联系较弱。	大量设计生活化、趣味化的情境, 强调数学知识与学生经验的联系。	情境设计更注重真实性、时代性和文化性(如展现传统文化、国家成就)。
设计风格与审美	风格朴实, 以准确传达信息为首要目标, 艺术性与审美考量较弱。	风格趋向活泼、鲜艳、卡通化, 注重吸引低龄学生兴趣。	回归中国风的写实画风, 追求精、气、神, 审美上力求展现健康昂扬的面貌。
与文本/教学的关系	附属于文字, 知识的视觉辅助。	与文字深度融合, 是教学过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为核心素养服务, 是启智增慧培根铸魂的关键一环。

2、各阶段特征分析

2.1 “双基”时期：知识本位的直观辅助

“双基”时期, 小学数学教材为了适应上世纪 50 年代至 21 世纪初社会的发展和培养建设人才的需要, 教材内容面向现代化, 注重培养学生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比如, 上世纪 70 年代的《全日制十年制学校小学数学教学大纲(试行草案)》(简称“1978 年大纲”)的教学要求就是使学生理解掌握最基本的数学知识, 能够正确迅速地进行四则计算, 初步了解数学中最简单的思想, 具有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空间观念, 并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日常生活生产中的简单实际问题。同时, 结合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8]。此教学大纲较之过去的大纲对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要求更加全面具体, 并将思想政治教育作为目标之一。

为了配合教材内容, 此时期的插图主要作为抽象数学知识的可视化注解, 仅是为小学阶段的学生理解数学知识或者题目提供帮助, 较少有引导学生进行思考的提示或者插图。例如, 用实物图辅助认识数字, 用线段图分析应用题数量关系, 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理解、加深记忆, 功能相对单一直接。插图的风格多为朴素写实, 图画内容也多偏生活化。如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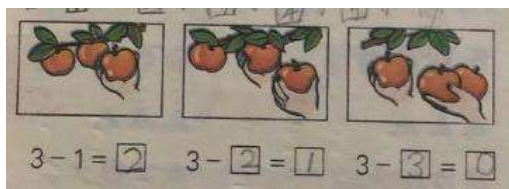


图 1 2000 年版小学数学教科书(试用修订本)第一册插图



图 2 2000 年版小学数学教科书(试用修订本第二册插图

由教材中真实插图可见, “双基”时期的教材插图的主要功能就是帮助小学阶段的学生更好的理解抽象的数学知识和题目, 而且教材中也较少插入有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我国数学历史文化等相关图示与图画。

2.2 “新课改”时期：生活化的学习情境创设者

“新课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作为一个以“三维目标”为核心的特定阶段, 其集中实施和推进的时间大致是从 2001 年至 2017 年, 持续了约 16 年。新课改的核心是“三维目标”, 强调改变过去过于注重知识的倾向,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基于此, 教材中插图的功能得到极大扩展, 成为引导学生进入数学世界的情境地图。插图内容编排更强调与生活实际的联系, 试图让学生在熟悉的情境中发现和解决数学问题, 并设置了丰富的综合实践活动, 旨在降低学习门槛, 激发内在动机。插图的设计更活泼有趣, 更生活化、卡通化。然而, 第十一套教材的插图人物形象被广泛批评为眼神奇怪、缺乏美感、精神风貌不佳, 被认为偏离了大众审美和教材应有的育人导向。该版本教材插图问题在网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与关



注, 教育局、人教社也进行了及时的回应, 表示已着手重新绘制。由于第十一套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的插图完全违背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 推动教材建设标准全面提升, 标志着教材插图的导向正式从“新课改”时期进入“核心素养”时期。

本研究分析中采用的是新课改时期人教社出

版的第十套教材中的小学数学教材。见图 3、4。

图 3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教材封面图



图 4 人教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数学教材插图

如上图所示, “新课改”时期的教材插图相比于“双基”时期更加的卡通活泼, 色彩鲜明, 而且出现大量与学生日常相关的场景, 强调与学生生活实际的联系。更重要的是, “新课改”时期的插图已经有引导学生思考学习的趋势了, 插图不再是简单的注释方便理解, 而是承担了引导学生发现数学问题, 思考数学问题的任务, 比如图 4 中, “谁摸的高”、“这样比对吗”等这种问题可以引导学生进行思考, 加深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深度。

2.3 “核心素养”时期: 立德树人的综合育人载体

我国“核心素养”作为国家层面的课程教学导向, 从 2014 年被正式提出至今, 一直持续并不断深化。因此, 这是一个正在持续进行、方兴未艾的教育改革阶段。在此阶段, 新课标首次明确界定了义务教育阶段数学核心素养的内涵——“三会”

[9]。

这段时期是教材插图功能的一次深刻升华, 它不仅服务于数学学习, 更承载了文化传承、价值塑造和审美教育的使命。在整体风格上追求中国风、时代感、精气神和数学味, 编排的总体思路如下: 一是坚持正确的政治价值取向, 体现党和国家意志; 二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大量融入中国传统服饰、建筑、游戏(如剪纸、围棋)、中国数学历史等文化元素, 坚持中国风格, 展现时代风貌, 融入高铁、航天、冬奥等国家建设新成就, 展现新时代中国青少年阳光向上的精神风貌; 三是遵循儿童认知与身心发展规律, 与学生的日常生活相联系; 四是坚持简洁雅正的主流审美取向; 五是更精准地服务于数学概念, 插图与知识相融, 例如通过天平示意图突出方程的本质——等量关系。见图 5-10。



图 5 人教版数学四年级上册、三年级上册中的插图



图6 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中的插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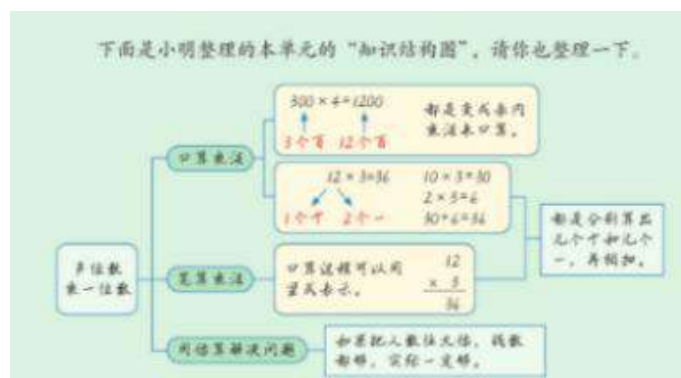


图7 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中的复习导图



图8 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四年级上册中的插图



图9 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四年级上册中的插图



图 10 人教版数学三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中的插图

如上图所示,为了纠正教材插图过度卡通化的错误,重新绘制的教材插图风格呈现中国风、时代感、精气神,强调写实,简洁雅正。一方面,部分插图致力于创设贴近小学生日常的生活场景,将抽象知识具体化、形象化,从而激发学生对数学学科的探究热情。图 5 这类插图不仅服务于教学,部分还蕴含了深刻的德育价值,有助于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另一方面,图 6 这种对话提示类插图在教材中也占有较大比重,这类插图借助人物对话或虚拟机器人提示的形式,或呈现关键信息,或引发认知冲突。在教学实践中,它们不仅能辅助教师准确把握教材脉络、优化教学设计,还能引导学生思考,培养其自主读图与解析题意的能力,为课前预习和课后复习提供有

效支持。图 7 这类的思维导图在“整理与复习”板块中出现,帮助学生清晰的梳理出了本单元的知识,此时插图不再只是简单对知识进行注解,而是塑造学生的数学逻辑思维。图 8 这种有关国家民族的插图有助于开阔学生的眼界,培养学生的民族荣誉感与爱国热情。图 9 是有关中国古代数学故事、历史的图例介绍,通过这种形式穿插在数学教材中,既增加数学文化知识的趣味性与形象性,又让学生感受我国数学的人文底蕴。与往年教材中的插图以卡通形象为主不同,新绘制的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中的插图加入了以相机拍下来的真实图片,是十分直观的实物展示,如图 10,此插图既能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还能培养学生保护动物的意识。

3、研究现状评述与未来研究方向

通过对国内外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对教材演变历程的分析,当前关于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研究已形成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也呈现出若干明显的特征与局限。本节旨在评述现有研究的总体态势,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有可行性的未来研究方向。

3.1 研究现状总体评述

当前研究呈现出以下三个维度的鲜明特点,其演变与我国课程改革及教材建设的进程紧密相连。

表 2 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演变总体评述

研究维度	主要特征与演变趋势	具体表现
研究视角的演变	从工具性辅助转向综合性育人	早期研究多聚焦于插图在认知过程中的辅助功能。 随着“核心素养”理念的提出,研究视角拓展至插图在文化浸润、价值引领与审美培养等方面的综合性育人价值,强调其作为“第二语言”承载立德树人的使命。
研究方法的特征	思辨与经验总结为主,实证量化研究逐步兴起,但仍显不足	大量研究为理论探讨或一线教师的教学经验总结,缺乏理论深度与推广。近年开始出现基于统计分析的量化研究(如对插图功能、颜色、图文关联的统计),以及采用问卷调查、观察法的实证研究,为研究注入了新活力。
核心研究议题	集中于功能分类、应用策略及风格审美三个焦点	沿袭并深化了 Levin、Mayer 等人的经典分类理论,结合本土教材进行探讨。主要从教师“教”的角度,探讨如何利用插图创设情境、突破难点。2022 年教材重绘后,对插图“中国风”、“时代感”、“精气神”与“数学味”的讨论成为热点,关注其如何体现国家意志与主流审美。但是却出现了教育公平问题——“教材城市化”现象。

3.2 现有研究的不足与局限

尽管成果丰硕,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一些亟待

弥补的空白与短板,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学生主体视角的系统性研究严重缺失。绝大多数研究站在教材编写者或教师的立场,探讨插

图的“编排意图”与“教学应用”[10]。学生作为插图的最終使用者,其认知过程、审美偏好、使用策略及插图对其学习效果、情感态度的实际影响,却缺乏深入、系统的实证考察。例如,不同年龄、性别、认知风格的学生如何“读图”、插图如何影响他们的数学问题解决策略,这些问题尚待回答。

应用研究表层化,缺乏与学习机制的深度结合。关于插图教学应用的建议,虽多有提及,但往往停留在“要善于利用”的经验层面。如何基于认知心理学理论(如认知负荷理论、双重编码理论),针对不同类型的数学知识(如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设计并使用相应功能的插图,以优化学习过程的研究尚不深入。有调查指出,教师在实际教学中存在对插图“解读浅显”、“用途受限”等问题,其根源在于缺乏扎实的理论指导。

实证研究与效果评估薄弱。国内研究多以定性分析为主,严谨的、大规模的实验研究与纵向追踪研究非常匮乏。例如,新版教材插图所强调的“中国风”与“写实风格”,是否真正更有利于小学生的数学理解与文化认同?不同类型的插图(如装饰型与解释型)对学习保持与迁移的效果有何差异?这些关键问题仍需通过控制变量实验、眼动追踪等技术手段加以验证。国外虽有类似研究,但文化背景与教材体系差异巨大,结论不可直接套用。

研究视野的广度有待拓展。首先,现有研究多集中于对单一版本教材的静态分析,缺乏跨版本(如人教版、北师大版等)、跨学段乃至国际比较的动态与比较研究,难以揭示教材插图发展的普遍规律与本土特色。其次,在数字化教育背景下,对动态插图、交互式插图等新型媒介形式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白。最后,对教材插图创作机制、评审流程等“幕后”环节的学术关注不足。

三、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人教版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功能演变、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主要结论如下:

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功能经历了从“双基”时期的知识图解工具,到“新课改”时期的生活化学习情境创设者,再到“核心素养”时期立德树人的综合育人载体的演变过程。插图逐渐从附属的视觉辅助发展为深度融合文本、承载文化浸润与价值引领的关键教学资源。

当前研究主要集中在插图的功能分类、教学应用策略及风格审美等方面,视角多从教材编写

与教师教学出发,缺乏对学生主体认知过程与使用效果的深入实证考察。同时,现有研究在方法论上以思辨和经验总结为主,实证研究与效果评估较为薄弱,尤其缺少基于学习机制的深度应用分析和跨版本、跨文化的比较研究。

未来研究应在以下方面深化:加强对學生视角的系统性考察,结合认知理论开展插图设计与学习机制的融合研究,推动实证研究与效果评估,并拓展研究视野至数字化插图形态及教材创作评审机制等方面,以促进教材插图在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中发挥更大作用。

参考文献:

-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教材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就《全国大中小学教材建设规划(2019-2022年)》答记者问[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001/t20200107_414566.html. (2020-01-07) [2022-10-26].
- [2]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强化国家事权,确保教材质量[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moe_2082/zl_2020n/2020_zl02/202001/t20200108_414669.html. (2020-01-08) [2022-10-26].
- [3]张晓天,张丹.小学数学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例式解读[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22:4.
- [4]徐进.插图视觉时代[D].中央民族大学,2004.
- [5]弗朗瓦索—玛丽.热拉尔(比):为了学习使用的教科书[M].汪凌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240.
- [6]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1.
- [7]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第七版.彩图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20:438.
- [8]课程教材研究所.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98.
- [9]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的通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531.htm. (2022-04-21) [2022-04-17]
- [10]杨思.小学数学教材插图的教学应用研究[D].湖南理工学院,2023.

我国双减政策工具选择与组合逻辑研究——基于 2018-2025 年政策的文本分析

董宁宁

(中南民族大学, 武汉 湖北 430000)

摘要:我国于 2018 年至 2025 年间发布了一系列围绕“双减”主题的教育政策文本, 本文以其中典型政策文本为研究样本, 采用文本分析法, 在规范梳理了条文内容的基础上, 重点解构了核心政策工具的类型谱系, 并进一步考察了不同工具间的协同机制及其对构建可执行政策体系的具体作用。研究显示, 单一政策工具在实际执行中存在明显的效能边界, 往往难以独立支撑改革目标的实现, “双减”政策的真正落地, 本质上依赖于多种工具的合作协同, 各类工具并非孤立运作, 而是遵循特定的组合逻辑相互耦合, 共同构成了严密的政策执行系统。鉴于此, 本文并未止步于对政策工具选择偏好的表层描述, 而是试图深入剖析其背后的组合规则, 旨在透过这一视角, 来揭示国家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 潜藏于政策文本背后的深层治理逻辑与宏观战略意图。

关键词: 双减政策; 政策工具; 组合逻辑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47

A Study on the Selection and Combination Logic of Policy Instruments for China's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A Textual Analysis Based on Policies from 2018 to 2025

DongNingNing

School of Education, South-Central Minzu University, Wuhan 430074, China

Abstract: Between 2018 and 2025, China issued a series of educational policy documents centred on the “Double Reduction” initiative. Using representative texts as samples and text analysis, this study deconstructs core policy instruments typological spectrum, examines their synergy mechanisms and roles in building an implementable policy framework. Findings show single instruments have effectiveness limitations and cannot independently achieve reform goals. The policy's implementation relies on multiple instruments synergy, which are interlinked by specific combinatorial logic to form a rigorous implementation system. This paper delves into the underlying rules of instrument combination, aiming to reveal the deep-seated governance logic and macro-strategic intentions in n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policy instruments; combination logic

作者简介: 董宁宁(2000—),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

通讯作者: 董宁宁

一、研究背景

我国是教育政策生产的大国,教育如何运行、创新和发展基本是依靠政府颁布的政策驱动、控制和调节。借由政策工具杠杆来推动教育改革,已成为当下中国政府治理教育的鲜明标识。步入新时代,立德树人被确立为根本任务,高质量发展成为核心导向,然而,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存在的“双重负担”顽疾,不仅掣肘了学生的全面成长,更异化为加剧家庭焦虑的社会痛点,成为亟待破解的结构性难题。我国自2018年起便开始了减负政策的试探性探索,直至2021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重磅出台,才真正标志着“双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性工程。政策执行中政策工具作为目标落地的载体,其选型是否科学、组合是否适配,更是决定政策效能的关键变量,但在当前现有学界成果里,关于“双减”的研究多滞留于实施现状描摹、问题对策罗列或效果评估层面。相比之下,对于政策工具选择背后的深层逻辑、组合特征的动态演化及其内在机理的系统性解构,尚显薄弱,甚至存在明显的研究盲区。鉴于此,本研究将视线聚焦于2018-2025年间我国“双减”相关政策文本,试图跳出单一工具描述,转而深入探究政策工具的选择偏好与组合逻辑,研究严格遵循“构建编码体系—标准化编码与信度检验—数据统计与深度阐释”的科学范式,保障在方法论上夯实结论的可靠性,填补研究缺口,透过政策工具的微观视角,透视国家在教育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战略意图,从而为优化“双减”政策配置、提升治理效能提供更具解释力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二、问题提出

(一)为什么实行双减政策

“双减”政策是我国针对义务教育阶段教育生态失衡问题推出的战略性公共教育治理政策,其全称为《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21年7月正式印发,后续通过多部门配套政策文件的持续补充与完善,形成了覆盖政策制定、执行、监管与评估的完整实施体系,是调整教育领域的社会问题和利益关系的公共政策。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减负政策是专门为减轻学生负担而制定的教育政策,目的在于减轻学生的过重负担。而如今“双减”的政策属

性已发生质的跃迁,不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减法”操作,而是以“减负”为破局点,同步驱动教育质量提升与生态系统优化的双向变革。这一改革将2021至2025年锁定为政策密集攻坚与深化的关键窗口期,其核心意图在于通过精准施策,强力纠偏长期困扰义务教育的“内卷化”困境,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呼应国家长远的人才培养战略需求。

(二)政府政策工具为什么要组合搭配

任何一项政策都是目标与工具的有机统一,工具是达成目标的基本途径。政策科学的创始人哈罗德拉斯韦尔(H.D.Lasswell)曾言,政策是“一种含有目标、价值与策略的大型计划”。基于对2018至2025年间“双减”政策文本的编码,研究发现单一政策工具在治理实践中常陷入“独立工作”的困境,或因效能边界受限,或因路径依赖僵化,难以独自承载教育减负这一复杂系统工程之重量。对此,政府倾向于采取组合策略,试图通过多元工具的耦合联动激发政策合力。所谓“组合逻辑”,实则是对这种搭配机制的深度解构,究竟是通过功能互补来填补单一工具的结构短板,还是通过层级递进来达到“长效治理”的梯度化路径。这一逻辑背后反映出的是政府在“短期见效”的政治压力与“持续优化”的长远愿景之间进行的微妙权衡。换言之,探究“双减”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本质上是在审视政府如何在教育治理的复杂场域中,动态平衡“快速破局”的紧迫性与“长期引导”的战略定力。这也正是本研究试图切入的关键视角,旨在厘清“双减”政策的深层治理逻辑与实施成效提供新的解释框架。

三、研究方法 with 工具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分析方法,借助SPSS 27.0软件开展多维度数据统计分析。

1.描述性统计

使用SPSS 27.0进行分析各编码维度的频率与占比,进而把握“双减”政策编码的整体分布特征。

2.内容分析法

本研究以2018-2025年“双减”政策文本为基石,搭建多维编码体系,通过严格的标准化编码与信度检验,完成从文本到数据的量化转译。

研究以融合量化透视与质性深描的双重视角展开,并对数据的深层交互进行解读,旨在剥离政策话语的

表层伪装,提炼其内在的治理逻辑与演化轨迹,最终为理解“双减”政策的复杂生态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支撑。

3.基于 NVivo12 的单人编码及重测信度分析方法

针对开放式问卷所获的非结构化文本,本研究依托 NVivo12 平台构建了系统化的质性编码。为规避主观偏差并夯实数据基础,研究在首轮编码完结两周后,盲选 20% 的样本子集进行独立性复编。随后,引入 Cohen's Kappa 统计量对编码者间的一致性进行量化裁决。实证数据显示,最终 Kappa 系数定格于 0.85 ($P<0.05$),这一数值不仅显著超越了内容分析法的信度阈值,更确证了编码体系的内部稳健性与结果的可信赖度,为后续的深层意义挖掘奠定了坚实的实证基石。

(二) 研究工具

1.工具选择

20 世纪 80 年代西方公共政策领域开始注重政策工具研究,在 20 世纪 90 年代逐步兴盛。迈克尔·豪利特(Michael Howlett)与 M. 拉米什(M.Ramesh)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根据政府在提供公共物品和服务中的介入程度,将政策工具分为 3 大类别,为强制性、混合型、自愿性。陈振明对国内外学者对政策工具概念进行梳理,将政策工具总结定义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方式和实现机制。而在教育政策方面,他认为强制性工具如义务教育制度、办学标准、教师资格认证等,具有强制性和权威性;混合性工具如教育财政补贴、学费减免、助学贷款等,兼具政府引导和市场参与的特点;自愿性工具如教育捐赠、民办教育、社区教育等,以自愿参与为基础。由于对政策工具的分类依据的是政府在公共产品与服务供给中的介入程度,与本研究通过政策工具来探讨双减政策文本相符,同时相较于其他政策工具分类,豪利特与拉米什所提出的政策工具分类综合性较强,分类较细化、明确,有助于细致剖析我国双减政策文本。故以此框架进行编码来分析我国双减政策执行过程中工具的选用情况以及政策颁布的效力。

2.政策文本编码

本研究借助 NVivo12 和收集梳理 2018-2025 年间政府颁布的对基础教育“双减”改革产生重要影响的法律法规、实施意见、工作通知、指导纲要等政策文本,对筛选出的专项“双减”政策文本进行分类筛选,按照“政策编号—条款序号”进行编码,形成了基于政策工具的“双减”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编码表见表 1,其中一级工具为核心类型,二级工具为具体实施手段,两者形成宏观框架到微观措施的层级关系。并对政策文本中的具体条款内容采用政策工具分析方法,将其分别归入强制性工具、混合型工具、自愿性工具等不同政策工具类型,系统梳理出 2018-2025 年我国“双减”政策在不同发展阶段的工具选择偏好与使用特征,为后续深入分析“双减”政策工具的组合逻辑与实施效果奠定基础。

属性	具体分类
政策工具 (一级)	1 强制性 2 混合型 3 自愿性
政策工具 (二级)	1 禁令类, 2 审批管制类, 3 处罚惩戒类, 4 监管监测类, 5 宣传引导类, 6 资源支持类,
政策发布份	2018-2025
双减目标	1 作业减负和培训规范, 2 教育生态优化, 3 学生全面发展与家长负担缓解

表 1

四、政策选择与分析

(一) 政策文本选择

本文以 2018-2025 年为时间区间,以“双减”“作业减负”“校外培训规范”为主题词,在教育部官网、中央人民政府网检索与双减相关的全国性政策文件。对于几经修订的政策,均选取 23 份政策最新版本作为分析文本,选用《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等核心政策的最新修订文本,构建本研究的政策文本分析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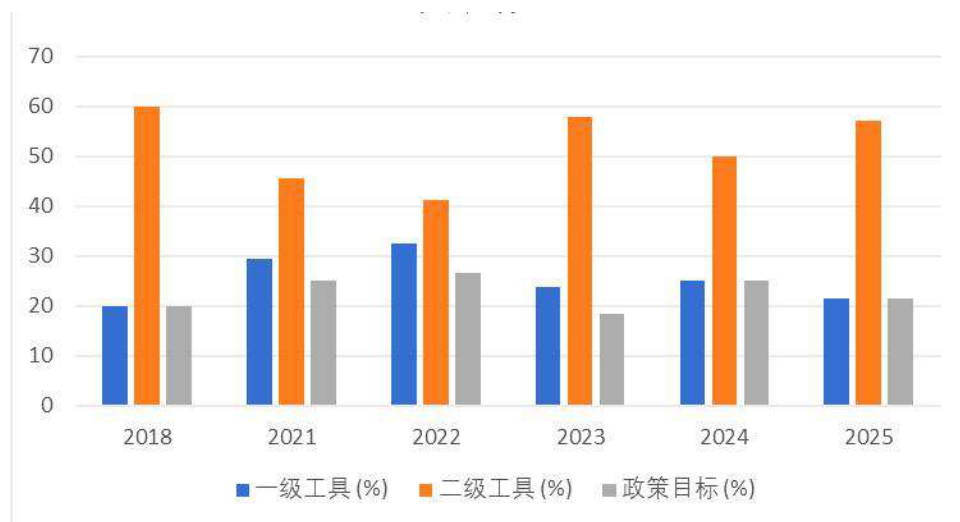


图 2

图 2 可以看出 2018 至 2025 年间政策工具配置的动态演进轨迹，各类工具的年度分布并非线性增长，而是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震荡特征。

一级工具的配置权重经历了从 2018 年的 20% 起步，攀升至 2022 年的峰值 32.4%，随后回调至 2025 年的 21.4% 的过程，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倒 U 型”发展曲线。可以看出政策重心在中期（2022 年前后）显著向强干预与刚性规制倾斜，试图通过高强度的行政手段破局，而后期的占比回落，则暗示了治理逻辑正从单一的“高压管控”向多元协同或长效机制过渡，标志着政策工具组合进入了优化重塑期。

二级工具在整个观测期内稳居政策工具重要地位，其配置比重长期高位运行。从 2018 年的 60% 起始，即便在干预强度最大的阶段也未显著偏离，并于 2023 年（57.9%）与 2025 年（57.1%）再度稳步回升。这一持续性的主导态势深刻揭示了混合型与倡导型工具在政策生态中的核心地位，它们不仅是政策落地初期的润滑剂，更在政策深化期（2023 年后）演变为驱动治理转型的关键引擎。图 2 占比的逆势反弹并非偶然，而是标志着治理逻辑发生了深层范式转移，即从依赖行政命令的“单向管控”，加速转向依托价值认同与利益诱导的“软性治理”，通过强化引导机制与激励杠杆，政策制定者正致力于激活社会主体的内生动力，构建起一种可持续的协同治理新格局。

政策目标维度在时序演进中呈现出显著的

“结构稳态”特征，其权重被严格规制于 20% 至 26.5% 的窄幅阈值区间内（2022 年达峰值 26.5%）。这种数值上的稳定发展深刻折射出政策制定主体的战略定力，即便在执行工具组合发生剧烈结构性震荡的情境下，核心目标始终发挥着基础性锚定功能，有效规避了治理行动的路径偏离，确保了政策体系的价值连贯性与目标导向性。

纵观观察期，政策工具结构呈现出“二级工具主导、一级工具协同、目标维度稳态伴随”的演化图景。2021 至 2023 年间“一级工具缓慢收缩”与“二级工具显著扩张”形成的结构性消长，绝非简单的数量互补，而是深刻映射了治理逻辑从“柔性倡导”向“刚性规制”的范式转型；而 2024 至 2025 年二级工具权重的逆势回升，则标志着政策组合正由单一规制路径向“混合型治理”架构复归，彰显了政策系统在动态环境下的自适应调适机制。

（二）政策工具使用的组合形式

1. 现有数据分析结果

基于图 3 对 2018 – 2025 年政策工具频次的时序追踪，可识别出三重关键演化逻辑：首先，在时间维度上，政策供给呈现显著的“脉冲式”非均衡分布，于 2021 年 2 月频次仅为 3 后，于 2023 年 3 月激增至峰值频次达 13 个，这种剧烈的振幅揭示了政策实施并非线性推进，而是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爆发特征；其次，在结构维度上，二级工

具以均值 3.3 的绝对优势主导政策组合, 显著高于一级工具 1.8 与目标维度 1.5, 折射出治理重心向“具体操作与执行层面”的深度倾斜; 最后,

从演进态势审视, 2021 年后工具频次虽呈震荡格局但整体趋势向上, 有力佐证了政策干预力度在动态调整中持续强化的现实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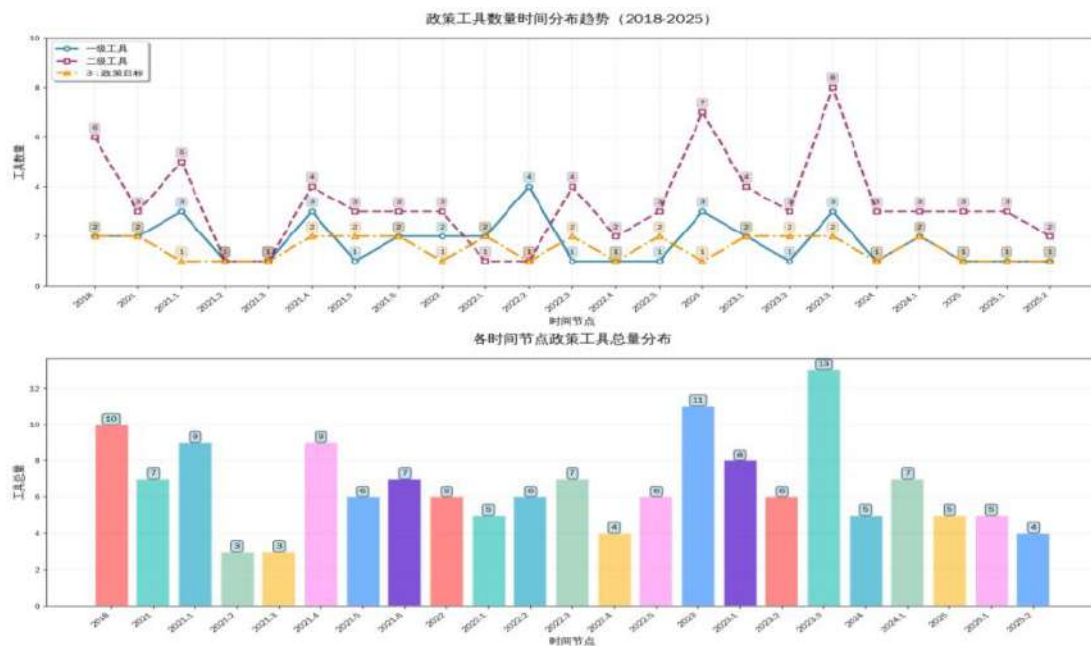


图 3

2. 政策工具的协同执行逻辑 (按时间阶段划分)

结合“双减”政策 2021 年 7 月正式发布的节奏工具协同, 呈现“目标先行, 框架落地, 措施补位, 长效优化”的递进协同治理逻辑。

首先在铺垫期 (2018 年-2021 年 5 月) 主要是目标锚定与框架初探, 当时政策目标稳定在 1-2, 说明“减轻学生负担”的核心方向已明确; 但一级工具、二级工具使用频率较少且波动小, 可以明显看出政府在政策执行初始处于试点状态, 通过较强的规制安排进行试探性推进, 来评估社会的可接受程度, 但也明确了核心目标, 进行初步探索政策框架一级工具使用, 仅配套少量具体措施二级工具使用, 进而避免工具冗余, 聚焦“目标统一”。

其次是启动期 (2021 年 5 月-2022 年 2 月)。基于试点积淀的成熟经验, 该阶段重心转向框架落地与措施跟进。伴随 2021 年 7 月“双减”政策颁布, 一、二级工具频次同步跃升 (分别达 3-4 个与 4 个), 构建起“一级引领、二级配套”的协同机制, 即以一级工具确立“强制、能力建设、系统变革”的核心架构, 二级工具精准填充“规范收费”、“课后服务”等基础措施, 实现了从“框架搭台”到“措施起步”的实质性跨越。

然后是深化期 (2022 年 2 月-2023 年 3 月) 政府着重多类措施并行与工具组合发力。一种政

策工具只有在以政策工具特征为一方, 以政策环境、目标和目标受众为另一方之间相匹配的时候, 才是有效的。该阶段的显著标志是政策工具总量的脉冲式上扬, 截至 2023 年 3 月, 工具频次触及 13 个的峰值。其结构性特征尤为关键二级工具激增至 8 个, 而一级工具恒定维持在 3 个, 这种“一稳多增”的态势深刻折射出政策执行从“框架搭建”向“细则填充”的纵深演进。此阶段的核心逻辑在于构建“同框多措、功能互补”的协同生态, 以强制工具为例, 通过叠加“违规查处细则”与“线上监管”等二级举措, 极大地增强了“堵”的刚性约束; 进而推动三类工具密集落地, 构筑起集“刚性封堵、柔性疏导、正向引导”于一体的闭环治理体系。

最终步入稳定期 (2023 年 3 月至今), 政策治理模式由“高频出台”转向“优化调整”与长效运行。该阶段的显著表征是工具总量在高位回稳后呈现回调倾向, 一、二级工具的频次波动显著收敛, 标志着政策供给从“规模扩张”迈向“结构精修”。政府的协同逻辑随之更迭为“工具组合的动态调适”。这种“做减法”与“做加法”的辩证统一, 重塑了“强制托底、能力赋能、系统引导”的三维协同格局, 从而确立了政策可持续发展的长效运行机制。

3. 探究动因与逻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工具”

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强制性变迁。政府作为强制性政策变迁的主体，掌握着政策制定、政策变迁的主导权，在执行中大量使用权威工具，表明国家以强大行政力量强力扭转教育生态的决心；其次是系统治理与源头治理。工具组合不仅“堵”去整治校外，更注重“疏”来提升校内，说明政府认识到问题根源在于教育评价体系和教育资源不均衡，试图进行系统性破解；再次是渐进式改革逻辑。从工具演变可以看出，政策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从宣传引导到强力整治，再到制度建设，体现了中国政策过程的典型特征；最后回应社会关切。工具选择强烈回应了民众对“教育内卷”和“生育成本”的焦虑，具有鲜明的民意基础。

五、政策工具视角下“双减”政策的实施问题与现存短板

（一）偏重强制性工具，社会协同参与不足

结合表2数据，一级工具以强制性为主占比峰值达32.4%，而自愿性工具占比不足10%，两者占比差距显著。当前双减政策以强制性工具为主，而自愿性工具使用处于边缘化。而在双减政策中主要体现为政府通过禁令类、审批管制类、处罚惩戒类等工具，以行政强制手段要求学校、校外培训机构等目标群体严格履行作业管控、培训规范等行为要求，并依托教育监管部门实施常态化监督管理，确保目标群体被动服从政策规制。但是，如果强制性政策工具使用过多，则使其“允许政府做职能范围内的任何事情”，变成“缺乏灵活性，不允许随机应变，导致决定和结果与政策目标相左”，而自愿性工具则强调政府弱化直接干预，依托家校协同、社会公益力量参与等自愿互动模式，整合社会资源助力双减目标实现。而科学的教育政策执行需要构建多元协同的执行体系，明确政府、学校、社会组织、家庭等主体的执行职责，形成“政府主导、多元协同、分工明确、责任共担”的执行格局。但当前双减政策对强制性工具的过度依赖，虽能快速推动政策落地、提升管控效率，但也存在明显弊端，主要在于政府在政策制定中对政府、市场、社会等方面多元治理格局的考量不足，对自愿性工具的设计与推广缺乏系统性规划，未形成家校社协同的有效机制，无法充分整合社会优质教育资源，难以真正实现“减负提质”的人本化目标。

（二）多种政策工具并用，组合形式固化单一

任何政策工具都内有着特定的功能属性与适用边界，单一维度的工具供给显然无法破解“双减”这一复杂的系统性治理难题。理想的政策执行逻辑，应当是基于问题情境的精准匹配，通过多元工具的耦合互补来形成治理合力。然而，对“双减”政策文本的深层剖析显示，尽管现有体系已完整覆盖豪利特与拉米什分类框架下的强制性、混合性及自愿性三类工具，且逾半数条款采用了组合策略，但其组合形态却陷入了严重的“路径依赖”与同质化困境。图2的数据直观地揭示了这种结构性失衡——此类固化组合的占比高达60%以上，构成了政策执行的绝对主流；相比之下，那些更能激发内生动力的多元化组合，如“资源支持”与“自愿参与”的协同、“处罚惩戒”与“正向激励”的配套，其出现频率不足15%，处于明显的边缘地位。这种“重管控、轻赋能”的单一化组合模式，不仅难以适配政策落地过程中多元主体的差异化需求与复杂场景的动态演变，更在实质上抑制了学校、家庭及社会机构的主动参与意愿。

（三）宣传引导为主，正向激励工具供给不足

在“双减”政策工具使用中，混合型维度的“宣传引导”工具占据高位，成为政策传导的核心载体。该工具试图通过政策解读、理念浸润及典型示范等手段，达成价值共识与认知同化，进而规训学校、家庭及培训机构的行为范式。但又因宣传引导本质上属于一种“弱约束”的认知干预机制，其效能的充分释放，高度依赖于“外部刚性约束”与“内部内生动力”的双重耦合。审视当前政策实践，发现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政策执行过度倚重强制性工具的外源性压力，以行政命令倒逼目标群体对宣传倡导内容的被动服从。这种“高压驱动”模式虽能在短期内换取形式上的合规，却因缺乏实质性的利益联结，导致了“认知-行为”的深层断裂。相比之下，在教育方面应灵活运用补贴、购买服务、特许经营等混合性工具，激发教育活力，但激励行为在制度设计中长期处于边缘化甚至缺位状态。这种激励机制的制度性匮乏，直接削弱了宣传引导工具的落地根基，结果则会导致宣传引导沦为单向度的观念灌输，既无法有效激活学校提升服务质量的主动性，也难以促成家校协同的内生自觉，最终致使政策执行陷入“短期攻坚有效、长效治理乏力”的困境。

（四）侧重短期攻坚，长效保障体系薄弱

在“双减”政策工具的体系中，混合型维度的“资源支持”与直接性保障工具呈现显著的“结构性缺位”。前者涵盖财政补贴、师资赋能及物质兜底，后者指向公益托管、资源共享等公共服务的直接供给。二者本应构成政策长效推进的物质基石与核心引擎，却在实践场域中沦为边缘化配角。这种供给侧的制度性匮乏，直接导致“双减”改革陷入“无米之炊”的资源困境，难以维系政策深化的持久动能。更深层的病灶在于政策目标的“短视化”倾向，现有条款过度聚焦作业压减、机构关停等短期攻坚指标，却对经费投入的精细化治理、跨部门资源的协同配置及资金使用的规范性监管关注寥寥。这种“重破局、轻立制”的路径依赖，不仅诱发了资源配置的碎片化低效与补贴资金的跑冒滴漏，更致使教师专业进阶、课后服务质效评估、家校协同机制构建等长效议题被系统性遮蔽。虽能凭借行政高压在短期内迅速回应社会焦虑、破解显性顽疾，却因缺乏可持续的资源输血与制度造血功能，难以支撑“双减”改革从“物理减负”向“化学提质”的深层跃迁，最终掣肘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图景。

六、结论

（一）政策工具选择的演进特征与核心逻辑

政策文本分析目的在于以政策问题为导向，通过精准化、规范化测量政策文献内容若干重要特征，从而发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关于政策工具选择规律与政策内容侧重。本研究通过对2018至2025年间我国“双减”政策文本的编码分析，勾勒出政策工具的动态演化轨迹。在类型学分布上，“双减”工具箱呈现出显著的“非对称”结构：以强制性工具为“刚性底座”，混合型工具为“柔性中枢”，自愿性工具仅作“边缘补充”。二级工具（如宣传引导、资源支持）以均值3.3的高频态势压倒性超越一级工具（1.8）及政策目标（1.5），折射出政策执行重心从“宏观愿景”向“微观操作”的剧烈下沉。

时序演化维度揭示了清晰的“四阶段”跃迁路径：从2018年至2021年5月的“目标锚定与框架初探”铺垫期，跨越至2021年5月至2022年2月的“框架落地与措施跟进”启动期，继而进入2022年2月至2023年3月的“组合发力与闭环构建”深化期，最终迈向2023年3月后的“动态优化与长效运行”稳定期。工具频次在2023年3月触及13个频率点的峰值，标志着政策干预强

度与精细度的历史高位，其阶段性特征鲜明如刻。

究其深层治理逻辑，政策工具的组合并非随机堆砌，而是遵循三重辩证法则：其一，“国家意志的强制性变迁”，借由禁令与审批管制的雷霆手段，强行扭转教育生态的失衡惯性，彰显顶层设计的决断力；其二，“系统治理的堵疏博弈”，在高压整治校外培训乱象的同时，依托资源注入与价值引导等混合工具夯实校内主阵地，试图破解“内卷化”的根源性死结；其三，“渐进式改革的动态适配”，从试点探路到密集施策，再到反馈迭代，工具组合随执行情境灵活调适，既追求“短期破局”的速效性，又兼顾“长期引导”的可持续性，以此回应社会对教育公平重构与生育成本减负的深层焦虑。

（二）政策工具优化的路径建议

从实践层面来说，不同类型政策工具在政策执行过程中，承担着不同的作用效果。在一项政策中综合使用多种政策工具，政策执行的效果会相当理想。而教育政策作为一种行政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政府意志的方向和主导教育改革与发展力度的大小。为此，各级政府在使用政策工具时，要综合掌握各项政策工具的优劣，围绕政策目标进行合理配置，在最大程度上形成政策合力，保证政策执行效果，需结合政策工具演进规律与组合逻辑，提出一系列优化建议：第一，优化工具结构配比，适度降低重复性强制性工具的使用强度，丰富自愿性工具的应用形式，构建“强制性工具定底线、混合型工具提效能、自愿性工具促协同”的多元工具体系，强化家校社协同治理；第二，创新工具组合模式，突破单一化组合局限，推动“资源支持加自愿参与”和“处罚惩戒加正向激励”等跨类型工具协同，提升工具组合与不同教育场景的适配性；第三，强化长效激励机制，增加诱因工具的供给与使用，通过财政补贴、职称倾斜、表彰奖励等措施，激发学校提升课后服务质量、教师优化作业设计、家长参与家校协同的积极性；第四，完善长效保障体系，加大资源支持工具的投入力度，细化财政资金管理、师资培训、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等配套措施，同时强化对教师发展、服务评估、机制建设等长效议题的政策覆盖，为“双减”政策长期深化提供坚实支撑。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虽系统解构了“双减”政策工具的演进图谱与组合逻辑，但仍受限于两重内生边界：

一是“文本—实践”的实证断裂,即研究止步于规范层面的应然推演,缺乏对执行现场实然效能的量化确证,难以精准捕捉政策落地过程中的衰减或异化;二是“空间异质性”的视角缺位,分析框架隐含了区域同质化预设,未充分剥离不同资源禀赋与发展能级对工具适配性的结构性制约。鉴于此,未来学理探索将聚焦三重纵深拓展:首先,打破文本中心主义,引入混合研究范式,通过大样本数据与深描案例的互证,揭示政策文本逻辑与基层实践逻辑的张力与错位;其次,植入空间比较视角,审视不同经济梯度下工具选择的差异化图景,为破解“一刀切”困境、推动政策的在地化优化提供实证支撑;最后,拓宽全球治理视野,开展国际教育减负政策的跨国范式互鉴,在汲取他国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重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工具箱,为“双减”改革的长效迭代提供更宏阔的理论坐标与实践路向。

参考文献

- [1]陈振明.公共政策分析[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 [2]刘叶婷.迈克尔·豪利特、M.拉米什:《公共政策研究——政策循环与政策子系统》[J].公共管理评论,2008,(00):140-144.
- [3]张国庆.公共政策分析[M].MPA公共管理硕士系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 [4]孙绵涛.教育政策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 [5]范晓东,杨钰钰,刘一丹.政策工具视角下我国“双减”政策的文本分析[J].湖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2,28(5):14-22.
- [6]陈学飞.本土化·理论化·经验化——评《中国教育政策过程本土化研究》[J].大学教育科学,2017,(03):2.
- [7]谢晓琴,江敏.政策工具视角下城市社会治理现代化政策试点的扎根分析——基于我国60个试点城市的研究[J].中国行政管理,2021(6):98-104.
- [8]陈振明,张敏.国内政策工具研究新进展:1998—2016[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7,(06):109-116.
- [9]孙科技.教育精准扶贫政策执行中政策工具应用偏差及其矫正——基于省级政策实施方案的文本分析[J].教育与经济,2019(3):3-10.
- [10]杨代福.政策工具选择的视角、研究途径与模型建构[J].行政论坛,2009,16(03):21-26.
- [11]赵垣可.政策工具视角下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政策文本计量研究——基于《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颁布以来的政策文本分析[J].上海教育科研,2020,(05):5-9.
- [12]张茂聪,吕晓敏,杜文静.校外培训治理的政策工具选择及其优化——基于20个省级“双减”政策文本的分析[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23,44(03):24-33.吕志奎.公共政策工具的选择——政策执行研究的新视角[J].太平洋学报,2006,(05):7-16.
- [13]谢维和,陈超.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政策走向分析——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教育政策数量变化研究[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6,(03):1-8.
- [14]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J].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2021,(10):2-7.
- [15]Howlett M, Ramesh M. Studying Public Policy: Policy Cycles and Policy Subsystems[M]. Toronto: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6]Scott J. Documentary Research[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 [17]Neuendorf K A. The Content Analysis Guidebook[M].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cations, 2002.
- [18]Salamon L M. The Tools of Government: A Guide to the New Governance[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AI 赋能的双师英语课堂模式构建与实践研究

高淑婷¹ 崔颖坤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及其与教育领域的深度融合, 传统双师课堂模式正迎来智能化升级的重要机遇。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 系统探讨人工智能技术如何赋能双师英语课堂, 构建“人机协同、以学为中心”的新型教学模式。研究首先梳理了双师课堂与AI教育应用的研究现状, 进而从理论框架、模式构建、实践路径、挑战对策等方面展开论述。本研究提出, AI赋能的双师英语课堂应融合智能备课、个性化学习路径、虚实结合的情境教学、数据驱动的过程性评价等核心要素, 形成“教师—AI—学生”三元协同的教学共同体。该模式不仅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动机、提升语言综合运用能力, 也为推动教育公平、实现因材施教提供了技术支撑与实践路径。最后, 本文从技术、教师、学生、政策等维度分析了实施中可能面临的挑战, 并提出相应建议, 以期对未来智能教育生态的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 人工智能; 双师课堂; 英语教学; 教学模式; 教育技术; 个性化学习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48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al Research on AI-Enabled Double-Teacher Classroom Model for Senior High English

Gao shuting, Cui yingkun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and its in-depth integration with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traditional double-teacher classroom model is embracing a crucial opportunity for intelligent upgrading. Based on the method of literature analysi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how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can empower the double-teacher English classroom, and constructs a new student-centered teaching model featuring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Firstly, the research comb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double-teacher classrooms and the application of AI in education, and then elaborates on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model construction, practical paths, challenges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This study proposes that an AI-enabled double-teacher English classroom should integrate core elements such as intelligent lesson preparation, personalized learning paths, virtual-real integrated situational teaching, and data-driven process evaluation, forming a ternary collaborative teaching community of "teacher-AI-student". This model not only helps stimulate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 and motivation and improve their comprehensive ability to use the language, but also provides techn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promoting educational equity and implementing targeted teaching. Finall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ossible challenges in implementation from the dimensions of technology, teachers, students and policies,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作者简介: 高淑婷(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崔颖坤(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通讯作者: 高淑婷

suggestions,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telligent education ecosystem in the future.

Key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double-teacher classroom; English teaching; teaching mode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ersonalized learning

一、引言

(一) 研究背景与意义

在全球教育信息化浪潮与国家“教育现代化2035”战略推动下,“人工智能+教育”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双师课堂作为融合优质教育资源、促进教育均衡的创新模式,近年来在英语教学中广泛应用,尤其在缓解师资不均、提升课堂互动等方面表现出显著优势(吕涛,2023)。然而,传统双师课堂仍存在互动深度不足、个性化支持有限、教学数据利用不充分等问题。人工智能技术,如自然语言处理、学习分析与推荐、虚拟情境构建等,为双师课堂的智能化升级提供了新可能(郭蓉蓉,2025)。本研究旨在探索AI如何赋能双师英语课堂,构建更高效、更个性、更沉浸的教学模式,对推动英语教学改革、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中,双师课堂已形成“线上主讲+线下辅导”的核心模式并在英语教学中应用,有效优化了资源配置、强化了课堂互动,尤其在提升学生听说能力、缓解师资不均问题上成效显著,同时随着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技术支撑的完善,AI技术逐渐从辅助工具升级为参与教学全流程的“第三教师”,在语音识别、智能批改、个性化推荐等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实践中也探索出趣味性教学、分层教学、合作探究等多元策略,但现有研究多侧重局部应用或理念描述,系统化模式构建不足,实证研究与对教师角色转型、学生数字适应力等问题的关注较为欠缺;国外研究起步更早,依托成熟的智能教育技术,“双师+AI”模式更注重沉浸式情境构建与文化浸润的结合,通过精准学情分析实现高度个性化教学,聚焦核心素养发展,在技术伦理规范与教师技术素养培养等方面形成完善保障,但针对非英语母语国家的适配性研究相对薄弱。

(三) 研究思路与方法

首先全面检索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件与教学实践报告,系统梳理双师课堂、AI教育应用及英语教学模式创新领域的研究成果,明确

现有研究的核心观点、实践经验与不足,奠定理论基础;以“人机协同、以学为中心”为核心理念,结合建构主义、情境认知等经典理论,整合教师角色分工、技术支撑、教学环境等关键要素,通过逻辑推理构建AI赋能双师英语课堂的完整理论框架与操作模式;从课程设计、教学实施、教学评价三个维度提出具体可操作的实践策略,同时深入分析技术、教师、学生、政策等层面的潜在挑战并给出针对性应对方案;最后凝练研究结论,明确理论贡献,指出研究局限并提出未来实证验证、跨学科融合等研究方向。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全面检索国内外相关学术文献、政策文件与教学实践报告,系统分析双师课堂与AI教育的研究现状、理论基础与实践案例,为模式构建提供依据。

二、AI 赋能双师英语课堂的理论框架

AI赋能双师英语课堂的理论框架,是在传统双师模式与智能技术融合的背景下,对教学目标、主体关系、过程与环境进行的系统性重构。该框架旨在阐明其运作的核心逻辑、参与要素的互动关系及其所依托的教育学原理,为模式的构建与实践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 核心理念:人机协同、以学为中心

“人机协同、以学为中心”是AI赋能双师课堂的根本遵循,它重新定义了教学场域中的角色关系与价值取向。人工智能在此模式中不再是辅助演示或简单交互的被动工具,而是晋升为具有特定教学职能的“协同者”。这一理念强调优势互补与功能整合。人类教师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情感联结、创造性思维、伦理判断与复杂情境的即时应变能力。他们负责价值引领、灵感激发、人文关怀以及对学习共同体氛围的营造。AI教师的优势则在于强大的数据处理、不知疲倦的个性化服务、标准化的技能训练与对大规模学情的精准洞察。

该理念要求所有教学设计与实施环节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促进学生的发展”。这意味着教学内容需围绕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进行动态调整,教学过程需保障学生的深度参与与意义建构,教学评价需服务于学生的持续改进与终身学习能力。

吕涛 (2023) 的研究指出, 双师课堂的核心优势在于能“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学习风格, 提供更个性化的教学支持”, 这正是以学为中心的具体体现。

(二) 系统构成要素

AI 赋能的双师课堂是一个由多重角色与多元环境构成的复杂生态系统, 各要素间相互关联、彼此支撑。教师角色分为主讲教师、辅导教师和 AI 教师, 其中主讲教师通常为线上名师或区域骨干教师, 是课程内容与高阶思维发展的主要人物。其核心职责包括: 基于课程标准和前沿认知, 架构知识体系与核心问题; 在直播或录播中, 进行深度讲解、思想引领与跨文化视角的阐释; 激发学生批判性思考与创新意识。他们扮演着“学术灯塔”和“思维教练”的角色。

辅导教师则是线下课堂的组织者与学生发展的主要承担者。其工作聚焦于: 将主讲教师的宏观设计进行本土化落地, 组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项目探究等协作活动; 提供面对面的即时答疑、情感支持和个别化辅导; 管理课堂秩序, 观察并记录学生表现, 并将一线学情反馈给主讲教师与 AI 系统 (杨兰, 2024)。他们是连接“云端”与“地面”、实现个性化关怀的关键枢纽。

AI 教师作为新兴的“数字教师”, 承担标准化、重复性、计算密集型的教学支持工作。其功能具体体现在: 作为资源引擎, 智能生成与推荐多媒体学习材料; 作为交互陪练, 提供全时段的口语对话、作文批改与语法答疑; 作为数据中枢, 全程采集学习行为数据, 进行学情分析与预测, 为真人教师的决策提供数据看板 (郭蓉蓉, 2025)。AI 教师的存在, 将人类教师从大量事务性工作中解放出来, 得以聚焦于更具创造性和人文性的教学环节。

学生作为自主学习者: 在 AI 提供的个性化学习地图和目标的引导下, 学生需要逐步学会规划自己的学习进度, 选择合适的学习资源, 并进行自我监控与调节。这对应了“个性化学习理论”对学习者的自主性的要求; 学生作为互动参与者: 互动维度从“师生”二元扩展到“师生-生生-生机”多元网络。学生不仅与两位真人教师互动, 还通过在线平台与同伴协作、竞争, 并与 AI 进行模拟对话、游戏化挑战。这种多通道互动极大地拓展了语言实践的机会与场景 (尤亚俊, 2024); 学生作为协作建构者: 在教师设计的真实或虚拟任务情境中, 学生通过与同伴、资源、环境的互动,

共同探究并建构对语言知识及其文化内涵的理解。例如, 在双师云课堂中, 学生通过小组合作完成情景表演或项目报告, 正是在实践中建构语言运用能力和跨文化认知 (唐先凤, 2024), 这深刻体现了建构主义的学习观。

教学环境则采用虚实结合。“线上”指基于云平台的虚拟学习空间, 支持异步学习和资源获取; “线下”是经过智能化改造的实体智慧教室, 支持面对面的社交化学习。二者通过直播、同步课堂等技术无缝衔接, 实现云端名师与线下课堂的实时贯通 (纪蓉, 2023); 利用 AR/VR 技术, 将虚拟的英语国家街景、历史场景或抽象的语言概念可视化, 叠加于真实课堂之上。学生可以“置身”于虚拟超市中进行购物对话, 或“触摸”虚拟的器官模型学习相关词汇, 极大增强了学习的临场感与趣味性; 整个环境设计强调任务驱动和文化载入。无论是线上外教带来的地道文化背景介绍, 还是线下教师结合本土文化设计的对比任务, 都旨在将语言学习嵌入有意义的、富含文化要素的语境中, 促进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协同发展。

(三) 教学模式的理论基础

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知识不是通过教师传授得到, 而是学习者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 借助他人的帮助, 利用必要的学习资料, 通过意义建构的方式而获得。AI 赋能的双师课堂完美呼应了这一理念: 首先, 它通过双师与 AI 创造了一个丰富的“社会文化”互动环境; 其次, 它提供海量的、多模态的“学习资料”; 最终, 学生在完成真实任务、解决实际问题的“意义建构”过程中习得语言。吕涛 (2023) 研究的核心发现——双师课堂通过增强互动和提供个性化指导来提升学习效果——正是学生积极进行意义建构的结果体现。

情境认知理论: 学习的本质是学习者参与实践、与情境互动, 进而形成对所在共同体文化的适应。脱离情境的知识是惰性的, 难以迁移。AI 赋能的双师课堂是该理论的卓越实践者: 一方面, 线上外教和 AI 能够创设高度逼真的虚拟语言应用情境; 另一方面, 线下教师组织的角色扮演、项目学习等, 是将语言知识置于真实的校园生活或社会问题情境中加以运用 (唐先凤, 2024)。这种“虚拟仿真+真实任务”的双重情境赋能, 确保了语言学习与运用的紧密结合。

个性化学习理论: 教学应尊重并适应学习者

在准备水平、兴趣、风格与节奏上的差异,以促进其潜能的最大化发展。传统课堂受制于师资与资源,难以实现真正的个性化。而AI的引入,使得大规模个性化教育成为可能。通过前期诊断, AI可以刻画每个学生的认知画像;通过过程跟踪,可以动态调整学习路径的难度与节奏;通过资源推荐,可以匹配其兴趣偏好。尤亚俊(2024)和纪蓉(2023)的研究均强调了智慧教育平台与双师课堂结合在实现“因材施教”、“分层教学”方面的巨大潜力,这正是个性化学习理论的直接应用。

混合式学习理论:将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两种模式有机整合,以结合二者优势,提升学习成效与体验。AI赋能的双师课堂是混合式学习的高阶形态。它不仅融合了线上与线下的教学时空,更通过AI技术将二者的混合从简单的“拼接”升级为智能的“融合”。AI作为粘合剂和催化剂,确保了线上线下的教学内容连贯、数据互通、活动协同,实现了“1+1>2”的效应,充分体现了混合式学习理论所追求的灵活性与有效性。

三、AI赋能双师英语课堂的模式构建

(一) 课程设计模式

线上主讲教师、线下辅导教师与AI形成三位一体的协同备课体系,打破传统备课的时空限制与信息壁垒。AI依托海量教学资源库,整合教材知识点、跨版本优质教案及前沿教学案例,为备课提供多元化素材支撑;同时通过深度分析学生过往学习数据、作业完成情况、测试错题分布等学情信息,精准定位班级共性短板与个体差异,生成可视化学情报告(纪蓉,2023)。线上教师结合自身学科专长与教学经验,负责搭建课程知识框架与高阶思维训练目标,线下教师则基于AI提供的学情洞察,反馈学生实际学习痛点与本地教学适配需求, AI进一步根据双师的备课思路,智能推荐适配的教学方法、互动形式与时间分配方案,确保教学设计既符合课程标准要求,又贴合学生实际学习需求。

以教材核心知识点为锚点,结合AI精准刻画的学情画像,实现教学内容的智能化生成与动态优化(郭蓉蓉,2025)。针对不同学段学生的认知特点, AI可自动生成适配的多媒体课件,如为初中阶段融入动画、短视频等直观化素材,为高中阶段补充学术文献片段、深度思辨话题等拓展内容;在语言实践层面, AI能模拟真实交际场景,

生成贴合学生生活经验与语言水平的情景对话,涵盖日常交流、跨文化沟通、学术讨论等多元场景,并支持根据教学需求调整对话难度、话题方向与互动形式;同时, AI可精准匹配知识点生成分层练习题,兼顾基础巩固、能力提升与思维拓展,且能通过跟踪学生答题数据,实时分析错误类型与薄弱环节,动态优化题目难度、题型搭配与考查重点,确保教学内容始终与学生学习进度、能力发展同频适配。

基于个性化学习理论,构建“基础—提升—拓展”三级递进式教学目标体系,实现教学目标与学生能力的精准匹配(尤亚俊,2024)。基础目标聚焦教材核心知识点的掌握,确保所有学生达成课程标准最低要求,如词汇识记、基础句型应用等;提升目标侧重语言技能的灵活运用,针对中等水平学生设计情境化任务,如对话创编、短文写作、话题讨论等;拓展目标则面向学有余力的学生,聚焦跨文化交际能力、批判性思维与创新能力的培养,如外语演讲、文化对比探究、项目式学习等。AI通过实时跟踪学生课堂参与度、作业完成质量、测试成绩波动等数据,动态评估每个学生的能力发展水平,自动调整其对应的任务难度与目标层级:对基础薄弱学生降低任务起点,增加引导性支架;对能力提升较快的学生拔高目标要求,补充挑战性内容,真正实现“一人一标”的个性化教学目标设定,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能在自身“最近发展区”内获得成长。

(二) 教学实施模式

课前进行智能预习与诊断, AI基于课程目标与学生学情画像,精准推送分层预习材料,基础薄弱学生侧重词汇、句型等基础内容的跟读与识记,能力较强学生则推送话题相关的拓展阅读、文化背景资料等(尤亚俊,2024)。预习材料以动画、短视频、互动问答等趣味形式呈现,配合闯关式任务设计,激发学生自主预习动力(吕涛,2023)。学生完成预习后, AI即时开展前置测试,通过客观题检测基础知识掌握情况,结合主观题分析语言表达潜力,生成包含班级共性短板、个体薄弱点、能力层级分布的详细学情报告,为线上主讲教师优化教学重点、线下辅导教师制定个性化辅导方案提供数据支撑(郭蓉蓉,2025);课中实行AI辅助互动教学与实时反馈:课堂开始,线上主讲教师结合AI学情报告,聚焦核心难点展开精准讲解,线下辅导教师同步观察学生状态,及时进行眼神示意、手势引导等互动反馈。在互

动环节, AI 通过智能互动平台主持随机问答、限时抢答、小组积分竞赛等活动, 实时统计学生参与情况与答题正确率, 生成课堂互动热力图, 帮助双师快速掌握学生注意力集中区域与知识理解盲区 (杨兰, 2024); 课后实施个性化巩固与拓展学习, AI 依据学生课堂表现、测试数据与学情画像, 推送定制化课后任务, 基础层学生以基础句型仿写、词汇听写等巩固性作业为主, 进阶层学生侧重短文写作、话题讨论等能力提升任务, 拓展层学生则安排项目式学习、跨文化主题探究等挑战性任务 (尤亚俊, 2024)。作业形式兼顾多样性与实用性, 包括 AI 智能批改的客观题、需线下教师批阅并批注的主观题, 以及口语录音、视频展示等实践类作业 (杨兰, 2024)。同时, AI 根据学生兴趣与能力短板, 推送适配的拓展阅读文章、微课视频、英语歌曲或影视片段, 延伸学习场景。 (吕涛, 2023)

(三) 教学评价模式

AI 行为分析与情感识别: AI 全程采集学生在课前预习、课堂互动、课后练习等环节的过程性数据, 包括学习时长、互动频率、错题类型等行为数据, 以及通过摄像头、麦克风捕捉的面部表情、语音语调等情感数据 (郭蓉蓉, 2025)。通过情感计算技术, AI 能够分析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专注度、焦虑度、兴趣度等情绪状态。

智能作业批改与测试分析: AI 承担客观题的自动批改工作, 包括选择题、填空题、判断题等, 即时生成批改结果与正确率统计, 节省教师批改时间 (尤亚俊, 2024)。对于主观题, 如作文、口语表达等, AI 通过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从内容完整性、语法准确性、表达流畅度、逻辑清晰度等维度进行多维度评分, 并提供具体的错误分析与改进建议。同时, AI 整合学生作业与测试数据, 生成班级学情分析报告与个人错题集, 为教师调整教学重点、设计针对性辅导方案提供数据支撑, 也帮助学生明确自身学习漏洞, 进行精准补弱。

学习轨迹跟踪与成长档案: AI 持续跟踪学生从入学到阶段性学习结束的全过程学习数据, 包括各阶段的测试成绩、作业完成质量、口语水平提升幅度、参与互动情况等, 构建可视化的个人学习成长图谱 (尤亚俊, 2024)。成长档案不仅记录学生的学业成果, 还涵盖学习习惯的养成、学习兴趣的变化、思维能力的提升等多方面内容, 全面展现学生的成长历程。

四、AI 赋能双师英语课堂的实践路径分析

(一) 技术整合策略

硬件设备配置主要是双屏互动黑板、学生平板、VR 头盔、高保真录音设备; AI 教学平台需具备智能备课、课堂互动、数据看板、资源库等模块。

(二) 教师发展支持

教师 AI 教学能力培训聚焦 AI 教学工具实操与教学设计深度融合, 系统开展 AI 工具工作坊、专题研修班及案例观摩活动。培训内容涵盖智能备课系统运用、学情数据分析、个性化资源推送等核心技能, 指导教师将 AI 技术融入课堂互动、口语训练、作业设计等环节, 提升技术与教学法的融合应用能力。明确线上主讲教师的课程架构、知识传授职责与线下辅导教师的课堂组织、个性化辅导职责 (杨兰, 2024), 制定标准化分工流程。建立定期教研、课前沟通、学情反馈等协同制度, 通过线上协作平台实现教学资源共享与问题实时研讨, 保障教学衔接顺畅高效。鼓励教师结合教学实践撰写日志, 记录 AI 应用中的成效与问题; 搭建校级、区域级案例分享平台, 组织专题研讨会与课题研究, 促进教师交流 AI 赋能教学的创新经验, 形成互助共进的研究氛围, 推动教学实践持续优化。

(三) 学生参与机制

引入游戏化学习场景、积分奖励与等级晋升体系, 将词汇记忆、句型练习等学习任务转化为趣味闯关活动 (吕涛, 2023)。定期组织英语演讲、情景表演、作品展示等活动, 给予学生正向反馈与认可, 激发英语学习的内在动力与主动性。

指导学生结合 AI 生成的学习诊断报告与个性化建议, 制定贴合自身的学习计划。教授学生运用 AI 口语陪练、错题本、资源推荐等工具进行自我监测与补弱, 培养自主规划、自我调整的学习习惯, 提升终身学习能力。

设计跨文化交流、社会热点探究等项目式学习任务, 鼓励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协作完成资料搜集、方案设计、成果展示等环节 (唐先凤, 2024)。通过小组讨论、角色扮演、互助答疑等形式, 提升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与合作探究素养。

(四) 教学管理优化

整合教材配套资源、名师优质课件、分层练习题、微课视频等素材, 搭建分类清晰、标准化

的课程资源库。支持教师根据教学需求一键调用资源,同时允许个性化修改与二次创作,实现资源高效复用与灵活适配,大幅提高备课效率。

通过 AI 课堂分析系统,实时监测教师的教学节奏、互动设计与学生的参与频率、专注度、知识掌握情况。生成多维度教学质量报告,为学校精准评估教学效果、优化教学管理策略提供数据支撑,及时发现并解决教学中的薄弱环节。

向家长开放学生学习数据端口,同步学习进度、作业完成情况与能力提升轨迹,方便家长实时了解孩子学习状态并配合指导。联合社区开展英语角、文化体验、实践调研等活动,拓展课外学习场景,形成家校社协同育人合力,全方位助力学生英语能力提升。

五、AI 赋能双师英语课堂的多维挑战与系统性因应策略

(一) 技术应用层面的挑战与策略

技术工具的双重性在赋能教学的同时亦衍生出系列潜在风险。其一,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过度依赖可能诱发教师传统核心教学能力(如临场互动决策、深度学情洞察)的式微。其二,技术系统本身的稳定性构成教学连续性的潜在威胁,任何软硬件故障均可直接导致教学流程的中断。其三,算法的公平性构成深层伦理挑战,若算法设计未经审慎考量与偏见校正,其数据驱动决策可能无意识地复制与固化既有的城乡、性别等结构性不平等,进而与技术促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

为应对上述挑战,需构建稳健且负责任的技术应用框架。首先,在理念上必须锚定“人主机辅”的根本原则,确保技术服务于教育者的专业判断,而非替代。其次,在操作层面需建立周详的技术应急预案与容错机制,保障基础教学的韧性。最后,在价值层面,应致力于开发具有包容性设计的算法,并建立定期的算法公平性审计制度;同时,需通过加强本地化部署、优化网络接入等方式,切实保障资源薄弱地区及弱势群体的技术可及性。

(二) 教师发展层面的挑战与策略

教师的角色转型与专业重构是模式落地的关键瓶颈。教师需从传统的知识“讲授者”转变为学习过程的“设计师”与“引导者”,此一根本性角色转换易引发职业认同焦虑与适应性压力。在能力层面,囿于既有知识结构,教师普遍面临

将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整合于特定学科教学法(如英语交际教学法)的实践困境,即“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不足。

支持教师顺利转型需提供系统性专业发展支撑。机构应提供持续、情境化的专业发展项目,并建立相应的创新教学激励机制。同时,需通过优化管理流程,实质性减轻教师的非教学性负担。专业培训的核心应聚焦于提升教师的“整合技术的学科教学知识”,并通过构建实践社群、推广经过实证检验的优秀教学案例,促进实践性知识的共享与迁移。

(三) 学生学习层面的挑战与策略

学生作为学习主体,面临“接入鸿沟”与“素养鸿沟”的双重挑战。在接入层面,偏远地区学生仍普遍存在智能终端设备与高速网络连接匮乏的问题,导致其被排除在智能化学习环境之外。在素养层面,部分学生难以适应新型人机交互模式;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元认知与自主学习能力的欠缺,可能导致学生对 AI 推送的学习内容形成被动依赖,从而抑制其自主规划、批判性思考与深度探究能力的发展。

对策需兼顾硬件接入与软性能力培养。在能力维度,课程设计应有意识地融入元认知策略训练,并可阶段性设定“无 AI 干预”的学习任务,以鼓励自主探索。在接入维度,需推动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协同的设备与网络援助机制。此外,应设计渐进式的人机交互适应课程,并在全过程中强化教师的人文关怀与情感支持,构建技术增强型的有温度学习环境。

(四) 政策与制度层面的挑战与策略

宏观制度环境的滞后是制约规模化、规范化应用的主要障碍。当前,缺乏针对 AI 教学产品的质量标准和教学效能评估框架及相关的数据安全与伦理规范,导致市场遴选与应用评估无据可依。此外,系统的初始建设成本高昂,加之持续的维护与升级费用,若缺乏有效的公共资源调配,可能加剧校际、区域间的数字化差距,衍生新的教育不公。

制度构建应从标准制定与资源供给两方面协同推进。当务之急是加快研制 AI 教育产品的质量规范与效果评估标准体系。在资源投入上,应加大公共财政对教育信息化,特别是薄弱学校的定向支持。同时,积极创新投入与运营模式,鼓励通过校企合作,探索“区域统一平台、学校

按需订阅服务”的轻量化、可持续模式，以促进优质教育技术资源的集约化建设与普惠性共享。

六、研究结论与未来展望

（一）主要研究结论

1.AI 赋能的双师英语课堂是技术逻辑与教育规律深度融合的产物，代表了未来教学范式变革的一个重要方向。

2.该模式的成功构建与有效运行，在系统论视角下，有赖于“技术、教师、学生、制度”四核心要素的统筹协调与协同进化，进而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共生的教育生态系统。

3.该模式在激发学习者内在动机、提供规模化下的个性化学习支持、以及提升教学管理效能方面展现出显著潜力，尤其为破解外语教学中的口语实践机会不足、优质教学资源分布不均等长期痛点提供了创新性解决方案。

（二）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研究局限：本文主要基于文献分析进行理论构建与推演，所提出的模式框架与对策尚未经过严格设计的实证研究检验，其实际效能与适用条件有待进一步验证。

未来方向：未来需开展长期、严谨的实证研究，比较该模式在不同学科领域、不同学段中的应用效果除此之外，需要进一步探索人工智能在模拟高情感卷入的语言交互情境、支持跨文化理解与教学，以及识别、响应学习者情感状态等更高层次教育目标中的应用可能；最后要将伦理考量置于前沿位置，积极推动建立兼具全球视野与

本土关怀的 AI 教育应用伦理准则与治理框架，确保技术发展始终遵循负责任创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吕涛.英语双师课堂对学生英语学习兴趣与动机的影响[C]//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2024 高等教育教学研讨会论文集（下册）.江西师范大学,2024:9-10.DOI:10.26914/c.cnkihy.2024.026368.
- [2]郭蓉蓉.基于人工智能的英语智能双师课堂构建研究[J].现代英语,2025,(11):51-53.
- [3]尤亚俊.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支撑下双师课堂研究——以初中英语学科为例[C]//中国智慧工程研究会.2024 数字化教育教学交流会论文集（上）.山东省济宁市泗水县泉林初级中学,2024:101-102.DOI:10.26914/c.cnkihy.2024.064292.
- [4]纪蓉.“双减”政策下双师课堂英语教学模式 的 实 践 研 究 [J]. 课 堂 内 外（高中版）,2024,(19):58-59.
- [5]唐先凤.双师云课堂,构建初中英语口语教学新模式[J].今日教育,2025,(02):60-62.
- [6]杨兰.双师推动下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式探究[J].学苑教育,2024,(06):40-42.
- [7]宁春.高职院校“双师型”英语教师专业能力标准体系构建研究[J].海外英语,2025,(14):222-224.
- [8]侯成英.初中英语听说教学中智慧教育平台的应用思考[J].新课程研究,2024(14):102-104.
- [9]许建华.以“双师课堂”助力农村小规模初中英语教学提质增效[J].教学月刊·中学版(外语教学),2023(4):78-81.

英语教材中“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实施路径

崔颖坤¹ 高淑婷¹

(1.太原师范学院, 山西 晋中 030600)

摘要: 当今时代, 人们越来越提倡培育文化自信, 进行跨文化沟通与交流; 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 其教育的文化传播功能也日益凸显。相关英语教材中关于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也成为人们实现培育文化自信, 进行对外传播的重要载体。本文主要研究英语教材“中国故事”内容为研究对象, 树立当前该类内容在教材中的运用现状, 剖析其教学实施过程中的困境, 进而提出针对性的解决途径, 旨在为英语教学挖掘更多有效的“中国故事”资源, 提升实际教学的参考意义, 助力实现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共同培养的目标。

关键词: 英语教材; 讲好中国故事; 语言能力; 文化素养; 多元评价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49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in English Textbooks

Cui Yingkun, Gao Shut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aiyuan Normal University, Jinzhong, China

Abstract: The teaching of content related to China’s stories in relevant English textbooks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cultivating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onducting external communication. Taking the content of “China’s stories” in English textbook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application status of such content in textbooks, analyzes the dilemmas in its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then puts forward targeted solutions. It aims to explore more effective resources of “China’s stories” for English teaching, enhance the reference value for practical teaching, and help achieve the goal of jointly developing students’ language competence and cultural awareness.

Keywords: English Textbooks; Telling China’s Stories Well; Language Competence; Cultural Awareness; Diversified Evaluation

一、引言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快速发展, 跨文化交流也变得逐渐频繁,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已成为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方式, 更是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文化传播要求(刘国辉, 2025)。英语作为全球通用的语言工

具, 在跨文化交流中有着关键作用, 英语教育承担着培养兼具语言应用能力与文化传播能力人才的使命。英语教材是英语教学活动开展的核心依据, 是课程理念与教学目标的外在体现, 其中蕴含的“讲好中国故事”相关内容, 既是语言学习的核心内容, 也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学生

作者简介: 崔颖坤(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高淑婷(2001—),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外语教学。

通讯作者: 崔颖坤

文化自信的重要工具。

当前,我国英语教材逐渐重视并融入“中国故事”相关内容,但教师在实际教学实施过程中,仍存在诸多问题,导致该类内容的潜在价值未能充分发挥,达到最初要求。基于此,本文系统梳理英语教材中“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运用现状,剖析其教学实施困境,并寻找可行的解决途径,对于推动英语教学与文化遗产、提升英语教学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讲好中国故事”内容运用现状

(一)教材内容融入逐渐增加

近年来,在课程改革与培养文化自信的导向下,中小学英语教材以及部分高校英语教材已经加大“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融入。从内容上来看,其范围基本涵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三大板块。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容最为丰富,包括传统节日、民间艺术、历史人物典故等;革命文化关注在红色历史事件与革命人物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侧重于国家发展成就,比如科技创新,生态文明建设方面。

从呈现形式来看,教材多采用主题单元以及分散渗透的方式融入“中国故事”内容。一方面,设置专门的主题单元,如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中的“Chinese Tea Culture”“The Silk Road”等单元,集中呈现相关内容;另一方面,在听说读写等不同模块中分散渗透,实现技能训练和文化吸收的融合。值得注意的是,小学英语教材也开始尝试融入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内容,如不同国家儿童节的文化差异,成为低学段文化渗透的重要尝试(方思颖,2025)。

(二)内容应用已初步开展但深度不足

在教学实践中,大部分教师已经意识到“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重要性,开始尝试将其融入课堂教学。在教学方式上,以老师讲授为主,通过讲解教材文章中的文化背景、词汇语法等内容,帮助学生理解“中国故事”内容;部分教师还会用图片展示、视频播放等直观方式,来吸引学生的兴趣和对相关文化的好奇心。在教学目标上,更多关注点在语言知识的学习上,比如与“中国故事”相关的英语词汇、句型等基础知识方面。

但从整体来看,“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深度明显不足。一方面,教师只停留在介绍文化现象,理解字词句的层面,未能深入挖掘其背

后的核心价值,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深刻的文化认知;初中英语教学虽通过情境创设等方式渗透中国故事,但多聚焦于文化现象的呈现,未能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化内涵与时代价值(谭纯,2025)另一方面,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之间存在障碍,教学中缺乏对学生用英语表达“中国故事”能力的系统训练,学生虽能理解教材内容,但难以自主运用英语向他人输出传递中国文化。

(三)教学相关支持资源丰富但适配性欠缺

为辅助“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相关部门逐步丰富了配套教学资源,如教师用书、教学课件、音频视频材料等。部分教材配套的教师用书会提供“中国故事”相关内容的背景介绍、教学建议等;同时,一些线上教学平台也上传了相关的微课等资源帮助老师进行资源辅助。这些资源为教学活动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支持。

但现有教学支持资源存在明显的适配性欠缺问题。一是教师用书提供的教学建议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的教学实施步骤与案例指导,难以满足不同教学水平教师的需求;不同阶段的教师均反映,现有资源针对不同学段无法有效指导一线教学(胡迎春,2025)二是配套资源多以语言输入类材料为主,如阅读文本、听力音频等,缺乏针对性的语言输出训练资源,比如口语练习、写作模板等;三是资源内容与学生认知水平的适配性不足,部分资源涉及的文化内容过于深奥或简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三、“讲好中国故事”内容教学实施困境

(一)教学目标定位不清晰

当前,大部分英语教师对“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目标不清晰,存在着重视语言习得,轻视文化素养的现象。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将核心目标聚焦于语言知识的传授与语言技能的训练,把“中国故事”内容视为单纯的语言学习素材,忽视了其文化遗产的核心价值。这种不清晰的目标导向,导致教学活动缺乏明确的文化传播意义,学生难以在学习过程中形成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交流的意识,无法实现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的共同提升。

此外,一些教师对“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理解不深入,将其简单等同于中国文化知识的讲解,未能认识到其核心是引导学生用英语准确、生动地传递中国文化,从而导致教学目标缺乏针对性与实践性。《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

年版 2020 年修订)》明确提出要培养“具备一定的跨文化沟通和传播中国文化的能力”，但多数教师未能将这一要求转为具体的课堂教学目标，仍停留在文化知识点的浅层讲解(唐书哲，徐剑，2025)。

(二) 教材内容过于碎片化

尽管当前英语教材中“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融入力度不断加大，但内容呈现仍存在碎片化问题，缺乏系统的整合。不同单元之间的“中国故事”内容缺乏关联，比如教材中讲解传统节日的内容与科技创新内容相互独立，未能形成文化上的相互关联；并且不同年级教材中的“中国故事”内容缺乏关联度，中小学阶段的文化内容与高中、大学阶段的内容重复或脱节，难以实现循序渐进的文化培育目标。

同时，教材中“讲好中国故事”内容与语言知识、教学任务的整合不够深入。多数情况下，文化内容仅作为阅读或听力材料的背景信息存在，与词汇、语法等语言知识的结合较为生硬，导致学生难以在语言运用过程中理解与传递文化内涵。

(三) 教学方法传统单一

在“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中，多数教师仍采用传统的教师讲授和学生被动接受的教学模式，教学方法单一。教师通过课堂讲解、PPT 展示等方式向学生传递“中国故事”相关的文化知识，学生则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缺乏主动探究与参与的机会。这种传统的教学方法，难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导致课堂氛围沉闷，教学效果不佳。

此外，教学过程中缺乏对真实跨文化交际情境的创设，学生难以在模拟的实践环境中锻炼用英语表达“中国故事”的能力。同时，小组合作、项目式学习等互动性较强的教学方法运用较少，学生的主体性难以发挥，无法实现对文化内容的主动探究与深度理解。小学英语教学中虽尝试开展少量故事表演活动，但缺乏系统性的项目式设计(方思颖，2025)，初中英语的任务设计多停留在课堂内，未能延伸至真实的跨文化交际场景(谭纯，2025)，而高中英语则缺乏对多体裁、多模态表达中国故事的教学方法探索(唐书哲，徐剑，2025)，各学段均未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四) 评价体系不完整

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是保障教学目标实现的

重要支撑，但当前“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评价体系存在明显缺陷。从评价维度来看，现有评价多聚焦于语言知识的掌握情况，比如通过笔试考查学生对相关词汇、句型的记忆与运用，忽视了对学生文化认知、文化表达能力以及跨文化交流能力的评价；从评价方式来看，以终结性评价为主，如期末考试、单元测试等，缺乏对学生学习过程的关注，无法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情况与能力提升过程。

此外，评价主体较为单一，主要以教师评价为主，缺乏学生自评与互评，导致评价结果不够全面、客观。这种不完善的评价体系，难以发挥评价的导向与激励作用，无法有效推动“讲好中国故事”教学目标的实现。小学英语虽然开展多元化的作业评价，但未将中国文化表达能力纳入核心评价维度，高中英语中对于学生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评价缺乏具体的指标和方法。

(五) 教师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不足

教师的文化素养与教学能力是影响“讲好中国故事”内容教学实施效果的关键因素。当前，部分英语教师存在文化素养不足的问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内涵理解不深入，缺乏系统的文化知识储备；同时，其跨文化交际意识与能力较弱，难以准确把握中西方文化差异，无法有效引导学生规避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使用问题。

在教学能力方面，部分教师缺乏对“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设计能力，难以将文化内容与语言教学有机融合；同时，其对新的教学方法、教学资源的运用能力不足，无法通过情境创设、项目式学习等方式提升教学效果。教师能力的不足，制约了“讲好中国故事”内容教学的有效实施。

四、“讲好中国故事”内容教学解决途径

(一) 明确教学目标定位

首先，教师应树立语言能力与文化素养协同提升的教学目标，明确“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核心目标是培养学生用英语传递中国文化的能力，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交流的共同发展。这一目标需要与各学段课程标准相契合，小学阶段需关注中国文化符号的认知与简单英语的表达；初中阶段侧重与文化内涵的理解与基本表达能力；高中阶段需要培养跨文化沟通能力。语言知识目标聚焦于与“中国故事”相关的词汇、句型、语

法等知识的习得；文化认知目标聚焦于学生对中国文化核心内涵的理解与认同；传播能力目标聚焦于学生在跨文化情境中用英语准确、生动传递中国文化的能力。

其次，教师应深入理解“讲好中国故事”的内涵，结合教材内容与学生认知水平，制定具体的课时目标与单元目标，确保教学活动始终围绕文化交流导向展开。

（二）系统整合教材内容

针对教材中“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碎片化的问题，教师应从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对内容进行系统整合。在横向整合方面，结合教材主题单元，将不同模块中的“中国故事”内容按照文化类型，比如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或主题，比如文化遗产、国家发展等进行整合，形成主题鲜明的文化内容模块；同时，加强文化内容与语言知识、教学任务的深度融合，将文化内涵解读与词汇、语法学习、口语表达、写作训练等有机结合，实现“语言学习”与“文化学习”的协同推进。小学英语教师可整合教材中的中西方文化对比内容，将中国文化词汇、句型与日常语言训练结合（方思颖，2025）。

在纵向整合方面，加强不同学段之间“中国故事”内容的衔接，依据学生认知发展规律，构建循序渐进的文化内容体系。例如，中小学阶段聚焦基础文化符号的认知与简单语言表达，如传统节日、民间艺术等；高中阶段聚焦文化内涵的深度解读与语言表达能力的提升，如革命精神、文化价值观等；大学阶段聚焦跨文化传播能力的培养，如中国发展成就、国际合作故事等。此外，可结合地方特色文化，补充本地文化资源，丰富教材内容体系。

（三）创新教学方法

首先，在课堂中推广情境教学法，创设真实的跨文化交际情境，比如创建“国际文化交流节”“外国友人来访讲解中国文化”等，引导学生在情境中运用英语表达“中国故事”。同时，充分利用多媒体资源，播放中国文化主题的英语纪录片、展示文化相关的图片与视频等，增强教学的直观性与趣味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其次，积极采用项目式学习法与小组合作学习法。以“讲好中国故事”为核心主题，设计具体的项目任务，比如“制作中国文化英语宣传手册”“拍摄中国故事英语短视频”“举办中国文化英语演讲比赛”等，引导学生分组合作完成项

目。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教师发挥引导者与组织者的作用，鼓励学生自主探究文化内容、设计项目方案、完成语言表达任务，充分凸显学生的主体性，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与团队协作能力。

此外，在课堂教学中可以引入任务型教学法，结合教材内容设计层次性的任务，如基础任务，例如掌握文化相关词汇句型、提升任务，比如解读文化内涵、拓展任务中可以用英语表达中国故事，引导学生逐步提升语言能力与文化传播能力。

（四）构建多元评价体系

首先，拓展评价维度。在语言能力评价方面，考查学生对相关词汇、句型的运用能力；在文化认知评价方面，考查学生对中国文化核心内涵的理解程度；在传播实践评价方面，考查学生在跨文化情境中用英语表达中国故事的能力；在学习过程评价方面，考查学生的课堂参与度、自主探究能力与小组合作表现。

其次，丰富评价方式，实现终结性评价与过程性评价的有机结合。终结性评价可采用口语测试、写作测试、项目成果展示等方式，全面考查学生的综合能力；过程性评价可采用课堂观察、学习档案袋、小组评价、学生自评等方式，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与能力提升过程，全面反映学生的学习成果。

最后，推动评价主体多元化，引入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相结合的评价模式，提升评价结果的全面性与客观性。

（五）提升教师素养与能力

首先，加强教师文化素养培训，通过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跨文化交际等主题的专题培训、研讨会等活动，帮助教师丰富文化知识储备，提升文化理解能力与跨文化交际意识；鼓励教师自主学习文化相关知识，深入挖掘教材中“中国故事”的文化内涵。

其次，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通过开展教学设计比赛、教学观摩、教研交流等活动，引导教师探索“讲好中国故事”内容与英语教学融合的有效方式；加强对教师新型教学方法、教学资源运用能力的培训，比如多媒体资源开发、情境创设、项目式学习设计等，提升教师的教学设计与实施能力。

此外，教育部门与学校应搭建教学资源共享平台，整合优质的“讲好中国故事”教学资源，如教学设计案例、教学视频、文化素材等，为教师教学提供有力支撑。

五、结语

英语教材中“讲好中国故事”内容的教学实施,是实现英语教育语言育人与文化育人双重目标的重要途径,对培养学生的语言能力、文化自信与跨文化传播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该类内容的教学实施仍面临教学目标不清晰、教材内容碎片化、教学方法单一、评价体系不完善、教师能力不足等困境。通过明确教学目标定位、系统整合教材内容、创新教学方法、构建多元评价体系、提升教师素养与能力等解决途径,能够有效破解这些困境,提升教学实施效果。

未来,英语教师应进一步深化“讲好中国故事”理念融入英语课堂当中,探索教材内容与教学实践融合的有效途径,不断优化自身的教学策略与评价体系,助力培养更多拥有语言能力与文化交流能力的优秀人才,对国际跨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参考文献

- [1]刘国辉. 高职英语课程“讲好中国故事”育人模式研究[J]. 辽宁高职学报, 2025,27(12):97-101.
- [2]方思颖. 巧用教材,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J]. 小学教学设计, 2024(04):14-15.
- [3]谭纯. 浅谈如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讲好中国故事”[J]. 天津教育, 2025(10):135-137.
- [4]胡迎春. 高职英语课程讲好中国故事教学路径探究[J].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5,28(05):65-69.
- [5]唐书哲,徐剑. 提升高中生用英语讲好中国故事能力的教学策略研究[J]. 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25,26(1):61-66.
- [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S].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0.
- [7]王蔷. 英语教学法教程(第二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1.

论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政治意蕴、理论表征与实践路径 ——基于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视域

张明¹ 艾珂欣² 应一卓³

(1.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新乡 河南 453007, 2.郑州信息工程职业学院, 郑州 河南 450121, 3.南阳市体育运动学校, 南阳 河南 473000)

摘要:教育家精神的时代内涵, 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的深度融合, 基于对“党之大计、国之重器”战略定位的把握, 结合国家发展需要与国民素质提升目标, 在继承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建构而成, 其本质特征是具有鲜明政治属性的价值导向和行为规范, 具体表现形式是信念与道德相统一的理想追求、知行合一的教学智慧以及以立德树人为核心的职业境界。弘扬教育家精神, 要从三个方面共同发力, 一是要唤醒教师主体意识, 二是要培育社会尊师风尚, 三是要健全制度保障体系, 这是落实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的根本要求, 也是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推进师资队伍建设和推进教育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进而为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强大助力。

关键词:教育家精神;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政治意蕴; 理论表征; 实践路径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0

Political Significance, Theoretical Manifestations, and Practical Trajectories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in the New Era: A Marxist Educational Perspective

Zhang Ming¹, Ai Kexin², Ying Yizhuo³

¹ Faculty of Education,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China, 453007

² Zhengzhou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Zhengzhou, China, 450121

³ Nanyang Sports School, Nanyang, China, 473000

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connotation of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originates from the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Marxist educational thought and the theory of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strategic positioning of education as "a matter of vital importance to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it is constructed by combining national development needs with the goals of improving national quality, while inheriting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eacher ethics. Its essential characteristic consists of a value orientation and normative framework with distinct political attributes. Its specific manifestations include the pursuit of ideals unifying belief and morality, pedagogical wisdom characteriz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a professional realm centered on "Lide Shuren"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Spirit of Educators, efforts must be made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awakening

作者简介: 张明(1998—), 男, 研究方向教育心理学;

艾珂欣(1998—), 女, 助教, 研究方向为教育心理学;

应一卓(1997—), 男, 助教, 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论。

通讯作者: 张明, 347079953@qq.com

the subj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eachers; second, cultivating a social atmosphere of respecting teachers; and third, refining th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system. This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implementing the socialist direction of schooling, as well as an important path for promot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eaching workforce, thereby providing powerful support for the strategic goal of building a leading power in education and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words: Spirit of Educators; Marxist View of Education; Political Implications; Theoretical Manifestations; Practical Path

一、政治意蕴：马克思主义教育观视域下“教育家精神”的生成逻辑

马克思深刻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教育家精神”的系统阐述与推广，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同中国本土实际和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蕴含着新时代背景下“两个结合”在教育领域的深刻内涵，“教育家精神”的出现并非偶然，而是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并逐步演进，在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这一理念的出现与发展既体现了国家战略目标的价值引领，也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支撑力量之一，其孕育与发展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发展^[2]。

（一）政治属性：党之大计与国之大计的必然逻辑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教育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是统治阶级维护和发展其生产关系的重要意识形态工具。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反映，并且以思想的形式表现着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3]。”因此，每个历史时期教育的实践和主体教师的精神特质，都不可避免地受到特定阶级属性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教育被赋予“国之重器，党之利器”的双重定位，这充分体现出其独特的政治属性。“教育家精神”正是这一政治属性的具体表现，已然成为当代教师群体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而逐渐转变为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源泉。

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在于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性，这种特性源于其阶级立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快速推进的当下，意识形态领域具有

隐蔽性强、动态变化大的特点，“教书匠”模式已跟不上新时代要求，“政治型教师”适时出现，这类教师要摆脱传统教学框架的限制，深入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4]，并积极将党的教育方针融入教育教学实践当中，经由课堂教学、师生活动以及校园文化建设等途径，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占据主导地位，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青少年群体中实现深层次内化和广泛传播。上述思想蕴含着马克思所提出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变革的一致性，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解释为革命实践”的教育学意义。在此种教育背景之下，教育工作者主动地革新教学行为，通过革新性的教学行为主动营造社会主义发展方向的社会氛围，并在革新性教学实践中实现自我身份的重塑和精神境界的提升。

其次，教育家精神的核心内涵可归结为以民族复兴为根本旨趣的人民立场，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人的全面发展”是其基本追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则凝练为“满足民众需求”的办学理念，作为这一思想体系的关键构成要素之一^[5]，便是“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之心”，这直接体现了教育的人民性，教育者要把个体对教育事业的热爱同最广大人民群众对优质、公平教育的期盼紧紧联系起来。教育家的“大爱”不仅体现在对眼前学生的关爱，更体现在胸怀“国之大者”，致力于通过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提升国民素质，为民族复兴培育最广泛、最深厚的人力资本。这种把个人价值完全融入国家和人民事业的价值追求，使得教育家精神突破了西方话语体系中基于个人主义、专业主义的“教师专业精神”，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主义、人民本位的教育伦理。

（二）时代价值：强国建设中“人的现代化”之核心驱动

从唯物史观的理论角度来说,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根本原因,“劳动者”被视为最具有活力的因素,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过:“人的劳动能力的形成和提高,需要经过一定的教育或训练过程”,在全世界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历史进程中,教育已经成为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当下国际竞争格局的本质就是人才争夺战和创新能力的比拼,很多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现象背后,根本原因在于缺乏高素质人才,解决这个瓶颈的根本办法就是深化教育改革,重点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工作。

首先,教育家精神蕴含着重要的时代价值,其根本意义在于推动教育实现从规模扩张向内涵发展的深刻转型,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资源经历了大规模扩充的过程,基础教育的普及阶段目标已经实现,“有学上”“上好学”成为新时期核心诉求,教育质量提出更高要求,单纯数量增长亟须转化为实质性提升。教育实践的重要指导思想“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与“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治学理念,成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支撑。这一思想启发教师跳出现有教育局限,构建教育艺术体系,最大限度地释放学生潜能及创造力;促使教师持续深化对专业知识理解,勇于应对专业前沿发展和综合素质要求的变化挑战。只有酝酿出大规模专业素养优良且锐意创新的“教育家式”教师群体,课堂教学层面才得以迈向质的提升阶段,面向未来的丰富人才梯队才能成功被培养出来。

其次,教育家精神是促成“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跃升的关键转化机制^[6]。我国教育体系在世界范围内规模较大,伴随较多的人力资源优势并存,如何使人口数量优势转变为优质的人才储备以便最终实现产出,已成为当前教育领域亟须解决的关键课题之一。教育家精神着重“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理念,在历史上以中华民族伟大精神持之以恒地培育教诲后人,此种培养路径所涵养的学生,他们能够铭记情操,在国家复兴蓝图中感到自己的存在感,同时具备国际意识。崇尚“以文化人”,期待华夏英才在朗朗乾坤中健康成长,让受教育者成为中华民族和世界各地文化的有组织部分,这种行为既可使人才池达到中坚地位,又能促使人力资源系统进行高级塑造,培养适配建设、产业升级与创新的文化引领者,塑造民族复兴的全球公民,也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不知不觉间将重大资源转变为物质领域的产业财富优势。

(三)文化基因:师道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真理力量下的当代激活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两个结合”重要论述,为阐释当代中国精神文化现象提供了根本遵循,教育家精神作为这种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具体表现,不是孤立的概念或者抽象的存在形式,而是基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对中华五千年师道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结果,这种精神内涵融合了时代特征,借助现代话语体系予以表现,体现了很强的历史底蕴和实践价值。

一方面,教育家精神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崇高理想,并将其具体化为中国特色教育实践的目标^[7]。马克思所构建的理想社会愿景,是为了消除传统劳动分工模式以及异化现象,推动个体在智力、体力以及社交能力等诸多方面得到全面发展,教育家精神中的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促使教师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发展理论的实践诠释,根据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即认知来源于社会实践又服务于实践,在教育领域具体表现为“勤学笃行、求是创新”的内在要求,促使教育工作者立足本土实际,在复杂多变的教学情境中探寻规律、推动教学创新。

另一方面,教育家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师道理念融为一体,其中包含的“尊师重教”文化传统积淀着深厚的过往,以道为本位的师德思想作为核心要义,发挥了教师在价值导向和人格塑造方面的特别位置,“传道、授业、解惑”这一韩愈《师说》提出的观点,表明了教师在知识传授和启迪思考方面的关键作用,而且突出了教师在道德典范和情感培育方面的重大责任,“有教无类”与“诲人不倦”的理念,体现着教育公平的追求和无私奉献的品格,这些要素与现代教育家精神里责任担当、仁爱育人的人文情怀以及道德表率功能相互映照,并加深了两者之间的联系。中国古代哲学所涉及的理想师者的双重特征——既有学术造诣又有伦理风范(“经师易得,人师难求”)这一思想观念,为解决马克思劳动异化的理论难题提供了特殊的东方智慧。教育异化现象的出现,会让教师角色慢慢变成机械式知识传授者,从而背离教师的根本任务——培养各方面发展的人。根据教育家理论,“经师”变“人师”的实质就是打破传统束缚,重塑教育本质——以师生互动、情感交流和共同成长为核心来培养

人,“教学相长”理念也就有了更深远的历史意义,在中国社会语境下实现了文化传承与现代价值的有机结合,并给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赋予了新的生命力和发展前景。

二、理论特质:当代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多维内涵表征

教育家精神不是一些优秀品质的简单罗列,而是一个严密的逻辑体系。它以马克思主义人学理论、实践哲学和价值观为基础,对新时代教育者精神世界进行系统建构,呈现出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辩证统一、育人智慧与勤学笃行知行合一、乐教爱生与弘道追求境界升华等多重理论特质,这些特质共同勾勒出“教育家型教师”丰满而崇高的精神肖像^[8]。

(一) 理想信念与道德情操的辩证统一

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人的主体性的生成与发展,同价值观念及道德规范的培育密切相关,“理想信念”作为精神层面的引导力量(为何而行),包含行动目标与精神动力两个方面;

“道德情操”作为行为准绳与规范的基本遵循(如何处世),是个人品德塑造的关键载体。它们彼此关联、相互推进,在实践中自觉达成某种有机结合。“教育家精神”实质是塑造既有崇高理想激情又有高尚人格的人才类型,这个描述契合了上文所述主体性建构的深层意义与现实价值。

“心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理想信念是教育家精神的灵魂和旗帜。“大我”不是狭隘的个体利益和小团体意识,而是国家、民族和人民这个集体性的“大我”。要求教育者将个人的教育生涯自觉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把教书育人当作报效国家、服务人民的崇高事业来追求。理想信念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赋予教育者一种超越日常琐碎和职业倦怠的宏大意义感和历史使命感,在平凡的教职岗位上坚守初心,在纷杂的思潮中保持定力。正如马克思年轻时为自己立下的誓词,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使自己幸福的职业,则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至诚报国”正是这种“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选择在当代中国教育家身上的具体映照。

“言为士则、行为世范”,这是教育家精神的伦理要义与基本特征所在。没有高尚品德作为支撑基础,个人的价值导向很容易陷入虚无化或

形式主义陷阱之中。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显示,道德观念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分化的背景下,阶层属性十分明显^[9]。社会主义背景下的教育家所具有的道德素养,是无产阶级及其人民群众的价值追求的体现。“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是教师职业伦理的重要原则之一。教师的一言一行都是直接的教育资源,且具有深远影响。

“言”需严谨、真诚、具有启发性,“行”需恪守公正、廉洁、担当责任,成为学生的榜样。上述要点大多集中到教育平等坚持不懈、一心遵守学术规矩、热切关心每一位学生这三大方面。这一类伦理品质的养成并非外界强加的结果,而是来源于自身内心所具有的自我约束意识,成为个人信仰在生活中的反映形式。“立德树人”这个核心理念通过理想信念给予价值导向和强大动力,使其拥有深远的意义指向。在道德情操方面,它起到了至关重要的纽带作用,为一个人品行的全面发展达到标准,提供了坚实可靠的铺垫和发展可能性。“立德树人”这些思想将二者融合,成为支撑专业能力发展的框架内容。

(二) 育人智慧与勤学笃行的知行合一

马克思主义实践哲学的精髓在于“知行合一”,强调理论联系实际,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10]。“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是教育家精神的核心育人理念,“勤学笃行,求是创新”是教育家的治学态度,“双核要素”有机融合是落实教育哲学的重要支撑,也是教育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教学智慧的集中体现,它折射出教育工作者严谨的职业操守和务实的工作作风。“启智”更侧重以启发为核心理念的育人方式,借助情境化的问题创设与适时地引导,让学生探究的兴趣、创新意识、批判性思维得以激活,从而促进学生自主学习素养的发展。“润心”更侧重情感培育的意义,是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营造人文关怀的氛围,通过潜移默化的道德熏陶塑造学生健全的人格结构、坚定的信念和科学的世界观、价值观体系。“因材施教”作为教育理论的核心理念,蕴含了对个体差异性特质的深刻认识,每个学习者都是拥有独特生命属性的存在主体,其潜能水平、兴趣倾向与发展节奏均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特征,教师需要具备敏锐的观察力与人文关怀精神,精准把握学生的个性化需求,并据此设计针对性的教学方案,使每位学生的发展目标得到最大限度地实现,“因材施教”的实践既蕴含理性思维的价值追求,又蕴含着深厚的人本主义情怀。

“勤学笃行、求是创新”体现了教育家行动理念的基本内涵,“勤学”是基础。在信息化、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教育工作者应树立终身学习的理念,积极吸收前沿成果充实自我。“笃行”是关键,任何先进思想只有付诸实践才能发挥功效,教师需深入课堂现场,关注学生需求变化,结合教学实际开展教研活动,通过不断反思与改进提高教学质量。“求是”是要求,要运用科学方法探究教育本质规律,反对盲目照搬或机械套用旧模式,倡导实事求是。“创新”是在突破传统经验基础上的发展,要符合时代变革趋势,构建适合现代发展的新型育人机制。“勤学—笃行—求是创新”发展路径呈现出螺旋式递进的特点,其内在本质在于教育理念的指导意义,把理论知识转化成实践方案,并不断检验和改进策略以实现知行合一的目标,促进教育教学质量的持续提升和创新发展。

(三) 乐教爱生与弘道追求的境界升华

马克思主义理论追求人类自由全面发展,饱含深厚的情感内涵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1]。教育家精神是从“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心出发,进而发展为“胸怀天下、以文化人”的精神。教育家精神的职业情感发展历程,既体现了教育家精神的本质价值和超越性特点,也全面地诠释了教育家精神的内涵及意义。

“乐教爱生、甘于奉献”的仁爱情怀是教育家精神的内核与动力。教育是一项生命影响生命的实践活动,教育的本质在于个体心灵的交互发展。“乐教”是指教师对教育事业有着深厚的认同感和积极的情感投入,这促使教师在日常教学中持续探寻教学乐趣,追寻成长的意义,实现自我价值,从而有效缓解职业倦怠,持久保持工作热情。“爱生”理念是激发这些情感的最关键驱动力,它超越了传统血缘关系和功利主义的局限。

“爱生”最核心的内涵就是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全面把握并满足个体差异化需求,在最大程度上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爱生”思想把“甘于奉献”当作情感支撑,教育工作者就会投入更多的时间、精力和智慧,并把学生学业进步当作最高追求目标,体现出崇高的职业道德品质。“爱生”精神源自仁爱之本,也是衡量优质师资的重要伦理标准之一。“胸怀天下,以文化人”,这种精神体现了教育家们的精神追求与理念坚守,推动教育者既要关注个体内在的成长需求,更要关心国家兴衰、民族盛衰、世界文化发展进步等

关乎整个人类文明走向的重大问题,并且致力于造就兼具家国情怀与世界眼光的新一代人。“以文化人”这一实践路径在于通过对人文资源的良好整合。“文”包含古今中外所有优秀文化的遗产,包括其内容的思想真善美;“化”强调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地塑造”。教育家通过选择、阐释与传播文化内涵,让学生体会人类文明的多样特质与内在一致性,自觉地传承民族文化精华,吸收世界先进思想成果。把外在知识转化成自己的价值认同、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促进人格的完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乐教爱生”的教育理念以情感为纽带,“弘道求真”实现了个人情感到社会责任意识的升华。这种升华不仅促进了学生的成长,还赋予教师在赓续文脉传承中的长久意义与广泛社会影响。

三、实践指向:新时代“教育家精神”的弘扬路径与制度保障

伟大精神具有持久的生命力,教育家情怀从理念转化为广大教师的行动,需要系统推进全方位保障,这是一项涉及个体提升与教育事业发展全局的社会工程与制度建构^[12]。弘扬教育家精神需要整体性思维,应构建以师德自律为核心、以社会尊师重教氛围为依托、以科学完备政策为基础的“三位一体”实施路径。

(一) 主体自觉:教师群体从“教书匠”向“教育家”的范式转型

外部环境的改善离不开内部机制的推动,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实现离不开教师内在发展的内驱力,推动教师从知识的传递者到知识的主动创新者的转变,实现教师从传统知识传授者到学生引导者的深刻转型,需要教师在三个层面实现主体意识的觉醒^[13]:

一是价值认同的自觉。教师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深入研读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教育精髓,全面把握其政治意义、时代意义以及文化根基,从内心深处坚定“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将自己的职业发展同国家教育战略结合起来。这种认同不能停留在表面,要通过参与扶贫支教、支援边疆地区、服务国家战略等实际行动,在实际工作中体会教育事业的伟大价值,从而筑牢信仰信念之基。

二是发展主体意识。身为教育工作者,成长为优秀的教师就必须拥有深厚的功底,树立学者

型角色是其成长的首要前提,要把教学转化为课题,形成反思体系。通过撰写案例分析报告,实施行动研究计划,参加校内外协同备课等途径,在日常教育教学中不断追问“如何提升课堂有效性?”“如何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从而逐步提炼出具有个性化的教育教学理念,塑造独具特色的教学风格,突破学科壁垒和校园范围限制,借助互联网整合多方资源要素,积极融入专业社群网络,在互动中拓宽认知视野,激发创新意识。

三是自觉加强道德修养。“行为世范”映射了终身学习观念的核心特征,教育工作者需持有批判性思维,依据教育家精神蕴含的道德准则,审慎考量自身言行,并将其转化为实践指导。“行为世范”内涵包含践行教育公平(诸如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捍卫学术诚信,恪守师德底线,抵制物质诱惑等),而且可通过学校及行政部门组织的师德典范剖析、廉洁从教专题培训、违规案例警示教育等形式,把外在约束内化为自觉自律意识,并融入日常教学活动当中。

(二) 环境塑造:营造尊师重道与鼓励教育创新的社会生态

教育工作者的职业发展和价值实现离不开公正、包容、富有激励功能的外部环境,全社会要共同营造出有利于优质师资涌现、成长的良好生态体系^[4]。

首要任务是塑造崇尚师德的社会文化环境,要借助主流媒体平台全方位展现优秀教师的事迹和高尚品质,着重凸显基层教育工作者长时间耕耘、毫无保留地付出辛劳并取得卓越成绩的典型代表。要着重改变人们对教育领域负面新闻过度关注且片面解读的情况,从很多方面阐释教师群体的总体贡献和精神内涵,切实提升他们的好名声和社会认可度。倡导文艺界创作以教师为主题的原创作品,借助多种媒介形式弘扬优良师德传统,促使尊师重教观念深入人心,达成共识。

其次,改善学校内部治理体系算是关键举措之一,管理层要秉持“以教师发展为中心”的教育理念,简化繁杂的行政事务,减轻教师的数据填报负担,削减无必要的绩效考核频次,给一线教学充裕的时间和空间,塑造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允许教师在课程设计、教材编制以及评估方法革新等方面展开探索性的实践,创建自上而下的扁平化交流平台,做到师生群体可以充分参与到校务决策之中,在知情权、话语权和监督权方面做到全覆盖,进而增强其职业认同感和责任感。

最后,构建协同育人的支撑体系,践行教育家精神和“立德树人”理念,突破传统校园边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是当务之急,深化家校社合作,引导家长深刻认识并认同学校办学宗旨,凝聚多方育人力量,加强学校与科研院所、公共文化机构、企事业单位、社区的合作与联系,为师生搭建多样化实践平台 and 专业化发展通道,在开放的环境中不断促进师生发展,推动教育事业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

(三) 制度支撑:评价体系改革与长效激励机制的构建

稳定、科学且导向明确的制度设计,是促使教师向教育家转型的重要保障和长效动力机制,唯有依靠系统性改革,才能真正破解阻碍教育家成长发展的深层次体制约束问题^[5]。

一是改革教师评价“指挥棒”。坚决扭转长期以来教师评价中存在的“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推行以“立德树人”成效为核心的多维评价体系。在评价内容上,把师德师风摆在首要位置,加大教育教学实绩、学生全面发展贡献度、育人创新实践、社会服务等方面的考核权重。在评价方式上,采取同行评议、学生评价、家长反馈、第三方评估等多种方式,注重过程性评价和增值性评价。对于不同学段、不同类型的学校教师,要实行分类评价标准,让各类教师都能在自己的领域追求卓越。

二是健全教育家成长的阶梯式培养和激励机制。构建教师职业生涯全周期的专业化发展支持体系。在教师培养阶段就要加强理想信念和师德教育,渗透教育家精神启蒙。在职后培训中,设立骨干教师、卓越教师、教育家型教师进阶式高端研修项目,提供国内外访学、跨界研修、导师制培养等机会。建立国家、省、市、校多层次的教育家型教师荣誉体系和认定制度(如“教育家型教师”“卓越教师工作室主持人”),与职称晋升、薪酬待遇、资源倾斜等实质性激励挂钩,让潜心育人的教师有地位、有荣誉、有发展。

三是创建创新型教育家办学与示范引领的运作机制。要赋予符合条件的教育家型教师更大的办学自主权,让他们创办或经营特色学校和改革实验班,把先进的教育理念变成实际成果,“名师工作室”“校长工作坊”等模式要完善起来,让教育名家的带动作用发挥出来,借助师徒传承,现场指导和线上协作等方法,让个体的经验变成群体的财富,做到“孵化一个人,带动一大片”,

创建长效的交流平台,让教育家深度参与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制订以及相关标准的修订。

四、结语

教育是国之大计。当代中国“教育家精神”的培育和践行,体现为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中国化、时代化”与中国现实和传统师道文化的互融性。其“本质含义”深深植根于“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政治精神,以“心怀天下,矢志报国”为根本理想信念和“立身之本”,又以“启智润心,因材施教”与“乐业敬业,甘愿奉献”相融汇的教育智慧和职业情怀为支撑,逐步生成。“胸怀世界,文化立人”的终极本质,则彻底回应了新时代“强国兴邦,教师应何以担当”的历史问题。践行教育家精神的本质就是其具体落实。既包含着教师个体从传统知识传授者转变为现代育人者的自我转变,也蕴含着社会各界营造尊师重教社会氛围,构建制度,破除“五唯”,建立新型评价体系。“教育家精神”的践行更在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及服务国家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青年责任与担当。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2] 汪立峰.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家精神的重要论述学术交流会在京举行[J].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5,(06):150-151.
- [3] 严卿.论《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与自然统一思想及其当代启示[J].湖南社会科学,2025,(04):9-16.
- [4] 刘虹.立德树人背景下高校师德师风长效机制的构建——评《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J].教育发展研究,2025,45(20):86.
- [5] 刘佳.习近平关于“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重要论述探析[J].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4,(03):137-145.
- [6] 黄斌,何沛芸.教育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键路径[J].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5,13(05):1-11.
- [7] 邱仁富.马克思“自由人的联合体”蕴含的相互性及其当代价值[J].江苏社会科学,2025,(05):1-10.
- [8] 成尚荣.教育家精神照耀教育强国建设征程[J].中国教育学刊,2025,(05):1.
- [9] 韩汶轩,崔昆.唯物史观基础上马克思主义道德建构问题考察[J].社会科学家,2025,(06):63-71.
- [10] 许月,丁俊萍.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J].党建,2025,(08):33-34.
- [11] 孙熙国,瞿杨.“人的现代化”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统一——兼论中国式现代化对西方现代化的超越[J].思想战线,2025,51(04):1-7.
- [12] 唐明超,翟雨辰,朱晓宏.教育家精神的理解与践行:一种实践的思维方式[J].教师教育研究,2025,37(03):1-6.
- [13] 杜黎明,马敏.自觉引领型历史主体: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体类型学研究的新范例[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52(06):23-32+195.
- [14] 卓泽林.提升高等教育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一个新的分析框架[J].教育研究,2025,46(11):41-54.
- [15] 李庆丰,秦惠民.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质量保障理论体系构建的四重逻辑[J].高等教育研究,2025,46(03):20-30.

基于“金课”理念的地理学一流课程建设路径研究

江进德¹ 李子杨¹ 罗云娟¹ 邢文旋¹

(1. 阜阳师范大学, 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金课”建设是高校本科教育转型发展的立足点,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在“金课”概念内涵分析基础上,总结高校地理学“金课”建设中面临的教学过程缺乏场景化、教学手段单一、考核重知识轻能力等一系列现实阻碍。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四个方面,分别论述地理学“金课”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希望促进地理学课程的“金课”建设,实现地理课程的精品化;同时为其他学科的“金课”建设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 地理学; 金课建设; 实施路径; 人才培养

基金项目: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 (2025zyxwjxalk296; 2023jyxm0543; 2024xsxx040);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S202410371175; S202410371185; S202510371076; S202510371156)。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1

Research on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Golden Course" construction in Geography

Jiang Jin-de¹, Li Ziyang¹, Luo Yunjuan¹, Xing Wenxuan¹

¹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Anhui, 236037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is the foothol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carry ou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golden course", this paper analyzes a series of practical obstacl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of geography in universities, such as the lack of scene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the single teaching way, and the assessment of knowledge over abilit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 of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in geography from four aspects, including teaching syllabus, teaching content, teaching mode and evaluation method. The research hopes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of geography curriculum and realize the refinement of geography curriculum.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golden course" of other disciplines.

Keywords: Geography; Golden course; Implementation path; Personnel cultivation

作者简介: 江进德(1985-),男,安徽安庆人,博士,阜阳师范大学,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地理学科教育。联系邮箱:981871556@qq.com;
李子杨(2002-),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地理);
罗云娟(2003-),本科生,研究方向:地理学科教育;
邢文旋(2005-),本科生,研究方向:地理学科教育;

通讯作者: 江进德

“金课”的概念最早由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在2018年6月21日召开的中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陈部长向全国教师号召：消灭“水课”，建设“金课”。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指出，“金课”就是一流课程，其评价标准为“两性一度”：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吴岩司长强调：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学生从大学里受益最直接、最核心、最显效的是课程^[1]。“金课”的基本特征是师生互动、关注过程、严格要求，治理“水课”、打造“金课”的途径是实现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考试为中心到学习为中心，学科为中心到专业为中心的转变^[2]。

本研究关注地理学的金课建设，注重以学生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学生能力提升为中心，按照金课的建设标准和要求，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和考核方式等方面创新设计“金课”建设的实施路径，促进地理学课程的“金课”建设，从而使课程达到高阶性、创新性、有挑战度，实现从教师为中心到学生为中心，从考试为中心到学习为中心，从学科为中心到专业为中心的转变^[3]。同时研究希望将理论成果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对理论成果进行不断的修正和完善，通过课程的金课建设，最终实现课程的精品化。

1 高校地理学“金课”建设的现状及问题

打造“金课”已成为高校课程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工作。“金课”建设的要求是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将探究式、互动式、启发式的教学模式运用到课堂教学，课程设计以学生素质和能力发展出发点，通过教学模式创新，使课程达到高阶性、创新性、有挑战度，受学生欢迎，满足学生需求^[4]。“金课”是新时代教学背景下提出的新理念，目前地理学很多课程的建设仍没有达到“金课”的建设标准而亟待加强和设计。按照“金课”的建设标准和要求^[5-6]，目前高校地理学实践教学普遍存在教学过程缺乏场景化，难以实现解决问题能力提升；课程教学手段单一，难以实现师生互动；课程考核重知识轻能力，难以实现课程挑战性等现实问题，影响课程的建设效果和教学质量，具体问题详述如下：

1.1 教学过程缺乏场景化，难以实现解决问题能力的提升

地理学是研究地球表层自然要素与人文要素相互作用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格局及影响机制的一门学科，其研究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开发和保

护地球表面的自然资源，协调自然与人类的关系。地理学是一门与日常现象、日常问题关联极其紧密的课程，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实践性和专业性。从目前的教学现状来看，地理学中绝大多数的知识点尚未与实际场景建立关联，容易导致学生对知识点缺乏深入理解，学完之后，不知用在哪里，也不知该怎么用，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受限，导致课程对解决问题能力培养的支撑作用有限，容易使学生丧失对课程核心价值的认知，甚至失去学习的兴趣。

1.2 教学手段单一，难以实现“师”与“生”的互动

目前地理学的课程教学由于受课程内容多、课时少、教学手段单一等现实原因，导致课堂主要以“教”为主，师生间缺乏互动的环节和空间。在课程教学中过于强调“教”，未能调动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导致学生思考探究的时空受限，对课堂的教学效果、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主动性的提高、相关能力的提升等都造成负面影响。同时，由于师生缺乏互动和了解，老师很难根据学生的学习反馈对课程教学模式进行有效的调整，同时也无法实现课程教学的个性化。

1.3 考核重知识轻能力，难以实现课程挑战性的提高

从目前地理学课程的考核体系来看，突出的问题主要体现在重知识考核而轻能力运用，考核方法较为简单、考核方式相对单一等。从课程终结性考核的内容来看，很多课程的考核试卷主要以识记性知识点为主，能力分析型的知识点较少。在形成性评价中，对于学生应用能力考核的难度相对较低，其广度深度还有待拓展和挖掘。

2 高校地理学“金课”建设的实施路径

鉴于地理学金课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同高校地理学金课建设问题的差异性。本文尝试从教学大纲、教学内容、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四个方面，分别论述地理学金课建设的具体实施路径。由于文章篇幅有限，每个方面只选择一个具体的实施路径进行论述分析，为其他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具体如下：

2.1 重构课程教学大纲，突出课程引领性

按照金课的打造标准和建设要求，在人才培养方案的指引下设计课程教学大纲；在教学大纲

制定过程中，首先确定课程教学目标，关注课程教学目标和毕业核心能力要求间的关系；基于核心能力培育指向下，构建专题化、前沿性的教学内容；确定课程各教学环节的教学方法和教学重难点。以地理学核心课程经济地理学的教学大纲制定为例，探讨地理学金课建设背景下，经济地理学课程教学大纲的制定过程，如下：

(1) 在人才核心能力培育目标下，确定课程目标。课程目标的设定要支撑人才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每一个课程目标至少应当对应或支撑一个毕业要求；为保证所设计的课程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对应关系，构建毕业要求与课程目标相互支撑的关系矩阵表，进行毕业要求观测指标和课

程目标的达成度和关联度的分析（如表 1）。

(2) 课程目标的达成需要一定的教学内容体系来支撑，所以构建科学合理的课程教学内容对于课程目标的达成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首先要理清每一章节的课程教学内容所对应的课程目标，基于达成课程目标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具体的课程内容安排设计中，要确保每章节所选的教学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作用。因此，在具体的课程教学内容安排设计前，需要明晰该部分教学内容在整个培养目标体系中的作用和贡献。在实践操作中构建课程教学内容体系对课程目标的支撑关系矩阵表以明确每部分教学内容对课程目标的支撑作用（如表 2）。

表1 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的关系（节选）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支撑强度）	支撑的毕业要求指标点
课程目标 1	3.学科素养 (H)	3.1 掌握地理学科的基本知识、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理解地理学科知识体系、基本思想、方法及其独特性。 3.2 了解地理学科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了解地理学科与资源环境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的联系。 3.3 了解地理学科及相关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发展趋势，具备运用地理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初步具备开展地理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
课程目标 2	4.教学能力 (M)	4.1 具备教师通用职业技能和中学地理学科教学基本技能，掌握教育教学的基本理论知识，能够运用教育学、心理学基础理论指导中学地理教学实践。 4.2 在教育实践中，能够依据现行的中学地理课程标准，针对中学生身心发展和地理认知特点，运用地理学科知识和信息技术，进行教学设计、教学实施和教学评价，获得教学体验。
.....		

注：课程教学目标对毕业要求的支撑强度关系为：H 强相关，M 中等相关，L 弱相关。

表2 课程学习与课程目标的关系

课程内容	教学方法	支撑的课程目标	学时安排
第一章 绪 论	讲授法	课程目标 1	2
第二章 城乡划分和城市地域	讲授法、专题研讨	课程目标 1、3	4
第三章 城市的产生和发展	讲授法、案例教学	课程目标 4、3	6
第四章 城市化原理	讲授法、研讨	课程目标 3	6
.....			
第十三章 城市问题	案例教学、专题研讨	课程目标 2、4	5

2.2 遴选前沿教学内容，展现课程高阶性

本部分基于教学大纲中的课程定位及课程体系选择和构建课堂教学内容；具体在融合多种教材精华并吸收权威学术期刊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择前沿性内容以专题学习的组织形式构建基本的教学内容；重新梳理章、节、知识点，以学生职业需求为导向进行课程教学内容的整体设计。根据新形势的学习需要，引入和增加前沿性、时代性的教学内容如目前教学改革的重点和热点问题：课程思政元素的课堂教学与运用。课程思政教学是目前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向^[7]，本文以课程思政融入教学、提升教学内容高阶性为目标，论述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思政目标及融入思路。

课程思政是借助专业课程渗透思想政治教育，或将思想政治教育元素融入专业课程的教学实践活动^[8]。课程思政教育首先要充分挖掘各学科、各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然后将这些思政元素融入到课程的教学中去，达到将思想政治教育融入高校课程教学的各环节、各方面，实现立德树人润物无声的效果^[9]。高校思政教育工作是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不可少且至关重要的关键环节，是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和建设者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举措。因此，本研究以地理学专业核心课程城市地理学为研究对象，围绕城市地理学的课程教学内容，挖掘城市地理学中的课程思政元素，归纳、总结课程思政元素的专业融入点，设计思政元素的教学融入思路，探索课堂教学的思政融入策略。通过研究希望加深思政元素与专业知识的融入程度，提升专业课程的思政育人效果；同时也希望作为“遴选前沿教学内容，展现课程高阶性”中课程教学内容遴选的一个参考范例。

以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等编著的《城市地理学（第二版）》教材为研究对象^[10]，参考地理学相关的课程思政研究^[11-14]，首先设定城市地理学的课程思政目标；然后，根据各章节的教学知识点，寻找专业知识和思政教育的融入点；其次，挖掘融入点中蕴含的思政元素，设计思政融入思路，从而达到专业教育的同时取得较好的思政育人效果。因此，围绕城市地理学课程思政目标，选择部分章节挖掘其中的思政元素并设计思政融入思路（如表3）。

表3 城市地理学课程思政元素、思政目标及融入思路（节选）

章节信息	思政融入点	思政目标及融入思路
绪论	1. 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历程 2. 城市地理学家及其科学精神	1. 通过学习和评价中国城市地理学的发展历程，让学生了解城市地理学的历史使命，专业学习立足于服务国家的战略需求，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及社会责任感。 2. 通过介绍国内外城市地理学家及其功绩贡献，使学生体会并传承老一辈学者刻苦钻研的探索精神，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同时建立学术上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明确知识创新要为国家服务的决心和使命。
城市化的历史进程	1. 1949 年以前中国城市发展史 2. 当代中国城市化进程 3. 世界城市化进程	1. 展示不同时期的中国城市发展史及城市发展成果，帮助学生认识和理解中华几千年的城市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情感认同、文化自信和民族自信等。 2. 通过介绍建国以来中国城市化的发展进程，了解和认识中国城市发展的基础国情；培养学生爱国爱党的家国情怀，坚定中国城市发展的制度自信和道路自信。 3. 通过对世界城市化进程的介绍，使学生清晰认识国外的城市发展情况，了解世情；理性接受中国城市发展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存在的差距，引导学生认清中国城市发展的世情、国情和民情，拥有既不自妄自菲薄也不盲目自大的品格；使学生明白中国城市发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多的事要做，引导他们刻苦学习、勇于担当的使命精神，为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		

2.3 设计“以学为核心”的教学模式，强化课程创新性

本部分主要关注如何将“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模式转变，从教师怎么教向学生怎么学转变。通过利用自主学习、案例讨论、议题分析、线上与线下、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模式的设计和运用实现以老师教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为中心的转变。本部分以地理学野外实践教学为例，设计野外实践的教学模式，探讨地理学“金课”建设中教学模式从以老师教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为中心的转变过程。

高校地理野外实习实践是地理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环节，是学生将课堂所学知识与实践有机结合，形成认知的重要过程^[15]。它既是课堂教学的延伸和延续，也是培养学生野外学习能力、学习方法的重要过程，更是提升学科核心素养的必然途径。野外实践教学是地理学课程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构成部分，对于培养学生的野外观察能力、实践操作能力和综合性地理思维能力具有重要意义；野外实践教学模式也是强化理论知识的实践运用，提升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16]。

关于野外实习实践教学内容，本着以学生能力培养为根本，以融合地理学三大分支学科（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信息科学）为导向的原则进行设置。结合实习实践基地情况，以“人地关系”为主线，整合基地的地形、地貌、地质、水文等自然要素和历史、街区、旅游、文化等人文要素，以及所形成的产业布局、空间结构、土地利用等综合交叉要素设置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实习教学内容；利用地理信息科学专业中的技术理论，开展数字地形建模、空间分析、专题制图等教学，实现地理信息科学与自然地理、人文地理的深度融合。完成构建深度融合中的自然地理、人文地理、地理信息技术等学科内容为一体的综合野外实习实践教学内容体系^[17-18]。在实习实践教学过程中强调“点”（观察点）、“线”（实习路线）的基础上，强化“面”（区域、案例）的综合和交叉，以地理现象与地理环境为中心通过地理学三大学科理论知识的融合教学，从而将分割的自然地理要素与人文地理要素串联起来。

野外实习实践的教学方式主要可划分为四大教学模块：（1）在固定的实践点，教师讲授相关知识点，帮助学生将课本中的理论知识和现实中的地理实践联系起来，加深地理现象的基础认知、拓展课本理论知识（第一模块）；（2）在实地讲解

过程中教师会适当的提出一些学科理论中的相关问题，布置相关的学习任务，启发学生的主动思考并尝试解决问题（第二模块）；（3）白天实习结束后，晚上进行实习的总结汇报，要求学生自选主题、自选内容汇报白天实习实践中的所学、所悟、所感，让学生之间互相交流、探讨，培养他们自主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第三模块）；

（4）返校后要求学生进行实习实践的全面总结，撰写实习实践报告，对野外实践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分析、综合总结（第四模块）。通过以上几个模块的教学，学生自主作用的发挥逐级提升：由第一模块教师主讲、学生学习（老师起主导作用）；第二模块教师引导、学生思考（老师起引导作用）；第三模块学生汇报、教师点评（老师起辅导作用）；第四模块学生总结、老师考核（老师不起作用）。从而逐步完成教学环节由教师主导向学生主导的过渡。从而完成地理学“金课”建设中教学模式从以老师教为中心向以学生学为中心的转变。

2.4 优化考核方式，增强课程挑战度

科学合理的课程考核方式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保障课程教学效果和专业育人质量^[19]。在以往的考核方式中，教师是考核评价的唯一主体，不能真正体现考核的公平性、科学性和精准性。因此需要改变传统的考核方式、强化过程性考核；改变以往单一性考核主体、确立多元化的考核评价主体；通过设计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能促进积极、主动的进行专业学习，同时引导学生学习的方向和学习效果。它是实现金课打造的重要保障手段，因此如何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方式成为金课建设重点关注的内容^[20]。

（1）采用多元化的考核方式：以往的课程评价成绩主要由学生的平时表现成绩和期末考试成绩两部分组成。平时表现成绩主要由出勤率、课堂表现和课程作业等形式构成，期末考试成绩主要是试卷的卷面成绩。这种考核形式很难对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全面有力的评价。建议对学生的考核评价采取“过程性+终结性”的考核方式。“过程性”考核是对学生平时表现（如考勤、课堂讨论、思想道德评价等方面）情况进行的考核评价，可采取专题汇报、课堂讨论、案例分析等形式进行有关专业知识、核心能力等方面的考核评估，促使学生在平时课堂表现中积极参与课程教学、主动思考，引导学生重视平时的课程学习。“终结性”考核是通过采取开卷或闭卷考试等形式考核学生对专业理论知识、课程核心内容的把握程度。

在试题中将专业知识考核与核心技能考核结合起来,考查学生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熟知程度。为引导学生注重专业课程的平时学习实效避免期末临时应付突击,降低课程学习效果,建议可以降低“终结性”考试成绩占总成绩的比重,这有助于提升课程的“两性一度”。

(2) 强化过程性考核:课程的考核方式应当根据不同课程(基础课程、核心课程、实践课程)的属性特点,按照强化过程考核,加强学习的过程性评价、注重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性评价与定量评价相结合的原则设计考核标准和考核方式,摆脱以往以单一成绩(考试成绩或报告成绩等)作为课程最终成绩的考核规则,实现课程考核的评价目标多元化、评价手段多样化。如以野外实习实践课程的考核评价中,摆脱以往仅凭实习报告确定课程最终成绩的考评模式,建立学生实习实践的过程性考核评价体系。构建一套涵盖测评学生的野外学习态度、实习表现、团结协作能力、实习实践汇报、创新能力评估和实习报告撰写等综合考评体系,更加强调实习实践考核的过程性评价指标在课程综合成绩中的权重。有意识引导学生注重平时过程性学习时间的投入,强化过程性学习效果。

(3) 推行多元化的考核主体:以往课程的考核主要是任课老师,学生只作为考核的对象。这种考核模式体现了传统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反映了教师的个人意志,带有教师的主观因素,缺少学生的积极参与,缺乏全面性、客观性和公平性。因此,需要强化学生在课程考核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为自己和他人的学习效果做出客观评价,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同时也发挥学生群体的互相学习、互相监督的作用。

确定“教师+学生”的多元化课程考核主体,重视学生在课程考核体系中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加入到课程的过程性考核评价中,增加专业课程考核的多样性和科学性。具体可以通过采取学生自评、学生互评等多种形式,让学生为自己和他人在课外的实践表现、日常生活表现等展开更加细致和全面的知识水平的考核评价,以便老师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的把握情况,亦可根据学生的课外反应对教学模式做出及时改进,营造学生作为课程学习自觉人和学习效果监督人的环境氛围。在综合考核的成绩中,对学生和老师两者的评定成绩可以设置一定的比例,如老师评定成绩占总成绩的权重为60%,学生的为40%等。

参考文献:

- [1] 吴岩.建设中国“金课”[J].中国大学教学,2018(12):4-9.
- [2] 陆国栋.治理“水课”打造“金课”[J].中国大学教学,2018(9):23-25.
- [3] 陈光磊.论“金课”的层面与维度[J].临沂大学学报,2019,41(3):117-123.
- [4] 崔佳,宋耀武.金课的教学设计原则探究[J].中国高等教育,2019(5):46-48.
- [5] 薄蓉蓉,冷明祥.高校“金课”建设的基本认知、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9(8):141-144.
- [6] 陈奕云,沈焕锋,徐璐等.面向地理科学一流本科专业的定量遥感“金课”的建设途径[J].中国地质教育,2020,29(1):57-61.
- [7] 贾亚男.《中国地理》课程思政改革的教学实践[J].高教学刊,2021(02):120-123.
- [8] 黄晓军.人文地理学课程思政建设思路与设计[J].地理教学,2022(01):12-16.
- [9] 梁品文.高校中国地理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策略研究[J].长春教育学院学报,2020,36(07):55-60.
- [10]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第二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 [11] 颜梅春.人文地理学课程融入思政教育探索[J].大学教育,2020(07):98-101.
- [12] 胡珊珊,李秦.地理师范类专业课程的思政探索与实践:以水文学课程为例[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1,42(06):93-96.
- [13] 董彬,徐小任,宋红丽,惠连晓.立德树人视域下自然地理学课程融入思政的示范课建设探索[J].高教学刊,2022,8(01):70-74.
- [14] 韩冰雪.中国地理课程思政教学设计与实践探究[J].河北北方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7(02):90-94.
- [15] 李徐生,韩志勇,陈刚,王腊春.庐山模式——以综合创新地理学人才培养为目标的野外实践教学改革与探索[J].高等教育,2021,(1):92-96.
- [16] 韩志勇,李徐生,王腊春.探讨庐山野外地理实践教学的改革[J].高等理科教育,2015,120(2):79-82.
- [17] 朱连奇,朱文博,时振钦,张广花.基于地理实践力培养的野外实践教学模式设计[J].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9,38(5):73-77.
- [18] 赵兴国,童彦,杨艳俊,庄立会.地理科学“一专多能”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践教学体系构建[J].曲靖师范学院学报,2020,39(3):88-92.
- [19] 陈季,宋爱迪.基于合作学习的环境学概论课程考核实践研究——以佳木斯大学地理科学专业为例[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35(1):190-191.
- [20] 张青峰,付金霞,刘京,李粉玲,杨香云.农林院校GIS类专业课程形成性考核体系的构建与实践——以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为例[J].高等农业教育,2012,4(4):60-62.

OBE 理念下高校篮球 “学练赛评” 一体化教学设计研究

杨帆¹ 吴秋燕^{2*}

(1.云南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体育运动学院, 云南 楚雄 675000 2.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体育与教育学院,
云南 昆明 650300.)

摘要: 本文在 OBE 理念指导下, 对高校篮球 “学练赛评” 一体化教学进行了系统分析与设计。研究认为, 成果导向能够为篮球课程提供清晰的目标牵引, 使教学由内容推进转向学习结果生成; “学练赛评” 则为课堂实施提供了连续性的组织路径, 有助于增强技术学习、比赛运用与评价反馈之间的内在联系。基于此, 文章从教学成果目标、技术学习、技能练习、教学比赛和过程评价等方面构建了一体化教学思路, 并分析了其实践优势与实施中可能面临的问题。研究表明, 该教学模式有助于提升高校篮球课程的整体性、实践性和育人价值, 为高校篮球教学改革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 OBE 理念; 高校篮球; 学练赛评; 一体化教学; 教学设计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2

Research on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Design of College Basketball under the OBE Concept: A "Learning-Practicing-Competing-Evaluating" Integrated Approach

Yang Fan¹, Wu Qiuyan^{2*}

¹*School of Sports, Yunnan Moder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Chuxiong, Yunnan 675000, China*

²*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Yunnan Polytechnic Vocational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300, China*

Abstract: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OBE concept,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and designs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learning, practicing, competing and evaluating" in college basketball. The study holds that outcome orientation can provide clear goal guidance for basketball courses, shifting teaching from content promotion to learning outcome generation. The "learning-practicing-competing-evaluating" model provides a continuous organizational path for classroom implementation, which helps to strengthe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among skill learning, competition application and evaluation feedback.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integrated teaching idea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outcome objectives, technical learning, skill practice, teaching competition and process evaluation, and analyzes its practical advantages and possible problems in implement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teaching model helps to improve the integrity, practicality and educational value of college basketball courses, and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the reform of college basketball teaching.

Keywords: OBE concept; college basketball; learning-practicing-competing-evaluating; integrated teaching; teaching design

作者简介: 杨帆 (1994—), 女, 硕士研究生, 助教,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与训练;

吴秋燕 (1986—), 女, 彝族, 云南普洱, 本科, 讲师, 云南理工职业学院, 研究方向: 体育教学与训练。

通讯作者: 吴秋燕

引言

在高校体育课程改革不断深化的背景下，篮球教学的重心正在由单一技术传授转向学生综合学习成果的形成。长期以来，高校篮球课堂多围绕运球、传球、投篮等基本技术展开，教学过程通常遵循讲解、示范、练习与考核的固定路径，这种方式在帮助学生建立基础动作表征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当课程目标进一步指向比赛运用、规则理解、合作意识和持续参与能力时，原有课堂结构的局限也逐渐显现出来。学生在课上能够完成技术练习，并不意味着其真正具备在具体情境中运用技术、作出判断和参与协作的能力；教学内容安排得较为完整，也不等于课程已经实现了从知识输入到能力生成的有效转化。教育部《义务教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2022年版）》提出落实“教会、勤练、常赛”，强调“学、练、赛”一体化教学，《〈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也强调要依据运动项目特征优化课堂组织，增强学习、练习与竞赛之间的衔接^[1]。这些改革导向虽然主要立足学校体育整体发展，但对高校篮球课程同样具有重要启示，即课堂不应再满足于“教了什么”，而应进一步追问“学生最终学成了什么”。

在这一背景下，OBE（Outcome-Based Education）所强调的成果导向，为高校篮球教学提供了新的课程理解方式。它要求教学从预期学习成果出发反向组织目标、内容、过程与评价，使课程真正围绕学生的实际获得展开，而不是停留在教师完成教学任务的层面。与之相联系，“学练赛评”一体化则为篮球课堂提供了更具操作性的实施路径，学习不只是动作认知的起点，练习也不只是机械重复的过程，比赛承担着检验与迁移的功能，评价则应贯穿课堂始终，对学生表现和教学过程形成持续反馈^[2]。将OBE理念与“学练赛评”相结合，既有助于弥合高校篮球教学中长期存在的目标模糊、过程割裂与评价单一等问题，也有助于推动篮球课程从内容导向走向成果导向，从单项技术训练走向能力、素养与项目理解并重的整体性建构。基于此，本文拟在OBE理念指导下，对高校篮球“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进行探讨，以期为高校篮球教学优化提供参考。

1 相关理论基础

1.1 OBE 成果导向教育理念内涵

OBE将课程理解的重心放在学习结果上。课堂是否按计划讲完内容，并不能直接说明教学是

否有效，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学生在课程结束之后究竟获得了什么，是否能够把所学转化为可观察、可运用的能力^[3]。这种思路改变了课程设计的起点。过去教学往往先考虑教什么、按什么顺序教，再去补充目标和评价；在成果导向视角下，顺序恰好相反，教师首先要面对的是学习结果的界定，然后才是内容的安排、过程的组织和评价的设置。放到高校篮球教学中，这种变化尤其重要。篮球课如果只是完成运球、传球、投篮等技术内容的讲授，课程看似完整，学生的真实获得却未必充分。技术掌握只是结果的一部分，更有价值的还包括规则理解、比赛中的技术运用、合作中的角色意识，以及持续参与篮球运动的倾向。篮球课程一旦从这个角度重新被理解，教学就不会停留在内容覆盖层面，课堂结构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1.2 “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模式内涵

“学练赛评”更像是一种课堂运行方式，而不是几个教学环节的并列罗列。它强调的是篮球学习应在连续的过程中展开。学生先进入学习情境，理解动作、规则和任务要求；再通过练习逐步稳定动作表现，把零散认识转化为可重复的技能经验；接着借助比赛或类比赛任务，把已经形成的技术放进更开放的关系之中，在对抗、协作和决策中接受检验；评价则贯穿始终，不断把课堂中的表现重新反馈给学生和教师，用来修正后续学习^[4]。这样的课堂逻辑之所以适合篮球，原因并不复杂。篮球原本就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项目，很多技术的意义只有进入空间变化、攻防转换和同伴配合之后才真正显现出来。学生若只在相对封闭的条件下反复练习，往往能够形成动作印象，却难以真正建立对项目的整体理解。学习、练习、比赛和评价之间一旦彼此割裂，课堂就容易显得完整而零散；若能够把它们拉回到同一条过程链中，篮球教学才更接近这项运动本身的学习规律。

1.3 OBE 与“学练赛评”融合的契合性

这两者放在高校篮球教学中，并不会产生彼此替代的问题。它们所面对的，其实是同一门课程的不同层面。OBE关心的是结果，课程最终要把学生带向哪里；“学练赛评”关心的是过程，课堂内部怎样运转，学生怎样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接近预期成果。高校篮球课程本身就不是单线条任务。学生既要学习技术，也要理解规则，还要能够在比赛中作出判断、在合作中承担责任。只

有目标,没有过程,课程容易停留在文字表述上;只有过程,没有清晰结果,课堂又可能显得热闹却缺少方向。把成果导向和“学练赛评”放在一起之后,篮球教学的内部关系会更清楚:目标不再只是写在教案里的要求,而会进入内容选择、练习推进、比赛组织和评价反馈之中;学习过程也不再只是围绕单项技术展开,而是朝着结果不断积累、修正和深化^[5]。这正是两者能够在高校篮球课程中形成契合的原因。它们并不分属两套互不相干的话语,而是在课程目标和课堂实施之间搭起了一条更稳定的连接线。

2 传统高校篮球教学存在的问题

2.1 教学目标模糊,成果导向不足

传统高校篮球教学通常会列出技术、体能或课堂任务等目标,但这些目标往往更多停留在教学内容安排层面,而较少真正转化为对学生学习成果的清晰界定。课堂上教了运球、传球、投篮,并不等于学生已经形成了相应的比赛运用能力、规则理解能力和合作参与能力。目标表述如果主要围绕“教什么”展开,而不能进一步落实到“学生学成什么、达到何种程度、如何判断达成”,教学活动就容易围绕授课进度推进,而不是围绕学习结果生成展开。高校篮球课程教学改革,把目标、内容、形式、手段与评价之间的失衡作为需要正视的问题之一,并强调篮球课程应走向综合能力培养,而不只是完成技术教学任务^[6]。

2.2 教学流程单一,学、练、赛、评脱节

在不少高校篮球课堂中,教学仍较明显地保留着“讲解示范、分组练习、课末考核”的线性结构。这样的流程看似完整,实际上容易把学习、练习、比赛和评价处理成相互独立的几个环节,学习更多停留在动作要领的接受与模仿,练习主要表现为重复性巩固,比赛往往被压缩到课末甚至被边缘化,评价一般作为教学结束后的结果出现。对于篮球这样高度依赖情境判断、空间利用和协作配合的运动项目而言,这种分段式安排难以支撑学生形成完整的项目理解。学、练、赛、评应该是一体化的关系,以练促学、以赛促练、学用结合,而不是彼此割裂地存在。

2.3 重技能传授,轻能力与素养培养

高校篮球教学长期以来较为重视专项技术的规范性传授,这一取向本身并无问题,但如果课程重心始终停留在动作分解、技术纠正和考核达标上,篮球教学的教育价值就容易被压缩为单一

的技能训练。学生也许能够较熟练地完成某些固定动作,却未必具备在具体比赛情境中进行观察、判断、选择和协作的能力,更难谈及规则意识、责任意识和持续参与意识的同步发展。当前体育课程建设需要回应能力导向与综合发展要求,单纯围绕传统技术技能展开课程,已难以适应体育高等教育面临的新形势^[7]。放到篮球课程中,这意味着课堂不能只满足于“动作学会了”,还应关注学生能否在项目学习中真正形成综合运用能力和体育素养。

2.4 评价方式单一,过程性评价缺失

评价是教学中最能反映课程观念的位置之一,而传统高校篮球教学中的评价往往过多依赖终结性结果,主要表现为定点投篮、运球绕杆、技术达标等单项测试占据主导地位。这样的评价方式便于操作,也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学生的基础技术水平,但很难完整呈现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真实发展,更难有效回应篮球课程对比赛运用、合作表现、学习投入与自我改进能力的关注。体育课程评价应由教师单一评价转向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和学生互评等多渠道评价,并重视全过程评价和综合表现展示^[8]。这一判断虽然并非专门针对篮球课程,但对高校篮球教学同样具有启发意义:评价若只出现在课程末端,就更多承担甄别功能,而难以真正发挥促进学习和改进教学的作用。

3 OBE 理念下高校篮球“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设计

3.1 基于 OBE 确定教学成果目标

OBE 进入高校篮球课程,首先改变的不是某一节课的组织形式,而是教师理解课程的方式。以往教学往往从“这学期要教哪些技术”出发,目标更多附着在内容之后;成果导向则要求先明确学生学完课程以后应当形成什么样的结果,再回过头来组织内容、方法和评价。放到篮球课中,这种结果显然不能被压缩为运球、传球、投篮等若干动作是否掌握,而应当表现为更完整的学习成果,学生能够在具体情境中较为稳定地运用基本技术,能够理解规则并据此作出判断,能够在局部对抗和合作任务中完成较合理的选择,也能够持续参与中形成责任意识、协作意识和自我改进意识^[9]。成果目标一旦被这样建立起来,课堂就不再只是围绕“教会动作”展开,而是围绕“形成怎样的学习结果”展开,“学练赛评”也

因此获得了共同的方向。

3.2 “学”：精准化技术学习

篮球课堂中的“学”本能单纯理解为教师先讲、学生后练的例行开端，更重要的是让学生在进入练习之前就对本节课要解决的任务形成清楚认识。技术学习之所以需要“精准”，并不只是因为动作要领需要讲得准确，而是因为技术本身必须被放回它原本所服务的项目情境中，传球要解决什么关系，突破要面对什么选择，投篮何以构成有效终结，防守站位为什么影响后续协作。脱离这些具体问题，学生即使记住了动作形式，也未必真正理解篮球。教学中的“学”应当把技术认知、规则认知和情境认知连接起来，使学生在起点上就知道动作服务什么任务、判断依赖什么信息、技术价值体现在哪里。这样处理之后，示范和讲解就不再只是技术说明，而成为学生进入项目理解的入口，后续的“练”和“赛”也才有真正的依托。

3.3 “练”：分层化技能练习

篮球课中的练习如果只有统一要求和统一节奏，就很难同时照顾到不同基础学生的真实需要。基础较好的学生容易在单调重复中失去挑战，基础薄弱的学生又可能在频繁失误中丧失控制感，练习最终看似热闹，实则没有真正转化为有效学习。分层化技能练习的意义，在于承认学生起点不同，也承认技术形成并不是同速推进的过程。课堂练习不应只是数量上的堆叠，而应在共同目标之下形成层次递进：先让学生在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建立动作控制，再逐步增加移动、协同和判断要求，使练习从单人完成走向组合运用，从较封闭的任务走向有限开放的情境^[10]。这样的分层并不是把学生简单区分开来，而是让不同基础的学生都能在合适难度中保持向前推进，使技术成长真正成为连续而可调整的课堂过程。

3.4 “赛”：情境化教学比赛

比赛进入课堂，不应只是为了活跃气氛，也不只是把前面的练习换一种热闹方式重复一遍。教学中的“赛”更重要的作用，是把学生已经形成的技术和理解放进更接近篮球真实逻辑的关系之中，让他们在攻防转换、空间变化和同伴配合中感受到技术的实际价值。情境化教学比赛强调的，不是形式上是否完整，而是任务是否清楚、目标是否聚焦、反馈是否可能。小场地、少人数、带限制条件的比赛更适合课堂，不是因为它们简化了篮球，而是因为它们能够把学生的注意力集

中到本节课真正要解决的问题上，让比赛成为学习内容的延伸和放大^[11]。当“赛”真正进入教学主线，学生在练习中形成的动作经验才有机会转化为项目经验，课堂也才可能从技术训练场转变为项目学习场。

3.5 “评”：多元化过程评价

成果导向下的评价，不是课程结束时对学生做一次技术结算，而是围绕预期成果持续收集证据、不断形成反馈，使教学和学习始终处在可以修正的状态之中。篮球课程尤其如此，因为学生的学习结果从来不是单一的：动作做得对，并不必然意味着比赛里会作出合适选择；比赛中参与积极，也不等于技术基础已经稳固。评价需要跟着“学”“练”“赛”的推进不断发生作用，既看技术完成情况，也看任务理解、配合表现、比赛选择、课堂投入和改进状态。教师评价固然重要，但不应成为唯一来源；同伴反馈、自我反思、任务表现记录和比赛中的行为证据都应进入评价视野。评价一旦进入过程，它承担的就不仅是甄别功能，而会成为推动课堂不断调节、推动学生不断修正的内部机制。

4 OBE“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的实践优势

4.1 目标清晰，教学更有方向

传统篮球课堂并不缺少目标表述，真正欠缺的往往是目标与课堂运行之间的稳定联系。成果导向进入课程之后，教学首先获得的是更明确的指向：教师不再只是围绕技术内容安排课时，而是围绕学生最终应形成的学习结果组织学习任务、练习层次、比赛情境和评价证据。这样一来，课堂中的每一项活动都不再是单独存在的环节，而是与既定结果发生对应，学生也更容易理解“这节课为什么这样学”“练到什么程度才算达成”“比赛中的表现与平时练习之间是什么关系”。目标一旦真正成为课堂的内在线索，教学过程就会从内容推进转向结果生成，教师的课堂决策也会更有依据，课程整体因而呈现出更强的方向感和一致性。

4.2 学练结合，技能掌握更扎实

篮球技术的稳定掌握，从来不是单靠反复模仿就能够实现的。动作之所以会真正沉淀下来，往往是因为学生在理解任务意义的前提下不断练习，并在练习过程中逐步把动作控制、空间感觉和协同意识连接起来。将“学”与“练”紧密结合之后，课堂不再把学习理解和技能巩固分作两

个彼此脱节的步骤,而是在持续往返中推动学生完成由“看懂动作”到“掌握动作”再到“在变化中运用动作”的过渡。这样形成的技能基础往往更扎实,因为学生掌握的不是脱离情境的动作外形,而是与任务、节奏和关系相联系的技术能力。整体性运动项目教学的研究也表明,运动技术的学习如果能够始终保持结构化和关联式推进,更有利于学生形成面向项目运用的技能理解,而不是停留在零碎的局部熟练之中^[12]。

4.3 以赛促学,课堂参与度更高

篮球课堂是否真正“活起来”,并不取决于活动数量有多少,而在于学生是否在课堂中感受到任务的真实性和参与的必要性。比赛环节一旦被纳入教学主线,学生原本在练习阶段形成的动作经验就会获得现实出口,技术学习也由此从“为了完成课堂任务”转向“为了应对具体情境”。这种转变对课堂参与有着明显影响:学生更愿意投入,是因为他们意识到学习的内容马上会在比赛中被检验;学生更愿意合作,是因为对抗与配合本身要求他们与同伴、对手的关系中作出反应;学生更愿意持续调整,是因为比赛会及时暴露问题,让练习和改进显得更有必要。关于高校公共体育课程学习投入的研究表明,课程体验、任务真实度和学习交互质量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而带有明确任务情境的教学设计更容易激发学习动机并提高课堂参与质量^[13]。对篮球课程而言,“以赛促学”真正带来的,不只是课堂气氛的活跃,而是学习意义的显化。

4.4 多元评价,符合学生发展

如果评价只在课程末端以一次技术测试的形式出现,学生能够看到的往往只是结果,却很难理解自己在过程中是如何变化的,也不容易形成持续改进的动力。多元评价进入课堂之后,评价开始承担更复杂的功能:它既关注技术结果,也关注练习态度、合作表现、比赛选择和进步幅度;既保留教师判断,也吸纳学生自评与同伴反馈;既看某一时点的表现,也看一段时间内的发展轨迹。这样的评价方式更贴近学生真实的学习过程,因为体育学习本身就不仅是动作成绩的积累,还包括兴趣、投入、责任感和自我认识的逐步生成。已有研究表明,多元体育学习评价能够更好地发挥激励和反馈功能,过程评价、自评互评以及进步性评价的结合,更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的学习体验,并促进学习兴趣与持续参与意愿的提升^[14]。放在高校篮球课程中,多元评价的意义正在于让

学生看到学习不只是“最后得了多少分”,而是“在这一过程中自己究竟成长了多少”。

5 结语

OBE理念下高校篮球“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的价值,并不在于对原有课堂结构作表层调整,在于重新确立篮球课程的基本逻辑,即从学生最终能够形成何种学习成果出发,统筹教学目标、内容安排、课堂推进与评价反馈。与传统更多围绕技术讲解、动作练习和结果考核展开的教学方式相比,这一思路更强调学习结果的真实生成,更重视技术掌握与比赛运用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更关注学生在规则理解、合作参与、情境判断和持续改进中的综合发展。篮球课程不再只是若干技术内容的顺序呈现,而是逐渐成为一个由学习、练习、比赛和评价相互支撑、连续推进的整体过程。这样的教学设计既有助于学生夯实专项技能基础,能够推动其在更接近真实项目特征的课堂情境中形成对篮球运动的整体理解。在此,也应看到,这种一体化教学在实际实施中仍面临课堂组织、课时安排、评价落实和教师专业能力等方面的现实挑战,这意味着课程改革不只是方法层面的替换,更是教学观念和课堂运行机制的同步调整。总体来看,OBE理念下高校篮球“学练赛评”一体化教学,为高校篮球课程由内容导向走向成果导向、由单项训练走向综合育人提供了较为清晰的实践思路,也为今后高校篮球教学的持续优化提供了可以进一步深化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的通知[EB/OL]. 2021-06-30.
- [2]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EB/OL]. 2020-10-15.
- [3] 姜波. OBE: 以结果为基础的教育[J]. 外国教育研究, 2003(3): 35-37.
- [4] 吕万刚, 季彦霞. 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面临形势与挑战及对体育类专业建设的启示[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7(05): 497-503. DOI: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22.05.001.
- [5] 李军, 刘世磊. “教会、勤练、常赛”的生成背景、基本内涵与实践审思[J]. 体育学刊, 2022, 29(06): 134-139. 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22.06.013.

[6]靳厚忠,范宏伟,刘晚玲,等.高校篮球课程教学改革思考[J].体育学刊,2010,17(08):68-71.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10.08.015.

[7]吕万刚,季彦霞.我国体育高等教育面临形势与挑战及对体育类专业建设的启示[J].天津体育学院学报,2022,37(05):497-503.DOI:10.13297/j.cnki.issn1005-0000.2022.05.001.

[8]赵晶,闫育东,高江航.课程思政融入高校体育课教学的本源回归、价值塑造与路径思考[J].体育学刊,2021,28(05):89-93.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210907.002.

[9]潘建芬.多维目标单元教学设计和实施——以篮球体前变向换手运球为例[J].体育学刊,2019,26(03):115-120.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19.03.015.

[10]翟宗鹏,郭永波.新课标视域下“学、练、赛”一体化教学的主要特征、现实问题及实现路

径[J].上海体育大学学报,2024,48(02):34-44.DOI:10.16099/j.sus.2023.01.06.0005.

[11]李奕霖,彭庆文,李焕玉,等.体育与健康课程教学新模式构建的思考——基于《〈体育与健康〉教学改革指导纲要(试行)》[J].体育学刊,2021,28(06):75-81.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21.06.010.

[12]尚力沛,程传银.论整体性运动项目教学[J].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1,45(06):50-58.DOI:10.16099/j.sus.2021.06.003.

[13]谢戴西,曲思岑,陈可心,等.基于学习投入理论的高校公共体育 SPOC 混合教学设计与应用[J].体育学刊,2023,30(02):95-101.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23.02.009.

[14]汪晓赞,季浏,秦海权,等.多元体育学习评价对中小学生体育学习兴趣的影响[J].体育学刊,2008,15(12):52-58.DOI:10.16237/j.cnki.cn44-1404/g8.2008.12.004.

高校在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中的多维功能与实践路径

——基于各民族区域的实证研究

丁惠炯¹

(1.梧州学院 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战略腹地重点研究基地, 广西 梧州, 543000)

摘要:在文化多样性保护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双重背景下, 少数民族武术的传承与发展面临新的历史语境。本研究发现, 民族区域高校凭借其独特的地缘、文化与教育资源, 已从边缘参与者转向核心枢纽, 构建了“学术研究—教育教学—社会实践”三位一体的传承生态系统。本文通过多案例深度剖析与数据呈现, 系统论证了高校在武术文化遗产的挖掘保存、知识转化、创新传播及认同构建中的核心功能, 并揭示了当前存在的结构性张力。研究提出, 未来应通过构建“弹性标准化”体系、深化校地协同创新、拥抱数字技术等路径, 进一步强化高校的引领作用, 推动少数民族武术实现从“遗产”到“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关键词: 民族区域高校; 少数民族武术; 文化传承; 课程体系; 校地协同; 数字存档

基金项目: 广西高等教育教学改革工程项目“广西高校传统武术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2019JGA314)”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3

Multidimensional Functions and Practical Approaches of Universities in the Inheritance of Ethnic Minority Martial Arts: An Empirical Study Based on Regional Ethnic Groups

Ding Hui-Jiong

(Wuzhou University, Key Research Base in the Strategic hinterland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uzhou, Guangxi, 543000)

Abstract: Against the dual backdrop of cultural diversity preserv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sense of community among the Chinese nation,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martial arts face new historical challenges. This study reveals that universities in ethnic regions, leveraging their unique geographical,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resources, have transitioned from peripheral participants to core hubs,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inheritance ecosystem encompassing "academic research, educational instruction, and social practice." Through in-depth case analysis and data presentation, the paper systematically demonstrates universities' pivotal roles in preserving martial arts cultural heritage, facilitating knowledge transfer, innovatively disseminating traditions, and fostering cultural identity. It also identifies existing structural tensions in current practices. The research proposes future strategies including establishing a "flexible standardization" framework, enhancing university-loca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embracing digital technologies to strengthen academic leadership, thereby driv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martial arts from cultural heritage to sustainable resources.

Keywords: Ethnic regional universities; Minority martial arts; Cultural heritage; Curriculum system; University-local collaboration; Digital archiving

作者简介: 丁惠炯, 男, 内蒙古包头人, 管理学博士, 梧州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非遗活态传承、管理哲学。

151

一、引言：传承危机与制度性回应——高校角色的历史性凸显

少数民族武术，作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生动的身体文化表征，其传承轨迹与民族命运紧密相连。全球化与城镇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冲击，使得依赖于方言系统、宗教仪式和村落社群的原始传承网络日渐式微。据国家体育总局武术研究院2023年发布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传承状况调查报告》显示，在普查的67个少数民族武术项目中，有超过40%的项目面临“传承人年龄断层”（主要传承人年龄超过60岁）的困境，近30%的项目缺乏系统的文字或影像记录。

在此背景下，高等学校的介入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性回应；尤其是民族区域高校，其被赋予了保存和发展区域特色文化、增进民族团结的特定职能：

1.文化感知的“在地性”与“敏感性”：师生长期浸润于当地文化环境，能更准确地把握武术动作的“神韵”与文化禁忌，避免文化误读。例如，川西某民族师范学院的师生在研究羌族“铠甲舞”中的武术动作时，能自然联系到羌族碉楼建筑的空间感与当地的战争历史，这是外来研究者难以快速获得的体悟。

2.人才储备的“地方性”与“回归性”：生源大多来自本地区，毕业后回乡工作的比例较高。调查显示，民族地区体育教育专业毕业生中，超过60%回到生源地或附近县市工作，他们成为将高校传承成果播撒到基层的“种子”。

3.学科集群的“交叉性”优势：综合型民族高校能便捷地整合资源。如某回族自治区高校在研究回族武术时，其体育学院、民族研究院、音乐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可联合攻关，分别从技术、历史、音乐伴奏、数字化呈现角度进行研究。

研究旨在深入探讨“高校如何有效参与”及“其作用的内在机理与外在限度”。通过对多个典型民族区域高校的实践进行“深描”，并结合量化数据，力图构建一个理解高校在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中多维作用的分析框架，以期在教育实践提供理论坐标。

二、理论建构：高校作为“文化枢纽”与“知识转化器”

研究高校在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中的作用，应围绕文化再生产理论（布迪厄）、文化认同理论、文化转换主义与文化创新理论等构建一个多层次、

动态的理论框架。此框架将传承视为一个在宏观（政策/制度）、中观（高校组织）、微观（个体实践）层面互动，并涉及社区、传承人、学生等多主体的动态过程，能够系统阐释高校作为“转化器”“枢纽”和“实验场”的核心作用与内在张力。

（一）从“身体惯习”到“体系化知识”：传承模式的范式革命

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实践理论”指出，文化往往以“惯习”的形式，通过身体的无意识模仿得以传递。少数民族武术的传统传承正是“体化实践”的典型。高校的介入，本质上启动了从“默会知识”到“明晰知识”的转化过程。这一过程并非简单的记录，而是通过体育学、民族学、历史学、影像人类学等多学科视角，对武术进行“解剖”、“编码”与“再语境化”。

其中，知识转化呈现出三级模型态：

（1）技术层编码：将口诀、心法、身法分解为可描述、可测量、可重复的教学单元（如动作名称、要领、攻防含义）。

（2）文化层阐释：挖掘并阐释技术动作背后的神话传说、祭祀仪式、生态观念、伦理规范（如为什么苗族拳术中多模仿动物，这与族群迁徙史和山林生存智慧有何关联）。

（3）价值层重构：在现代社会语境下，重新定位其价值，如从单纯的搏击术转向文化认同媒介、身体教育工具、健康促进手段乃至文化创意资源。

（二）“双重认同”的锻造：个体、族群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链接

高校的传承实践同步塑造着两种关键认同：

1.族群文化认同：对于少数民族学生而言，学习本民族武术是一个“寻根”与“赋形”的过程。身体技艺的学习强化了对族群文化的感性认知与归属感。

2.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当不同民族的学生在高校平台上共同学习、展示、研究彼此的武术文化时，武术成为一种“跨越差异的共享语言”。这种体验生动诠释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理念，从身体实践层面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三）高校作为“创新实验场”：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空间

高校远离纯粹的文化保护主义，它鼓励批判性思考与创造性实验。在这里，传统的武术元素

可以与现代舞蹈、戏剧、体育训练学、运动康复学乃至数字媒体艺术发生碰撞，催生出新的表现形式和产品，从而为古老文化注入当代生命力。

三、相关调查与分析

(一) 调查研究设计

针对本研究的调研旨在通过定量数据与定性材料相结合的方式，对高校的作用机制、成效及挑战进行实证检验。

1.调查目标

- (1) 量化评估民族区域高校在武术传承中的参与广度与深度。
- (2) 测量高校传承实践对关键利益相关方(学生、教师、传承人、社区)产生的实际影响。
- (3) 识别影响传承效果的关键因素及瓶颈。
- (4) 为论文中的理论模型(如“文化枢纽”、“双重认同”)提供数据支撑。

2.研究对象与抽样

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我国西部、北部、西南部等地区的15所典型民族区域高校(涵盖师范大学、综合性大学、民族大学等类型)作为实证案例。

调查对象包括：高校群体，即体育学院/民族学系教师(N=300)和在校学生(N=1500，含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关联群体，即参与高校合作项目的民间武术传承人(N=60)、项目受益社区代表/中小学教师(N=120)。

3.调查工具与方法

- (1) 问卷：设计《高校少数民族武术传承现状与效果评估量表》，采用李克特五点量表，涵盖认知、情感、行为、评价四个维度，预测试信度良好。
- (2) 深度访谈与焦点小组：针对教师、传承人、管理者进行半结构化访谈，获取质性资料。
- (3) 文本分析与数据挖掘：对高校相关课程大纲、科研成果、活动报道进行内容分析。

4.数据收集与处理

通过线上问卷与实地调研相结合的方式收集数据，使用SPSS 26.0及NVivo12进行量化统计与质性分析。

(二) 核心发现与定量分析

1.高校参与传承的广度与机制验证

表1：样本高校少数民族武术传承活动参与情况

(N=15)				
传承活动维度	已开展高校比例	年均投入经费(万元, M±SD)	拥有专门管理机构比例	纳入学校发展规划比例
课程教学	100%	18.5 ± 7.2	73.3%	86.7%
学术研究	93.3%	12.1 ± 5.8	60.0%	66.7%
校园文化活动	100%	5.3 ± 2.4	40.0%	53.3%
社会服务/社区合作	86.7%	8.7 ± 4.1	33.3%	60.0%

数据解读：

- (1) 普遍性：课程与校园活动是高校参与的基础和普遍形式，验证了“课程化传承”与“活化传承”的普及性。
- (2) 制度化差异：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制度化程度(拥有专门管理机构比例)相对较低，表明这两类活动更多依赖项目或个人驱动，其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 (3) 资源分配：课程教学获得最多的经费支持，体现了其核心地位。

2.传承成效的量化评估：以学生为核心

表2：参与高校武术传承项目学生的效果评估(N=1350)

评估维度	测量指标	均值(M)	标准差(SD)	显著提升比例(同意或非常同意)
技术技能掌握	能完整演练1套以上本/他民族武术套路	3.82	0.91	78.5%
文化认知与认同	了解项目文化内涵, 增强对本/他民族文化尊重	4.15	0.76	89.2%
族群认同感	(少数民族学生)学习后对本民族认同感增强	4.33	0.69	93.7%
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学习后更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	4.28	0.72	91.5%
行为意向	愿意向他人介绍或传授所学	3.95	0.88	81.8%

进一步分析：

- (1) 配对样本t检验：对少数民族学生(N=620)学习前后的族群认同感进行测量，结果显示学习后得分(M=4.33, SD=0.69)显著高于学习前(M=3.85, SD=0.81)，t(619)=14.227, p<0.001。这为“高校传承能强化族群文化认同”的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持。
- (2) 独立样本t检验：比较参与传承项目学

生 (N=1350) 与未参与对照组学生 (N=300, 来自同校其他专业) 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上的得分。参与组得分 ($M=4.28$) 显著高于对照组 ($M=3.91$), $t(1648)=8.542, p<0.001$ 。实证了高校武术传承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的显著作用。

(3) 回归分析: 以“行为意向”(愿意传承推广) 为因变量, 以“技能掌握”、“文化认知”、“认同感”为自变量进行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显著 ($F=112.365, p<0.001$), 其中“文化认知” ($\beta=0.412, p<0.001$) 和“认同感” ($\beta=0.387, p<0.001$) 的预测作用最强, 表明情感和价值认同是驱动传承行为的核心动力, 而非单纯的技术掌握。

3. 不同传承模式的效能比较

表 3: 不同传承模式效果感知评分对比 (教师与传承人评价, N=360)

传承模式	文化原真性保持 (1—5分)	知识传播效率 (1—5分)	学生兴趣激发 (1—5分)	社区连接强度 (1—5分)	综合效能指数
传统师徒制 (参照)	4.71	2.95	3.12	3.88	3.67
高校课程化教学	3.52	4.33	3.98	3.45	3.82
高校学术研究	4.05	3.67	3.24	3.12	3.52
高校常态化活动	3.88	3.91	4.41	4.22	4.11

数据解读:

(1) 高校模式的互补优势: 高校课程在“传播效率”上优势显著, 活态化活动在“激发兴趣”和“连接社区”上表现突出, 学术研究在“保持原真性”上贡献最大。这印证了论文提出的“三位一体”生态系统各具功能、相辅相成的观点。

(2) 综合效能: “高校活态化活动”综合评分最高, 表明其最能平衡文化保护与现代传播的需求, 是未来发展的重点。

(3) 挑战显现: 所有高校模式在“文化原真性保持”上均低于传统师徒制, 量化证实了“标准化与原真性张力”的客观存在。

4. 关键挑战与影响因素的量化分析

(1) 师资瓶颈分析: 67.3%的教师认为“缺乏既懂武术技艺又精通现代教学与研究的‘双师型’人才”是最大障碍。对师资结构的调查显示, 来自民间、有深厚功底传承人仅占武术相关课程教师的 28.4%, 且其中仅 40% 拥有硕士以上学历, 在职称评定、课题申请中处于劣势。

(2) 标准化与原真性张力的数据体现: 通过内容分析法对 10 所高校的武术课程大纲进行编码, 发现技术动作描述标准化程度高达 85%, 而对地方流派特色、个人体悟风格的提及率仅为 32%。这从文本层面证实了标准化对多样性的挤压。

(3) 影响传承效果的关键因素模型: 通过结构方程模型 (SEM) 分析, 发现“学校制度支持”(如经费、规划、激励)、“师资专业水平”和“校地协同机制”是直接影响传承效果的三大外生潜变量 (路径系数分别为 0.51、0.47、0.43)。其中, “校地协同机制”通过增强“社区反馈”和“资源活化”, 对传承的可持续性产生显著正向影响。

(四) 结论

上述调查研究为原论文观点提供了坚实的实证基础, 并使其得到深化和细化:

1. 证实了高校作为“核心枢纽”的有效性: 数据表明, 高校通过系统化、制度化的参与, 在提升传承效率、扩大受众范围、强化文化认同方面作用显著, 尤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上效果量化显著。

2. 细化了“三位一体”传承模式的功能与效能: 研究明确了课程化、学术化、活态化三种模式各自的优势象限 (效率、深度、活力) 及最佳应用场景, 为高校优化资源配置提供了依据。

3. 量化呈现了核心张力与挑战: 师资结构缺陷、标准化与原真性的矛盾、学术与实践的脱节等, 不再是抽象论述, 而是通过具体数据被清晰刻画, 使对策建议更具针对性。

4. 构建了“影响因素—传承效果”的实证模型: 揭示了制度支持、师资力量和校地协同是决定成效的关键杠杆点, 指出未来的政策与资源投入应聚焦于此。

通过系统的定量分析, 将民族区域高校在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中的作用从理论推演推进到实证检验阶段, 不仅验证了其核心作用的真实性, 更揭示了作用发挥的内在机理、条件与限度, 使相关研究建立在更科学、更坚实的基础上, 也为后续的实践优化与政策制定提供了精准的“数据导航图”。

四、高校开展少数民族武术传承的实践模式

高校开展少数民族武术传承的实践模式必须丰富且自成体系, 这是由高校作为教育、研究与文化创新枢纽的独特定位决定的。相较于社区 (依

赖原生态师徒传承)和商业机构(侧重表演与健身),高校的核心优势在于其系统化整合能力。其“四位一体”实践模式应突出:课程化教学,构建标准化的知识技术体系;学术化研究,深入挖掘、考证、保护濒危形态与理论;活态化实践,通过社团、展演、赛事形成沉浸式文化体验;服务化输出,将研究成果和人才辐射至中小学及社区。

高校教育传承模式的核心特征是理论指导实践、研究支撑传承、教学融合创新,实现了从“自然传播”到“自觉传承”的质变,这是其他单一功能场域无法比拟的。

(一)课程化传承:构建多层次、可评估的教学体系

课程是高校发挥教育功能的核心载体。成功的课程化传承不仅在于“开课”,更在于构建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评价科学的课程体系。

表 4: 不同区域民族高校少数民族武术课程体系模式对比

区域类型	公共体育课(普及层)	专业选修课(提高层)	通识/理论课(认知层)	特色实践平台
某自治区师范大学	蒙古族搏克	《蒙古族体育史》《搏克专项训练》	《草原文化与民族体育》	举办“那达慕”校园体育文化节、创办搏克训练队
某西南民族高校	傣族象脚鼓武术操	《云南少数民族武术概览》《非遗体育项目传承实践》	《身体、符号与族群认同》	与民族自治州共建教学实践基地
某西北民族大学	回族八门拳、藏族押架入门	《伊斯兰文化与中国武术交流史》《藏族传统体育》	《丝绸之路上的体育文化交流》	创建“民族体育工作坊”,聘请国家级非遗传承人驻校
某东北民族高校	朝鲜族跆拳道(跆拳道原型)	《朝鲜族民族体育专项》	《东北亚武术文化比较研究》	定期举办跨境武术交流汇演

【案例深化】某民族地区师范大学的“搏克课程链”将蒙古族搏克打造为标志性传承项目,形成了“一条链”式课程体系:

(1) 入门体验,在“大学体育”中设置4学时的“搏克”体验模块。

(2) 专项技能,开设专项选修课(32学时),系统教授技术、规则、礼仪。

(3) 理论深化:体育教育专业开设《民族传统体育理论与实践》必修课(48学时),其中“搏克”占1/3内容。

(4) 竞技提升:“搏克”队常年训练,在各级各类体育运动会或专项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5) 文化研究:依托校内相关研究中心,近五年获批相关国家级、省部级课题多项,发表核心期刊论文多篇,并出版了相关方面的特色教材。

(二)学术化传承:科研驱动的深度挖掘与理论提升

学术研究是高校传承的“引擎”,它决定了传承的深度与可持续性。

表 5: 部分民族区域高校近五年少数民族武术相关科研成果统计

地区与高校类型	省部级以上课题数	核心期刊论文数	专著/教材数	数字档案建设项目	关键技术突破
某西南民族高校	5	22	3	《壮族蚂拐拳数字化保护》	建立标准套路动态库
某西北民族高校	4	18	2	《土族“轮子秋”等非遗VR体验系统》	VR场景还原宗教祭祀与武术结合仪式
某西南民族高校	6	31	4	《黔东南苗族武术传承口述史数据库》	基于GIS的苗族武术流派分布地图绘制
某高原地区民族高校	3	15	1	《藏族传统射箭技艺多媒体档案》	高原环境下传统弓箭力学性能测试与分析

【案例深化】某西南地区民族大学的“数据库+社区反馈”模式:

该校课题团队对黔东南州雷公山区域的苗族武术进行了为期三年的田野调查。他们不仅记录了12个主要支系的拳术、器械套路,还重点采集了与之相关的“鼓藏节”仪式、服饰银饰图案、古歌口诀。所有资料存入“苗族武术文化数据库”,并设定了分级访问权限。

创新点在于:团队每年将初步研究成果(如梳理出的拳谱、拍摄的影像)带回当地社区,组织“成果反馈会”,请老拳师和村民纠错、补充。这一过程将单向的“学术提取”转变为双向的“知识对话”,既保证了学术严谨性,也尊重了文化主体的阐释权,有效避免了“学术殖民”的批评。

(三)活态化传承:构建校园-社区双向循环的文化生态

传承的活力在于“活态”,即融入当代生活。高校通过校园文化和社会服务,打通武术回归社会的“最后一公里”。

表 6: 民族区域高校武术传承社会服务与校园活动成效示例 (2024—2025 学年)

活动类型	所在区域	活动名称/内容	参与规模	主要成效
校园品牌活动	西北边疆地区	“丝绸之路民族体育艺术展演”	校内外观众超 5000 人次	将维吾尔族“达瓦孜”技巧改编为舞台剧, 成为校园文化名片
社区服务/支教	西南民族地区	“苗族武术进校园”志愿服务	覆盖多所中小学, 累计授课 1200 多小时	编制校本教材, 若干所小学将其列为特色课间操
非遗工作坊	西南民族地区	白族“绕三灵”武术工作坊	每期招募学员 30 人	由非遗传承人与体育教师共同授课, 推动体验式旅游
文创开发	华北草原地区	“那达慕小子”(含搏击动作)	上线半年下载量超 10 万次	将武术符号转化为现代传播媒介, 吸引年轻群体关注

【案例深化】某西南民族地区学院的“乡土教材—师资培训—赛事激励”三维模式, 该校体育学院与当地州教育局合作, 启动“民族体育薪火计划”:

(1) 教材开发: 编写图文并茂、双语(汉苗)对照的《苗岭武术趣学》小学版教材, 免费发放。

(2) 师资培训: 利用寒暑假, 为当地小学体育教师进行苗族武术教学法培训, 并发给“种子教师”证书。

(3) 赛事激励: 联合州民宗委、体育局, 举办全州小学生苗族武术操比赛, 对获奖学校的指导教师给予评优评先倾斜。

此模式通过制度性设计, 将高校的资源持续注入地方基础教育体系, 形成了可复制的“高校赋能民族武术传承”的范式。

五、现实挑战、张力分析与优化策略

尽管多年以来高校在少数民族武术文化传承工作中成效显著, 但也面临一系列深层次矛盾与挑战。

(一) 核心挑战与张力分析

1. 标准化与原生性的张力: 教学要求动作规范统一, 而民间武术讲究“师承各异, 千人千面”。过度标准化可能导致武术失去其地域特色和个性魅力, 沦为“广播体操”。

2. 学术逻辑与实践逻辑的冲突: 学术研究追求“本真性”与深度阐释, 可能将武术复杂化、神秘化; 而社区传承和大众传播追求简易、趣味

与实用性。二者目标不尽相同。

3. 师资队伍“双重断层”: 既懂高校教学科研范式又深谙民间武术精髓的“双师型”教师极度稀缺。许多老拳师不擅教学法, 而年轻博士又缺乏长期田野浸润。

4. 学生兴趣的“现代性偏移”: 在篮球、电竞、健身等现代流行文化的冲击下, 如何让武术对 Z 世代学生产生持久吸引力, 是根本性挑战。

(二) 系统性优化策略建议

针对上述挑战, 本研究提出如下应对策略, 以供参考:

1. 推行“核心—模块”弹性课程模型:

核心库: 由国家层面组织专家委员会, 界定某一武术项目最核心、不可变的技术元素与文化精神。

模块库: 允许各地区高校根据本地流派特色, 开发不同的技术组合模块、文化故事模块、现代应用模块。

教学过程中, 在完成“核心库”教学后, 学生可自主选择感兴趣的“模块”学习, 实现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平衡。

2. 构建“研究—实践—反馈”闭环系统:

建立制度化的社区反馈机制, 将学术研究成果(如教材、展演方案)定期返回文化持有者社区评议。

设立“应用转化研究”专项, 鼓励师生针对社区需求(如旅游开发、中小学教学)进行研究, 使学术直接服务于实践。

3. 实施“双向赋能”师资培养计划:

高校教师“下沉”计划: 要求相关专业教师每五年至少有一个学期的田野实践或社区驻留。

民间传承人“上升”计划: 为民间拳师提供系统的教育学、心理学以及体育科学等方面的培训, 并设立“特聘传承教授”岗位, 纳入高校师资管理体系。

4. 启动“数字原生代”吸引工程:

开发武术主题的严肃游戏、VR 对战体验、动漫短视频; 将武术元素融入街舞、健身操、极限运动, 打造“国潮武术”新形态; 利用社交媒体, 打造高校武术“网红”教师或学生团队, 进行现代化传播。

六、结论与展望: 迈向共生、智慧与开放的传承新生态

民族区域高校在少数民族武术传承中的作用, 已从初期的“保存记录”阶段, 历经“课程整合”

阶段,正迈向“创新引领”与“生态构建”的新阶段。其角色是多元复合体:是濒危文化的“方舟”,是传统知识的“转化器”,是文化创新的“孵化器”,更是促进民族团结的“粘结剂”。

展望未来,高校引领的传承应致力于构建三大生态:

1.共生型文化生态:强化校地协同,明确高校、政府、社区、传承人、企业等多元主体的权责利,形成“共商、共建、共享”的可持续机制。

2.智慧型传承生态:全面拥抱数字技术。不仅要建“数字档案馆”,更要构建“武术数字孪生系统”,利用人工智能进行动作分析与创新编排,利用元宇宙技术创设沉浸式文化学习空间。

3.开放型话语生态:推动少数民族武术从“地方性知识”上升为参与全球体育文化对话的“中国智慧”组成部分。通过国际学术交流、海外巡演、孔子学院课程等方式,讲述中国少数民族武术中蕴含的和谐、包容、敬畏自然等哲学理念,为世界体育文化多样性贡献中国方案。

通过高校系统性、创造性的介入,少数民族

武术将不再是博物馆中静态的“标本”,而是流动在校园、社区、赛场、屏幕中的“活水”,持续滋养着个体的身份认同、群体的文化记忆与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

参考文献:

[1]陶朔秀,童国军,王明建.民族聚落中少数民族武术拳种的田野调查研究[J].体育学研究,2023,37(02):17-24.

[2]吴明冬,张萍,梁勤超.新中国70年少数民族武术创新发展历程、经验及展望[J].体育文化导刊,2020,(06):53-60.

[3]李洋,戴国斌,张君贤,等.精英、场域与情景教育:民族民间武术活动传承中共谋性因素的探讨[J].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17,33(04):37-42.

[4]王荣.民族地区传统武术技艺传承与文化空间保护[J].贵州民族研究,2015,36(05):130-133.

[5]罗辑.少数民族武术中“物”的在场、脱域与出场——以贵州少数民族武术为例[J].体育科学,2014,34(03):72-75.

性别比例失衡对学科英语专硕男生学习影响与对策思考

杨旭光¹

(1.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要: 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硕士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突出,男生占比普遍低于15%。该现象对男生产生多层面影响,包括学业竞争压力增大、学习动机衰退及思维发展受限等。成因主要涉及应试教育偏重记忆、教师职业性别标签及教学方式与男生学习风格不匹配。本文从招生机制、评价体系与教育环境三个维度提出对策,为构建多元均衡的师范教育生态提供参考。

关键词: 性别失衡;师范院校;英语专业;高等教育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4

The Impact of Gender Imbalance on Male Students in Master of Subject English Programs and Countermeasure Considerations

Yang Xuguang¹

¹ Ning Xia Normal University, Gu yu an, Ningxia 756000, China

Abstract: The gender imbalance among Master of Subject English (Teaching) students is a prominent issue, with the proportion of male students generally falling below 15%. This phenomenon has multifaceted effects on male students, including increased academic competition pressure, diminished learning motivation, and restricted cognitive development. The primary contributing factors involve the exam-oriented education system's emphasis on memorization, the gender labeling of the teaching profession, and a mismatch between instructional methods and male students' learning styles. This paper proposes countermeasures from three dimensions: admission mechanisms, evaluation systems, and th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im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constructing a diverse and balanced teacher education ecosystem.

Keywords: gender imbalance; normal universities; English major; higher education

一、英语专业学生性别分布情况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学生性别结构经历了显著变迁。伴随社会进步与教育普及,女性高等教育机会持续增加,高校整体性别比例趋于均衡,但在不同学科领域呈现出差异化分布特征,其中师范类院校外语专业的性别结构变化尤为引人关注。从宏观层面观察,外语类专业学生性别结构失衡现象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外国语言文学类专业本科阶段女生

占比已长期维持在较高水平。这一趋势在研究生教育阶段,特别是侧重教学实践的专业硕士学位项目中得到进一步延续。聚焦至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硕士层面,通过对多所师范院校的调研可以发现,该专业方向学生性别比例呈现出高度一致的倾斜态势^[1]。以部分高校该专业近三届生源构成为例,2023级至2025级学生总数达58人,其中男性学生仅为8人,占比13.8%,男女比例接近1:6.25。这一分布特征在不同地域的师范院校中具有普遍性。东北地区某省属师范大学2024级该专

作者简介: 杨旭光(1999-)男,硕士,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英语)

业录取的42名学生中,男生5人,占比11.9%;华东地区一所师范院校同期该专业57名学生中,男生7人,占比12.3%;西南地区某师范院校该专业三届在校生中,男生比例均未超过15%。这些数据共同勾勒出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硕士层面学生性别分布的典型图景。从历史纵向比较来看,这种性别分布特征呈现出固化趋势。对比近五年的招生数据,该专业男生比例始终在12%~18%区间内波动,未出现明显回升迹象。这种现象的形成既受到社会文化观念、职业性别标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2],也与教育体系内部评价机制、学科认知特点等要素密切相关,构成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教育现象。

二、性别失衡成因分析

(一) 应试教育模式与男女生的思维感知特点

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模式侧重于知识的记忆、再现与标准化应用,这种评价方式对学生的认知风格提出了特定要求。有学者指出,男女两性在认知加工方式上存在群体性差异,例如女性通常在语言流畅性、记忆力和感知速度方面表现出优势,而男性则在空间能力和数学推理上更具特长^[3]。现行高考英语科目的考查方式,如单词背诵、语法规则应用和范文仿写,更侧重于对语言材料的熟练记忆与精细加工。这使得在语言感知和形象思维方面更具适应性的女生更容易在评价中取得优势。男生虽可能长于逻辑分析,但在当前以记忆和细致为主要特点的英语学科应试体系中,其优势难以充分发挥,因而在英语等文科类课程的学习中更容易感到压力大,进而影响其后续的专业选择意愿,师范类院校英语专业的学生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由此日益凸显。

(二) 社会观念与职业认知的性别偏好

社会观念对职业的性别定位是影响学生专业选择的重要因素。在教师职业领域,这一现象表现得尤为明显。教师职业因其社会声誉较高、工作环境稳定且能兼顾工作与生活平衡,在社会认知中常被视为更适合女性的职业选择^[4]。这种职业性别标签的形成,与我国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传统密切相关。从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分工来看,教育行业特别是基础教育阶段,往往被归类为具有“关怀型”特质的职业领域。相关调查显示,大多数受访者认为教师职业更适合女性担任。这种普遍的社会认知通过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和社会传播等多种途径不断强化,深刻影响着学生的专业选择意向。相比之下,社会传统观念往往对男性赋予更高的经济成就期望。男性在职业选择时通常被期

望从事具有较高经济回报和较强发展空间的工作。然而,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岗位的薪酬水平与晋升空间相对有限,这种现实状况与传统观念中对男性职业角色的期待形成了一定落差。在英语教育领域,这种职业认知的性别偏好表现得更为突出。语言类教学职业往往被赋予更多“柔性”特质,进一步强化了其女性化的职业形象。研究表明,相当比例的男性考生在考虑报考师范专业时,会担忧未来职业发展与社会期望之间的契合度。这种基于性别刻板印象的职业认知,不仅影响了个体的职业选择自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师队伍性别结构的不均衡。

(三) 男女生学习方式的差异性

教学方式与学习风格的匹配度是影响学生学习体验与成效的关键因素。教育心理学研究表明,不同性别的学生在认知风格与学习偏好上存在群体性差异。在教学方法层面,有学者指出女性教师往往更倾向于采用结构清晰、注重细节和强调合作的教学模式^[5]。这种教学风格与女生普遍表现出的认真细致、善于沟通的学习特点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在以女生占绝对多数的学科英语专业课堂中,教学环境与互动氛围往往会无意识地与主流群体的学习习惯相适配。具体表现为:课程组织更注重流程规范,学习评价更关注细节把握,课堂讨论更强调共识达成。这种教学环境在保证教学秩序的同时,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学方式的多样性。相较而言,部分男生更倾向于通过探索、试错和实践来构建知识体系。他们往往表现出更强的探索欲望和实验精神,习惯于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掌握知识。当这类学习风格与强调规范和共性的主流课堂文化产生差异时,容易导致其产生适应困难^[6]。研究表明,在教学方式与学习风格不匹配的情况下,男生的课堂参与度和学习投入度往往会受到明显影响。这种适应性挑战若长期存在,不仅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效果,还可能逐步削弱其专业认同感。教育实践显示,当学生感到自身学习特点与专业教学环境持续不相容时,容易产生自我怀疑和归属感缺失。因此,关注教学方式与学习风格的适配性,对提升学科英语专业男生的学习体验和专业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三、性别失衡导致的男生学习困境

(一) 学业表现与竞争力的显性下滑

高校环境中“女多男少”的性别结构对男生的学业表现产生了直接的负面影响。在女生占据多数的班级和专业中,学术评价的标准和课堂互

动的风格会无形地向女性优势领域倾斜,这主要体现在注重记忆、语言表达和细致规范的学业任务上。男生在数理逻辑和空间思维上的潜在特长,在这种同质化的评价体系中难以得到充分发挥和认可,导致其在考试成绩和综合排名中处于不利地位。特别是在师范院校和人文社科专业,极度失衡的性别比使得男生在学术竞争中更容易被边缘化。一项对多所师范院校的调查显示,男生不仅在学习成绩上整体落后,在保研率等衡量学术竞争力的关键指标上也显著低于女生^[7]。这种由性别结构导致的学习劣势,不仅挫伤了男生的学习积极性,也可能限制其未来的学术发展路径。

(二) 学习动力与心理状态的隐性衰退

长期处于性别失衡的学习环境中,男生容易因缺乏群体认同感而出现学习动力衰退和心理适应问题。当男生在班级中成为绝对的少数时,他们会体验到强烈的孤立感,这种感受会削弱其参与课堂讨论和学术活动的意愿。在女性主导的对话氛围中,男生的观点和表达方式可能显得格格不入,使其倾向于保持沉默以避免关注,从而在学业上逐渐自我放逐。相关研究发现,师范院校中数量稀少的男生更易产生自卑、厌学等情绪,其学习投入度和成就感明显低于处于性别平衡环境中的学生^[8]。同时,由于缺乏同性别的同伴榜样和良性的竞争氛围,男生的学习动机系统难以被有效激活,这种内在驱动力的不足是其学业表现不佳的重要心理因素。

(三) 思维发展与创新能力的结构性抑制

教育环境的性别失衡会通过削弱思维多样性来抑制男生创新能力的发展。健康的学术生态需要不同思维模式的碰撞与互补,男性通常更倾向于尝试探索性、批判性的思维方式。然而,在女生占压倒性多数的群体中,保守、求稳的思维容易成为主流,这使得男生的创新想法和批判性质疑难以获得共鸣与支持,其思维特质也因此得不到充分的锻炼与发展。研究指出,这种“思维同质化”的课堂环境是导致男生创造力发展受限的重要原因^[9]。此外,性别失衡还会影响教学资源的分配与活动设计。学校的课程设计和课外活动可能会更侧重于女性偏好的领域与形式,而那些能够激发男生学习兴趣、培养其动手能力和实践精神的课程与项目则相对匮乏。这种资源分配的结构性偏差,从长远来看限制了男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创新的能力^[10]。

四、应对性别失衡教育问题的路径探索

(一) 推动评价改革与招生调整, 构建多元学业评价体系

针对男生在现有学业竞争中面临的系统性劣势,关键在于改变以单一笔试为主导的评价模式^[11]。应在高考及其他关键性选拔考试中,显著降低对记忆性和精细化作答的依赖,增加考核逻辑推理、批判思维与创新能力的题目比重。同时,探索将学生在中学阶段的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成果纳入升学评价体系,形成综合性评价档案,使擅长动手和实践的男生能展现其优势。在高等教育招生阶段,特别是对于性别失衡严重的师范院校及部分人文社科专业,可考虑设定合理的性别比例区间。在录取时,当某一性别过少时,可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对处于劣势性别的考生给予适当的倾斜,以确保学生群体构成的多样性,从源头上改善男生的竞争环境。

(二) 优化师资结构与教育氛围, 强化榜样引领与因性施教

为解决男生学习动机与角色认同弱化的问题,根本途径是改善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性别结构。应通过宣传引导和政策激励,鼓励更多男性投身教育事业,尤其是在小学和初中阶段,提高男教师比例,为男生提供充足的同性别榜样^[12]。在学校教育环境中,应主动创设能激发男生学习兴趣的教学情境。教学设计应超越单一的言语讲授,增加项目式学习、实验操作、户外考察等环节,将男生的精力与好奇引导至学术探索中。教师需践行“因性施教”理念,理解并尊重男女生在认知风格和行为模式上的差异,对男生的评价不应局限于是否“听话守纪”,更应关注其探索精神和解决问题的潜力,通过积极的反馈重塑其学习自信。

(三) 打破专业刻板与革新教学模式, 促进思维交融与能力发展

为应对男生思维发展与创新能力的抑制问题,需着力打破固有的专业性别标签。社会与学校应共同引导,鼓励学生根据自身兴趣而非性别刻板印象选择专业,支持男生进入教育、文学等领域,促进不同思维模式在专业内部的交融碰撞。在教学模式上,应进行深刻革新。课程设置应增加跨学科、综合性的内容,强调真实情境下的问题解决。课堂教学应更多采用讨论、辩论、合作探究等形式,鼓励不同观点的交锋,为男生擅长的批判性和探索性思维提供展示空间。同时,学校应加大对科技创新实验室、创客空间等实践平台的投入,为男生提供将抽象思维转化为具体成果的场所,系统性地培养其创新实践能力。

五、总结与展望

教师队伍的性别结构是衡量教育生态健康程度的关键指标之一。在充分认识女性教师为我国教育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基础上,必须同时重视男性教师在教育场域中承担的独特角色及其带来的教育价值。当前学科教学(英语)等专业领域出现的性别失衡问题,是社会观念、职业认知、教育评价及招生政策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长期积淀的结果。改善这一现状,需要构建系统化的改革路径。在招生环节,应探索建立兼顾公平与多样性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培养过程中,需推进评价体系改革,打破单一的评价标准;在教学实践层面,要创新教学模式,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在校园文化建设方面,则应着力营造包容多元的环境氛围。这些措施的共同推进,将有助于优化学科教学(英语)专业的性别结构,为不同性别学生的专业发展创造更加适宜的条件。从教育发展的战略高度来看,建设一支结构合理、素质过硬、多元构成的教师队伍,不仅关乎教育自身的生态平衡,更直接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方向。这样的教师队伍能够为学生提供更全面的成长视角,为基础教育注入更丰富的教育智慧。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加强政策引导,高等院校深化培养模式改革,社会各界凝聚共识,形成协同推进的良好局面。唯有如此,才能构建更加健康、多元的教育生态,为教育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础。

参考文献:

[1] 吴玉文. 浅谈大学生性别失衡现象[J]. 大众文艺, 2020, (02): 269-270.

[2] 应小丽, 蒋国勇. 对高师院校男女生性别比失衡的思考--以浙江省高师院校为例[J]. 青年研究, 2002, (03): 27-31.

[3] 邵志芳, 庞维国. 高考成绩性别差异研究的回顾与展望[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6, 34(1).

[4] 吴捷. 教师性别比例失衡对师范生培养的启示[J]. 文教资料, 2021, (27): 79-82.

[5] Driessen, G. The feminiz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effects of teachers sex on pupil achievement, attitudes and behavior[J]. Review of Education, 2007, 53(2): 183-203.

[6] 张军威. 师范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研究[D]. 导师:李伟言; 马治国. 辽宁师范大学, 2014.

[7] 徐家庆, 封秀英. 高校学生性别失衡:表现、成因、危害及应对[J]. 扬州大学学报(高教研究版), 2017, 21(06): 15-19.

[8] 李赐平, 樊燕飞. 师范院校大学生性别失衡造成的问题与对策[J]. 时代教育, 2015, (23): 10-11.

[9] 张文娟. 学生性别失衡对学校教育造成的困扰[J]. 教育现代化, 2017, 4(40): 243-245.

[10] 廖春贵, 熊小菊, 胡宝清. 全国高等师范院校师范生性别比例失衡问题及其对策研究[J]. 教育现代化, 2017, 4(28): 233-235.

[11] 张怀文. 从我国高考制度的演变看高校学生性别失衡问题[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4(02): 21-25.

[12] 郑丽. 师范生性别比例失衡的原因及对策分析[J]. 时代教育, 2017, (05): 249.

原型理论视域下小学语文神话教学的文化认同培育

陈文俊¹ 孔艳洪*

(1.肇庆学院, 广东 肇庆 526000, 2.佛山市南海区西樵镇樵山小学, 广东 佛山 528211)

摘要:小学语文神话教学是培养学生文化认同、奠定文化自信的重要方式, 当前教学多专注于情节讲解, 陷入表层化困境, 忽视了神话作为原型沉淀所承载的民族精神, 难以实现文化育人目标。本研究以原型理论为核心, 结合荣格集体无意识理论与弗莱原型批评理论, 以《女娲补天》《盘古开天地》《精卫神话》等部编版篇目为载体, 探究人物与母题原型的教学实施办法。通过引导学生感受神话背后的民族精神, 搭建原型与现实的联结, 助力学生建立文化认同, 为攻克教学表层化难题提供支撑, 契合义务教育语文育人要求, 筑牢童年阶段文化自信的情感基础。

关键词:原型理论; 神话教学; 文化认同; 小学语文; 教学策略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5

Cultivating Cultural Identity in Primary School Chinese Myth Teaching: An Archetype Theory Perspective

Wenjun Chen¹, Yanhong Kong*

¹Zhaoqing university, Guangdong, China

* Xiqiao Qiaoshan Primary School, Foshan,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 Teaching Chinese myths in primary schools is an important way to cultivate students' cultural identity and lay the foundation for their cultural confidence. At present, most teaching focuses on plot explanation, falling into the predicament of superficiality, ignoring the national spirit carried by myths as the precipitation of archetypes, and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achieve the goal of cultural education. Taking archetype theory as the core, combined with Jung's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theory and Frye's archetypal criticism theory, this study takes compiled textbooks such as *Nüwa Mends the Sky*, *Pangu Separates Heaven and Earth*, and *The Myth of Jingwei* as carriers to explore the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methods of character and motif archetypes. By guiding students to feel the national spirit behind myths and building a connection between archetypes and reality, it helps students establish cultural identity, provides support for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uperficial teaching,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Chinese education in compulsory education, and consolidates the emotional foundation of cultural confidence in childhood.

Keywords: Archetype Theory; Myth Teaching; Cultural Identity;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ing Strategies

一、绪论

由于目前小学语文神话教学中普遍存在就情节梳理、人物分析展开教学的倾向, 很少触及神话文本中所承载的深层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因此教学容易停留在故事表层, 学生也因而缺乏真正

扎实、动人的文化体验, 更不用说充分发挥神话作为民族文化基因的育人功能。

神话本身即是民族早期集体无意识的原型性表达, 蕴含着该文化最根本的世界观、价值观与精神模式。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指出, 原型是人类心理中普遍存在的先天倾向, 而神话正是这

作者简介: 陈文俊(2005—), 男, 本科在读, 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孔艳洪(1980—), 女, 一级教师, 研究方向为语文教育

通讯作者: 孔艳洪

些原型最早、最集中的叙事呈现。因此,从原型视角解读神话,实质是引导学生透过故事表层,抵达一个民族情感与精神的源头,理解“我们为何如此思考、如此感受”。将原型理论系统引入小学语文神话教学,不仅是一种文本解读方法的转换,更是一条引导学生走向深层文化认同的有效路径。它旨在将教学重心从“知道了什么故事”转向“理解了怎样的文化心理与精神原型”,从而在学生心中播下文化自信的种子,实现从认知到认同的升华。这一路径也呼应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感受中华文化魅力,热爱中华文化”的内在要求^[1]。

从现有研究现状看:原型理论在教学中的应用已有相当好的基础,且在词汇、概念教学领域都有清晰的应用方向:语言学习中用以解释一词多义现象,确定核心义项进而建构词义网络^[2],跨学科教学中用以提取核心概念以降低学习难度^[3]。当把目光投向文学教育,尤其是小学语文中的神话教学时,又会发现一个值得重视的研究断层。现有原型理论的教学研究多从语言学及一般知识教学的角度切入,对文学文本如何实现文化育人的关注不足。而且,目前对神话教学的讨论多停留在情节复述或品德点拨的层面,缺少一种能将叙事细节与文化根脉自然联结起来的有力理论视角:叙事为何能跨越千年依然打动人心?它与我们民族的情感模式、精神特质又有何内在联结?这种从“知道故事”到“理解文化心理”思考路径的缺失,神话教学的文化育人功能就无从真正发挥。换言之,弥补此断层是实现真正有效文化育人的重要前提。

由此可见,把原型理论转化成有实效的教学视角,去引导学生从神话叙事中认识、认同其中所承载的本民族的文化精神模式,显然是一个值得认真考察的课题,也是本文的研究方向,即寻找将抽象的文化原型转化为可感知、可理解、可共鸣的教学路径,在童年时期自然、充分地为学生打下文化认同的基础。

二、从原型到认同:神话教学的学理依据

(一) 原型理论及其教学化界定

“原型”概念是本文论述的基本出发点和核心视角,本文将荣格心理学与弗莱文学批评二者结合起来考察。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清晰地揭示了原型是人类心灵中代代相传的普遍心理模式^[4],弗莱将其引入文学研究后,文学原型便被视作文学中具有相对稳定结构的意义单位。它

常以意象、主题、人物、情境等形式,在不同时代与文类的作品中反复呈现,构成文学传统的内在力量,并在特定文化语境中为读者所普遍理解^[5]。基于这一认知,后世文论多将文学原型概括为**人物原型**、**母题原型**与**象征原型**三类基本形态。

人物原型是叙事中为某种人格理想服务的经典角色模式,例如象征勇气与担当的英雄,代表智慧与谋略的智者。母题原型是构成故事内核的原始情节单元与普遍主题,例如解释万物起始的创世,展现顽强意志的抗争,以及彰显奉献精神的牺牲。象征原型是有明确、稳定的文化意义的自然意象或符号,诸如象征光明秩序的**太阳**,象征混沌灾难的**洪水**。

从小学神话教学的语境出发,探究教材神话文本中人物、母题、象征三类原型的具体呈现。这些原型绝不是抽象概念,而是中华神话中承载着民族精神的具体形象、经典情节与情感主旨。因此,神话教学的真正目的乃是引导学生透过故事表层,去触摸、感受民族文化中深藏其内的形式与模式。

(二) 小学语文神话文本与文化认同教学

本文对所论的“小学语文神话文本”做了具体清晰的界定:即统编版小学语文教材中所选的《盘古开天地》《精卫填海》《女娲补天》诸篇中华经典神话,其根本特征是原型性,即以本源性叙事承载中华民族最典型的文化原型。具体而言,盘古开天的故事本身就是牺牲自我、化身万物的开创者原型及殉道母题原型的典型示范,精卫填海的意象是坚韧不拔、生生不息的抗争母题原型的人格化表现,女娲补天的传说则是修复世界、护佑苍生的救世者人物原型的经典呈现。这些具体可感的形象、情节与意象,是民族核心价值观与精神特质的叙事性凝结。

而针对小学生的“文化认同教学”,应在于引导他们通过主动的阅读与思考,逐步感知和理解神话中这些生动的形象、深刻的母题所传递的民族精神,从对故事的兴趣,走向对其中蕴含的民族情感的初步体认与共鸣。这一过程,与接受美学的观点深相契合。沃尔夫冈·伊瑟尔认为,文本中存在着意义的“空白”与“未定性”,等待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主动参与和填补,从而完成意义的最终建构。神话中的原型,正构成了这样一种强大的“召唤结构”。它不是一种僵化的灌输,而是一种深层的叙事邀请^[6]。当学生被精卫的身影或女娲的选择所触动,并开始思考“她为

何这样做”“这与我何干”时，他们便不再是故事的被动接受者，而成为了意义的主动建构者——他们在教师的引导下，以自己的经验情感去填充、解释那些原型，从而在个人理解与民族集体精神之间建立起意义的联结。

这样的过程，本质上就是学生主动建构自身文化认知、形成内在情感认同的过程。神话的原型叙事，悄然地回应了“我们是谁”这一厚重的文化叩问，在童年时期就为孩子们的文化自信打下坚实的情感基础。

（三）原型叙事契合儿童的心理图式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在《童话的魅力》中对儿童用故事处理内在恐惧、解决冲突、寻找生命秩序的方式做了全面的分析。神话中所塑造的强大英雄及救世者满足了儿童对力量、保护、理想自我的种种想象，其从混沌走向有序的叙事框架自然地抚平了儿童对世界不确定性的本能焦虑，而“考验—胜利”、“牺牲—再生”的经典母题给儿童克服现实困难，提供心理模板及道德勇气^[7]。因此，不少课文能被儿童天然地喜爱并长久铭记，其根本原因绝不是辞藻的华丽，而是因为其用文学的方式触及人类共有的“集体无意识”。

对正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小学生而言，“文化认同”本身是一个难以直接理解的概念。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此学段儿童的逻辑思维仍需具体形象和情境作为支撑。空洞的价值说教无法被其有效同化，他们必须通过可感、可触、可思的具体中介来完成学习^[8]，而神话堪称将抽象文化精神转化为具体叙事最绝妙、最有力的中介。

“开天辟地”的创世精神，化身为巨人盘古清晰有力的动力来源；坚韧不拔的民族意志，凝结为小鸟精卫日复一日衔木填海的执着身影；舍己为人的牺牲美德，演绎在女娲炼石补天的救世壮举之中。这些既超凡又具象的角色，以及情节中鲜明的冲突与转化，恰恰将“奉献”“秩序”“抗争”等宏观的文化基因与集体精神，凝结为了一套生动、完整、可被儿童心智直接接收与处理的故事系统。

三、原型理论在神话教学中的实施策略

（一）人物原型的教学阐释：以《女娲补天》为例

小学神话教学中运用人物原型的根本目的就是实现从学术概念到教学实践的创造性转化，因

此绝不可简单地向学生灌输抽象理论，而要将神话人物所承载的民族性、普遍性并存的精神模式，转化为学生可感知、可体验的具体品格，由此切实培育文化认同。简言之，这是把弗莱所论的人物原型理论通过具体教学环节还原为鲜活的文化体验。

教学首先要让学生走进神话文本本身，直接而充分地感知女娲形象，故而先梳理女娲“抁土造人”与“炼石补天”事迹，由此自然、妥帖地在想象中建构起有慈爱、有伟力的女神形象。本环节的根本目的就是体会神话故事本身的奇异性、浪漫性，为后续的深度理解奠定坚实的经验基础。

当鲜活、明确的人物形象已经建立之后，教学转向对人物行为内在逻辑及普遍意义的分析。教师宜以问题引导学生跳脱情节表层的奇巧，去挖掘行为背后的精神动因：女娲为什么要创造生命？为什么灾难降临时她要主动承担补天之任？在师生共思共言的过程中，学生会自然而然地提炼出“创造”“守护”“担当”“牺牲”等核心品质。女娲的形象由此得到第一次真正意味深长的升华，从具体的神话人物发展为人类对“至善的创造者”“无畏的守护者”理想人格的集体表征。更难得的是，此种升华恰如其分地呼应了人物原型理论的本质，契合“原型是种族记忆的保留，种族集体无意识的心里沉淀”的观点。女娲形象所承载的创造与守护精神，是中华民族在漫长发展历程中形成的精神积淀，是集体无意识的生动外化，能够引发每一个个体的情感共鸣。^[9]

教学的根本目的就是促成古典精神与现代生命之间的真正共鸣，而原型的力量恰恰在于其能打破时空限制做有力且有意境的映照。因此，教师可搭建起沟通神话原型与现实经验的桥梁，引导学生思考：女娲身上所呈现的创造之爱、守护之责，是否也存在于我们周围的世界？当学生联想到家人的抚育、师长的教诲、社会上种种陌生人的善举时，两者之间意义的联结就水到渠成地建立起来。至此，女娲的形象完成第二次极好的升华，从一个古老的叙事符号升华为一种鲜活的文化精神与情感认同。学生由此切实感受，博爱、担当的品格绝不是典籍中僵硬的文字，而是流淌于自己所属的文化血脉之中。

（二）母题原型的教学阐释：“牺牲—化生”母题与《盘古开天地》

神话教学中对母题原型的阐释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学生认识民族文化中远古的精神模式，盘古

开天辟的神话便引出中华民族精神中一个基础性的母题原型：“牺牲—化生”。更难得的是，该母题绝不止是品德的象征，实质上也是中华文明对“开创”本质的集体回答：新秩序的建立、文明的新起点，从来都与为整体福祉而彻底奉献自我、甘愿化生万物的崇高选择直接相关。故而教学宜引导学生从叙事出发，切实感受、体会深植于民族历史记忆之中的这一文化特质。

教学实践从对神话整体的感知、对重要情节的把握入手，先系统、有层次地叙述盘古在混沌中开天辟地、以身躯撑起乾坤、力尽之后以身化万物的完整故事，帮助学生建立起从混沌到有序、从个体到万物的壮阔叙事框架。继而自然地转入“以身化万物”的核心转折，用有效提问引导学生思考：“盘古牺牲后，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他的身体变成了山川、风云，和彻底消失有什么不一样？”在轻松的讨论中，学生能直观体会到，盘古的牺牲不是消亡，而是把自己变成了世界的一部分，是一种充满爱的“馈赠”。

由此，顺理成章地引导学生理解“牺牲—化生”母题原型的内在逻辑。中华民族从远古伊始便秉持这样的生命认知，即个体生命并非消逝即终结，而是能转化为世间万物、融入天地自然，与世界永恒共存。正是这份独有的生命观念，让“奉献与牺牲”不再是令人畏惧的选择，反而成为成就天地、延续存在的崇高方式。这样一来，学生所学习到的不是“做人要无私”的道德准则，而是能读懂民族文化中开创与奉献的精神，源于生命终将化为万物因而无惧牺牲的底气，其催生出愿意为美好事物付出的勇气。盘古以生命化生万物的“牺牲—化生”原型，正是个体融入集体、实现生命永续的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

为了让母题原型与学生现实认知建立起进一步的联系，教学仍需进一步地指引学生发现所论精神模式在历史、当代的延续，教师可以很自然地提出问题：盘古所象征的此种精神，目前我国的文化传统及现实生活中是否仍有存在？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的公共精神，历代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仁人志士，以及当今种种平凡岗位上埋头苦干、甘于奉献的普通人，其具体行为虽各不相同，但精神内核都与盘古叙事形成跨越时空、彼此辉映的呼应。因此学生在辨识此种精神共通性时，也就自然、有力地领悟到：奉献与开创绝非远古传说，实为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一以贯之、绵延不绝的精神传统。

（三）母题原型的教学阐释：“坚韧—抗争”母题与《精卫神话》

“精卫填海”的神话叙事有一个明确、有力、动人的原型母题：“微渺对抗浩瀚”的坚韧抗争，但对该母题的教学阐释要突破“教导坚持”的常规德育框架，妥帖地引出其中所蕴含的更根本、更壮大的民族生命意志及存在态度：即其根本不是讨论行为能否成功，而是要让学生体会行为本身所表现出来的、遇压倒性困境绝不肯屈服的精神姿态。这正是中华文化中一种关于尊严、韧性及生生不息力量的经典表达。

教学开始时引导学生进入神话中所呈现的极端不对等的冲突，即弱小无力、曾失去生命的精卫鸟与浩瀚无边、吞吐万物的大海，然后让学生品读“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的重复性动作描写，在想象中建构起悲怆壮烈、动人心弦的画面。更重要的是，教学要适时、有力地引导学生厘清该行为的象征意味——精卫填海绝不是单纯的现实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永恒的姿态，即在承认填海结局的不可能之后，仍以持续行动去确认自身意志、反抗命运安排。故而其填海之举可被恰如其分地视为“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崇高选择。此番执着绝非功利计较，实乃纯粹、坚定的精神性抗争，这也是民族集体心理中应对巨大逆境时“不低头、不认命”原型态度极为动人、富有力量的叙事结晶。同时，原型作为个体应对相似情境的先天心理倾向，精卫的抗争姿态，正是中华民族在面对困境时不屈不挠集体心理的原型呈现，能够跨越时空引发学生们的情感共鸣。

为了让学生更好地从叙事共鸣过渡到内化精神，教学活动宜设计有简单易懂的思辨情境：先以“精卫每天衔木填海，到底有意义吗”为切入点，组织学生讨论，引导他们思考“精卫明明填不满大海，为什么还要坚持”，区分“为了要成功而坚持”和“为了不放弃而努力”的不同，在轻松的观点交流中，让学生慢慢理解精卫精神的核心——哪怕力量小，不放弃的态度本身就很有价值。更重要的是，教学要将此古典母题与学生的日常学习生活做有温度、易共鸣的联结。教师可适时引导学生反思：生活中，我们有没有遇到过像“大海”一样难办的事？比如解不出的数学题、学不会的新技能、坚持不下来的好习惯，这时，我们可以像精卫一样，做哪些小小的、不放弃的努力？这样一来，精卫的形象就从一个遥远的神话人物，真正变成了学生可以学习、可以

践行的榜样,也让抗争与坚持的原型精神,悄无声息地融入学生的生命体验中,实现文化认同的内化。

综上,三种教学呈现出共通的教学逻辑:以文本的感知作为基础,让学生先走进神话故事,搭建鲜活的人物或情节认知,奠定情感与经验方面的基础;然后以问题引导作为方法,跳出表面内容,发掘人物行为或母题背后的精神内涵,达成从具体形象向原型精神的首度提升;最后以联结现实作为关键,架起原型与学生日常生活体验之间的桥梁,使抽象的民族精神成为可感知、可付诸实践的具体认知,达成原型精神的内化以及文化认同的落地,于年轻心灵当中,种下把握民族精神深度的种子。

四、结论与展望

本文对原型理论在小学语文神话教学中的应用做了尝试性的分析,先厘清了该理论在解读文本深层文化意蕴、培养学生文化认同感两方面的独特价值,继而以人物原型、母题原型的教学转化为例,逐步地推出从文本感知、原型体认到文化关联的具体教学路径,为神话教学突破表层情节分析、触及民族精神根脉提供了学理依据与实践方向。

毋庸讳言,本研究仍存在明显局限。就研究内容的完整性,目前讨论以人物原型和母题原型为主,故对象征原型的教学转化尚未予以充分考察,因此研究视角宜作扩展。就理论转化而言,本文论述多从理论角度展开,故尚不能提供有完整设计、有明确评价方案的可操作案例,其在真实课堂中的实际效应,自然要待今后的实践观察及实证研究方能厘清。

文中未完善领域本身就是今后研究的方向。在横向拓展上,可将原型理论应用于小学阶段其

他有文化意蕴的文本类型,诸如古诗词中的经典意象体系、民间传说中常见的叙事模型,由此建构起更完备的传统文化深层解读教学框架。在纵向深化上,要让理论切实地转化为教学实践。未来可专注于开发系统、简洁、可操作的教学设计,再以课堂教学实践为基础,结合长期效果分析,层层反思、反复优化,真正让原型理论成为培育学生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具体教学智慧。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S].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2.
- [2] 曹巧珍. 原型范畴理论应用于课堂一词多义教学的实验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2010,31(2):37-44.
- [3] 贾瑞婷. 原型理论在钢琴教学中的应用[J]. 戏剧之家,2023(26):129-131.
- [4]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原型与集体无意识[M]. 徐德林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11: 3-5.
- [5] 朱立元. 弗莱的原型批评美学[J]. 人文杂志,1998,(06):128-134.
- [6] 沃尔夫冈·伊瑟尔. 文本的召唤结构[M]//刘小枫. 接受美学译文集.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9: 238-241.
- [7] 布鲁诺·贝特尔海姆. 童话的魅力: 童话的心理意义与价值[M]. 舒伟、丁素萍、樊高月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71-73, 125.
- [8] 让·皮亚杰. 发生认识论原理[M]. 王宪钊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1: 47-49.
- [9] 胡苏晓. 集体无意识——原型——神话母题——容格的分析心理学与神话原型批评[J]. 文学评论,1989(01):133-140.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背景下高等教育的社会市场逻辑 与治理变革

刘心怡¹

(1.中南民族大学, 湖北 武汉 430000)

摘要: 随着中国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 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传统的高等教育体系强调学术独立性和公益性, 但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 高校正逐渐从封闭的象牙塔转向开放的社会中心。本文基于政策分析与文献研究, 探讨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 以及高等教育如何适应社会市场逻辑, 平衡公益性与效率性。研究发现, 市场化改革在促进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同时, 也带来了功利化、区域失衡等挑战。未来改革应在政府引导下, 构建分类治理体系, 推动高等教育与市场良性互动。

关键词: 高等教育; 社会市场逻辑; 市场化改革; 要素流动; 治理体系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56

The social market logic and governance reform of higher educ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Liu xinyi¹

¹ Affiliation, South 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Wuhan, China

Abstract: As China acceler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unified national mark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market is undergoing profound changes. The tradition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emphasizes academic independence and public welfare, but driven by market-oriented reforms, higher education is gradually shifting from a closed ivory tower to an open social center. Based on policy analysis and literature research,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social market, and how higher education adapts to the logic of the social market and balances public welfare and efficiency. The study finds that while promoting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market-oriented reform also brings challenges such as utilitarianization and regional imbalance. Future reforms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government to build a classified governance system to promote the positiv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market.

Keywords: higher education; social market logic; market-oriented reform; factor flow; Governance system

作者简介: 刘心怡(2002—), 女, 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

通讯作者: 刘心怡

一、引言

近年来,中国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中共中央与国务院明确提出要推动资本、劳动力、技术等要素的市场化配置,这直接影响了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和发展方向。传统的高等教育理论认为高校应保持相对的独立性并以学术自由为核心价值,然而在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已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协同,甚至在某些领域呈现出市场力量牵引高校发展的趋势。当前高等教育正经历从传统学术共同体向市场服务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过程呈现出要素配置市场化、服务功能社会化以及治理结构多元化等三个显著特征。通过对多所高校的案例可以发现,市场化改革使高校科研转化率得到显著提升,但同时也带来了基础研究投入下降与人文社科专业萎缩等结构性问题。本文提出有限市场化改革框架,建议通过建立分类评价体系、完善要素流通机制与强化政府调控职能等路径实现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二、社会市场要素及其改革逻辑

社会市场要素主要包括沉淀在产业与农村集体中的资本、土地、劳动力和数字等资源,其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是经济市场追求的主要目标。当前市场制度改革要求建设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与制度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强化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与社会信用等基础制度规则的统一。这些宏观维度的改革举措必然对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科研方向产生深远影响,高等教育作为人才和技术的核心供给者,必须积极回应并融入这些市场要素改革的需求。

(一) 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与要素市场打造

现代流通网络建设与市场信息交互渠道的完善是打破信息孤岛和降低交易成本的关键举措。当前我国流通体系建设亟需构建立体化物流网络,在国家、区域与终端层面补齐流通短板。同时,各部门与各地区的数据标准不统一严重制约了市场运行效率,因此需要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信息共享平台,整合关键数据以实现市场主体信息的一网通查,并制定统一的数据标准和接口规范确保各类市场信息能够实时互通。此外,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核心在于推进要素市场的深度整合与制度创新,这一进程需要从土地、资本、技术数据、能源和生态环境等关键要素市场协同发力。

在土地与资本要素市场,通过同权同价机制促进要素平等交换,消除区域性准入壁垒以破解市场分割问题;技术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则聚焦制度突破,加快数据产权立法以明确权属规则,推动公共数据有序开放与社会数据合规流通。这些举措为高等教育产学研对接与科研成果转化提供了高效的基础设施支撑与制度环境。

(二) 推进商品与服务市场统一及监管规范化

推进商品和服务市场高水平统一以及市场监管与竞争秩序规范,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关键环节。在商品质量体系建设中,我国正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的质量监管机制并推广溯源技术,构建预防监控处置闭环管理体系。标准计量体系建设聚焦新兴领域,加快数字经济等领域标准研制以提升国际话语权,这直接倒逼高等教育调整专业结构以培养符合高标准新型人才。同时,我国正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规则框架,制定通用市场监管权责清单,针对新业态实施包容审慎监管,并在反垄断与反不正当竞争治理方面细化认定标准。改革的落地依托跨领域协同机制与制度保障,通过实施市场准入壁垒清理专项行动与加快相关领域立法,逐步构建现代市场体系,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与高校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提供坚实制度支撑。

三、社会市场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重构

在资源依赖与系统演化的双重逻辑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随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经历了深刻的变迁。

(一) 传统高等教育理论中的相对独立机制

在传统的高等教育理论中,高等教育在适应并引领社会市场发展需要的同时,必须保持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主要体现在学术自由的保障机制与人才培养的内在逻辑两个层面,即高校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应不受市场短期行为的干扰以追求知识的深度与原创性,同时强调通识教育与综合素质发展以防止教育被工具化和短视化导向所左右。在这一理论框架下,高等教育不仅是人力资本供给方,更是文化传承与批判性思维培育的重要空间,其作为超越功利的学术机构,核心价值在于面向未来。然而,随着市场逻辑日益渗透社会各个层面,传统高教理念所倚赖的学术共同体自治正面临空前挑战。

(二) 新时代背景下关系的动态演变与协同

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并行推进的宏观背景下,高等教育与社会市场的关系发生了结构性重塑,其功能的社会化、角色的复合化与目标的多元化趋势日益显著。社会市场的迅速变革正在倒逼高校调整专业结构与课程体系,以应对复合型与高适应性人才的迫切需求,例如数字经济相关专业在高校中的爆发式增长折射出教育结构对市场信号的高度响应能力。与此同时,社会反向需求愈加显性,促使高校不断拓展其边界,设立校企联合研究平台与技术转移中心,形成知识技术产业协同融合的新模式。全国统一大市场改革强调要素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与公平竞争机制的建立,为高校办学提供了更广阔的制度空间,促使高等教育从接受式适应者转变为共建式参与者,成为制度创新与社会结构重塑的主动参与者与引领者。

四、 社会市场改革对高等教育的深度影响

随着社会市场逻辑在经济运行中的全面嵌入,高等教育的内外部结构均面临深刻重塑。改革不仅改变了高校的资源供给模式,也对其组织结构、学科生态与治理逻辑提出系统性的重构要求。

(一) 资本要素变革下的办学逻辑重组

市场化改革最直接的体现是推动了高校财务结构的多元化,尤其是资本来源渠道的社会化趋势日益明显。以国内顶尖学府为例,其社会筹资占学校总收入的比例在近七年内实现了大幅跃升,显示出高校已逐步摆脱对财政拨款的单一依赖,进入政府引导与社会投入双轨并行的新阶段。这种财务结构的根本性转变,不可避免地促使高校在资源配置与战略方向上更加注重投资回报与市场反馈。近年来,企业主导的科研课题数量快速增长,部分校企联合实验室采用企业出题与高校解题的协同模式,极其有效地提升了技术研发与产业应用的契合度。然而,资本逻辑的强势介入也引发了学界对于学术自主性被资本蚕食的担忧。若科研目标完全交由市场终端驱动,其带来的短期逐利导向极有可能导致基础研究空间的急剧压缩,从而在根源上损害高等教育作为前沿知识创新基地的长远战略功能。

(二) 劳动力市场演化对学科生态的冲击

社会市场机制对劳动力的动态需求直接且猛烈地作用于高校专业设置。在2020至2023年间,全国高校共新增数字经济相关专业近三百个,同时大批撤销了部分产出率不高的人文社科类专业,这充分体现出教育系统对宏观市场导向的快速响

应能力。在短期内,这种调整极大优化了学科供给与社会就业需求之间的结构性匹配,有效缓解了毕业生结构性失业的紧迫问题。但从长远的人才储备战略来看,这种功利化的结构性调整也带来了学科生态严重失衡的潜在风险。基础学科与人文社科专业因其短期经济转化率不高而频繁成为被优化的对象,这不仅破坏了大学知识体系的多样性,更可能在潜移默化中削弱国家未来的基础创新能力和文化软实力积淀。

与此同时,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建设在打破地域壁垒、促进人才自由流动的同时,却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地区间高教资源分布的极端不平衡。以西部高等教育重镇陕西为例,近几年其双一流建设高校中流失了大量正高级科研人员,且绝大多数直接流向了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的高校。这种由市场薪酬和资源级差带来的虹吸效应,使得西部高校在高端人才的存量博弈中持续处于劣势,进而危及区域高等教育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三) 技术要素市场化带来的结构性挑战

专利转化率的提高是衡量高校科研成果市场化效率的关键指标。部分理工科强校在近三年内累计转化专利数以百计,产值突破数十亿元,客观反映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的显著增强。但剥离总量的表象深入分析可以发现,绝大部分的转化项目高度集中在光电、芯片等热门应用领域,而其他传统学科的成果转化率依然极低,呈现出严重的技术转化结构失衡现象。此外,伴随技术要素市场化而来的还有知识产权纠纷数量的激增,许多高校法务部门处理的侵权案件连年翻番,显示出有制度保障与法律支撑严重滞后于改革步伐,凸显出高教系统在转型期普遍存在的法治盲区。

(四) 高校组织形态的重塑与文化冲突

随着效率至上的市场化逻辑深入校园治理体系,各类面向市场的新型组织机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例如科技成果转化公司、产业研究院等。由于这些机构以经济效益最大化为核心运作逻辑,与传统院系以学术真理为导向的体制存在天然的隔阂,导致组织文化间的张力与摩擦日益凸显。在面临双轨制考核时,部分教师开始出现行政目标优先于学术追求的倾向,这不仅破坏了纯粹的教研氛围,也对大学作为知识共同体的核心定位构成了严峻挑战。

五、 市场化改革的现实困境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冲

突

尽管市场化改革在盘活高校资源、提升办学效率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其在狂飙突进的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系列深层次矛盾。这些矛盾既是价值理念的剧烈碰撞，也是制度供给匮乏的必然结果。

（一）效率导向与教育公益性的剧烈张力

高等教育作为准公共产品，其根本属性在于学术传承与社会育人，但市场逻辑天然强调投入产出比与效益最大化，这必然导致教育价值的功利化异化。以上海部分顶尖高校为例，其部分热门应用型硕士项目的学费在短期内呈现跳跃式上涨，直接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教育资源公平性的强烈质疑。生源数据表明，高昂的学费门槛使得此类项目中来自高收入金融行业的学生比例占据绝对主导，而具有公共服务行业背景的学生则被大幅挤出。这一现象的本质，是高投入与高回报的资本逻辑对学科发展和教育准入的深度渗透。当越来越多的高校受利益驱使，将有限的财政资源倾斜至盈利性强的专业时，那些慢产出、高风险的基础学科则面临被彻底边缘化的风险。

（二）区域教育资源的结构性失衡与阶层固化

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政策初衷是促进资源在更广阔的空间内高效配置，但在高等教育领域，资本与人才的自由流动却残酷地加剧了资源积聚的两极化趋势。西北地区的一流高校在激烈的市场抢断中，短短数年间流失了数十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在横向科研课题经费的吸附能力上，这些西部强校甚至不及同等体量东部高校的十分之一。这种由于市场机制造成的持续性贫血，直接导致西部高校在重点实验室的设备更新、科研平台的搭建上举步维艰，进而对其核心科研竞争力构成实质性绞杀。部分西部高校的青年教师甚至将本地执教视为积累职称的跳板，一旦评上高级职称便立刻兑现市场价值流向东部，彻底形成了一条培养、流失、再培养的恶性循环链条。此类制度套利现象严重削弱了国家宏观区域均衡政策的实际效力，暴露出当前粗放的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根本缺乏自我纠偏与区域平衡调节的能力。

（三）制度供给滞后与治理能力的瓶颈

改革的快速推进在高校内部催生了对制度配套的巨大需求，但现实中制度供给的严重滞后已成为阻碍改革深化的核心掣肘。这主要体现在三

个维度的突出短板。首先是专业化技术转移人才的极度匮乏，绝大多数地方高校尚未建立专职且具有市场敏锐度的技术转移团队，导致海量专利沉睡在实验室，转化周期远远落后于市场迭代速度。其次是绩效评价体系的顽固僵化，即便外部市场导向日益强烈，但高校内部的人事考核依然刻板沿用唯论文与唯项目的指标体系，导致许多从事高质量应用转化研究的教师在职称晋升上面临制度性歧视。最后是产权与风险防范机制的模糊不清，在混合所有制改革与科技成果入股的过程中，由于产权界定不清导致的法律纠纷频发，不仅极大地打击了科研人员的创新热情，也让高校本身背负了巨大的国有资产流失风险与声誉危机。

综上所述，这些问题并非偶发的孤立事件，而是我国高等教育在市场化转型中路径依赖与制度惯性的集中爆发。长久以来，改革往往遵循先实践后制度的经验主义渐进路线，导致制度规范永远滞后于实践创新。要彻底打破这一僵局，就必须在拥抱社会市场的同时，同步启动内部制度系统的底层再造。

六、国际经验比较与本土化创新

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并非中国独有现象，发达国家早已在不同制度历史路径下进行了广泛且深刻的探索。系统梳理并审视其经验与利弊，对于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市场化治理模式具有不可替代的借鉴意义。

（一）高度市场化下的效率与公平博弈

美国高等教育的市场化程度稳居全球前列，其强大的社会筹资能力与庞大的捐赠基金规模不仅构筑了坚实的财务基础以支撑学术自由，更使大学具备了极其强烈的自主改革与抗风险能力。在科技成果转化这一核心维度上，美国高校普遍设立了专业化的技术许可办公室，通过确立明确的收益激励机制与产权归属法案，极大激发了教师群体与科研机构的创新积极性。然而，这种高度依赖资本逻辑的市场化体系也暴露出了致命的社会问题，其高等教育体系呈现出触目惊心的高度分化与阶层固化倾向。高昂的准入门槛使得顶尖大学中来自极高收入家庭的学生比例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这深刻反映出纯粹的市场机制在教育资源配置中存在严重的公平缺失。尽管联邦政府试图通过各类助学金手段进行宏观再分配，但在资本的虹吸效应面前，这些举措始终难以从根本上撼动其结构性的不平等格局。

（二）产教协同与法人化治理的转型尝试

德国与日本则提供了截然不同的制度样本。德国高等教育极度强调职业教育与企业实践的深度融合，通过与跨国企业共建联合研究院并实行双负责人制，确保了校企双方在决策与目标设置上的绝对对等参与。该模式凭借稳定的经费保障与高度贴近工业需求的实践导向取得了巨大成功，但过度依附于企业盈利目标的弊端也逐渐显现，部分探索性的基础研究项目面临被全面边缘化的严峻风险。此外，在快速变化的数字经济时代，其过早锁定的职业路径反而限制了学生跨领域自由发展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日本为应对沉重的财政压力与低下的行政效率，全面启动了国立大学法人化改革。通过在高校内部设立产学研协同推进机构，整合技术转移与创业孵化资源，显著提升了高校的市场适应能力与科技转化效率。但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同样带来了始料未及的学术异化问题，过度注重短期量化成果的考核机制导致教授群体将大量精力耗费在行政审批与项目报告上，不仅部分基础研究质量出现断崖式下滑，学术自由也遭受了潜在的制度性侵蚀。

（三）构建中国特色敏捷协同的治理体系

立足于中国独特的政治经济国情，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必须彻底摒弃单纯放权或强硬管制的二元对立思维，转而探索一种兼顾效率与公平、开放与稳定的敏捷协同治理模式。在宏观理念层面，必须坚持放而不脱与收而有度的辩证统一，高校在资源使用与组织架构上应获得充分的自主权以提升市场适应力，而政府则必须利用制度底线牢牢守住教育公平与基础学科发展的大门。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应当全面建立负面清单管理体系，明确划定市场化改革的绝对禁区，绝不允许特定基础学科因短期的市场失灵而被迫退出。同时，改革的推进必须实行分类指导与差异发展策略，针对研究型、应用型及职业类院校实施量身定制的市场化路径，并构建基于周期性科学评估的动态反馈机制，以此实现改革政策的闭环管理与精准修正。

七、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

高等教育市场化改革是中国教育现代化战略蓝图中的核心板块，其推进过程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底线思维与战略定力。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制度逻辑与国际社会的经验教训，本文提出以

下系统性改革路径。

（一）厘清政校职能边界与优化资源配置机制

当前我国部分高等院校在资源配置与自主办学权方面依然深受传统行政管理的深度制约，政府在微观干预与宏观放权之间的摇摆不定，严重压抑了高校内生动力的激发。破局的关键在于全面完善高校办学自主权清单制度，以清晰的法律条文明确学校和专业设置、人才引进与财务管理等核心领域的自主权限，切实提升治理的透明度与政策的可预期性。政府管理方式必须由繁琐的审批制向高效的备案制全面过渡，完成从高高在上的控制者向服务者与监督者的角色转换。在资源配置维度，应当彻底打破长期以来按行政级别与学生规模分配财政资金的路径依赖，全面推行竞争性拨款与基础拨款相结合的混合模式。对不同类型高校设定差异化的绩效引导指标，同时设立专项兜底资金以保障薄弱学科和中西部地区高校的生存底线，通过建立涵盖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等多维度的综合评估体系，强力倒逼高校完成内部治理转型。

（二）贯通科技供给链条与筑牢教育公平底线

市场化改革的核心诉求之一在于彻底激活高校的科技创新潜能与社会服务能力。面对当前科研到成果再到转化链条中的重重制度堵点，必须大刀阔斧地修订高校科技成果使用权制度。通过深化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允许并在法律层面保障科研人员在技术转化中持有股份与享受分红，真正实现人尽其才与技尽其用。此外，政府应积极引导建设校地协同创新平台，鼓励高校与地方产业集群共建产教融合基地，打造校企政三方紧密联动的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然而，市场机制如果缺乏强有力的公平保障，极易导致资源向上层板结与机会向底层封闭，这与国家共同富裕的战略宏图背道而驰。因此，必须建立系统性的教育数字鸿沟补偿机制，利用国家级智慧教育平台向中西部高校无偿开放顶尖教学资源。更重要的是，要将区域协调发展政策深度嵌入教育资源配置的核心环节，为边缘落后地区高校设立长期的专项发展基金，并以制度化的形式鼓励双一流高校通过对口支援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最后，由多部委联合设立国家级改革评估中心，围绕资源配置效率与教育公平指数开展全周期的大数据动态监测，为政策的精细化微调提供坚实的数据支撑。

八、结语

当前,中国正处于从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全面转型的历史性关键节点,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与全局性战略地位愈发凸显。高等教育作为国家人力资本积累和前沿科技创新的最重要载体,在市场经济体制不断深化的宏观语境下,其改革方向既不能毫无底线地完全倒向市场化,也绝不能因循守旧地拘泥于传统计划体制。唯有在无形的无形之手与有形的手的动态战略互动中,方能蹚出一条中国特色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的崭新路径。

本文系统剖析了社会市场变革中高等教育转型的底层逻辑与现实困境,指出在深化改革的历史进程中,必须推动高等教育从粗放的规模扩张大步迈向内涵式的结构优化与质量提升。未来的研究可以在以下几个战略方向继续深化:一是教育数字化转型及其对大学生学习方式变革与高等教育市场化的深层影响机制;二是基于区域禀赋差异的不同类型高校特色化改革路径探索;三是高度市场化语境下教育公平的法治化保障机制构建。

必须深刻认识到,市场化永远只是优化资源配置的工具与手段,立德树人才是高等教育不可动摇的根本使命。在浩浩荡荡的改革浪潮中,唯有始终坚守这一正确的价值导向,避免陷入为改革而改革的盲目误区,才能确保中国高等教育事业行稳致远,真正兑现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承诺。

参考文献:

- [1] 张浩正,张瑞瑞.类市场化治理:高等教育改革的运作逻辑及价值定位[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50(04):138-143.
- [2] 蔡永平,朱立峰.国外高等教育市场化的特征及启示[J].文教资料,2019,(26):139-141.
- [3] 睦依凡,王改改.大学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的必然选择[J].中国高教研究,2021,(10):8-13.
- [4] 张敏.高效可持续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建设研究[M].湖北人民出版社:2023:46-47.
- [5] 郑润廷,徐艳茹,刘继安.理解高等教育市场化态度与实践的差异——基于思想实验达成的反思平衡[J].江苏高教,2025,(02):13-21.
- [6] 谭小芳,冯珂珂.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产品属性与市场化分析[J].民族高等教育研究,2022,10(04):30-40.
- [7] 林少婷.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弊端及其对策[J].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18(01):12-16.
- [8] 郝广龙.当代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异化与回归研究[D].四川师范大学,2022:9-10.
- [9] 颜苗苗,周桂芹.高校数字化转型的智慧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出场语境、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江苏海洋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6,24(01):125-135.
- [10] 杜学元,周敖冬.教育数字化转型下高校数字教育的价值旨归、现实困境与纾解路径[J/OL].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15[2026-03-22].<https://doi.org/10.16246/j.cnki.51-1674/c.20251121.001>.

中国社会与酒文化变迁

王路宁¹

(南华大学, 湖南 衡阳 421000)

摘要:在中国酒文化演变过程中,低度黄酒一直是主流,黄酒式微也就是近百年的事。酒从先秦沟通神人的媒介,变为个体情感的寄托,再变到大众消费的商品,最终变为了近代多功能的且受文化资本加持的道具。如今社会对高度酒的复杂态度,本质上只是回归对这一“非自然选择”的直觉反应。若欲重构健康的酒文化,或当从先秦之“节”、魏晋之“真”、唐宋之“雅”中汲取智慧。

关键词:酒文化;黄酒;白酒;历史演变

基金项目:衡阳市社科基金自筹项目(2023D006):衡阳酃酒文化产业发展模式研究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67

Chinese Socie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Wine Culture

WANG Lun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0, China

Abstract: In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liquor culture, low-alcohol huangjiu (yellow wine) had long been the mainstream, and its decline has occurred only over the past century. Liquor transformed from a medium for communicating with deities in the pre-Qin period into a vessel for individual emotions, then into a commodity for mass consumption, and eventually in modern times into a multifunctional instrument bolstered by cultural capital. Contemporary society's ambivalence toward high-alcohol liquor essentially reflects an intuitive response to this “non-natural selection.” To reconstruct a healthy liquor culture, we may draw wisdom from the “spirit of moderation” of the pre-Qin period,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Wei and Jin dynasties, and the “elegance” of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Keywords: liquor culture; yellow wine; baijiu; historical evolution

《说文·酉部》:“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恶。从水、从酉,酉亦声。一曰,造也。吉凶所造也。古者仪狄作酒醪,禹尝之而美,遂疏仪狄。杜康作秫酒。子酉切。”许慎用直音法注解“酒”造字之初的音义关联,认为酒的本义是“就”,酒是一种迁就之物,是用来迁就人之善恶的饮料,再通俗一点说,酒

一、先秦的克制:酒以成礼

《战国策·魏策二》中记载“仪狄作酒献禹”的故事里,大禹发出了预警:“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或许是一种放大人性中的善恶的东西。俗话说酒怡情、酒乱性,小酒怡情,喝多了则乱性情。^[1]许慎于酒所作的亦正亦邪的评价可见“酒”很早以来在人们心中就是要严加管控的饮品,那么历朝历代都是如何看待中国酒的呢?

也正如大禹说预见的,夏朝末年君主桀,极尽享乐之能事,命人挖了一个巨大的酒池,可以在里面划船,足以容纳三千人俯身牛饮,甚至不少人醉溺其中。此种穷奢极欲的作为,最终导致了夏朝的灭亡。此后的

商朝也没有吸取教训，末代君主纣王同样建造了巨大的酒池，并将肉悬挂在树林里，史称“酒池肉林”，让男女在其间裸身嬉戏，彻夜狂欢，惹得民怨沸腾，商朝灭亡。

因此，周代吸取前朝的教训，将酗酒与失德系联起来，禁止酗酒风气继续蔓延，初步建立了一套酒礼，将“祭祀”“尽孝”“敬老”三类场景列为“合法饮酒”的情境。《尚书·周书》就记录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限酒令。周公旦平定武庚叛乱后，令康叔在卫国宣布戒酒令，“刚制于酒”，确立了一套严格的饮酒规范，“无彝酒，执群饮，戒缅酒”：强调饮酒非常事，平时应节制；禁止聚众饮酒，凡违令者全部逮捕押送京师处死；即便在允许饮酒的场合，也须以道德约束自己，不至喝醉。

周代将饮酒严格纳入礼制轨道，那么酒的主要用途就从单纯的享乐之用转为“礼器”之用。据统计，记录周代礼仪的《仪礼》《周礼》《礼记》“三礼”中，光记载用酒礼仪活动就涉及“祭祀类”“宴饮类”“射礼类”“冠昏类”“养老类”五类场景，细分则可达十余种。比如祭祀时，宗庙禘祭、禘祭、四时祭等皆需备五齐三酒，所谓“五齐”指五种未经过滤、带有酒糟的浊酒，根据它们的清浊程度的不同分为“泛齐”“醴齐”“盎齐”“缇齐”“沉齐”，越浑浊的酒越接近天道自然，更接近“神明”。这类酒就是后世酃酒、黄酒的源头。“三酒”则指三种过滤后较为清澈的酒，根据酿制时间的长短可分为“事酒”“昔酒”“清酒”，越清澈的酒等级越高、越贵重。五齐事神，三酒养人，即便为人而作的三酒，也不可“无事饮酒”。又比如若遇上乡饮酒礼、燕礼、飨礼等的宴饮，讲究一献、一酢、一酬，即主人要向客敬酒，客答谢主人的敬酒，主再次回敬宾客，循环往复最高可九献。乡饮酒礼、燕礼都包含旅酬，即按尊卑长幼的顺序依次酬饮，乡饮酒礼旅酬的目的是“养老尊贤”，燕礼则为了彰显君主礼贤下士，完成旅酬后可“无算爵”，随意饮酒不限量。射礼中的饮酒礼节则主要是射箭比赛前后的宴饮礼仪，大致与乡饮酒礼同。昏礼、冠礼中的酒则主要是以酒完礼，用酒行醺礼、合巹礼、拜舅姑之礼等。天子或诸侯还会亲自主持飨耆老孤子之礼，所养之老有三，国老、庶老、死政者之老，孤子者，死王事者之子。飨孤老之礼常在“仲春、季春、仲秋”举行，此礼是周代酒礼中罕见的“允许醉酒”的特例，“无酌数”“以醉为度”。

如果聚众饮酒时大家不守规矩怎么办呢？于是周代还设立了专门的酒官来管理，《周礼》称为“酒正”“酒人”“浆人”，其中“酒正”不仅掌管有关酒的政令，按法式授酒材，还具备“辨五齐之名”“辨三

酒之物”“辨四饮之物”的能力，“酒人”则负责具体酿造五齐三酒，“浆人”则负责酿造和提供水、浆、醴、凉、医、醕等“六饮”。这三种职位对应的职能有效地维持着酒礼秩序，再合以不同场景下酒礼，保证了“酒以成礼”的观念深植人心，大多数人的饮酒行为是克制守礼的，若疯狂饮酒作乐则会受到猛烈地道德抨击。

先秦的酒礼文化是极其克制的，这一点从《诗经》中也可得一窥。《诗经》中饮酒诗达50余篇，约占“诗三百”的六分之一，主要场景内容关乎“以酒殽神”

“以酒和乐君长”“以酒孝于亲”，皆落脚于以酒纳礼。相传为卫武公所作的《小雅·宾之初筵》，描绘了大射礼前后的宴饮，还直接讽刺了酒后失仪、失言、失德的种种醉态，强调饮酒应慎之、节之。可见反对滥饮而失德是时下酒文化的主线。

二、汉唐的解禁：诗酒与礼乐并存

汉承秦制，初期也继续施行禁酒政策，譬如汉文帝即位后颁布了《即位赦天下诏》，“朕初即位，其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酺五日”，汉末文颖注曰：“汉律，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今诏横赐得令会聚饮食五日也。”可见也是将饮酒的场景限定在特定的场合中，为的是防止聚众滋事甚至借故谋反，此外防止因酿酒而造成粮食浪费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汉文帝后元元年曾下诏，曰：“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汉书·文帝纪》）

汉武帝时期酒政发生重大转变，从“禁酒”转向“官营专卖”政策，“（天汉三年）初榷酒酤”（《汉书·武帝纪》），应劭注：“县官自酤榷卖酒，小民不复得酤也。”“榷酒酤”的政策要求民间不得私自酿酒卖酒，所有生产和销售均由官府管控。使酒类专卖与盐铁专卖一样，成为政府的重要的财政来源。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酒纳入国家专卖体系。

这一政策到昭帝时就废止了，施行税酒政策，“（昭帝始元六年）秋七月，罢榷酤官，令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汉书·昭帝纪》），令酒商自行酤酒缴税，每卖一升酒，须向官府纳税四文钱。

西汉末年王莽篡汉，又恢复了更为严格的专卖制度。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羲和鲁匡提出了由官酒坊作酒，利润的十分之七归官府的方案并得到允准，“请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为一均，率开一卢以卖，雠五十酿为准。一酿用粗米二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以其市月朔米曲三斛，并计其贾而参分之，以其一为酒一斛之平。计其利而什分之，以其七入官，其三及糟截灰炭给工器薪樵之费”。这

一方案并未实施很久便因民怨四起而作罢。有意思的是,这一方案细致规定了酿酒的酒米、酒曲的比例以及出酒率,严格控制成本预算,可以算得上最早的由官方出台的酒类生产管理条例。

东汉基本延续西汉的税酒政策,但也“因灾禁酒”,宋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卷十七就记录了三次因天灾行禁酒令的情况,和帝永元十六年,因兖、豫、徐、冀四州雨灾而禁酤酒,顺帝汉安二年,因凉州郡六地震故行禁酒令,桓帝永兴二年因旱蝗饥谨在郡国行禁酒令。这些临时的禁酒政策同时也反映出,酒在百姓生活中已经是“不可或缺”的,甚至于若按照民间日常用酒量,很可能大到威胁灾害时节的粮食安全,到了需要国家干预以“保口粮”的程度。

两汉时期民众对酒的观感较之先秦更显理性,并不一味排斥。西汉时期最能体现理性思考酒文化的便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以酒为题的赋作——邹阳《酒赋》。赋中“庶民以为欢,君子以为礼”,这句话实际上代表了酒文化史上一个非常微妙的转折点,首次表达了对酒的双重属性的认可,庶民可以用酒来欢庆,君子用酒来行礼。承认庶民饮酒的“欢庆”功能具有正当性是尤其重要的,这本身是对周礼“饮惟祀”观念的一次松绑,以开放性的视野和格局来享受酒文化,而不再把“欢”视为“礼”的对立面或堕落形态。

据统计,汉赋中涉及吟咏宴席饮酒的就多达20余篇,虽然骈赋之文对于贵族的酒席宴饮极尽夸张之能事部分要归咎于文体因素,但这种频繁以正面态度描绘酒宴的行为已说明,上下尚饮之风渐起,且此种趋势已不可逆转。

两汉时,对酒持逐渐开放的态度还体现酒的功能开始多元化。《黄帝内经·素问》第十四篇《汤液醪醴论》专门讨论了“醪醴”的制作与功效,《内经》十三方中,用酒治疗疾病的方子就有五个,如“左角发酒”“鸡矢醴”“马膏”“寒痹熨法”等方剂,都用到了酒。东汉末年张仲景将酒的应用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伤寒杂病论》中用到酒的方剂多达25个,用法多种多样,有“酒水同煎”“以酒送服”还有“酒浸制药”等,还将其功效归纳为温阳散寒、活血通经、通药性之凝滞、祛风补虚、健脾除湿、用药反佐等,为后世推广酒疗习俗提供了医学依据。庶民之欢与酒疗之效也将汉代的酒文化符号从周代单一的“礼器”,裂变为礼、乐、药三重身份并存的文化符号。

此后,历朝历代统治政权基于财政与民生,灾害来临时粮食短缺就禁酒,需要财政收入时就征税或专卖,酒也顺而成为了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

真正为酒文化赋予了新内涵的是魏晋文人。这一

时期政局动荡、世事无常,酒禁政策时有时无,民间群饮及酗酒之事屡禁不止,许多文人借酒避世,也让饮酒成为士大夫的风尚。譬如《世说新语·任诞》就记载,“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竹林七贤”皆尚清谈与饮酒,饮酒轶事阮籍尤多,据《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等篇目记载,阮籍靠连醉六十日来婉拒与晋文帝司马昭联姻一事,又以酣醉应对司马昭心腹钟会,让其无从下手,司马昭受“九锡”,公卿们要写劝进表,阮籍不愿写,亦终日沉醉拖延。“阮籍胸中垒块,故需酒浇之”,酒已成为他们麻痹自己、逃避现实的情感依托。

礼法中对饮酒一事立下不少规矩,然他们多以酒抗礼,阮咸与猪同饮,阮籍醉卧美妇之侧,母丧期间阮籍仍饮酒食肉。因为这一时期,礼法已然沦为篡位夺权者的“合法外衣”,名教的虚伪达到顶峰,司马昭曾指使成济当街刺杀皇帝曹髦,事后假意请罪,将弑君罪责全部归咎于成济,以“大逆不道”之名处死成济。弑君者摇身一变竟成了“维护礼法”的执法者。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公然宣称,自己“每常非汤武而薄周孔,在人间不止此事,会显世教所不容”,拒绝受礼法的制约,同时也暗含,自己对于依托儒家礼法的司马氏政权的鄙夷与不屑。这封绝交书最终激怒了司马昭,嵇康因“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被处死。

而刘伶的饮酒则更多以酒为“心之器”,他常裸饮于屋中,人责之则答:“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裋衣”,将酒视为摆脱形骸的束缚,通往“道”之法门。酣醉之时,“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泰山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酒德颂》),听不到雷霆之声、看不见泰山之形、感觉不到寒暑之侵,几近庄子“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坐忘”境界。七贤的饮酒行为多多少少推广了道家思想,提倡让人回到自然状态,卸下礼教面具,酒就是检验“本真”的良方。七贤之后,“能饮”便成为名士的标配,除了酒以载情,酒亦可载“道”,实现与道家思想的深度捆绑。有意思的是,魏晋以前道教仪式并无酒供,魏晋南北朝以后,酒就正式成为道教宫观和斋醮中的供品了。

唐代的酒文化空前繁荣,主要原因在于,唐初的统治者对酒采取了极其宽容的态度。唐承继了隋代的酒盐免税政策,还明确下令“天下置肆以酤者,斗钱百五十,免其徭役”,鼓励民间酿酒、开坊卖酒,官府只收一点税,连徭役都免了。汉以前,汉律规定:

“三人以上,无故群饮,罚金四两”,唐代却频繁赐

酺，解除民间“禁群饮”的禁令，允许官民大规模聚饮欢庆，据《册府元龟·庆赐》记载，仅贞观年间太宗就赐酺四次，其中一次是为了庆贺丰年，一次则因贞石表瑞而大赦天下，全国臣民赐酺三日。此后安史之乱前，以武则天当政时赐酺次数最多，赐大酺二十次，集中于其称帝前后，时长多达七天甚至长达九天，“永昌元年春正月，神皇亲享明堂，大赦天下，改元，大酺七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九月九日壬午，革唐命，改国号为周。改元为天授，大赦天下，赐酺七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秋九月，亲祀南郊，加尊号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大赦天下，改元为天册万岁，……大酺九日”（《旧唐书·则天皇后纪》）。唐代的频繁“赐酺”，标志着统治者对酒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从秦汉的“禁群饮”，到唐代的“赐天下大酺”，“酒”不再是需要严防死守的乱源，而成为可以施予百姓的恩典。这种转变的背后，是经济实力的增强、社会秩序井然的自信，更是统治智慧的升级——与其让百姓在禁忌中偷喝，不如让百姓在皇恩中畅饮。当“庶民以为欢”获得官方背书，酒文化“从礼到情”的转向也就完成了最关键的一步：“情”不再是需要压制的欲望，而是可以合法释放的恩泽。

正是因为自上而下宽松的酒政环境，催生了最兴盛的盛唐诗酒文化。从李白的“会须一饮三百杯”到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杜甫大赞“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诗与酒的关系密不可分。据郭沫若统计，李白现存的诗和文一千五十首，说到饮酒上来的有一百七十首，杜甫现存的诗和文一千四百多首，说到饮酒上来的共有三百首^[2]。正如丁启阵在《中国诗酒关系略论》一文中所说，“到了唐代，诗酒的关系才被发展到了极至。……唐代的酒诗，真正达到了丰富而深刻。说它丰富，豪放的，低徊的，忧伤的，欢快的，揭露丑恶的，再现美好的，应有尽有；说它深刻，无论是社会现象，还是人生感受，唐代诗人都凭着他们超卓的禀赋和惊人的胆识，辅以酒神的激情，作了近乎完美的再现或表现。唐代固然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大时代，但是唐代诗人的才情之所以能够得到那样淋漓尽致的发挥，跟酒的作用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酒（当然也因为当时政治上的许可这个大前提）的作用，艺术家们可以把贵贱礼数置之度外，在一定的时间里让自己的心灵进入自由境界，这是符合艺术创造规律的。”^[3]

庄子在《达生》篇中说，“夫醉者之坠车，虽疾不死。骨节与人同而伤害与人异，其神全也”，醉酒者能坠车而不死，主要在于“醉者神全”。“醉者神全”是中国文化第一次正面承认醉与酒的价值，也是

第一次深入挖掘酒与神志的关系。这与从西周时期便开始的对“醉”的畏惧害怕是截然不同的。正是因为对酒醉之事警惕非常，因此不停以礼节制，上规矩上枷锁。但真正让酒的形象摆脱负面色彩还是唐以后，酒不再是躲避乱世的麻醉剂，也不仅是祭典或欢庆场景中的需要警惕的配角，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神志对“超我”的控制力，让克制的人回归本我，让“本我”的创造力得以释放，成为文学创作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完成了物质的酒到精神符号的转变。

三、宋元的“变革”：飞入寻常百姓家

宋元时期是中国酒文化史上最具革命性的阶段。如果说汉代以前是“酒以成礼”，魏晋至隋唐是“酒以寄情”，那么宋元则完成了两次根本性的转向：一是饮酒主体的转向，从文人雅士走向市民大众，饮酒一事真正融入寻常百姓家；二是酒体本身的转向，从低度发酵酒走向高度蒸馏酒。这两次转向，彻底重塑了中国酒文化的面貌。

宋代市民阶层的形成与勾栏瓦舍的兴盛为酒文化的世俗化提供了天然的生发土壤。公元1019年（北宋天禧三年），北宋正式在洛阳试行新的户籍制度，即将城市与乡村户口分别列籍定等，户籍分为“坊郭户”与“乡村户”，市民阶层在法律上获得了独立身份。谢桃坊认为，“市民阶层的基本组成部分……是代表新的商品生产关系与交换关系的手工业者、商人和工匠。……手工业者、商贩、租赁主、工匠、苦力、自由职业者、贫民等构成坊郭户中的大多数，他们组成了一个庞杂的市民阶层。市民阶层在城市经济活动与社会生活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处于城市劳动的中心地位，成为城市文化的创造者”^[4]。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瓦舍勾栏这一融赏、饮、赌、嫖、玩等感官享乐于一体的大众化文娱活动中心，宋元时期酒楼林立，据宋末元初周密《武林旧事》和南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等书记载，临安的酒店数量非常庞大，不仅有官方酒库设立的酒楼，又称“正店”，还有第二等的零售批发酒店“脚店”，又称“分茶酒店”，第三等则为“拍户酒店”，属于零卖散酒的酒家，“兼卖诸般下酒，食次随意索唤”。第四等的没有固定的买酒场所，只是小贩沿街叫卖。这第三等的酒家各因其特色不同，又有茶饭店、宅子酒店、花园酒店、直卖店、散酒店、碗头店、庵酒店、罗酒店之分。这一类酒店不仅是说书艺人的关键舞台，也是话本中的主要叙事背景，甚至还是一些悲欢离合的传奇故事的发生地。譬如南宋建炎元年朱敦儒就在吴越的一家酒楼偶然认出，酒楼的小唱艺人竟是与徽宗皇帝有过风流韵事的民间歌妓李师师。堪称全民性的市井化的文娱体系脱离了皇

权、士族的专属文化圈层，催生了小唱、杂剧、说书等世俗类艺术文化形式，极大程度弱化了严苛的尊卑礼制和等级规矩，人人以酒为媒、以乐相交。酒楼等场所成为不设身份门槛、没有严格阶层限制的独立空间，贵族官员、文人墨客、市井百姓、行商坐贾皆可同场落座。

内藤湖南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中是这样描绘宋代的人民的，“（宋代）人民的地位亦有显著变化。中国本来……不承认人民的权力。但近世人民的地位和财产私有，与贵族政治时代大异其趣。贵族时代（唐宋以前），人民在整体贵族眼中视若奴隶。隋唐时开始，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由国家直辖。……到了宋代，经过王安石的新法，人民拥有土地所有权的意义更加确实。……政府承认人民有处置土地收获的自由。……君主和人民直接相对，亦是进入近世政治以后的事情”^[5]。中古贵族文化在酒杯中逐渐走向衰落，近世市民地位的崛起加速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文化的交融与思想的解放。

在这一时期鼎盛的市民文化中“酒”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以酒为物质依托，催生了催生了一个庞大而精细的职业体系，从官府到民间，从宫廷到市井，围绕酒的生产、销售、管理和服，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条，官府甚至还为从业者设立了“糟户”（造酒）和“酒户”（卖酒）这样的专门户籍。以酒文化为依托，承托了宋元时期 79% 的话本的情节，情节，《全宋词》中涉酒词超 4000 首，苏轼《水调歌头》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传唱至今，当时以记载都市生活为主的笔记，如《武林旧事》，80% 以上的篇幅都涉及酒文化。但也正因为勾栏瓦舍这一集声色享娱为一体的复合空间在宋代酒文化转型过程中充当了物质载体的角色，饮酒，逐渐从“助诗兴”“浇块垒”沦为纯粹的世俗消遣。

酒令的演变是最直观的晴雨表。唐代酒令以雅令为核心——飞花令、四书令，比拼的是学识才思，是文人身份的自我确认。到了宋元，随着市井文化兴起，“六六六”“五魁首”等俗语化酒令大行其道。尽管保留了民俗的活力，但文化内涵“有所减弱”。

宋人所喝之酒其实仍旧是低度发酵米酒，最高度数不超过 20 度，接近于现代的黄酒。这意味着，宋人虽然喝得更狂放肆意，但实质仍与唐人无异。真正让“酒”的功能发生根本转变的是元代。

元代酒文化最大的变局，来自技术蒸馏法的发明。明代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留下经典记载：“烧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用浓酒和糟，蒸令汽上，用器承取滴露。”这一技术让元代成为中国高度蒸馏酒（白酒）的开端。蒸馏技术带来了根本性变化，酒

体从“甘醇”变为“辛辣”。蒸馏后的白酒度数可达 50 度以上，入口如刀，感官冲击强烈。李时珍评价元以后的“烧酒”（即蒸馏高度酒）是这么说的，“烧酒，纯阳毒物也……过饮不节，杀人顷刻”。这也让元以后文人创作与酒的关系明显疏离，酒不再是激发创作的灵感源泉，成了逃避现实的精神麻醉剂。“元人，尤其是元末人，对世事无常和生命短暂普遍有比较深刻的感受，这是动乱时代的特殊赐与。敏感的文人特别意识到生命的脆弱和短暂。……他们常有未来难以预料、自己命运无法把握的感觉。……怀着这种对生命、对未来的恐惧而互相倡引及时行乐的。酣饮沉醉，不仅可以乐而忘忧，而且可以借酒发泄心中的郁结，使情绪得以排遣”^[6]，因而文人们的聚会通常都是宣泄感情、表现自我的渠道，么书仪评道，“在有关（元代）玉山草堂的记载中，我们看到的几乎都是尽情尽性的狂饮沉醉的情绪，难以寻到在动乱年代表现文人传统责任感的文字”^[7]。

四、明清的酒文化：雅俗分野

宋代的世俗酒文化在明代得到了传承与发展，酒令文化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甚至还出现了总结推广的书籍，如《安雅堂酒令》《觴政》《醉乡律令》《文字饮》《嘉宾心令》《狂夫酒语》和《酒家佣》等。袁宏道在《觴政》中就详细介绍了行酒、劝酒、斗酒、祭酒茶、罚酒和酒席上所具备的各种助兴器物等具体的内容。这些书籍的出现和流传，无疑对明代的饮酒风尚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有意思的是，即便是酒令也有雅俗之分。据说《安雅堂酒令》这套酒令以历代才子、名妓、美女、历史人物以及与饮酒、金钱有关的人事典故为题材，若要掌握这类游戏，必须相当熟悉文人笔下的典故。所以“酒令”在这一时期形成为一种泾渭分明却能雅俗共赏的格局：文人雅士在宴会上仍以诗词经史为令，比拼学识才思，而民间酒肆则以划拳、掷骰等助兴。

清代酒文化最重大的格局变化，是酒品内部格局的变迁。明清两代直至清中叶，黄酒始终是中国酒的主流，文人雅士偏好，而烧酒则是下层人民的主要消遣饮品。不过，这一时期，黄酒内部也存在“南酒”与“北酒”的对峙的情况，北酒以京、冀、鲁、豫为代表，工艺尊尚古法，其中沧酒、易酒、潞酒皆属上品，南派则以绍兴为代表。然而，北派黄酒在清代中期后逐渐衰落，南派绍兴黄酒开始崛起，且南酒因工艺统一、能远途运输不惧寒暑、品质稳定等优势，逐步推广开来，迅速占领市场，并成为贵重礼物。这一时期，蒸馏白酒“烧酒”完全不能与之匹敌，清代张应昌在《清诗铎》中是这么评价的，“黄酒价贵买论

升，白酒价贱买论斗”。白酒饮用成本低，主要在下层百姓间流行，清袁枚在《随园食单》中是这么说的，“既吃烧酒，以狠为佳”，可见白酒以烈性越强越受欢迎，这种程度的酒入口通常辛辣，只需饮用一点便易醉人，适宜在短时间内饮用寻求刺激。黄酒在这一时期被视作酒中贵族，便是由于黄酒度数低，却价格高，且大量饮用不易醉，因此总得算来饮酒成本酒很高。

六、近现代的转折：白酒的逆袭

近现代以来白酒从原本的“烧刀子”一跃而成为“国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白酒地位的真正转折，始于抗日战争。1937年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大批企业、事业单位、大学随之西迁，大量人口涌入四川、重庆地区。原有的优质黄酒产区（如江浙）落入敌占区，无法继续为国统区供酒，对四川本地白酒的需求量激增。四川白酒产量从1936年的1亿斤增至1938年的1.5亿斤，白酒开始进入国宴。

更关键的是，战争时期，酒精含量更高的白酒除了可供饮用外，还可以外用擦拭伤口，止痛消炎，因此战时的粮食若是可以酿酒，则多酿为多功能的白酒，而非饮用成本更高的黄酒。且据党内资料记载，红军长征途经茅台镇时，当地群众捧出茅台酒欢迎红军。战士们用它擦脚和伤口，止痛消炎，解决了缺医少药的困难。建国后，为了发扬白酒文化，在周总理的亲自推动下，1952至1989年举办了五届中国名酒评选，贵州茅台、山西汾酒、泸州老窖连续霸榜多年，深切影响了今天中国酒文化的发展格局。

总结

从中国酒文化历史演变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低度黄酒其实才一直是中国的主流酒，黄酒式微也就是近百年的事情，中国人从谈酒色变到无酒不欢、纵饮无度，再到如今一部分人无酒不欢，一部分人谈酒色变，似乎依旧在循环中打转。酒文化演变的深层原因在于社会结构、思想文化、技术进步及政治经济的持续演进：从先秦的“敬而远之”到魏晋的“爱而近

之”，是礼教束缚松动、个体意识觉醒的结果；从唐宋的“亲而用之”到宋元的“俗而广之”，是市民社会崛起、文化下移的体现；从明清的“分而视之”到当代的“纵而滥之”，是阶层分化与消费主义盛行的产物。

酒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文化符号之一，其意义的演变，核心是从“神”到“人”的变迁。酒从沟通神人的媒介，变为个体情感的寄托，再变为大众消费的商品，最终变为近代多功能的且受文化资本加持的道具：它既能成礼，也能乱性；既能寄情，也能麻醉；既能助兴，也能伤人。近来全社会因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以及交通安全、酒桌文化等问题对主流高度白酒的排斥与反思，政策上对酒不断收紧，也是避免重复“纵而滥之”的老路。饮酒从来不是为了“悦人”，而是为了“悦己”，明白了这一点，才算真正理解中国酒文化乃至中国文化的核心。酒剧变为伤人的符号，也不过就是高度酒出现之后的事，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高度酒一直就并非最符合中国人生活习惯的饮品。今天人们对酒的态度复杂且充满疑惑，本质只是回归到对这一“非自然选择”的直觉反应。若欲重构健康的酒文化，或当从先秦之“节”、魏晋之“真”、唐宋之“雅”中汲取智慧。

参考文献

- [1] 林明，《诗经字疏》，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版：295页。
- [2] 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426页。
- [3] 丁启阵，《中国诗酒关系略论——附论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融合》，《中国典籍与文化》2001年第02期。
- [4] 谢桃坊，《中国市民文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13页。
- [5] 刘俊文主编，黄约瑟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一卷《通论》，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5页。
- [6] 幺书仪，《元代文人心态》，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版：243页
- [7] 上同，244页。

立德树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实践研究

荣晓雯

(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 康复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33)

摘要：立德树人是高校教育的根本任务，“五育并举”是推进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路径。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服务的一线力量，在落实“五育并举”育人要求中具有独特优势。文章立足立德树人与“五育并举”的内在关联，结合高校辅导员的岗位职责，对其开展“五育并举”育人的职责基础、主要内容、现实问题及推进路径进行了分析。研究认为，高校辅导员在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实践参与空间，但在实际工作中仍存在育人理念把握不够深入、五育内容统筹不够均衡、工作方式较为单一、协同育人机制不够顺畅等问题。基于此，应进一步坚持立德树人主线，围绕学生发展需求优化育人内容，改进工作方法，丰富育人载体，完善协同机制，不断提升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的针对性与实效性。

关键词：立德树人；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实践；协同育人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68

A Practical Study on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by College Counselo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Character Building

Rong Xiaowen

Rehabilitation College, Yunnan Medical and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Kunming, Yunnan 650033, China

Abstract: Moral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th to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As the frontline for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and daily management services for college students, college counselors have unique advantages in implement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intrinsic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 education and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and combined with the job responsibilities of college counselors, analyzes the foundation, main content, practical problems, and promotion path of their work in carrying out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The study argues that college counselors play a crucial role in moral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While there is ample room for practical participation in areas such as moral education and labor education, problems still exist in actual practice, including an insufficient grasp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ies, an unbalanced integration of the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esthetic, and labor education), a relatively singular working method, and an inefficient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Therefore, we should further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haracter, optimize educational content around students' developmental needs, improve working methods, enrich educational carriers, and perfect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o continuously enhance the pertine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university counselors'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approach.

作者简介：荣晓雯(1995年1月)，女，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学生管理

Keywords: Moral education; university counselors; five aspects of education; educational practic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1 引言

立德树人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也是高校一切育人实践展开的价值原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必须着眼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实际上对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即不能将育人理解为知识传授、事务管理或阶段性教育活动的简单叠加，而应在价值塑造、能力培养与人格养成的统一中推进学生全面发展^[1]。与此相应，“五育并举”并非对德智体美劳五个方面的机械并列，而是对高校育人理念、育人内容与评价方式的系统校正，要求教育实践突破单一知识本位和结果导向，在德育铸魂、智育启思、体育强身、美育润心、劳育砺行的协同中重塑人才培养体系^[2]。在这一过程中，高校辅导员作为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是学生日常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工作的组织者、实施者与指导者，其工作天然处于高校育人体系的一线位置，既直接面向学生思想动态、成长需求与行为养成，也贯通班级建设、学风建设、心理疏导、就业指导和实践教育等多个环节^[3]。由此来看，辅导员参与“五育并举”并不是在既有职责之外附加新的工作任务，而是在立德树人根本要求不断深化的背景下，对其育人职责边界、工作内容和实践方式的进一步拓展。尤其是在学生成长需求日益多元、网络空间深度嵌入校园生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更加注重协同联动与整体实效的现实条件下，辅导员如何把“五育”要求有机融入日常教育管理服务之中，已经成为高校落实立德树人任务不可回避的实践课题。现有研究对辅导员思想政治教育、心理育人、资助育人等专题已有较多讨论，但从立德树人与“五育并举”相贯通的视角，对辅导员育人实践进行整体考察的研究仍有进一步展开的空间。因此，围绕高校辅导员参与“五育并举”的实践逻辑、现实问题及推进思路展开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辅导员育人功能的理解，也对完善高校育人体系、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具有现实意义。

2 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的定位依据

2.1 立德树人与“五育并举”的内在关联

立德树人是高校人才培养的根本旨归，回答的是“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教育根本问题；“五育并举”则是在这一根本旨归之下，对育人内容、育人方式和育人体系作出的具体展开。换言之，立德树人强调的是价值统领和目标指向，“五育并举”强调的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结构安排和实践载体，二者并非并列关系，而是目标与路径、统领与落实的关系。从高校教育实践看，若仅停留于德育层面的原则倡导，而忽视智育、体育、美育、劳育在学生成长中的协同作用，立德树人的要求便难以真正落细落实；反之，若将“五育”简单理解为若干教育板块的拼接，又容易造成育人目标分散、教育过程割裂的问题。因此，只有将立德树人的根本要求贯穿于“五育并举”的整体设计之中，推动德智体美劳由分散实施走向协同贯通，才能真正形成面向学生全面发展的育人格局^[4]。从这个意义上说，“五育并举”不是对立德树人的替代性表达，而是其在新时代高校育人体系中的具体化、系统化和实践化呈现。

2.2 高校辅导员的育人职责及其实践基础

在高校育人体系中，辅导员并不是单一教育环节的执行者，而是连接思想政治教育、学生日常管理和成长发展服务的重要枢纽。与专业课教师相比，辅导员工作的突出特点在于更加贴近学生的现实生活与成长过程，其职责既体现为价值引导，也体现为行为规范、发展支持和资源协调。这种岗位属性决定了辅导员天然具有参与“五育并举”的实践基础，在德育层面，辅导员承担理想信念教育、日常思想教育和班级建设任务；在智育层面，辅导员通过学风建设、学业帮扶和生涯指导参与学生发展；在体育、美育、劳育层面，其又通过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志愿服务、劳动教育组织等方式，推动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实现多维成长。现有研究也表明，辅导员作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骨干力量，不仅是协同育人的关键节点，也是整合校内外教育资源、推动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落地的重要力量^[5]。因此，将辅导员置于“五育并举”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考察，并不是对其职能的外部附加，而是对其既有育人职责的进一步深化和拓展。

3 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的主要内容

3.1 德育：强化思想引领

德育是高校辅导员开展学生工作的核心内容，也是贯穿教育管理服务全过程的重要主线。新生入学教育、主题班会、党团建设、奖助评定、违纪处理、宿舍关系协调以及网络舆情引导等工作，虽然表现形态各异，但均包含价值引导和规范养成的育人意涵。辅导员德育工作的重点，在于将价值要求嵌入学生日常生活情境之中，通过具体事务的组织与处理，引导学生形成对公平、责任、规则与边界的基本认知。学生道德观念的生成，往往并非源于抽象概念的接受，而是在具体事件的经历、判断和反思中逐步完成。辅导员与学生保持较为稳定的日常联系，能够较为及时地把握学生思想变化与班级运行状况，因此更适合将思想引领落实到日常教育之中。由此展开的德育实践，不局限于一般性的说理教育，而是体现为对学生价值确认、行为规范和精神成长的持续塑造。

3.2 智育：服务学业发展

辅导员参与智育，主要体现在对学生学习过程和成长发展的支持与引导之中。大学生学业问题通常并不单纯表现为学习能力不足，而更多与学习目标、时间管理、专业认知、心理状态及发展规划相互交织。辅导员身处学生工作一线，能够较早发现旷课增多、成绩波动、作息失衡、沉迷网络等现象，也更容易将这些问题放回学生成长背景之中加以理解。实践中，辅导员既承担学风建设和学业帮扶的常规任务，也需要根据不同年级学生的发展特点实施分层指导。低年级学生更需要完成学习方式转换、专业认知建构和基本学习习惯养成，高年级学生则更需要要在考研、就业、竞赛、实习等事项中获得发展支持。同时，辅导员还承担着联结学生、任课教师、导师与家长的沟通功能，有助于将分散的教育资源整合到学生发展过程中。辅导员在智育中的作用，并不在于替代专业教学，而在于促进学生将知识学习转化为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和现实能力。

3.3 体育：促进身心健康

在“五育并举”视野下，体育不仅关系到体质提升，也涉及生活方式、心理调适和行为习惯的形成。当前部分大学生长期存在久坐、熬夜、运动不足等问题，学业压力、情绪波动与生活失序之间往往相互影响。辅导员虽不直接承担体育教学任务，但在宿舍走访、请销假管理、谈心谈

话和班级活动组织中，更容易观察到学生在作息、情绪和交往方面的异常变化，从而较早识别潜在问题。辅导员推进体育育人，主要通过班级体育活动、健康教育、宿舍文明建设、心理关怀及同学互助等路径，引导学生形成规律作息、主动锻炼和理性疏压的生活习惯。对部分处于心理波动期的学生而言，适度运动、稳定作息和正常交往本身就是恢复身心状态的重要条件。因而，辅导员参与体育育人的价值，更多体现为将健康理念转化为学生可持续践行的日常方式，使身体发展与心理成长在教育过程中实现有机统一^[6]。

3.4 美育：涵养审美素养

美育在辅导员工作中并不总是以显性方式呈现，却深刻影响学生的精神气质、审美判断与表达方式。对于大学生而言，审美素养不仅关乎艺术感受能力，也关系到其对校园文化、集体生活和社会价值的理解。辅导员参与美育，通常不是通过专门课程展开，而是依托校园文化和班级生活组织，在阅读分享、主题团日、红色观影、宿舍文化评比、毕业仪式及社团活动指导等具体场景中营造具有感染力的教育环境。美育工作的关键，不在于活动数量的多少，而在于能否通过有品质的文化供给和有温度的集体氛围，引导学生形成较为健康的审美趣味和表达取向。面对网络环境下碎片化、娱乐化内容对大学生审美判断的持续影响，辅导员将美育融入日常教育，实际上也是对学生文化认同、情感体验与人格涵养的积极塑造。由此，美育不再只是校园文化活动的附属内容，而成为辅导员育人工作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维度。

3.5 劳育：培育责任意识

劳育的价值，体现在通过真实劳动和实践参与促进学生形成正确劳动观念、责任意识和合作精神。高校劳动教育资源并不匮乏，宿舍值日、校园服务、勤工助学、志愿活动、社会实践和实习见习等，都可以成为劳育的重要场域。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活动能否被有效转化为育人过程。辅导员参与劳育的意义，正在于将劳动实践与价值引导结合起来，使学生在具体参与中理解劳动的意义，认识个人、集体与社会之间的责任关系。实践中，辅导员不仅承担活动组织职能，还应重视劳动前的教育动员、劳动中的过程观察以及劳动后的总结反思，使学生从“完成任务”走向“获得体验”，再进一步转向“形成认知”。对于部

分长期缺乏公共意识和实践意识的学生而言,持续的劳动参与往往是其责任感、合作意识和耐挫品质形成的重要契机。由此看来,劳育进入辅导员工作,不能停留于简单的组织安排,而应着眼于学生劳动观念、实践态度与责任意识的长期培育^[7]。

4 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的现实问题

4.1 育人理念把握不够深入

从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的实际运行情况看,辅导员对于“五育并举”的认知总体上已形成基本共识,但这种共识在不少情况下仍停留于原则层面,尚未充分转化为统摄学生工作的整体观念^[8]。在具体实践中,辅导员往往仍沿袭以思想教育、日常管理、事务处置和风险防控为主的工作思路,对德智体美劳之间的内在关联缺乏系统把握。受此影响,德育容易被窄化为纪律教育和政治教育,智育往往被等同于学风建设和成绩管理,而体育、美育、劳育则更多被置于辅助性位置,未能真正进入辅导员育人工作的核心结构。理念把握上的局限进一步影响了工作设计。一些工作安排仍然停留在活动叠加层面,将主题班会、志愿服务、文体比赛等视为“五育并举”的主要呈现形式,却较少从学生成长规律出发统筹教育内容和实施节奏。另有部分辅导员虽已意识到拓展育人内容的重要性,但在实际推进中仍更重视“完成了什么”,对教育活动如何影响学生价值形成、能力发展与行为养成缺乏持续追问。因此,当前较为突出的现实问题,不在于辅导员对“五育并举”缺乏认同,而在于这一理念尚未充分转化为观察学生、分析问题和组织工作的基本方法。

4.2 五育内容统筹不够均衡

“五育并举”强调的是育人内容的整体推进,但在辅导员日常工作中,各育的落实程度仍存在明显差异。德育和智育因与思想政治教育、学风建设、学业预警、就业升学等工作联系紧密,通常更容易进入学生工作的常规体系,也更容易形成相对稳定的抓手。相比之下,体育、美育、劳育虽然在制度文本和工作方案中均有所体现,但进入辅导员工作实践后,往往呈现出较强的阶段性、活动性和任务性特征,缺乏持续性设计。体育工作在不少情况下仍主要依附于运动竞赛、日常打卡和集体活动,美育多寄寓于校园文化活动和节庆组织,劳育则常被简化为志愿服务、卫生

劳动等事务性安排^[9]。这些工作并非缺乏意义,问题在于不同内容之间缺少有机衔接,与学生年级差异、专业特点和发展需求的结合也不够紧密,因而难以构成连续性的育人过程。尤其在任务繁杂、节奏紧张的现实条件下,辅导员更倾向于优先处理制度要求明确、考核指向清晰的工作事项,由此导致“五育并举”在实践层面呈现出德育和智育相对突出、体育美育劳育相对薄弱的失衡状态。这种结构性偏差削弱了“五育并举”应有的整体性,也影响了辅导员育人工作的层次展开。

4.3 工作方式较为单一

从实施方式看,当前高校辅导员推进“五育并举”育人,仍较多依赖班会、讲座、集中宣讲、线上打卡和主题活动等传统组织手段。这类方式便于统一部署,也较容易形成显性的工作成果,但在回应学生差异化需求方面存在明显局限。面对学业困难、情绪波动、人际退缩、参与意愿不足等具有较强个体差异的问题,单次集中教育往往难以形成持续影响。例如,学业支持并不能仅依靠一次学风动员完成,心理压力的缓解也难以通过单场讲座实现,美育和劳育更不可能依赖若干活动安排便自然达成教育目标。辅导员工作的独特价值,本在于贴近学生日常生活,能够进入宿舍、班级和小群体之中,以较长时间跨度开展观察、引导与跟进。但在现实工作中,大量事务性任务挤压了这一部分空间,使得不少育人工作仍停留在集中部署和统一推进层面,缺乏面向具体问题的过程性介入。目前,辅导员育人实践中仍不同程度存在方式单一、识别不细、干预不深等问题。这说明,当前工作方法尚未完全适应大学生成长状态的分化趋势,也未能充分体现“五育并举”所要求的精细化育人取向。

4.4 协同育人机制不够顺畅

“五育并举”本质上是一项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系统性育人工程,仅凭辅导员单线推进,难以形成稳定而深入的教育效果。从现实运行情况看,协同育人在原则层面已成为高校育人工作的普遍共识,但真正落实到制度安排、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层面的机制建设仍显不足。辅导员、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心理教师、体育教师以及团学组织虽然都承担一定育人职责,但各主体所掌握的信息类型、关注重点和工作节奏并不一致。学生在课堂中的学习状态、在宿舍中的生活表现、在活动中的参与情况,往往分散在不同岗位和部

门之中,缺少有效汇聚,由此导致一些问题只能被局部识别,而难以形成整体判断^[10]。与此同时,部分高校对辅导员工作的评价仍偏重事务完成和风险控制,对协同育人的投入程度、资源整合能力和实施成效缺乏更具针对性的考核办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师之间的协同动力。在这样的条件下,辅导员推进“五育并举”时容易陷入“单兵作战”的状态,既承担较多协调责任,又缺乏足够的平台支持和制度保障,进而影响育人工作的连续性、系统性和整体效果。

5 高校辅导员“五育并举”育人的推进路径

5.1 坚持立德树人主线,统筹五育实施

高校辅导员推进“五育并举”育人,首要任务在于明确工作主线,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统摄日常教育管理服务的整体思路。学生工作涉及班级建设、谈心谈话、心理关怀、学风建设、就业指导 and 活动组织等多个方面,若缺少立德树人的价值统领,相关工作便容易停留于事务化推进,难以形成清晰的育人导向。立德树人之于辅导员工作的意义,正在于为分散的工作事项提供共同的价值指向,使学生工作由事务完成转向成长促进,由阶段性应对转向全过程育人。基于这一要求,辅导员在组织具体工作时,应避免将德智体美劳割裂理解,也不宜将“五育并举”简单处理为若干活动的机械叠加。较为可行的路径,是依据学生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特点统筹安排育人内容。新生阶段应更加重视理想信念教育、学业适应与行为规范养成,中间年级可侧重学风建设、心理调适与审美涵育,毕业年级则应将就业指导、责任意识与社会参与有机结合。如此,德智体美劳才能在学生成长过程中形成有层次、有重点的连续展开。教育行政部门多次强调,应将立德树人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推动德智体美劳全面融通^[11]。这一要求落实到辅导员工作层面,实质上就是增强整体设计意识,提升育人工作的系统性与贯通性。

5.2 围绕学生发展需求,优化育人内容

“五育并举”能否落到实处,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育人内容能否回应学生真实的发展需求。辅导员所面对的并不是抽象的教育对象,而是处于不同年级、专业背景和成长情境中的具体学生,其在学业、心理、交往和发展规划等方面的需求具有明显差异。若育人内容长期停留于统一部署

和常规安排,往往只能覆盖一般性要求,难以深入学生实际处境。基于此,优化育人内容的关键,在于将共性教育与分类指导结合起来,在保持基本育人方向稳定的同时,增强内容供给的针对性和适配性。班级层面,应持续推进价值引导、学风建设和集体教育,夯实学生共同发展的基础;个体层面,则需通过谈心谈话、学业帮扶、心理支持和生涯辅导等方式,将学生面临的具体问题纳入育人过程。有关精准育人的研究指出,学生工作的有效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育内容与学生成长规律及现实需求之间的契合程度。因此,辅导员应在长期观察和动态把握中不断调整工作重心。对低年级学生而言,适应教育、规则意识和专业认知更为关键;对高年级学生而言,升学、就业与自我定位则更具现实意义。只有当育人内容真正贴近学生成长中的突出问题,“五育并举”才可能由一般性的教育倡导转化为具有实际影响的育人实践。

5.3 改进工作方法,丰富育人载体

辅导员育人工作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工作内容本身,也与实施方式密切相关。当前学生工作的组织形式仍较多依赖班会、讲座、集中宣讲、线上通知和打卡管理等传统手段,此类方式便于统一部署和结果呈现,但在回应学生差异化需求和促进深层次内化方面存在一定局限。随着大学生信息获取方式、交往习惯和参与节奏的持续变化,辅导员若长期沿用单一的组织模式,育人工作的吸引力和渗透力必然受到影响。因而,改进工作方法应成为推进“五育并举”的重要着力点。这里所强调的方法改进,并非单纯追求形式更新,而是要使教育活动更贴近学生的生活世界和成长情境。德育可结合宿舍管理、班级治理和网络行为引导予以推进,智育可依托学业预警、同学互助和生涯辅导予以深化,体育、美育、劳育则应由单次活动导向逐步转向项目化、持续性设计。同时,数字平台也可作为辅导员把握学生状态、优化教育供给的重要支撑。有关“精准思政”的研究表明,数据画像、动态监测和行为分析并非取代面对面教育,而是有助于提升问题识别的及时性与教育介入的针对性^[12]。在此基础上,工作坊、小组活动、主题实践和网络互动等多样化载体,能够为“五育并举”提供更具参与感和持续性的实施空间。

5.4 完善协同机制,凝聚育人合力

“五育并举”是一项具有系统性的育人工程,其有效推进离不开多主体协同参与。辅导员虽然在学生日常教育管理服务中处于关键位置,但课程教学、专业训练、心理辅导、体育锻炼、审美教育和劳动实践等育人资源并不完全掌握在辅导员手中。若缺乏有效协同,辅导员即便具备较强的推进意愿,也容易受限于岗位边界,难以形成整体性育人成效。现实中,任课教师更多关注课堂表现和学习基础,辅导员主要把握学生日常状态,心理教师侧重情绪问题和风险识别,团学部门则掌握活动参与和组织运行情况。由于不同主体所掌握的信息类型和工作重点并不一致,学生不同场域中的表现往往处于分散状态,若缺少稳定的信息汇聚与责任衔接机制,相关问题容易被局部识别,难以形成整体判断。由此可见,协同机制建设的重点,不在于简单增加会议频次,而在于建立常态化的信息沟通、资源整合和责任分工机制。对于重点学生,应明确发现、跟进和支持的基本流程;对于日常育人工作,也应推动思政课教师、专业教师、心理教师与辅导员之间形成相对稳定的合作关系。相关研究指出,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之间具有明显的互补性,前者侧重日常教育,后者注重理论引导,二者协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弥合高校育人过程中的分段运行问题^[13]。因此,完善协同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将分散于不同岗位和部门的育人资源纳入统一过程之中,进而提升高校“五育并举”育人的整体效能。

5 结语

立德树人是高校育人工作的根本要求,“五育并举”则为这一要求的落实提供了更为完整的实践框架。辅导员处在学生工作一线,既贴近学生日常生活,也连接学校育人体系中的多个环节,在推进“五育并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现实作用。本文从立德树人与“五育并举”的内在关联出发,对高校辅导员开展“五育并举”育人的职责基础、主要内容、现实问题及推进路径进行了梳理。总体来看,当前辅导员在推进“五育并举”过程中已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但仍存在理念理解不够深入、内容统筹不够均衡、方法较为单一、协同机制不够顺畅等问题。要提升育人实效,还需要在立德树人主线下进一步整合育人内容、改进工作方法、完善协同机制,把德智体美劳贯通到学生成长的具体过程之中。对辅导员而言,“五育

并举”不是对既有工作的简单加码,而是对育人职责的进一步深化。只有把日常教育管理服务放到学生全面发展的视野中来理解和推进,辅导员工作才能更好体现育人价值,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才能在具体实践中得到更扎实的落实。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J]. 求是, 2024(17).
 - [2]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20-10-13.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令第43号. 普通高等学校辅导员队伍建设规定[Z/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 2017-09-29.
 - [4] 顾玲玲. “五育并举”融合育人背景下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问题与应对[J].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23(03): 77-80.
 - [5] 杨巍. 高校辅导员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机制构建[J]. 高校辅导员, 2019, (02): 64-67.
- ### 参考文献
- [6] 丁闽江. 辅导员在心理育人中的角色定位及工作方略——基于406封大学生求助信的思考[J]. 高校辅导员, 2020, (02): 73-76.
 - [7] 潘晖君, 洪跃雄.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校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的实证研究[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4, 39(06): 35-40. DOI: 10.13947/j.cnki.yzyxb.2024.06.007.
 - [8] 余琪. 高校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困境及对策分析[J]. 上海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44(03): 317-320.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2.03.017.
 - [9] 任雅才, 董恩汝, 林滨娟. 习近平总书记用典的价值意蕴和借鉴路径[J]. 高校辅导员, 2021, (01): 3-7.
 - [10] 初金哲, 李维婷. 高校银龄与专职辅导员协同育人的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J]. 高校辅导员, 2025, (06): 43-49.
 - [11] 高毅哲. 打开立德树人全新格局[N]. 中国教育报, 2024-12-26.
 - [12] 狄佩佩. 大数据时代高校辅导员“精准思政”路径探析[J]. 科教导刊, 2021, (02): 101-102+161. DOI: 10.16400/j.cnki.kjdz.2021.01.045.
 - [13] 陈静, 程琬寒, 邵洋, 等. “大思政课”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思政教师与专业课教师协同育人路径研究[J]. 教育观察, 2025, 14(S1): 84-85. DOI: 10.16070/j.cnki.cn45-1388/g4s.2025.s1.05

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及专业技能提升策略研究

周澧骊

(广州科技职业技术大学, 广州, 5100801)

摘要:在建筑行业转型升级与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作为培养应用型建筑设计人才的核心载体,其毕业生就业质量直接关系到专业建设成效与行业人才供给。本文采用文献研究法、问卷调查法与访谈法,结合职业本科教育定位与建筑设计行业岗位需求,系统分析当前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与核心困境,重点探究专业技能与行业需求的适配差距,并针对性提出专业技能提升策略,为优化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破解毕业生就业难题、推动专业与行业协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就业困境;专业技能

基金项目:广东省人力资源研究会2025年度科研课题项目(项目编号:GDHRS-25-01-048)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69

Research on Employment Dilemmas and Professional Skill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ZHOW Lili

Guang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510080 Guangzhou, Guangdong, China

Abstract:Against the dual background of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major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as the core carrier for cultivating applied architectural design talents, the employment quality of its graduates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and the supply of industry talents. Adopt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search,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combined with the positioning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and the post needs of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 industry,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urrent employment status and core dilemmas of graduates majoring in Architectural Design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focuses on exploring the adaptation gap between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industry needs, and puts forward targeted strategies for improving professional skills.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paths for optimizing the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major in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colleges, solving the employment problems of graduates, and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major and the industry.

Keyword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Architectural Design Major; Employment Dilemma; Professional Skills

作者简介:周澧骊(1992-),男,硕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为建筑设计。

一、引言

建筑设计行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承载着城市建设、人居环境优化、文化传承等重要使命。近年来，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加剧、智慧城市建设和提速以及跨界融合趋势凸显，建筑设计行业正从传统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绿色建筑、智能建筑、城市更新等新兴领域成为行业发展的核心方向。与此同时，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职本教育作为衔接高职教育与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要环节，聚焦“厚基础、强技能、能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成为培养复合型、创新型^[1]建筑设计人才的重要阵地。

然而，当前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形势不容乐观。据住建部 2025 年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建筑设计公司数量减少两成，相关岗位需求直接下降三分之一，建筑学应届生对口就业率不足五成。职本毕业生既面临着普通本科毕业生的学历竞争，又面临着传统行业被淘汰与行业转型升级带来的技能适配难题^[2]，就业困境日益凸显。如何破解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难题，提升其专业技能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成为当前职业教育领域和建筑行业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统梳理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及成因，丰富了职业教育与建筑行业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填补了职本建筑设计专业就业研究的部分空白。同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提出技能提升策略，构建了“行业需求-教育培养-个人提升”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和思路借鉴。

对于职本院校而言，本文提出的技能提升策略可为院校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调整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提供实践指导，助力院校培养更贴合行业需求的应用型建筑设计人才；对于毕业生而言，本文明确了就业困境的核心症结和技能提升方向，有助于毕业生精准定位自身不足，有针对性地提升专业技能，增强就业竞争力；对于建筑行业而言，本文的研究有助于行业明确人才需求导向，推动校企协同育人，缓解行业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短缺的现状，促进建筑设计行业高质量发展。本文首先梳理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现状和职本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特点，明确研究的背景和意义；其次，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系统分析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现状和核心困境；再次，从行业、教育、个人三个层面，深入探究就业困境产生的根源；最后，结合行业人才需求和毕业

生技能短板，提出针对性的专业技能提升策略，形成“现状-困境-成因-策略”的完整研究思路。

二、相关概念界定与行业发展现状

（一）相关概念界定

1. 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

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以培养适应建筑设计行业一线岗位需求的应用型、技能型人才为目标，区别于普通本科的学术型培养，注重实践能力和职业技能的培养，聚焦建筑方案设计、施工图绘制、效果图制作、现场技术服务等核心岗位，培养具备扎实的专业基础、熟练的专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能够快速适应岗位需求的建筑设计从业人员。其人才培养强调“理实结合”，突出“厚基础、强技能、能发展”的特点，兼具职业教育的实践优势和本科教育的理论基础。

2. 专业技能

结合建筑设计行业岗位需求，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专业技能主要包括核心专业技能、辅助专业技能和综合素养技能三个层面。核心专业技能包括建筑方案设计、施工图绘制、CAD/SU/3DMAX 等设计软件操作、建筑规范应用等；辅助专业技能包括效果图后期处理、BIM 技术应用、绿色建筑设计基础等；综合素养技能包括沟通协调、团队协作、创新思维、问题解决等。

（二）建筑设计行业发展现状与人才需求特点

1. 行业发展现状

当前，我国建筑设计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呈现出三大发展趋势：一是绿色建筑成为主流，随着“双碳”目标推进^[3]，国家对绿色建筑的政策支持力度不断加大，绿色建筑设计、施工、运营等环节的人才需求日益增加；二是智慧城市兴起，智慧城市建设推动建筑设计与信息技术、大数据、人工智能深度融合，智能建筑、数字孪生建筑等新兴领域快速发展；三是跨界融合成为新常态，建筑设计行业与互联网、文创、环保等领域的跨界融合日益紧密，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凸显。

与此同时，行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传统地

产行业收缩导致部分设计院缩编裁员, 岗位需求减少; 行业竞争加剧, 低价竞争现象普遍, 企业对人才的筛选标准不断提高; 技术革新速度加快, AI 辅助设计、BIM 全流程应用等新技术对从业人员的技能提出了更高要求。

2. 行业人才需求特点

结合 2026 年建筑设计行业人才需求报告和访谈结果, 当前行业对建筑设计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以下特点:

(1) 复合型人才需求凸显: 企业不再单纯关注毕业生的绘图技能, 更注重其跨学科能力, 要求毕业生具备建筑设计、信息技术、绿色建筑、项目管理等多领域知识, 能够适应跨界融合的行业需求。

(2) 技能实用性要求提高: 企业更倾向于招聘能够快速上手的毕业生, 强调熟练掌握设计软件、建筑规范、BIM 技术等实用技能, 能够直接参与项目设计和现场服务。

(3) 职业素养要求提升: 企业注重毕业生的责任心、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 认为良好的职业素养是保障项目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

(4) 新兴领域人才需求增长: 绿色建筑、城市更新、智能建筑等新兴领域的人才缺口较大, 企业对具备相关技能的毕业生需求旺盛, 成为职本毕业生就业的新赛道。

三、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现状

结合问卷调查和访谈结果, 当前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主要体现在就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就业竞争力不足、就业心态失衡四个方面, 具体如下:

(一) 就业对口率偏低, 跨界就业成为常态

问卷调查显示, 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对口率仅为 48.2%, 近一半毕业生未能进入建筑设计相关岗位就业。其中, 27.3%的毕业生进入建筑施工、监理、造价等相关行业, 15.6%的毕业生转向室内设计、景观设计等关联领域, 8.9%的毕业生彻底脱离建筑行业, 进入互联网、文创、销售等无关领域。

访谈中发现, 就业对口率偏低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是建筑设计行业岗位需求收缩, 尤其是中小型设计院和设计公司, 受地产行业影响, 招聘需求大幅减少, 部分企业甚至停止招聘应届生;

二是职本毕业生的技能未能满足企业需求, 多数企业反映, 职本毕业生虽然具备一定的绘图基础, 但在方案设计、规范应用、技术创新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 无法直接胜任建筑设计核心岗位, 只能转向其他相关岗位或跨界就业。

(二) 就业质量不高, 薪资待遇与发展空间有限

在对口就业的毕业生中, 就业质量普遍不高, 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是就业单位层次偏低, 72.5%的对口就业毕业生进入中小型设计公司、工作室或私人设计院, 大型设计院、国有设计院的录用比例仅为 10.3%; 二是薪资待遇偏低, 毕业生起薪普遍在 3000-5000 元/月, 远低于普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起薪 (5000-8000 元/月), 且薪资涨幅缓慢, 工作 1-2 年后薪资涨幅不足 20%; 三是发展空间有限, 中小型设计公司的项目规模较小、类型单一, 毕业生长期从事基础绘图工作, 难以接触到高端项目和核心设计环节, 职业晋升路径模糊, 多数毕业生在工作 2-3 年后出现职业瓶颈。

(三) 就业竞争力不足, 难以应对市场竞争

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不足, 主要体现在技能短板和综合素养欠缺两个方面:

在技能方面, 毕业生的核心专业技能不够扎实, 38.7%的毕业生表示无法熟练绘制完整的施工图, 45.2%的毕业生不熟悉建筑设计相关规范, 52.1%的毕业生不能熟练运用 BIM、AI 辅助设计等新技术。同时, 技能单一问题突出, 多数毕业生仅掌握基础的 CAD、SU 软件操作, 缺乏对绿色建筑设计、智能建筑设计、效果图后期处理等相关技能的掌握, 难以适应行业转型升级的需求。

在综合素养方面, 毕业生的沟通协调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和创新思维普遍不足。访谈中, 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反映, 部分职本毕业生缺乏沟通意识, 无法准确理解客户需求和团队分工; 40.8%的毕业生在团队项目中表现出协作能力欠缺, 难以配合团队完成设计任务; 此外, 毕业生的创新思维不足, 设计方案缺乏新意, 多为模仿复制, 无法满足企业对设计创新的需求。

(四) 就业心态失衡, 求职定位不够清晰

部分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存在就业心态失衡的问题, 主要表现为两个极端: 一是期望值过高, 部分毕业生受传统观念影响, 认为建筑设计专业是“热门专业”, 毕业应该进入大型设计

院、获得高薪，对中小型设计公司和基础岗位不屑一顾，导致求职范围狭窄，错失就业机会；二是自信心不足，部分毕业生因学历层次低于普通本科毕业生，在求职过程中产生自卑心理，面对企业的筛选和竞争，缺乏主动争取的意识，甚至主动放弃对口就业机会，选择门槛较低的非专业岗位。

此外，部分毕业生的求职定位不够清晰，对自身的技能水平和职业发展方向认识不足，盲目跟风求职，既没有明确的岗位目标，也没有长期的职业规划，导致就业后频繁跳槽，难以积累职业经验，影响职业发展。

四、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的成因分析

析

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并非单一因素导致，而是行业环境、教育培养、个人能力三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具体分析如下：

（一）行业层面：转型升级带来的需求变化与竞争加剧

争加剧

随着建筑设计行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跨界化转型，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从传统的“绘图型”人才转向“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而职本建筑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未能及时跟上行业转型步伐，仍以传统绘图技能培养为主，对绿色建筑、BIM技术、AI辅助设计等新兴技能的培养不足，导致毕业生的技能与企业需求脱节，难以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当前，建筑设计行业竞争日益激烈，一方面，普通本科院校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数量逐年增加，为行业提供了大量人才，职本毕业生在学历上处于劣势；另一方面，行业内企业数量减少，岗位需求收缩，企业为降低用人成本，更倾向于招聘具备丰富经验和全面技能的从业人员，对应届生的筛选标准不断提高，进一步挤压了职本毕业生的就业空间。此外，部分企业存在“学历歧视”现象，对职本毕业生的认可度不高，即使毕业生具备相应技能，也难以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

建筑设计行业的招聘信息多集中在行业内部平台和大型招聘网站，部分中小型设计公司的招聘信息传播范围有限，而职本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不够深入，未能及时为毕业生提供精准的招聘信息。同时，毕业生对行业发展趋势、企业需求标

准、岗位技能要求等了解不深入，导致求职过程中存在盲目性，难以找到符合自身条件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加剧了就业困境。

（二）教育层面：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需求脱节

调查发现，部分职本院校建筑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存在明显缺陷：一是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比例失衡，理论课程占比过高（约60%-70%），实践课程占比不足，导致毕业生的实践能力薄弱；二是课程内容滞后，仍以传统建筑设计理论和技能为主，缺乏对绿色建筑、BIM技术、AI辅助设计等新兴领域知识的融入，与行业发展需求脱节；三是课程设置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未能结合区域建筑行业特点和企业需求，培养具有针对性的技能型人才。

实践教学是职本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但当前部分职本院校的实践教学存在诸多问题：一是校内实践基地建设不完善，缺乏专业的设计工作室、实训场地和先进的设计设备，无法满足学生的实践需求；二是校外实践基地合作流于形式，多数院校与企业的合作仅停留在签订合作协议层面，企业未能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学生的校外实习多为“参观式”“打杂式”，无法真正参与项目设计，难以提升实践技能；三是实践教学师资不足，部分教师缺乏建筑设计行业一线工作经验，教学过程中难以结合实际项目开展教学，导致实践教学效果不佳。

多数职本院校的职业指导工作存在“重形式、轻实效”的问题：一是职业指导课程内容单一，多以求职技巧、简历制作等基础内容为主，缺乏对行业发展趋势、岗位需求标准、职业规划等方面的针对性指导；二是职业指导教师专业能力不足，多数教师并非建筑设计专业出身，对行业情况和岗位技能要求了解不深入，无法为毕业生提供精准的职业指导；三是缺乏个性化职业指导，未能根据毕业生的技能水平、兴趣爱好和职业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导致毕业生求职定位不清晰，就业心态失衡。

（三）个人层面：技能水平与综合素养不足

部分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在学习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和积极性，对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不够深入，仅掌握基础的绘图技能，对建筑规范、设计原理、新兴技术等内容掌握不扎实。同时，部分毕业生缺乏实践意识，不重视校内实训和校外实习，未能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导

致技能水平难以满足企业需求,缺乏核心竞争力。此外,部分毕业生技能单一,不注重拓展自身的技能领域,难以适应行业跨界融合的发展趋势。

除了专业技能,综合素养也是企业招聘的重要考量因素。当前,部分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综合素养存在明显不足:一是沟通协调能力不足,缺乏与客户、团队成员沟通的技巧,无法准确表达设计理念和需求;二是团队协作能力欠缺,在团队项目中缺乏合作意识,难以配合团队完成设计任务;三是创新思维不足,习惯于模仿复制他人的设计方案,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无法满足企业对设计创新的需求;四是职业素养不高,缺乏责任心、敬业精神和抗压能力,难以适应建筑设计行业高强度的工作节奏。

部分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心态存在偏差,要么期望值过高,盲目追求大型企业和高薪岗位,忽视自身能力和岗位需求的匹配度;要么自信心不足,在求职过程中缺乏主动争取的意识,轻易放弃就业机会。同时,多数毕业生缺乏清晰的职业规划,对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认识不足,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岗位、未来想从事什么工作,导致求职过程中盲目跟风,就业后频繁跳槽,难以积累职业经验,影响职业发展。

五、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专业技能提升策略

针对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及成因,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特点,本文从行业、院校、个人三个层面,提出针对性的专业技能提升策略,形成“行业引导、院校主导、个人主动”的三位一体提升体系,助力毕业生提升专业技能,破解就业困境。

(一) 行业层面:优化就业环境,搭建人才培养

与就业对接平台

建筑行业协会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一方面,引导企业转变用人观念,摒弃“学历歧视”,注重毕业生的技能水平和实践能力,为职本毕业生提供公平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制定行业人才需求标准和技能评价体系,明确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技能要求,为院校人才培养和毕业生技能提升提供指导。同时,行业协会应加强行业自律,规范企业招聘行为,杜绝虚假招聘、恶意压薪等现象,优化职本毕业生的就业环境。

企业应主动参与职本建筑设计专业的人才培养过程,与院校共建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和

实训基地,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具体而言,企业可派一线设计师到院校担任兼职教师,结合实际项目开展教学,提升学生的实践技能;院校可根据企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融入企业实际项目案例,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接触真实项目。同时,企业应提供更多的实习岗位和就业机会,接收职本毕业生进行顶岗实习,帮助毕业生积累实践经验,实现“实习-就业”无缝对接。

行业协会和企业应搭建建筑设计行业人才招聘信息平台,整合行业内的招聘信息,及时向职本院校和毕业生推送,减少信息不对称。同时,企业应加强与职本院校的沟通交流,定期举办校园招聘、企业宣讲会等活动,向毕业生介绍企业需求、岗位技能要求和职业发展前景,帮助毕业生了解行业情况,明确求职定位。此外,行业协会可组织职本毕业生开展技能竞赛、行业交流等活动,为毕业生提供展示自身技能的平台,提升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 院校层面: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技能

培养与职业指导

职本院校应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企业需求,优化建筑设计专业的课程设置:一是调整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比例,将实践课程占比提高至40%-50%,强化实践技能培养;二是更新课程内容,融入绿色建筑、BIM技术、AI辅助设计、城市更新等新兴领域的知识和技能,删除滞后、无用的课程内容,确保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同步;三是突出专业特色,结合区域建筑行业特点,设置针对性的课程模块,如针对南方地区的绿色建筑模块、针对城市更新的旧建筑改造设计模块等,培养具有区域特色的技能型人才;四是推行“课证融合”,将建筑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BIM技能等级证书等相关职业证书的考核内容融入课程体系,提升毕业生的职业资格水平。

实践教学是提升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技能的核心环节,院校应从三个方面强化实践教学:一是完善校内实践基地建设,建设专业的设计工作室、实训场地,配备先进的设计设备和软件,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校内实践环境;二是深化校外实践基地合作,与大型建筑设计企业、设计院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共建校外实训基地,让学生真正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在实践中提升技能;三是加强实践教学师资队伍建设,引进具有行业一线工作经验的设计师担任专职教师,同时

鼓励现有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提升实践教学能力,确保实践教学能够结合实际项目开展。此外,院校可推行“项目制教学”,以实际项目为载体,引导学生分组完成方案设计、施工图绘制、效果图制作等环节,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职本院校应完善建筑设计专业的职业指导体系,为毕业生提供全方位、针对性的职业指导:一是优化职业指导课程内容,增加行业发展趋势、岗位需求标准^[4]、职业规划、技能提升等方面的内容,帮助毕业生了解行业情况,明确求职定位;二是加强职业指导教师队伍建设,选拔建筑设计专业出身、具有行业经验的教师担任职业指导教师,提升职业指导的专业性和针对性^[5];三是开展个性化职业指导,根据毕业生的技能水平、兴趣爱好和职业需求,制定个性化的职业规划和技能提升方案,帮助毕业生找准自身定位,调整就业心态;四是加强就业指导服务,为毕业生提供简历制作、面试技巧、模拟面试等专项培训,帮助毕业生提升求职能力。

(三) 个人层面:主动提升技能,树立正确的就

业心态

毕业生应树立主动学习的意识,扎实掌握建筑设计专业的核心知识和技能:一是认真学习专业理论知识,深入理解建筑设计原理、建筑规范、设计美学等内容,为技能提升奠定基础;二是强化软件操作技能,熟练掌握 CAD、SU、3DMAX、PS 等基础设计软件,同时主动学习 BIM、AI 辅助设计等新兴技术,拓展自身的技能领域,适应行业转型升级的需求;三是注重实践技能提升,积极参与校内实训、校外实习和实际项目,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结合,积累实践经验,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四是主动考取相关职业资格证书,如建筑设计师职业资格证书、BIM 技能等级证书等,提升自身的就业竞争力。

毕业生应注重自身综合素养的提升,全面满足企业的岗位需求:一是提升沟通协调能力,主动与他人沟通交流,学习沟通技巧,能够准确表达设计理念和需求,协调好与客户、团队成员的关系;二是增强团队协作能力,树立团队意识,积极参与团队项目,学会配合团队完成设计任务;三是培养创新思维,主动关注行业前沿动态,学习先进的设计理念和方案,勇于尝试新的设计方案,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四是培养良好的职业

素养,树立责任心、敬业精神和抗压能力,适应建筑设计行业高强度的工作节奏,脚踏实地,积累职业经验。

毕业生应调整就业心态,树立正确的就业观:一是摒弃“学历自卑”心理,正确认识职本教育的优势,相信自身的技能水平,主动争取就业机会;二是调整就业期望值,结合自身能力和行业需求,理性选择就业岗位,不要盲目追求大型企业和高薪岗位,注重岗位的发展空间和实践机会;三是制定清晰的职业规划,明确自身的职业发展方向,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自身技能水平,制定短期和长期的职业目标,逐步提升自身技能,实现职业发展。此外,毕业生应保持积极乐观的求职心态,面对求职过程中的挫折,不要轻易放弃,主动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提升自身的求职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一) 研究结论

当前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面临着就业对口率低、就业质量不高、就业竞争力不足、就业心态失衡等多重就业困境,这些困境严重影响了毕业生的职业发展和职本教育的人才培养成效。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困境是行业、院校、个人三个层面共同作用的结果:行业层面,转型升级带来的人才需求变化、竞争加剧和信息不对称,挤压了毕业生的就业空间;院校层面,人才培养模式与行业需求脱节、实践教学薄弱、职业指导不完善,导致毕业生的技能和综合素养难以满足企业需求;个人层面,技能水平不足、综合素养欠缺、就业心态不端正和职业规划不清晰,影响了毕业生的就业竞争力和求职效果。破解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就业困境,提升其专业技能,需要行业、院校、个人协同发力:行业应优化就业环境,推动校企协同育人,搭建信息对接平台;院校应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和职业指导;个人应主动提升技能和综合素养,树立正确的就业心态和清晰的职业规划。

(二) 研究展望

随着建筑设计行业的不断转型升级,绿色建筑、智能建筑、跨界融合等趋势将进一步凸显,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就业环境和技能需求也将不断变化。未来,相关研究可进一步拓展:一是扩大问卷调查和访谈的范围,覆盖更多地区、更多院校和企业,获取更全面、更精准的数据,

为研究结论提供更有力的支撑；二是深入研究职本建筑设计专业与新兴领域的融合，如绿色建筑、智慧城市、数字孪生等，探索针对性的技能培养路径；三是跟踪职本建筑设计专业毕业生的职业发展情况，分析技能提升策略的实施效果，不断优化完善技能提升体系，为职本院校人才培养和毕业生就业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指导。

此外，随着职业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职本教育将迎来更好的发展机遇。希望职本院校能够不断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贴合行业需求的应用型、技能型建筑设计人才；希望毕业生能够主动提升自身技能和综合素养，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职业规划，在建筑设计行业实现自身价值；希望行业能够给予职本毕业生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共同推动建筑设计行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 [1] 邓磊,蒋吉凯,戎一翎.行业转型发展背景下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J].职业教育研究,2025,(10):68-77.
- [2] 王康,李娜.提升建筑类高职毕业生就业质量的现实模式构建探究[J].人生与伴侣,2026,(02):67-69.
- [3] 尚玉金.“双碳”目标下建筑企业绿色建筑与智能建造协同策略研究[J].陶瓷,2026,(03):220-222.
- [4] 李海周,高露.基于岗位能力需求的高职建筑设计专业课程体系优化探索[J].重庆建筑,2025,24(07):105-107.
- [5] 胡文嘉,杨渝.探索职业本科建筑设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J].居业,2021,(06):13-14.

鲸的认知与语境——中国古代鲸豚类的社会史深描

刘金岁月

(苏州科技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苏州 215009)

摘要:中国古代先民对鲸豚类动物的认知具有清晰可辨的脉络,从先秦至汉魏的神话想象与官方定名,到两晋至唐宋的博物考证,再到宋元近海实用化,至明清形成相对成熟系统的看法,这一过程实质上是内陆文明向海洋拓展过程中人与海洋关系的文化建构。鲸豚既是海洋生物,也曾是古代社会的政治符号、信仰载体以及生态标识。对于鲸的认知史是中国传统环境观中敬畏、实用、节制等要素共生的案例。复原古人对鲸豚类动物的自然感知及文化认知,对反思传统环境观、拓展中国海洋环境史研究具有参照意义。

关键词: 鲸豚认知史; 中国古代海洋社会; 历史人类学; 环境史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0

Cognition and Context of Whales: A Thick Description of the Social History of Cetaceans in Ancient China

Liu Jinsuiyue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Suzho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zhou 215009, Jiangsu, China

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people's cognition of cetaceans presents a clear and traceable evolutionary thread. From mythological imagination and official nomenclature in the pre-Qin period to the Han-Wei dynasties, to natural-historical research from the Jin to the Tang-Song dynasties, practical utilization in coastal areas during the Song-Yuan dynasties, and finally a relatively mature and systematic understanding in the Ming-Qing dynasties, this process essentially reflects the cultural construction of the human-ocean relationship as inland civilizations expanded toward the sea. As marine creatures, cetaceans also functioned as political symbols, religious carriers, and ecological markers in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The cognitive history of whales serves as a case embodying the coexistence of reverence, practicality, and restraint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nvironmental ethics. Restoring ancient people's natural perception and cultural understanding of cetaceans is of referential significance for reflecting on traditional environmental views and expanding research in China's marine environmental history.

Key words: cognitive history of cetaceans; ancient Chinese maritime society;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environmental history

自年鉴学派开启文化史、环境史转向[1]以来,许多曾经被忽视的“他者”逐渐成为历史学家关注的对象,自然环境的各种要素也逐渐进入史学

视野。鲸作为一种海洋哺乳动物,长期以来在人类与海洋的关联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生物学分类上,鲸通常指鲸偶蹄目鲸下目所涵盖的海洋哺乳

作者简介: 刘金岁月(2000—),男,研究生,研究方向:专门史;江南区域社会史;新文化史

动物,分为须鲸与齿鲸两大类,包含海洋与淡水鲸豚[2]。关于鲸豚类生物的生物学研究已成果颇丰,但将鲸作为历史研究对象的相关探索却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中国古代沿海先民,在与海洋的接触中逐渐认识到,鲸这种独特的生物并非一般的“鱼类”。与此同时,长江中的长江江豚、白鱀豚等淡水小型鲸豚类动物,因与人类活动接触密切,逐渐被中国古代先民记录下来,其形象不仅出现在文学作品中,还被赋予了神秘色彩,例如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白秋练”的原型就是白鱀豚。鲸豚类动物在中国古代先民的日常生活、文化意象、信仰符号及政治隐喻中,都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这一重要物种在长期人海互动中被赋予特定文化内涵。

中国先民对鲸豚的认识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从先秦汉魏的初步认知,到唐宋时期的深化,再到明清阶段的趋于成熟,直至晚清近代实现转型。这一认知演变,是古人海洋实践、文化观念、政治需要与所处生态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也从某种角度展现出中国先民的环境认知与价值取向。探究中国先民对鲸豚类动物的认知演变与文化内涵发展,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现实价值。

一、先秦至汉魏时期的神话与想象

先秦至汉魏时期,是中国古代鲸认知的初始阶段。这一时期,古人对海洋巨型生物的认知从无专门称谓的神话概念,逐步发展为有明确“鲸”字的命名,延伸至对动物形态的初步观察。

(一) 先秦时无“鲸名”的巨鱼想象

目前先秦遗址出土的鲸豚类实物,以安阳殷墟发现的鲸骨较为闻名,但殷墟甲骨文中并未出现与“鲸”相关的记载。[3]先秦时期尚无“鲸”这一专用名称来界定鲸豚类动物,古人多以鯨、巨鱼、长鲸等称呼指代海中巨型类鱼生物。先民对这类巨兽的认识多来自传闻与神话,缺乏实际观察依据,未能形成对鲸豚类生物明确的认知,整体呈现出模糊化、神话化的特点。

《庄子》中记载“北冥有鱼,其名为鯨。鯨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4]。鯨并非生物学意义上的鲸,而是一种被神话化的巨型类鱼生物,但是对于鯨的想象却是古人对海洋巨型生物认识的开端。《山海经广注》中载有“长鲸”[5]。《楚辞·天问》亦有“鳌戴山抃,何以安之”的记录。[6]古人将这类未知的海洋巨兽归为海怪体系,赋

予其神秘莫测、巨大无穷的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鲸的政治象征意义已初步萌芽。《左传》中“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鲸鲵而封之,以为大戮”[7],以鲸鲵喻指不义之人,雄者称鲸,雌者称鲵,后逐渐引申为凶暴之人。这一表述赋予了鲸政治象征意义,使鲸形象与礼法秩序相关联,成为其形象演变为政治符号的开端。

(二) 汉代以来“鲸”字诞生与命名

汉代,“鲸”字正式出现,且被纳入文字学中的鱼部,许慎《说文解字》中记载“鯨,海大鱼也。从鱼,𩺰声。《春秋传》曰:‘取其鯨鲵。’鲸,鯨或从京”[8],这一界定标志着鲸不再是单纯的神话创造物,而是作为一个物种正式进入官方博物分类体系,古人对这类海洋巨兽的认知开始从神话想象向纪实转变。班固《汉书·扬雄传》、张衡《西京赋》等文献中,关于鲸豚类动物的描绘逐渐成为常见文学意象。张衡《西京赋》中“海若游於玄渚,鲸鱼失流而蹉跎”[9]。鲸形象不再局限于纯粹的神话叙事,开始融入现实语境,成为文人抒情、状物的载体。

《汉书》记载“成帝永始元年春,北海出大鱼,长六丈,高一丈,四枚。哀帝建平三年,东莱平度出大鱼,长八丈,高丈一尺,七枚,皆死”[10],如此巨大的类鱼生物搁浅死亡,极易指向鲸类集体搁浅的现象。受汉代天人感应观念的影响,将此类现象视为“灾异”,鲸这种生物再次与政治意涵、谶纬暗示相结合。此外,崔豹《古今注》中“鲸,海鱼也,大者长千里,小者数十丈……鼓浪成雷,喷沫成雨”[11]的描述,是古人首次较为具体地记录鲸类生物换气喷水的生物活动。这一时段先民对于鲸豚类生物的认识突破了此前单纯的神话化想象,逐渐对鲸进行更为具体细致的描述。

汉魏时期古人对鲸的认识相比前代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深化,古人赋予鲸巨大、神秘、可畏等特性,时人常把鲸记述为身长千里、喷浪如山、鼓浪成雷的“海鱼之王”,此种夸张之辞既是对鲸巨物本身的敬畏,也流露出当时观察条件的种种限制。鲸的政治象征内涵在汉魏时期得到充分、妥帖的发展,“斩鲸”[12]已然成为彰显平乱武功的绝好隐喻,继承并升华了先秦时期鲸的政治象征传统。

若细究汉魏人的思维逻辑,海洋本身即被当作不可控的自然力量的象征,而鲸作为海洋最庞

大、最惊人的生物，理所当然地被视作海洋神秘性最生动、最有力的具象化身。曹植《洛神赋》中“鲸鲵踊而夹毂”[13]一句便极生动地将鲸与其他海洋巨兽并列，既突出其神秘威严之状，亦体现古人对未知海洋世界的深切敬畏，同时坦然承认彼时内陆文明对海洋认知的种种局限。

二、两晋至唐宋时期的博物认知

晋唐时期，海上交通与贸易逐步发展，古人与海洋接触日益密切，在航海中鲸这种生物被进一步详细地观测。这一时期对鲸的认知由传闻转向亲历，博物学发展使其分类更趋系统，象征内涵不断丰富。

（一）地理拓展与鲸的出现

从目前所见的正史及方志中可以看到当时大量有关鲸类活动及搁浅的细致记载，《南齐书》载“永元元年四月，有大鱼十二头入会稽上虞江，大者近二十余丈，小者十余丈，一入山阴称浦，一入永兴江，皆喝岸侧，百姓取食之”[14]，对鲸闯入内河搁浅、民众分食的情形有极清楚、极生动的描述。与此形成补充的是《新唐书》中所载“开成二年三月壬申，有大鱼长六丈，自海入淮，至濠州，招义民杀之”[15]，也如实记载了鲸搁浅之后沿海民众对其的具体处置方式。

唐代各类航海笔记中，文人、海商、官员等群体留下了大量海上目击鲸的记录。《岭表录异》称“海鲎”为“即海上最伟者也，其小者亦千余尺”，在记录鲸类换气时称“鲎鱼喷气水散于空，风势吹来若雨耳”[16]。这些来自于目击的记载，逐渐将鲸细致切实地记录描绘。

（二）博物学框架下的鲸归类

晋唐时期，各类博物著作、方志文献关于鲸的记录日益增加，对鲸的形态、习性、实用价值记载更为详细。《魏武四时食制》中记载“东海有大鱼如山，长五六丈，谓之鲸鲵……时死岸上，膏流九顷。”[17]，该记载记录了鲸搁浅后的状态，以及鲸油脂的实用价值。鲸类的利用价值逐步体现。《集韵》中记载鲸“五月生子于岸，八月导而还海，鼓浪成雷，喷沫成雨，水族畏之”[18]，这段描述细化了人们对鲸习性的认知，甚至观测到鲸会在春夏季节前往沿海繁殖，秋冬季节返回大洋。随着认知的深入，鲸逐渐成为博物学中明确的物种，原本带有神话色彩的巨型生物，在晋唐时期博物学发展的推动下，其形象变得愈发清

晰具体。

（三）鲸与政治、祥瑞、武功

唐代，社会繁荣稳定，国家实力强盛，鲸的政治象征意义达到顶峰，其内涵逐渐丰富，涵盖政治、祥瑞、武功等多方面。“鲸鲵”逐渐成为叛臣的代名词，“斩鲸”则成为平定叛乱、彰显皇权的象征，延续并强化了先秦以来的政治象征传统。李白《司马将军歌》中“直斩长鲸海水开”[19]，便将“斩长鲸”隐喻平定叛乱、建功立业，既体现了唐代的时代气象，也丰富了鲸的政治象征内涵。与此同时，鲸的出现被古人解读为政治兴衰的征兆，纳入五行灾异体系，成为天人感应观念的重要载体。如《新唐书》中对鲸搁浅的记载，便被视为“鱼孽”，与王朝兴衰、民生祸福关联起来，这与《盐铁论注》中“鲸鱼死而彗星出”[20]的记载所体现的灾异观念一致。

除了武功灾异的种种说法外，鲸在文学中被塑造为豪放壮阔的美学符号，既是力量雄浑的象征，也宜于表现文人的壮志豪情，辛弃疾《和马叔度游月波楼》词中“鲸饮未吞海，剑气已横秋”[21]一联堪称绝妙，将鲸与“鲸饮”“剑气”联结，呈现了壮阔豪迈之质，遂使鲸成为文人抒写壮志、宣泄豪情时极其有力、极有风神的意象，形成了鲸的美学意象。

两晋至唐宋时期，古人对海洋的探索不断加深，人与鲸接触更频繁，从想象转向实证。当时海洋开发、航运贸易、海防建设等活动兴盛，海上活动频繁，古人与鲸相遇的机会大大增加，所见场景也更为丰富，打破了此前以传闻、想象为根基的认知模式。《岭表录异》中所载鲸类之物，实为当时海民及官员直接观察所得，描写根植于真实经验，与先秦神话想象形成鲜明对比。航海笔记中对鲸的记录亦见古人的细致观察。航海活动既开阔了古人的海洋视野，也积累了大量实地经验，此时的鲸认知已趋于具象化、系统化，也恰是当时内陆与海洋文明交融的极佳体现。

三、宋元时近海社会与民间信仰

宋元时期商品经济繁荣，近海开发加速，海洋社会兴起，渔民、海商与鲸接触日趋频繁。人们对鲸的认知从文人记述走向民间生活，实用利用与民间信仰并存，鲸逐渐褪去神话巨兽色彩，融入沿海居民的日常生活。

（一）宋元海洋社会发展

宋元时期的文人笔记与方志中,留下了大量鲸搁浅及民间利用的详细记载,展现了当时沿海民众与鲸的互动场景。洪迈在《夷坚志》中记载了航海途中所见的“巨鲳”即为鲸,鲸随船而行,后游入深海[22]。宁波、温州、泉州等沿海地区的地方志中,也有关于鲸类搁浅的记载,如《咸淳临安志》载“永明九年,盐官县石浦有海鱼乘潮来,水退不得去,长三十余丈,黑色无鳞,未死,有声如牛,土人呼为海燕,取其肉食之”[23],这一鲸类搁浅事件在《天中记》《格致镜原》等书中亦有收录,均反映了当地民众分食鲸肉、提炼鲸脂、利用鲸骨的习惯。

(二) 从博物到实用

宋元时期,有关鲸的知识不再限于文人博物记载,逐步渗入民间生活,对这一海洋生物的认识趋向实用化。在医药领域,鲸被纳入药用体系,其药用价值得到系统记载。南宋洪遵《洪氏集验方》中记载“大鰓胶一味,碎锉,用无灰酒煮烂……治疝气偏坠。”其中大鰓胶为鲸脂熬制而成。宋代人们已认识到鲸的药用价值,文献明确记载鲸脂、鲸骨可入药治疗疝气等病症,丰富了传统医药内容。不仅是药用价值,鲸在农业中的实用价值凸显,鲸脂用作肥料、照明燃料,鲸骨制成农具与建材,成为沿海民众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源。在海防与航海方面,人们通过观察鲸的活动规律进行导航与气象判断,为海上航行提供了便利。

(三) 鲸作为海神与灵物

宋元时期民间对鲸的敬畏发展为具体的信仰及禁忌,形成了完整、成熟的民间信仰体系,既源于对鲸庞大体型的敬畏,也契合沿海民众的海洋生存需求,成为民间海洋文化中重要的内容。在海神崇拜中鲸被视为龙王化身、海神使者,搁浅之鲸即称“龙搁浅”,民众不敢随意捕杀,必举行祭祀以求海上平安。这是对鲸最切实、最郑重的敬畏,也体现了当时民间将鲸与海神信仰自觉、巧妙地结合的认知特点,鲸被纳入民间海神崇拜体系,成为沿海民众精神寄托的具体载体。

民间形成了“不杀搁浅鲸”“不食鲸眼”的禁忌,其根本原因乃是对鲸的敬畏,又必然包含朴素而可贵的生态智慧。《述异记》中载有“南海有明珠,即鲸鱼目瞳”[24],古人因而将鲸眼视为“明月珠”,捕杀鲸、食用鲸眼都会招致海难,该禁忌客观上起到了约束人类对鲸过度利用的作用,也表达了民间对鲸的敬畏。民间尚有鲸搁浅

系因“触犯神明”遭贬谪的说法,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天人感应的传统观念,把鲸的异常现象与神灵意志、人间祸福联结起来,强化对鲸的敬畏,也使民间鲸信仰更加系统化、规范化。

宋元时期近海开发加速,人鲸互动大大增加,鲸从远方巨兽变为近海邻居,当时人们对鲸的认识从单纯的敬畏自然转向实用与敬畏并重,也形成了仅利用搁浅个体、不主动捕猎的节制格局。其节制利用的生态智慧实为敬畏自然、满足实用两者平衡的体现,也是传统环境观念中颇有意义的一部分。

四、明清时对鲸类认知的固化

明清时期是中国传统时代对鲸类生物认知的成熟定型阶段。各类类书、博物志与本草著作对鲸类知识进行系统整理与传播,形成完备体系。官方与民间认知并行发展,文学意象趋于定型,传统认知达到顶峰并就此定型。

(一) 明清类书与博物著作

明清时期,文化繁荣,类书、博物志、本草著作大量编纂,学者们对前代对鲸的知识进行系统整理、补充,结合当时的观察经验,使关于鲸的认知逐渐定型。

李时珍《本草纲目》将鲸纳入“鳞部”[25]。该书不仅梳理了前代关于鲸的记载,还结合当时的观察经验,明确区分了“鲸”与“人鱼”,纠正了此前部分文献中的认知偏差,使鲸的物种辨识度逐渐提升。明万历年间王圻、王思义采用“图绘以勒之于先,论说以缀之于后”的体例著成《三才图会》,其中载“鲸,海中大鱼也”[26],王圻绘录的鲸的图像,在图画中鲸化身为一条巨型鱼类,张口吞噬小舟,这种图文并茂的形式让其时的鲸形认知更为具象。尽管明代学界仍将鲸视为巨型鱼类,但在长期的文化演绎中,其形象被广泛复制、传播并逐渐定型。《三才图会》刻本现存于世,作为考察明代人对鲸类生物认知的重要实物,它不仅推动了相关知识的流布,也加速了这一传统认知的定型。《广东新语》等沿海方志中,不乏有关鲸的种类、分布区域、搁浅规律等内容,如将“蜃家贼”比作鲸鲵“蜃家本鲸鲵之族,其性嗜杀”会伤害劫掠民船,干扰沿海居民,而其中鲸的形象也逐渐定格为凶狠的破坏者。有明一代的记载均基于沿海民众的实际经验,对于鲸的认知更加细致、贴近现实,也体现了明清时期对鲸的认知的地方性与实用性特征。清代博物

学家聂璜在其海洋生物志《海错图》中，将鲸类称为“井鱼”，并以图像形式将其描绘为头部可喷射水柱的大型水生鱼类。这一记述与图像呈现，反映了清代中期士人对鲸豚类动物的经验性认知与博物学记录范式，也为考察中国古代海洋生物认知体系提供了典型例证[27]。

（二）官方与民间双重认知并存

明清时期对鲸的认识略有不同。官方继承前代的政治化认知，把鲸纳入异物体系以服务于政治叙事，而民间从生产生活的实际出发，形成真实具体的地方性知识，二者互为补充、相对独立，共同构成当时鲸认知的双重体系。

对于鲸的官方记载延续了前代“祥瑞灾异”的概念，将鲸纳入异物体系，鲸的出现、搁浅等现象被用于政治叙事，如《海盐县图经》中记载“三十七年十月，有大鱼至，搁于东门海滩，其长十丈余”[28]，这类关于鲸类搁浅的记载与灾异紧密联系，与汉魏以来的天人感应观念一脉相承，将鲸与天命祸福紧密结合，成为官方政治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

沿海民众从事航海、捕鱼诸多活动，故对鲸类活动有长期、系统的观察积累，尤其清楚地掌握鲸洄游、繁殖规律，其知识偏向实用，直接服务于航海、捕捞，与官方政治化认知形成对照。文人书本知识与海民实践知识并存，前者承载文化内涵、政治象征，维系鲸文化的延续，后者指导具体利用，二者独立而互补，相互促进，共同完善并定型对鲸的认知。

（三）鲸意象的文学定型

明清时期文学中所用的鲸意象已经成熟、丰富，文人继承唐代以来的美学传统，把鲸视为壮阔、有力等品质的象征，“长鲸”“鲸吞”“鲸波”等表述常被用来抒写壮志豪情，尤见于豪放派诗词，其中“鲸波”一词使用极频，既可实指浩瀚海浪，又用作武功抱负的隐喻，气势恢宏，雄浑奔放。此种意象既固化了鲸的文学形象，又充分地将其与自然景观结合，鲸的美学内涵得到极大拓展，也成为中国文人海洋美学最鲜明、最有力的符号，承载着文人对远方、自然等永恒主题的思考，既表现海洋的壮阔、鲸的磅礴，又流露文人对自然之美真挚热烈的欣赏。若再细加考察，可知诸多文学意象实为古人文化心理及自然观的精妙映照，对海洋有敬畏，对力量有崇拜，对自由有追求，三者联结，互为补充，中国古代

文学的精神内核更饱满、更丰盈，而鲸的美学意象也根植于古典文学土壤之中，成为真正经得起反复品玩、层层挖掘的经典符号。

这一时期是中国传统有关鲸类认知基本定型而尚未形成现代生物意义上的充分理解的时期，明清古人没有现代生物学及生态学的观念，对鲸的认识始终以敬畏、实用、禁忌、信仰等因素为基础，并让其共生调和。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对鲸作了细致的形态描述及药用记述，但是仍将其归入“鳞部”，并未突破传统博物学分类框架。与此形成呼应的是，民间对鲸的信仰及禁忌亦源于神灵崇拜，绝非科学观察的结果。直到西方生物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后，古人对鲸的关注才逐步从政治象征、信仰意义、实用价值转向其生物属性及生态意义，传统认知模式也被现代科学认知所取代。

五、古人如何建构“鲸”？

梳理中国古代鲸认知的演变，实质上就是在考察古人关于鲸的认知路径、象征体系、环境观念等建构方式，鲸的认知史与中国古代社会、文化、生态的发展深度关联，是古人文化建构与自然观察相融合的产物，也呈现出中国传统认知特有的逻辑脉络及文化品格。

（一）从神话巨物到具体生物

中国先民对鲸的认知变迁有迹可循，这一过程是从模糊到清楚、从想象到实证、从零散到系统，可一窥先民的海洋实践经验及当时的社会需要。

先秦时期，认知尚处在神话想象阶段，又无实地观察，古人对鲸的认识，以内陆文明对未知海洋的想象为起点，呈现为神话化的巨鱼形象，《庄子·逍遥游》中所载的“鲲”、《山海经》中所论的长鲸都属于此阶段的典型认知框架。汉魏时期，“鲸”字诞生，官方记录出现，认知从纯粹神话自然过渡到现实，但毋庸讳言当时仍以传闻为主，实地经验尚少，这一时期的重点是鲸的命名及初步分类，许慎《说文解字》对“鲸”的界定、班固《汉书》对鲸搁浅的记载都为此做了示范，并开启了鲸的政治象征传统。两晋到唐宋时期，海上交通、海洋活动空前繁荣，古人获得大量实地目击鲸的机会，认知从想象转向实证，海洋经验成为认知的基础，博物知识也逐渐系统化，鲸的生态特征及实用价值均得到充分挖掘。宋元时期，近海社会兴起，人与鲸的互动更加频

繁, 认知从文人书斋走向民间日常, 实用利用与民间信仰交织, 洪迈《夷坚志》中对鲸利用的详实记载、民间所承袭的鲸信仰禁忌, 共同构成了敬畏与实用并存调和的认知格局。明清时期, 类书与博物著作大量编纂, 对鲸的认知由此进入体系化、符号定型的新阶段, 李时珍《本草纲目》、王圻《三才图会》对鲸知识的系统整理堪称典范, 官方与民间双重认知体系都已成熟, 传统鲸认知达到顶峰并最终定型。

(二) 鲸的多重文化意义

中国古人对鲸的认识绝不止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鲸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有着完整生动的象征体系, 且渗透于政治、信仰、美学、实用诸领域, “鲸”这种生物亦是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文化符号。

鲸在政治符号层面与政治秩序有着明确的联系, 既是逆贼的隐喻, 《左传》中以“鲸鲵”喻不义之人, 又是平乱武功的象征, 李白诗中“直斩长鲸海水开”即为明例, 同时又被系统、妥帖地纳入祥瑞与灾异体系之中, 班固《汉书》、宋祁等《新唐书》都把鲸搁浅当作灾异来记载, 并以此解说天意、颂扬皇权, 融入帝国政治叙事。在信仰符号层面, 鲸被民间奉为海神、灵物、龙王化身, 洪迈《夷坚志》中所载鲸祭祀仪式即为印证, 相关祭祀仪式及禁忌规范既规范了人与鲸的关系, 也切实强化了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之感, 与此后的任昉《述异记》中“鲸的眼睛化为夜光珠”的传说形成绝妙呼应。在美学符号层面, 鲸是中国文人海洋美学最富魅力、最见风神的意象, 象征壮阔、力量、自由, 故辛弃疾、高启诸家诗作中常见以鲸抒写对远方、自然、自由的追思, 使中国古代文学及美学都增彩生辉。最后, 在实用符号层面, 鲸的肉、脂、骨等部分都曾被直接用于饮食、医药、农业、建材诸领域, 唐慎微《证类本草》、王桢《农书》中均有详实可靠的记载, 可知鲸早已真正融入民间日常生活, 成为古人生产生活中实实在在、经得起反复利用的资源。

(三) 人与鲸的互动

古人对鲸的认识实际上是中国人传统环境观的体现, 古人对鲸这种生物的认知过程, 也体现了敬畏、实用、想象三者的平衡, 与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自然观一脉相承。

古人对鲸始终怀有敬畏之心, 因认为鲸是海洋神秘性的化身, 故极少主动捕杀, 宋元时期对

搁浅鲸的祭祀仪式就是这种敬畏最典型、最诗意的表达, 即其根本出发点绝不是科学知识, 而是对未知自然力量的敬畏, 也由此引出传统环境观念中“敬畏自然”的基本精神。更可贵的是, 古人对鲸的利用一贯克制, 以搁浅个体为主, 不主动捕猎, 洪迈《夷坚志》、萧子显《南齐书》中所载案例皆以搁浅个体为对象, 故能将实用需求与自然保护两者调和, 堪称实用而非掠夺的示范。从认知逻辑上考察, 古人对鲸的认识以文化、信仰、经验为根本基础, 绝不是现代实证科学的框架, 将鲸列入“鳞部”, 将鲸搁浅视为灾异, 此种“想象而非科学”的认知模式实为一种别致而富洞见的“文化生态观”, 即人与自然当共生共存, 而非人类征服自然。

(四) 一种被文化重塑的生物

从历史人类学的角度可以考察中国古人对鲸的认识, 古人对鲸的形象、意义及价值的理解都是对中国古人社会生活等各种因素加以回应的文化建构, 也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特质及环境观。

鲸绝不是单纯的海洋生物, 更是政治、信仰、美学、实用等文化意义的载体, 对鲸的认知历程必然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文化传统、环境变迁、海洋开发有直接、深刻的联结。古人对鲸的命名、分类、利用、信仰, 皆是以自身文化需求及生存经验为出发点, 对鲸进行种种有目的、有逻辑的文化赋予与建构: 给鲸命名为“鲸”, 即源于古人对其巨大体型最直观、最明确的认识, 把鲸纳入政治象征体系, 是为了满足古代帝国的政治需要, 而将鲸奉为海神, 则是沿海民众生存信仰的具体体现。这些文化建构相互呼应、彼此支撑, 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环境观念的特质, 人与自然共生, 文化与经验互为补充。对鲸的认知史, 实质上就是中国传统环境认知及文化观念生动的缩影。

结语: 以鲸为镜——传统环境认知的特质与启示

由于中国古代对鲸的认知实质上是古人与海洋、自然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 故其既是古人对自然的观察结果, 也含有古人独到的生态智慧, 总结这一认知史具有重要理论价值, 对当代海洋生态保护也有直接启发。

中国古代对鲸的认知有逻辑严密的阶段演变, 可自然、妥帖地归纳为从想象到实证的递进过程, 先秦时期鲸以神话巨兽的形象出现, 当时的认知

以想象为主,汉魏时期“鲸”字产生,官方开始系统记录,此时的认知已向现实过渡并初现政治象征意义,晋唐时期实地目击记载大量增加,鲸的认知趋于实证化,其生态特征及实用价值都得到初步挖掘,宋元时期鲸与民间生活联系更直接,此时的认知已显示出世俗化,明清时期鲸认知达到体系化、符号化的高峰,也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对鲸的认知。

以中国古代鲸认知为研究对象,从环境史的角度出发,以物象史视角将鲸纳入环境社会史框架,即可突破传统研究的种种局限,有效丰富环境史研究的维度,对同类自然物认知史研究具有示范意义。在新文化史的框架下,用深描、符号史等方法复原古人对鲸的感知世界,厘清其文化符号演变逻辑,也切实推进新文化史在自然物认知研究中的应用。在认知建构层面,系统考察鲸认知的演变过程,便能论证鲸认知是人与海洋互动的文化产物,并说明传统认知乃生存需求、文化传统、自然观察三者交互建构的结果。

中国古代鲸认知中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具有现实意义,就海洋保护而言,古人“敬畏自然、节制利用”的理念,以及以搁浅鲸为主要利用对象、不主动捕猎的具体做法,都可直接成为当代鲸类保护、海洋生态修复的极佳参照,也在提醒人们要坚持可持续发展,积极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环境观念建构而言,古人所推崇的人与自然共生的认知模式打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根本桎梏,对当代树立正确环境观、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乃至促使人类社会从“征服自然”转向“与自然共生”,都有极其重要的正面启发。

参考文献:

- [1] 彼得·伯克著、刘永华译:《法国史学革命——年鉴学派(1929-2014)》,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
- [2] 王丕烈著:《中国鲸类》,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2年。
- [3] 李志鹏著:《殷墟动物考古90年》,《中原文物》,2018年第5期,第90-100页;陈翔著:《动物与晚商王朝的权力秩序》,山东大学博士论文,2021年,第101页。
- [4] 庄周著、方勇译注:《庄子》,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 [5] 吴任臣撰、栾保群点校:《山海经广注》,北京:中华书局,2022年。
- [6] 洪兴祖著:《楚辞补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
- [7] 左丘明著、杜预注、孔颖达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5年。
- [8] 许慎著、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2015年。
- [9] 严可均等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
- [10] 班固著、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 [11] 崔豹著、牟华林校笺:《古今注》校笺,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
- [12] 房玄龄著:《晋书·明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
- [13] 萧统编:《昭明文选》,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1年。
- [14] 萧子显著:《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 [15] 欧阳修、宋祁著:《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
- [16] 刘恂著:《岭表录异》,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
- [17] 李昉等辑:《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
- [18] 丁度纂、浙江古籍出版社整理:《集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23年。
- [19] 中华书局编辑部:《全唐诗(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
- [20] 桓宽著、王利器注解:《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
- [21] 唐圭璋编:《全宋词》,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 [22] 洪迈著:《夷坚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
- [23] 潜说友著:《咸淳临安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 [24] 任昉著:《述异记》,长春:吉林出版社,2005年。
- [25] 李时珍著、刘山永编:《本草纲目》,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年。
- [26] 王圻、王思义著:《三才图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 [27] 聂璜著、戴启飞等译注:《海错图》,重庆:重庆出版社,2021年。
- [28] 胡震亨著:《海盐县图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

AI 赋能下的母语者书法教学创新研究——以汉语言文学专业 零基础本科生为对象

池程远

(芜湖学院 人文教育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要: 作为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 书法教学需完成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学生的技能培养、文化传承与审美提升等诸多使命, 传统的模式已难以适配需求, 而 AI 技术对书法教学的适配、反馈、场景呈现等优势, 为摆脱当前的困境提供了新路径。以某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 2023 级 32 名零基础本科生为对象, 结合 AI 应用场景, 探讨母语者书法教学的定位、困境与创新路径发现, AI 技术可通过阶梯式适配、实时反馈、场景化渗透等方式, 破解传统书法教学所遇到的学生基础薄弱、兴趣不足以及教学内容同质化等问题, 因此核心化、AI 赋能、多元评价三位一体的教学框架, 能够为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本科生的书法教学提质增效提供有力的学理与实践支撑。

关键词: 汉语言文学专业; 母语者书法教学; AI 赋能; 零基础本科生

基金项目: 安徽省质量工程项目: 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 AI 运用技能习得与应用能力培养的探索与实践 (2024jyxm0576); 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项目: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媒体传播与转化路径研究 (2023AH052445)。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1

An Innovative Study on AI-Enabled Calligraphy Teaching for Native Speakers: Taking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Zero Found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Chi Chengyuan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Education, Wuhu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basic course, calligraphy teaching undertakes multiple missions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s with zero foundation, including skill cultivation, cultural inheritance and aesthetic improvement.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l can no longer meet the current needs. However, the advantages of AI technology in calligraphy teaching adaptation, real-time feedback and scenario presentation provide a new approach to break through the current dilemma. Taking 32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zero calligraphy foundation from the 2023 cohor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in a university as research objects, this study combines AI application scenarios to explore the orientation, dilemmas and innovative paths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for native speakers. It is found that AI technology can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teaching, such as students' weak foundation, insufficient interest and homogeneous teaching content, through stepwise adaptation, real-time feedback and scenario-based infiltration. Therefore, a three-in-one teaching framework featuring core-oriented teaching, AI empowerment and diversified evaluation can provide stro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for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zero foundation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作者简介: 池程远 (1989—), 男, 安徽滁州人, 副教授, 文学博士, 研究方向为国际中文教育。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major; calligraphy teaching for native speakers; AI empowerment; undergraduate students with zero foundation

前言

汉语言文学专业作为当前中国高校专业设置中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其本科教学质量国家标准明确要求学生具有“坚定的政治方向”和“扎实的中国语言文字基础”^[1]。书法作为汉字的艺术化呈现形式，既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应具备的基础技能，也是其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媒介——通过笔墨实践，学生可深化对汉字源流、中国古代文学典籍、中华审美精神的认知。当前，全国大部分本科高校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已开设与书法相关的课程，但低年级本科生普遍存在诸如“识字，但不了解字理”“会写，但不容易写美”等问题。书法的零基础直接导致学生兴趣缺失、入门困难，过去传统的课堂书法教学模式已难以满足当前时代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素质培养的精细化需求。而数智化时代，生成式人工智能（Generative AI）引擎、AI 图像识别、虚拟仿真（Virtual Simulation）等技术的发展，为零基础书法教学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AI 技术具备的阶梯式教学、实时化反馈、场景化浸润等优势，与汉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本科生书法学习的“零基础入门、体系化训练、重文化关联”等特点高度契合。探讨 AI 赋能下的母语者书法教学创新，既是汉语言文学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时代命题。国内学界对母语者书法教学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基础教育阶段，针对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专项研究相对薄弱。就目前而言，在高等教育阶段，AI 技术多应用于文学典籍数字化、文字学研究等领域，尚未系统融入书法教学过程。就未来发展趋势而言，AI 赋能下，适配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本科生的书法教学应聚焦三个方向：一是入门阶段的阶梯式技能训练，二是与文学相关的文化场景浸润，三是基于差异需求的个性化书法学习路径生成。这些技术应用与汉语言文学专业技能与文化并重的培养目标高度契合，为书法教学革新提供了有效手段。

本文拟采用“理论梳理——实证分析——创新建构”的研究路径：首先，基于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的培养要求与零基础本科生的学习特点，明确母语者书法教学的核心定位与传统困境；其

次，结合 AI 赋能下教学技术的特性，分析其在零基础书法教学中的适配场景与赋能机制；最后，以某高校 32 名低年级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教学实践为基础，构建“AI 赋能下的技能与文化”教学模式。其中，本文实证数据来源于对 32 名零基础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生的一学期跟踪调查、课堂观察记录与作品分析。

一、母语者书法教学的定位重构与传统困境

（一）汉语言文学专业背景下的教学定位

首先，书法教学应作为专业基础技能的核心载体。汉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本科生的书法教学，首要定位是“筑牢专业基础技能”。与基础教育阶段书法教学的“品格培育”以及国际中文教育中对外书法教学的“文化体验”不同，母语者书法教学要求学生掌握规范的执笔、运笔、结构规律，具备楷书、行书等基础书体的书写能力——这不仅是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阅读典籍、书写文稿的必然需要，也是未来从事教育、文化传播等工作的必备素养。有研究显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岗位集中在行政管理岗位、学术研究岗位、专业技术岗位、文化艺术及体育岗位这四类岗位^[2]，而这些岗位对书法技能均有不同程度的要求。就当前高校书法教学实践而言，受制于课程设置、师资水平等因素^[3]，汉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本科生大多缺乏系统训练，零基础入门，故而导致技能断层，因此亟需通过阶梯式教学，尽快实现从“能写”“会写”到“写好”的跨越。其次，书法教学应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与传承的重要途径。事实上，书法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核心课程如《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等存在着“强关联”，例如书法与古文字学在学术理路上具有内在互通性，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可广泛应用于书法篆刻的理论研究、创作实践与教育教学之中^[4]，书法作品的文学内涵与古代文学史课程亦能相互印证，甚至对于古籍文献的推广，也能起到重要的作用，如香港城市大学邵逸夫图书馆就以馆藏古籍资源为依托，以学生志愿者组建的书法社团为载体，通过服务学习视角下的信息素养综合实践活动，借助书法艺术创作活化古籍文献，将邵逸夫图书馆所藏古

籍引入校园公共视野,在传承书法艺术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古籍资源的利用价值与传播效能。^[5]因此,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本科生的书法教学,应定位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与传承的重要途径,通过解读书法作品中的文学典故、临摹具有代表性的古代碑帖,来实现文化认知与书写技能的双重提升。最后,书法教学应作为审美能力提升的关键抓手。汉语言文学专业对学生的审美素养有着明确的要求^[6],而书法作为一种“线条的艺术”,是审美训练的合适载体。零基础本科生的书法教学,需要引导学生通过笔画书写的粗细、书法结构的疏密、作品章法的布局来提高其对汉字美的敏感度。这种审美能力一旦得到提升,不仅适用于书法创作,更能迁移至古典文学作品赏析、汉字文化解读等专业学习中,形成“书写审美”到“文学审美”再到“文化审美”的递进式培养路径。

(二) 传统母语者书法教学的现实困境

当前,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传统书法课程普遍存在着“泛化”问题:多数高校将其纳入面向全校的公共基础课程《大学语文》的实践模块或传统文化通识课程中,不仅内容较少,而且实践或训练体量也相对较小,并未体现出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色与需求。即使是对书法素养要求较高的高师中文专业,其书法教学课程也远未能达到使学生具备“深厚的文字学知识、熟练的书写能力、较高的书法教学能力和比较全面的书法文化功底”^[7]之目标。此外,教学内容多聚焦于基础笔画与临摹训练,与《古代汉语》《中国文学史》等核心课程缺乏互动与关联,导致学生将书法视为“独立于专业之外的附加技能”,无法全面地理解书法艺术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联。因此,书法教学的模糊定位成为制约教学效果的核心因素。此外,书法教学还存在方法同质化,忽视零基础特点的问题。2015年,书法作为必修课程才正式走进全国中小学的课堂,且受制于书法教育人才的稀少,多数中小学书法课程并未能真正落到实处。^[8]因此,长时间以来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低年级本科生几乎都为零基础。就目前而言,传统的书法教学仍较多采用“一刀切”的模式:教师统一示范、学生统一临摹、以书写结果作为统一评价标准。这种模式未能充分考虑到零基础学生的领悟力、协调性和兴趣点,故而教学效果有限,这也直接导致学生的书法技能训练与专业知识脱节,浸润效果不足。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书法教学,本应具

备天然的文化关联优势,但在实际教学中,这种优势却很难显现。学生将精力完全用在“如何写”上,但不知“为何写”——如练习《兰亭集序》,却不能深入了解王羲之这篇序文的文学价值。这种技能与文化割裂、剥离的教学模式,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持续的学习动力和知识与技能的凝合力,也违背了汉语言文学专业素养培养的核心目标。更要指出的是,零基础书法学习的关键在于及时纠错,但传统的书法教学中,教师难以兼顾所有学生,当学生的握笔错误、运笔偏差等问题因无法及时发现而固化之后,便难以矫正。滞后的书法教学反馈机制会严重影响学生的学习效率与自信心。

二、AI 赋能母语者书法教学的机制与场景

在数智时代的信息技术条件下,书法教学事实上已经具有了远不同于过去传统常规教学的现状,虽然不少新技术尚未应用于全部教学场景,但至少在现实操作层面,针对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本科生的书法课程教学已经完全没有了技术壁垒,从机制与应用场景上,都有了现实技术的有力支撑。

(一) AI 技术针对母语者书法教学的核心赋能机制

制

首先是书法教学的阶梯式适配。可通过前期测评,利用 AI 技术将学生划分为基础薄弱、领悟力较强及兴趣驱动等不同类型,针对性推送学习内容:针对基础薄弱学生,主要聚焦握笔、运笔等基本功的分解训练;针对领悟力较强的学生,主要增加书写结构规律与简单章法训练;对受到兴趣强烈驱动的学生,推送与汉语言文学自身专业相关的碑帖文化内容。这种从零起步但能够体现进阶梯度的适配机制,极强地契合了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学生的书法学习特点。其次是书法教学的实时反馈机制。通过智能手机等简单易得的工具,利用 AI 视觉识别技术相关软件,实时捕捉学生的书写动作与作品,与标准的书法作品模型进行比对,在握笔、运笔、结构安排等环节发现问题并实行及时反馈。反馈形式主要包括文字说明、语音指导、动作示范等,避免因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而形成的固化。最后是书法教学的场景化浸润机制。当前实际技术条件下,AI 工具能够轻松整合全网可见的书法作品影像、文学典籍等资源,因此在书法教学的实践中,我们已能够

构建与汉语言文学专业关联的虚拟场景,例如,通过VR技术还原“兰亭雅集”现场,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与理解《兰亭集序》的创作背景;利用简单训练后的AI模型,在临摹某一碑帖时,同接受其推送的相关文学作品、历史典故、学术研究成果等,实现书法与文学、文化的深度关联。

(二) AI技术在母语者书法教学中的具体应用场

景

在入门阶段,可利用AI技术进行基础技能的阶梯式训练。针对零基础学生的特点,利用AI工具设计“三阶入门训练”:第一阶段为握笔与笔画训练,约4周,通过AI技术中的动态演示等,帮助学生掌握正确姿势与基本笔画的起、行、收;第二阶段为结构训练,约8周,利用AI工具生成个性化字帖,针对学生书写中上下结构重心不稳以及左右结构比例失衡等易错结构问题进行强化练习;第三阶段为简单的章法训练,约4周,结合诗词创作,练习条幅、斗方等基本形制。此外,可开展个性化指导与文化相关联的书法课堂教学,并采用教师主导与AI辅助的模式。以2节共90分钟的标准课时教学为例,前30分钟,可利用AI系统,根据学生前一阶段的学习数据,推送个性化复习内容与新知识点演示;中间40分钟,学生进行实操练习,利用AI工具实现实时反馈^[9],教师针对共性问题进行集中讲解,对个性问题进行个别指导;后20分钟,通过AI整合网络资源或自主生成的虚拟场景进行文化浸润,例如观看颜真卿创作《祭侄文稿》的历史场景,结合中国文学史课程的相关内容解读其忠义精神。在课后练习方面,可采用智能批改与专业拓展相结合的方式,主要涵盖笔画、结构、章法等指标及碑帖背景、文学内涵等。同时,推送与专业相关的拓展资源,如书法史与文学史的联系、典籍中的书法题跋赏析等,强化书法教学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关联性。需要特别重视的是,在汉语言文学的核心课程教学中,应树立整体观念,将汉语言文学专业核心课程与书法教学建立资源关联,例如在中国文学史课程讲解“唐诗”“宋词”知识点时,可推送相关诗词的书法作品。这种跨课程资源整合,不仅能够使书法教学成为专业课程学习的有力辅助工具,也能促使专业课程成为书法文化的延伸课堂,实现双赢。

三、实证研究:AI赋能下的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

础本科生书法教学实践

为切实检验AI技术在书法教学中的实际应用效果,着力解决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本科生在书法学习中面临的入门难、进步慢、反馈滞后等现实问题,本研究也进行了针对性的教学实践尝试,主要以可操作化、科学化为原则,围绕教学对象、实施流程、技术应用等环节展开了初步实践。

(一) 研究对象与实施过程

本研究以某综合类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2023级32名本科生为对象,均为入学前未接受过系统书法训练的零书法基础学生。其中,男生8名、女生24名,教学实践为期一学期(16周),每周2课时(90分钟),采用教师传统教学与AI辅助教学的混合模式,具体实施过程如下:第一,前期准备阶段,进行书法基础测评与学生个性画像构建。通过AI测评系统,对学生进行书法基础能力测评,内容包括手部协调能力、空间感知能力、文学知识储备等,结合问卷调查收集学习兴趣、专业规划等信息。结果显示:20名学生手部协调能力较差,基础薄弱;8名学生领悟力较强;4名学生对传统文化兴趣浓厚。基于测评结果,借助AI系统生成了个性化学习方案与阶梯式教学目标。第二,教学实施阶段,主要进行三阶混合教学。第一阶段(1-4周)为筑基阶段,该阶段核心目标为掌握正确握笔姿势与8种基本笔画。利用AI工具,实时矫正姿势并动态演示笔画书写过程,学生通过触控屏进行模拟练习,系统即时反馈。教师每周进行1次集中示范,重点解决共性问题。第二阶段(5-12周)为学习结构规律阶段,该阶段核心目标为掌握楷书基本结构规律并能够书写简单的汉字与词语。依托AI系统,生成个性化字帖,针对学生易错结构进行强化训练,通过图像比对,标注需要改进之处。此外,在教学中还结合了古代汉语“六书”理论,教师对汉字结构与造字法的关联亦进行了简单的讲解。第三阶段(13-16周)为技能融入文化阶段,该阶段核心目标为能书写简单诗词作品,理解碑帖的文学与文化内涵。通过AI系统推送与中国文学史课程相关的碑帖,利用VR场景还原创作背景,学生在临摹书法作品的同时研读文学文本。学生需完成融入文化内容的书法书写作业,例如为唐诗创作书法作品并撰写赏析短文。第三,效果评估阶段,主要采用技能、文化、兴趣三重维度相结

合的方式。评估方式既注重量化,也包含质性:量化指标包括AI系统生成的书法技能如笔画、结构、章法等评分、课堂练习时长、课后作业完成质量;质性指标包括学生的学习日志、访谈记录、专业关联认知变化。同时,还设置未使用AI技术的30名同年级本科生作为实验对照组,进行效果对比。

(二) 实践结果与分析

实践后发现,学生的书法技能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AI系统数据显示,实验组学生的平均技能评分从学期初零基础水平时的35分提升至学期末的78分,其中笔画规范性的正确率从28%升至82%,结构合理性正确率从32%升至79%;对照组学生平均评分从33分提升至61分,实验组提升幅度显著高于对照组。访谈显示,实验组学生均认为AI系统的实时反馈能够有效帮助快速纠正错误,并认为这种阶梯式训练让书法入门不再困难,充分印证了AI赋能书法教学的有效性。此外,学生对书法与本专业的关联认知进一步深化。实验组学生的文化关联认知有了明显的提升,期末测评中,有29人能准确阐述至少2个碑帖与中国古代文学专业课程的关联,较学期初增加26人;27人能结合古代汉语知识分析汉字结构与造字法的关系,而对照组则只有12人。学生课终反馈表示,AI系统推送的文化场景让自己时刻意识到书法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知识紧密相关。最重要的是,学生对书法学习的兴趣与自主性增强。问卷调查显示,实验组学生的学习兴趣评分从期初到期末有着显著的提高,且课后主动练习意愿强烈,AI平台的拓展资源得到有效利用;对照组学生兴趣评分变化不大,课后练习意愿一般。而AI系统的游戏化设计^[10]、个性化内容推送、实时反馈是提升实验组学生书法学习兴趣的核心因素,有效解决了零基础学生书法学习的“入门难、兴趣低”问题。

(三) 实践反思与改进

实践发现,AI技术在针对零基础学生的书法教学上具有明显优势。AI辅助教学能够有效解决传统书法教学的四大难题:一,利用阶梯式教学针对性地个别指导,使零基础学生逐步建立信心;二,通过实时的教学反馈及时纠错,避免学生错误的固化;三,通过书法与汉语言文学专业相关提升学生兴趣,有效建立书法与专业学习的内在联系;四,通过AI系统生成的学习方案,对学

生进行个性化指导,适配不同学生的学习节奏。同时,我们也发现,AI技术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仍存在一定不足,需要不断优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一,部分学生过度依赖AI反馈,缺乏独立思考与自主审美判断;二,AI工具对书法审美的评价仍依赖于固有算法,较为机械,难以替代教师具有人性温度的真实指导;三,虚拟的文化场景浸润无法完全替代真实的文化体验,例如与书法家面对面交流、参观书法展览所带来的个人审美体验是虚拟空间无法替代的。这表明,AI是辅助工具,教师的专业引领、文化阐释与情感互动仍是核心。未来可从三方面优化:一,课堂教学中加大AI与教师协同指导模式的比重,在课堂中强化教师的文化讲解与审美引导;二,在AI主导的评价体系中增加审美的维度,引导学生在规范书写的基础上注重更深层次的书法审美表达;三是整合线下资源,组织AI技术辅助下的碑帖临摹展、书法与文学融合创作等活动,实现线上线下的高效联动。

四、AI赋能下以汉语言文学零基础本科生为对象的书法教学发展路径探讨

(一) 要着力构建“三位一体”的教学体系

首先,要明确书法课程的核心化、靶向化定位。书法课程应明确为汉语言文学专业低年级核心基础课,单独制定教学大纲与评价标准。书法课程内容应靶向性地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色:基础阶段主要以书法技能培养为主,并同时辅以文字学基础内容的教学,与古代汉语课程衔接;提升阶段主要以碑帖赏析等文化教学为主,并注重与古代文学等相关内容的联系,与中国文学史课程衔接;拓展部分要鼓励书法创作,注重审美素养的培养。有学者就指出,临摹经典、自书诗文、创意拓展等均为书法学习与展示的主要维度,不仅能够积极地落实立德树人的理念,也能够为学生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可能。^[5]其次,书法课程要充分利用AI技术辅助,但教师仍要占据主导地位。应构建一种AI在线上筑牢书法根基、教师在线下及时指导纠错的混合教学模式,如学生可以在线上通过AI的指导与帮助,完成笔画、结构的基础训练,再参与线下教师讲解碑帖的文学内涵、高水平书写示范、组织学生间的作品互评等。最后,要建立多元化的评价体系。不仅要依托AI系统的规范性与标准性,对笔画、结构、章法等

技能规范进行量化评分,还要让教师要从学生对书法与文化的理解与认知、书法审美感悟、学习态度等方面进行质性评价,学生自身也要反思、自评。在多元化评价体系下得出的评价结果,要纳入专业素养考核,从而实现汉语言文学专业学生既有书法技能提升,也有深入的文化浸润之培养目标。

(二) 要加强推进教学资源数字化建设

首先是要开发专业化 AI 适配的书法教材。联合书法专家、汉语言文学专业教师、AI 技术人员,共同开发书法课程的适配型 AI 教材。教材应具有阶梯性,从零基础到进阶提升,覆盖低年级学习需求,还要具备专业性,融入文字学、古代文学史、传统文化等知识,体现汉语言文学专业的特色。其次是要构建专业适配型教学平台,整合优质资源,构建汉语言文学专业书法教学 AI 平台,平台应包括基础训练模块,如姿势矫正、笔画分解、字帖临摹等,还要具有专业关联与文化浸润模块,如字体演变与文字学关联知识、碑帖与文学史课程关联知识,书法史与文学史同步讲解,VR 模拟还原碑帖创作场景等等。

(三) 要加强师资队伍专业化培养

首先要优化师资能力结构。一方面,要敦促书法专业教师加快转变教育理念,树立主动发展的意识,积极关注新事物、学习新技术,主动应对当前书法教育面临的瓶颈,并从教学主体出发,设计形式新颖、趣味盎然的书法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要加快书法专业教师应用 AI 技术的准备,主动接纳新兴媒介与技术,熟练运用并合理借助当下流行 AI 技术平台,充分把握信息、时间、知识“碎片化”的时代特征,将书法教学内容与之有机融合起来,例如,通过 AI 技术,制作并发布涵盖书法历史、文化内涵与书写技法等内容的优质短视频,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借助虚拟现实交互技术,实现汉字书法的沉浸式、跨空间学习体验。其次,要建立书法教学研究机制。一方面,以设立专项课题的形式,鼓励书法专业教师开展 AI 赋能书法教学相关研究。另一方面,尽可能搭建校际交流平台,组织书法教学研讨会、示范课观摩等活动,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与研究成果,提升书法课程整体教学水平。

五、结论与展望

书法教育是历史文脉的延续与积淀,是中华民族集体记忆的文化载体,也是民族深层文化心理的内化与凝练,它蕴含着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本质逻辑,能够增强文化认同,提升中华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1],因此,针对零基础母语者的书法教学尤显重要,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本科生的书法教学更是传统文化传承与专业素养培养的核心环节。AI 技术的赋能,为破解传统书法教学中的入门难、兴趣低、反馈弱等问题提供了系统且有效解决方案。本文通过对汉语言文学专业书法零基础本科生的实证研究,表明 AI 赋能不仅能显著提升汉语言文学专业零基础学生的书法技能,更能深化其专业关联认知与学习兴趣,实现书法技能提升、传统文化传承、审美能力培养等多重目标。同时,也必须清楚地认识到,AI 技术是课程教学的有效辅助,远不能替代教师的专业引领、文化阐释与人文关怀。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上)[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85.
- [2] 马晓琳.“就业难”现象的微观解释:课程体系和岗位需求的就业力匹配度——以五所综合性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为例[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8,39(04):205-210.
- [3] 傅振余.高等院校书法教育教学浅谈[J].中国高等教育,2022,(Z1):70-71+80.
- [4] 徐舒桐.论学科建设背景下书法学对古文字学的浸润[J].美术观察,2025,(11):127-131.
- [5] 景祥祜,王玮乐,肖寒月.服务学习:以书法艺术活化古籍的文化教育实践[J].大学图书馆学报,2023,41(04):36-42+21.
- [6] 潘涌.高师汉语言文学本科专业学科能力标准研究[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01):117-125.
- [7] 张学鹏.高师中文专业书法教学与中小学书法教学对接问题研究[J].中国书法,2016,(24):65-67.
- [8] 李逸峰.论当前中小学书法教学中的三对关系[J].课程.教材.教法,2018,38(06):59-64.
- [9] 马雨晴,宋春晓,许明月,等.结合智能评测系统应用的师范生硬笔书法教学方案设计[J].现代教育技术,2018,28(12):101-107.
- [10] 李杜,郎劲松.书法与游戏相结合的可行性与现实性的研究[J].传媒,2023,(04):74-77.
- [11] 郭世杰,刘明.书法教育赋能中华文化认同的路径研究[J].民族教育研究,2024,35(03):152-159.

试论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的社会工作介入

秦嘉琪¹ 陈涵涵¹ 黄钰玲¹ 宋方港¹ 倪宸好¹ 袁伊尔¹

(1.温州大学 教育学院,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唇腭裂作为最常见的先天性面部畸形之一, 对儿童的生理健康、心理发展及社会适应造成深远影响。本文从生态系统理论视角出发, 分析我国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现状与面临的多重困境, 梳理国家相关政策指南, 探讨社会工作在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中的专业介入路径。研究提出从医疗康复、心理支持、家庭赋能、社会融入四个维度构建社会工作服务体系,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具体的实践方略, 为唇腭裂儿童的全面康复与社会融入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指导。

关键词:唇腭裂儿童; 生存系统重建; 社会工作介入

基金项目:温州大学 2025 年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立项 (JWXC2025040)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2

Discussion 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in Surviv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for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Qin Jiaqi¹, Chen Hanhan¹, Huang Yuling¹, Song Fanggang¹, Ni Chenhao¹, Yuan Yier¹

¹ School of Education, Wenzhou University, Wenzhou, Zhejiang,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ost common congenital facial deformities, cleft lip and palate significantly impacts children's physical health,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social adaptation. This study employs ecosystem theory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urvival status and multifaceted challenges faced by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in China, reviews national policy guidelines, and explores professional intervention pathways for social work in rebuilding their survival systems. The research proposes establishing a social work service framework through four dimensions: medical rehabilitation, psychological support, family empowerment, and social integration. Specific practical strategies are develop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omprehensive rehabilitation and social reintegration of affected children.

Keywords: Children with cleft lip and palate; Survival system reconstruction; Social work intervention

作者简介: 秦嘉琪(2006—), 女, 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心理学;
陈涵涵(2005—), 女, 学前教育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教育;
黄钰玲(2005—), 女, 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心理学;
宋方港(2004—), 男, 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特殊儿童心理学;
倪宸好(2004—), 女, 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袁伊尔(2005—), 女, 小学教育专业本科生, 研究方向为小学教育。

通讯作者: 袁伊尔

唇腭裂 (Cleft Lip and Palate, CLP) 是一种常见的先天性颅颌面畸形, 表现为上唇、腭部或两者同时存在裂隙。世界卫生组织 (WHO) 统计, 全球每 700 名新生儿中就有 1 名患有唇腭裂 (WHO, 2022)。我国唇腭裂的发生率约为 1.62‰, 每年新增病例约 2.5 万例, 累计存量患者超过 200 万人 (中华口腔医学会, 2021)。这一庞大的患病群体面临着生理功能障碍、心理发展受阻、社会适应困难等多重挑战, 其生存系统的重建需要医疗、心理、社会等多学科的协同介入。

生存系统重建 (Survival System

一、我国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现状与现实困境

(一) 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现状

根据《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 (2021)》数据显示, 唇腭裂在我国新生儿出生缺陷中排名第三位, 占有出生缺陷的 12.6%。从地域分布来看, 我国西部地区唇腭裂发生率显著高于东部地区, 农村地区高于城市地区, 这与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资源可及性、孕期保健意识等因素密切相关 (张志愿等, 2020)。中国唇腭裂防治联盟在 2022 我国唇腭裂儿童呈现出明显的“存量高、增量持续”特征。据统计, 我国现有 0-14 岁唇腭裂儿童约 50 万人, 其中约 30% 因家庭经济困难未能接受规范治疗。未治疗的唇腭裂儿童在喂养、语言、听力等方面存在严重障碍, 其 5 年生存率相较正常儿童低 15%-20% (Lietal 等, 2021), 一系列数据反映出唇腭裂问题对我国儿童健康状况的严重影响。

(二) 多维度的生存困境

1. 生理功能障碍

唇腭裂儿童在出生后即面临喂养困难, 由于口腔结构异常, 吮吸功能受损, 约 60% 的患儿存在营养不良问题 (Shkoukani 等, 2013)。随着生长发育, 患儿还可能出现听力障碍、语音不清、牙齿畸形等并发症。研究表明, 未经治疗的唇腭裂儿童中, 约 85% 存在不同程度的语音障碍, 70% 伴有分泌性中耳炎 (马莲等, 2019)。

2. 心理发展受阻

唇腭裂儿童从婴幼儿期开始就面临外观差异带来的心理压力。3-5 岁是儿童自我概念形成的关

键期, 而此阶段正是唇腭裂儿童接受首次手术的高峰期, 手术创伤与外观改变对其心理发展产生深刻影响 (Murray 等, 2010)。国内研究显示, 唇腭裂儿童的心理问题检出率高达 38.5%, 显著高于普通儿童群体的 15.2% (刘进忠等, 2018)。

Reconstruction) 是指针对处于困境中的个体或群体, 通过整合多方资源、修复支持网络、提升主体能力, 帮助其重新建立适应社会生活的完整功能系统的过程 (王思斌, 2019)。对于唇腭裂儿童而言, 生存系统重建不仅包括生理结构的修复, 更涵盖心理健康的维护、家庭功能的恢复以及社会关系的多维重建。社会工作作为一门以“助人自助”为核心价值的专业, 以行动为导向, 可以在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系统重建中发挥独特的专业优势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3. 家庭系统失衡

唇腭裂儿童的出生往往给家庭带来巨大冲击。首先, 完整的唇腭裂序列治疗需要从新生儿期持续到成年期, 经历多次手术和辅助治疗, 治疗程序较为复杂, 时间和经济负担难以计算 (陈宇翔等, 2021)。其次, 部分家长将孩子的缺陷归咎于自身, 产生强烈的内疚感和自责情绪造成家庭关系紧张。此外, 由于唇腭裂儿童需要特殊的喂养方式和长期的医疗随访, 照护压力沉重, 家长 (通常是母亲) 不得不减少工作或放弃职业发展。

4. 社会融入困难

唇腭裂儿童在社会融入中面临着多方面的阻碍。教育方面,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曾报告, 部分学校以“影响其他学生”为由拒绝接收唇腭裂儿童, 或将其安排在特殊座位, 造成隐性排斥。就业方面, 成年唇腭裂患者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外貌歧视的比例高达 67% (王国民等, 2019)。社会交往方面, 由于长期遭受负面评价, 唇腭裂患者往往形成社交回避行为, 导致其难以建立深厚的友谊关系。同时, 公众对唇腭裂的认知不足, 使得患者在与他人互动时容易遭遇误解或不友善的态度, 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孤立感。这种回避行为不仅影响了患者的日常生活质量, 也对其心理健康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

二、国家政策与社会工作介入视角

(一) 唇腭裂儿童相关的国家支持政策

随着我国对医疗卫生事业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一系列惠及唇腭裂儿童的政策相继出台,为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系统重建提供了制度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提高先天性畸形救治水平。《关于开展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工作的通知》将唇腭裂纳入救助范围,为贫困患儿提供医疗费用补助。2021年,国家医保局将唇腭裂修复术等治疗项目纳入医保支付范围,报销比例达到70%以上。在康复服务方面,《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办法》规定为0-6岁残疾儿童提供基本康复服务,包括手术、辅助器具配置、康复训练等。2022年,中国残联启动“唇腭裂儿童康复救助专项行动”,计划三年内为10万名唇腭裂儿童提供免费或补贴治疗。除此之外在社会福利方面,《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将因残致困儿童纳入保障范围,提供基本生活、医疗、教育等全方位保障。《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修订进一步强化了对特殊儿童群体的权益保护,明确了家庭、学校、社会和政府的责任分工,为唇腭裂儿童的社会融入提供了法律支持,为唇腭裂儿童的社会接纳和心理康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 社会工作介入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的

理论视角

上述政策为社会工作介入唇腭裂儿童服务提供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当前,我国社会工作在儿童福利领域的发展方向主要体现在从单一服务向综合服务转型、从个体干预向系统干预拓展、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预防延伸三个方面。本研究以生态系统理论、优势视角理论和社会支持理论作为理论基础。其中,生态系统理论由布朗芬布伦纳提出,强调个体发展嵌套于相互影响的一系列环境系统之中,为社会工作理解唇腭裂儿童的生存困境提供了整体视角,即儿童的问题不仅源于个体缺陷,更与家庭、医疗、教育、社会文化等环境因素密切相关。而优势视角主张关注服务对象的优势和资源,并非问题和缺陷,社会工作者应帮助儿童及家庭发现自身的抗逆力、社会支持网络等积极因素,增强其应对困境的信心和能力(Saleebey,2006)。社会支持理论则认为个体的心理健康和社会适应与其获得的社会支持密切相关,正式支持与非正式支持的整合是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的关键(House,1981)。因此,社

会工作对唇腭裂儿童的介入应涵盖微观、中观、外观、宏观四个系统层次。微观系统层面直接服务唇腭裂儿童及其家庭,提供心理支持、照护指导、资源链接等服务;中观系统层面协调医疗、教育、民政等部门,促进跨专业合作,确保服务的连续性和一致性;外观系统层面关注影响儿童发展的外部社会环境,如家长的工作环境、医疗政策执行等;宏观系统层面参与政策倡导,推动唇腭裂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营造包容友好的社会氛围。

三、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的社会工作实践方

法

整合上述理论,社会工作对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的重建应从医疗康复、心理支持、家庭赋能、社会融入四个维度展开,并在建设服务网络、专业协作机制、开发服务工具、资源整合机制和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系统推进具体实践。

(一) 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级服务网络

构建“医院-社区-家庭”三级服务网络是社会工作介入的基础架构。在医院层面,应在唇腭裂治疗定点医院设立专职医务社会工作岗位,嵌入序列治疗团队提供全程服务。社会工作者在患儿入院24小时内完成首次评估,内容涵盖儿童基本情况、家庭状况、社会支持情况和心理社会需求,并建立标准化服务档案。作为患儿家庭与医疗团队的沟通桥梁,社会工作者协助家长理解治疗方案、签署知情同意书,并为经济困难家庭申请先天性结构畸形救助项目、医保报销和慈善基金。术前通过医疗游戏帮助儿童熟悉手术流程以降低焦虑,术后运用叙事疗法帮助儿童整合手术体验,同时建立家长等候室支持小组提供情感支持。出院时制定个性化计划,并通过定期随访及时发现和解决治疗障碍。

社区层面的服务点依托街道社会工作服务站和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站建立,将专业服务延伸至儿童和家庭的生活场景。社会工作者每季度进行入户探访,运用需求层次评估工具识别家庭在各层面的需求。联合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为家长提供语音训练辅助、口腔功能锻炼等康复指导,采用示范练习反馈的教学模式确保家长掌握照护技能。开展社区心理健康服务和融合活动,为唇腭裂儿童创造与普通儿童互动的机会。建立24小时服务热线和紧急援助基金,对突发危机进行及时响应。

针对重度困境家庭,探索家庭社工服务模式,每周进行密集家访,运用家庭生态图等工具评估家庭系统,与家庭成员共同制定赋能计划,培育家长同伴支持者实现从受助到互助的转变。

(二) 构建跨专业协作机制

构建跨专业协作机制需要整合医疗、教育、心理和社会服务等多领域资源,形成多方联动的服务模式。社会工作者在其中扮演协调者角色,通过定期召开跨专业团队会议,明确各专业领域的职责分工与合作流程,确保服务的连贯性与高效性。在医疗康复阶段,社会工作者需与外科医生、语言治疗师和康复治疗师密切配合,制定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并监督实施效果。同时,教育系统的介入也不可或缺,社会工作者应联合学校教师和心理咨询师,为唇腭裂儿童提供适应性教育支持,帮助其克服学习障碍并融入校园生活。此外,社区资源的引入能够进一步强化协作机制,通过链接志愿者组织、公益机构和企业赞助,为唇腭裂儿童及其家庭提供更多元的支持网络。这种跨专业的深度合作不仅提升了服务质量,还促进了各领域间的知识共享与经验交流,从而为唇腭裂儿童的全面康复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三) 开发专业化服务工具

针对唇腭裂儿童的特殊需求,设计科学、实用的服务工具能够有效支持社会工作者的专业实践。例如,开发一套标准化的心理评估量表,用于全面了解唇腭裂儿童的心理状态和适应能力,为制定个性化干预方案提供依据。同时,可以设计一系列互动式康复训练手册,结合图文并茂的形式,帮助家长和儿童更好地掌握语音训练、口腔功能锻炼等技能。此外,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移动端应用程序,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康复进度追踪以及家庭支持资源对接等功能,进一步增强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这些专业工具的开发不仅能够提高服务效率,还能确保干预措施的科学性和针对性,从而更好地满足唇腭裂儿童及其家庭的实际需求。

(四) 加强政策倡导与资源整合

社会工作者在政策倡导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社会工作者可以定期开展需求调研,形成政策建议报告提交相关部门向政府部门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推动唇腭裂防治相关政策的完善。同时,社会工作者还应积极参与资源整合工作,搭建信

息共享平台,将医疗资源、教育资源、社会福利资源等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合力。通过与慈善机构、企业基金会等合作,拓宽资金来源渠道,为唇腭裂儿童提供更全面的支持。此外,还可以推动建立区域性唇腭裂诊疗中心,集中优质医疗资源,提升治疗水平,让患儿能够就近获得高质量的医疗服务。这些努力不仅有助于优化现有的政策环境,也能为唇腭裂儿童创造更加友好的社会支持体系。

(五) 建立质量保障与可持续发展机制

为确保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工作的长效推进,建立质量保障与可持续发展机制尤为重要。首先,应制定科学的服务质量评估标准,涵盖医疗康复、心理支持、家庭赋能和社会融入等多个维度,通过定期监测和评估服务效果,及时发现并解决存在的问题。其次,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对服务项目进行独立审核,确保服务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此外,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通过持续的专业培训和督导,提升社会工作者及其他相关从业人员的专业能力和服务水平。在资金保障方面,探索多元化的筹资模式,包括政府拨款、社会捐赠和国际合作等,确保项目的稳定运行。同时,注重信息化建设,利用大数据技术对服务数据进行分析和管理,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服务效率。通过建立反馈机制,鼓励服务对象及其家属参与服务质量监督,形成良性互动,从而推动唇腭裂儿童生存系统重建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论

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系统重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医疗、心理、社会等多学科的协同努力,更需要政策、资源、服务的系统整合。社会工作以其独特的价值理念、理论视角和专业方法,在唇腭裂儿童的生存系统重建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从生态系统理论出发,构建涵盖医疗康复、心理支持、家庭赋能、社会融入四个维度的社会工作服务体系,并详细阐述了服务网络建设、专业协作机制、服务工具开发、资源整合机制和质量保障体系等实践方略。这些方法立足于我国本土化实际,借鉴国际实践经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推广价值。

正如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所宣示的,每个儿童均有权享有足以促进其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的生活水平。唇腭裂儿童能在生命的早期获得及时规范的医疗救治,唇腭裂家庭

能在困境中获得专业温暖的社会支持,唇腭裂儿童能在阳光下自信成长,拥有平等有尊严的人生。这不仅是社会工作专业的使命追求,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中华口腔医学会.中国唇腭裂防治白皮书[R].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1.
-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中国出生缺陷防治报告(2021)[R].北京,2021.
- [3] 张志愿,石冰,马莲.唇腭裂序列治疗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20:45-78.
- [4] 王思斌.社会工作概论(第3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156-189.
- [5] 刘进忠,李刚,王国民.唇腭裂儿童心理行为特征及干预研究[J].中华口腔医学杂志,2018,53(6):412-416.
- [6] 陈宇翔,黄群,闫怡轩,等.先天性唇腭裂三级综合防治及规范化序列治疗指引[J].中华口腔医学研究杂志,2021,15(4):193-197.
- [7] 王国民,马莲,石冰.成年唇腭裂患者社会适应状况调查研究[J].中华整形外科杂志,2019,35(5):456-460.
- [8]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EB/OL].(2016-10-25)[2025-07-30].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6/content_5133024.htm.
- [9]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困境儿童福利保障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25〕18号[A/OL].(2025-05-07)[2025-09-27].https://www.gov.cn/gongbao/2025/issue_12066/202505/content_7025477.html.
- [10] 国务院关于建立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EB/OL].(2018-07-10)[2023-09-23].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8-07/10/content_5305296.htm.
- [11] BRONFENBRENNER U.The ecology of human development:Experiments by nature and design[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9.
- [12]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Birth defects:Cleft lip and palate[EB/OL].(2022-03-15)[2023-10-01].
- [13] LI Q,WU J,MA L,et al.Prevalence and treatment outcomes of cleft lip and palate in China: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J].The Lancet Regional Health-Western Pacific,2021,12:100-115.
- [14] SHKOUKANI M A,CHEN M, VONG A.Cleft lip:A comprehensive review[J].Frontiers in Pediatrics,2013,1:53.
- [15] MURRAY L,ARTECHE A,BOVINGDON L,et al.The effect of cleft lip and palate on the mother-infant relationship[J].Child:Care,Health and Development,2010,36(1):33-42.
- [16] SALEEBEY D.The strengths perspective in social work practice[M].5th ed. Boston:Pearson,2006.
- [17] HOUSE J S.Work stress and social support[M].Reading,MA:Addison-Wesley,1981.
- [18] 王思斌.社会工作在健康中国建设中的作用与路径[J].社会工作,2020(1):3-12.
- [19]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权利公约[EB/OL].(2019-04-30)[2026-1-11].<http://www.unicef.org/media/52626/file>.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需求分析与教育改革路径

黄斌斌

(广东海洋大学, 广东 阳江 529500)

摘要: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持续推进,涉外法律事务日益繁杂,我国面临的国际法律环境日趋复杂。在此背景下,华为、中芯、中兴和字节跳动等国内优秀企业却多次受到美国的不公平制裁,因此,培养具备国际法律文化理解、能够参与国际秩序建设并掌握国际法律话语权的涉外法律人才显得尤为迫切。然而,目前我国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尚存诸多不足,如实践知识传授的系统性不足、教学内容与实践结合不紧密等。本文深入剖析了涉外法律人才的现状和需求,审视了涉外法律人才教育的现状,并提出了针对性的教育改革路径。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育与校企合作、提升教师队伍建设等措施,旨在培养出具备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及国际视野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

关键词:涉外法律人才;需求分析;教育改革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3

Demand Analysis of Applied Foreign-Related Legal Professionals and Path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Binbin Huang

Guangdong Ocean University, Yangjiang 529500,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advancement of globalization, cross-border legal affair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and the international legal environment facing China has grown more complicated. Against this backdrop, outstanding Chinese enterprises such as Huawei, SMIC, ZTE, and ByteDance have repeatedly been subjected to unfair sanctions by the United States.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urgent to cultivate foreign-related legal professionals who understand international legal cultures, can participate in the building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hold the right to speak in international law. However, current education for foreign-related legal professionals in China still has many shortcoming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systematic teaching of practical knowledge and poor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content with real-world practic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mand for foreign-related legal professionals, reviews the status quo of their education, and proposes targeted paths for educational reform. By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practical education and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mprov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ing staff, this study aims to cultivate applied foreign-related legal professionals with innovative thinking, practical capabilities, and an international vision.

Keywords: foreign-related legal professionals; demand analysis; educational reform

作者简介: 黄斌斌(1991-),女,硕士,助教/三级律师,研究方向为经济法学、民商法学、思想政治教育。

一、涉外法律人才现状

纵观我国对外经济发展的历程，长期以来的法律服务领域，“引进来”策略占据着显著的主导地位。与此相对应的涉外法律服务需求，主要呈现出一种内向型的特征。具体而言，法律服务提供者主要致力于解决外资进入中国市场时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多数聚焦于中国国内法中的涉外部分，涉及外资准入、投资保护、合同执行等关键环节。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战略的深入实施，国内营商环境得到了持续优化，具备实力的中资企业逐步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这些企业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多样的法律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法律制度不健全、法制文化差异、金融产权问题、贸易壁垒、涉外商事争议、国际融资、跨国并购、反垄断调查、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合规审查等。这些法律问题涉及国际公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多个法律领域，构成了当前涉外法律服务的主流需求。^①针对这些法律问题，涉外法律服务提供者需要具备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丰富的国际经验以及卓越的跨文化沟通能力。他们需要深入研究各国的法律制度和背景，为企业提供精准的法律分析和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他们还需要密切关注国际法律动态和贸易政策变化，为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及时的风险预警和应对策略。

在全球化与智能时代的大背景下，涉外法律事务已成为国家间交往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5G 等创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与不断升级迭代，法学理论教育亦需与时俱进。然而，我国涉外法律人才的数量与质量尚难以满足现实需求。一方面，涉外法律事务的复杂性和专业性对人才提出了高要求，需具备扎实的国际法基础知识、良好的外语能力以及跨文化交际能力；另一方面，涉外法律人才还需具备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法律环境。因此，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已成为当前法律教育的紧迫任务。

二、涉外法律人才需求分析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我国与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日趋紧密，涉外法律事务的范围和复杂程度不断扩展。从国际贸易、跨境投资到知识产权保护、国际争端解决等领域，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呈现出多元化、专业化的趋势。同时，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涉外法律人才在促进国际合作、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方面的话语权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我国在国际舞台上表达立场、参与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

自中美贸易战以来，两国关系日趋紧张，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倾向有所增强，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挑战。在此背景下，我国频繁成为多国经济制裁的对象。2025 至 2026 年间，美国以“管理性贸易”为核心框架，对华政策呈现高频高压与战略博弈并存的复杂态势，不仅延续关税施压，更将制裁触角延伸至关键技术与供应链领域。2026 年 3 月，美国商务部启动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 301 调查，以“产能过剩”“强迫劳动”等为由扩大贸易限制，叠加欧盟、英国、巴西等多国密集发起的反倾销、反补贴措施，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全球遭遇贸易救济调查最多的国家，贸易摩擦呈现“多节点、宽领域、常态化”特征。

面对涉外法律程序的复杂性与繁琐性，以及大量证据材料的梳理需求，我国在涉外法治领域的人才储备尚显不足，无法为企业提供充分的专业法律服务。因此，众多企业在面临不合理的贸易制裁时，往往只能被动应对。目前，我国在国际谈判领域的人才储备亦显薄弱，能够熟练运用国际规则处理涉外法律事务、解决涉外纠纷的专业人才存在较大缺口。为满足涉外法律事务的需求，涉外法律人才不仅需要掌握扎实的法律专业知识，还需具备较高的外语水平、跨文化交流能力、国际视野及实务操作能力。此外，随着科技的迅猛发展，涉外法律人才还需具备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以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挑战。

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是指能够直接从事涉外法律工作、经受实践考验的法律人才。他们不仅需具备扎实的国际法基础知识，还需具备法律英语等外语文献检索与阅读能力、涉外法律文书写作能力以及庭审驾驭能力等。同时，随着国际交往的深化，涉外法律人才还需具备国际视野和跨

^① 参见黄蕾、肖敏：《RCEP 下广西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探析》，载《视界》，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 2023 年司法行政系统理论研究课题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SFTKT2312，第 75 页。

文化交际能力,以适应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法律实践。

三、涉外法律人才教育现状

当前,我国涉外法律人才教育面临着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实践知识传授的缺乏系统性是制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之一。目前,许多法律教育机构在涉外法律领域的教学中,往往只侧重于理论知识的传授,而忽视了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这种教学方式导致学生缺乏实际操作的机会,难以积累涉外法律实务经验,进而影响了他们在涉外法律领域的竞争力。其次,教学内容与实践结合不够紧密也是当前涉外法律人才教育的一大问题。尽管我国已经逐渐重视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但相关的教材和课程设置仍显不足。缺乏专门针对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合适教材,导致教学内容难以与实际需求相匹配。同时,高水平的涉外法律实践内容相对匮乏,学生难以接触到真实、复杂的涉外法律案例,难以提升实际操作能力。

此外,涉外法治领域学科交叉不足,人才培养的综合性不足,也是制约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的重要因素。涉外法律事务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复杂性,并非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多个领域的知识和技能,需要从业者综合运用国际法、国内法、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外语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既要精通法律规则,也要了解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不同国家的文化习俗和商业规则。然而,当前我国的涉外法律教育体系往往过于专业化、单一化,学科壁垒森严,缺乏跨学科的交流与合作。多数高校的涉外法律专业仍局限于法学学科内部,与经济、管理、外语、国际政治等相关学科的融合度极低,课程设置中缺乏跨学科课程的支撑,比如未开设国际经济贸易实务、跨文化沟通、涉外商务谈判、跨境数据分析等相关课程。这种单一的培养模式,导致学生只掌握了法律专业知识,却缺乏相关学科的知识储备,难以形成全面、系统的知识体系,在处理复杂的涉外法律事务时,往往难以从多角度、全方位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难以适应涉外法律事务的综合性需求。

最后,缺乏有效的实践锻炼机会,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也是涉外法律人才教育面临的一大严峻挑战。实践是培养涉外法律人才实践能力的核心载体,而当前我国涉外法律教育中,实践教学环节的建设严重滞后,学生难以获得真实的工作

环境和案件处理经验。一方面,多数高校与涉外法律实务部门的合作不够深入、不够广泛,仅停留在表面层面,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难以搭建起有效的实践教学平台。比如,高校与涉外律所、企业涉外法务部门、国际仲裁机构、海关、涉外司法机关等实务单位的合作,大多只是简单的参观交流,难以让学生真正参与到实际的涉外法律工作中,无法积累真实的案件处理经验。另一方面,尽管一些高校已经开始尝试开展境外法律实习、涉外律所实习等实践环节,但这些实践机会仍然十分有限,覆盖面较窄,大多集中在少数重点高校的优秀学生身上,难以满足广大涉外法律专业学生的实践需求。同时,部分实践环节缺乏科学的指导和考核机制,实习内容流于形式,难以真正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导致实践教学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进一步加剧了“理论与实践脱节”的问题。

针对以上问题,我们需要深入分析其原因。首先,传统的法学教育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即以教材为主,侧重于灌输教材知识,局限于学术理论成果,与具体实践,特别是司法实践存在一定的距离,实践教育的比重相对较低,导致学生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其次,涉外法律人才教育缺乏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难以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竞争力的法律人才。此外,教师队伍的建设也存在不足,缺乏具备丰富实践经验和国际背景的优秀教师。

因此,针对当前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我们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进行改革和创新,以适应全球化背景下对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

四、教育改革路径探索

针对上述问题,可参考北航法学院本科生新法学实践教学模式,即“一年级文理通识培养——二年级基础法学培养与基层法律实践——三年级新法学思维与知识养成——四年级科技法律实践”^②,即既要注重培养通识教育,又要培养基础法学教育、实践及新法学思维。在实践训练中,又可以从三个阶段循序渐进式进行,第一阶段是对于涉外法律文书写作和法律检索的实践教学与训练;第二阶段是实务模拟训练;第三阶段是校外涉外专业实习。则可从以下教育改革路径入手,改变传统教学模式,加强学生在涉外法治方面实

^② 参见乔博娟:《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究》,载《法学教育研究》2021年第38卷,第121页。

践技能的培养,以优化涉外法律人才教育,培养具备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

(一) 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国际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核心课程的设置,同时引入跨学科课程,培养学生的综合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此同时,为了培养一批精通国际法律规则、具备国际视野、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己任的涉外法治人才,使我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危机应对能力和话语权得到增强,是十分有必要将课程改革与思政教育有机结合,通过近年来的生动案例,让学生明白身上所肩负的时代使命。此外,还应设置实践课程,如模拟法庭、法律诊所等,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同时在实践课程中,增加案例分析、参加国内外技能大赛等实践机会,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应加强法律外语教育,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跨文化交流能力。

建议:一是增加专业选修课程的比重,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相关课程;二是引入国际前沿的法学理论和案例,使学生能够接触到最新的法律知识;三是加强案例教学和情景模拟等教学方法的应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积极性。

(二) 加强实践教育与校企、实务部门合作:实践教育与校企、实务部门合作是培养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重要途径。涉外法治人才的培养离不开实践活动,但由于实践教学较多流于形式,以至于我国实务部门的涉外法治实践资源无法转化为国际法学教学资源,出现了理论教学和实践教育相互独立运行的状态,故通过与律师事务所、跨国企业等机构的合作,学生可以参与到实际的涉外法律事务中,从而达到积累宝贵实践经验的效果。同时,开展校企合作项目,让学生参与到实际涉外法律事务中积累实践经验,掌握涉外法律事务的操作技巧。邀请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律师、法律顾问等人员参与教学,为学生提供更贴近实际的指导,还可以推动学校与企业的相互了解和交流,促进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化。

此外,国际组织是全球治理变革的协调中心,是体现和提升国家软实力的特殊平台,在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高校应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平台,通过与国际组织进行多方位合作来助力涉外法治人才培养。

(三) 提升教师队伍建设: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要素,对于提升教育质量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针对涉外法律专业教师,提

升其专业素养与实践能力,对于培养具备国际视野的高素质法律人才至关重要。为此,我们可采取以下切实有效的措施:

首先,应当加大教师培训与学习力度,积极鼓励教师参与国内外各类学术会议与研讨会,深入参与访问学者项目等,以此拓宽教师的国际视野,提升其学术造诣和科研水平。其次,注重引入具备丰富实践经验的涉外法律人才,担任兼职教师或开设专题讲座,为学生提供更为贴近实际的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再者,建立健全教师激励机制,对在涉外法律人才培养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的教师予以表彰和奖励,激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新精神。

此外,鉴于兴趣是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我们应加强对涉外法学兴趣导向的引导,帮助学生认识到涉外法治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明确学好涉外法学的深远意义,从而激发其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

(四) 建立涉外法学课程教学资源库:由于涉外人才培养的特殊性,法学院和法学教师有必要保持持续关注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特别是国际争议案件的全过程,搜集整理针对性涉外案件,建立课程教学资源库,并对学生的深层次研究提供专业指引。^③在教学过程中,法学院和法学教师还需要注重提升学生的外语水平。由于绝大多数国际规则、条约、惯例以及国际法庭判决采取的都是英文形式,因此,掌握良好的英语能力对于涉外法律人才来说至关重要。教师可以在教学课件及教学资料中补充涉外法律条文和规则内涵的英文表达,帮助学生熟悉并掌握这些法律术语和表达方式。同时,教师还可以通过模拟国际法庭庭审、参与国际法律论坛等方式,为学生提供实践英语的机会,锻炼他们的英语口语和写作能力。当然,除了英语等外语能力的提升外,法学院和法学教师还需要注重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涉外法律工作往往涉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文化、法律体系以及法律制度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具备跨文化交际能力对于涉外法律人才来说同样重要。教师可以通过引入多元文化元素、组织国际交流项目等方式,帮助学生拓宽视野、增强对不同文化的理解和尊重。

综上,法学院和法学教师在涉外人才培养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不仅需要关注国际形势和重大国际事件,搜集整理针对性涉外案件,

^③ 参见刘洁:《基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际经济法课程改革研究》,载《学科探索》2023年第17期,第49页。

建立课程教学资源库,还需要注重提升学生的英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真正具备国际视野和实践能力的涉外法律人才,为我国的对外开放和国际合作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

(五) 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 学校应积极与国外知名法学院校、法律机构等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开展师生互访、学术研讨、联合培养等活动。通过这些合作,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国外的先进教育模式,同时也可以展示我国在涉外法律教育方面的成果和经验。其次,我们可以引进国外优秀的法律课程和教学资源,将其融入我们的教学体系中。同时,鼓励教师开展双语教学或全英文教学,提高学生的外语水平和国际交流能力。此外,通过举办国际研讨会、论坛等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我国在涉外法律教育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同时,积极宣传我国的涉外法律人才需求和市场前景,吸引更多的国际学生来华学习,促进涉外法律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五、结论与展望

本文通过深入分析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的需求和当前教育的不足,提出了针对性的教育改革路径。通过优化课程体系、加强实践教育与校企合作、提升教师队伍建设等措施,可以有效提高涉外法律人才的培养质量。然而,教育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持续投入。未来,我们期

待看到更多具有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的应用型涉外法律人才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我国涉外法律事务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

参考文献

- [1] 黄蕾,肖敏.RCEP下广西涉外律师人才培养探析[J].服务外包,2024,(01):74-77.
- [2] 武嘉曦,黄馨如.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困境及其出路[J].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23,39(03):106-112.
- [3] 刘洁.基于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国际经济法课程改革研究[J].科教导刊,2023,(17):47-50.DOI:10.16400/j.cnki.kjdk.2023.17.015.
- [4] 木尼拉·莫合旦尔.西部高校涉外法律人才培养现状探析——以喀什大学为例[J].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2022,38(08):56-58.
- [5] 乔博娟.科技全球化背景下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究[J].法学教育研究,2022,38(03):107-123.
- [6] 王新博,董昊衢.新时代涉外法律人才培养路径探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21,43(01):37-49.
- [7] 张正怡,李霄晨,董奕玮.教育开放背景下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路径探析[C]//Science and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Proceedings of 2021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oder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Research(MMER2021).上海政法学院,2021:5.DOI:10.26914/c.cnkihy.2021.033867.

教育镜像与成长突围：电影《我，许可》中青少年自我认同的教育叙事建构与价值阐释

王晨璐¹

(1.贵州民族大学, 贵州 贵阳 550025)

摘要：本文以现实题材影片《我，许可》为研究对象，立足2025年后国家青少年教育相关政策导向，依托教育叙事理论、拉康镜像理论及埃里克森自我认同理论，以“教育镜像—成长突围—价值阐释”递进逻辑，系统探析影片对当代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的影像呈现、主体性觉醒的叙事建构及其教育实践价值。研究表明，影片以身体自主、代际沟通、身份认知为镜像载体，精准投射当代青少年在规训体系中的认同危机；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建构，完成青少年从“他者许可”到“自我许可”的成长突围，构建起兼具个体觉醒与代际和解的教育叙事范式。本文研究既呼应《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国家政策要求，又为新时代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影视美育实践及家庭育人体系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照。

关键词：《我，许可》；教育镜像；自我认同；教育叙事；青少年教育；影视美育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4

Educational Reflection and Growth Breakthrough: The Educational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nd Value Interpretation of Adolescent Self-Identity in the Film

'Me, Permitted'

Wang ChenLu¹

¹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zhou, Guiyang,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realistic-themed film *I, Permit* as the research object, based on the guidance of national youth education policies after 2025, and relies on education narrative theory, Lacan's mirror theory, and Erikson's self-identity theory. Following the progressive logic of 'educational mirror—growth breakthrough—value interpretation,' it systematically explores the film's portrayal of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self-identity dilemmas, the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f subjectivity awakening, and its educational practical value.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film uses bodily autonomy, intergener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identity recognition as mirror carriers, accurately reflecting the identity crisis of contemporary adolescents within the disciplinary system; through progressively layered narrative construction, it completes the adolescents' growth breakthrough from 'permission from others' to 'self-permission,' establishing an educational narrative paradigm that integrates both individual awakening and intergenerational reconciliation. This research not only responds to national policy requirements such as the *Outline for Building a Strong Education Nation (2024 – 2035)* but also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adolescent self-identity educ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aesthetic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family education systems in the new era.

作者简介：王晨璐(2002—)，女，硕士，研究方向为戏剧与影视；

通讯作者：王晨璐

Keywords: "I, Permission"; Educational Mirror; Self-Identity; Educational Narrative; Adolescent Education; Film and Television Aesthetic Education

绪论

2025年以来,我国教育强国建设持续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等政策将青少年心理健康、人格健全与自我认同发展摆在突出位置。在社会转型与文化多元交织的背景下,当代青少年面临传统观念与现代价值、家庭规训与个体自主、社会期待与自我诉求的多重冲突,自我认同建构困境凸显,身体认知偏差、代际沟通不畅、主体意识薄弱等问题,已成为制约青少年健康成长与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影视艺术以直观影像、鲜活人物与现实关照,成为介入青少年教育、回应成长困惑的关键载体。现实题材影片能够将抽象教育问题转化为具象叙事,以镜像方式呈现困境、以故事路径探索突围,为自我认同教育提供极具感染力的实践样本。电影《我,许可》聚焦00后青年女性成长历程,直面身体自主、代际冲突、身份认知等核心议题,呈现主人公从“他者许可”到“自我许可”的主体性觉醒,精准映照教育现实、彰显时代价值,是研究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叙事的典型文本。

目前学界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研究多集中于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领域,侧重理论阐释、现状调查与策略构建;影视研究对现实题材影片的探讨,多关注艺术手法、文化内涵与社会批判。将教育叙事、自我认同与影视文本结合的跨学科研究相对不足,以“教育镜像”为框架、衔接政策导向与美育功能的系统分析更为匮乏。

基于此,本文以《我,许可》为研究对象,立足新时代教育政策要求,融合教育叙事理论、拉康镜像理论与埃里克森自我认同理论,沿“教育镜像—成长突围—价值阐释”脉络,探析影片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的影像投射与教育隐喻,梳理主体性觉醒的叙事路径与实践逻辑,阐释其在影视美育、家庭育人、价值引领方面的现实启示。本研究力求弥补现有研究缺口,丰富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的影视研究视角,为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影视美育实践及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助力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

一、镜像观照：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的影像投射

与教育隐喻

作为现实题材影视文本,《我,许可》以00后女教师许可的成长经历为叙事主线,将当代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转化为具象化影像场景,构建起映照教育现实、折射成长痛点的“教育镜像”。该镜像不单是对现实的复刻,而是通过艺术化叙事,将青少年在身体认知、身份建构、价值判断中的矛盾困惑具象化,蕴含深刻教育隐喻,为解读当代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的现实短板提供重要样本。

(一) 身体规训下的自我边界模糊

身体认同是自我认同的基础,《我,许可》中许可的身体困境,是当代青少年身体认知偏差、自主权利缺失的真实影像投射。结合影片核心情节,许可因子宫息肉需接受手术治疗,医院依据传统医疗流程要求家属签字确认,其母亲胡春蓉得知病情后,未优先关注女儿身体健康,反而以“未婚”“贞操”等传统观念为由拒绝签字,将女性身体与世俗偏见绑定,加剧许可的身体羞耻感。影片中许可在妇科检查时的局促不安、面对医生询问时的欲言又止,精准折射出青少年在生理教育缺位背景下的身体认知困境。

基于拉康镜像理论视角,许可的身体认知始终被“他者凝视”所左右——母亲的传统规训、医院的流程束缚、世俗的偏见评价,共同构成“他者镜像”,导致许可在自我身体认知中陷入迷茫,难以确立清晰的自我边界。这种影像呈现,深刻隐喻了当前青少年生理教育与身体教育的现实短板,也揭示了身体认知困境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的阻碍作用,凸显了身体教育在青少年自我认同培养中的重要价值。

(二) 代际冲突中的身份价值撕裂

代际关系是影响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的关键因素,《我,许可》以许可与母亲胡春蓉的价值冲突为核心,构建代际矛盾的教育镜像,折射当代青少年在多重身份中的价值撕裂。影片中,母亲胡春蓉秉持“婚姻至上”“牺牲自我”的传统价值观,将自身人生遗憾投射于女儿,强行干涉许可的职业选择、生活方式与婚恋观念,否定其作为教师的职业价值,忽视其主体诉求与个人意愿。

作为00后青年,许可秉持独立、平等、自主的现代价值观,渴望在职业实践中实现自我价值,在生活中拥有自主选择权,不愿被“女儿”“女性”的标签所束缚。这种价值观的根本冲突,使

许可在“子女身份”与“自我身份”之间陷入撕裂,既渴望获得母亲的理解认可,又不愿牺牲自我迎合他人期待,最终在反复拉扯中产生身份认同危机。该影像镜像精准反映当前家庭教育中“单向规训”模式的弊端,呼应教育部“健全家庭育人体系、强化青少年主体意识”的政策导向。

(三) 社会凝视下的主体认知迷失

社会评价体系的裹挟的是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的重要诱因,《我,许可》通过许可在社会空间中的生存处境,构建社会凝视下主体认知迷失的教育镜像。影片中,许可作为年轻教师,面临职场中的偏见质疑——同事认为“年轻女孩镇不住学生”,家长质疑“未婚教师不懂教育”;在亲密关系中,因坚持自主选择被伴侣误解,因拒绝妥协传统婚恋观念面临舆论压力;在公共空间中,其身体困境、职业选择始终被外界指指点点,这些外界评价形成无形桎梏,裹挟其自我判断。

依据埃里克森自我认同理论,青少年时期的核心发展任务是建立自我同一性,即明确自我价值、确立自我边界,而外界评价与期待往往对这一过程产生深刻影响。影片中,许可在社会凝视下,一度陷入“需获得他人许可才能确认自我价值”的认知误区,甚至怀疑自身选择、否定自我价值,这种主体认知的迷失,是当代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的真实写照。该镜像揭示社会评价体系对青少年自我认同的深刻影响,凸显培育青少年独立判断能力、强化主体意识的紧迫性。

二、叙事突围: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的影像路径

与实践逻辑

《我,许可》并未止步于对青少年自我认同困境的镜像呈现,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建构,展现许可从“他者许可”到“自我许可”的成长突围过程,构建起兼具现实性与教育性的自我认同成长路径。影片以“冲突—反思—抉择”的叙事逻辑,推动许可在打破规训束缚、坚守自我立场的过程中完成自我认同建构,为当代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提供鲜活影像样本,实现从“镜像呈现”到“主体建构”的逻辑递进。

(一) 破身体枷锁,立自主认知:身体认同的建构路径

身体自主的确立是许可自我认同突围的首要环节,影片通过一系列关键情节的叙事推进,展现其打破身体羞耻、确立身体主权的成长过程。

面对母亲的阻挠与世俗的偏见,许可始终坚守自身立场,坚定维护个人就医权利,多次与母亲沟通,明确主张“我的身体我做主,我有权决定自身治疗方式”,最终凭借自身坚持完成手术。术后,许可并未回避自身身体议题,反而在课堂上坦然向学生讲解生理知识,纠正学生对“阴道瓣”“身体羞耻”的认知误区,以自身经历传递“正视身体、接纳自我”的理念。

基于教育叙事理论,许可的身体叙事核心在于“自我接纳”,其通过直面身体困境、主动言说身体议题,完成从“被动遮蔽”到“主动接纳”的转变,确立身体自主认知,为自我认同建构奠定坚实基础。这一叙事实践,打破传统影视文本对女性身体的遮蔽与污名化,为当代青少年身体认同教育提供重要启示:唯有正视身体、接纳身体、尊重身体主权,才能打破身体羞耻的桎梏,建立稳定的身体认同。

(二) 破规训束缚,立独立人格:主体意识的觉醒路径

独立人格的确立是自我认同的核心要义,《我,许可》通过许可对各类规训束缚的反抗,完成独立人格的影像建构。面对母亲的过度干涉,许可不再一味妥协退让,而是明确划定自我边界,拒绝母亲插手自身工作与婚恋选择,坚定追求职业理想;面对职场中的偏见与质疑,许可未陷入自我否定,而是凭借自身努力深耕教学工作,以实际行动打破“年轻女孩不懂教育”的刻板印象;面对亲密关系中的不理解,许可未牺牲自我迎合对方,而是坚守自身价值观,坦然接受关系终结,彰显独立女性的主体底气。

结合埃里克森自我认同理论,青少年独立人格的建构,本质上是自我同一性的确立过程,即个体在与外界互动中,明确自我价值、坚守自我选择,最终形成稳定的自我认知。影片中,许可的成长突围,正是这一过程的生动影像呈现——其摆脱“他者规训”的束缚,不再依赖他人认可确认自我价值,而是通过自我反思、自我坚守,确立独立的自我认知与价值判断,完成独立人格建构。这一叙事建构,凸显“自我许可”在青少年自我认同中的核心作用,为当代青少年独立人格教育提供重要参照。

(三) 破代际壁垒,立双向成长:代际关系的优化路径

《我,许可》的成长叙事并未局限于许可个人的主体觉醒,而是跳出单一青年成长视角,构建“代际双向成长”的叙事模式,通过打破代际

壁垒,实现许可与母亲的共同成长,为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拓展新维度。影片中,许可在坚守自我立场的同时,并未一味对抗母亲,而是尝试理解母亲的成长背景与价值观,主动开展双向沟通,向母亲传递现代女性的自主理念;母亲胡春蓉在与女儿的反复磨合中,逐渐意识到自身规训与控制对女儿的伤害,开始反思自身教育方式与价值观,最终放下刻板偏见,接纳女儿的选择,甚至在女儿影响下打破母职枷锁,追求自身人生价值。

基于教育叙事理论,这种“双向成长”的叙事建构,打破传统家庭教育中“单向管教”的模式,构建起平等对话、相互成全的代际关系,形成“青年觉醒—代际和解—共同成长”的教育叙事闭环。这一成长路径,为当代家庭教育提供重要启示:唯有打破代际壁垒,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实现双向沟通、双向成长,才能为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营造良好家庭环境,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三、价值阐释:影视教育叙事的实践启示与时代

指向

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全面推进、“光影育人”工程持续深化的时代背景下,《我,许可》的教育叙事不仅具有重要的个体成长意义,更契合国家教育政策导向,为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影视美育实践、家庭育人体系完善提供重要的现实启示与时代指向,实现从“成长突围”到“价值落地”的逻辑升华。

(一) 丰富影视美育实践,助力青少年全人发展

2025年全面实施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深化美育浸润行动,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与人格健全,推动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劳育深度融合”。《我,许可》作为兼具现实性与教育性的影视文本,以真实细腻的叙事介入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为影视美育实践提供贴近现实、直击心灵的教学资源,丰富美育实践的内容与形式。

与传统美育文本侧重审美鉴赏不同,《我,许可》将美育与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生命教育、身体教育深度融合,通过许可的成长叙事,引导青少年正视身体、接纳自我、坚守自我,培育青少年的审美判断力与人文素养。该影片可作为中小学影视美育课程、心理健康教育课程的核心案

例,通过观影研讨、主题分享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思考自我认同的内涵,树立正确的身体观、价值观,推动美育从“审美鉴赏”向“人格塑造”延伸,助力青少年全人发展,契合国家“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的政策要求。

(二) 完善家庭育人体系,优化现代家庭教养方式

教育部2025年发布的《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强化家庭育人主体责任,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优化家庭教育方式,缓解代际矛盾,构建新时代家庭育人新模式”。《我,许可》中“双向成长”的代际叙事,为完善家庭育人体系、优化家庭教养方式提供重要的现实参考。

影片通过许可与母亲的和解过程,清晰展现现代家庭教育的核心要义:尊重青少年主体地位,树立平等亲子关系,强化双向沟通与相互理解,摒弃“单向规训”“控制型教养”的传统模式。当前,部分家庭仍存在忽视青少年主体诉求、强行传递自身价值观的问题,导致代际矛盾突出,影响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我,许可》的叙事实践表明,唯有尊重青少年自主选择,倾听青少年内心诉求,实现亲子双向成长,才能缓解代际矛盾,为青少年自我认同建构营造良好家庭环境,推动家庭育人体系不断完善,呼应国家“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的政策导向。

(三) 拓展影视媒介功能,强化价值引领作用

在“光影育人”工程持续推进的背景下,现实题材影视文本作为重要的媒介载体,承担着价值引领、社会教化的重要功能。《我,许可》以温和而坚定的叙事,倡导自我接纳、身体尊重、独立人格、代际平等的正向价值观,契合“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教育目标,为影视创作坚守教育立场、传递正向价值提供良好创作参照。

当前,部分影视创作过度追求娱乐化、商业化,忽视教育功能与价值引领作用,难以满足青少年成长与教育的需求。《我,许可》立足现实,聚焦青少年自我认同这一教育痛点,以真实的叙事、鲜活的人物传递正向价值,实现娱乐性与教育性的有机统一。这种创作模式,不仅拓展了影视媒介的育人功能,也为新时代影视创作提供重要启示:影视创作应立足国家教育政策导向,聚焦青少年成长现实,挖掘教育题材的深刻内涵,以影像为桥、以叙事为径,引导青少年树立正确

的自我认知与价值观,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为教育强国建设注入媒介力量。

结语

电影《我,许可》以细腻的生活叙事构建起清晰的教育镜像,精准投射当代青少年在身体、身份与价值层面的自我认同困境,深刻揭示当前青少年教育中生理教育缺位、代际沟通缺失、主体意识弱化等现实短板;通过层层递进的叙事建构,展现许可从“他者许可”到“自我许可”的成长突围过程,构建起“身体自主—人格独立—代际和解”的自我认同成长路径,为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提供鲜活影像样本。

在教育强国建设全面推进、青少年心理健康与人格教育备受重视的时代背景下,《我,许可》不仅是一部优秀的现实题材影视佳作,更成为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影视美育实践的重要文本。该片的教育叙事,既契合《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建设实施方案》等2025年后国家教育政策导向,又回应当代青少年成长的现实需求,为完善青少年教育体系、拓展影视媒介育人功能、优化家庭教养方式提供重要现实启示。未来,影视创作应进一步挖掘现实题材的教育价值,推出更多贴近青少年成长、兼具教育性与艺术性的作品;教育实践应充分发挥影视文本的育人作用,将影视美育与青少年自我认同教育深度融合,助力青少年建立稳定、自信、独立的自我认同,成长为具有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参考文献:

- [1]肖巧云,董铃.从“控制”到“涵容”:代际传递视角下厌学青少年的家庭系统重塑[J].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2025,(22):47-50.
- [2]李娟.家庭教育对青少年自我同一性的影响及改进策略[J].心理与健康,2025,(S1):109-110.
- [3]胡红草,刘海波.教育镜像与现实反思——2013年以来国产教育题材电影的多元主题探索[J].传媒,2025,(18):40-43.
- [4]邓晓翔,文军.面向“不确定性”:青少年学校教育理念的当代转向[J].当代青年研究,2026,(02):119-132.
- [5]姚德雯,严林峰.社交媒体环境下青少年心理教育信息筛选研究[J].中国信息化,2026,(02):38-39.
- [6]闫博博,闫玥.电影疗法视角下青少年自我认同的符号化建构——以《心灵捕手》为例的视觉叙事分析[J].三角洲,2026,(06):52-54.
- [7]吕国锋.如何帮助高中生应对“自我认同困惑”[J].山东教育,2026,(Z2):69-70.
- [8]方镇东.青春期孩子家庭教育中的沟通难题与破解之道[J].幸福家庭,2025,(10):196-199.
- [9]张华,韩忠宇.融媒体时代下的影视教育:培养青少年人文素养的新路径[J].新传奇,2025,(01):83-85.

精神内核、专业本体与行为表征：书法教师教学形象的系统塑造逻辑

秦祥¹ 马宇²

(1.淮北理工学院, 安徽 淮北 235000, 2.益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书法教师教学形象塑造对书法教育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其建构需依托精神内核、专业本体、行为表征等多重协同框架。精神内核维度以深厚文化底蕴与坚定文化自信为根基，为教师书法教学立意奠基；专业本体维度聚焦精湛书写技艺、科学教学方法及敏锐审美感知能力，保障教学专业性与效能；行为表征维度通过得体教态、规范教学语言及良好师生互动，优化课堂生态。本文围绕上述维度剖析书法教师教学形象塑造逻辑，旨在为书法教师教学形象的科学化塑造提供理论参照与实践指导，助力书法教育体系建设。

关键词：书法教师；教学形象；文化底蕴；专业素养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等学校科学研究项目重点项目（2024AH053173）研究成果；安徽省高等学校省级质量工程项目（2024zybj066）研究成果；中国信息学会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创新应用项目（ZXXJ20250049）研究成果；淮北理工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目（2025xjyx39）研究成果；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5

Spiritual Core, Professional Ontology and Behavioral Representation: The Systematic Shaping Logic of Calligraphy Teachers' Instructional Image

QinXiang¹, MaYu²

¹ Huabe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Huaibei, China

² Yiyang Normal College, Yiyang, China

Abstract: The shaping of calligraphy teachers' instructional image carrie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alligraphy education. Its construction relies on a collaborative framework integrating the spiritual core, professional ontology, and behavioral representation. The dimension of spiritual core, grounded in profound cultural deposits and solid cultural confidence,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calligraphy teaching. The dimension of professional ontology, concentrating on exquisite writing techniques, scientific teaching methodologies, and keen aesthetic perception, guarantees the professionalism and efficiency of instruction. The dimension of behavioral representation optimizes the classroom ecology via appropriate teaching demeanor, standardized teaching language, and positive teacher-student interaction. Centering on these dimensions, this paper probes into the logical mechanism for shaping the instructional image of calligraphy teachers,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scientific construction of such an image, and to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calligraphy education system.

Keywords: Calligraphy Teacher; Instructional Image; Cultural Deposits; Professional Literacy

作者简介：秦祥(1996—)，男，助教，研究方向为艺术教育、书法理论；

马宇(1997—)，男，硕士，研究方向为书法教育；

通讯作者：秦祥

一、引言

在学科教育体系中,书法教学以技法传授、文化传承、审美培育的三重属性,成为承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学生人文素养的核心场域。作为书法教学课堂主导者,书法教师教学形象并非单一的外在表征,而是内在精神特质、外在行为表征与专业能力素养的有机统一体,其形象建构质量直接关联教学效能的发挥,对书法教学目标的实现具有基础性作用。

书法教师的教学形象涵盖多重核心要素。内在层面,需具备坚定的文化自信、深厚的人文底蕴;专业能力层面,则聚焦于高超的书法技法、科学的教学方法与持续的创新意识。外在层面,体现为规范的教态、精准的教学语言与高效的互动方式;这些维度相互支撑、协同共生,共同刻画书法教师教学形象。

在教育改革持续深入的今天,深层探究书法教师教学形象的建构逻辑,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与理论意义。对教师个体而言,明确形象建构的核心方向,可引导其针对性提升综合素质,加强自身师德师风建设,突破发展局限,实现专业能力的系统化成长;对教学过程而言,优质的教学形象有助于优化课堂生态,教师的文化自信可激发学生对书法文化的认同,规范的教态与精准的语言能提升知识传递效率,科学的教学方法能激活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进而推动书法教学从单向输出向双向互动与深度建构转型;对教师队伍建设而言,厘清教学形象的建构维度,可为书法教师培养、评价提供标准化参照,助力打造专业过硬、素养全面、适应时代需求的高素质书法教师群体,为书法教育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人才基础。

二、精神内核维度:书法教师形象的塑造根基

精神内核是教师形象塑造的根基所在,是教师形象展现的特质核心,唯有内核精神的充沛,教师形象才能“气自华、形自端”。这就要求书法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坚定文化自信,更要有昂扬的创新开拓精神。

2.1 文化底蕴:书法教师形象建构的本体根基与教

学升维密钥

中国传统的儒家师道哲学要求教师既要具备

高超学术造诣,更强调以“希圣”“希天”为核心的精神向度,而“为学”则是践行这一追求的逻辑起点。深厚文化底蕴的积淀,成为教师精神品格与专业素养的双重载体。书法作为传统知识分子的核心素养,在数千年文明演进中已内化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精神标识,其发展脉络与传统文化形成“体用不二”的深度互嵌。对书法教师而言,文化底蕴绝非附加性知识储备,而是塑造专业教学形象的本体基石,更是实现书法教学从“技法传授”向“文化浸润”跃升的底层支撑。这种底蕴积淀不仅为教师自身的形象塑造筑牢根基,更助力其在学校教育生态中确立素养优良、师德纯正的学者典范。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指出:“中国各门传统艺术(诗文、绘画、戏剧、音乐、书法、雕塑、建筑)不但都有自己独特的体系,而且各门传统艺术之间,往往互相影响,甚至互相包含。……因此各门艺术在美感特殊性方面,往往可以找到许多相同之处或相通之处。”^[1]这一论断揭示了中国传统艺术的整体性特征。书法教师唯有构建涵盖史学、文字学、文学的复合型文化底蕴,方能在教学中实现不同艺术门类的知识融通,将书法置于更广阔的文化视野中解读,既展现书法艺术的本体魅力,又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最终形成兼具专业性与人文性的独特教学风格。

2.2 文化自信:书法教师形象建构的精神基点与文

化传承引擎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2]这一重要论断为高校书法教师的文化自信建构确立了根本遵循与价值坐标。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核心载体,书法教师的教学形象必然内嵌坚定的文化自信特质,这种自信绝非个体层面的精神自洽,而是兼具专业素养与文化传承双重属性,既是教师立足书法教育领域的精神基石,更是保障书法文化基因代际赓续、维系民族文化主体性的关键支撑,其建构逻辑与实践路径关系着书法教育文化育人功能的实现深度。

文化自信的实践维度体现为教师对文化传承使命的主动践行与创新转化。一方面,教师需拓展书法文化的辐射边界,通过多种形式,将书法

文化传递至更广泛的场域。另一方面,需立足当代语境挖掘书法文化的现代价值,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创造性融合,创新书法文化的传播形态,让学生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感知书法文化的当代适配性,进而强化文化认同与自信。

书法教师唯有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精神原点,在教学中精准传递书法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审美旨趣与民族精神,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传承路径与传播形态,方能突破“技法传授”的浅层局限,激发学生对书法文化的内在热爱与价值认同,引导其从“被动学习者”蜕变为“主动传承者与创新者”。这种由“教”到“传”的转化,既是书法文化活态传承的核心要义,更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培育注入鲜活而持久的艺术力量。

2.3 创新意识:书法教师形象建构的时代标识与教

学转型驱动

创新意识是书法教师形象塑造的关键,在教育教学改革纵深推进的时代语境下,其已升级为适配新时代书法教育需求、驱动教学范式迭代的核心要素。这种创新绝非局限于教学形式的表层优化,而是指向书法教育从技法单向传授到文化传承与创新育人的深层转型,彰显书法教师对书法教育时代使命的精准把握。

教学内容创新是创新意识落地的核心载体,其内核在于坚守传统书法文化精髓的同时,实现内容体系的拓展与活化。熊秉明在《中国书法理论体系》中指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1]这一论断揭示了书法承载的文化价值与精神内涵。书法教师唯有以创新意识为引领,在传承书法文化精髓的基础上,推动教学理念、内容与方法的系统性创新,方能为书法教学注入时代活力,打破传统教学的路径依赖,使书法这一古老艺术形式在新时代语境下实现文化价值与育人功能的双重彰显。

从教师内在形象建构的本质来看,创新意识是其精神风貌的鲜活注脚,彰显着积极开拓的内在品格与锐意进取的时代风尚。在创新意识的驱动下,教师才能以主动姿态审视教学与科研中的现存问题,通过创造性实践实现问题破解与路径优化,进而推动教学质量与科研水平的协同提升。这种以创新为内核的成长路径,使教师内在形象始终紧跟时代发展与知识转型步伐,摆脱僵化滞后的认知局限,最终沉淀为兼具传统底蕴与时代精神的鲜明特质,成为其专业形象不可或缺的精

神标识。

三、专业本体维度:书法教师形象的专业内核

3.1 技法能力提升

书法技法体系作为中华文明演进的重要艺术结晶,是历代书家在长期艺术实践中对书写本体规律的认知凝练与美学体系的系统性建构。“掌握书法的基本技巧,是深入理解书法艺术深邃意蕴的不二法门,也是书家形成个人风格的基本前提和主要内容。‘技’是书法艺术表现力、冲击力、艺术魅力的出发点和归宿。”^[4]突显出“技”在书法艺术体系中的本体地位。脱离技法支撑的书法教学,必然陷入空洞化困境,丧失书法课程作为实践性美课程的本质属性。作为专业从业者,技法能力是其专业形象确立的根基所在,技法的缺位,则无法形成清晰的书法教师身份标识,更难以构成书法教学有效开展的核心支撑。

基于此,书法教师的技法能力提升成为应对技法教学挑战、保障教学质量的核心要义。一方面,教师需具备高超的技法实操能力,既能精准示范各类书体的技法规范,又能深度解析技法背后的审美逻辑,为学生提供实践和认知的双重指引;另一方面,需以“终身学习”为导向持续提升自身专业水平,通过追踪书法技法研究前沿精进自身书写实践,形成“以技载道”的教学示范力,进而激发学生对技法学习的内在动机,引导学生通过技法积累充实书法艺术素养。

从教学效能看,教师技法水平是巩固教学权威、塑造专业形象的关键支撑。唯有具备扎实的技法功底,教师才能在技法教学中精准回应学生的实操困惑,以专业权威性获得学生认同,这种认同正是教师专业形象得以确立的基础。同时通过技法示范和精准指导的教学闭环,降低学生的技法学习认知负荷,推动书法教学从知识传递向能力培养的高效转化,强化教师“专业、可靠”的形象认知,使技法能力成为书法教师形象最鲜明、最坚实的专业本体标识。

3.2 教学方法现代化

在书法教学的效能提升体系中,科学教学方法是衔接教学目标与育人成果的核心枢纽,其适配性关系着书法教学从知识传递向能力提升的转化效率。所以书法教师的教学能力建构需契合教育现代化的时代要求,以“终身学习”为核心,推动自身教学视野的扩容与教学方法的迭代。这

就需要教师持续追踪书法教育领域的前沿动态,关注跨学科融合、个性化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通过批判性吸收与辩证性转化,将前沿方法与书法教学本体特性相结合;同时深刻把握书法教育的“双重属性”其既是书法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教育活动的学科具象形态,脱离教育规律的书法教学,会丧失其作为教育活动的本质属性,沦落知识商品化境地,丧失其“立德树人”的教育本质,而书法教师自身也会因缺乏教育理念支撑,难以塑造“专业教育者”的立体形象。

新时代背景下,书法教学已转向“综合素养培育”,这要求教师突破传统教学方法的桎梏,构建“多元协同”的教学能力体系。既要具备对新型教学方法的接纳与转化能力,又要在自身形象塑造中定位“学习型教师”,以教育规律为准则,以教学实践为依托,通过持续的知识更新与能力升级,实现教学方法与时代需求的动态适配。如此方能完成教师教学能力的现代化转型,塑造兼具传统底蕴与现代视野的专业书法教师形象。

四、行为表征维度:书法教师形象的具象呈现

4.1 得体的教态:仪表规范与神态表达的双重塑造

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论及教师仪表云:“善为师者,既美其道,有慎其行。”^[5]认为教师的外在仪表应体现“雅正”与“端庄”。在书法教学场域中,教态作为书法教师教学形象的具象化,是实现教学信息有效传递与课堂氛围正向建构的关键所在,同时也是学生形成教学认知的首要感知对象,对课堂互动关系的初始建构具有奠基性作用。在书法教学场景中,教师需遵循职业伦理规范与学科教学特性的双重要求,保持整洁得体的外在风貌以契合教师职业身份的庄重性,规避过度随意化或个性化,体现“美其道,慎其行”的“雅正”与“端庄”。

而教师的表情神态作为非语言沟通的核心要素,在课堂氛围营造与教学情感传递中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面带微笑、眼神温和的表情范式能够消解师生间的心理距离,构建轻松愉悦的教学互动场域。表情神态的动态调整,可成为教学内容的情感注脚,在传递专业严谨性的同时,避免挫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在感知教师关注与期望的过程中,形成正向的学习动机。

4.2 规范的教学语言:语义精准性与教学效能感的

双重保障

教态是教师教学形象的具象化,而规范的教学语言则是教学形象的语义化表达。在书法教学的知识传递系统中,规范化的教学语言是保障技法要点传递准确性、提升教学效能的核心媒介,直接影响学生对书法专业知识的认知深度与转化效率。作为书法教学语言的首要属性,语言专业性植根于对书法学科术语体系的精准运用。教师需以书法界共识的专业术语为知识编码载体,在术语使用过程中同步完成概念界定、内涵阐释与实践应用指引,使学生建立起对书法专业概念的精准认知结构,避免因术语模糊或口语化表述导致的技法传递偏差。

此外,教学形象塑造中的教学语言规范化应当提倡简洁性与生动性。简洁性是书法教学语言在信息传递层面的关键要求,其核心在于实现教学内容的高效筛选与精准输出。生动性则是破解书法教学抽象性困境、激发学生重要学习动机的重要路径。正如苏霍姆林斯基所言:“教师的语言素养,在极大程度上决定着学生在课堂上的脑力劳动的效率。”^[6]书法教师唯有构建“专业精准、简洁凝练、生动具象、表达适配”的教学语言体系,方能实现书法知识的有效传递与学生认知能力的深度培养,达成教学质量与学习效能的双重提升。

4.3 良好的师生互动:正向教学氛围与课堂生态的

双重支撑

在书法教学场域,师生互动作为课堂生态的外在显现,是营造正向教学氛围、激活教学效能的关键枢纽,决定着书法教学目标的达成度与学生主体性的发挥水平,也正是在师生互动中,书法教师形象的内在与专业维度散发的感染力,得以有效传递。在教学实施环节,教师可以“问题导向”构建互动场域,围绕核心议题,引导学生开展深度思辨。在此过程中,教师对学生的独特见解予以即时肯定,强化其审美表达的自信心与创造性;对认知偏差或概念误解,则以循循善诱的方式纠偏,帮助学生重构认知框架,避免简单否定式反馈对学习积极性的挫伤。

高质量的师生互动,使得教师教学形象塑造更趋完美,教师个人魅力和学术专业素养在互动中传递,有益于激发学生的书法学习内驱力,提升其技法实践与审美认知的水平。书法教师形象在生动的书法课堂生态中,摆脱既往存在的古板

形象,而充满引领性与感召性,推动课堂生态从“教师单向输出”转向“师生协同建构”,构建起平等、尊重、共进的和谐师生关系。

五、结语

书法教师教学形象的塑造是一个系统工程,涵盖精神内核、专业本体与行为表征等多重维度。精神内核维度中的深厚文化底蕴、坚定文化自信与创新意识,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撑与文化根基;专业本体维度中的精湛书写技艺、教学方法现代化,是教师开展有效教学的核心能力;行为表征维度中的得体教态、规范教学语言与良好师生互动,为教学活动营造了积极的氛围。这三个维度相互关联、相互影响,共同塑造书法教师的教学形象。书法教师应从这些维度入手,不断提升自身素质,塑造良好的教学形象,为书

法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培养出更多具有深厚文化素养与审美能力的优秀书法人才。

参考文献:

- [1] 宗白华.美学散步.彩图本[M].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34.
- [2] 习近平.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J].2016.
- [3] 熊秉明.从书法看中国文化精神[J].江苏教育,2017,(05):22-23.
- [4] 张海.当代书法“尚技”刍议[J].中国书法,2018(1):6.
- [5] 董仲舒.春秋繁露[M].河南大学出版社,2009.36.
- [6]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全一册.2版[M].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278.

高职院校微创业教育生态构建研究

王丽华¹ 苏媛媛¹

(1.潍坊食品科技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00)

摘要:在界定相应概念和了解微创业发展的基础上,借助现实生活中微创业的调查分析,认为微创业在当前经济和就业形势下具有现实意义。针对不同专业学生可能面临的微创业困难,提出构建高职院校微创业教育与实践的创业生态系统的途径,包括促进微投资、筛选微创业项目、推进微创业、注重商业计划训练等。

关键词:微创业; 微投资; 商业计划训练; 微创业生态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76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Micro-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Eco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 Yuanyuan¹, Wang Lihua¹

Weifa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eifang, Shandong 261000

Abstract:Based on defining the corresponding concepts and understanding the development of micro-entrepreneurship,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micro-entrepreneurship in real life, it is believed that micro-entrepreneurship has practical significance under the current economic and employment situation. Aiming at the possible micro-entrepreneurship difficulties faced by students of different major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path of constructing the entrepreneurial ecosystem of micro-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actic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cluding promoting micro-investment, screening micro-entrepreneurship projects, promoting micro-entrepreneurship, and focusing on business plan training.

Keywords: Micro-entrepreneurship; Micro-investment; Business Plan Training; Micro-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1 引言

企业家精神被定义为创业的过程。在 20 世纪 40 年代和 50 年代,创业历史学家开创了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约瑟夫·熊彼特的理论工作支持了人们对企业家作为历史变革推动者的日益关注。熊彼特认为,创业活动的本质在于创造“新组合”,打破现有市场、产品、流程和组织的竞争平衡。这个观点至今被视为创新的五条传统路径,由此

熊彼特被称为创新理论的鼻祖。

熊彼特以及后续的研究重点放在了那些大型的公司身上,而且此后的研究对象更多是公司而不是创办那些公司的创业者。即使我们不关注对创业者自身的而研究,但仅仅将在关注重点放在公司身上是不合适的,那些数量众多的,自我雇佣或只雇佣了有限的几个人的小型的、微型的经

作者简介:王丽华(1981—),女,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就业指导;

苏媛媛(1978—),女,大专,讲师,研究方向为大学生创业就业教育。

济组织在几乎每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都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价值。

2 微创业与微型企业

2.1 界定微创业

微型企业是一个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许多国家,它们是最常见的企业类型 (Bruwer & Coetzee, 2016)。现存的微型企业 1/3 多是成立于 2020 年及以后。尤其是 2026 年随着“养龙虾”的兴起,一人公司越来越被更多人关注及应用。

按照美国中小企业局标准(Macleod,2025),结合美国的具体情况,其主要特征包括:

- 小团队: 美国小企业管理局定义一个微企业有 1-9 个员工。

- 小资本: 投资往往来自自己的储蓄、家庭或朋友的友情支持, 50%以上的微型企业启动资本在 5000 美元以下, 大约 16%的微型企业不需要启动资本。

- 规模: 微型企业一般提供有限的几种产品或服务, 或服务于一个有限的顾客池 (pool of clients)。

对应微型企业家概念, 可以定义微创业这个术语。微创业 (Micro-entrepreneurship) 指的是通常由个人或小团体进行的小规模商业活动。微创业通常与个人企业家精神相联系, 在个人企业家精神中, 一个人负责整个商业运作。

2.2 微创业的类型

虽然规模很小, 但微型企业可以代表经济的很大一部分, 包括独立承包商、自由职业者和小型组织, 被视为微型企业的企业类型包括: 以家庭为基础的企业、街头小贩、木匠、电工、水管工、草坪美化公司、独立的机修工、机械车间操作员、鞋匠、小农户、面包店老板、裁缝、干洗店、餐饮服务、摄影师、私人执业会计师、各平台网店老板、私人顾问、自由职业平面设计师、优步、滴滴司机、Airbnb 房东等等。

2.3 微创业在国外的发展

在国外, 随着越来越多的服务让人们将自己的资产和知识货币化, 它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经济领域。

随着经济衰退或企业发展困难, 不满意的工人放弃公司工作的“安全感”, 转而追求自己的激情。在后工业化国家, 尤其是美国、欧洲和澳

大利亚, 是一种新的、越来越多的行为。媒体将这种日益增长的微型创业趋势称为“创意阶层的崛起”、“零工生活”或“自由经济”。虽然这种趋势以前就被发现过, 但今天的微型企业家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技术。根据《2024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项目分析报告》, 微创业者普遍认为“技术型项目”最具挖掘价值, 而“低成本项目”已不再是首选。这标志着创新与技术突破已成为核心竞争力。

关于自营职业和自由职业者的数据有限, 因为国际劳工报告尚未采纳, 但一个无可争议的指标是微型创业平台的兴起及其对“自己动手经济”的贡献。越来越多的人在合作平台上出售自己的技能和时间。对一些人来说, 这项活动补充了稳定的收入。对于那些失业(和未充分就业)的人来说, 通过协作平台完成的小任务和工作活动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随着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微型企业, 不稳定和计件工作变得越来越普遍。

研究微创业, 不能仅仅停留在概念和行业的简单了解上, 基于现实经济生活的数据更能帮助我们了解看似新生事物的基本情况, 帮助教育工作者思考如何在高校中开展微创业教育, 并促进微创业实践。

2 微创业调查分析

2024 年 9-12 月, 笔者参与了面向潍坊市某行政区社区微创业和微就业调查, 下面的分析基于 2023 年 7-2024 年 7 月该区新增微创业者, 样本总量 258。

2.1 样本性别构成

在 258 个样本中, 男性占 63.2%。按照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2020 年 11 月), 该区总人口性别比 (以女性为 100, 男性对女性的比例) 为 97.81 (0.4945:0.5055), 样本性别比为 171.74 (0.632/0.368), 说明男性微创业者占比显著高于人口结构的男性占比 ($P < 0.001$), 且男性在微创业者中占比显著高于女性 ($P < 0.001$)。

2.2 样本年龄与相关分析

有效样本的年龄均值为 43.31 岁。按照我国的年龄划分标准, 35 岁及以下的人属于青年人, 样本中这个比例为 20.9%, 也就是说, 21%的微创业者属于青年人, 其中年龄最小的只有 20 岁, 2004 年出生, 从事餐饮服务业。

数据显示, 男性和女性创业者在年龄上有没

有差异 ($P=0.084$)，Cohen 效应量 d 的点估计值为 0.227，略高于低效应的阈值 0.2 (Cohen, 1988)。因此，性别与年龄的关联较小。

2.3 创业企业形式

调查显示，35 岁以下样本的组织形式主要是个体工商户，占比 90.4%。主要集中在食品业、餐饮业和其他服务业，合计占比 63.5%；其他类别中有 9 个，其中 3 个从事 IT 业。

2.4 收入水平

女性微创业者月收入均值 7224.35 元，男性为 9061.88 元，女性的收入水平显著低于男性 ($P=0.017$)。Cohen 效应量系数 d 的点估计绝对值为 0.314，高于 0.2 的弱效应标准值，因此这种差异在现实生活中是显著的，而不仅仅是统计上存在显著差异。不同创业组织形式的月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P=0.139$)，但是效应值绝对值为 0.518，达到中等效应水平，说明了实际上的差距是比较明显的。数据显示，个体工商户月收入均值 8165 元，小微企业主为 11150 元，均值差达到近 3000 元，小微企业主的平均月收入水平远高于个体工商户。

调查数据展示了微创业在日常经济生活中的某些特点，显示了深入讨论创业尤其是大学生微创业的意义，在当前经济形势下更显示其价值。

3 进一步讨论与建议

3.1 阻碍微型企业家经济发展的障碍

从有关研究看，阻碍微型企业家经济发展的三个主要障碍包括 (Chandy, 2013)：

微创业者缺乏基本的商业技能。大多数微型企业家的管理实践与一流商学院教授的管理实践截然不同。他们很少思考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那些关于差异化的问题(“为什么人们会从我这里买东西，而不是从别人那里买?”)、客户定位(“我是否向合适的客户销售?”)还有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客户吗?”)、产品或服务(“我为什么要卖我卖的东西?”)，以及其他类似的关于运营、资金和人员管理的问题。

微创业者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对于大多数微型企业来说，关于买家、卖家和周围更大市场的基本信息仍然是难以捉摸的。他们往往会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价格卖给错误的人。

微创业者往往无法获得信贷资金。由于微型

企业规模小、营业收入低、资产规模小、固定资产少，绝大部分金融金钩不愿意承担对小微企业放款的金融风险。

微型企业成长之路在哪里呢?

3.2 创造高校微创业生态

3.2.1 促进微投资

大学是未来企业家获得蓬勃发展所需知识和技能的地方。从技术专长和创造性解决问题到研究技能和商业战略和规划，学生们建立了强大的基础。如今，越来越多的学生从大学宿舍开始创建和投资初创企业。这股新的校园创业浪潮不仅关乎建立自己的企业，还涉及支持同龄人的创业努力。在同学的初创企业中进行可控的微投资，为更多学生提供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成为大学内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

微投资概念正在兴起，因为它使更多学生们能够在不需要大量资金的情况下支持彼此的创业项目。从创业教育与创业实践角度看，重点应更多地放在培育创意和培育创新社区上，而不仅仅是盈利。但这种投资为崭露头角的学生企业家提供了资金支持，并创建了一个点对点支持网络。这也是一次实用的学习经验。

通过小额投资，学生们可以对创业公司的运作方式、所涉及的风险以及为同伴的成功做出贡献的满足感有一个真实的了解。这是一门商业和金融的实践课程，提供了传统课堂环境中往往没有涵盖的见解。

3.2.2 推进微创业

大学生微创业的核心在于轻资产、低风险、高灵活性，能利用校园内的现成资源(如人脉、场地、信息差)来实现盈利。最有可能的是，将要开展的商业活动是学生充分利用自己已经做得很好的东西。结合当下的趋势，最适合在校大学生尝试的微创业赛道可能包括校园生活服务、技能与知识变现、内容创作与自媒体、文化创意与轻资产销售等。

校园生活服务是最接地气、需求最稳定的赛道，可以建立一个微信群或小程序接单，甚至可以组建一个小团队按宿舍楼划分区域提供代办跑腿服务。建立一个纯信息撮合的平台，收取中介费，促进校园二手物品交易也是不错的想法。实际上，这些服务在高校已经比较普遍，只是人们没有把它上升到微创业层次。

技能与知识变现赛道是学生利用专业特长或擅长的技能,将个人时间转化为金钱。如擅长设计、编程、视频剪辑或写作的学生,可以在校内外接单。整理并售卖高质量的笔记、考试题库或考研/考公资料。还可以利用AI工具提升效率,提供AI助教、智能批改、文案生成或简历优化服务。

内容创作与自媒体赛道聚焦喜欢拍照、写文案,或者在某个领域(如穿搭、美妆、学习)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生,可以通过内容来赚钱。可以在抖音、小红书、B站等平台分享校园生活Vlog、探店(学校周边美食)、学习经验或穿搭分享。当粉丝积累到一定量,可以通过接商家广告(如周边餐馆推广)、带货或引流到私域进行社群变现,从而使自己成为“按效果付费的推广者”,成为常说的校园淘客或校园推客或校园达人。

文化创意与轻资产销售赛道中可以设计带有学校特色(如校徽、标志性建筑、校院宠物)的周边产品,如钥匙扣、明信片、盲盒或帆布袋。可以利用情人节、女生节、毕业季等节点,摆摊销售鲜花、手工饰品或定制礼品。还可以使用拼豆生产适合学生及其他各类群体的二次元、异次元产品进行网络销售等等。

3.2.3 注重商业计划训练

创新参与教育中,各级各类商业计划训练如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挑战杯商业计划竞赛等可以增强学生对商业活动和企业运营的了解。

有技术优势的学生,如学汽修的改进一个修车工具(申请专利);学会计的开了一个记账小程序(软件著作权)等,都是各类训练计划非常喜欢的项目。通过进行模拟训练获得竞赛奖励,可以为微创业提供初始启动资金,会提高学生创业的自我效能感,从而促使微创业走向商业实践。

参考文献:

- [1] Bruwer, J. P., & Coetzee, P.A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sustainability, the managerial conduct of management and the internal control systems evident in South African small, medium and micro enterprises. 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in Management, 2016, 14(2-1): 201-211.
- [2] Macleod, C. Micro Entrepreneurship: A Guide to Starting Small[EB/OL]. <https://blog.hubspot.com/sales/Micro-entrepreneurship>.2025.07.07.
- [3] KAB 创业俱乐部.2024 年大学生微创业行动项目分析报告[EB/OL].www.kab.org.cn/gb/articles/2025-09/05/content_nyzYOswOa.html2025.09.05.
- [4] Cohen, J. STATISTICAL POWER ANALYSIS for the BEHAVIORAL SCIENCES[M].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1988.24-27.
- [5] Chandy, A. How microentrepreneurs could change the world [EB/OL].<http://www.london.edu/think/how-microentrepreneurs-could-change-the-world>.2013.01.21.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小团体现象的调查与引导策略研究

林婉君

(珠海市香洲区云峰小学, 广东 珠海 519075)

摘要:小团体主义是指在学生共同学习和生活过程中, 自发形成的具有共同兴趣、价值观或情感联结的非正式群体。在小学中高年级阶段, 小团体现象普遍存在, 对学生的社会化发展和班级管理产生重要影响。本文采用自编问卷, 对珠海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 (N=1009) 进行统计分析, 探讨小团体的成因、类型、规模与影响, 并结合访谈资料提出教育引导策略。研究结果表明, 小团体以“兴趣相投”和“性格相近”为主要成因, 学生学习成绩与小团体学习风气呈显著正相关 ($r=0.307, p<0.01$), 而学生年级与参与班级活动的积极性呈显著负相关 ($r=-0.137, p<0.01$)。研究认为, 小团体具有积极与消极双重作用, 教师应通过正向引导促进其积极功能的发挥, 从而提升班级凝聚力与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关键词:小团体主义; 小学中高年级; 同伴关系; 教育引导

基金项目:珠海市香洲区教育科研“十四五”规划 (2025 年度) 课题 (编号: 2025KT014)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83

A Study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Guidance Strategies of Small Group Phenomena among Upper-Grade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Wanjun Lin

Yunfeng Primary School, Xiangzhou District, Zhuhai, Guangdong 519075, China

Abstract: Cliquishness refers to the informal groups that are spontaneously formed among students during their joint learning and living processes, sharing common interests, values, or emotional bonds. In the middle and upp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the phenomenon of cliques is widespread and has significant impacts on students' soci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lass management. This study employed a self-designed questionnaire to conduct statistical analysis on 1009 students from grades three to six in a primary school in Zhuhai City, exploring the causes, types, scales, and influences of cliques. Combined with interview data, educational guidance strategies were proposed. The research results indicated that the main causes of cliques were "similar interests" and "similar personalities", and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nd the learning atmosphere within cliques ($r = 0.307, p < 0.01$), while there w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students' grades and their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ng in class activities ($r = -0.137, p < 0.01$). The study suggests that cliques have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effects, and teachers should promote their positive functions through positive guidance to enhance class cohesion and students' social adaptability.

Keywords: Cliquishness; Middle and upper grades of primary school; Peer relationship; Educational guidance

“小团体”是相对于正式组织而言的一种非正式群体，通常基于成员之间的共同兴趣、性格特征、社会背景或价值取向而自然形成。这类群体具有一定的情感纽带和内部规范，对成员的行为方式、社会认同以及人际态度产生潜在影响，有时甚至超过正式组织的约束力。在学校班级中，小团体普遍存在，其成员通过非正式的交流与互动满足社会归属和心理支持等需求，在学生的社会化与个性化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在我国部分教育实践中，学生小团体常被简单地等同于“小帮派”“小圈子”，被视作破坏班级团结的消极现象。这种片面认识忽视了小团体作为学生社会化自然产物的积极意义。事实上，适度的小团体不仅能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和社交安全感，还可能促进学习互助与班级内部合作。因此，系统研究小学中高年级阶段小团体的形成机制、类型特征及其影响，对于科学理解学生同伴关系、改进班级管理策略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本文旨在通过问卷调查及访谈的方法，了解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小团体的基本情况，为小学班主任和心理教师提供可操作的教育管理策略，帮助教师正确看待小团体现象，避免片面压制，转而通过引导促进班级凝聚力与学生社会适应力的提升。同时，通过理解小团体的积极功能与潜在风险，教育者能够构建更包容、更具合作精神的班级文化，从而实现学生全面发展与校园文化的和谐共生。

一、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为广东省珠海市某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共计 1009 人，其中男生 512 人，女生 497 人。各年级分布为：三年级 141 人、四年级 322 人、五年级 322 人、六年级 224 人。采

用整群抽样的方式进行问卷施测，问卷发放与回收均由班主任协助完成，共发放问卷 1009 份，全部有效回收，有效率为 100%。

(二) 测量工具

本研究采用研究者自编的《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小团体调查问卷》作为主要研究工具。问卷共包含六个维度：小团体成因、小团体类型、小团体规模、小团体活动、小团体活动态度和小团体学习风气，共 24 个题项，主要以单选和多选形式呈现。问卷旨在探索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小团体现象的基本特征与影响因素，因此题项内容较广、涵盖面较宽。

(三) 统计学处理

采用 SPSS20.0 软件对相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根据问卷数据特征，进行频数分析与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

二、研究结果

(一) 小团体的成因与类型

1.小团体的成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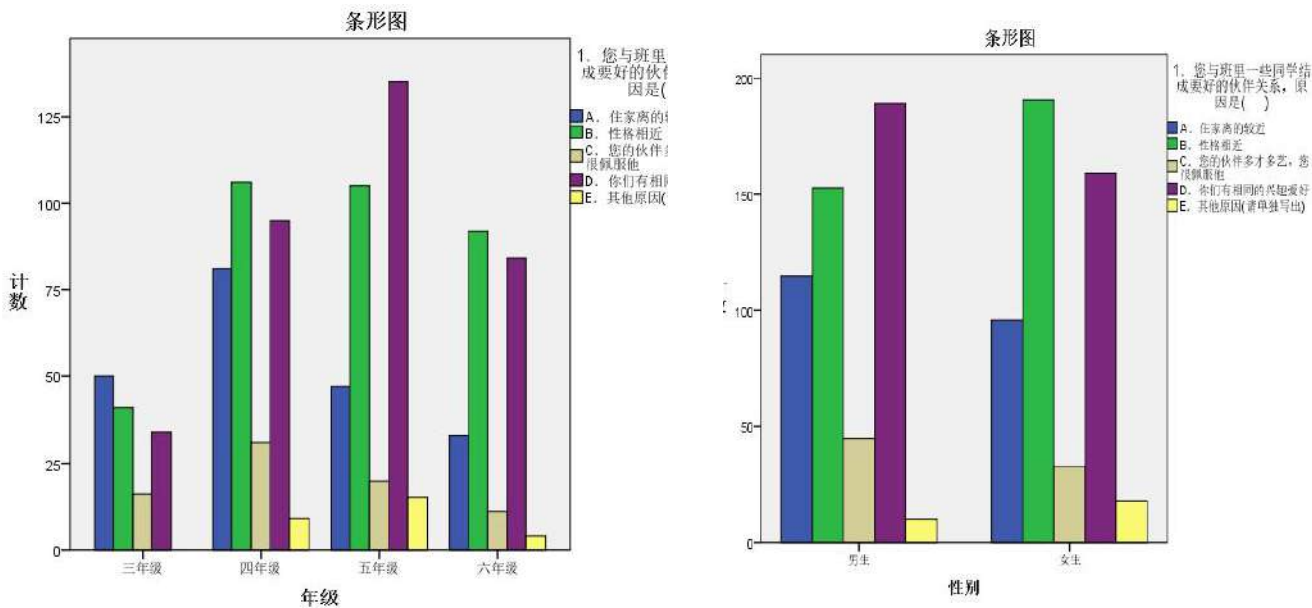
调查结果显示，学生形成小团体的主要原因是“性格相近”和“兴趣爱好相同”，选择人数分别为 344 人 (34.1%) 和 348 人 (34.5%)；其次是“住家距离较近”，占 20.9%；“伙伴多才多艺，您很佩服他”占 7.7%；选择“其他”原因的占比为 2.8%。

从年级分布来看，中年级（三、四年级）学生受地缘因素影响较大，而高年级学生更倾向于基于心理契合与兴趣相投形成小团体。这说明，随着年龄增长，学生结群的动机逐渐从外在条件转向内在兴趣与情感认同（见表 1、图 1）。

表 1 学生间结成小团体的成因

选项	各级人数				总人数	百分比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住家离的较近	50	81	47	33	211	20.9%
性格相近	41	106	105	92	344	34.1%
伙伴多才多艺，很佩服他	16	31	20	11	78	7.7%
你们有相同的兴趣爱好	34	95	135	84	348	34.5%
其他	0	9	15	4	28	2.8%

图 1 学生间结成小团体的成因



【研究者访谈补充】

研究者：请问您对您班级小团体的基本情况了解吗？例如是否存在，具体的规模等。

教师受访者 A：我大概了解咱们班小团体的情况。班里确实有几个小圈子，有的是住一个小区的孩子凑一块儿玩，有的是因为喜欢同款游戏聊得来，还有的就是单纯脾气相投。这些小团体的界限都不算清晰，基本都是玩到一块儿就聚着，有其他同学想加入的话，大家也不会排斥。不过女生的小团体相对会敏感一点，个别孩子会用打趣调侃别人的方式，来让自己的小圈子显得更抱团。

教师受访者 B：这些团体男女生都有。男生的小团体通常根据他们平常的游戏或者打球等情况，女生的情况比较复杂，她们更多是因为一些小秘密走在一起，比如说共同喜欢哪个明星、对哪个男生有好感。亦或是共同的“敌人”……这个班女生小团队的稳定性并不稳固。这些小团体规模大多在 5 到 6 人，偶尔会变动。

结合访谈和量化数据可以发现，小团体在小学中高年级具有普遍性与自然性，其形成主要源于兴趣、性格等心理社会因素，而非刻意排他。

2.小团体类型结构

在调查的 1009 人中，构成小团体的成员类型以“积极上进的好学生”居多，占 54.4%；其次为“能玩到一起的同学”，占 31.6%；“家庭背景差不多”的占 10%；“不受老师待见的学生”占比最低，仅为 2.7%。

从小团体性质来看，娱乐型占比最高 (72.9%)，其次为学习型 (49.0%) 和性格相投型 (45.4%)，地缘相近型占 23.7%。此外，91.5% 的学生认为自己的小团体“很团结”，80% 的学生认为小团体内部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准则”。这表明，小团体已成为班级中较为稳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参见表 2-4，图 2)。

表 2 小团体的成员构成

选项	各级人数				总人数	百分比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积极上进的好学生	88	171	187	103	549	54.4%
不受老师和同学待见的学生	7	8	7	5	27	2.7%
能否玩到一起的同学	34	100	89	93	316	31.6%
家庭背景差不多	10	41	32	17	100	10.0%
其他	2	2	7	6	17	1.7%

图 2 小团体的成员构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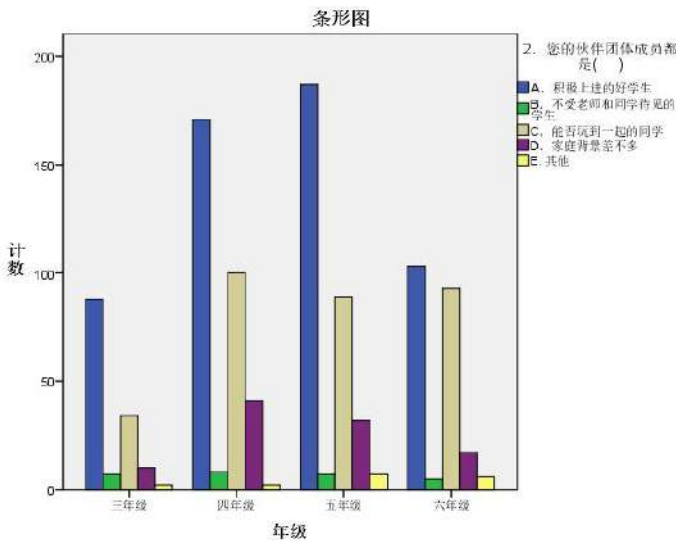


表 3 您的伙伴团体很团结

选项	伙伴团体很团结		伙伴群体有自己的规范和准则	
	选择人数	百分比	选择人数	百分比
是	923	91.5%	807	80%
否	86	8.5%	202	20%

表 4 您认为您所在班级小伙伴团体的类型是(可排序多选)

选项	选择人数	总人数	百分比
娱乐型	736	1009	72.9%
学习型	494	1009	49.0%
地缘相近型	239	1009	23.7%
性格相投型	458	1009	45.4%
其他	10	1009	1.0%

(二) 小团体的规模与活动特征

1.小团体的规模

数据显示，小团体的典型规模集中在 3 人 (29.0%) 和 6 人 (28.3%)，其次为 4 人 (18.9%) 和 5 人 (14.9%)。此外，91.1% 的学生表示在班级中拥有要好的朋友，说明几乎所有学生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到同伴群体中。

这一结果表明，小团体在小学中高年级学生中不仅普遍存在，而且结构较为稳定，大多数学生都能在班级中找到归属感与情感支持群体（见表 5－表 7）。

2.小团体的活动特征

在活动形式方面，调查发现学生最常从事的活动是“玩游戏” (43.2%) 和“体育运动” (28.5%)，其次是“打电子游戏” (10.2%) 和“看电影或视频” (6.4%)。此外，11.6% 的学生选择“其他”活动，如聊天、手工或兴趣小组。

在活动偏好上，72.8% 的学生表示“更喜欢参加小团体活动”，仅 27.2% 的学生更倾向参与班级或学校组织的集体活动（见表 8－表 9，图 3）。这表明小团体在满足学生个体化社交需求方面具有显著优势，其活动形式更灵活、更贴近学生兴趣。

表 5 您所在的伙伴团体的成员数目

选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3 人	293	29%
4 人	191	18.9%
5 人	150	14.9%
6 人	286	28.3%
其他	89	8.8%

表 6 您所在班级的朋友数目

选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1 人	40	4%
2 人	90	9%
3 人	135	13.4%
4 人	333	33%
其他	410	40.6%

表 7 班中每位同学是否都有要好的朋友

选项	在您班中每位同学都有几个要好的小伙伴	
	选择人数	百分比
是	919	91.1%
否	90	8.9%

表 8 和要好的伙伴们课余时间，经常从事的活动是

选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看电影或看视频	65	6.4%
玩游戏	436	43.2%
体育运动	288	28.5%
打电子游戏	103	10.2%
其他	117	11.6%

表 9 判断更喜欢参加班级活动或伙伴群体活动

选项	与班集体学校活动相比较，您更喜欢参加伙伴群体活动	
	选择人数	百分比
是	735	72.8%
否	274	2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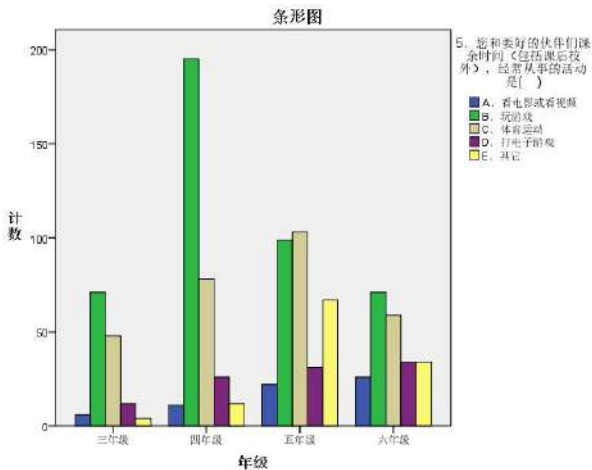


图 3 和要好的伙伴们课余时间经常从事的活动

(三) 小团体影响分析

1.小团体的总体影响

62%的学生认为“同伴间互相影响”是小团体中行为变化的主要原因；23.9%的学生认为受“社会不良风气”影响；8.3%的学生认为是“原本学习差的学生互相影响”；3.2%认为“老师教育不当”导致；2.6%选择“其他”

在积极影响方面，48.7%的学生表示“交到朋友”是加入小团体的最大收获，33.2%认为“有助于学习”，11.1%认为“促进兴趣培养”，仅 5.6%选择“避免被欺负”。

总体来看，52.7%的学生认为小团体对班级教育工作具有积极作用，27.7%的学生认为既有积极也有消极影响，仅 4%认为纯粹消极（见表 10－表 12，图 4－图 5）。这说明，小团体在小学阶段总体上发挥了正向功能，但其影响具有复杂性和双重性。

表 10 小团体的影响

选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伙伴间相互影响	626	62%
原来就是些差生	84	8.3%
老师教育不当	32	3.2%
社会不良风气影响	241	23.9%
其他	26	2.6%

图4 小团体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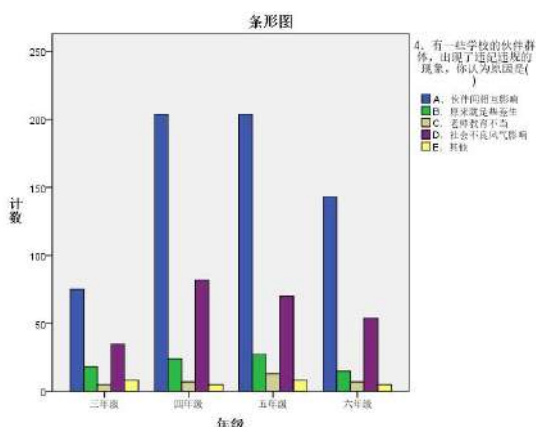


表11 加入伙伴团体对您最大的帮助

选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交到朋友	491	48.7%
帮助学习	335	33.2%
不被其他同学欺负	56	5.6%
兴趣培养	112	11.1%
其他	15	1.5%

表12 您认为班级学生的小团体对班级教育工作的影响

选项	选择人数	百分比
积极的	532	52.7%
消极的	40	4%
有积极也有消极	279	27.7%
没有影响	154	15.3%
其他	4	0.4%

2. 相关分析结果

学习成绩与学习风气的相关性：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学习成绩与所在小团体学习风气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 $r=0.307$ ， $p<0.01$ ）。这表明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更容易形成积极的学习氛围，小团体的学习文化具有一定的同质性和互促进作用。

家庭经济状况与学习风气的相关性：学生家庭经济状况与小团体学习风气之间也存在显著正相关（ $r=0.251$ ， $p<0.01$ ），说明家庭条件较好的学生所在团体的学习风气整体较佳。虽然相关强度为中低水平，但具有统计显著性，提示家庭经济地位对学习取向可能存在间接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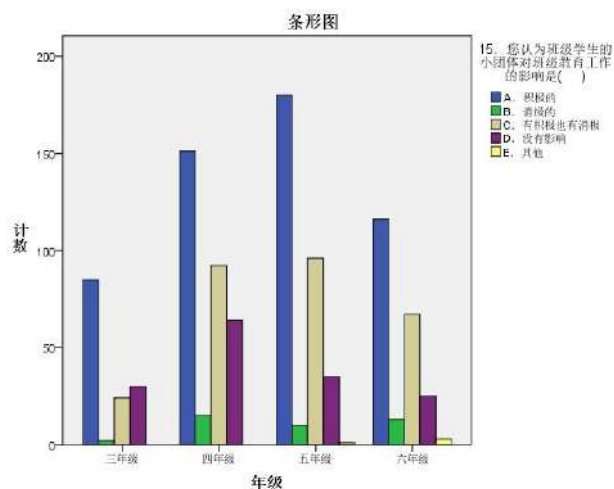
年级与班级活动积极性的相关性：分析结果

显示，学生年级与班级活动参与积极性之间存在显著负相关（ $r=-0.137$ ， $p<0.01$ ），表明年级越高，学生对班级活动的参与度越低。这意味着在教育管理中应特别关注高年级学生的集体归属感与参与动力。

性别与学习风气的相关性：学生性别与小团体学习风气之间存在微弱但显著的负相关（ $r=-0.124$ ， $p<0.01$ ），女生所在的小团体学习风气评分略低于男生，提示性别差异可能影响团体的学习氛围。访谈资料进一步印证了该结果——教师普遍认为女生小团体的情感波动较大、关系更敏感，容易受情绪因素影响学习氛围。

年级与学习风气的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学生年级与小团体学习风气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r=0.000$ ， $p=0.991$ ），说明团体学习风气不受年级差异影响，是相对独立于年龄层次的社会因素。

图5 您认为班级学生的小团体对班级教育工作的影响



【研究者访谈补充】

研究者：请问您对您班级小团体的基本情况了解吗？例如是否存在，具体的规模等。

教师受访者 B：六年级新接的班级里有过小团体。最初只是个人从集体活动的一些微妙细节感受到，比如表扬一些人的时候会有几个同学翻白眼；比如总是有几个固定的孩子突然不见，躲起来做其他事情，窃窃私语，老师一来立刻闭嘴。随着跟学生的认识跟谈话的深入，最终确认班级里存在若干个小团体。

这些团体男女生都有。男生的小团体通常根据他们平常的游戏或者打球等情况，女生的情况

比较复杂,她们更多是因为一些小秘密走在一起,比如说共同喜欢哪个明星、对哪个男生有好感。亦或是共同的“敌人”……这个班女生小团队的稳定性并不稳固,且出现过A自残,B模仿自残的情况

研究者:您如何看待小团体成员间交往?

教师受访者B:我觉得小团体成员最初聚在一起时初衷不一定是坏的。比如有自残的那一个小团体,最初在一起,是因为都觉得家人不怎么关心自己(普遍存在要么家庭暴力、要么重男轻女、要么家长太忙顾不上自己),最初的时候,他们互相支持,倒是给了对方一定的情感支持。

教师受访者A:对于这种小团体,适合找到她们的共同点,逐一击破,转换负面情绪为积极的。感觉这类型她们都是关心对方的,比较好转化。男生小团体我目前没有很好的办法。就是他们毕业后,团体成员就分散了,情感链接上不太强。

教师受访者B:不过女生队伍中,也有单纯因为看一些人不顺眼而聚在一起的。这种小团体流动性强,且内部也容易互相攻击。

三、研究结果讨论

(一)小团体形成的心理与社会机制分析

本研究通过多维度分析发现,小团体形成的主要原因是“兴趣相同”和“性格相近”,这与马斯洛(Maslow, 1943)提出的“社会归属与情感需要”理论相一致。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处于从家庭依附向同伴依附过渡的关键时期,渴望获得同伴的接纳与情感支持,因此容易以共同兴趣或心理契合为纽带自发结群。

从社会心理学角度看,Tajfel (1981)的社会认同理论进一步解释了小团体的形成机制:个体通过群体成员身份获得自我认同感和社会定位,从而增强安全感与归属感。在小学阶段,这种社会认同往往建立在情感与兴趣的基础上,而非明确的社会目标或意识形态。

(二)小团体的积极影响

1. 促进学生社会化与情感成长

小团体为学生提供了表达自我与获得同伴支持的空间,使学生在互动中学习沟通、合作、包容与自我调节等社会技能。访谈结果显示,多数

学生认为小团体能带来“安全感”和“归属感”,这对儿童社会情感能力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

2. 强化学习动机与互助机制

调查结果显示,学习成绩与小团体学习风气呈显著正相关($r=0.307, p<0.01$),说明积极的小团体氛围有助于营造学习支持系统。学习型小团体内部常存在模仿与竞争机制,成员间通过相互激励促进学业成就。

3. 增强班级凝聚力与组织认同

适度的小团体能促进班级整体互动,形成内部多元合作的结构。教师若能有效引导,使不同小团体在活动中协作,可进一步强化班级认同感与集体荣誉感,推动形成积极向上的班级文化。

(三)小团体的消极效应与潜在风险

尽管小团体总体上具有积极功能,但若缺乏教育干预,也可能产生排他与分化现象。

1. 排他性与社交分化

小团体内部的高度认同与紧密联系,在加强成员归属感的同时,也可能无形中构筑“社交壁垒”。非成员学生可能因兴趣、性格或背景差异被排除在互动圈外,从而感受到被孤立或边缘化。这种分化若不加以引导,容易在班级中形成“小圈子”文化,削弱整体的凝聚力,甚至引发群体间的隔阂与对立,影响学生社会性发展的包容性与多元性。

2. 学习取向偏差

以娱乐、消遣为主导的小团体,若缺乏正确价值观引导,可能使部分成员过度沉浸于休闲活动,逐渐淡化学习目标与进取心。更值得注意的是,团体内部有时会形成一种“反学习亚文化”,将勤奋视为“不合群”,从而产生“逆向榜样效应”——即学业表现懈怠的成员反而获得更高团体声望。这种风气可能干扰学生的学习动机,长期不利于其成长发展。

3. 人际冲突与情绪传染

小团体成员间情感联结密切,但也因此更容易因小事产生摩擦,尤其在情感细腻、关系导向较强的女生团体中,误解、竞争或意见分歧可能被放大,引发人际紧张。同时,团体内部情绪易快速“传染”,一人焦虑、抱怨或消极情绪可能迅速蔓延,影响整个群体的心理健康与氛围。若不及时疏导,可能升级为持续的关系冲突,损害

学生的情感安全感与社交能力发展。

这些现象印证了群体动力学中的“内群体偏好效应”与“外群体排斥效应”，提示教育者应在承认小团体自然存在的前提下，关注其负向演化的风险。

四、教育引导策略

1. 接纳并正向引导小团体存在

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正视并接纳小团体存在的客观性与合理性。有一些老师可能会认为个别学生存在小团体主义，影响了班级团结，会以偏概全认为小团体都是会影响班级的团结或会对学生的不良影响。但是到了小学中高年级，学生的社会认知和交往能力都在迅速发展，小团体的产生具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作为教师的角度可以更多地思考如何引导小团体向正向发展。

2. 构建融合性集体活动平台

作为班主任老师及心理老师，可以就随着年级越高参与班集体活动积极性降低这一现象，有针对性地设计一些融合性强、趣味性高的集体活动，增强班级凝聚力，多创造小团体之间及与班级整体互动的机会。发现一些可能存在消极影响的小团体组织，班主任可以进行私下了解，在日常班级活动中多促进小团体与班级其他同学的沟通交流，也可以增进全体学生之间的友谊，降低小团体在班级的负面影响。

3. 强化积极团体的榜样作用

要发挥“学习型”等积极小团体的辐射作用，引导其风气，并多关注边缘学生，发现他们的闪光点，创造机会让他们被集体需要。同时，也要

善用团体中核心孩子的正向影响力，引导小团体风气向阳生长。我们的目标并非消除小团体，而是超越小团体。让边缘学生加入到正向的小团体中，促进班级的和谐与整体凝聚力的提升。通过积极引导，让小学中高年级小团体成为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班级建设的重要力量。

五、结语

小学中高年级学生小团体是一种普遍存在且具有双重效应的社会现象。它既能为学生提供情感支持与学习互助平台，也可能导致社会排斥与群体分化。教育者应从理解与引导的角度出发，通过科学的教育干预，使小团体成为促进学生社会化、提升班级凝聚力的重要力量。

参考文献：

- [1]何杰.班级中的小团体及同伴交往问题[J].广东教育(综合版),2009,(02):19-21.
- [2]杨渝川,郑淑杰,陈欣银,等.同伴团体对儿童青少年学业成就和社会功能关系的影响[J].心理学探新,2003,(02):45-50.
- [3]包克冰,徐琴美.学校归属感与学生发展的探索研究[J].心理学探新,2006,(02):51-54.
- [4]李沛沛,黄程,寇彧.社会排斥与个体助人意愿:归属感需求的调节作用[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7,25(04):597-602.
- [5]俞国良.儿童社会发展及其培养[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 [6]刘斌.高校大班教学的同群效应——基于对经济学课程教学中“小团体”的实证观察[J].重庆高教研究,2020,8(03):78-88.

科研反哺教学：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最新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的实践

关晓颖¹ 郭伟圣¹

(1.广州医科大学 生物医学工程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36)

摘要：为满足《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本科课程建设需求，本研究以近三年干细胞领域前沿成果为教学素材，围绕基因编辑干细胞干预糖尿病、类器官等方向，探索科研与教学融合路径。结合教学实践，构建“基础理论—技术转化—临床应用—伦理规范”四位一体育人体系，整合权威案例，采用多元教学方法，践行科研反哺教学理念。实践表明，学生核心能力得到显著提升。本研究梳理成果转化路径，为破解教学科研脱节、深化高教改革、培育创新人才提供可复制范式与参考。

关键词：科研反哺教学；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类器官技术；本科教学改革；临床转化

基金项目：2025 年度广东省本科高校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84

Research Feeds Back into Teaching: Practices in Translating Cutting- Edge

Research Achievements in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into Teaching

Content

Xiaoying Guan¹, Weisheng Guo¹

¹ School of Biomedical Engineering, Guangzhou Medic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1436

Abstract: To meet th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needs of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 Tissue Engineering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this study takes cutting-edge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stem cells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as teaching materials, focusing on directions such as gene-edited stem cell intervention in diabetes and organoids, to explore the path of integrating scientific research with teaching. Combined with teaching practice, a four-in-one talent training system of *basic theory—technology translation—clinical application—ethical norms* was constructed, authoritative cases were integrated, and diverse teaching methods were adopted to practice the concept of research feeding back into teaching. Practice shows that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have been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path of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providing a replicable paradigm and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eepening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and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 Research feeding back into teaching; stem cells and regenerative medicine; organoid technology; undergraduate teaching reform; clinical translation

作者简介：关晓颖（1980-），女，副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为组织工程、教学改革；

郭伟圣（1990-），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纳米医学、工程教育。

通讯作者：郭伟圣

一、引言

生命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人类社会逐步进入“器官再造”与精准医疗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凭借其在疾病治疗、组织修复、器官替代等领域的颠覆性潜力,驱动 21 世纪医学变革,成为全球科研领域的前沿热点^[1-2]。当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科研创新活力强劲,行业市场需求呈现持续增长态势,但本科教学实践中仍存在明显短板,教学内容更新滞后于科研前沿,实践教学与真实科研场景严重脱节,这些问题直接制约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质量,难以满足行业发展的迫切需求^[3-4]。

科研反哺教学正是破解这一困境的有效路径,其核心在于将最新科研成果、前沿研究方法及批判性学术思维系统融入教学全过程,实现教学内容的动态更新与教学质量的精准提升^[5]。我们以《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本科课程为实践载体,探索近三年干细胞领域前沿成果向教学资源转化的科学路径,结合本科学生的认知规律设计教学实施方案、构建多元化教学评估体系,力求为推动理工科课程与前沿科技深度融合,提供切实可行的实践支撑与理论参考^[6-10]。

科研反哺教学绝非简单的科研成果堆砌,其核心是构建“科研—教学”双向互促的良性生态体系,将科研过程中形成的知识体系、研究方法、思维模式及价值理念,有机融入教学的各个环节,推动教学从单纯的知识传授,向能力培育、思维塑造的深层次转变^[11]。结合国内外现有教育研究成果,并结合自身一线教学实践,持续更新课堂教学内容,有效缓解传统教材滞后于科技发展的现实困境。在教学中适时补充前沿实践案例,将高水平学术研究成果融入课堂研讨,可确保教学内容紧密贴合学科发展前沿,助力学生掌握与时俱进的专业知识^[12-14];在能力培育层面,引导学生深度剖析科研案例、自主设计实验方案,既能夯实专业理论基础,又能切实锤炼批判性思维、科学探究能力与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契合高等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也与创新型人才的

培养导向高度契合^[15];在情感塑造与价值引领方面,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中器官修复、攻克疑难病症等兼具科学价值与人文温度的现实案例融入课堂,能够让学生切实体会本专业的社会价值与现实意义,进而树立正确的职业认知,为今后的专业发展与职业深耕筑牢根基。

结合多年教学实践观察,当前国内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本科教学普遍存在“理论滞后、实践薄弱”的双重矛盾,在理论教学层面,现有教材仍以干细胞基础概念、基本分类等传统知识为主,对 2020 年后涌现的类器官技术、器官芯片、基因编辑干细胞临床转化等前沿成果覆盖不足,导致学生难以把握学科发展的核心趋势^[16];在实践教学层面,传统实验多以细胞培养、染色观察等基础操作为主,实验设计缺乏科研逻辑性与临床针对性,无法模拟真实科研场景中“干细胞定向分化调控”、“临床转化可行性分析”等核心环节,学生的实践能力培育效果大打折扣。

哈佛大学推行的“科研导师制”,为本科学生配备干细胞领域的科研团队导师,引导学生深度参与真实科研项目;剑桥大学采用的“课题嵌入课程”模式,将干细胞临床转化相关科研课题拆解为教学模块,实现科研与教学的无缝衔接^[17-18]。国外顶尖高校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教育中,已形成成熟的科研反哺教学模式,为我国相关教学改革提供了有益借鉴。

二、研究方法

2.1 教学内容重构:四维一体化教学体系构建

以近三年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突破性成果为依据,结合本科学生的认知规律与专业培养目标,重构“基础理论—技术转化—临床应用—伦理规范”四维一体化教学内容体系。各维度的具体内容与对应教学形式,详见表 1。该体系打破传统线性教学局限,融合各教学维度,既夯实学生理论基础,又引导其把握技术前沿、理解临床价值、树立伦理意识。

表 1 “基础理论 - 技术转化 - 临床应用 - 伦理规范”四维一体化教学内容体系

维度	具体内容	教学形式
基础理论	干细胞分类(胚胎干细胞、iPS 细胞、间充质干细胞)、分化调控机制、免疫调节特性、微环境调控作用	互动讲座、三维动画演示、科研文献精读研讨
技术	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糖尿病技术、3 类器官构建核心技术、器官	虚拟仿真实验、科研论文拆解分析、

转化	芯片集成技术	技术操作视频演示
临床	干细胞治疗脊髓损伤、帕金森病精准干预、心肌梗死修复、卵巢	临床病例深度分析、临床专家线上访
应用	功能重塑、角膜再生临床案例	谈、临床转化路径研讨
伦理	干细胞研究的道德边界、胚胎干细胞研究伦理准则、患者隐私保	伦理辩论工作坊、政策法规解读、角
规范	护规范、技术商业化风险防控	色扮演模拟

2.2 教学方法创新：多元化教学模式设计

依托高校生物 3D 打印实验室，为学生开展类器官实体构建实训，配备类器官构建试剂盒，引导学生运用 3D 生物打印技术，亲手完成肺类器官、胰岛类器官等微型组织模型的构建，全程观察干细胞分化与组织形成的过程，这种实践方式既能提升学生实验操作能力，也能培养其科研观察能力与严谨的科学态度。

引入前沿案例嵌入式教学，筛选近三年干细胞领域具有代表性的最新研究成果，包括 Vertex 公司 hESC 衍生胰岛细胞治疗 1 型糖尿病的 III 期临床试验结果、韩国团队开发的 3D 堆叠脑类器官阵列技术等，将这些前沿成果转化为标准化教学案例，课堂上引导学生深度分析案例中的技术原理、临床价值及应用前景，让学生在案例研讨中掌握前沿知识。针对干细胞领域的争议性伦理议题，比如“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是否应扩大至非致命性疾病”、“日本批准全球首款 iPS 细胞产品的国际舆论两极分化”等问题，组织学生开展情境模拟伦理辩论，让每组学生分别扮演科研人员、临床医生、伦理学家、患者等不同角色，在辩论中深化对伦理规范的理解，培育社会责任感^[19]。

顶刊文献深度精读也是重点采用的教学方法，选取《Cell》等顶级期刊中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高质量论文，由教师拆解论文的研究背景、技术路线、实验设计与结论逻辑，再指导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文献汇报、观点互评与学术质疑训练，通过高频次、结构化的文献研讨，帮助学生快速接轨国际学术前沿，强化科研思维、学术表达与批判性分析能力。

2.3 实施对象与评估体系设计

为客观全面评估教学效果，构建多维度可量化评估体系，包含四项指标：一是知识理解能力，以期末考试干细胞专题得分量化；二是科研创新能力，通过学生课程结束提交的“干细胞技术应用方案设计”作品，由 3 位专业教师盲评打分；三是伦理意识与决策能力，依据伦理辩论表现结

构化评分；四是学习动机与兴趣，结合课程兴趣度问卷数据及半结构化学生访谈质性资料评估。

三、研究结果

3.1 学生核心能力明显提升

教学评估数据显示，学生在知识理解、科研创新及伦理意识方面均有明显进步。课程结束后，学生对干细胞核心理论的掌握更扎实、运用更灵活；科研创新上，其提交的干细胞技术实施方案中不乏新颖可行的思路，科研思维与创造力显著提升；伦理意识方面，学生在辩论中逻辑更严谨、思考更全面，对相关政策法规的理解更为透彻，伦理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3.2 学生学习动力与专业认同增强

兴趣度调查显示，学生学习积极性与投入度显著提高。访谈中多名学生表示，接触最新科研案例后，真切体会到干细胞技术的价值与发展前景，探索热情明显提升；类器官构建实验让他们全程参与科研流程，既提升了动手能力，也增强了专业自信心；伦理辩论则让他们认识到，科技创新既要勇于突破，也要坚守伦理底线、履行社会责任，这种认知深化其作为未来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感，专业认同感大幅增强。

3.3 典型教学案例教学反馈

针对三大核心案例的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各项实践活动均达成预期目标。在基因编辑干细胞治疗糖尿病案例学习中，78%的学生说：“通过仔细研究 Vertex 公司的临床试验，不仅搞清了基因编辑的原理，也了解了从实验到临床的全过程，对技术转化更有信心”；在类器官构建实验中，85%的学生表示：“亲手做类器官模型，能直接看到干细胞分化和组织形成的样子，比光听理论更直观，实验操作和观察能力都得到提高”；在伦理辩论工作坊中，90%的学生认为：“通过角色扮演和多角度辩论，能更全面地思考科技发展的伦理边界，既加深对规范的理解，也锻炼了批判思维和社会责任感。”

四、讨论

本次教学实践表明,科研反哺模式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本科教学中具有独特价值,可使课堂内容兼具时代性与学科前沿性。类器官技术、器官芯片、基因编辑临床转化等最新科研成果系统融入课堂,有效弥补了传统教材更新滞后的不足,确保学生所学与学科发展同步^[21]。以“基础理论—技术转化—临床应用—伦理规范”为框架的四维教学体系,构建学生能力培养递进路径,推动学生从机械记忆转向实操创新。该模式凝聚教、学、研合力,前沿案例提升教学吸引力,学生新颖思路也为教师科研提供启发;目前全体学生通过科研兴趣小组加入教师团队,实现教学与科研双向滋养^[22]。

推行科研反哺教学过程中,我们针对遇到的现实难题提出对应解决办法,保障模式落地见效。部分专业教师虽干细胞科研功底扎实、经验丰富,但缺乏科研成果课堂转化的经验方法,导致成果转化效率低、学生难以有效吸收。对此,我们建立双聘激励机制,将教学转化成果纳入教师考核以调动积极性;定期开展教学能力培训,邀请教育学科科研人员及有经验教师传授成果转化方法;组建跨学科“科研+教学”团队,联合开发教学案例与资源^[23]。本课程中的多个教学案例,均源自授课教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将相关科研成果系统转化为课堂教学内容,实现科研与教学的深度融合,保障教学内容的科学性与前沿性。干细胞领域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的研发具有技术难度高、资金投入大的特点,单一高校独立开展平台建设,难以承担其研发成本与技术维护压力,这是当前高校在干细胞相关课程教学中面临的突出难题。为有效破解该难题,教学团队积极加强与科研机构、行业企业的协同联动,推进教学资源共建共享机制建设。本次课程所采用的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由广州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开放共享,为课程教学的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与医疗器械企业合作,开发类器官构建教学专用试剂盒,大幅降低教学成本;此外,积极申报国家级、省级虚拟仿真教学项目,争取政策与资金支持,为教学模式的持续推进提供保障^[24]。

伦理意识属于隐性能力,传统的评估方法难以精准量化,评估结果往往主观性较强,这是伦理教学面临的主要挑战。针对这一问题,设计结构化伦理评估评分表,从逻辑思辨能力、论据充分性、政策法规熟悉度、团队协作表现等维度,

设置具体的评分标准;同时,采用“过程性评估+结果性评估”相结合的方式,将学生在伦理辩论中的表现、课程论文中的伦理分析部分、案例讨论中的发言等,均纳入评估体系,有效提升了评估的客观性与全面性。

结合本次教学实践的经验与反思,建立教学内容动态更新机制十分必要,建议成立由科研人员、一线教师、行业专家组成的课程内容更新委员会,每年筛选领域内的最新科研成果,更新教学案例库,确保教学内容始终紧跟科技前沿,避免出现“教材滞后于科研”的问题。干细胞与再生医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其发展离不开生物信息学、材料科学、临床医学、伦理学等多学科的支撑,因此在教学中应注重融合多学科知识,设计“干细胞+3D打印”、“干细胞+基因编辑”、“干细胞+人工智能”等跨学科教学模块,培养学生的跨学科思维与综合应用能力。此外,深化产学研协同育人也不可或缺,加强与行业企业、临床医院的合作,共建实践教学基地,开发企业定制化教学内容,缩短科研成果到教学应用的转化周期;为学生提供更多真实岗位实践机会,让学生在实践中提升专业能力,增强就业竞争力^[25]。

五、结论

本次研究以《组织工程与再生医学》本科课程为实践载体,将干细胞与再生医学领域的前沿科研成果系统转化为本科教学资源,创新性构建了“基础理论—技术转化—临床应用—伦理规范”四维一体化教学内容体系,同时融合类器官构建、前沿案例嵌入、伦理辩论、文献研讨等多元化教学方法,形成科学可行、可落地的科研反哺教学模式。

从实际教学来看,这一模式确实帮学生把知识学得更透,科研思维和创新力都有长进,伦理判断也更成熟,而且学习劲头和专业归属感明显变强,有效化解传统教学里“理论离科研太远、实践对不上需求”的老问题。为理工科课程如何与前沿科技真正结合,提供一套可照着做、能推广的实打实做法,对推动高校教学改革、提高创新人才培养质量,提供有益的参考价值。在此基础上,我们进一步将AI辅助教学融入科研反哺教学全过程,结合学生个体特点设计个性化学习路线,提升教学针对性与实效性;同时,积极推进国际联合课程建设,引进世界顶尖科研成果与优质教学资源,持续优化完善教学模式,为培养更多拔尖创新人才筑牢基础。

参考文献:

- [1]郭静莉,高建超,卞莲莲,等.国内外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监管科学研究进展[J].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2026,48(01):20-32.
- [2]郭晓蔚.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北京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研究员杨秋潭深入探究生物学机理实现再造器官生理功能[J].中国高新技术,2024,(07):9-10.
- [3]周琪.中国及中国科学院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概述[J].生命科学,2016,28(08):833-838.
- [4]曾洁,温启烨,李怡霖,等.“新医科”背景下医工融合双创人才培养优化实践[J].医学教育研究与实践,2026,34(01):9-13.
- [5]张艳青,张贞,张超,等.“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科研反哺教学探索[J].西部素质教育,2026,12(03):173-176.
- [6]郝莎,程涛.细胞与基因治疗产品的研究现状与未来[J].中国细胞生物学学报,2026,48(01):2-19.
- [7]李旺轩,王献抗,高丽兰,等.基于3D打印的生物制造研究进展[J/OL].天津理工大学学报,1-9[2026-04-02].<https://link.cnki.net/urlid/12.1374.N.20251028.1040.002>.
- [8]杨玉维,李敏,要智颖,等.类器官芯片在纳米药物递送系统研究中的应用及前景[J].化工学报,2024,75(04):1209-1221.
- [9]何卫红,赖旭龙,刘德民,等.“以点带面、融会贯通”培养创新思维的教学理念与实践[J/OL].中国地质教育,1-4[2026-04-02].<https://doi.org/10.16244/j.cnki.1006-9372.20260331.001>.
- [10]凌梦莹,王琼,崔文璟,等.以学生为中心理念下生物工程类专业“生物化学实验”课程的教学改革与实践[J/OL].生物工程学报,1-13[2026-04-02].<https://doi.org/10.13345/j.cjb.250701>.
- [11]蒋俊华,吴永辉,候卫周.“双一流”背景下科研反哺教学的思考[J].商丘师范学院学报,2024,40(03):92-94.
- [12]黄佩滢,彭思荣,张敬,等.气道类器官的培养技术及其在呼吸系统疾病中的应用进展[J].广东医科大学学报,2026,44(01):49-58.
- [13]范衍序,白易,张雅敏.CRISPR/Cas9 基因编辑技术应用于肿瘤治疗耐药性研究的新进展[J].天津医科大学学报,2025,31(02):180-183.
- [14]王瑶,肖志涛,张芳.医工协同的生物医学工程学科研究生创新培养体系构建[J].黑龙江教育(理论与实践),2026,(03):6-8.
- [15]宋泉.新工科产教融合育人模式的理论内涵、逻辑理路与实践进路[J].黑龙江教育(高教研究与评估),2026,(03):47-51.
- [16]龚佳欢,张琦.新医科再生医学复合型人才培养体系研究[J].基础医学教育,2025,27(10):1007-1010.
- [17]刘正伟,卢美艳.竺可桢对哈佛大学导师制的引进及实践[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49(6):182-195.
- [18]吴美婷,徐淑芹,谢安安,姜涛.OBE-CDIO理念下世界技能大赛模式嵌入护理英语课程教学改革实践[J].华夏医学,2026,39(1):152-160.
- [19]刘长君,张洪江.医学伦理学教学的临床疏离与实践缺位的思考[J].医学与哲学,2026,47(05):13-18.
- [20]容敏华,陈昱,柳亮.高校教师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的现状与路径[J].教育观察,2020,9(46):40-42.
- [21]胡良斌,李必文,唐永辉,李丽慧.基于学研教协同的机械精度设计与检测课程教学改革探索[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16(17):72-74.
- [22]潘金林.西南联大本科教育“教—学—研”共同体探微[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25,43(5):91-94.
- [23]袁国良,季昉,邢燕,胡青.科研项目驱动跨学科协同创新实践教学模式研究[J].教育教学论坛,2025(50):9-12.
- [24]张雪,潘立川,赵京丹,等.虚拟仿真实验教学平台建设与管理探索——以温州医科大学为例[J].温州医科大学学报,2025,55(11):935-941.
- [25]万遂人,张晓丽,刘爱玲,等.中国生物医学工程教育与行业发展概况[J].生物医学工程研究,2025,44(04):201-208.

人工智能赋能的高校数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探究 ——以《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为例

王立雄¹ 马迪¹

(1.湖南理工大学, 湖南 岳阳 414006)

摘要:《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作为理工科专业的数学基础核心课程,因其抽象程度高、理论与实践联系紧密的特性,对现有的教学模式要求也越来越高,人工智能技术为解决传统教学困境、构建混合式教学新生态提供了切实有效的途径。文章结合该课程教学实际情况,剖析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探究人工智能赋能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价值,并从优化教学内容、教学模式创新以及评价体系完善三个维度,提出具体的教学改革策略,并对实践成效进行分析,验证了教学策略的可行性,旨在为同类数学基础课程教师的教学实践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 混合式教学; 教学改革

基金项目: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编号:2026JJ90082)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85

An Exploration of Blended Teaching in University Mathematics Courses Empowered b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Taking the Course “Functions of Complex Variable and Integral Transforms” as an Example

Wang Lixiong¹, Ma Di²

¹ Hunan Institut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nan Yueyang 414006, China

Abstract: Functions of Complex Variable and Integral Transforms, as a core foundational mathematics course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demands increasingly sophisticated teaching approaches due to its high level of abstraction and clos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offers a practical and effective pathway to address traditional teaching challenges and establish a new blended learning ecosyste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actical challenges in teaching this course, explor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AI-enhanced blended learning, and proposes specific teaching reform strategies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innovating teaching models, and refining evaluation systems. It also analyzes the outcomes of these practices, validating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eaching strategies.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teaching practices in similar foundational mathematics courses.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nctions of Complex Variable and Integral Transforms; Blended Learning; Educational Reform

作者简介:王立雄(1992—),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学课程与教学法;

马迪(1994—),男,博士,讲师,研究方向为数学课程与教学法;

通讯作者:王立雄

随着人工智能 (AI) 技术被广泛运用, 在高等数学教育领域引入人工智能已经成为推动高校数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의必然选择。《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是电气信息类、通信工程以及自动化等专业的核心基础课程, 其在图像处理、控制工程和信号处理等许多领域具有广泛的应用价值, 该课程的教学质量对学生后续专业课程的学习成果以及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有直接的作用。但是在传统教学模式的范畴内, 此课程存在许多不足的情况, 例如抽象概念令人难以理解, 理论推导生硬缺乏趣味, 应用场景相互脱节以及学生参与程度偏低等。伴随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领域深度融合, 教育部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指出, 需运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 尝试开展全要素的横向评价以及全过程的纵向评价^[1-3]。混合式教学把线上教学的灵活特点和线下教学的互动特性相融合, 并且人工智能技术的助力让传统混合式教学的局限被进一步打破, 实现教学过程的智能化, 个性化以及精准化^[4]。基于此, 本研究将湖南理工大学的《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作为研究对象, 构建人工智能助力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通过重新构建教学体系, 革新教学方法, 完善评价机制来解决课程教学中的难题, 以此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 进而为新工科背景下数学基础课程教学改革的实践路径探寻提供可参考的思路。

1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在传统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1 教学目标偏重理论, 应用导向不足

传统教学目标存在过于重视复变函数的定义、定理推导以及积分变换的运算技巧的情况, 它把重点放在学生对公式和定理的记忆与理解上, 却忽略了对学生数学建模能力培育, 创新思维激发以及工程应用能力等方面的关注。课程教学与后续专业课程以及工程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脱节情况, 致使学生往往难以切实感受到课程的实际应用价值, 进而引发学习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

1.2 教学内容抽象枯燥, 适配性不强

课程的核心内容包含复数以及对其进行运算, 解析函数, 复变积分, 复级数, 留数理论, 共形映射, 傅里叶变换和拉普拉斯变换等关键部分, 该课程的概念体系具有抽象的特性, 逻辑结构十分严密, 而且演算过程颇为繁杂。传统教学的内容大多局限于教材范围之内, 缺乏与学科前沿, 工程实际的有机结合, 且未依据不同专业学生的需求进行差异化设计, 如此便难以很好地契合新工科建设对复合型

人才日益提高的培养要求。与此同时线上教学的资源分布比较零散, 缺乏具有智能化与系统性特点的学习资源来提供助力, 致使其难以高效地辅助学生开展自主学习活动。

1.3 教学模式固化单一, 互动性不足

传统课堂教学中比较缺乏探究性与互动性环节, 仍全程以教师主讲、学生听讲的灌输式教学为主。虽然现在有少部分教师开始尝试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但教学未能有效衔接, 线上多为资源推送和线下教学没有充分利用线上数据反馈优化教学过程, 导致缺乏个性化指导与实时互动, 并难以关注学生的个人差异而造成学生参与度低、课堂沉默现象普遍存在。

1.4 评价体系不够完善, 反馈滞后

传统课程主要使用期末考试成绩这单一的形式来评估课程整体的学习情况, 单一模式下过于重视学生知识的记忆, 知识计算能力的考核, 平时的过程评价成分相对来说较弱, 没有对学生思维过程、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等综合水平进行全面考核。单一的评估模式下绝大多数教师无法及时、准确地了解学生的学习进步情况, 也对课程学习中学生知识短板的状态了解不甚准确。这使得教师的反馈效果滞后, 授课教师不能据此及时把握调整今后的教学设计和教学手段, 从而进一步抑制这门课程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改善。

2 人工智能赋能混合式教学的实践价值

人工智能赋能的混合式教学, 是指将人工智能技术与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深度融合, 依托智能教学系统、大数据分析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及自然语言处理等技术手段, 实现教学内容动态适配、教学目标精准识别、教学过程智能调控、教学评价多元高效的新型教学模式。其核心在于以学生为中心, 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破解传统混合式教学中的个性化指导不足、互动性不强、评价不全面等问题, 构建“数据驱动、智能适配、知行合一”的教学新生态。因此, 人工智能驱动的混合式教学模式在实践层面具有以下三个方面价值:

2.1 提升教学精准度

通过学习通、雨课堂等学习平台采集学生线上学习数据、课堂互动数据及测试数据, 借助智能教学平台大数据分析技术深度挖掘学生的学习习惯与知识薄弱点, 从而为授课教师生成精准学情分析, 促进教学内容与教学策略的个性化精确匹配。

2.2 增强教学互动性

借助智能问答系统、虚拟仿真实验平台等工具,为学生提供实时答疑、沉浸式实践体验,打破时空限制,丰富互动形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与主动性。

2.3 优化教学评价

通过利用 AI 技术,实现评价数据的自动化采集、智能分析与实时反馈机制,建立了融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的综合性多元评价体系,以全面客观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效与综合素养发展水平。

3 人工智能赋能《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混合式教学改革策略

以新工科建设需求为导向,结合该课程特点与各个不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重新构建“知识+能力”的教学体系目标。

3.1 优化教学内容,实现精准匹配

利用 AI 技术建构智能教学资源。首先,借助智能学习平台(如学习通、雨课堂等)创设线上资源库,包括微视频、主要课件和知识点解析、随堂小练习、在线或网上虚拟仿真实验、案例库等教学资源;其次,基于虚拟仿真技术,设计复变函数几何意义的可视化演示模型,积分变换中重要定理、公式、实验的在线动态演示实验,把抽象概念可视化,减轻学习者认知负荷,大幅度减缓本课程的学习难度;最后,基于已有的人工智能技术智能答疑系统,及时满足和回答学生的问题,快速解决学生疑惑的问题等。

3.2 创新教学模式,构建智能互动

创新教学模式是进行混合式课程改革的重点,从课前、课中、课后这三部分分别运用人工智能技术进行教学改革,构建“课前自主预习—课中精准施教—课后强化巩固与实践提升”的混合式教学模式,促进线上线下教学的融合^[5]。

3.2.1 课前线上自主预习

教师课前可以通过学习通等智能平台布置预习任务,其中包含基础概念的练习题测试试卷和对应的教学微视频链接等。学生就可自主完成个人预习后,并参加在线的试卷测评,完成后的试卷会被智能平台自动批改,并同时生成每个人自己的学习进度报告,从而教师就利用这些报告精准识别学生的薄弱环节,并针对性调整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策略。与此同时,学校的智能问答系统在预习过程中提供实时 AI 机器人解答,实现个性化辅导。

3.2.2 课中线下精准施教

教师课中可以将课的模式确定为以“问题驱动、师生互动”引导,通过在线学习数据查询到学生哪

部分知识有问题,并针对该部分内容教师进行具有针对性地讲解。使用学习通、雨课堂、实时回馈等人工智能工具围绕这些问题展开问题讨论,要求所有学生都必须到学习通上回答问题并计平时分,就能较大程度提高学生对课堂的参与感。部分章节有以小组协作问题时教师可以提前一天到一周内分好组,进行小组讨论分组回答,包括有比较多的案例、项目展示等小组表演的内容,由此培养学生的团体合作和创新能力。只不过对于抽象的概念、定理,教师还可以从人工智能中模拟提供的动态图等来达到可视化的意图,这样就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抽象、理解难懂的知识。

3.2.3 课后线上线下强化巩固与实践提升

教师课后可以根据每堂课上表现和每堂课的效果,结合不同专业要求,有针对性地给学生布置作业、相关练习题,相应的作业、复习资料等会发布在学习通和雨课堂等智慧平台中,从而强化知识的巩固。课后提升上智慧平台发布傅里叶变换降噪、信号滤波等方面应用,拉普拉斯变换系统稳定性应用等方面的案例或典型习题,学生按照问题抽象、建模、算法设计、成果发布的过程和环节协作学习,优秀的同学还可加平时分。最后教师还可以利用智慧平台的大数据对学生的进行学习情况进行反馈分析,提供学生的个性报告并对学生进行个性化的提升资源推荐,指导学生参加各种数学建模等竞赛活动来进一步培养和加强学生实践能力。

3.3 完善评价体系,实现多元智能评价

传统上构建基于人工智能的“过程性评价+结果评价+能力评价”多元体系,从而全方位、客观化评估学生的学业表现与职业发展。过程性评价部分,利用 AI 智能技术实时收集学生在智慧平台上学习的行为轨迹数据,如课堂参与度、作业质量、小组合作表现、知识点掌握度等信息,利用智能算法实现多种方式对学生成绩动态数据进行分析,刻画学生的过程,以代替传统的简单的点名、作评估得分形式,评价“实”而“细”,连续度更高;结果评价部分,利用 AI 辅助客观题自动评分、对主观题进行语义分析评判得分(如对复变函数应用的案例报告的逻辑性、思考创意运用等进行智能分析),结合结果和期末成绩等全部结果信息,用加权方式对结果进行综合评判,实现评判的准确性,提高结果分数的客观性。能力评价部分,主要涉及课程核心的应用能力、职业素养,用 AI 工具评价学生在傅里叶变换降噪实践、拉普拉斯变换求系统分析等实际任务中问题抽象能力、建模能力、算法

设计能力等,还可以结合学生参加数学建模竞赛的成绩、数学表达的清晰程度,刻画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等,预估学生职业发展潜能,给每位学生赋能。其次, AI 工具可以把多方面的评价归合成可视化的评价报告,将评价报告推送给学生,给出一些个性化的改进意见;推送给教师,给出评价上可能缺乏反馈的不足之处,实现评价反馈和教学双向贯通,真正使评价起到“指挥棒”和“加油棒”的作用。

4 《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教学实践与成效分析

本文以湖南理工大学 2024 级电气自动化专业两个班的学生为研究对象,开展教学实践,目的是为了验证人工智能赋能混合式教学模式的策略可行性以及有效性。因此,选取电气 1 班 (51 名学生) 实施本文的创新教学策略,电气 2 班 (50 名学生) 采用传统混合式教学模式。两班的教学内容、进度、授课教师都是保持不变。进入试点教学之后,电气 1 班的教学过程是以人工智能教学平台为载体实现的智能课前自学、上课、课后强化、多种评价与测验;而电气 2 班课堂教学方式是线下传统教学+线上资料补充,评价方式以期末考试为主。通过一学年的教学实践,我们具体得到如下三个方面成效进行分析:

4.1 学习成绩显著提升

期末考核结果显示,电气 1 班学生的平均成绩为 74.3 分,然而电气 2 班学生的平均成绩为 69.2 分,电气 1 班平均成绩比电气 2 班高出 5.1 分;电气 1 班及格率为 88.2%,电气 2 班及格率为 80%;电气 1 班优良率 (80 分及以上) 为 36.8%,电气 2 班优良率为 24.5%。从而表明,人工智能赋能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成绩,帮助学生更好地掌握该课程知识。

4.2 学习兴趣明显增强

通过结课后对两个班的调查发现,电气 1 班 79.8% 的学生认为人工智能增强型混合式学习模式本身很有趣、高效,能激发兴趣。68.9% 的学生认为有意愿更积极地参与课堂讨论、课堂实践操作;72.5% 的学生认为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辅导帮助他们克服了挑战。相较之下,电气 2 班只有 52.2% 的学生认为传统混合式学习能激发兴趣,42.8% 的学生有意愿主动参与课堂讨论。可见,人工智能增强型混合式学习不但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意愿和学习热情。

4.3 综合能力全面提升

实践结束后,基于实践报告考核材料与访谈记录所形成的信息,得出电气工程 1 班学生在逻辑推理、抽象建模、工程应用及自主学习能力方面均有显著提升的结论。具体地说,有 75.3% 的学生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解决一般的工程问题,50% 的学生可以独立完成工程案例并安排具体的学习计划。电气工程 2 班这一数字分别为 53.3% 和 44.9%。由此可知,利用人工智能工具和方法来开展混合式教学对学生综合能力的提高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符合培养新一代工科人才的培养要求。

5 结语

人工智能应用到《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在破解传统教学困局、提高教学质量上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给《复变函数与积分变换》课程教学质量改革提供了有效途径。但它本身也存在一定的现实局限性。一方面,对于教育资源不发达的地区而言,由于该教学模式对网络技术条件、学习工具的依赖度较高,可能会影响学校和学生的学习参与度,使教学无法普遍覆盖。另一方面,人工智能算法的精准度有限,人工智能自身的缺点会制约对学生的客观准确的学习效果评价和个性化教学内容推送的精准度。但是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改进、教育信息化的不断发展,混合式教学模式将会逐步突破其局限性。不断地完善智能教学平台功能,扩大教学推广范围,逐步改进教学模式,最后达到课堂教学智能化、教学服务个性化。希望本文的一些探讨能给教师们课堂教学带来实践上的启发,为培养素质高、复合型工程人才拓宽新路提供可参考的信息。

参考文献:

- [1] 邵新慧,沈海龙,史大涛,等.人工智能赋能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范式改革与实践[J].大学教育, 2025, (20): 33-37.
- [2] 孙典,王莉,商立媛.人工智能赋能我国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困境及路径[J].现代教育管理, 2024, (6): 34-42.
- [3] 王勇勇.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编排设计》课程实践教学改革创新研究[J].新美域, 2025, (10): 177-179.
- [4] 李舒弘,薛清晨.人工智能赋能高校计算机理论类课程的教学模式创新研究[J].中国电子商情, 2025, 31(24): 10-12.
- [5] 李玲.融合人工智能技术的高等数学课程混合式教学改革与实践[J].数字技术与应用, 2024, 42(01): 134-136.

数智时代广播电视编导专业“真题真做”跨界融合路径研究

戴露¹

(1. 吉利学院 数字媒体学院, 四川 成都 641423)

摘要:数智传播时代, 传媒产业的数智化转型推动广播电视编导岗位能力需求从单一艺术审美创作, 转向技术应用、运营思维与市场转化力兼具的复合型能力。传统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教学存在实践脱节、能力培养与产业需求适配性不足的结构性问题, 造成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间的“能力断层”。本文立足产教融合背景, 界定数智时代广编专业企业岗位核心能力与“真题真做”教学模式的核心内涵, 剖析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错位问题, 重构广播电视编导岗位的核心能力维度。并以“真题真做”为实践载体, 从课程、师资、场域三个维度探索岗位能力与课程体系的跨界融合路径, 结合具体院校实践案例分析模式落地的实践成效与现存问题, 最终提出针对性的发展建议。研究表明, 该融合路径能有效消解教育与产业的场域隔阂, 推动学生从传统艺术创作者向专业内容运营者的角色转型, 为应用型本科院校广编专业教学改革提供实践范式。

关键词:数智时代; 广播电视编导; 真题真做; 岗位核心能力; 跨界融合

基金项目:吉利学院“三个校园”教学改革项目(2025SGXYJG096)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86

A Study on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Pathways for the “Practice with Actual Exam Questions” Approach in the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Major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Abstract:In the era of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communicatio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 industry has shifted the competency requirements for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directors from a focus on artistic and aesthetic creation alone to a set of multidisciplinary skills that integrate technical application, operational thinking, and market-oriented capabilities. Traditional university curricula for broadcast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programs suffer from structural issues such as a disconnect between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a lack of alignment between competency development and industry demands, resulting in a “skills gap” betwee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y need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his paper defines the core competencies required for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positions in the digital and intelligent era, as well as the core essence of the “real-world problems, real-world solutions” teaching model. It analyzes the misalignment betwee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industry demands and reconstructs the core competency dimensions for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positions. Using the “real-world projects” approach as a practical vehicle, this study explores pathways for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between job competencies and the curriculum system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courses, faculty,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By analyzing specific institutional case studies, it examines the practical outcomes and existing challenges of implementing this model, ultimately proposing targeted recommendations for development.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this integration

approach can effectively bridge the gap between educational and industrial contexts, facilitating students'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artistic creators to professional content operators, and providing a practical model for curriculum reform in broadcasting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programs at applied undergraduate institutions.

Keywords: The Digital Age; Radio and Television Directing; Practice with Actual Exam Questions; Core Job Competencies; Cross-Industry Integration

1 引言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与虚拟现实技术深度交织的数智传播时代,传媒产业正经历从传统内容生产向专业运营的范式变革。产业转型驱动了广播电视编导(以下简称广编)职业功能的深度重组,该岗位的工作范畴不再局限于单纯的视听艺术创作,而是延伸为专业工具应用、内容运营管理、全链路市场转化相结合的综合领域。行业对编导人才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发生本质变化,从单一考量艺术审美能力,转向强调技术应用能力与市场转化力的深度结合,具备实战能力的复合型新质人才成为产业核心需求。

然而,我国高校广编专业的传统教学体系难以适配行业的转型节奏,教育端输出的人才能力模型与产业端的实际需求出现明显的“能力断层”。一方面,教学内容仍偏重于传统视听语言与线性叙事层面,对行业主流的专业化运营思路、市场化创作标准的教学覆盖不足;另一方面,实践教学长期局限于封闭的校园实验室,模拟化的创作训练让学生作品脱离市场实际,难以满足行业的商业标准、合规要求与流量转化需求。如何以企业真实产业项目为依托,界定并培养数智化背景下广编专业的核心岗位能力,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脱节的困境,成为传媒专业教育教学改革的迫切命题。

面对产业变革带来的挑战,传统“围墙式”的教育模式已难以适应快速迭代的行业标准,基于无边界教育理论,打破物理空间与学科壁垒、构建校企协同的产教融合新生态,成为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路径。将企业真实生产任务、行业标准引入高校教学环节的“真题真做”模式,作为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新型实践教学形态,为实现企业岗位核心能力与高校课程体系的深度融合提供了有效载体。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索数智时代广编专业企业岗位核心能力与课程体系的跨界融合路径,结合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实际实践案例,验证模式的可行性与实操性,不仅旨在破解广编专业人才培养的现实困境,也希望为同类院校传

媒专业的人才培养提供可验证、可复制的课程重构思路与实践范式。

2 核心概念界定与错位分析

2.1 核心概念界定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广编专业的企业岗位核心能力重构,其本质是将数智时代核心职业岗位群的技术应用、运营管理、市场转化等能力要求,转化为教育教学目标和课程内容,使人才培养标准更加贴近实际工作需求[1]。基于这一逻辑,该岗位核心能力已突破传统视听语言组织、影视创作编排的单一能力范畴,成为技术工具应用与市场运营思维深度交织的复合型综合胜任力,形成了“创作实战+专业运营+商业思维”的三维能力矩阵。其中创作实战是显性的技术执行力,体现为对专业编辑工具、直播运营设备的掌握与短视频、直播内容的实际制作能力。专业运营是深层的职业素养,涵盖对平台运营逻辑的理解、内容数据的分析、受众行为的洞察以及内容合规的把控能力。商业思维是核心的价值导向,要求创作者具备内容营销思维、商品卖点提炼、流量转化落地的市场能力,这一能力矩阵要求广编专业学生实现从纯艺术创作者向专业内容运营者的角色跨越。

“真题真做”教学模式是产教融合背景下的新型实践教学形态,其核心逻辑在于将企业的真实生产任务、行业标准与商业诉求转化为高校的教学课例、实训要求与考核指标,实现教育场域与生产场域的无缝对接。依据情境学习理论,有效的知识获取与能力培养需发生在真实的职业情境中,该模式打破了传统校园模拟化实践的桎梏,严格遵循“任务来源真实、执行标准专业、评价反馈客观”的运行逻辑。通过引入企业真实的商业项目、行业素材与考核标准,让学生在高度还原的职业压力下开展实操训练,这种“干中学”的模式不仅能极大地缩短毕业生从校园到职场的心理与技能适应期,更能通过真实的生产反馈推动高校课程体系在动态循环中持续优化迭代,从根本上消解学术理论与行业实践之间的固有鸿沟。

2.2 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错位分析

当前高校广编专业人才培养与数智时代传媒产业需求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结构性错位,集中体现为教学与行业发展脱节、实践与商业生产逻辑割裂两大问题。教学与行业发展脱节体现为教学内容与行业专业化发展节奏的不匹配。数智时代,新的传播理论、技术和手段迭代更新周期日益缩短,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也不为过。特别是AI技术的突飞猛进,对传媒专业产生深刻影响[2]。然而事实上,因各种条件制约,高校广编专业的教学大纲仍多停留在传统视听语言、线性影视制作的层面。数字媒体技术、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新兴技术,正在全方位渗透广播电视领域,从内容创作到分发,都能看到新兴技术的影子。但部分高校广编专业课程内容未能及时跟进,对行业主流的专业化运营思路、市场化创作规范的教学覆盖不足,对专业工具的实操教学缺乏行业场景化应用[3]。部分高校虽引入了剪辑软件教学,但未结合电商直播、短视频运营等行业实际应用场景,也未涉及平台运营、内容合规等核心知识,不少学生在校期间仅掌握剪辑工具的基础操作,却对抖音、快手等平台的违禁词规范、视频制式要求一无所知,这种教学与行业之间的应用鸿沟,让学生毕业后面对企业的专业生产流程与运营要求时产生明显的适应障碍,揭示了高校教育资源配置与行业发展节奏之间的失衡问题。

实践与商业生产逻辑割裂体现为实践教学与行业商业生产逻辑的脱节。传统广编专业的实践教学长期局限于封闭的校园实验室,这种去语境化的“象牙塔”模式让学生的创作过程仅关注艺术表达层面的探索,而忽略了市场生存的硬性约束。由于缺乏真实的市场压力、数据反馈与商业诉求,学生的创作处于“无重力”状态,产出的作品往往不符合行业的品牌植入、平台合规性等标准化要求,也不具备市场所需的内容营销思维与流量转化能力。传统实践教学以艺术审美为核心的评价标准,与行业以完播率、互动率、商业转化率为核心的评价逻辑形成鲜明反差,如校园实践中的短视频作品常追求画面美感与艺术创意,却未考虑商品卖点植入、引流转化等商业需求,导致校园实践成果难以直接转化为行业生产成果,这种结构性矛盾凸显了广编专业实践教学从“实验室模拟”向“行业实战”转型的紧迫性。

3 数智时代岗位核心能力的维度重构

3.1 内容营销与商业脚本架构能力

数智化传播环境下,编导的创作重心已从单纯的艺术表现转向基于实际反馈的精准传播与商业转化,这也是区别于传统编导创作的核心特征,内容营销与商业脚本架构能力成为编导的核心能力之一。这要求突破传统的文学性叙事思维,依据5W传播模式与受众心理学,将传播效果与商业转化前置为创作的核心导向,精准分析碎片化传播场景下的用户注意力唤起机制,具备商品核心卖点提炼、目标受众画像分析与内容场景匹配的能力,让作品在满足审美需求的同时具备明确的商业转化潜能,实现从视听技术员向内容策划人的角色转变。

在脚本架构层面,创作逻辑也需从传统的文学性叙事全面转向功能性重组,以适配短视频碎片化、快节奏的传播特点。编导需要围绕营销目标拆解脚本结构,通过开篇3秒的“钩子(Hook)”设计瞬间夺取用户注意力,在中段进行深度的核心卖点植入(USP)以建立用户的价值认同,再以末端强有力的行动号召(CTA)引导用户完成点击、关注、购买等转化行为。这种高度标准化、脚本模型,成为编导岗位适配行业发展需求的核心技能,也是高校广编专业教学需要重点培养的内容,让学生在脚本创作中树立内容营销的核心思维,摆脱纯艺术创作的局限。

3.2 平台运营与流量统筹能力

在数智化运营时代,对平台运营规范的理解与流量意识的培养,已成为广编专业不可或缺的核心能力,对平台红线与运营机制的掌握程度直接转化为内容的“生产力”。传统的把关人理论在数智时代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内容传播的把关主体已由人工编辑演变为由平台规则、审核标准及法律法规构成的综合体系,任何艺术造诣极高的作品,若触碰平台红线、违背运营逻辑,都将失去传播的基础,因此深入研判不同平台的算法偏好、审核尺度与合规规范,成为保障内容生存与传播的首要前置条件。

在此基础上,广编专业还需具备主动的流量统筹能力,即平台规则实现传播最大化的“流量艺术”。这要求编导在实操中通过优化视频关键词、标签体系及封面设计等元素,精准触达目标画像人群,并根据完播率、互动率、转发率等实时数据反馈,动态调整内容创作与运营策略。这种对平台运营的主动适应,能让编导从被动的内容被选择者转变为主动的流量运筹者,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内容价值与商业价值的平衡。掌握平台运营与流量统筹能力,是广编专业学生从

“内容制作者”向“内容运营者”转型的关键，也是适配行业数智化运营需求的核心素养。

3.3 数智工具与技术实操能力

数智化工具的熟练应用是编导的基础实操能力，也是连接艺术创作与市场运营的重要桥梁，直接决定了内容生产的效率与质量，更是高校广编专业弥补教学与行业发展脱节问题的关键突破点。相关研究表明，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需要具备技术融合与创新能力、跨媒体的内容创作能力，以及数据分析与应用能力[4]。数智时代的传媒行业已形成一套标准化的数智化内容生产体系，涵盖视频剪辑、数字人制作、直播运营、内容分析等多个环节，要求编导具备跨工具的操作能力与实操思维。

具体而言，需熟练掌握 Adobe Premiere Pro、Final Cut Pro、剪映等主流视频剪辑工具，能够根据不同平台的制式要求高效完成视频剪辑、音效包装、字幕添加、品牌标识植入等操作，独立完成符合行业标准的视频制作。同时需掌握 AI 脚本生成、数字人直播制作等数智化创作工具，通过技术实操提升内容生产效率与创意呈现效果。此外，仍需具备基础的数据分析工具能力，能够通过平台后台抓取流量数据、分析用户行为，为内容创作与优化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撑。数智化工具的应用能力与实操思维已成为衡量编导岗位胜任力的基础指标，也是高校广编专业实践教学的核心内容。

4 “真题真做”模式下跨界融合的实践路径

以“真题真做”为载体的产教融合实践，是实现企业岗位核心能力与应用型本科高校广编专业课程体系跨界融合的关键路径。该路径以重构后的编导岗位核心能力为导向，将企业的制式要求、工作流程、评价标准全面融入高校教学的各个环节，本文以吉利学院广编专业的实践项目为具体案例，从课程内容、师资协同、场域素材三个维度，实现教育场域与生产场域的深度融合，推动广编专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4.1 课程内容重构与任务模块化

课程内容重构的核心是教学大纲与商业准入标准的深度融合，高校需以重构后的编导岗位核心能力为依据，构建“传统技能+AIGC 技术+艺术创新”的进阶式实践课程集群。具体而言，就是删减与行业发展脱节的传统教学内容，将 AIGC 创作模块融入传统影视技能课程，增设数智工具应用、平台运营、内容营销等核心内容，进而构

建岗位能力与教学模块的直接映射机制[5]。吉利学院广编专业结合传媒产业数智化运营需求，开设《数字人电商运营》特色课程，设置抖音平台运营规则、短视频剪辑流程及规范等核心专题，各专题均围绕岗位核心能力设计教学内容，同时要求学生在“真题”约束下遵循行业技术参数与制作标准，推动课程产出物从个人化“艺术实验品”向标准化“商业产品”转型，确保学生学得技能无缝对接产业端商业投放需求。

在课程内容重构的基础上，需按照行业真实的编导岗位工作流将实训流程重组为逻辑递进的生产模块。依据建构主义教学法，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 提出，学习者会基于已有的知识背景，积极地去理解当前面临的新情境，从而获取新知识。学习的过程并非仅仅是被动地从外部环境中接收信息，而是学习者主动探索、发现和构建知识的过程[6]。基于这一理念，在整个实训周期从商品供应链调研、商业脚本设计，到利用数智化工具完成素材二次创作与成品交付，形成全流程闭环。该校广编专业在实训中让学生以团队为单位完成全流程任务，根据自身优势分工协作，在各生产节点的推进中掌握专业工具技巧，建构行业逻辑，实现从“学习者”向“生产者”的身份跨越。

4.2 双导师机制与多元评价体系

双导师协同育人机制是跨界融合的核心支撑，协同育人的关键在于建立基于不同知识背景的协作共同体，企业导师与校内教师并非简单的先后衔接，而是在教学全过程中的深度嵌入与能力互补：一方面，协同备课授课，校内导师梳理理论体系与教学框架，企业导师融入行业最新标准与实战案例，共同设计动态适配的教学内容；另一方面，跨场景协同教学，校内课堂夯实专业基础，企业场景开展实战演练，通过线上互动专区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实时答疑与资源共享[7]。形成“行业实战+理论提升”的协同育人格局。

该校广编专业在实践中形成了成熟的双导师运行模式，邀请电商运营、短视频创作等领域的行业一线专家担任企业导师，通过直播课、线下授课讲解行业标准与实战案例，发放行业专属讲义，针对学生实战作品进行专业点评，导入市场准入标准与职业规范。校内教师则负责学理转化与教学管理，将企业导师的碎片化行业经验系统化，分班开展实训指导，针对脚本写作、剪辑实操等环节的问题进行一对一点评，让学生结合专业理论吸收行业实战经验，消解“教室”与“工

位”的认知隔阂。

在双导师机制的基础上,同步推进评价体系的革新,将传统的学术评价体系重构为多维度的编导职业胜任力考核体系,核心在于实现评价主体的多元化与评价指标的客观化。采用企业导师与校内导师各占50%的打分机制,企业导师依据市场反馈与行业标准评价作品商业价值与合规性,校内导师从学理层面评价艺术表达与专业技巧。同时将出勤、课堂表现、课后作业纳入平时成绩,期末成绩以实战作品为核心,考核标准从“画面美感”转向合规性、技术熟练度、转化潜力等行业导向维度,促使学生以职业人视角审视创作成果。

4.3 合场域功能置换与真实素材整合

合场域功能置换与真实素材整合是“真题真做”模式落地的重要保障,只有让广编专业学生在高度还原的职业情境中开展实操训练,才能真正实现编导岗位能力的有效培养,让教学过程具备行业级的实战含金量。

合场域建设的核心逻辑契合“第三空间理论”,其本质是打破“校园教学空间”与“企业生产空间”的二元对立,模糊校园与社会的边界。这种场域融合不仅体现为实体空间的升级——将校内机房、实验室进行专业化升级,配备专业设备,承接企业真实业务需求,或联动企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更包含数字空间的拓展,搭建线上资源共享平台,让学生与双导师不受时空限制开展实时交流、案例共享与问题研讨,实现实体第三空间与数字第三空间的协同互补,最大化提升“真题真做”的场域适配性[8]。该校广编专业以专业机房为实训主场地,配备专业剪辑软件与设备,联动企业云端实训平台,让学生在校园环境中体验真实企业办公流程与协作模式,适应现代职场办公要求,降低未来角色转换成本。

教学素材的核心革新是实现从“模拟素材”向“商业资产”的跨越,引入企业一手商业素材是培养学生职业敏感度的关键。在实训中由合作企业提供真实商业素材,要求学生结合商品核心卖点进行二次创作,创作过程中需严格遵守版权规范与平台要求,还原行业真实创作场景。通过大规模、高频率的真实素材创作实战,让学生积累行业实操经验,验证创作逻辑有效性。同时校企共建教学素材资源库,将企业真实素材、行业标准纳入资源库,实现教学资源长效循环,进一步提升“真题真做”的实战含金量。

5 实践成效与现存问题

5.1 实践案例落地成效

该校在与新媒体行业企业的校企合作实践中,以“数字人电商直播实训”为主题的“真题真做”项目落地实施,覆盖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及网络与新媒体专业学生百余人,设置抖音平台运营规则、短视频剪辑规范、商业脚本写作、数字人直播电商等核心实训专题,累计完成超千条符合行业标准的短视频作品创作。取得了多维度的实践成效,成为跨界融合路径可行性的直接验证。

从学生能力提升来看,超90%的广编专业学生能熟练运用主流数智化工具完成符合行业标准的短视频制作,85%的学生掌握商业脚本架构逻辑,78%的学生能准确识别并规避平台违禁内容,学生的技术实操能力、市场思维与合规意识均得到显著提升,实现了从“艺术创作者”向“内容运营者”的思维转变。从企业反馈来看,合作企业对60%以上的学生作品给予“可直接商业投放”的评价,30%的作品达到“爆款潜力”标准,部分学生因表现突出获得企业的实习与就业邀约,学生的职业胜任力得到行业直接认可。从人才培养质量来看,参与项目的毕业生进入头部传媒企业、电商平台、新媒体机构的比例较传统培养模式大幅提升,就业竞争力与就业质量显著改善。有效缩短了学生从校园到职场的适应周期。

5.2 模式实施中的现存问题

尽管“真题真做”跨界融合模式取得了显著的实践成效,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着多方面的问题与挑战,集中体现在四大维度:其一,校企合作机制稳定性不足。当前校企合作多依赖项目制合作形式,缺乏制度化保障。企业因业务调整、工期变动易导致实训资源缩减、计划调整,影响教学的统一性与持续性。其二,双导师资源配置不均。兼具丰富行业实战经验与系统教学能力的复合型导师数量有限,企业导师线下指导的时间难以保障,校内导师行业实践经验不足,难以满足学生对前沿行业知识与实操技巧的学习需求[9]。其三,实践内容与岗位匹配度有待优化。部分实训项目存在重剪辑、轻运营的问题,进阶内容的覆盖时长不足,且学生团队分工固化问题,部分学生难以接触到内容策划、平台运营等核心工作环节。其四,数智化教学资源适配不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广编专业实践教学资源仍以传统拍摄、剪辑设备为主,缺乏AIGC智能创作工具、专业操作软件及配套数字化素材库的教学支撑,

且 AIGC 技术与平台规则迭代速度快,教学资源更新滞后于行业发展节奏,导致“真题真做”的数智化实操训练与行业实际存在偏差。

6 结论

数智化转型背景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岗位核心能力已重构为“内容营销与商业脚本架构能力+平台运营与流量统筹能力+数智化工具与技术实操能力”的三维复合型矩阵,传统教学因与行业发展脱节、实践脱离商业生产逻辑,造成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间的“能力断层”。“真题真做”作为产教融合的有效载体,以岗位能力为导向,通过课程内容重构、双导师机制、场域功能转型与素材整合,将企业标准与工作流程全面融入教学,实现岗位能力与课程体系深度对接,有效打通教育与产业的壁垒。为推动模式持续落地,需健全校企长效协同机制,优化双导师队伍建设,完善实训内容与评价体系,推动“真题真做”全学段阶梯式覆盖,不断提升广编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更好服务数智时代传媒产业发展。

参考文献:

- [1] 谢莉花,曾世羊,侯梅霞.产教融合背景下岗位能力与人才培养标准衔接研究——以职业能力标准为核心纽带[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5,(24):28-38.
- [2] 李秀卿.数智时代民族地区高校传媒人才培养路径——以西昌学院为例[J].西昌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38(01):121-128.
- [3] 王佳茵.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课程教学存在的问题及创新策略[J].西部广播电视,2025,46(05):70-73.
- [4] 胡飒刘爽,马月香.融媒体时代高校广播电视编导专业人才培养策略[J].西部广播电视,2024,45(10):134-138.
- [5] 岳小玲,王一臻.AIGC 背景下广播电视编导专业实践教学的改革与探索[J].北方传媒研究,2026,(01):122-125.
- [6] PIAGET J. Psychology and Epistemology: Towards A Theory of Knowledge[M]. London: Penguin, 1972.
- [7] 李洪玲.产教融合背景下舞蹈表演专业“双导师制”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J].大众文艺,2026,(03):86-88.
- [8] 唐亚南,吴南中.高职教师专业实践培养的第三空间:建构逻辑、内容体系与路径生成[J].教育与职业,2023,(14):71-76.
- [9] 李娜.电商人才培养“双导师制”的现实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J].商业文化,2025,(22):95-97.

芬兰托育服务保教结合的制度逻辑及其教育启示

董柯筠

(福建师范大学, 福建 福州 350117)

摘要:我国托育服务体系尚未形成统一的管理网络,存在“保”与“教”相分离的问题。探究芬兰托育服务保教结合的制度逻辑,可以为我国托育服务的未来提供借鉴。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系统分析了国家、专业、医疗、社区、家庭五重制度逻辑的核心诉求及其互动机制。研究发现,芬兰保教结合形成的原因是五重制度逻辑通过共同目标、规则和行动实现了协同整合。结合中国托育服务的现状,我国应确立教育框架的主导地位,构建保教结合课程体系,强化专业逻辑的中介功能,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

关键词:芬兰;托育服务;制度逻辑;保教结合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87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of the Integr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in Finnish Childcare Services and Its Educational Implications

Dong Kejun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China

Abstract: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 system has not yet formed a unified management network and suffers from a separation between "care" and "education." Exploring the institutional logic behind the integr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in Finland's childcare services can provide valuable less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hildcare system. Drawing on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ory,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core demands and interactive mechanisms of five institutional logics: the state logic, professional logic, medical logic, community logic, and family logic.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integr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in Finland is achieved through the synergistic coordination of these five institutional logics via shared goals, shared rules, and shared actions. In light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China's childcare services, China should establish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educational framework, develop an integrated care and education curriculum, strengthen the mediating function of professional logic, and activate the participation of diverse actors.

Keywords: Finland; Childcare Services; Institutional Logic; Integration of Care and Education

作者简介:董柯筠(2002—),女,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比较教育学。

通讯作者:董柯筠

据《中国统计年鉴 2025》数据显示, 2024 年我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99‰, 0-14 岁人口比重下降至 15.8%, 65 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至 15.6%^[1]。这些指标表明我国人口正在“负增长”的阶段, 并面临着“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生育作为影响人口发展的关键因素, 是应对人口问题的重要一环。有研究将“生育友好型社会”界定为: “在社会结构、政策制度、文化观念和资源配置等多个层面, 全面支持家庭生育和育儿的社会形态。”^[2] 据此, 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构建需要为儿童早期发展提供系统性的教育支持与家庭照护保障, 也就是托育服务方面的保教结合。“保”和“教”是托育整体的不同方面, “保”是保护幼儿的健康, “教”则是向幼儿传授知识经验, “保”与“教”的有机融合是托育服务系统性发展的基础。然而, 当前中国的托育服务仍面临“托育服务管理网络尚未统一, 缺乏统一的主管部门, 各部门管理割裂, 横向沟通难度大”^[3]等碎片化问题, 难以形成跨部门协同推进保教结合的制度合力, 制约了 0-3 岁婴幼儿早期教育服务的有效供给, 致使家庭养育负担难以得到有效缓解, 社会生育意愿亦因此受到抑制。

芬兰作为北欧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 在支持儿童福祉的国家条件总排名中位列前茅^[4]。在组织早期儿童教育与养护的过程中, 行政管理权归属于教育与文化部, 法律又明确规定市政当局应与负责教育、体育、文化、儿童保护以及其他必要的社会福利、咨询和卫生保健机构开展制度化合作, 并特别强调教学法^[5], 形成了以教育部门为主导、多领域协同参与的早期儿童发展支持网络, 促进了保教的有机结合。鉴于此, 本文基于制度逻辑理论为分析框架, 对芬兰的十部核心法案进行系统解读, 系统分析芬兰托育服务制度逻辑的核心诉求和互动关系, 结合中国的托育现状, 以期为我国构建科学育人的托育服务体系提供借鉴。

一、芬兰托育服务的制度逻辑分析框架

制度逻辑反映了特定领域中稳定存在的制度安排和相应的行动机制, 这一逻辑塑造了相应的行为模式^[6]。大规模的制度变迁由多重过程和机制共同构成, 唯有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中, 才能准确把握各自的作用^[6]。这意味着制度变迁受到多重逻辑的约束, 不同的制度逻辑将导向不同的行为取向。桑顿 (Patricia H. Thornton) 等也将制度

逻辑分为家庭、社会、宗教、国家、市场、专业、企业七个类型并分析了它们的运行逻辑以及彼此之间的互动关系^[7]。

芬兰托育服务整体上形成了以《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法案》(2018) 为核心, 以《国家早期教育与保育核心课程》(2022) 为教育指南, 并以《基础教育法》(1998)、《儿童福利法》(2007)、《市镇基本服务政府补贴法》(2021)、《幼儿教育保育客户收费法》(2016) 等为支撑的法律体系。《儿童早期教育与保育法案》将儿童利益放在首位, 将幼儿早期教育与保育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以下简称 ECEC) 定义为“一个系统化、目标导向的整体, 由养育、教育和照护组成, 特别强调教学法^[5]”, 打破了“保”和“教”的二元划分, 将照护内化成为婴幼儿教育整体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 芬兰托育服务制度是兼具明确教育属性和跨部门协同的制度架构。不仅如此, 芬兰托育服务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多专业团队合作, 合作由 ECEC 教师、社会教育者、保育员以及一些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人员构成^[8]。其整合托育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会福利机构和家庭的优质资源, 为每一个婴幼儿提供个性化、连续性、综合性的早期发展计划, 促进每个婴幼儿的全面成长、发展、健康和福祉, 支持和保障婴幼儿的学习, 尊重婴幼儿的权利, 发展婴幼儿的人际交往和互动能力^[5]。由此可见, 芬兰的托育是保与教的结合体, 涵盖照护、养育以及潜能激发和早期启蒙教育多重功能。其运行嵌入于复杂多样的制度逻辑之中, 适合采用多重制度逻辑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基于此, 本文识别出影响芬兰托育服务运行的五个关键行为主体, 即中央政府与市镇政府、ECEC 机构、医疗卫生机构、社区机构、家庭, 并结合桑顿的制度逻辑划分形成了国家逻辑、专业逻辑、医疗逻辑、社区逻辑、家庭逻辑这五重核心制度逻辑。在托育服务中, 不同的行为主体遵循着各自的制度逻辑。当不同的逻辑能够达成协同时, 制度才能够更加有效地运行。因此, 该框架试图探析芬兰托育服务的这五重逻辑的互动是如何实现保教结合的。

二、芬兰托育服务中五重制度逻辑的内涵

在芬兰的托育服务体系之中, 国家、专业、医疗、社区、家庭这五重制度逻辑在推动保教结合方面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这些制度逻辑分别代表不同主体对托育服务的核心价值诉求, 以下分别阐述每一重制度逻辑在托育服务中的内涵。

（一）国家逻辑

国家逻辑的诉求是保障所有婴幼儿都能获得高质量的早期教育，并通过托育服务实现特定的社会目标，倾向于通过定量的评估和定性的标准来实现服务的可控性。具体来说，国家希望托育服务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家庭，并且能够缓解低生育率的问题和促进女性就业，同时控制公共支出在可承受范围内。因此，国家需要确保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托育服务能够达到基本一致的质量标准。这样的诉求决定了国家倾向于在托育服务方面采取统一、规范、可预测的管理方式，将教育与文化部作为管理部门。

（二）专业逻辑

专业逻辑强调以特定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为基础，通过专业协会和认证体系来规范行为^[7]。专业逻辑由幼儿教师、社会工作者和学者主导，其核心是“儿童本位”的教学法。在专业逻辑中，“保”与“教”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核心诉求是让托育服务建立在科学的知识体系之上，通过专业知识和技能促进婴幼儿个人的整体成长、健康和福祉。这样的诉求决定了专业人员希望托育服务是有目的、有计划、可评估的专业实践，从而倾向于强调教育在保教结合中的核心地位。

（三）医疗逻辑

医疗逻辑依托于芬兰著名的儿童保健诊所（Neuvola）系统及其专业人员，其核心诉求是保障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和早期发展，预防疾病和健康问题的发生。医疗系统希望托育服务能够与健康检查进行有效的互动和衔接，让婴幼儿的健康信息能够在不同的系统之间流动。不仅如此，医疗系统同样关注托育环境的安全性、营养膳食的合理性以及身体活动的充足性。这样的诉求决定了医疗逻辑倾向于将托育服务视作健康检测和早期干预的重要场所，以及时发现婴幼儿发展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

（四）社区逻辑

社区逻辑的代表是社区及其成员，其核心诉求是托育服务能够融入居民的日常生活，成为社区生活的一部分。一方面，社区及其成员希望托育服务在空间上方便可及，能够减少通勤成本。另一方面，社区及其成员希望托育服务能够利用社区现有的资源，与社区的相关设施相互连接，让托育服务能够与实际的社区生活相协调，成为邻里交往和互助的一个平台。这样的诉求决定了社区逻辑倾向于强调托育服务的就近和融入，追

求便利、开放和归属感。

（五）家庭逻辑

家庭逻辑的核心诉求是托育服务能够满足家庭的育儿需求，即真正服务于婴幼儿的福祉，同时不给家庭带来过重的经济和时间负担。一方面，家庭希望托育服务是安全可靠且有质量的，是能够放心将孩子托付出去的。另一方面，不同的家庭有着不同的需求。有的家庭需要全日的托育以支持父母的工作，有的家庭需要半日或临时托育，有的家庭只需要在家的托育服务；有的家庭注重托育的质量，有的家庭看重托育的便利程度，有的家庭则注重托育的成本。这样的诉求决定了家庭逻辑倾向于选择的自主性和需求的匹配性。

三、芬兰托育服务五重制度逻辑的互动：保教结合的形成机制

这五重制度逻辑在托育服务中有着不同的价值诉求，而芬兰托育服务保教结合的真正实现依赖于不同逻辑之间的有效互动，其制度逻辑在国家逻辑的主导下形成了制度化的互动机制。以下从共同目标、共同规则和共同行动这三个层面的制度化互动展开分析芬兰托育服务保教结合的形成机制。

（一）共同目标的形成

国家逻辑通过立法将ECEC明确定义为教育，为其他逻辑提供了共同的价值方向。在芬兰的托育服务发展过程之中，国家及教育行政机构是重要的驱动力量，通过法律和政策保障所有婴幼儿平等享有高质量托育服务的权利。芬兰政府在托育服务上采取由教育部门牵头的“统一制”管理模式^[9]，国家逻辑在其中起着主导作用。2013年，ECEC管理权从社会事务与卫生部转移到教育与文化部。追溯过往，会发现芬兰的ECEC从主要作为有子女家庭的社会服务，转向教学机构和终身学习的起点。这一转变使ECEC作为教育体系一部分的身份得以强化，并强调了ECEC作为终身教育路径第一步的重要性。后续法案将ECEC定义为“由养育、教育和照护组成的整体，特别强调教学法”，将教学法放在核心地位，更是明确了教育在托育服务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这意味着无论是医疗的介入、社区的支持还是家庭的参与，都要服务于“促进婴幼儿全面发展”这一共同目标。

专业逻辑为国家确立的共同目标注入了具体的内涵，使不同逻辑的诉求建立在共同的科学知识体系之上。《国家早期教育与保育核心课程》

(以下简称为“核心课程”)一方面是芬兰托育服务国家逻辑的产物,具有法律约束力;另一方面又是专业逻辑的核心载体,其内容是由专业知识和研究汇聚而成。核心课程将“我成长、活动和发育”被设定为五大学习领域之一,涵盖健康、营养、安全等通常被归属于医疗范围的内容。不仅如此,核心课程还强调“学习与思考能力、文化适应与交流能力、自我照顾及日常生活管理能力、多元读写能力、数字能力、主动参与的能力”六大横向能力^[10],这些能力的培养需要专业、医疗、社区、家庭的协同配合。因此,不同逻辑的诉求都在这一共同目标下找到了具体的要求,形成教育目标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 共同规则的建立

在芬兰,每名接受托育服务的婴幼儿都必须拥有个人ECEC计划,这是保教结合在个体层面的具体体现,更是多重制度逻辑在微观层面达成一致的制度载体。首先,个人ECEC计划实现了不同逻辑信息之间的合法化整合。根据法案的规定,ECEC的组织者和提供者有权免费从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教育当局、医疗保健和社会福利当局以及其他ECEC服务提供者和专业人士获取必要的信息。这强制规定了医疗信息、家庭观察、社区资源等不同信息的整合,从而合法地流动到教育决策之中,使保育需求能够在教育中得到体现。其次,个人ECEC计划促进了不同逻辑之间的双向互动。整合信息的过程是不同逻辑交叉互动的过程,比如儿童保健诊所的健康检查结果会作为婴幼儿的资料输入到托育服务的个人计划之中,而托育服务中对婴幼儿的观察也会反馈到医疗机构以供参考。再次,该计划应根据婴幼儿的需求进行至少每年一次的审查,并且只有要有需求就应及时修订,在不同的逻辑之间建立起了责任共担机制。

信息整合是制度载体内容的丰富,而不同逻辑诉求的互动还需要通过不同专业背景的专业人员之间的协作机制得以落实。芬兰托育服务的多专业协作主要发生在两个层面,一是机构层面,ECEC与医疗、福利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联合评估;二是中心内部层面,不同专业背景的人员的日常合作。ECEC人员的职前培训涵盖三个层次,包括侧重于教育科学的大学、侧重于婴幼儿照护的中等职业教育机构以及侧重于社会科学和健康的应用科学大学^[8]。各专业的人员汇集到托育机构共同工作,通过团队会议、协同教学等形式实现日常协作。同时,芬兰法律还规定了托育

中心内部教师、社会教育者与保育员的配比。这种人员构成和合作机制不仅确保团队在数量上形成了合理的知识互补结构,还让不同逻辑的诉求得到了有效的回应,确保了保教结合在制度上的稳步实现。

(三) 共同行动的实现

芬兰托育服中不同制度逻辑的互动促进了共同目标和共同规则的形成,最终又借助专业逻辑的中介功能在实践中实现了共同行动,推动了保教结合机制的进一步完善。芬兰托育服务的国家逻辑和专业逻辑将不同逻辑的诉求转化为实际的教育实践。

第一,芬兰托育服务将医疗逻辑的早期识别和健康保障转化为实际的教育行动。芬兰的国家儿童保健诊所(Neuvo)的目标之一就是“预防和减少儿童福祉水平的差异”,并且大力强调健康检查、早期干预以及确保儿童整体福祉的预防措施,以保障儿童获得多样化和同等质量的支持^[11]。芬兰的儿童医疗体系并不是独立于托育体系之外,芬兰托育体系致力于通过专业医疗服务保障儿童的身体健康和早期的发展,为婴幼儿提供科学和规范的照护服务。首先,医疗相关信息会通过个人ECEC计划被纳入到教育决策之中。医疗机构会对儿童进行定期的健康检查和生长发育检测,用于识别儿童的健康与否并整合为儿童的个人教育与保育计划。当评估儿童是否需要特殊支持时,医疗专业人员也必须参与评估^[5],让医疗评估成为教育的决策内容之一。其次,医疗诊断结果会被转化为具体的教育活动安排。当医疗系统发现某个儿童存在发育迟缓或慢性疾病,专业人员会据此在计划中加入必要的医疗护理计划、相关学习与发展目标和必要的活动安排等内容。最后,游戏作为婴幼儿的主要活动内容,是促进婴幼儿健康与生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医疗逻辑在保教结合中运作的一种象征。正如福祿贝尔所说:“当儿童的游戏,如同其整体发展一样,与整个生命和谐一致时,和平与喜悦、健康与生命的丰盈便归属于儿童。^[12]”在芬兰的托育实践之中,教师会有意识地将医疗内容融入游戏活动,例如促进大小肌肉发展、感官统合等等。

第二,芬兰托育服务将社区逻辑的资源提供转化为具体的教育内容。在芬兰的托育体系中,社区逻辑强调从社区成员共同的价值观念和信任关系出发,将托育服务带入社区这片网络,关注集体的利益和本地的福祉。市政当局被要求要根据居住地组织ECEC,组织时应当力求在设置在

服务使用者附近,并考虑居住区的位置和交通连接^[5]。在此基础上,芬兰托育服务还将社区文化与资源渗透到了实际的课程安排之中。首先,芬兰托育服务建立了以社区为载体的教育场所。芬兰有各式各样的开放式照护服务,包括“游乐俱乐部”“家庭小屋”“公园托管”等。这些服务会面向居民社区,为其提供育儿讲座、育儿课程、育儿家庭等育儿信息等^[13],将社区的支持与有目的的教育活动相连接。其次,教师将社区的经验与资源转化为相关课程。一是芬兰幼儿教育及保育的使命之一是培养婴幼儿理解当地社区多样性并在其中实践的能力,并从伦理思维、世界观、地方社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媒体的角度来探讨此主题。二是如果社区引进了新的公园活动资源,专业人员会将其转化为具体的课程内容。例如,教师引导婴幼儿对社区中的自然资源进行观察或将自然材料转化为婴幼儿手工材料,以此培养婴幼儿对自然的认知,加强体能的训练以及社会交往能力等。三是,社区网络被纳入婴幼儿支持体系。《儿童福利法》规定在要求儿童安置离家之前,还需要调查儿童是否有机会与儿童亲近的其他人一起生活^[14],明确了对社区网络的依赖。这是社区逻辑在婴幼儿教育和保护的制度化表达,也同样要求专业人员具备识别和调动社区资源的能力。

第三,芬兰托育服务以教育实践满足了家庭逻辑的育儿需求。在芬兰的托育服务中,家庭逻辑是需求方的角色,托育服务的发展最终还是要回应家庭的需求,使保教结合始终围绕着婴幼儿的实质发展运作。首先,芬兰政府为国民提供了多样化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国民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模式,如中心式照护服务模式、家庭式照护服务模式和开放式照护服务模式等。其次,婴幼儿个人教育与保育计划也要与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共同制定。托育服务需要围绕着家庭的需求不断调整和整合,与此同时,还需要持续地反馈给家庭。如果有家庭提出孩子在家有不良的卫生习惯,专业人员会将该信息记录在个人计划中,实践过程中会重点实施相关的引导策略。最后,抚养婴幼儿的主要责任在于监护人,幼儿教育及保育是为了支持和补充家庭的教育任务,芬兰将家庭视为婴幼儿成长的首要场所,家庭环境和核心家庭在历史和文化上被建构为婴幼儿成长的最重要环境。尽管工作人员在ECEC教学法方面拥有专长和专业培训,但监护人才是真正了解孩子的人,他们更能够表达孩子的需求。因此,

各类家庭支持政策为家庭托育服务创造了条件。除了各式各样的育儿假,《幼儿教育和保育客户收费法案》中明确规定要根据各个家庭的收入确定ECEC的收费机制^[15],《市镇基本服务政府补贴法》中提到要通过失业率、外籍语言使用者比例等指标调节财政资源分配^[16],这种收费机制和财政分配机制实际上是国家逻辑调配各类资源共同保障幼儿托育服务权利的重要体现。

四、芬兰经验对中国托育服务的教育启示

芬兰托育服务保教结合的制度逻辑主要是“国家主导、专业实践、多方参与”的整合机制,这样的机制让不同主体的诉求在共同目标、共同规则、共同行动三个层面达成协同。因此,基于前文对芬兰五重制度逻辑内涵及其形成的保教结合机制,并结合我国托育服务发展的现实困境,以下提出相关的教育启示。

(一) 确立教育框架的主导地位

芬兰的托育服务由教育与文化部统一管理,并通过立法,建立起了一个能够给不同诉求提供价值方向的教育大框架。而我国幼儿发展的整体性与部门职能的割裂化之间的矛盾是我国托育服务供需错配的重要成因^[17]。我国0-3岁托育由卫生健康部门主管,3-6岁学前教育由教育部门主管,形成了“托幼分离”的管理格局。卫生健康部门侧重于0-3岁婴幼儿的保育与健康检测,教育部门侧重于3-6岁儿童的早期教育与能力发展,使得托育服务的“保”与“教”被割裂为两个部分。上海市针对此问题已经先确立了由教育部门负责的0-3岁托育服务工作,并联合其他相关部门对托育机构进行监督和指导^[18]。因此,我国应在托幼一体化条件成熟的地区先行试点,将0-3岁托育逐步纳入教育部门的管理范畴,以确立教育框架的主导地位为保教结合的制度前提。而在条件不成熟的地区,至少要先在国家层面明确托育服务的教育属性,确立教育在托育服务的核心地位,使得各方面的逻辑都能以“促进婴幼儿的全面发展”为共同目标。

(二) 构建保教结合的课程体系

芬兰托育服务的保教结合的重要体现是建立起了以婴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课程体系,明确了教育、教学和保育是一个连贯的整体,婴幼儿是在所有的情境中学习、成长和被养育。芬兰的国家核心课程致力于培养婴幼儿的综合能力,将健康、安全等日常保育活动都赋予了教育的意义。而我国的托育课程仍旧处于起步的阶段,有

研究指出托班的课程体系是结合 3-6 岁的园本课程经验或是借鉴其他地方的出版教材自行摸索出来的^[17]。课程体系的不完善不仅会导致难以达成在课程中的保教结合目标,片面强调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等问题,更有可能危害婴幼儿的身心健康发展。因此,我国应当以婴幼儿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构建起完善的保教结合课程体系,将健康、安全等保育内容有机地融入日常课程内容之中。同时,应当加快推进托幼一体化课程的建设,实现 0-6 岁儿童教育内容的连贯与衔接,也能够进一步推动课程体系的专业化。在具体实施课程时,还应当重视游戏在课程实施中的重要作用,让“保”与“教”在婴幼儿的游戏中自然融合。

(三) 强化专业逻辑的中介功能,激活多元主体的参与活力

芬兰托育服务的专业逻辑是保教结合从理念走向实践的关键中介。芬兰 ECEC 人员拥有高标准的职前培训和职后工具,运用个人计划、教学记录等将医疗信息、社区资源和家庭需求转为成具体的教育实践,让不同逻辑的诉求都落实到科学的教育体系之上。而我国托育服务的从业人员专业水平参差不齐,缺乏统一的资格标准,没有相关资格证包括育婴师证或者幼儿教师资格证的教师占比 56.45%^[19]。大多数从业人员缺乏必要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难以满足婴幼儿的成长需求,也无法调动起来自不同逻辑的诉求分配。不仅如此,我国开设“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专业的学校多数集中在五六百所的高职院校中,人才规模难以满足行业的需求。因此,我国应尽快落实托育师资格考试和注册制度,建立起 0-6 岁托幼一体化师资格标准,明确专业岗位的学历和能力要求。在托育以及学前专业培养中,应当增强跨学科的意识,培养专业人员将不同逻辑的诉求转化成教育实践的意识 and 能力。除此之外,还可以借鉴芬兰的个人 ECEC 计划,建立独立的婴幼儿发展档案,作为整合不同信息的载体,实时跟踪婴幼儿个人的保育和教育状况。

然而,芬兰托育服务保教结合的有效实现并不仅仅依赖于专业逻辑的中介功能,还需要医疗、社区和家庭三者的深度参与和协同整合。我国的医疗、社区和家庭却尚未形成制度化的整合,缺乏参与的活力,相关资源匮乏以至于协同的动力不足。因此,在医疗方面,我国应当打通医疗与教育的隔阂,建立婴幼儿的健康信息与教育的共享机制,实现医育结合。在社区方面,把社区资

源纳入托育的环境和课程之中,盘活社区的闲置场所,与社区图书馆、公园等建立合作关系。在家庭方面,畅通家庭诉求的表达渠道,将家长的诉求系统性地体现在教育决策中,并且以育儿补贴、托育消费券等形式提升家庭的选择意愿和能力。

参考文献:

- [1]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25[EB/OL]. (2025)[2026-01-18]. <https://www.stats.gov.cn/sj/n dsj/2025/indexch.htm>.
- [2]闻英,邹桂阳.制度重构与价值重塑:生育友好型社会的双重构建路径[J].决策科学,2025,(04): 15-24.
- [3]任沙沙.托育服务制度化的实践困境与纾解——基于社会学制度主义视角[J].北京教育学院学报,2025,39(05):76-84.
- [4]UNICEF Innocenti. (2020). Worlds of Influence: Understanding what shapes child well-being in rich countries (Innocenti Report Card No. 16). UNICEF Office of Research – Innocenti.
- [5]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 Finland. (2024). Act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540/2018; amendments up to 700/2024 included).
- [6]周雪光,艾云.多重逻辑下的制度变迁:一个分析框架[J].中国社会科学,2010,(04):132-150+223.
- [7]THORNTON P H, OCASIO W, LOUNSBURY M. The Institutional Logics Perspective: A New Approach to Culture, Structure, and Proces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 [8]Karila, K., & Kupila, P. (2023). Multi-professional teamwork in Finnish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Policy, 17(1), 21.
- [9]孙蕾蕾,王铁晰,龙正渝.OECD 国家婴幼儿照护服务的经验与启示[J].学前教育研究,2025,(04):35-46.
- [10]Finnish National Agency for Education. (2022). National core curriculum for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 [11]Rutanen, N., & Hännikäinen, M. (2019). Finland: Becoming and the Youngest Children at Home and in ECEC. In M. Gradovski, E. E. Ødegaard, N. Rutanen, J. Sumsion, C. Mika,

& E. J. White, *The First 1000 Days of Early Childhood* (Vol. 2, pp. 93 – 108). Springer Nature Singapore.

[12]Fröbel, F. (1909). *Friedrich Froebel's pedagogics of the kindergarten, or, his ideas concerning the play and playthings of the child.* (J. Jarvis, Trans.). In W. Lange (Ed.). New York: D. Appleton and Company.

[13]李梓怡,刘丽伟.贯彻公平普惠理念,赋能家庭助力托育——芬兰0~3岁婴幼儿照护服务的主要做法及启示[J].早期儿童发展,2023,(01):38-48.

[14]Ministry of Social Affairs and Health, Finland. (2007). *Child Welfare Act* (No. 417/2007; amendments up to 1292/2013 included).

[15]Republic of Finland. (2016). *Act on Client Fe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and Care* (1503/2016).

[16]Republic of Finland. (2021). *Act on Central Government Transfers to Municipalities for Basic Public Services* (618/2021).

[17]万丹,周文雯.我国托育服务供需错配的表现、成因及破解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6,(01):50-57.

[18]洪秀敏,陶鑫萌.改革开放40年我国0~3岁早期教育服务的政策与实践[J].学前教育研究,2019,(02):3-11.

[19]黄靖,傅静思,蔡晷怡.我国婴幼儿照护服务政策执行的困境与优化路径[J].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5,43(12):37-41.

面向新质劳动者的高职财税专业课程体系创新研究

刘玉叶

(安徽职业技术大学 智慧财经学院 230011)

摘要：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我国当前的核心战略，其本质在于培养兼具数字素养、创新思维与工匠精神的“新质劳动者”。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作为对接财税数字化转型的关键载体，其现有课程体系在培养目标、内容结构与产业需求间存在显著断层。本研究旨在回应这一核心矛盾，通过系统绘制财税领域“新质劳动者”能力图谱，创新性提出“三层四模、项目贯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重构方案，以期高职财税专业面向新质生产力进行系统性课程改革提供参考。

关键词：新质劳动者；财税大数据应用；能力图谱；课程体系重构

基金项目：安徽省高校科研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类）：“数字税务助力企业新质生产力提升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路径研究”（2024AH052668）；2022年度安徽省职业与成人教育学会教育教学研究规划课题一般项目“数智时代《基础会计》分层分类OMO教学模式改革与实践”（Azcj2022157）；安徽省高校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哲学社科）“管理会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再研究”（2022AH052048）；安徽省质量工程研究项目：“高职经济法分层分类案例互动模式研究”（2021jyxm0790）。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89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he Curriculum Syste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or New Types of Workers

Liu Yuye

School of Smart Finance, Anhui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University 230011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 core strategy in China at present, and its essence lies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workers" with digital literacy,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craftsmanship. As a key carrier for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the current curriculum system of the big data application major in higher vocational finance and taxation has a significant gap between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content structure and industrial demands. This study aims to address this core contradiction by systematically drawing the competency map of "new quality workers" in the field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and innovatively proposing a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reconstruction scheme of "three layers and four models, project integration", with the expectation of providing a reference for the systematic curriculum reform of finance and tax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wa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Keywords: New quality workers; Tax and finance big data application; Capability map; Curriculum reconstruction

作者简介：刘玉叶(1989—)，女，硕士，研究方向为财税大数据分析；

一、引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一创新思维,明确提出要整合科技创新资源,积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1]。在这一战略性布局下,人才的适配与重塑已成为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的关键环节与紧迫任务。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深刻变革,不仅实现了生产力的技术跃迁,更深层次地对“人”这一关键要素提出了革命性要求,即必须培养兼具数字素养、创新思维与职业精神的“新质劳动者”,以此适应并驱动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财税领域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市场经济运行的重要支柱,其数字化转型的步伐正不断加快。从“金税四期”构建“以数治税”新格局,到智能财务工具逐渐承担起流程化工作,再到基于大数据分析的税务风险预警与决策支持成为常态,行业对人才的需求已发生根本性转变,亟需既懂财税业务、又精通数据分析、更能支撑战略决策的“财税数智化复合型人才”。

高职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力量,其专业建设和课程体系必须主动适应产业发展的节奏。为响应这一现实需求,教育部2021年修订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正式增设“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这不仅仅是一个专业名称的录入,更标志着财税领域数智化人才培养进入了系统化、专业化的发展新阶段,也为高职院校的教学改革指明了清晰的航向。然而,作为一个新兴交叉专业,其课程体系建设普遍面临“新瓶装旧酒”的困境:多数院校由传统会计或税务专业转型而来,课程体系多是原有课程的简单叠加或局部修补,缺乏基于未来职业能力需求的系统性重构。这种“供给”与“需求”的错配,导致学生难以形成满足数字财税岗位要求的复合能力,成为制约新质劳动者培养的关键瓶颈。

因此,面向数字经济时代,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的人才培养必须紧扣智能化财税岗位群的能力需求,构建数字技术与财税业务深度融合的现代化课程体系^[2],真正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二、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为精准把脉现状,本研究对国内多所高职院校的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进行了调研,并结合公

开的人才培养方案文本分析,发现当前培养模式主要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培养目标同质宽泛,未能精准对接“新质”内核

不少院校的培养目标写得还比较笼统,基本停留在“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掌握财税基本知识和数据分析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这一通用表述上,未能清晰界定出“财税大数据”人才与传统财税人才或通用数据分析人才之间的独特能力标识。至于“新质劳动者”所需的数字思维、创新能力、跨界协同素养等关键特质,在培养目标中也体现得不够充分,导致后续课程设置与教学实施缺乏明确导向。

(二)课程结构机械叠加,未实现“技术-专业”的有机融合

现有课程体系在适应新质生产力要求方面,其结构性矛盾日益凸显,核心在于技术模块与专业模块之间缺乏系统性的融合设计,呈现出显著的“两层皮”形态。当前主流的“财税专业核心课+信息技术基础课+数据分析课”的课程组合模式,本质上是一种知识领域的机械叠加而非有机整合。这种架构导致课程体系存在逻辑断层:技术类课程的教学目标、内容与案例未能深度嵌入财会专业的核心问题与业务场景;财会专业课程的内容设计未能将数据分析、智能工具的应用作为解决本专业复杂问题的内生方法和必要组成部分。这种脱节造成了学生在知识建构与应用上的困境,即技术能力与专业认知在各自孤立的脉络中发展,难以在真实的、跨情境的专业问题解决中实现有效联结与协同,最终制约其形成面向新质生产力需求的、融合性的综合实践能力。

(三)教学内容更新迟缓,与行业实践脱节

教材和教学内容滞后于财税数字化实践是普遍痛点。许多课程案例仍基于手工账、线下报税等传统场景,对“全电发票”的全面推广、大数据税务稽查的模型与指标、RPA在财税流程自动化中的应用等前沿实践涉及甚少或流于概念介绍。这使得学生毕业时所学知识与用人单位实际应用的技术、工具、流程存在“代差”,严重影响就业竞争力与岗位适应性。

(四)实践教学环节薄弱,产教融合深度不足

实践教学环节设计未能体现“大数据”特征。校内实训多停留在使用单一财务软件进行模拟做账,或利用静态、小规模、结构化的“盆景式”

数据进行简单分析，缺乏对真实、海量、多源、非结构化涉税数据的处理与分析训练。校外实习岗位则大多仍为传统会计助理或报税员，学生难以接触到核心的数据分析工作。校企合作大多停留在协议层面或顶岗实习的浅层合作，缺乏共同开发课程、共建实训项目、共组教学团队的深度融合机制，企业真实项目和数据资源难以有效反哺教学^[3]。

（五）师资队伍“数字+财税”复合能力欠缺

师资是制约专业发展的关键瓶颈。现有专业教师主体来源于会计、税务或计算机等单一背景。会计税务背景的教师往往缺乏数据采集、清洗、建模、可视化的技术实操能力与信心；而计算机背景的教师则对财税业务逻辑、政策法规、风险点理解不深。能够贯通两个领域、胜任项目化教学的“双师双能型”教师严重短缺。教师的数字化转型培训往往零散、不系统，难以支撑课程体系的深度重构。

综上所述，当前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的人才培养，在目标、内容、方法、资源、师资等多个环节，均与数字经济时代财税行业对“新质劳动者”的要求存在显著差距。对其进行系统性、深层次的重构，已不是简单的课程增减问题，而是关乎专业生存与发展的战略性问题。

三、财税大数据“新质劳动者”能力图谱构建

课程体系重构必须建立在科学、清晰的人才能力标准基础之上，而能力标准应紧密结合行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4]。基于行业岗位需求调研与职业能力系统性分析，本文从职业素养能力、专业基础能力、数智技术能力、业财融合能力和创新实践能力五个维度，构建了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新质劳动者”五维能力图谱，自上而下从基础到拓展、从专业到创新的能力进阶，自下而上从实践驱动到素养支撑，共同构成一个相互关联、动态发展的职业能力有机整体，如表1所示。

表1 财税领域“新质劳动者”五维能力图谱

能力维度	核心能力要素	对应岗位	具体能力要求
职业素养能力	职业道德	全岗位通用	具备诚信、守法、责任等职业操守和工匠精神
	团队协作		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和团队合作能力
	国际视野		了解国际财税发展趋势，具备跨文化沟通能力
专业基础能力	财税理论功底	初级 + 中级为主， 高级为延伸	掌握财税基础理论知识，熟悉财税金融政策法规
	会计核算能力		具备会计核算与监督能力
	税务管理能力		掌握纳税申报、税务筹划、纳税检查等税务管理技能
数智技术能力	大数据分析能力	中级 + 高级核心岗位	运用大数据工具进行数据采集、清洗、分析与可视化
	智能工具应用		掌握财税机器人（RPA）、BI分析工具等智能工具应用
	数据建模能力		具备数据挖掘、风险预警等数据建模与决策支持能力
业财融合能力	业务理解能力	中级 + 高级核心岗位	具备业务流、数据流、财税流、知识流“四流融合”思维
	价值创造能力		能够从业务视角进行财务分析，为企业经营决策提供支持
	流程优化能力		运用数智技术优化业财税一体化流程，提升管理效能
创新实践能力	问题解决能力	全岗位分层对应（初级实践、中级提升、 高级创新）	具备运用数智技术解决财税领域实际问题的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能够适应新技术变革，具备持续学习和创新能力
	实践应用能力		通过实训实习，掌握真实工作场景下的财税业务处理能力

（注：初级岗位包括出纳、助理会计；中级岗位包括财税代理、办税员；高级岗位包括财税咨询、财税顾问、财税主管）

四、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课程体系重构

为精准回应新质生产力对财税领域“新质劳动者”的培养要求，本研究创新性地提出了“三层四模、项目贯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重构方案。通过模块化课程建设，激发专业人才培养的内生动力，以大数据、人工智能赋能人才培养的教学

方法和手段，是财税服务专业人才培养的新途径^[5]。其目的在于彻底打破传统课程体系中技术课程与专业课程“两层皮”的现状，通过结构化的层级设计与贯穿始终的项目化教学，实现知识、能力与素养的有机融合，其核心框架如图1所示。

（一）“三层”递进式能力培养框架

“三层”即职业素养层、专业融合层、创新发展层，构成了一个自下而上、从基础到高位递进式人才培养结构。

一是职业素养层。它对应着人才培养能力图谱中的“职业素养能力”，是整个体系的价值基石和行为导向。通过打破传统“公共基础课”与“专业基础课”的简单区分，构建一个有机贯通的整体。公共基础课程重在培养学生的广阔视野、科学思维和基本职业素质，而专业基础课程则进一步将这些通用素养“锚定”在财税的具体情境之中。通过这种方式，将诚信、责任、合规等抽象价值，转化为学生内化于心的职业品格，为后续专业能力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人格基础。

二是专业融合层。这是课程体系的核心主体，旨在回应“新质劳动者”所需的复合能力结构。本层重点解决“技术-专业”割裂的问题，通过对“财税专业基础”、“数智技术应用”与“业财融合创新”三大能力模块的课程进行系统性整合与重构。教学不再按孤立学科进行，而是围绕“财税大数据处理流程”、“智能税务管理”、“业财一体化分析”等核心领域，将会计、税务、数据分析、编程、智能工具应用等知识进行交叉编排与融合设计，培养学生运用数智技术解决专业核心问题的能力。

三是创新发展层。此层面向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与创新潜能挖掘。它超越了固定的课程模块，通过设置专业拓展选修课、创新创业项目、跨学科竞赛以及深入的岗位实习等形式，鼓励学生在掌握核心融合能力的基础上，探索前沿技术应用，解决更为复杂的真实行业问题，锻炼其技术创新、流程优化和战略决策支持等高阶能力，实现从“技能应用者”向“问题解决者”和“创新探索者”的跃迁。

（二）“四模”模块化能力体系构建

“四模”是对“专业融合层”与“职业素养层”部分内容的具体化，指“职业基本素养”、“财税专业基础”、“数智技术应用”、“业财融合创新”四个核心能力模块。各模块以能力为导向进行内容重组与更新。职业基本素养模块：整合思想道德、法律法规、沟通协作、职业精神等内容，强化财经法规、数据伦理与团队项目管理。财税专业基础模块：聚焦会计核算、税务管理、财务管理等核心知识，但教学内容需同步更新，融入“全电发票”、电子税务局等数字化业务场景。数智技术应用模块：强化 Python/RPA 财务自动化、大数据采集与清洗、数据可视化、以

及基础的数据建模与机器学习算法在财税场景下的应用。业财融合创新模块：这是体现“新质”的关键模块，开设“大数据税务风险防控”、“财税机器人应用与开发”等课程，培养学生“业务流、数据流、财税流”融合的思维，以及运用数智技术进行业务流程优化、价值创造与风险管控的能力。

（三）“项目贯通”融合驱动教学实施

“项目贯通”是确保“三层四模”有机整合、避免再次割裂的关键教学策略。具体来说，就是要设计一系列由浅入深、贯穿整个人才培养周期的综合性实战项目，并将其作为组织教学内容和评价学习成果的主线。这些项目应直接来源于企业真实场景，或高度模拟真实情境。低年级时，通过相对简单的项目，推动“财税专业基础”和“数智技术应用”两个模块的初步融合；进入高年级后，则通过复杂的综合性项目，要求学生综合运用“四模”中的所有知识与技能。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会计、税务、数据分析、编程、系统设计等多领域能力得以自然贯通，团队协作、创新思维等职业素养也能同步强化。

总的来说，“三层四模、项目贯通”课程体系重构方案，以清晰的“新质劳动者”能力图谱为靶向，借助层级化的结构设计、模块化的内容重组以及项目化的教学实施，系统性地回应了当前培养模式中的核心矛盾。



图1 “三层四模、项目贯通”课程体系

五、结论

发展新质生产力，基础在劳动者，关键在教育。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的建设，必须直面数字经济带来的深刻变革，以培养能够驾驭数据、赋能财税管理的“新质劳动者”为根本使命。本文针对当前专业人才培养中存在的目标泛化、内容滞后、实践薄弱等核心问题，遵循“从产业中来，到教育中去”的逻辑，构建了系统化的解决方案。首先，通过多维度调研，构建涵盖职业素养、复合能力、技术技能三个层次的财税大数据“新质劳动者”能力图谱，将宏观人才需求转化为清晰、可操作的教育培养标尺。其次，以图谱为依据，创新性提出“三层四模、项目贯通”的模块化课程体系重构方案。该方案以“通识素养基础层”为根基，以“专业能力核心层”为主体，以“拓展创新发展层”为延伸，通过贯穿始终的“项目化”教学，彻底打破学科壁垒，实现技术、业务与素养的深度融合，旨在培养学生解决复杂

财税数据问题的综合职业能力，以此推动职业教育的内涵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发展输送适配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参考文献：

[1]习近平.牢牢把握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3-09-09(01).

[2]丁春玲.数字经济时代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构建研究[J].产业与科技论坛,2022,21(21):276-278.

[3]高敏.创新能力视角下应用型高校就业生态供需错位与系统重构[J].就业与保障,2026,(01):90-92.

[4]覃丹.高职财税大数据应用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析[J].财会学习,2024,(07):149-151.

[5]郝宝爱,李飞.创新构建模块化课程体系培养财税服务新型劳动者[J].山西财税,2024,(12):27-30.

地方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与实践-以山东理工大学

“空间信息+” 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为例

王春光¹ 苏天^{1*} 刘建平¹

(1.山东理工大学, 山东 淄博 255000)

摘要: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中,仍存在专业领域不聚焦、产教融合推进“一头热”、专业及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师资队伍实践能力弱等问题。为此,本研究根据高校人才培养内在逻辑和“专精特新”企业用人特点,聚焦“空间信息+”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的建设与实践,联合“专精特新”企业、关键产业链重点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中心、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单位,依托优势特色专业,为相关单位同高校深化合作,搭建融科研教学、实践实训、创业就业、社会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产业人才培养载体,探索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可复制、能推广、见实效的示范性人才培养体系。

关键词:现代产业学院; 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空间信息+; 产教融合

基金项目:山东省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重点项目): 赋能产业集群发展的地方高校“政产学研”一体式专业集群建设与实践(Z2023102); 中国建设教育协会科研课题: 新工科背景下多目标融合的土建类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体系重构与实践(2025026); 山东省优质研究生课程: 工程结构仿真技术(英语)(SDYKC2025090); 山东省优质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库建设项目: 基于虚拟仿真技术及典型工程实例的土木工程领域双语案例库建设(SDYAL2023114);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50201082270537): “新工科背景下“政产学研”一体式专业集群建设路径探索。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500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in Local Univers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Space Information+” Industrial College a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Chunguang Wang¹, Tian Su^{1,*}, Jianping Liu¹

¹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and Geomatics,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China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continues to face several persistent challenges, including a lack of focused specialization in key fields, imbalanced advancement i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a disconnect between curriculum design and industrial demands, and insufficient practical expertise among teaching staff.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this study, grounded in the inherent logic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aligned with the recruitment patterns of “Specialized, Sophisticated, Distinctive, and Innovative” enterprises, concentrates on the constru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a “Spatial Information+” specialized industrial college. Through collaboration with

作者简介:王春光(1984—),男,博士,学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高校教育、结构工程;

苏天(1989—),男,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土木工程材料;

刘建平(1970—),女,教授,研究方向为混凝土结构。

通讯作者:苏天

enterprises, key enterprises in critical industrial chains, local SME service centers, industry associations, and industrial parks—while leveraging established disciplinary strengths—this initiative aims to create an integrated talent development platform. This platform is designed to synergize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practical training, entrepreneurship, employment, and social services, thereby fostering deeper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between academia and industry. The research further seeks to explore a novel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 underpinned by profou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with the ultimate goal of establishing a replicable, scalable, and demonstrably effective exemplary framework for talent development.

Keywords: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Specialized, Sophisticated, Distinctive and Innovative” Industrial College; Spatial Information+;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产业学院概念的提出可以追溯到1988年覃晓航在《广西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试探》^[1]中提出的：“按照我区农业、轻工业、乡镇企业的发展需要，建议创办一所民族产业化技术学院”。2017年以来，产业学院建设与规划进入快车道，“天大行动”、“北京指南”提出优化协同育人模式^[2]，探索建设产业化学院；同年，《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3]提出：“深化引企入教改革，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院校、高等学校设立产业学院”。2018年，《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4]提出“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多主体共建的产业学院和未来技术学院”。2020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5]并于同年开展了现代产业学院申报与建设工作。2022年，为进一步落实《“十四五”促进中小企业发展规划》目标，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6]，并展开了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的申报建设工作，作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一个重要分支。

可见，“产业学院”的概念与建设发展经历了“产业化学院”——“产业学院”——“现代产业学院”（“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的历程，作为一种新型的高校二级组织形态^[7]，主要涉及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为高校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有效的抓手，使其突破传统路径依赖，实现跨域式发展成为可能。

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中，仍存在专业领域不聚焦、产教融合推进“一头热”、专业及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师资队伍实践能力弱等问题^[8-10]，为此本项目聚焦“空间信息+”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的建设与实践，联合“专精特新”企业、关键产业链重点企业、地方中小企业中心、行业协会、产业园区等单位，依托优势特色专业，为

相关单位同高校深化合作，搭建融科研教学、实践实训、创业就业、社会服务等功能为一体的新型产业人才培养载体^[6]，探索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可复制、能推广、见实效的示范性人才培养体系。

一、地方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中面临关键问题

1. 服务定位不够精准，片面追求合作企业“高大上”，服务新兴产业数量少。
2. 学校管理层面政策不完善，理事会不健全，产教融合推进过程“一头热”现象明显，缺少长效机制。传统学科型二级学院建制，在面向以跨界融合为特征的社会服务时，难以汇聚资源形成合力。
3. 专业及课程设置与产业需求脱节，教学计划与企业生产安排时间冲突，学用落差、就业鸿沟。
4. 师资队伍实践教学能力弱，偏离真实工程技术问题。

二、山东理工大学“空间信息+”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实践

（一）建设联合管理机构，为专精特新空间信息产业学院建设和运行提供持久机制保障

在遵循学校办学规律的基础上，联合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共同探索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模式，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探索双主体“共建、共享、共赢”建设机制，实现资源高效利用。

（二）建设专精特新空间信息产业学院，培育面向产业前沿的高端科学研究能力

结合淄博市地处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区、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两大国家战略经济区以及山东省会城市群经济圈的区位优势，

面向地理信息产业高精度地图智能获取、实景三维中国、地理人工智能等空间信息的前沿问题,以专精特新产业学院为框架,共同组建校企双方智力资源队伍。围绕产业技术瓶颈和特性技术难题开展协同创新,推动科学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为空间信息行业提供更多专业人才,促进专业转型升级。将前沿科技与案例融入教学,形成教学案例,反哺教学。

(三) 产教融合,构建师资共享机制

校企共同组建产业学院教学团队,选派高素质师资和技术骨干人员进驻产业学院,实现实训项目双导师制,通过项目提升教师的实践能力。产业学院实施产业教授(导师)特设岗位计划,聘请企业技术管理骨干担任产业教授(导师),将产业学院建设成“双师双能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建立“科技副总”、“人力资源副总”、“产业教授”等校企人才双向流动机制,产业教授和企业教师深度参与课程建设、实习指导,科技副总助力企业技术创新;校企双方以研讨、培训、挂职锻炼等多形式,共同提高育人能力和教学水平。

(四) 建设专精特新产教融合教育教学与资源中心,对标产业需求开展高水平专业体系建设和教学资源开发

发挥产业学院教育共同体作用,瞄准产业发展中的需求,针对“专精特新”新质生产力的培养要求,更好地为智慧城市、空间信息的产品研发及技术升级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五) 建设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和创新教育基地

依托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共建,空间信息实训平台,主要培养学生对地理空间信息数据处理、分析、可视化,系统设计与开发,系统工程实施与管理等技术技能。建设 BIM+GIS 实验实训平台,提高学生三维精细建模与平台可视化等能力。

依托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发挥专业教师,行业领军人才,企业首席顾问、技能大师的高水平科研创新能力,聚焦空间信息产业的地理时空大数据、实景三维、CIM 平台、空间信息人工智能等创新中心,培养创新创业专业人才。

(六) 依托专精特新产业学院,提高社会服务能力

依托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结合专业实训基地建设规划,整合空间信息教育资源,组建一支理论知识扎实,技能水平高超的培训团队,为空间信息行业发展培养更多的高科技人才,同时,面向社会开展专题科普项目,通过现场参观,自媒体平台等线上线下多种形式开展信息安全科普宣传,服务国家,回报社会。

三、山东理工大学“专精特新”产业学院的实践特色

(一) 人才培养方面

形成以创新驱动企业发展、科技促进产业升级、成果反哺课堂教学的人才培养特色。构建“校企共建”思政体系,培养学生爱国主义情怀、大国工匠精神、高尚职业道德、空间信息思维和现代工程理念;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微专业与微课堂、创新创业的“一制二微双创”措施;创建校内课程+企业讲座、项目+实战、竞赛+双创+实习的“三阶式”人才培养模式。



图 1. 人才培养特色

(二) 校企合作方面

校、企双重管理空间信息产业学院,落地校企双方资源共享、人才共享、成果共享,实施产业学院共建、专业共建、实习基地共建,实现从企业“捐赠模式”到校企“共享、共建、共赢”的转变。



图2. “共享、共建、共赢”的校企合作模式

(三) 建设内容方面

构建“空间信息+”的多专业融合发展模式,融合地理空间信息工程、土木工程、交通工程、农业工程等多专业协同发展,推进“空间信息+”,将产生出新的信息能源,催生新的产品、新的服务、新的经济增长极。

参考文献:

- [1] 覃晓航. 广西民族高等教育发展试探 [J]. 广西民族研究, 1988(2):39-45.
- [2] 张凤宝. 新工科建设的路径与方法刍论——天津大学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大学教学, 2017(07):8-12.
- [3]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Z]. 国办发[2017]95号, 2017.
- [4]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 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Z]. 教高[2018]3号, 2018.
- [5] 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Z]. 教高厅函[2020]16号, 2020.



图3. “空间信息+”的多专业融合发展

四、结论与展望

地方应用型高校的生命力和独特性依赖于其地方根植性和协同性,因此,产业学院建设必须在校企协同、产教融合、校城共生上求突破,形成产教深度融合协同育人长效机制,实行共谋专业建设、共商专业育人、共建教育资源的协同育人模式。“空间信息+”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经验与收获将逐步相关兄弟院校,其建设目标、实现路径、改革内容等都将为更好地培养符合企业行业需求的高级应用型人才提供保障,为其他高校产业学院建设提供启发和借鉴。

同时,通过向政府、企业、行业开展的科研、企业培训、人才输送、社会培训、信息化、咨询等工作,提高学校社会美誉度及产业学院自主造血能力。

- [6] 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 关于组织开展“专精特新产业学院”建设的通知[Z]. 中小企函[2022]87号, 2022.
- [7] 梁彤. 地方高校转型背景下产业学院的形成与发展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 2021.
- [8] 杜阳阳, 王贞, 杜彩凤. 产教融合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问题和路径研究——基于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视角[J]. 教育教学论坛, 2024(11):53-56.
- [9] 林健.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主要共性问题分析及对策建议[J].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2024(01):1-9.
- [10] 聂晓梅, 曲永鹏, 易锋, 等. 深度产教融合下产业学院建设的问题与实施路径[J]. 北京城市学院学报, 2022(03):94-99.

从资源转化到信仰生成：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机制研究

张晓琳¹ 梁昭^{1*}

(1.泰山学院, 山东 泰安 271000)

摘要：地方红色文化是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资源，也是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支点。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虽已取得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资源运用表层化、课程衔接不够紧密、教师协同不足、制度保障不够有力等问题，影响了地方红色文化由教育资源向价值认同、由价值认同向信仰生成的深入转化。基于此，本文围绕“资源转化、课程嵌入、教学表达、认同深化、信仰生成”这一主线，提出文化母题提炼、课程螺旋衔接、教学表达优化、教师共同体协同、高校牵引赋能和制度嵌入保障等机制。研究认为，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关键不在于资源的简单叠加，而在于将其转化为贯穿不同学段的课程资源和价值资源，并通过协同机制推动学生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理想信念的有机生成。

关键词：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转化；信仰生成；思政课一体化；协同机制

基金项目：2025 年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课题一般项目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501

From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to belief generation: A mechanism study on local red culture empowering the integra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education

Zhang Xiaolin¹, Liang Zhao^{1*}

1. Taishan University, Tai'an, China

Abstract: Local red culture is an important resource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as well as a key support for advanc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across universities, secondary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Although certain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incorporating local red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problems remain, including superficial use of resources, insufficient curricular articulation, limited teacher collaboration, and weak institutional support. These issues hinder the in-depth transformation of local red culture from educational resources into value identification, and further from value identification into the formation of faith and conviction. In response, this paper follows the logical thread of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curriculum embedding, pedagogical expression, deepening of identification, and formation of conviction,” and proposes mechanisms including the refinement of cultural motifs, spiral curriculum articulation, optimization of pedagogical expression, collaboration within teacher communities, university-led empowerment, and institutionalized safeguards. The study argues that the key to empowering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through local red culture lies not in the simple accumulation of resources, but in transforming such culture into curricular and value resources that run through

作者简介：张晓琳(1995—)，女，博士，研究方向为中国语言文学、思想政治教育；

梁昭(1898—)，男，博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通讯作者：梁昭

different educational stages. Through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this process can promote the organic formation of students' political identification,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and ideals and convictions.

Keywords: Local Red Culture; Resource Transformation; Formation of Conviction; Integr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引言

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已经成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整体效能的重要要求。所谓一体化,不是将不同学段的思政课简单拼接起来,而是依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认知特点,在育人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实施机制等方面形成前后衔接、层层递进的整体设计。

地方红色文化在这一过程中具有独特优势。它来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既承载着鲜明的历史记忆、精神传统和价值追求,又具有较强的地域亲近性、现实可感性和教育感染力。将其有效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有助于增强教育内容的生动性,提升价值引领的针对性,并推动育人目标更好落地。

现有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聚焦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本身,主要讨论其内涵、价值、现实问题与推进对策;一类聚焦红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重点讨论其育人价值、主要内容及实现路径;还有一类进一步关注教师教育课程、师范生培养以及红色资源在跨学段衔接中的运用问题。总体看,相关研究为本文提供了重要基础,但对地方红色文化如何进入不同学段课程体系、如何形成持续递进的育人链条,以及如何通过协同机制转化为稳定育人成效,讨论仍显不足。

从现实层面看,当前大中小学思政课建设仍存在内容重复与断裂并存、学段协同不足、教学方式相对单一、资源共享不够充分等问题。地方红色文化由于具有地域性、亲近性和实践性,能够在优化课程内容、丰富教学场景、增强学生认同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山东为例,其既拥有较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又在思政课一体化建设、高校参与基础教育和基层制度探索等方面具备一定基础,为观察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提供了较为典型的现实场域。

基于此,本文围绕“从资源转化到信仰生成”这一主线展开讨论。本文认为,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不是简单的“资源进入课堂”问题,而是一个涉及资源筛选、价值提炼、课程转化、教学表达、主体协同和制度保障

的系统过程。只有把地方红色文化由零散的材料资源转化为能够统摄不同学段的课程资源和价值资源,并通过协同机制加以落实,才能真正推动学生由历史理解走向价值认同,由价值认同走向理想信念的生成。

一、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逻辑起点

(一) 地方红色文化是兼具历史真实性与价值引领性的育人资源

地方红色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支撑,首先在于它具有鲜明的历史真实性和价值引领性。它并不是抽象建构出来的观念集合,而是沉淀于具体历史事件、革命人物、革命遗址和精神传统中的现实存在,因而具有较强的历史说服力和情感感染力。地方红色资源承载着革命精神与红色基因,不仅能够提供历史知识,更能够成为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

地方红色文化还具有明显的地域亲近性和现实可感性。思政课如果只是停留在抽象概念和宏大叙事层面,往往不易进入学生的具体经验;而发生在本地区、本区域的革命历史和红色记忆,则更容易引发学生的现实联想与情感共鸣。正因如此,地方红色文化不仅“有意义”,而且“可感知、可进入、可体验”,更适合转化为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稳定资源。

(二) 思政课一体化的内在要求决定了地方红色文化必须完成课程化转化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核心,不是让不同学段都“讲思政”,而是要根据学生成长规律和不同阶段的育人任务,在目标、内容、方法和评价上形成前后衔接、层层递进的整体设计。当前基础教育阶段思政课仍存在内容重复与断裂并存、不同学段衔接不畅、师资互动不足和资源共享不够等问题。正因为如此,地方红色文化如果只是作为课堂中的零散材料被偶尔使用,就很难真正服务于一体化建设。

要让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就

必须把它从“讲几个故事、举几个例子”的材料层面,提升到课程组织和价值引导的结构层面。所谓课程化转化,主要包含三层含义:一是对地方红色文化进行教育性提炼,把其中蕴含的人民立场、信仰力量、家国情怀、制度优势等核心价值转化为课程主题;二是围绕这些主题建立跨学段内容结构,使不同学段围绕同一价值主线展开学习;三是使地方红色文化与教材体系、教学目标和学生成长需求形成稳定对应关系,从而真正进入课程内部。

(三) 从资源转化到信仰生成构成地方红色文化赋能一体化的基本逻辑

地方红色文化进入思政课,并不意味着教育目标已经自然实现。真正决定其育人效果的,是它能否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由外在资源到内在认同、再到理想信念的持续转化。地方文化从沉浸体验、教学表达、内容整合到信仰内化,构成了从资源到信仰的系统育人路径。

这一过程至少包含五个基本环节:资源识别,即从地方革命历史、红色人物、革命遗址和精神传统中筛选具有明确教育意义的内容;价值提炼,即把分散的史实材料概括为具有课程组织功能的主题;课程嵌入,即围绕这些主题把地方红色文化嵌入不同学段课程体系之中;教学表达,即通过故事化、任务型、项目式和实践化等方式,使学生在认知和情感层面形成真实体验;认同深化与信仰生成,即在持续学习和多样化教学场景中,推动学生由历史理解走向价值认同,再进一步走向理想信念的形成。

需要强调的是,信仰生成不是知识灌输的自然结果,而是认知建构、情感体验和价值判断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学段学生在理解能力、生活经验和价值接受方式上存在差异,因此这种生成应体现为由启蒙到理解、由理解到认同、由认同到自觉的渐进过程。

二、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现实梗阻

(一) 资源运用仍偏表层,地方红色文化尚未真正进入课程内部

当前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最常见的方式仍然是素材式使用。教师可能在课堂中加入一个革命故事、一位英烈事迹、一处地方遗址介绍,或组织一次简单参观活动。这些做法并非没有价值,但如果长期停留在这一层面,地方红色文化就容易沦为课堂点缀,而难以成为课程建构的重

要内容。

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地方红色文化“不够丰富”,而在于资源与课程之间尚未形成稳定关系。很多地方红色文化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感和感染力,但如果没有经过系统筛选、价值提炼和课程重组,它们就难以与教材内容、课程目标和学生认知特点形成有效对应。这样一来,地方红色文化虽然“进了课堂”,却没有真正“进入课程”,更难持续作用于学生的认知、情感和价值形成。

(二) 学段衔接仍不紧密,课程容易出现重复和断层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围绕共同育人目标形成分层推进、逐步深化的课程安排。但从现实情况看,这一要求尚未充分落实。不同学段教材编写和课程设计之间缺少整体规划,既容易导致内容重复,也容易造成关键内容衔接不足。

这一问题在地方红色文化教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一方面,不同学段常常围绕同一红色人物、同一历史事件反复讲述,但讲法差异不大,难度提升有限,容易让学生产生“年年都学、层层相似”的感觉。另一方面,又存在明显断层:前一学段侧重故事感知和情感唤起,后一学段却突然转向较抽象的理论讲解和制度分析,中间缺少必要过渡。课程缺少层次化和衔接性,已成为地方红色文化赋能一体化建设的一大现实障碍。

(三) 协同育人力量尚未形成,高校与中小学之间仍有明显距离

地方红色文化要真正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不能只依靠某一学段、某一学校或少数教师的个人探索,而需要高校、中小学、教研部门和地方场馆等多方共同参与。现实中,这种协同还不充分。高校在理论研究、文化阐释和资源开发方面具有优势,但其研究成果和表达方式未必能够直接进入中小学课堂;中小学教师更熟悉学生特点和教学节奏,却可能在理论提炼和系统开发方面受到条件限制。同时,跨学段教师之间也缺少持续、稳定的共同研讨机制。不同学段教师往往更熟悉本学段教材和教学任务,但对其他学段的内容安排、目标重点和学生发展状况了解不够,导致课程设计容易停留在“各管一段”的思路中。主体之间真实合作不足,已经影响到地方红色文化运用的深度和一体化推进的质量。

(四) 制度推进仍偏阶段性,地方红色文化融入

课堂缺少稳定支撑

从长远看,地方红色文化能否持续、有效地融入思政课,不仅取决于教师个人热情和学校短期活动推动,更取决于是否形成了稳定的制度支撑。现实中,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探索出较有特色的做法,如“首课思政”等制度创新,但这类探索往往还停留在局部试点和经验层面,尚未形成统一、清晰、可持续的运行标准。

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制度与课程结合不够紧密,部分制度安排强调活动组织或课堂要求,却没有与具体课程内容、教学目标和评价方式形成配套;二是教师参与机制不够明晰,如果缺少培训支持、协同教研和成果激励,教师就容易把地方红色文化教学理解为阶段性任务;三是评价反馈不够健全,学生在认知、情感和价值层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往往缺少连续、有效的评价工具。

(五) 现实梗阻的本质在于缺少完整的转化链条

综合来看,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某一个环节单独失效,而是多个环节之间还没有真正打通。资源层面,地方红色文化尚未充分完成课程化转化;课程层面,不同学段之间尚未形成稳定的递进关系;主体层面,多方协同育人力量还未真正形成;制度层面,长效保障机制仍有待完善。

因此,推动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不能只是在现有做法上简单增加资源投放或活动次数,而是要围绕“资源转化—课程衔接—教学表达—协同推进—制度保障”建立起较为完整的机制链条。只有这样,地方红色文化才能由课堂中的辅助材料,逐步转化为贯穿不同学段的育人主线,并进一步推动学生由历史认知走向价值认同,由价值认同走向理想信念的形成。

三、从资源转化到信仰生成: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核心机制

(一) 文化母题提炼机制:把地方红色文化由“材料资源”转化为“课程主线”

地方红色文化能否有效进入思政课,首先取决于能否完成从“资源储备”到“主题建构”的转化。现实中,很多地方并不缺少红色资源,缺少的是能够统领课程内容和育人目标的组织方式。如果只是把革命人物、红色故事、历史事件和革命遗址零散地放进课堂,地方红色文化就很容易停留在素材层面,难以形成课程内部的连贯性,

也难以支撑跨学段的一体化设计。

所谓文化母题提炼,就是从大量具体而分散的地方红色资源中,概括出能够稳定承载育人目标的主题主线。地方红色文化中蕴含的人民立场、信仰力量、制度优势、爱国精神等要素,可以进一步转化为“人民至上”“信仰力量”“国家观念”“制度认同”等主题模块。这样处理的意义在于,它使地方红色文化不再只是辅助材料,而成为组织不同课程内容的价值支点。

文化母题提炼机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使地方红色文化由“碎片化使用”转向“结构化进入”,围绕相对稳定的主题形成课程单元;二是为不同学段之间的课程衔接提供共同依据。

(二) 课程螺旋递进机制:把共同主题转化为分层有序的学段课程

文化母题提炼解决的是“教什么”的问题,而课程螺旋递进机制解决的是“不同学段怎样教”的问题。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并不意味着四个学段讲相同内容,而是要围绕共同主题,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认知水平和成长任务,形成层层递进的课程安排。

这一机制的关键,在于“同一主题、分层表达”。以“人民至上”为例,小学阶段可以通过具体人物和感人故事,帮助学生形成朴素的情感认识;初中阶段可以结合地方历史和现实生活,引导学生理解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主体地位;高中阶段可以进一步联系国家制度和社会发 展,帮助学生理解人民立场的政治含义;大学阶段则应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视野中,对这一主题进行更系统的理论把握。

通过“共同主题+分层课程”的方式,地方红色文化在不同学段中既保持连续性,又体现阶段性,真正形成由感知到理解、由理解到认同、由认同到信念的课程链条。

(三) 教学表达与认同生成机制: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生的真实体验

地方红色文化即使完成了主题提炼和课程嵌入,如果缺少适合的教学表达方式,仍然难以真正进入学生内心。因此,在一体化建设中,教学表达与认同生成机制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它决定着课程内容能否由书面设计转化为学生的真实学习经验。

在这一方面,应推动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实现

可视化、场景化和数字化转化,并探索“故事化+任务型+项目式”相结合的教学方案。故事化教学有助于建立直观印象和情感联系,任务型教学有助于引导学生进行问题思考和价值判断,项目式教学则能够把学习过程延伸到调查研究、研学实践和成果展示等更完整的活动之中。课堂、活动、基地相结合的立体化模式,能够使学生在体验中理解,在参与中思考,在表达中形成认同。

更重要的是,“认同生成”不是知识输入后的自然结果,而是认知、情感和实践共同作用的结果。地方红色文化教学不能只看教师“讲了什么”,更要看学生“发生了什么变化”。

(四) 教师共同体协同机制:把分段教学转化为协同育人

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最终要落实到教师的实际教学中。无论是文化母题提炼、课程螺旋设计,还是教学方式创新,都离不开教师之间的共同参与和持续合作。问题在于,当前不同学段教师之间相对独立,对其他学段的课程内容、教学重点和学生特点了解有限,这使得一体化建设容易停留在政策要求层面,而难以进入真实教学过程。

因此,需要建设“跨学段+跨校际+跨角色”的教师协同共同体。跨学段协同意味着不同阶段教师要围绕同一文化母题共同研讨“讲什么、怎样讲、讲到什么程度”;跨校际协同意味着不同学校之间要共享地方红色文化资源、教学案例和课程设计成果;跨角色协同则意味着教研员、场馆讲解人员、地方文化研究者等也要参与到课程建设之中。教师共同体协同机制的关键,在于把抽象的一体化要求具体化为持续的合作关系。

(五) 高校牵引赋能机制:把研究优势转化为基础教育的实际支持

在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过程中,高校的作用不应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还应向课程开发、教师支持和平台建设等方面延伸。高校不是外围支持者,而应成为地方红色文化课程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

高校牵引赋能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高校能够在地方红色文化的整理、研究和阐释中发挥专业优势,提炼适合进入思政课的主题和内容。其次,高校可以把研究成果进一步转化为课程成果,如联合开发主题课程包、教学案例、数字资源和研学方案等,使地方红色文化从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可用资源。再次,高校还可以通过教师培训、驻校指导、混合研课等方式,

帮助中小学教师提升理论把握能力和课程开发能力。

从山东已有探索看,这一路径并非停留在设想层面。高校已经在特色思政课建设、课程资源开发和实践教学创新等方面参与区域思政教育改革;地方层面也在尝试依托红色场馆、研学基地和课堂制度创新,把高校研究力量、地方文化资源与中小学教学需求联结起来。

(六) 制度保障机制:把阶段性探索转化为长效运行方式

无论前面几个机制设计得多么完整,如果缺少制度保障,都很难真正持续运行。现实中,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往往容易依赖个别学校、个别教师或某一阶段的集中推动,一旦项目结束、人员变动或活动热度下降,相关做法就可能难以坚持。因此,制度保障机制并不是外加环节,而是确保前述机制能够长期稳定发挥作用的基础。

这一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就课程统筹而言,可以通过“首课思政负责制”“红色思政月”等方式,把地方红色文化内容更有计划地嵌入日常教学,而不是临时性安排。就教师发展而言,应把地方文化和红色文化研修纳入教师培训体系,使教师具备持续转化资源和组织教学的能力。就评价与保障而言,则要建立与课程建设相匹配的评价标准,将文化融入程度、课程衔接情况和育人成效纳入考察范围,并与教研、评优、职称等机制形成一定联系。

制度保障机制的意义,在于它使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不再只是临时任务,而是成为学校课程建设和教师专业发展中的常规内容。

(七) 六重机制的内在联系:形成从资源转化到信仰生成的完整链条

以上六个机制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共同构成了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完整链条。其中,文化母题提炼机制解决“资源如何进入课程”的问题,课程螺旋递进机制解决“不同学段如何有序展开”的问题,教学表达与认同生成机制解决“学生如何真正受到教育”的问题,教师共同体协同机制和高校牵引赋能机制解决“多主体如何形成合力”的问题,制度保障机制则解决“这些做法如何长期坚持”的问题。

从整体上看,这一链条体现出清晰的转化方向:地方红色文化首先要被提炼为能够承载价值目标的文化母题,继而通过课程设计进入不同学段,再通过适当的教学表达和多方协同进入学生

的学习过程，最后在制度保障下实现持续作用，推动学生由历史认知走向价值认同，由价值认同走向理想信念的生成。

四、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实践进路

（一）以文化母题为统领，推动地方红色文化由“素材供给”走向“主题建构”

地方红色文化进入思政课，首先要避免“找到什么就讲什么”的随意状态。现实中，很多学校并不缺地方红色资源，缺的是把这些资源组织起来的课程思路。

在实践中，这一路径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其一，做好资源梳理与分类。要围绕政治认同、文化理解、社会责任和历史记忆等育人目标，对地方红色文化资源进行系统筛选，优先选择那些思想内涵明确、教育意义突出、学生容易感知的内容。其二，做好主题提炼。要从具体人物、历史事件和革命遗址背后，概括出能够跨学段贯通的核心主题，使地方红色文化由“事例集合”转化为“课程主线”。其三，做好主题关联。地方红色文化不能孤立地讲，而应与教材体系、时代主题和学生生活实际建立联系。

从山东实践看，沂蒙精神、胶东抗战文化、铁道游击队精神、台儿庄战役精神等地方红色文化资源，可以与儒家文化、泰山文化、黄河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一并纳入课程构想，并围绕“人民至上”“制度认同”“国家观念”“文化自信”等主题进行整合。

（二）以螺旋课程为主线，推动多学段由“内容拼接”走向“育人贯通”

地方红色文化能否真正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关键在于它是否同时出现在多个学段，而在于它能否在不同学段中形成有层次的连续表达。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必须坚持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在整体目标一致的基础上，处理好分段任务与递进任务的关系。

这一实践进路的重点，不是简单划分四个阶段，而是把“同一主题、分层表达”真正落实到课程开发之中。小学阶段应突出故事性和形象性，让学生先形成基本情感；初中阶段应加强历史理解和行为判断；高中阶段应更多引入制度理解、理论联系和现实思考；大学阶段则应重在理论自觉和价值自觉，引导学生把地方红色文化放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中国式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视野中加以理解。只有让地方红色文化在不同学

段中围绕共同主题展开，并在难度、重点和表达方式上逐步提升，思政课一体化才不是形式上的连续，而是内容和目标上的真正贯通。

（三）以教学场景为支撑，推动课堂教学由“单一讲授”走向“多维表达”

实践进路不能停留在课程设计层面，还必须进入真实教学场景。地方红色文化之所以具有独特育人价值，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适合通过多样化、情境化方式展开教学。因此，在推进过程中应改变单一依赖教师讲授的方式，把课堂、活动、基地和数字资源结合起来，形成更有参与感和体验感的学习过程。

具体来看，课堂教学可以更多运用故事讲述、情境讨论和问题导向等方式，使地方红色文化先“讲得进”；活动设计可以加入主题展示、口述史整理、红色地图制作、研学任务单等内容，使学生“做得进”；基地教学可以依托红色场馆、纪念馆和革命遗址，让学生“走得进”；数字学习则可以通过微课、虚拟展馆和线上资源库等方式延展学习空间，让学生“用得进”。需要强调的是，教学场景的丰富化并不是为了追求形式新颖，而是为了更好支持学生认同的形成。

（四）以高校赋能为牵引，推动育人资源由“分散占有”走向“协同共享”

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不应主要依赖基层学校单独摸索，而应充分发挥高校在研究、开发和支持方面的带动作用。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可以沿着“高校研究—课程开发—中小学实践”的纵向协同路径展开。在实践中，这一路径可从三个方面推进。第一，建立课程联合研发机制。由高校教师、中小学教师和教研人员共同参与，把地方红色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主题课程包、分段课例、案例资源和教学指南。第二，建立教师双向交流机制。通过高校教师进中小学、中小学教师进高校、联合备课、混合研课等方式，缩短不同学段教师之间的距离。第三，建立基地与平台共建机制。高校可以联合地方场馆、研学机构和中小学，共同建设实践基地与数字资源平台，减少资源分散、重复开发和使用不均衡的问题。

从山东已有探索看，这一路径并非停留在设想层面，完全可以沿着“高校引领、地方协同、学校落实”的方向逐步推进。

（五）以制度嵌入为保障，推动教育实践由“阶

段探索”走向“长效运行”

任何一项教育改革,如果不能进入制度层面,最终都容易停留在阶段性尝试。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同样如此。前述各项做法能否持续推进,取决于是否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安排。

在实践中,制度嵌入至少应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进入教学计划。地方红色文化的融入不能只依赖教师个人发挥,而应在课程安排、教学计划和教案设计中有明确位置。第二,进入教师发展。应把地方红色文化研修、课程开发和协同教研纳入教师培训和专业成长体系。第三,进入评价反馈。既要评价课程是否有效融入地方红色文化,也要评价课程衔接是否顺畅、学生是否在认知和价值层面发生了变化。基层在“首课思政负责制”等方面的探索表明,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不能只依靠个别教师的主动性,还需要通过课程统筹、课堂规范、教师协同和评价反馈等制度设计,把零散经验转化为可持续的运行机制。

(六)以育人成效为落点,推动地方红色文化由“课程融入”走向“信仰生成”

实践进路最终要回到思政课的根本任务上来。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目标并不是单纯增加课程内容、丰富教学形式或建设几个平台,而是要通过这些过程促进学生形成更加稳定的政治认同、文化认同和价值追求。因此,实践的最终落点必须放在育人成效上,特别是放在学生能否由历史理解走向价值认同、由价值认同走向信仰生成上。

这意味着,在实践推进中应始终把握一个基本原则:地方红色文化融入思政课,不是为了让课堂显得更丰富,而是为了让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形成更深的历史感、责任感和信念感。只有当学生能够把地方红色文化中的人物精神、历史经验和价值追求,与自身成长、社会责任和国家发展联系起来时,地方红色文化才真正完成了由课程内容向精神力量的转变。

总体来看,地方红色文化赋能思政课一体化的实践进路,可以概括为一条较为清晰的推进链条:以文化母题为起点,完成资源整合;以螺旋课程为主线,完成学段贯通;以多维教学场景为抓手,完成课堂转化;以高校赋能和平台共建为支撑,完成协同共享;以制度嵌入和评价反馈为保障,完成长效运行;最终把地方红色文化转化为学生可理解、可认同、可内化的信仰力量。

结语

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并不是简单地把地方革命故事、红色人物和历史遗址加入课堂,而是要把这些资源转化为能够贯穿不同学段、支撑课程结构、引导价值生成的育人内容。地方红色文化要真正发挥作用,关键不在资源数量多少,而在于能否完成由“材料资源”向“课程资源”、由“课程资源”向“价值认同”、由“价值认同”向“信仰生成”的持续转化。

从全文分析看,这一系统工程的有效推进,有赖于几个关键环节的同时发力:通过文化母题提炼,把地方红色文化由零散素材整合为课程主线;通过螺旋式课程设计,把共同主题转化为符合不同学段特点的分层内容;通过故事化、任务型和项目式等教学表达,把课程内容转化为学生可感、可思、可参与的学习经验;通过教师共同体建设和高校牵引赋能,推动不同学段、不同学校 and 不同主体之间形成稳定协作;通过课程统筹、教师发展和评价反馈等制度设计,把阶段性探索转化为常态化运行。因此,推进地方红色文化赋能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不能停留在资源展示和活动叠加层面,而应坚持课程化转化、体系化设计、协同化推进和制度化保障,使地方红色文化真正实现从“资源”到“信仰”的深层转化。这既是提升思政课针对性和实效性的现实要求,也是推动地方文化资源活化利用、服务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路径。

参考文献:

- [1] 陆道坤. 新时代大中小学课程思政一体化的内涵、难点及优化路径[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43(02):38-48.
- [2] 马宝娟, 张婷婷.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问题与对策[J]. 理论视野, 2020(02):4-8.
- [3] 宋显. 红色资源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的价值、内容与路径探赜[J]. 成才之路, 2023(31):25-28.
- [4] 刘舒钰, 王欣怡, 朱以财.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背景下教师教育课程的育人困境与优化路径: 以红色资源运用为例[J]. 文教资料, 2023(02):16-19.
- [5] 刘晓哲, 魏巍. 充分运用红色资源的理论价值及实践价值[J]. 人民论坛, 2022(02):85-87.
- [6] 文天天, 陈大文. 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的由来、科学内涵与基本要求[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1(07):68-71.
- [7] 袁苍松, 蒋顺梅. 用好区域红色资源, 提升思政育人实效[J]. 思想政治课教学, 2022(06):45-49.

玩中传承：民族节庆体育游戏的幼儿教育转化路径研究

韩明慧¹ 代如意^{1*}

(1.河池学院, 广西 河池 546300)

摘要:针对民族文化在幼儿教育中“在地化”传承的困境,研究以桂西北A市为案例,通过文献梳理与田野观察,系统挖掘当地的节庆体育游戏资源。分析发现,原生态游戏在文化内涵、活动强度、规则结构等方面与幼儿教育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形成了一种适配性鸿沟。为此,研究构建了一个“文化原型分析—教育目标转译—游戏活动重构”的三步转化模型,并进行了初步实践检验。结果显示,该模型能够将“抛绣球”等多民族体育游戏顺利转化为分龄化、游戏化的园本课程。民族体育游戏的教育转化,本质上是基于文化理解的再创造,这一转化模型为非遗“在地化”的教育应用提供了可参考的实践路径。

关键词:民族体育游戏;幼儿教育;课程转化

基金项目:202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国家级)《“玩中传承”:民族节庆体育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创新应用研究》(编号202510605003)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502

Play-based Inheritance: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Pathway of Ethnic Festival Sports Games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HAN Minghui¹, DAI Ruyi^{1*}

1. Hechi University, Hechi 546300, Guangxi, China

Abstract: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of “localized” inheritance of ethnic culture i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his study takes City A in northwestern Guangxi as a case, systematically exploring local festival sports game resource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field observation. The analysis reveals a notable mismatch in cultural connotations, activity intensity, and rule structures between the original games and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reating an adaptability chasm. Therefore,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three-step transformation model of “cultural prototype analysis – educational goal translation – game activity reconstruction” and tests it preliminarily. Results show the model successfully transforms multi-ethnic sports games such as “throwing embroidered balls” into age-appropriate, play-based kindergarten curricula. The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ethnic sports games is essentially a re-creation grounded in cultural understanding, providing a replicable practical pathway for the “localize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Keywords:ethnic sports games;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curriculum transformation

作者简介:韩明慧(2003—),女,本科,研究方向为幼儿教育、韩明慧;

代如意(2004—)女,本科,幼儿教育,体育游戏。

通讯作者:韩明慧

一、引言

在全球化与现代化交织的今天,“文化自信”已成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石,而文化传承的起点,正在不断下沉至基础教育的最初阶段——幼儿教育。《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1](以下简称《指南》)与《体育强国建设纲要》^[2]的颁布,共同指向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育文化融入日常保教的时代要求。桂西北地区的A市,作为壮、苗、布依族等多民族的家园,其“三月三”“苗年”等节庆活动中蕴含的体育游戏,如抛绣球、踩高跷等,是民族精神与生活智慧的生动载体,构成了极为丰富的本土教育资源库^[3]。

然而,我们的前期观察发现一个普遍存在的悖论:一方面是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亟待传承,另一方面却是幼儿园教育实践中本土文化元素的普遍缺位或浅层应用。在许多民族地区,园本课程的开发普遍面临着现实困境,教师们对如何将本土文化有效融入日常保教感到迷茫^[4]。这种“文化资源富矿”与“教育实践贫瘠”的矛盾,揭示了民族文化在幼儿教育应用中所面临的“在地化”困境,即如何将原生态的、服务于特定民俗情境的文化实践,科学、有效地转化为适合幼儿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内容。因此,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并非简单地“要不要”引入民族体育游戏,而是聚焦于“如何引入”。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探究阻碍民族节庆体育游戏直接进入幼儿园课程的核心障碍,并进一步探索是否存在一套行之有效的转化方法,能将这些原生态的文化资源,系统地改造为适龄、有趣的幼儿课程。解答这些问题,不仅能为A市提供一套可操作的园本课程开发方案,更有望为全国众多面临类似困境的民族地区,提供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转化的可行范式。

二、文献述评与理论基础

学界对民族传统体育与学校教育的结合已有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民族体育的文化价值与传承危机探讨,强调其作为活态遗产的重要性^[5-6];另一类则聚焦于其在学校体育中的应用,但多集中于中小学及以上学段,内容偏向竞技化和标准化改造。针对幼儿阶段的研究虽有增加,但大多停留在对传统游戏应用价值的宏观倡导或个别案例的介绍上,鲜有研究深入剖析从文化原型到教育课程这一转化过程本身,缺乏系统性的方法论指导。

本研究的理论建构立足于对三种核心理论的整合应用。首先,赫伊津哈的游戏精神理论^[7]为

我们指明了方向,即民族节庆体育的教育转化必须是“回归游戏”而非“去游戏化”的过程,要保护和激发其内在的趣味性。其次,人类学中的文化涵化理论^[8]启示我们,文化是在族群互动与接触中潜移默化地被习得和再创造的,这提示教育工作者,文化传承不应是生硬的知识灌输,而应将文化元素巧妙地“编织”进幼儿喜闻乐见的游戏情境中。最后,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9]则为解决“适配性”难题提供了关键工具,它要求教育者通过搭建合适的“脚手架”,将游戏难度调整至幼儿“跳一跳,够得着”的区间,从而促进其发展。综上,本研究将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跳出简单的案例介绍,尝试在上述理论的指引下,构建一个聚焦于“转化过程”本身的方法论模型,以回应前述的“在地化”困境。

三、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范式,综合运用了文献法与田野观察法,力求在真实的文化与教育场域中获得深描式理解。在文献层面,我们系统梳理了关于民族体育、幼儿课程、文化传承等主题的学术文献,并深入研读地方性史料,为研究构建了扎实的理论与背景框架。研究的核心环节是在A市开展实际调查,为获取多维视角,观察对象涵盖A市内具有代表性的4所幼儿园,以了解当前教育实践的真实图景,也深入对2个壮族村寨和1个苗族村寨的活动资料进行深度挖掘,以捕捉体育游戏的“原生样貌”。

四、“玩中传承”的实现路径:三步转化模型的构建与阐释

通过对A市幼儿园及民族村寨的深入观察与访谈,我们证实了阻碍民族节庆体育游戏进入幼儿园的核心障碍,在于原生态游戏与幼儿教育之间存在一道深刻的适配性鸿沟。例如,村寨里壮年男子玩的高跷,其高度远超幼儿身高;苗年节庆上的“抢花炮”活动,充满了激烈的身体冲撞;而“竹竿舞”复杂多变的节奏,对于幼儿而言不仅难以掌握,更潜藏风险。这些原生态游戏所具有的文化内涵的隐晦性、身体对抗的激烈性以及规则逻辑的成人化等特点,使其难以被直接“搬运”到幼儿课堂。因此,要实现真正的“玩中传承”,就必须建构一条科学的、可操作的转化路径。基于此,本研究提炼并阐释了旨在跨越这道鸿沟的“三步转化模型”。该模型不仅是一个操作流程,更是一种教育思维的转换,它指导教育者如何从文化资源的“使用者”转变为教育课程

的“创造者”。

(一) 第一步:文化原型分析——探寻游戏的“根”与“魂”

转化的起点,并非对游戏玩法的表面模仿,而是深入肌理,探寻其“原型”。研究发现,任何一项民族体育游戏都可被解构为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型,即动作原型、规则原型与文化原型。这一步骤的目的是防止教育转化过程中的“去文化”或“形式化”,确保转化后的游戏“形散而神不散”。

动作原型分析,旨在识别游戏中蕴含的核心身体动作。以壮族的“踩高跷”为例,我们摒弃了其在传说中用于涉水或侦察的功能性解释,而将其动作核心提炼为“动态平衡下的交替踏步与节律性前进”。这一提炼使其与《指南》中“发展平衡能力”和“动作的协调、灵敏”等健康领域目标直接关联。同理,苗族的“打鸡毛毽”被分析为“眼、手、脚协同下的向上踢击”,而不仅仅是“踢毽子”。

规则原型分析,则聚焦于游戏内在的组织与评判逻辑。例如,传统“抛绣球”的规则原型,并非简单的投掷,而是蕴含着“在特定距离内的精准传递与成功接取”,其中包含了空间判断、力量控制和社交互动等复杂元素。若忽略这些,将其简化为单纯的“扔沙包”,则会丧失其独特的挑战性和趣味性。

文化原型分析,则是“三步转化模型”的灵魂,它要求挖掘游戏背后所承载的象征意义与情感价值。实地调研发现,“抛绣球”在壮族“三月三”歌圩中,是青年男女表达爱慕、传递祝福的媒介,其文化核心是“祝福”与“情谊”。因此,在后续的教育转化中,游戏的情感基调应围绕“分享”“友好”“快乐”来展开,而非单纯的竞技输赢。这种对“根”与“魂”的探寻,为后续的教育目标转译和活动重构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和方向指引。

(二) 第二步:教育目标转译——搭建文化与教育的“桥梁”

在完成原型分析后,接下来的关键是将这些文化元素“翻译”成幼儿教育能够理解和实施的语言——即具体的、可观察的、可评估的教育目标。这是一个将文化资源与《指南》进行双向匹配和创造性转译的过程:

1.将动作原型与幼儿的身体发展目标进行了匹配。例如,“踩高跷”的“动态平衡”动作原

型,可转译为小班“在一定宽度的平面上行走不掉下来”,中班“能双脚交替上下楼梯”,大班“能在斜坡上平稳地走”等一系列循序渐进的体能发展目标。

2.将规则原型转化为培养幼儿社会性与认知能力的契机。例如,“抛绣球”的“精准传递”规则,在中班阶段可转译为“学习与同伴轮流抛接”,培养其轮流与等待的意识;在大班阶段则可转译为“遵守分组竞赛的基本规则”,发展其初步的团队合作与规则意识。

3.将文化原型进行“浅语化”处理,使其成为幼儿可以感知和体验的情感与认知目标。壮族绣球所象征的“祝福”,可以转译为“乐于与人分享,体验交往的快乐”,让幼儿在互相抛接“祝福球”的过程中,学习表达友好。通过这样的转译,原始、深奥的文化内涵被巧妙地转化为一个个具体、可感的教育瞬间,成功搭建起连接民族文化与幼儿发展的桥梁。

(三) 第三步:游戏活动重构——游戏的“在地化”再创造

这是将理论蓝图转化为生动实践的最后一步,也是最具创造性的一步。基于明确的教育目标,对原始游戏从道具、规则、情境、分层四个维度进行系统性重构,形成全新的、适合幼儿园的活动方案。

1.道具的改良与创新。这是保障安全和激发兴趣的前提。我们将传统一米多高的木制高跷,改良为高度不足20厘米、由废旧奶粉罐或厚实塑料瓶制作的“幼儿矮高跷”,底部加装防滑垫,确保了幼儿行走时的安全。对于“竹竿舞”,则用轻质的PVC塑料管或卷起来的报纸棒代替沉重的竹竿,并由教师控制开合力度,杜绝了夹伤的风险。这些改良不仅降低了难度,更鼓励幼儿亲手参与道具制作,增加了游戏的亲近感。

2.规则的简化与游戏化。幼儿的规则意识是逐步建立的,成人化的复杂规则必须被简化。具体而言,将“竹竿舞”多变的节奏统一简化为“开—合—开—合”的固定慢节奏,幼儿的任务从“跟上复杂节奏”简化为“在竿打开时跳进去,在竿合上之前跳出来”。这种简化保留了游戏的核心挑战,同时又在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之内,使他们能通过努力获得成功感。

3.情境的故事化创设。为激发幼儿的参与兴趣,将文化背景转化为生动有趣的游戏故事。例如,在组织“踩高跷”活动时,创设了“勇敢的

小牧童要踩着高跷去草地另一边给小羊喂草”的故事背景，幼儿在角色扮演中，自然而然地练习了平衡行走的技能，游戏不再是枯燥的技能训练，而是一场充满想象的冒险。

4. 实施的分龄化设计。这是实现教育精准性的关键。同一游戏原型，必须根据不同年龄段幼儿的身心特点进行差异化设计。如表1所示，游戏“抛绣球”被重构为一套从易到难、从个体到群体的系列活动。小班幼儿在“给小动物送礼物”的情境中，练习向固定目标投掷，满足其自我中心的探索需求；中班则在“和朋友分享祝福”的配对游戏中，学习轮流与合作；大班则引入分组竞赛，体验团队协作与健康竞争的乐趣。这种分层设计，确保了游戏既能被所有幼儿接纳，又能对不同水平的幼儿构成适度的挑战。

综上所述，通过这环环相扣的三步走，我们成功将“踩高跷”“竹竿舞”“打鸡毛毽”“抢花炮”“滚铁环”“抛绣球”等6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节庆体育游戏，系统地开发为12套包含完整教案、材料准备、指导建议的园本课程活动方案。这些方案在A市部分幼儿园的初步试用中，

获得了教师和幼儿的积极反馈，初步验证了该转化模型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五、讨论

本研究构建的“三步转化模型”，其核心在于提出了一个基于A市民族体育游戏“创造性转化”而非“原貌移植”的文化遗产路径。这深化了与现有研究的对话：以往研究多聚焦于资源的价值阐述[2, 6]，而本研究通过识别并解决适配性鸿沟的问题，将研究焦点从“资源有什么”转向了“转化如何发生”，为该领域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法论框架。

该模型也为教育理论提供了实践印证。维果茨基的“最近发展区”理论[9]强调“脚手架”的作用，而本模型的“游戏重构”环节，正是通过改良道具、简化规则，为幼儿搭建起通向理解民族文化的“文化脚手架”。这同样回应了文化濡化理论[8]的精髓，即文化遗产是在特定情境下的沉浸式体验，而非简单的知识传递。该模型通过重构游戏情境，让幼儿在“玩”中内隐地学习和认同文化民族文化。

表1 民族节庆体育游戏“三步转化模型”应用示例

转化步骤	游戏案例一：抛绣球（壮族）	游戏案例二：踩高跷（壮、苗族）
第一步： 文化原型分析 （探寻“根”与“魂”）	动作原型：投掷与接取。 规则原型：在特定距离内的精准传递。 文化原型：传递祝福、表达情谊。	动作原型：动态平衡下的交替踏步。 规则原型：在规定路线上比拼速度或距离。 文化原型：征服自然的智慧、勇敢与挑战。
第二步： 教育目标转译 （搭建“桥梁”）	健康领域：发展手眼协调能力，控制投掷力度与方向。 社会领域：学习轮流、等待与合作，体验分享快乐。 语言领域：能用语言表达“我把祝福送给你”。	健康领域：发展平衡能力与下肢力量，提高动作协调性。 社会领域：遵守游戏路径规则，体验克服困难的成就感。 认知领域：感知高度变化，理解简单的空间方位（如直线、曲线）。
第三步： 游戏活动重构 （“在地化”再创造）	道具改良：将传统绣球改为适合幼儿抓握的软质布球、沙包。 规则简化：从精准抛接简化为向固定目标（小筐）投掷。 情境创设：“给小动物送礼物”“和朋友分享祝福球”。 分龄设计：小班（投筐）→中班（配对抛接）→大班（分组比赛）。	道具改良：将高木跷改为用奶粉罐、塑料瓶制作的矮高跷。 规则简化：从竞速简化为在规定路线上平稳行走不掉下。 情境创设：“小牧童过小河”“勇敢者之路”。 分龄设计：小班（扶走）→中班（独立走直线）→大班（挑战走曲线/S线）。

因此,本研究的实践启示在于,它要求教师从文化的“搬运工”转变为课程的“设计师”,其核心素养在于分析、解构并重构文化资源的能力。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通过对桂西北地区A市民族节庆体育游戏的田野观察,构建并初步验证了一个将文化原型转化为幼儿教育课程的“三步转化模型”。研究结论是:民族节庆体育游戏的在地化教育应用,其关键不在于资源的多少,而在于转化的深度与科学性。所提出的包含“文化原型分析、教育目标转译、游戏活动重构”的转化路径,是实现“玩中传承”这一美好愿景的有效方法。当然,本研究仍有局限。所开发的课程方案仅为初步成果,其在更大范围内的长期效果有待通过纵向的教学实验进一步检验。未来的研究,应从“开发”走向“评估”,即通过科学的测评手段,量化评估这些转化后的游戏活动对幼儿体能、社会性及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的具体影响,从而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学前教育领域的活态传承,提供更为坚实的实证支持。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EB/OL].(2012-10-09)[2026-1-15].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7/201210/t20121009_143254.html.

[2]国务院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体育强国建设纲要的通知[EB/OL].(2019-08-10)[2026-1-15].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9/content_5430499.htm.

[3]邬孟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节庆活动对文化认同的影响探讨[C]//河南省民办教育协会.2025年高等教育发展论坛思政分论坛论文集(下册).贵州师范学院,2025:243-245.

[4]刘英,万国崔.民族地区幼儿园课程资源开发的困境和路径探索[J].教育评论,2016,(05):139-142.

[5]吴惠生.我国民族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价值、困境及纾解[J].福建商学院学报,2025,(02):67-73

[6]宋迪涛,李谋涛.民族传统体育活态传承与健身休闲产业融合发展研究[J].黄山学院学报,2025,27(05):71-75.乔凤杰.论民族传统体育进入学校教育的价值、困境与路径[J].体育学刊,2015,22(02):92-96.

[7][荷]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M].傅存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李丹,杨东萱.如何促进民族地区少数民族教育的发展——文化涵化理论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3,(04):301-302.

[9][苏]列夫·维果茨基.思维与语言[M].李维,译.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高中英语读写教学实践

曹改娟

(1.宁夏师范大学, 宁夏 固原 756000)

摘要:针对目前高中英语读写课重阅读轻写作、读写分离、学用割裂等现象, 本文基于产出导向法倡导的“学用一体”教学理念, 提出高中英语读写课应聚焦文本的结构框架、内容指向、语言特征, 通过“输出驱动—输入促成—评价产出”活动设计实现学生输入输出的有效衔接, 并以新人教版高中必修三 Unit3 Diverse Cultures 读写课为例, 阐述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写作教学中的具体实践, 以期提高读写教学效率, 落实核心素养。

关键词:高中英语读写教学; 产出导向法; 学用一体

DOI: doi.org/10.70693/jyxb.v2i2.490

Teaching Practice of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n High Schoo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Cao Gaijuan¹

¹ Ning Xia Normal University, Gu yuan, Ningxia 756000, China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issues in high school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classes—such as overemphasizing reading, separating reading from writing, and disconnecting learning from application—this paper applies the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s principle of “integrating learning with application.” It suggests focusing on text structure, content, and language features, and designs activities around “output-driven, input-facilitated, and evaluation-based production” to effectively integrate input and output. Using the lesson “Diverse Cultures” from the PEP compulsory textbook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llustrates how this approach can enhance reading and writing teaching and develop students’ core competencies.

Keywords: English reading and writing instruction in senior high school; Production-Oriented Approach ;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using

一、引言

写作是历年高考试卷的重要组成部分, 写作教学是高中英语教学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它不仅能够检验学生语言知识掌握程度与语言技能运用水平, 更是落实英语学科核心素养培育目

标的关键路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2020年修订)》强调了“着力提高学生学用能力”^[1]。人教版高中英语教材 Reading for Writing 板块的设计重点培养学生用阅读所学语言知识进行写作及在真实语境中传递与沟通信息, 再现生活经历, 表达观点、意图和情感的能力。然而,

作者简介: 曹改娟(2001-)女, 硕士, 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英语)

通讯作者: 曹改娟

在实际教学中普遍存在重阅读轻写作、学用分离的现象,学生缺乏写作兴趣,写作能力滞后^[2]。导致以上现象的原因可能有输入与输出之间的时差过长导致遗忘、用非所学或学非所用、为应试而实施短期写作训练等,这种学用分离现象制约了英语写作教学的有效性^[3]。

产出导向法针对学用分离问题,主张输入性学习和产出性运用紧密结合,两者之间有机联动,无明显时间间隔^[4]。简单来说,产出导向法就是让学生先明确“要完成什么语言任务”,再围绕任务进行学习和练习,最终达成产出目标。在高中英语读写课教学中,利用产出导向法的逆向设计思维,首先引导学生明确写作任务,进而围绕这个写作任务,进行语篇精读与分析、好词佳句积累、课外阅读拓展、思维导图搭建内容支架等输入性活动,

为产出目标奠定基础。随之通过师生、生生互评的方式对学生的输出作出评价,以达到在合作互评中学以致用,学用一体的效果。

二、产出导向法“学用一体”理论依据概述

产出导向法由文秋芳教授将“输出驱动假设”和“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进一步与教学实际相结合而提出,旨在构建一套适合中国外语教师和学生的教学方式,以解决实际英语写作教学中学用分离的问题^[5]。其理论核心指向学用一体,在英语教学中一切语言教学活动都服务于语言运用,即输入性语言学习都为产出性语言运用服务,做到学中用,用中学,学用结合^[2]。其教学流程

是在以教师主导、以学生为主体、师生共建原则下构成驱动—促成—评价组成的活动链^[6]。

驱动阶段由老师提出一个真实、有意义且具有挑战性的写作产出任务,学生在尝试运用旧知完成该任务时发现存在的语言知识或写作框架等方面的困难与不足,激发学生的学习需求、调动学生产出兴趣,进而驱动学习。

促成阶段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环节,在这个环节教师提供特定源于主题语境的输入材料,引导学生通过选择性学习、自我发现、小组合作等方式梳理分析判断材料,获取完成任务所需的内容框架和语言结构,帮学生搭建完成任务的“脚手架”,促成产出任务的完成。

评价阶段师生共同对学生的产出成果进行评估,不仅看语言准确性,还关注内容质量和交际效果,同时给出改进建议。

三、产出导向法在高中英语读写课的具体实施

本文选取的课例是来自新人教版高中必修三 Unit3 Diverse Cultures 读写课。本单元多元文化为主题语境,聚焦跨文化理解、尊重与融合,覆盖听、说、读、写全技能训练,旨在提升学生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树立正确文化价值观。该单元的“Reading for Writing”板块主要阅读介绍美国旧金山唐人街范文,完成介绍某一城市或社区的写作任务。以下是利用产出导向法实施这节课读写课教学的具体操作,读写结合教学结构图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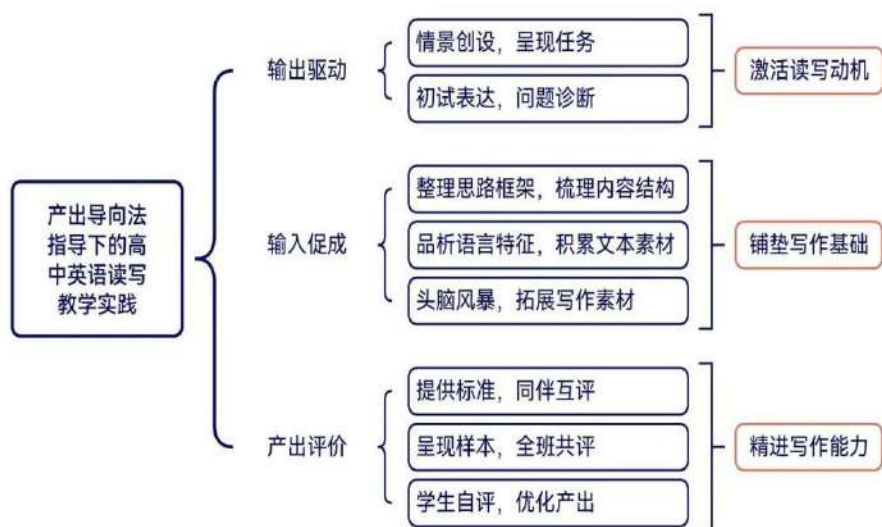


图1 读写结合教学结构图

（一）输出驱动，激活读写动机

“输出驱动”是输出假设理论指导的英语教学策略，旨在以有意义的输出任务为目标，打破“优先输入，延后输出”的传统模式，通过明确的写作、产出目标，激发学生主动开展阅读积累与写作实践的内在动力。在人教版高中英语必修三 Unit 3 Diverse Cultures 的教学中，该理念可通过“以写促读、以读助写”的逆向设计，将多元文化主题的读写学习转化为学生主动探究、表达与创造的过程，实现语言能力与文化意识的同步提升。

（二）创设情景，呈现任务

呈现交际场景是驱动环节的第一步，是产出导向法最具创意的部分^[7]。新课程强调教学情境性，这和我们一直强调的“让教学回归生活、联系生活”是分不开的，关键就是要把知识放到具体的情境和真实的生活中去教和学^[8]。教师通常会通过图片、视频、语言描述或 AI 数字人机对话等方式创设情景，将话题对应的真实场景直观呈现，激发学生对主题的兴趣与思考，待学生真正融入情境后，再顺势呈现产出任务，学生便能够清楚明确任务目标与要求。

上课伊始，教师采用电子邮件为载体创设教学情境。首先展示美国笔友 Mary 的邮件内容，其中 Mary 分享了自己通过抖音平台对中国多元城市文化产生的浓厚兴趣，表达了来中国参观的计划，并向教师提出推荐的请求。考虑到高中阶段学生对教师的个人生活普遍抱有好奇心，为进一步提升情境的真实感与吸引力，教师同步展示了与 Mary 的合照，快速拉近情境与学生的距离。当学生完全进入情境、清晰理解 Mary 的需求后，教师自然过渡到本节课的主线任务，邀请学生结合自身生活经验，为 Mary 介绍自己的城市或家乡，让输出任务的呈现既符合逻辑又富有意义。

（三）初试表达，问题诊断

明确本节课的主线任务之后，教师可在阅读文本前通过两种方式诊断学生的已有知识与能力短板。第一种是基于生活经验的口头展示诊断，教师先提问“若要为 Mary 介绍你的家乡或城市，你会从哪些方面入手”，引导学生先在小组内交流，再邀请代表进行口头展示。这一设计既便于教师诊断学情、明确学生短板并调整教学策略，

也能让学生在初次尝试任务的过程中，清晰认知自身语言知识的不足，进一步激发求知欲。第二种是基于文本主题预测内容的诊断方式，教师让学生先打开阅读文本，接着提问：“如果让你来介绍旧金山唐人街，你会从哪些方面入手？”并将学生提出的角度逐一板书。学生阅读文章时，可将自身思路与文本内容对应。阅读结束后，教师结合板书梳理文章主要内容。此方式既能实现学情诊断，又能帮助学生提前预测文章结构，提升阅读效率。

（四）输入促成，铺垫写作基础

促成环节是教学流程中的关键衔接点，当学生的学习动机被成功激活后，教师需适时引入阅读材料，通过针对性指导，使学生借助文本阅读，选择性学习，积累写作所需的语言资源与背景知识，进而实现产出质量的进阶^[9]。本节课的促成环节主要包括整理文章思路框架与内容结构、赏析阅读材料语言特征、头脑风暴写作内容等活动，以此积累文本中的语言素材、拓展文本之外的写作素材，为产出任务的写作奠定基础。

1. 整理思路框架，梳理内容结构

本环节以教材中旧金山唐人街说明文为阅读材料，通过分层阅读引导学生提取文本结构与内容要素。首先，组织学生快速初读文本，使其获取“Introduction-Body-Summary”的总分总结构，教师随即引导学生完成段落的结构分类，把文章的段落对应划分到这三个部分里，帮助学生建立清晰的篇章认知。其次，指导学生进行逐段再读，梳理并汇总各段落对唐人街的介绍维度。整个过程教师将学生梳理所得的文本框架与核心内容转化为写作支架，以板书形式呈现，既强化本节课教学重点，又为学生后续写作提供持续性的内容参考。如图 2 所示。

2. 品析语言特征，积累文本素材

在学生掌握写作框架与核心内容后，本环节聚焦细节阅读与语言赏析，核心任务为引导学生提炼唐人街各介绍维度的典型语句，分析其词汇选择、句型结构与表达技巧。例如，介绍气候时，教材范文运用了 climate、mild、comfortable、all year round 等本单元的新词汇；介绍美食时，则采用了 There is ... food to suit everyone's taste 这一通用句型。在梳理完这些文中表达后，教师需设

计针对性练习,如提供一组有明显气候特征的图片,引导学生通过模仿文词汇和中句型来描述图片中的气候巩固运用,实现语言内化,为后续写作积累可迁移的文本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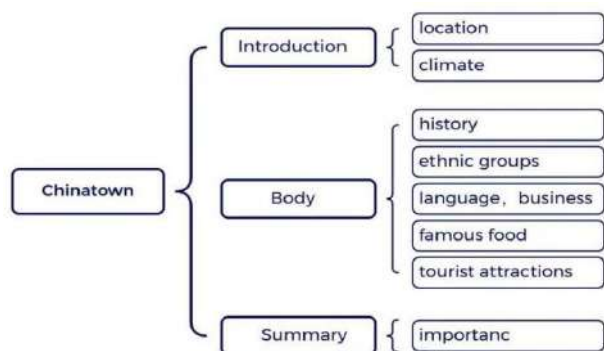


图2 写作框架板书

3.头脑风暴,拓展写作素材

在学生选择性学习教材文本中能服务于写作任务的有意义信息的基础上,本环节将组织头脑风暴活动,在学生能力范围内适度拓展教材外的写作素材。教师可结合本节课的任务情境,以“你想为Mary介绍哪些地方”为切入点引导思考。高中学生熟悉的地点多集中于自身所在城市或家乡,而这些区域往往蕴含独特的文化与历史。基于此,教师通过头脑风暴活动鼓励学生主动分享自己想介绍的地点及其特色。考虑到学生可能存在“有想描述的内容,却不知如何用英语准确表达”的问题,教师在备课时需提前预测此类情况,允许学生先用汉语表述相关内容,并及时为其提供对应词汇或句式的英语表达。例如,宁夏学生若想介绍当地农业特产枸杞,却不熟悉“Gouji berry”这一表达,教师需及时以板书的形式补充该词汇,供学生整合内容所用。

(五)产出评价,精进读写能力

产出导向法有一个重要的观点,那就是评价要和学习、教学有机结合起来。评价不只是简单的打分,更是让学生的学习得到强化、实现升华的关键环节,所以教师必须把它纳入到整个教学循环中,作为必不可少的一步^[6]。本节课的评价环节采用同伴互评、全班共评、学生自评相结合的多元评价模式。教学中依据统一评价标准,通过多主体评价,分别指出学生写作中的亮点与不足,引导学生在同伴间相互借鉴、全班共同研讨的基础上,开展自我修改,最终实现作品的优化

完善。

1.提供标准,同伴互评

学生完成初稿后,教师组织同伴互评。首先呈现评价标准,这份标准采用打分的方式,从文章结构、内容质量、语言表达和书写规范四个方面来评价,每个方面的打分范围是1到5分。教师详细解读评价标准后,将学生划分为四人小组,组内成员交换作品进行评分。同时以“评选小组最优作品”为激励机制,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互评过程中,教师需巡视课堂,针对学生有困难的地方进行针对性点拨。评价标准如图3所示。

Item	Criteria	Scores (1-5)
Structure	1. Is the structure of the introduction clear?	
Content	2. Does the city/town introduction contain all the important information?	
Language	3. Is the information arranged in a good order?	
	4. Does the writer use the useful expressions or sentence patterns?	
	5. Are there any grammar or spelling mistakes?	
Handwriting	6. Is the handwriting neat and clear?	

图3 写作评价标准

2.呈现样本,全班共评

在同伴互评环节完成小组最优作品推选后,教师通过投影展示各小组的优秀作品,组织全班参照统一评价标准展开集体评议。这一轮评价采用文学圈模式,邀请学生主动上台,一方面对作品中的亮点进行标注与肯定,另一方面针对拼写、语法、用词等语言层面的错误或不当表达,标注问题并提出具体修改建议。全班共评通过集体分析典型作品,汇聚集体智慧,帮助学生打破个体视角的评价局限,形成更全面的评价认知,进一步深化对写作要求的理解与把握,以便更好地完善个人写作、精进写作能力。^[10]

3. 学生自评，优化产出

经过小组内成员互评和全班共评，学生对评价标准有了一定的理解和把握，在此基础上，教师组织学生依照评价标准和文学圈的范例对自己产出的作品进行自我评价和修改，逐一核查文章结构、内容质量、语言表达及书写规范等，同时借鉴文学圈范例中的优化思路，弥补自身作品不足，最终打磨形成完善的终稿作品。

四、结语

产出导向法针对现有读写课普遍存在的学用分离现象，为高中英语读写课提供了一套符合学生学习规律的具体教学模式。这个教学模式以输出为驱动，激发学生写作动机、以输入促成铺垫学生写作基础、以产出评价深化学生写作认知，精进学生写作能力。在产出导向法的指导下，Unit3 Diverse Cultures 读写课的实施不仅体现英语课堂学生的主体地位，同时能够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读写效率。^[11]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2018.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 张运桥.2020.产出导向法指导下的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实践[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05):1-6.

[3] 赖曼珍.2023.基于产出导向法开展高中英语写作“学用一体”教学的实践[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05):29-33.

[4] 文秋芳.2015.构建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J].外语教学与研究, (4): 387-398.

[5] 文秋芳.2014.输出驱动—输入促成假设—构建大学外语课堂教学理论的尝试[J].中国外语教育, (2): 3-12, 98.

[6] 文秋芳.2018.“产出导向法”与对外汉语教学[J].世界汉语教学, (3): 387-400.

[7] 文秋芳.2020.“产出导向法”：中国外语教育理论创新探索[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8] 王茜莹.2018.情境创设—英语课堂中的有效运用[J].当代家庭教育,(02):40-4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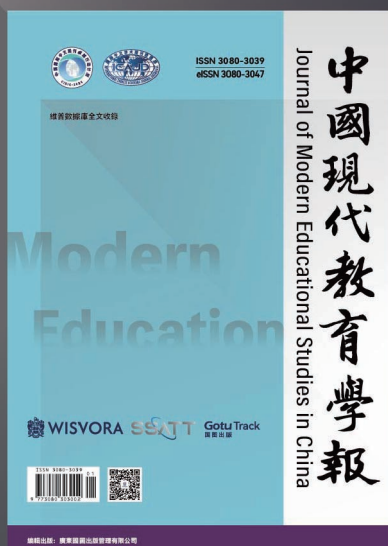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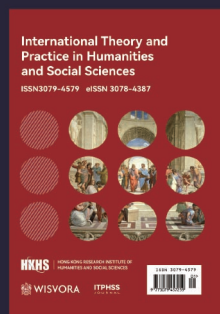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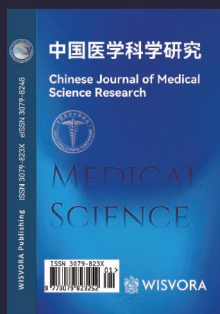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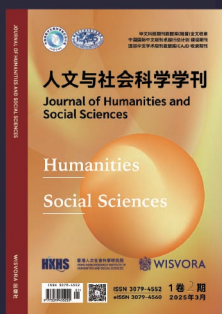
[9] 孙幸立.2021.基于“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读写教学模式探究[J].中小学英语教学与研究, (10):49-53+69.

[10] 陈涵琳.2023.基于“产出导向法”的高中英语写作教学实践研究[D].湖南科技大学.

[11] 马晓磊,丁雪萍.2024.基于产出导向法的初中英语读写教学实践探究[J].中小学外语教学(中学篇), 47(07):24-29.

WISVORA 出版社：專注於學術出版管理，WISVORA 出版社提供期刊編輯、論文出版和國際索引、期刊創辦、期刊託管等服務，增強學術研究的全球傳播和影響力。

www.wisvora.com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

Journal of Modern Educational Studies in China

《中國現代教育學報》是一份聚焦中國教育現代化進程、服務教育強國戰略的學術期刊。期刊以推動教育學理論發展與教育實踐創新為核心使命，重點關注課程改革、教育政策、教學理論、教師發展、教育技術等重大議題，致力於在新時代教育變革背景下，探索更為科學、高效、人本的教育路徑。

印刷出版 ISSN 3080-3039

網上出版 ISSN 3080-3047



學術贈閱

權責聲明

本期刊所刊載的評論、意見、觀點等均出自文章作者個人立場，不代表本期刊的觀點或看法。對於文章任何部分及文內引用材料給任何個人、機構、及其財產所帶來的任何損失及傷害，本出版社均不承擔任何責任。我們鄭重聲明，本出版社的出版業務，不構成對任何產品商業性能的保證，也不表示本社業已承認本社出版物中所述內容適用於某特定用途。如有疑問，請尋找專業人士協助。